山川　　历史　　人物

永嘉掌故



肖志华　严昌洪　主编



ISBN 7-5430-1200-6

9 787543 012004 >

ISBN 7－5430－1200－6/I・151　　定价：9.80 元

武汉掌故

肖志华　严昌洪　主编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沙市市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5.5 印张　插页 1　335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9.80 元
*
ISBN 7—5430—1200—6/I・15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封面题字　洪　源
责任编辑　潘长胜
封面设计　李　敏

目　录

·上编·

故园青史话沧桑(代序) …… 杨振兴　1
"武汉"的由来 …… 3
"扬子江"名的来历 …… 4
芳草何处鹦鹉洲? …… 5
晴川历历汉阳树 …… 7
汉阳为何在汉水之南? …… 9
武昌名山"龙"占多 …… 10
"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 …… 11
蛇山古迹觅踪 …… 12
　孔明灯、石照亭与仙人洞 …… 13
　涌月、压云与南楼、北榭 …… 14
　历史的纪念 …… 16
有凤来仪——武汉三座凤凰山 …… 17
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 …… 18
清代黄鹤楼的铜顶 …… 20
龟山古迹揽胜 …… 24
摩崖长留天地间 …… 26
千湖之乡——武汉的湖泊 …… 28
后湖何处觅芳踪 …… 30
东湖定比西湖强 …… 33
李白泛舟郎官湖 …… 34
"坐两天牢，充一天军"——昔日马沧湖之旅 …… 36
高山流水有知音 …… 37

榴花吐蕊为谁开？ …… 39
汉阳十景名胜多 …… 40
黄陂十景与"铁锁龙潭" …… 42
归元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 …… 43
宝通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二 …… 46
古德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三 …… 49
莲溪寺—— 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四 …… 50
佛教居士团体 …… 51
抗战僧尼救护队 …… 53
汉口第一公园——中山公园 …… 54
不知遗址所在的怡园 …… 56
乃园——一幅"田园山水画" …… 58
敬生花园漫忆 …… 59
杨森花园 …… 60
萧耀南庄园 …… 61
花楼街的故事 …… 62
"背娘舅"与保华街 …… 64
"满园春色"一名街 …… 65
华清街——多事的街 …… 66
汉口里弄的崛起 …… 68
接驾嘴接谁的驾？ …… 69
故国神游——三国遗迹巡礼 …… 70
黄巢的"系马桩" …… 72
凤凰山下"天完国" …… 73
三公庙异事 …… 74
未雨绸缪——晋将陶侃的故事 …… 75
焦度与焦度楼 …… 77
"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宋状元冯京轶事 …… 78

江夏的榜眼和探花 …… 79
汉阳的榜眼：萧良有与熊伯龙 …… 81
唐代武昌大员趣闻 …… 83
二程夫子与黄陂 …… 84
黄陂文武三榜眼 …… 85
弃城而逃的威顺王 …… 87
"诡谲秀才"吴衡 …… 88
官文督府"三大" …… 89
裙带风一例——陈夔龙妻改变朝廷成命 …… 91
张济川一日"三捷" …… 92
阅马厂与红楼 …… 93
孙中山铜像与黄兴铜像 …… 95
"床下都督"黎元洪 …… 96
黎本危的醋劲与改嫁风波 …… 99
为科学献身的徐建寅 …… 101
大智若愚——华蘅芳为仆所愚 …… 102
词人老去风情不减——王湘绮与"侠妓"王金玉 …… 103
地皮大王刘歆生的自吹 …… 104
孔庚监狱写春联因祸得福 …… 106
萧楚女、李四光改名趣谈 …… 107
为中国工运献身的第一人 …… 108
"劫收"大员"四大金刚" …… 109
话说武汉童子军 …… 111
保卫武汉的三大空战 …… 113
中山舰金口遇难 …… 114
武汉的鲁迅逝世周年祭 …… 116
汉口人力车夫血泪史 …… 117
吴一狗案 …… 118

龚银保案 …… 119
徐典案 …… 119
"四三"惨案 …… 120
水杏林案 …… 120
"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 121
一三里与工人运动讲习所 …… 123
两个"六一惨案" …… 124
"六一惨案"祸首"投江自杀"假相 …… 127
蒋介石怒杀韩复榘 …… 128
洪帮"寨主"杨庆山 …… 130
王世杰不怕挖祖坟 …… 132
吴国桢照相馆结姻缘 …… 133
《俄华辞典》与陈昌浩 …… 134
陈时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 136
郭沫若与第三厅 …… 137
"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 139
熊廷弼巧帮冯梦龙 …… 140
江夏书画家趣闻 …… 142
"江夏画派"的鼻祖——"画状元"吴伟 …… 143
闵杲子为贱牛脯而作画 …… 144
美术家的摇篮——武昌艺专 …… 146
汉口市警察局长策反内幕 …… 148
张轸智斗"小诸葛" …… 150
黄陂三姊妹 …… 152
杨永泰被刺案探秘 …… 153
陈启天与国家主义派 …… 155
僧房认子报夫仇 …… 156
两世姻缘 …… 157

黄鹤楼九老诗会 …… 158
"莫笑鸽眼石，不换蛾眉人" …… 160
第一支劳动人民的足球队 …… 161
武汉的古老书院 …… 162
江汉书院 …… 162
晴川书院与凤山书院 …… 163
经心书院 …… 163
两湖书院 …… 164
钟台书院 …… 165
近代学堂的兴起 …… 166
早期警察及其警务、警风 …… 168
武汉邮政、电信之始 …… 170
武汉铁路、火车之始 …… 171
中国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 …… 172
《鄂州约法》的诞生 …… 173
景明大楼美军逛舞案 …… 174
满城争说"双钉案" …… 177
奇特的社会产物——武汉的茶馆 …… 179
"九头鸟"典出何处？ …… 181
漫话除夕旧俗 …… 183
春节习俗琐记 …… 184
龙腾狮跃闹元宵 …… 185
数罗汉与大士阁求子 …… 187
木兰山进香旧话 …… 189
洪山菜苔趣闻 …… 191
"秋来倍忆武昌鱼" …… 193
热干面与名小吃 …… 194
美人店的蝴蝶面 …… 196

武鸣园里吃河豚 …… 197
近代汉货精品 …… 198
武汉著名老字号 （中药业） …… 200
古老的药店叶开泰 …… 200
"同登寿域"的金同仁 …… 201
以饮片闻名的陈太乙 …… 202
洪帮大爷开设的初开堂 …… 202
武汉著名老字号 （绸布业） …… 203
妇孺皆知的谦祥益 …… 203
悦新昌绸缎局 …… 204
武汉著名老字号 （餐馆业） …… 205
经营楚乡名菜的老会宾楼 …… 205
以鱼菜为主的大中华酒楼 …… 205
小笼汤包四季美 …… 206
豆皮大王老通城 …… 207
老大兴园与"鲫鱼大王" …… 207
从"筱陶袁"到"小桃园" …… 208
武汉著名老字号 （食品杂货业） …… 210
250年的老店汪玉霞 …… 210
"一大把"蚕豆起家的曹祥泰 …… 211
过世纪的伍亿丰 …… 212
老锦春酱园 …… 213
和利汽水厂发家小史 …… 214
经营有方的国货公司 …… 215
"外圆内方"——周恒顺的立厂之本 …… 216
武汉地区主要教堂 …… 217
韦棣华与武汉第一所图书馆 …… 219
湖北最早的西医院和第一位西医 …… 220

花园山育婴堂的万婴墓 …… 221
三镇善堂与汉口慈善会 …… 223
阳逻浮尸与培心善堂 …… 226
游弋江、汉的救生红船 …… 228
敬节堂里寡妇泪 …… 229
"大水冲了龙王庙"——近代武汉大水灾 …… 231
大火烧不尽，劫后又复兴——明清时代汉口大火灾 …… 233
旧汉口的堂子姑娘 …… 236
洪帮帮规种种 …… 238
"翻戏党"及其拆骗手法 …… 239
"花会"与花会迷 …… 241
"丐帮"探秘 …… 243

·下编·

龟蛇锁大江的传说 …… 246
汉阳古城的兴废 …… 247
武昌城的变迁 …… 249
汉口堡的兴建与拆毁 …… 250
洪山上的塔 …… 251
九峰山与无念禅师 …… 252
八分山与白云洞 …… 253
木兰山与木兰古寨 …… 254
九真山的"九" …… 256
吹落乌纱帽　变作镇水山——纱帽山的来历 …… 257
三镇古堤漫忆 …… 258
澹灾伟画——金水闸的修建 …… 261
"谁人垒石架长虹？"——三镇古桥巡礼 …… 262
古江汉亭与雄楚楼 …… 264
古镇金口与留云亭 …… 266

"无陂不成街"——汉口的黄陂人与黄陂文化 …… 267
江楚名区长春观 …… 271
九宫八卦的元妙观 …… 274
神灵之宅的武当宫 …… 276
闹市街头的大道观 …… 277
旧武汉的"长街"与"正街" …… 279
武汉名人路 …… 281
用"三民主义"命名的四条路 …… 283
武汉行业街 …… 284
汉口的"雨花台"——铭新街 …… 286
防汛险段龙王庙 …… 287
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 …… 289
武汉第一座水塔 …… 290
梅神父医院与梅神父路 …… 291
人间地狱——汉口难民区 …… 293
武汉三条文化街 …… 295
火巷与水巷 …… 298
汉口"墩子"何其多 …… 299
汉口的会馆、公所 …… 300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 302
清代汉阳两相国 …… 304
注意平政刑的吴正治 …… 304
迷信误国的叶名琛 …… 305
张之洞生活琐闻 …… 307
"丫姑爷"张彪 …… 308
梁鼎芬驱逐章太炎 …… 310
从"武昌县开国子"到"鄂王"——岳飞与武汉 …… 312
从学徒到兵部侍郎 …… 313

学台充刑台　冤狱难平反
——黄陂胡瑞澜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 315
"天国"故实 …… 316
九女墩 …… 316
江、汉浮桥 …… 317
"双料举人"与"状元游街" …… 317
清王朝祭台上的牺牲 …… 318
首义"三武" …… 320
湖北"三怪" …… 322
廉介刚毅的石瑛 …… 322
圣洁苦行的严立三 …… 323
嫉贪如仇的张难先 …… 324
省主席当县秘 …… 326
"密青天"与"密疯子" …… 327
汉口"末代市长"娶勋甫 …… 328
寇英杰电话局碰壁 …… 330
"屠户"和"三蛋将军" …… 331
"烟土大王"出任禁烟处长 …… 333
洪帮首领周胜余 …… 335
"中国女神童"冯铸 …… 337
恶有恶报——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不得好死 …… 338
楚王府轶闻 …… 339
封建亭与楚望台 …… 339
愍王为世子所弑 …… 339
华奎假王案 …… 340
楚宗人造反 …… 341
华奎被沉入江 …… 341
龙泉山下楚王陵 …… 341

从"反日英雄"到大汉奸——叶蓬罪行录 …… 342
黄卫军是什么货色 …… 343
狱中十三姊妹 …… 345
斗级营七姐妹 …… 346
湖北女师学潮 …… 348
断子绝孙的刘桂狗 …… 350
活捉汉奸汪步青 …… 351
徐祝平娶日本女谍 …… 353
短命的伪共和党 …… 354
"魔术师"顾顺章"变"成了叛徒 …… 356
柳亚子题曹立庵印谱 …… 357
椎门竟是弹冠客 …… 359
张若柏得印丢命 …… 360
王铭章灵榇过汉记 …… 360
戴笠行宫与两农图书馆 …… 362
刘镇华妾与小扬月楼私情 …… 363
萧耀南暴死之谜 …… 364
张少帅主持球赛 …… 365
夏寿康"优容""膺相" …… 367
追悼"三·一八"烈士联争 …… 368
断指争路与割肉血书——武汉保路风潮中的动人事迹 …… 369
革命党人筹款奇招 …… 371
奇文共欣赏——汉口审判厅为嫖妇改嫁之判词 …… 372
急公好义的汉口商人 …… 373
李子里与李孝子 …… 374
冯玉祥与抗到底社 …… 376
七月社与时调社 …… 377
抗战电影与《抗战电影》 …… 379

"好一记鞭子"——《放下你的鞭子》在武汉街头 …… 381
昭文新报——中国内地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 …… 383
江流呜咽无处诉——清末民初两度"大江报案" …… 384
华字《楚报》的创办与被封 …… 385
"现世报"与《现世报》 …… 387
王国光与《汉口中西 报》 …… 388
《江汉日报》插图讽时政 …… 389
南洋大楼 …… 391
武汉新式旅馆第一家——汉口大旅馆 …… 392
燕宫饭店今昔谈 …… 394
宝庆码头与宝庆会馆 …… 395
"瓷瓦描青"的万寿宫 …… 397
中国最早的地图出版社——武昌亚新地学社 …… 398
洋人的俱乐部——波罗馆 …… 399
所谓"模范监狱" …… 400
洋奴、洋"法"和巡捕房 …… 401
吴天保演《哭祖庙》 …… 403
在汉口演京剧的第一个外国人 …… 405
"小叫天"高月楼"响"遍武汉 …… 406
花鼓戏、楚剧和沈云陔 …… 407
演戏的革命军都督——刘艺舟 …… 409
京剧票友和票社 …… 411
旧汉口的戏园 …… 413
《蝴蝶杯》与蝴蝶杯 …… 414
武汉最早的影星——"模范美人"叶秋心 …… 415
跑龙套起家的丑星大和尚 …… 416
谭派鼻祖谭鑫培 …… 418
老牡丹花与小牡丹花 …… 419

汉剧公会及其三任会长 …… 421
楚剧改革家李百川 …… 422
新市场大舞台今昔 …… 424
丹桂舞台的变迁 …… 426
一末带十杂——汉剧的脚色 …… 427
小凤仙挽蔡锷联的捉刀人 …… 429
闲话"老圃" …… 431
汉口的跑马场 …… 432
汉口华商总会 …… 435
大端阳节 …… 437
元旦开笔 …… 439
六月六，赶臭肉 …… 440
"童言无忌" …… 441
"二百五"、"半吊子"的由来 …… 442
"打扁担"、"刮胡子"及其他 …… 443
洪山的天齐会与甘蔗节 …… 444
"五方杂寓，家自为俗"——客籍人风俗拾零 …… 446
武昌火药局爆炸纪实诗 …… 447
轰动全国的张五婆大骗案 …… 449
汉口轮渡跳板折断案 …… 452
"济饥辟谷"仙方的传说 …… 453
孟宗哭竹生笋——"二十四孝"之一 …… 454
旧武汉的斗蟋蟀 …… 456
相命骗术种种 …… 457
汉口药帮巷与药王庙 …… 459
街头巷尾讲"善书" …… 461
名中医的奇怪处方 …… 462
"无不灵"测字 …… 463

鹦鹉洲的竹木市场 …… 465
和记蛋厂与坤厚里 …… 467
从仁济医院到协和医院 …… 469
官商相争的武昌掘金案 …… 471
千古悲剧"江宽"轮遇难 …… 473
旧陆军医院轮奸案 …… 475
夫妻黑店思明堂 …… 478
金圆券存兑骗局 …… 479
后记 …… 482

·上编·

故园青史话沧桑(代序)

杨振兴

在中华民族辉煌璀璨的五千多年历史中，城市作为标志她进入文明时代起点的象征，都有着自身兴衰荣辱、变异更迭的记载。这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精粹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武汉，在社会的变迁中也留下了富于启迪的典故和饶有兴味的传说。忠实地记录这些人世沧桑、风采神韵，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让当代的有识之士和一切后来者，都能够以历史为鉴，做推动武汉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有益之事。武汉出版社出版，严昌洪、萧志华主编的《武汉掌故》，就是一本能让世人从中得到这方面启示和教益的历史典故通俗读物。

处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武汉，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让世界了解武汉，让武汉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武汉的渠道甚多，我们曾经通过新闻传媒报道宣传武汉成就，举办全国第三届艺术节和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向各国来宾展示武汉的风采，拍摄各种电视专题片和电视剧，以及举办各类商品展销和商贸洽谈活动，展示武汉人的拼搏精神及创业的酸甜苦辣，把我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使五大洲人士认识武汉包括汉货精品的价值。而编印和出版图书，向海内外读者介绍武汉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武汉出版社历来重视出版具有地方特色的图书，为弘扬武汉的历史和文化做了大量工作，在让世界了解武汉方面贡献了积极的力量。该社这次又推出《武汉掌故》，这是一本让海内外读者了解武汉历史、文化

的好书。纵观全书，具有如下三个特色。

一是选材新颖。武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反映武汉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已载在典籍；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均立有传记。《武汉掌故》没有重复这些，它在历史长河中钩沉发微，采撷点点浪花，而这每滴水珠却都折射出历史的光泽和辛酸。它从一山一水、一砖一石、一人一事，勾勒出武汉城市发展的轨迹；它从世间沧桑、轶闻趣事、生活小节，描绘出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它从一段插曲、几则旧闻，反映出上下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它从一爿商店、几句方言，使武汉多姿多彩的风土民情跃然纸上。

二是汉味浓郁。既是武汉掌故，当然所写都是武汉史实、典故和传说。而该书尤其注意他处所无，武汉独有的文化现象，于各地均有的民俗事象也刻意挖掘其中的地方色彩。从龟蛇的传说到黄鹤的故事，从洪山菜苔武昌鱼到近代汉货精品，从数罗汉讲善书到汉调楚剧花鼓戏，无不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确是一幅武汉风情画。

三是文笔灵活。《武汉掌故》在写作上亦有自己的特色，语言生动，写法多样。作者对武汉市情十分熟悉，信手写来，如数家珍。有的旁征博引，像历史笔记；有的娓娓道来，似故老传说；有的言之凿凿，像现场纪实；有的精彩纷呈，如今古传奇。它没有历史教科书那严峻的面孔，也没有学术著作那莫测的高深。尽管书内有些文字、论述都还显得粗糙一些，但它寓教于史，寓教于事，寓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启迪于谈天说地的史实叙述之中，可谓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武汉掌故》以其丰富生动的内容，不仅使年青一代大开眼界，真切地了解武汉历史的变迁，而且令上了年纪的"老武汉"回首往事，也将倍感亲切，使浪迹天涯的"湖北佬"追忆故土，更会凭添一缕乡思。因此，我向广大读者推荐《武汉掌故》，愿大家都能喜欢它。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汉口花桥

“武汉”的由来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华中地区和长江中游的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武汉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在离汉口仅30里的府河北岸，就建有古城，遗址在盘龙湖畔被发掘出来。可见，自商、周以来武汉地区即是重要的古城镇。

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的合称，即“武汉三镇”的合称。武汉成为统一的大城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武汉三镇在历史上形成的时序为江北（汉阳）先于江南（武昌），而汉口在明代以前，不过是毗连汉阳的一个水曲荒洲，因此，在明代以前，所谓“武汉”，乃是武昌、汉阳两地的合称。元代武昌、汉阳均属湖广行省，鄂（武昌）汉（汉阳）并称，是为双城。元代诗人余阙在诗中把武昌、汉阳称为“双城”，显示了武昌、汉阳由单称到合称的趋势。

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初，汉水改道入江，汉口始形成市集。但每到夏天涨水之际，江水漫溢，人们仍无法安居。1635年（明崇祯八年）通判袁焜创筑长堤（上起 硚口，下迄堤口）以障水患，此堤名曰“袁公堤”，即今日之长堤街。此后，居民日增，到清仁宗嘉庆时，汉口居民已达36,929户，129,183人，但汉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隶于汉阳县，因此，早期的“武汉”概念仍是武昌、汉阳双城的合称。如1822年（清道光二年），范锴所著《汉口丛谈》中“遂陷武汉等郡”一句，即指武昌、汉阳等郡（府），汉口是称不上郡（府）的。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其奏章、函牍中常用“武汉”两字，如“武汉为荆襄咽喉”、“若使武汉克复”、“武汉两城对峙”等等，显然也是指武昌、汉阳（当然也包括了汉口）两地的。“武汉”实际上应读作“武、汉”。

汉口的独立地位是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才确立的，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阳、夏分治，改汉口同知为抚民同知，分汉阳汉水以北

地段北至滠口，西至硚口，拨归同知管辖，立名曰“夏口厅”。到民国初年，改同知为知事，易厅而为县，于是便有了夏口县。当时，武昌（江夏）、汉阳、汉口（夏口）仍以各自名称为主，而且各有隶属，如清末时江夏属武昌府，汉阳、夏口属汉阳府，民初时夏口属江汉道，故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在历史上，亦有将汉阳、汉口联称为“阳夏”，将武昌、汉阳联称为“武阳”，将武昌、汉阳、汉口联称为“武阳夏”者。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次年初，国民政府将汉口市（辖汉阳县）与武昌合并，划为京兆区，作为首都，并建立统一的武汉市政府，此时，武汉才取得了作为政区、市区的称谓。此后，武昌、汉阳、汉口时分时合，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武昌、汉口作为两个省辖市，汉阳作为县而分治。

解放后，政务院将汉口、武昌、汉阳（县府所在地及邻近地区）合并为武汉市（原汉阳县治所迁至蔡甸，保留县的建制），武汉市人民政府设在汉口。至此，武汉三镇才名符其实地合三为一了。

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多次在此卷起巨澜。唐代王仙芝，元末徐寿辉与陈友谅，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清代洪秀全等，都曾亲临武汉。在近代，一举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革命业绩。“二七”大罢工，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八七”会议的召开，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熠熠生辉。

1984年，国务院批准武汉市计划单列，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86年，国务院批准武汉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92年，国务院又批准武汉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可以预期，武汉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名城将会变得更美、更繁华、更加欣欣向荣。

（商若冰）

“扬子江”名的来历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通称长江为“扬子江”。外文中的“长江”，既不

用“长江”二字的译音，又不意译为“长长的河流”，而是音译为“扬子”。如英语为 Yangtes River(或 Yangtze River)，俄语为 Я нцзы。长江流经武汉，因此武汉有不少事物也与扬子江名有关，如长江中的鲟鱼(鳣)称为“扬子鲟”，长江边上的机器厂称为“扬子机器厂”(清朝末年建于汉口谌家矶)，汉口还有扬子街，今为服装市场。现在一些工厂、商店以“扬子”或“扬子江”命名的也不少，有的产品还以“扬子江”作商标。长江称为扬子江的来历如何呢？

长江在古代以“江”为专名，就如同“河”是专指黄河一样。后来人们把其他一些大河流也称为江，“江”变成了通名。为了与其他江相区别，便有了“长江”、“大江”的名称。

至于“扬子江”原仅指江苏扬州一带江段。《清稗类钞·地理类》抄录的一则史料称：扬子江之名由来已久。江苏扬州府城南15里有渡口名扬子津，后来又称扬子桥。隋以前扬子津临江，不与瓜洲接，当时江面宽至40里，北方人南渡都要通过此津，于是江也就以“扬子”为名了。到唐时，江滨积沙25里，瓜洲遂与扬子津相连，江面已窄至18里，于是渡江者，南岸则在京口之蒜山渡，北岸则在瓜洲，扬子津之名渐渐湮灭，而扬子江之名竟传于古。590年(隋开皇十年)杨素率舟师自扬子津入，击朱莫问于京口；宋建炎初南渡，金人追至扬子桥而还，均指此处。611年(隋大业七年)，隋炀帝升钓台，临此津，寻置临江宫，亦名扬子宫。

另外，隋末杜伏威在江都县置戍守，称“扬子镇”。682年(唐永淳元年)从江都县析出置扬子县，明废。故城在今江苏仪征县东南。扬子江的得名，与扬子县也有关系。

由于近代以来把长江通称扬子江，武汉也就与“扬子江”这个名称发生了关系。

(田雨)

芳草何处鹦鹉洲？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含火

德之明辉。惟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紫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光，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这是东汉名士祢衡所写用以自况的《鹦鹉赋》中的一段，长江中的鹦鹉洲因此赋而得名。

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乐陵西南)人。少有才辩，为人"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如仇"，恃才傲物，屡侮权贵。先是曹操召其为鼓吏，令其改服鼓吏之装，借以辱之，他却在曹操及众宾客面前裸身更衣，后又在营门外，击鼓骂曹，为曹操不容，遣送与刘表，刘表亦被其侮慢，乃转送给部下江夏太守黄祖。祢衡又讽刺黄祖是"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终被性情暴躁的黄祖杀害，终年仅26岁，葬于江中芳洲之上。后人为纪念这位刚直不阿的名士，便借《鹦鹉赋》将他埋骨之处称为鹦鹉洲，并在洲上建正平祠，供人凭吊。古往今来，不少墨客骚人来游鹦鹉洲，凭吊祢衡墓，留下无数诗篇，使鹦鹉洲芳名远播，祢正平精神长存。请看清代诗人沈德潜《鹦鹉洲吊祢处士》诗云：

蚊视曹公气不摧，兰焚玉碎剧堪哀。
故人慷慨推奇士，乱世纵横露俊才。
洲沁何妨激涛浪，文章那肯辱蒿莱。
只今后代经过者，烟水茫茫酹一杯。

被崔颢描写为"芳草萋萋"的鹦鹉洲究在何处，即是在太江武昌一侧还是在汉阳一侧，可说是历史上的一段公案。由于"洲聚于沙，而沙转于水"，鹦鹉洲几经变迁，有了古、今之分。有人认为，古鹦鹉洲在武昌一侧，今鹦鹉洲在汉阳一侧，因此有武昌鹦鹉洲与汉阳鹦鹉洲之说。而有的人认为，今鹦鹉洲固然在汉阳，而古鹦鹉洲也靠近汉阳岸边。将两说的根据加以比较以后，我们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读明人杨基《眉庵集》有《望武昌》二首：

吹面风来杜若香，离离烟柳拂鹦长。
人家鹦鹉洲边住，一向开门对汉阳。

春风吹雨湿衣裾，绿水红妆画不如。
却是汉阳川上女，过江来买武昌鱼。

题为《望武昌》，"开门对汉阳"，可知诗人观察事物的立足点是在鹦鹉洲上。"过江来买武昌鱼"的汉阳女，显然来到了鹦鹉洲上或洲边。鹦鹉洲的位置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又黄福《后乐堂稿》《过武昌》亦有句云："城头黄鹤楼，城外鹦鹉洲"。这信手拈来的例证足以作为对前一种说法的补充。

靠近武昌的古鹦鹉洲约在明末清初被冲毁消失。汉阳江边在宋元时代亦有沙洲涌出，但有确定的名称：刘公洲。宋汉阳知军刘谊曾在洲上耕种收获，故名。此洲明嘉靖以来渐没。到了清雍正乾隆年间，武昌的白沙洲为水所没，而汉阳又有新洲淤出，白沙洲民吴某等竟禀官争夺这块地方，请求以新淤洲地断给他们以补白沙洲课税，并命名补课洲。汉阳县民以鹦鹉洲久为汉阳古迹，今既淤出，近在南纪门外，不应远隶武昌，遂争讼于官府。经汉阳县令裘行恕3次具禀力争，新洲仍归隶汉阳，并恢复鹦鹉洲名，以存古迹。汉阳鹦鹉洲就是这样来的。汉阳县民所谓"鹦鹉洲久为汉阳古迹"，乃争讼时一种强词，其理由盖由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而来，我们断不可以争讼之词作为古鹦鹉洲亦在汉阳岸边的根据。

今鹦鹉洲从清同治年间起，已渐渐与汉阳江岸连成一片了。旧中国，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竹木市场，居民多为做木材生意的湖南人。如今，它不但是长江上最大的竹木转运站，而且是武汉市的新兴工业区和对外贸易港口。

（严昌洪）

晴川历历汉阳树

自从唐代诗人崔颢写了《黄鹤楼》千古名篇以后，汉阳增添了几处

以崔诗之意定名的景点。首先有宋太平兴国年间建于郡治前门的"白云楼"，以"白云千载空悠悠"之意定名。该楼与大江彼岸的黄鹤楼遥相呼应，互为衬景，吸引了多少迁客骚人登楼眺望"乡关"，抒写思亲之情。然后官绅集资在汉阳郡治东北江边修建了一座"烟波亭"，以"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意命名的这座古亭毁坏以后，人们又在禹功矶禹稷行宫左侧建起一座"楚波亭"，后毁于大风。

明嘉靖中年，汉阳知府范之箴倡议在楚波亭旧址上再建一座规模较大的阁楼，竣工后，取"晴川历历汉阳树"之意，命名为"晴川阁"。晴川阁"削壁沿江断，危楼傍水悬，窗飞衡岳雨，门过洞庭烟"，与武昌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当阳仲宣楼被人誉为楚中四大名楼。有人甚至评论说，晴川阁之景色超过了黄鹤楼。清刘献廷《广阳杂记》称：

> 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盖龟山之首，走江中数百步，而大江横过其下，左右无遮蔽，与市廛稍远。纵目所之，山水之情，与精神融洽，不如黄鹤之散漫无章，可谓后来居上矣。

晴川阁与黄鹤楼一样，也是屡毁屡建。1852年（清咸丰二年）毁于大火后，1864年（同治三年）由清廷拨款重建，知府钟谦钧主持其事。光绪年间进行修葺，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晴川阁题联曰：

洪水龙蛇循轨道，
青春鹦鹉起楼台。

至于登临晴川阁的景与情，《湖北旧闻录》著录《遂初堂集》中的一首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别山头一阁雄，岚光树色远连空。
窗涵梦泽三秋水，袖拂兰台万里风。
铁锁不消吴国恨，虫书犹纪夏王功。
怀乡览古无穷意，并在飞帆落照中。

1934年中秋节，一场特大风灾过后，晴川阁成为一片废墟。1984年后开始了重建工程，通过设计和施工人员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可以

说，“今阁胜古阁”的重建目标业已实现。

“晴川历历汉阳树”中的汉阳树，本来是崔颢泛指在黄鹤楼上所见大江对岸的各种树木。而到了现代，人们却往往把原凤凰巷 11 号后院的那株古银杏树（俗称白果树）称为“汉阳树”。也许是因为此树近千年的树龄，当是崔颢当年所见汉阳树中仍然健在的一株。笔者读小学时，有位同学就住在凤凰巷 11 号。放学以后，我们有时到他家去玩，在后院白果树的浓荫下或写作业，或做游戏，兴致来时，携起手来合抱树干，三五人才能抱住，其粗可知。为写作此稿，我又一次来到凤凰巷，老同学家早已搬迁，围绕白果树建了一座小院，粉墙青瓦，古朴典雅，门楼上书有“汉阳树”三字。然大门紧锁，只得从围墙窗孔中窥视，依然是那样枝繁叶茂。询问隔壁老妪，知道这千年古树，如今仍在开花结果，真可谓活力旺盛矣。

（严昌洪）

汉阳为何在汉水之南？

中国古代把山之南或水之北称为“阳”，反之，山之北或水之南称为“阴”。许多带“阴”字或“阳”字的地名，就是根据这种习惯命名的。如，陕西的华阴，在华山之北；江苏的江阴，在长江之南；湖南的衡阳，在衡山之南；河南的洛阳，在洛河之北。根据同样的道理汉阳应该在汉水之北，而现在的汉阳明明在汉水之南，这是什么缘故呢？

汉阳在汉水之南，既不是古人起错了地名，也不是汉阳搬了家，由汉水之北搬到了汉水之南，而是汉水改道造成的。汉水原来是从汉阳南边汇入长江的。《尚书·禹贡》上说：“汉水南至大别入江。”《春秋左传》云：“定公四年，吴师伐郢，楚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杜预注《左传》释地曰：“二别，近汉之名。”郦道元《水经注》指出：“案《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与江合，则与《尚书》、杜预相符。”这就是说，汉水古时是从大别山（即今龟山）之南入江的。汉阳县名是在 606 年（隋

大业二年)由汉津县改名而来,取名汉阳的根据是汉津县治由林郸山移到了鲁山(即今龟山),居汉水之北。汉水故道早已淤为平地,具体在汉阳南边的什么地方,今已不可考,大致是从郭师口折向东南,经邓家岭西南至旧汉阳城南,在今夹何至鹦鹉洲头一带入江,略对武昌鲇鱼口。

明成化初年,在汉阳县西郭师口之上,汉水冲决旧河道笔直向东而流,从黑山、梅子山、龟山之北注入长江。汉阳城便在汉水之南了。

同样的,原来的夏口或汉口,即汉水入江口亦在汉阳城南,汉水改道后,才在汉水入江口之北形成新的汉口。

故老传说,民国年间,因汉水入江口集稼嘴一带河道弯曲,洪水时排水不畅,致使汉水两岸常受水灾,曾拟将汉水引入汉阳城南的故道,不知何故,此计划并未实施。

另,汉口有所谓襄河故道者,上通汉水处在郭师口对岸,称襄河口,下通潇湘湖(即后湖),从沙口入长江,方位约在今解放大道一线。从前诸书多误为汉水故道。其实襄河(襄水)本是汉水旁支,后来因汉水在襄阳一段俗称襄河,致混用为汉水之名。

(山风)

武昌名山"龙"占多

古诗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而武昌的名山则是"龙"占多,如龙山、盘龙山、青龙山、黄龙山、二龙山、龙泉山、龙头山、九龙山、龙起云山、关龙山、龙嶂峰等。关于武昌山川形胜多冠龙的原因及其山的来龙去脉,清代朱炯(明楚昭王后裔)有文曰:"以八分山为始祖,锦绣山为少祖,顺龙逆结,仓库旗鼓,东走各支。"相传八分山是众龙产生的龙宫、龙洞,锦绣山是各支龙经游的圣地。明代兵部尚书、江夏人熊廷弼有一联云:"锦绣山高,脉脉结成龙虎地;梁湖水阔,滔滔流入凤凰池。"

"东走各支",即龙泉山群峰。其山三面临牛山湖与三汊港,在无边碧浪之间,逶迤地崛起龙起云山、二龙山、龙泉山、龙嶂峰等.在珠山前,

众龙山的高峰腾地而起，似昂起龙头争夺珠峰，气势十分雄伟壮观。

自汉代樊哙葬于龙泉山后，这里被明代王朝派遣的卜师勘为"九龙捧圣之吉地仙壤"，成为九王暨王妃的陵区。"昭园"等八座陵园，到处是龙的艺术，龙的文化遗存：双龙戏珠的石碑，通高 5—5.5 米，碑下的龙头龟趺，高 1—1.4 米；凡拱桥、享殿、九龙台等，无一不是用汉白玉雕刻的龙头与龙纹装饰，翠 绿色的瓦当，全是盘龙、双龙、飞龙等风采。其诗碑也多咏龙，如宋代诗人张文渊诗有："龙池春水盛，远望去烟连。百亩风潭阔，一川幽雾眠 。金鳞常出没，绿草更襟环。"

东南走向的龙山、龙岗、龙泉，均是"以八分山为始祖"。山下有洞，即"白云洞"，传为白龙仙子所居之仙乡，熊廷弼也曾题诗云："重重峭峒自天开，殿殿无梁龙世界"，"窈窕龙宫通地脉，崆峒石窦志天心。"关于此洞与武昌山川形胜，清代金口人陶谷的诗文集中有诗云："龙宫通九脉，龙泉十壑深，江夏龙虎地，何人道 八分？"的确，站在八分山顶端眺望，眼际以龙为名的群山，蜿蜒起伏，真如群龙竞走，风举云从。

（徐忠影）

"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

旧时的武昌，山多水多，可以说开门见山，出门遇湖。人们将城内的山水概括为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实际上武昌城内的山水并不止此数，故所指常不一致。

三台是指楚望台、梳妆台、望儿台。楚望台在梅亭山，起义门附近。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六子朱桢为楚王，朱桢就藩武昌后，在此筑台遥望明朝当时的都城南京，表达对父母的怀念之情。台早已不存，清末曾在此建军械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起义士兵以此地为总指挥部，楚望台因而知名于世。梳妆台所指有二，一般指楚王城内寝宫，为楚王妃嫔梳妆处，原有金鱼池、御菜园、长寿寺等建筑，故址在今彭刘杨路省水产局后，高台残址犹存。而《江夏县志》却指为朱石山，在县东北，邑人以山

位于郡学巽地，建奎光楼其上。为何称为梳妆台，缺乏交待。如果三台都指楚藩旧事，那朱石山一说则不能成立。望儿台又称龙床台，在高观山凤凰窝。楚王华奎系恭王妃兄王如言之子，抱养在宫中，袭封为第九代楚王。宗人华越等向朝廷揭发华奎非恭王子，神宗下诏"勘楚"，华奎被暂幽于贡院，王母到山顶土堆上望之，故称该处为望儿台。

八井一般是指清风井、明月井、九龙井、八卦井、汲水井、蟹马井、白鹤井、金钱井。而有的认为八井中无白鹤、金钱二井，而有小井、义井、还有的认为八井中有双眼井、霸王井或五龙井、沙井等。随着武昌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些井多已湮没，由于一部分井在历史上有名，准备重建井台，供人观赏。如文昌门内、高观山下的清风、明月二井和清风、明月二桥、本来是很好的景点。现拟于清风井原址重建青石井台，于北侧设月洞门以通明月桥。紫阳湖畔公园门外的霸王井，传说饮此井水可使人体力倍增，在修马路时已填没，现在公园内另砌有霸王井井台。

九湖指司湖、西川湖（一说无此湖，应为弯把湖，又名东湖）、宁湖、都司湖、西湖、歌笛湖、教唱湖、长湖和紫阳湖，已在《千湖之乡》篇中介绍，兹不赘述。

十三山一说指七山、二岭、三坡、一峡。七山是黄鹄山、高观山、长春山（此三山为蛇山分地段的山名）、胭脂山、花园山（崇福山）、凤凰山、梅亭山。二岭是芝麻岭、巡道岭。三坡是黄土坡、察院坡、鼓架坡。一峡是螃蟹峡。另一说指黄鹄山、蔡东山、殷家山、高观山、棋盘山（此五山总称蛇山）、炮架山（在武胜门东段城墙内）、崇福山（在蛇山之北）、凤凰山（在城北）、胭脂山（在蛇山北、又名鞭子山，山石呈胭脂色，故名）、一字山（俗称狗儿山，在黄鹄山后，现尚有高土堆）、朱石山（又称猪市山，在黄土坡附近）、梅亭山（在起义门附近）、萧山（在梅亭山西北石灰堰附近，传为晋萧丹隐居地）。

（士心）

蛇山古迹觅踪

黄鹄楼重建以来，蛇山游人日渐增多。最近，白云阁又在山顶拔地

而起，为蛇山添一胜景。登楼远眺，不仅可饱览江、汉汇流的滂湃气势，武汉三镇新貌亦能尽收眼底。

蛇山自古即为江夏游览胜地，山上历史遗迹很多。根据现存建筑和文献记载，我们将引导读者把蛇山上的古迹一一寻觅。

孔明灯、石照亭与仙人洞

明清以来，黄鹤楼几经大火，建而又毁，而在黄鹤楼旁边的一座白色石塔却总能幸免于难，如今它仍然屹立在楼前，与黄鹤楼相映成趣。因传说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燃灯为关羽水军导航，武汉人将石塔称为孔明灯。其实，它是从印度传来的一种佛塔，与北京北海琼岛上的白塔、阜城门内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塔是一个类型的塔，只是略微小些。此塔造型工丽。四周镌有花纹和梵文，难以译读。从前塔的前方建有石坊，题"胜像宝塔"四字，并注明是"大元至正中威顺王太子建"。据考，具体建造年代在1343年（至正三年）。塔内有一件石幢和一个铜瓶，瓶内放有舍利（佛骨）。从瓶上文字看，似在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此塔时放进去的，瓶上所刻文字说明了此举的目的："如来宝塔，奉安舍利，国宁民安，永承佛庇"。

山下旧有石照亭，亦名石镜亭，正枕大江，与汉阳相对。传说有一块山石光可鉴人，但宋代已风化，陆游来时只见"粗顽石也，色黄赤，敝敝了不能鉴物"，大呼上当，批评其"可谓浪得名者"。今已不辨所在。

石镜亭右边有石室曰仙人洞（游仙洞），李白诗曾记此事："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回蓬海，千载空石室。"关于这些仙人，《江夏县志》转载了这样一个传说：一名守关的老卒每天早起即拜洞前。一晚月明如昼，只见三个道士从洞中走出，口中念念有词。良久，将要回洞，老卒尾随其后求富贵。道士给了他一块石头，叫他快出，石洞立刻关闭。第二天看那块石头，已变成了黄金。老卒喜开去卖，被队长发现，抓了起来，认为是偷来的。老卒以实告之，官府派人到他家取来石头，已不是黄金了，而是一块非金非玉，非石非铅的东西，后来一直收藏在军资库中。

到了后世，此故事已不传，由于吕洞宾在民间影响大，人们把游仙洞附会到他身上，改称吕公洞，并在蛇山头一带建有吕祖阁、仙枣亭等建筑。仙枣亭又名吕仙亭，相传吕洞滨曾在此卖枣，人们建亭纪念之。枣树长时间不结果，有一年忽然结了小瓜般大小的枣子，太守命小吏采摘，小吏却私自偷吃了枣子，成仙驾云而去。此亭明景泰年间重建，清时又建，"仙枣亭"三字为何绍基所书。清光绪末年，湖北巡抚端方在山头仿西洋式样建一警钟楼，犹如今之火警了望台。民国初年有人在此开饭馆，以其邻近吕祖阁而取名"纯阳酒楼"，简称"纯阳楼"。

涌月、压云与南楼、北榭

宋代时，蛇山上"涌月台"、"压云亭"和"南楼"、"北榭"最为著名。涌月台解放前尚存，从照片上看，方形，花岗石砌，颇似明人张维枢《黄鹤楼游记》中所记"亭空八面，类清凉界"的清凉亭。以前俗传"涌月台"三字为曹操所书，《楚记》一书曾辨此说之误，认为操败赤壁，未尝至鄂(武昌)，不应有操书。且"月涌大江流"，取自杜少陵名句，说明涌月台为唐宋后人所为。《一统志》载汉阳凤栖山曾有涌月亭，为宋代黄清老所建，石上有"涌月"二字，"涌月台"可能是后人摹刻于此而加以"台"字，今"台"字断处为一截，字亦差小不类，就是明证。另外，涌月台侧摹刻有李白所书"壮观"二字，取自李白自谓"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原书于山东金乡县，后翻刻于济宁州城南楼。涌月台上的这两个字可能拓自前两地之一处。

压云亭在蛇山东头头陀寺顶院，所镌"压云"二大字极工，为宋吴琚所书。从下面几句诗中可见当年压云亭之气势："一带城头四望全，压云亭上更无边。手攀北斗轻飞肉(鸟类)，目盼南楼仅及肩。"

南楼颇有名气，始建子晋，中改为白云阁。后屡毁屡建，并多次易名。宋元祐年间鄂州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崔颢诗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白云、黄鹤相呼应，十分恰切。虽在1705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复建时一度易名白云楼，但白云阁终成定名，一直沿袭至

今，1991年在黄鹤楼东高观山顶新建的楼阁，即称白云阁。当年南楼制度宏伟，登望尤胜，其建筑制作之美，有宋代诗人黄庭坚诗为证："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雪筵披襟夏簟寒，胸吞云梦何足言……"历代诗人咏南楼之诗不少，载在清陈诗《湖北旧闻录》中。

南楼被毁后，曾在原址上重建新楼名斗姥阁，内有鄂州杂诗碑，共录历代诗人诗作39首，有的为本集所未载。白云楼后有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士民所建万寿亭，为六面形，内立两座石碑，勒有蠲免钱粮谕旨和优恤老人诏旨。亭外有坊题"万寿无疆"，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今已不存。

北榭在子城之颠。从1224年（宋嘉定十七年）眉山人李某所作《鄂州重修北榭记》来看，北榭当是登临北望的好处所。附近曾有奇章亭、振衣亭，今皆不存。

为与南楼、北榭相配，有人把头陀寺称"东楼"，黄鹤楼称"西楼"，这样，东、西、南、北俱全。

在蛇山中段，阅马厂与胭脂路之间，今有一山洞相通，俗称"古（鼓）楼洞"。其实那不是真正的鼓楼洞，而是清末为方便交通所开凿的武昌洞。民国初年曾堵塞一次，1927年重新修通。据说开凿此洞还有一个目的，即"出于恶风水形家之习俗，特力反之，以示破除尔"。日寇占领武汉期间，曾封其一端，用作军火库。洞上原有黎元洪手书"武昌洞"三字，在文革中被凿掉。清末《开通蛇山治路记》碑现保存在首义公园内。

真正的鼓楼洞应在今解放路司门口长江大桥跨线桥处。这里蛇山从前并未挖断，山上自宋元以来即有谯楼（即鼓楼），后毁。1499年（明弘治十二年）由湖广布政使徐源等商请楚王同意修复鼓楼，以使钟鼓有节，便于警众号令。继任布政使韩镐接手主持其事，3年而成。登斯楼凭栏而眺，连山大江，旷野空谷，禽鱼草树，风云月雾，凡百之形状，不出几席而尽收眼底，诚楚天之大观。故韩镐为其取名楚观楼。清乾隆年间毁于大火。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修时，仍取黄庭坚诗"鄂州南楼天下无"之

意改称南楼，唐代南楼已不存，故新楼上题“南楼遗胜”四字。

历史的纪念

蛇山上纪念历史人物的古迹有许多，最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太白堂，纪念李白。虽然李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不复作，去为金陵凤凰台赋诗，但他不止一次到此地，以后奇句得于黄鹤楼者甚多，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就是传诵千年的佳作。登太白堂即可缅怀李白这位唐代大诗人游历江汉的往事。还有搁笔亭，在黄鹤楼东，取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意。原建已毁，1992年重建，“搁笔亭”三字由当代著名诗人臧 克家题写。

陈友谅墓，在南侧山腰。陈友谅系湖北沔阳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曾自立为帝，国号大汉。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决战失败，从湖口突围出长江，中箭死。部将张定边驾舟载尸还武昌，葬于此地。次年朱元璋进兵武昌时曾来祭奠，手书“人修天定”四个字于墓前。墓道牌坊正面镌“江汉先英”，背面书“三楚雄风”。传说明万历末年陈祝摄古墓，至此，风沙大作，天地昏暗，雷声隆隆，掘墓者只得停工，天始光明。

岳飞亭，建在蛇山中部山 脊上，又称“岳武穆遗像亭”，中有明刻的岳飞像，系暗红色砂石线刻。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曾驻军鄂州(今武昌)，后又追封鄂王。1937年，人们在清理巳圮岳王庙时，发现了这块遗像石碑，乃移此建亭奉祀，通过纪念民族英雄岳飞激励人民抗日斗志。

奥略楼，是晚清鄂督张之洞调北京后，其门生故吏为怀念他而在黄鹤楼故址东北修建的。原取名“风度楼”，张之洞知道后，致电鄂中，谓“此楼形势，关系全鄂，不当为一人所私”，建议改称奥略楼，取《晋书·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之语意，并由张氏亲书匾额。其时黄鹤楼已毁，人们常将此楼视为黄鹤楼。楼前有一巨大时钟，但无机括，属装饰品，指针不能走动。有人乘船行江中，望见此钟而笑曰：“文襄以喜举新

政著称于时，然所行新政，类皆虚有其表，亦有异于此钟否乎？'语见《清稗类钞·讥讽类》，文襄即张之洞。此楼1955年建设长江大桥时才拆除。楼后原有张公祠，亦系纪念张之洞。

抱冰堂，在今首义公园内，原包括十洼堂、张公祠、平台、藤棚等建筑。也是张之洞离鄂后，其门生故吏集资兴建，以为纪念，堂名取《吴越春秋》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之意，颂扬张之洞刻苦自励，以成大业。

抱膝亭，亦在蛇山西头，取"抱膝长为梁父吟"之意，"梁父"暗指广东番禺人梁鼎芬，他在武汉办教育最力，深得士子尊敬。梁鼎芬从湖北按察使任上辞职离鄂后，学界捐资建此亭以为纪念。清同治年间铸造的黄鹤楼顶原安放在亭后。

（田雨）

有凤来仪
——武汉三座凤凰山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神鸟，其状如鸡，五采而文，自歌自舞，人们认为凤凰是一种吉祥之鸟，"见（注：出现）则天下安宁"。据说229年（三国吴黄龙元年）"夏口（今武昌）言凤凰见"，汉阳也有凤凰出现。此后，人们把汉阳凤凰栖息过的山称作凤栖山，把武昌出现过凤凰的山称凤凰山。而在青山有座小山形状像凤凰，也被称为凤凰山。这样一来，武汉就有了三座凤凰山。

凤栖山在汉阳城北，今汉阳区中部偏东，北距龟山约500米，俗呼凤凰山。此山为汉阳城北部屏障，形势险要，自唐至清，历代均设城垣于山上。凤栖山在唐代建有秋兴亭，为沔州刺史贾载所建，亭后飞阁，瞰大湖，对大别山，景趣尤胜。中书舍人贾至曾作《沔州秋兴亭记》。宋孙构亦题诗云：

前有长江后有湖，天将此景属吾徒。
当时想未见秋兴，漫说南楼天下无。

亭东旧有寥廓台，宋蔡纯臣谓其“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之巨麓，蜀江西来，汉水东入，山光水色，四环交映”。在凤栖山南麓有一梅岩，岩上及四周为园亭池馆会集之地。如双松亭，传李白将去衡岳时，曾在此与族弟相聚。另一竹斋，亦传为唐张谓出使夏口时与其弟酬唱处。明万历末年，世运承平，士大夫卸职归来，无不假此行乐。有一位叫萧丁泰的官员用重金在凤栖山麓买得王太常故宅，将梅岩上下亭台楼阁重加修饰，在岩下修池，池上建阁。如果从小道登岩上吸江亭，则大江洲渚、城郭之盛，一览而极。亭东架岩而出，在侧边建曲房，可谓“天吹绮窗，凌虚梅槐”，直与神仙洞府媲美。岩前有别业，道旁老桂婆娑。其南曰览辉堂，其北有先春楼，密砌幽篁，与山争胜。最西夹巷而下，有九莲池，池中金鲤大者八九寸，池上筑退密斋。明末遭劫火，楼台花草全部化为灰烬，惟宋摩崖刻“梅岩”二字屹然尚在。清初萧氏故园易姓，吸江亭被更名为御书亭。

武昌凤凰山在城北，今解放路北端东侧。山上旧有炮台，在战争期间，为攻守要地。汉孝子孟宗之母墓亦在山上。

青山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凤凰村北，东距红钢城约4公里。早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山势起伏多变，山上古树参天，松竹繁茂。原有一寺庙，抗战时毁于战火。

（山风）

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

唐代诗人崔颢有诗写黄鹤楼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中所谓乘黄鹤去的“昔人”是古代仙人，关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故事。

《报恩录》一书上说：黄鹤楼原名辛氏楼。辛氏在山头卖酒，有一位道士常常来喝酒，辛氏并不向他索酒钱。道士后来要离开此地，临别时用桔皮在辛氏酒家的墙壁上画了一只鹤，并对主人说：“有客来了，你

就拍手，鹤会飞舞侑酒的。”此后辛氏酒家生意兴隆，逐渐富裕起来。过了10年，那位道士又来了，拿出他所佩戴的铁笛吹了数声，一会儿，白云自空中飞来，鹤亦从墙上飞下来舞蹈一番，然后道士乘鹤而去。辛氏便在道士跨鹤升天的地方建了辛氏楼。因桔皮画的鹤呈黄色，后人就把辛氏楼称为黄鹤楼。黄鹤的故事为黄鹤楼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为历代诗人吟咏黄鹤楼提供了灵感之源。

鹤类确能随音乐起舞，这并非神话，而是其本能使然。鹤的这一特性早为人们发现。先秦《韩非子》载：“师旷援琴一奏，有玄鹤二八来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颈而鸣，舒翼而舞。”而汉代马融作《长笛赋》，更直接说到长笛一吹，能“仰驷马而舞玄鹤”。至于跨鹤成仙则带有几分道家情调和神话色彩。

乘鹤而去的仙人是谁，在民间传说和史籍记载中往往所指不同。《列仙全传》卷9记载了一个与《报恩录》相同的故事，但点明仙人是费祎(字文祎)。《南齐书·州郡志》亦云“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太平寰宇记》卷112也说：“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者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其实，费祎为三国蜀将，并无关于他成仙的传说。倒是东汉的费长房有骑竹缩地之术，颇有点仙家味道，不知是否古人张冠李戴了。南朝梁代的任昉作《述异记》不同意前说，他认为“驾鹤之宾，乃荀叔伟而非费文祎。”明清以来易费而吕，乘鹤而去的仙人又变成了时代稍后的吕洞宾。清褚人获《坚瓠八集》卷4云：

> 相传唐时吕纯阳尝客兹地，侨寓酒家，日饮数壶，累至数百不偿值。复索饮，主人供给无倦色。纯阳喜之。适啖西瓜，遂以瓜皮画一鹤于壁上，始色瓜皮青，久之变黄，遂为黄鹤。纯阳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词，自鼓板为节。已而唱时，鹤辄从壁间飞下，婆娑翔舞，观玩饮酒者日数千人。凡阅数月，酒家得钱数百万，骤富，以钱酬纯阳，纯阳不受。遂构此楼志感，故名黄鹤楼。

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一种附会。世上绝没有画鹤起舞，乘鹤登仙

的事。这些故事，无非是教育人们知恩而后图报，聚财适可而止。最早的黄鹤楼似与黄鹤无涉，《元和郡县志》记载："吴黄武二年(223年)城江夏山以安屯戍，其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故名黄鹤楼。"盖最初当为守军了望楼，因建在黄鹄矶上，原名似应为"黄鹄楼"，后来转为黄鹤楼。 (郭云涛)

清代黄鹤楼的铜顶

在武昌黄鹤楼公园东面的山坡上，一圈栏杆围着一个大型的紫铜铸件，游人到此无不驻足观赏，或者以此作背景摄影留念。原来这就是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同治黄鹤楼烧毁后剩下的楼顶。

它的上部为葫芦形，下部为荷叶形托盘——整个高度3米，底径1.8米，壁厚35毫米。望着这个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的庞然大物，人们不禁要了解：它是由谁铸造的，又是怎样铸造的呢？

1868年(清同治七年)秋末，武昌府知府黄昌辅遵照上司旨意，主持重建在1856年(清咸丰六年)毁于战火的黄鹤楼。由杨玉山、段德文和杨先裕负责施工技术，雇工千余名，花了10个月时间，耗银3万多两，于次年夏季建成。因为要和这座有48根拔地擎天的粗达六七尺以上的大柱头、72条流水花脊、360架斗拱、高宽各为20多米的名楼相匹配，决定安装上述铜顶。

与历代屡毁屡建的黄鹤楼比较，这也是同治黄鹤楼的突出特点。然而，铸造这样既大又重，费铜又多的楼顶，并不是一般厂家能够和敢于承接的。

当时，有个周氏家族，世代相传200多年都是吃铁货饭的。他们共有八房，在武昌城内开有好几家炉房和锅厂，招牌都叫“周天顺”，只是下面各自标着“某记”的字样以为区别，这几家和他们的近亲开设的“王天泰”，几乎把武汉三镇的炉房活包下来了，其他一些铁货店多数是他们几家产品的代销店。周家还在湖南益阳开有“广大锅厂”，在湘潭设有“广大炉房”，曾自备几艘木船，贩运铁器到南京、镇江一带销售，回程则运销淮盐。因此，周家炉房遐迩驰名，铸造铜楼顶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地交给了“周天顺”。

尽管周家财多气粗，艺高胆大，面对这样没有干过的大活，仍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件活如果做好了，“周天顺”更会红得发紫；惧的是万一搞糟了，就会给“周天顺”抹黑。

经过一再研究，他们首先确定了铜合金的配料方案，然后选用粘性极强的黄泥土分为两大堆：一堆拌上铡成一段段的稻草为筋，另一堆则掺进焦炭末以增强其耐高温的力度。两堆泥土分别用蒙上眼罩的牛反复践踏，辅以人工翻拌，直到和得极熟。按照官方规定的铸件形制：将前者车成外模，后者车成内模，并在外模的内部雕上花纹与文字，让这套模子慢慢阴干，一直等到干透。由于铸件太大，需要铜水多，而且要一次铸成，所以事先邀集了多家炉房，准备了多盘炉子，组织了大批人力，以便共襄盛举同时开工。

选定了吉日良辰后，陈设香案，在鞭炮轰鸣声中举行了隆重仪式：自总管事，各炉掌作师傅直至炉前工，事先无不斋戒沐浴，总管事与各炉掌作师傅在轮流拈香与叩首时，都虔诚祷告菩萨和祖宗显灵，保佑开炉大吉。升火开炉后，每炉均投放与炉膛容积相当的铜合金配料，焦炭

及一锭金元宝，由各炉掌作师傅分别掌握火候，根据冶炼情况，依次连续浇注，终于迎来大功告成。

1884年(清光绪十年)，一场大火把这座修起来不过16年的名楼，烧得只剩下这个铜顶。从那时起，这个铜顶在蛇山上几次变更陈放点，都是放在露天空地上。武汉解放后，黄鹤楼遗址一带划归首义公园管辖。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这个铜顶又被移放到首义公园的草坪区，供游人观赏。铜顶的葫芦形部分就象戏曲舞台上八仙中铁拐李背的葫芦那样，由顶尖，小头和大头组成。1958年，它的顶尖莫名其妙地被人敲掉了。当时正在"大办钢铁"，据说是由于有人铜铁不分，想把它拿去回炉炼铁。后来虽被有关部门追回，但已经损坏，难以接上。1981年9月，又发生3名盗窃犯将底部直径为62厘米的小头，用钢锯条从细腰那里锯下盗走，砸成碎块，当废铜卖了分赃。后3犯虽被捕获，但这个历史文物毕竟还是损毁了。1984年秋天，重建黄鹤楼办公室力图恢复这个铜顶的原貌。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照片经过研究考证与测算，绘制了复原图，制订了计划，重新铸造球状形的小头，使其与荷叶形托盘上的大头以及第一次被敲掉的顶尖相结合。

116年前，周天顺铸造这样的楼顶堪称史无前例；116年后，修复这样的楼顶同样是缺乏前例可循，难度太大了！谁敢揭榜呢？

武汉不愧为藏龙卧虎之地。这一年的12月，技术力量雄厚，曾经复制过曾侯乙编钟的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毅然承担了这个重任。该所组成攻关小组，经过月余奋战，精确测定尺寸；做金相分析，决定铜合金配料比例，在青山造船厂的有力配合下，崭新的小头于1985年1月底铸造成功了。

然而，这只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修复历史文物不是要求整旧如新，而是讲究整旧如旧。如何把闪烁着金光的新铜部件，从质感到色泽，弄得看来和久经风雨侵蚀的旧铜部件一致，这又是一道难题。

不过，科技人员就是为了发现、发明和创造才生活在世界上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攻关小组最后闯出了一条"加温变色"的新途径。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炼出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现代的加热炉通过升温——降温——保持恒温等手段，终于叫这个崭新的部件新貌变旧颜。

同年4月中旬，把新旧部件再一次对照，拍板变色，并且进行组装焊接，两度损毁的"铜葫芦"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后来，重建黄鹤楼办公室负责人向笔者介绍有关情况时，欣慰地说："毁不由我成由我，总算向世人有个交待了。"

于今，在黄鹤楼公园东面的山坡上，熙来攘往的游人，虽然看不出这个铜顶的一丝破绽，但是，它仍然给人们留下了三个疑团：一、整个铜顶重约两吨，同治年间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起重机械，施工者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吊到24米的高楼上去的？二、设若吊装时不能一次正位，又是如何调整的？三、同治黄鹤楼的最高一层是8条脊，而铜顶的荷叶形托盘却是6条脊，这两者又是怎样吻合的？

看来，这三个问题只好留待古建筑专家和历史文物专家回答了。

（徐明庭）

龟山古迹揽胜

今天，人们游览龟山，可以登临座落在东部山顶、高耸入云，内有旋转餐厅，外有健牌香烟广告的电视塔，也可以凭吊东头的鲁肃墓、黄兴铜像和西头的向警予墓、红色战士公墓，至于龟山上许多以往的名胜古迹，已很少有人能够道及。

古人称突出江中的巨石为"矶"。长江上著名的矶有南京的燕子矶、武昌的黄鹄矶。龟山之首亦突出江中，称禹功矶，因纪念大禹治水之功而命名。传说元世祖忽必烈渡江至武昌，驻黄鹄山（蛇山）时，大别山（龟山）形胜恰收眼底。他指着对岸问道："山头石矶何名？"众以"吕公矶"对，并说唐时有仙人吕洞宾曾吹笛其上。元世祖又问："唐以前何名？"众人回答不上来。路旁有一老者告诉他"闻诸古语云是'禹功'，字音讹传，成为'吕公'"。元世祖十分高兴，欣然命立禹王祠于其上，敕有司岁时祭祀。

禹王宫（即禹王祠）是晴川阁外龟山上的又一重要古迹。宋绍兴年间始建，后毁于兵燹。1304年（元大德八年）重修。明天启年间改称"禹稷行宫"，加祀后稷、伯益等18位先贤。现存建筑为1864年（清同治三年）重建，解放后多次修缮。

在晴川阁、禹王宫附近，相传大禹曾种柏树。一说在龟山南麓太平兴国寺前有古柏，为大禹所栽，故称"禹柏"。宋代诗人苏轼游太平兴国寺时还见过古柏，写下了题为《禹柏》的诗篇，谓"谁种殿前柏？僧言大禹栽。不知几千载，柯干长苍苔"。传说禹柏的根伸展到了60里外的汉阳柏泉山（今属东西湖区）柏泉寺（即景德寺）古井中。《汉阳县志》记载："禹王栽柏，通六十里之寒泉。"《续辑汉阳县志》亦载称："相传禹植柏大别山头，根达柏泉井中，故名。今土人淘井，犹见树根二，状如双鲤，其泉对面涌出，如鱼嬉水。遇岁旱，犹能供数十村汲取。"明代诗人赵鹏曾游景德寺，饮柏泉古井清泉赋诗云：

影沁空霄玉鉴光，苔封石鼓色苍苍。

汲来数钏清泉水，犹带高林柏子香。

清人宋荦《大别山谒禹庙》诗有句云："庭前碑勒岣嶁字，栋里云生大别山。"这庭前刻着岣嶁字的碑就是禹碑。此碑文原刻在湖南衡山岣嶁峰上，不知何人所书，后人附会为夏禹治水时所刻。宋嘉定年间何致曾到该碑之处，手摹碑文刊之。共77字，似缪篆，又似符箓。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由毛会建从衡山摹刻下来，刊于禹王庙前。毛会建认为"形模太奇特，结撰无起止"，无人能够译出读通。衡山原刻和禹王庙碑刻均已不存，昆明、成都、绍兴和西安碑林都曾摹刻有此碑，据说西安之碑还是从汉阳之碑摹刻去的。1984年重修禹稷行宫时，又从西安还刻于此，连原刻残本和乾隆《禹碑真伪辨》一并置于亭内，以存古迹。据载，蛇山上亦曾有禹碑亭，所立"衡岳岣嶁碑"不知与禹功矶上禹碑是否为一？

在今电视塔处原有火警了望台，其地为屈原望远台遗址。屈原《哀郢篇》中有句云："登大坟以望远兮，聊以舒吾忧心。"大坟即指龟山。在龟山极顶之处，原筑土台一座，民间传为当年屈原望远台。

在龟山南麓泗湾一带，原有唐代古庙一座，宋太平兴国年间奉敕重建，因名太平兴国寺，一名文殊院。苏轼曾到此作《方丈铭》曰：

> 我观大别，山门之外，大江方东，东西万里，千溪百谷，为江所同。我观大别，方丈之内，一灯长红，门闭不开，光出于隙，晔如长虹。

该寺元末毁于兵燹。明万历年间重建时，皇太后赐丈六尺高金佛一座。后屡毁屡建。规模大时，殿阁层楼，林木幽深，八景辉映，足擅一山之胜。到清同治年间重建时，规模"未复旧观"。民国年间逐渐衰败，今已无存。

韩纯玉《寓兴国寺》诗有句云："柏树传神禹，桃花祀息妫。"后一句说的是龟山北麓、月湖南滨的桃花洞和桃花夫人庙。此庙唐代即有之，壁绘仙女，内祀春秋时为楚王俘虏的息夫人。息夫人为息侯之妻，姓妫。关于她的记载歧异甚多。《左传》上说：楚文王灭息，以息妫归己，生堵敖

及成王。传说她因国亡夫死之痛，与楚文王三年不通言语。而汉刘向《烈女传》上却说，楚王灭息，虏获息君夫妇，两人同时自杀而死。汉阳民间传说，息君与息夫人在国破之后双双碰壁而死，后人在他们溅血之处遍植桃花，象征鲜血遍地，并建桃花洞和桃花夫人庙纪念他们。正是："寂寞应千岁，桃花想一枝。"（唐·刘长卿《过桃花夫人庙》）"息宋兴亡随逝水，死生恩怨问桃花。"（《清稗类钞·祠庙类》"祠庙联语"条所记《息夫人庙联》）。

（士心）

摩崖长留天地间

山崖石壁上所刻文字、图画，称作"摩崖"，亦作"磨崖"。一般由善书法者题写于纸上，倩石匠艺人描摹凿刻于崖壁上。如果山崖岩石质地好，不易风化，则摩崖可千百年留于天地间不致磨灭。在武汉一些风景秀丽、古迹较多的名山上，多有古人留下来的摩崖。有些因岩石风化已无法辨认，只好求诸文献资料。

武昌黄鹤矶原有一方刻石，为一笔草成的"鹅"字，好事者往往摹拓传布。书石者门镇国系清代汉军旗人，康熙年间曾为松滋县官。此公初不识汉字，后留心笔法，临摹碑帖，不问寒暑，长年坚持，久之成一大书家。传说他常悬一笔于窗间，有一天毛笔锋头忽然散开像一朵五色花，人谓"其精神专注，故管城效灵耳"。松滋人庞洵有句云："石碑刊法书，纵横势径丈。曾闻五色花，幻自笔头放。"门镇国喜作径丈鹅字，所过名胜都要书之，黄鹤楼下刻石不过是其一。

汉阳月湖边的梅子山，以多植梅树得名，清中叶时，颇极园林之清雅。汉川张竹樵在《楚天樵话》中认为："汉阳诸园亭，推梅子山为第一。他处多藻绘，此独以淡瘦胜。"他曾同友人酌酒石几上，赋诗云：

暂憩劳薪到此来，万竿烟雨旅怀开。
石床影静秋花落，消受湖山酒一杯。

梅子山北临月湖的石壁上刻有“海阔天空”、“灵鹫飞来”8个大字。据王葆心《续汉口丛谈》上说“灵鹫飞来”四字，笔力雄伟，为扬州布衣扬威凤所书。至于另一石壁上“海阔天空”四字，一说书写者只知姓李，名不详；一说是毛会建（子霞）所书，其根据在《楚天樵话》中。

龟山上也有摩崖。据《汉阳县识》记载：“山北石壁摩崖，书围径六尺，隐约可辨者‘大别山’三字。”此三字左侧有竖书小字五行，仔细辨认，可知“大别山”三字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方密庵所刻，鲍里星因识以记其事。“大别山”三字至今仍存，笔力刚健，气势雄伟，确系大手笔。北边山麓有民国年间所挖防空洞8个，每个洞口各刻一字以为名，连起来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汉阳凤凰山南麓石壁上镌有“梅岩”二字，大如斗，遒劲有力，为1236年（宋端平三年）汉阳县令赵时所题。后人又在此二字东边壁上题刻“凤立”二字。从几本有关文献均未提及此二字的情况看，“凤立”二字早已剥离不存。

洪山在灵济宝塔周围一带山岭上有许多奇石。1195年（宋庆元元年），将右军、河阳人赵淳在此建东岩阁时，取石秀而木茂之处，稍加斧凿，按其天然形态一一命名，并用不同字体品题摩刻于石上，计有云根、云扃、伏仙、飞雪、栖霞、半霄、清肃、爽垲、[illegible]岩、翠屏、堆云、狮子峰等数处。赵淳又将其在五华洞石壁上所摹拓下来的“寿”字刻于东岩石上，期与金石书法爱好者共享之。后人又题刻了仙人石、窥榛、东崖三处，合赵淳所题刻的云扃、翠屏、栖霞、狮子峰、“寿”字云等为洪山八景（一说八景指东山赋、狮子流涎峰、翠屏峰、岳飞松、白龙泉、赤龙泉、圣僧桥、凹樽等）。洪山摩崖原已湮没。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邑人王以宁登眺洪山，浣剔积藓得之，使其重见天日。现保存完好者尚有十处，已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市内胭脂山、市郊九峰山等地亦有摩崖数处，在各专篇中将作介绍。

（士心）

千湖之乡
——武汉的湖泊

武汉为古云梦泽地带，江汉平原的中心，这里的湖泊之多，可称为“千湖之乡”。市区内的湖泊有些已经湮没，仅存地名，有些湖泊水面在缩小，有的由大湖渐渐填塞成若干小湖。市郊的湖泊有的是著名风景区，有的是重要养殖基地。而郊县的湖泊除了养殖和灌溉以外，有些仍在发挥水上交通线的作用。

在武昌城内，原有九湖。蛇山以南，长街（今解放路）东西各有一组湖泊。街西今人民电影院附近有菱湖，原名宁湖，避庙讳改之，又名明月湖，是旧两湖书院的外湖，今花堤街即为菱湖的拦水堤，在堤的北端经平湖闸出江。南与都司湖、东与西湖均相连。两湖书院的内湖为都司湖，沿湖原来建有水阁、凉亭、长廊，风景宁静宜人。现武汉音乐学院即其旧址，尚保留有 30 多亩水面。

街东则有西湖和歌笛湖。西湖原有湖上花园，绿柳成荫，宜于休养，故址在今湖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内。歌笛湖（一名东湖），湖中芦苇薄膜可做笛簧，故名，当地百姓却以谐音呼为锅底湖。湖址在今水陆街与紫阳路之间，现仅存歌笛湖街巷名称。又东为滋阳湖，一名紫阳湖，在今紫阳公园内，是现存诸湖中最大者。据说湖中以前有个墩子，涨水淹不没，故又称墩子湖。湖中有堤，东西向，中有滋阳桥，夏日荷花盛开，可资游赏，为纳凉胜地。因贺逢圣投湖殉明（朝），清初督学高世泰曾易名为亚相湖。滋阳湖在桥北的狭长部分称长湖，旁有长湖堤和长湖南村，该湖今已填没。另外，位于水陆街巡回岭和清真寺街附近的教唱湖，明代时曾为楚王府歌伎集中的地方，故名。所有这些湖泊以前都是连成一片的，名曰南湖。现今隔开诸湖的街道，均系以前的湖堤，宋代祝穆在《方舆纪胜》中云：“南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或附。”《湖北旧闻录》引《入蜀记》称，在蛇山南楼上“下瞰南湖，荷叶弥望，中为

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山谷（按即黄庭坚）云'凭栏十里芰荷香'，谓南湖也"。古南湖随着旧武昌城从蛇山北扩展到山南而包入城内了，现在的南湖指城外赤栏湖。南湖外还有汤逊湖，湖在山间，比南湖水位高，湖面比南湖大。

蛇山之北有司湖，又名藩湖、都抚湖，在旧藩署后，抚署前，为县学外泮。都府堤即为该湖堤防，武昌儿童公园即为其故址之一部分。当时也是菡萏亭亭，幽芬袭人。司湖以东与其相连的一个小湖称西川湖。

以上为历史上武昌九湖。其实武昌城内还有几个湖泊。如：今紫阳路北，复兴路和烈士街之间曾有弯把湖。凤凰山以北，中山路以南得胜桥、西城壕街一带原有应山湖。旧城东北紫金山外，有一小湖，小湖之外，又有一大湖称沙湖。其中靠东一部分已淤成田亩，仅剩下一青山港可通船。湖西有沙湖嘴，现为武昌工人文化宫。武黄铁路从湖心穿过，堤上有长桥。旧城西北外，筷子街附近曾有筷子湖，今已不复存在。

宋时有东湖在县东5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地。此东湖疑为今武昌火车站以东的晒湖（赛湖），绕湖一带原多古寺，盖是风景很好的游览地。今东湖，是郭郑湖、水果湖（由水口湖讹念而来）、喻家湖、汤湖、牛巢湖的总称。从磨山可看到东湖外另有严东湖、严西湖，西北还有北湖、杨春湖。更远在青山公园附近还有戴家湖。

汉阳的湖泊除了古郎官湖和今莲花湖外，最著名的则为月湖了。月湖的范围原来从梅子山向东在龟山北麓直达江边。月湖上有三条堤。最东临江之堤名杨柳堤，筑于1506年（明正德元年），中有桥，1732年（清雍正十年）郡守高纲并绅士甘昌祺捐建，故名高公桥，为汉口集稼嘴到汉阳城的大道，今高公街、晴川街是其故址。中间一条系清汉阳知府郭朝祚时所筑，旧称郭公堤，中有三孔石桥，解放初此堤尚存，是汉阳人到汉口去的主要通道之一。月湖西端另有一条堤称龙灯堤，今仍在。在龟山北麓未淤塞之前，以郭公堤为界分为东西两月湖，三堤卧于湖上，龟山、梅子山突出湖中，配上古琴台、崇福寺、钟楼、文昌阁等建筑，昔人曾谓仿佛西湖风景。清代施襄有《汉口竹枝词》一首曰：

踏青先上伯牙台，弓底鞋新不染埃。
走遍月湖堤十里，过河还到后湖来。

可见月湖不仅是汉阳人，也是汉口人所喜欢的游览地之一。那时，客到古琴台，可雇舟游荡，湖岸柳树成行，湖中荷花，一碧接天，千红映日，煞是好看。古人总结出月湖八景，有古洞仙踪、板桥花影、僧楼钟韵、宵市灯光、柳映长堤、荷风曲溆、琴台残月、梵寺朝晖等。

汉阳城外西南郊，今武汉动物园一带，还有马沧湖、墨水湖，有港直通汉阳县诸湖，如官湖、刀环湖。再南还有太子湖（又名九真湖），因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得名。往西在汤家山和扁担山之间有龙阳湖。在汉南区还有银莲湖、沉湖等诸多湖泊。

汉口中山大道西北边原来都是湖泊，统称"后湖"，包括牛湖、西长湖、鲩子湖、十八汊等。后逐渐淤浅，在张公堤筑成后更涸出多数田亩，剩下来的湖泊遗迹，主要分散于沿街后侧及沿张公堤一带。后湖传是襄河（不是汉水）故道，原可由土堤出江。在江汉路一带，未筑堤前可直接乘船经后湖达黄陂、孝感。后湖风景优美，骚人墨客称其为"潇湘湖"，明清之际是汉口人的主要游乐场所，将有专篇述及。在今建设大道和青年路的夹角上有一北湖，建设大道以南还有罐子湖等小湖。

在汉口西北，原有一片面积为40万亩的水面，泛称东西湖，其中又有小湖名猫儿湖、桑台湖等。现基本上淤为田地，已辟为农场。

至于武汉郊县武昌县的纸坊湖、汉阳县的鸡笼湖、黄陂县的武湖、新洲县的张渡湖和更多的湖泊，限于篇幅，不拟一一介绍。

（田雨）

后湖何处觅芳踪

汉口西北今长堤街外，原有许多湖泊、池塘、水汊，均在旧襄河（不是汉水）故道，统称后湖。因其地遍种菜麦，春来"麦苗含浅碧，菜蕊散深黄"，俗名黄花地。相传元末朱元璋进攻武昌陈理（陈友谅之子）时，曾勒

马赋诗："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故后湖又有潇湘湖之称。

汉水改道之初，汉口尚未成为集市，后湖那里一片湖沼、荒草，平畴旷野，一望无垠。清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汉口镇的繁盛，后湖南沿(今中山大道一带)渐渐热闹起来。客商和市民在紧张的商业活动之余，需要一块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地方散散心，而后湖则是较为理想的场所，试看当年自然风光：

淤后襄河二百年，平芜十里望无边。
白云有影常垂地，青草无依欲上天。

人们看中这块地方以后，茶肆酒帘列置上下，亭馆歌台遍布湖边，或筑小径，间植花柳，湖光野色，点缀可观，豪竹哀丝，夜分不断。士女出游，常乐而忘返，彻夜达旦而归。旅汉江浙商人群夸为"吴兴之水晶宫，包山之销夏湾"。暮春踏青，盛夏避暑，诗人雅集，朋僚设宴，诚一时盛况。时人将后湖风光归结为潇湘湖八景，计有：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陇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茶社歌声。

说起后湖茶社，相传 自湖心亭始，后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芗、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等，皆在下路(今满春路以下)。一般茶社无楼，惟涌金泉小楼重阁，白石红栏，登楼四眺，远山近水，尽入图画。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云："要吃清茶兼望远，楼高须上涌金泉。"第五泉亦很有名气，同人每于此联诗会，"高朋半是无双士，胜地重来第五泉"。上路(观音阁一带)以白楼为最著。白楼位于观音阁后，编槿为篱，积石成径，小楼轩窗豁达，楼外远山隐隐。范锴《汉口丛谈》认为凭眺之胜，以斯楼为第一。他曾有句云："杨柳四围遮不住，看山都上白家楼。"湖水涨时，诸茶肆皆淹没，惟白楼与涌金泉得以接待游客休息啜茗。

有些茶馆早晨开门到深夜才打烊，以女唱(丝弦)和局班(屠户、菜贩聚集而唱)招徕游客，所谓"粗茶莫怪人争嚷，半是丝弦半局班"。如果要听丝弦怕熟人，地方僻静的茶坊有早逢春。而望湖泉由于有歌伎陈简姑在，茶客们往往"为恋清歌不散场"。据说简姑修眉广额，姿色清疏，所

唱小曲韵叶筝琶，声迟以媚，而所唱乱弹，神完气足，有金石声，无脂粉气，人称"歌院魁杰"。

汉口教坊歌舞亦以后湖一带为多，当时邑人熊垓（梦华）有《后湖》诗记其盛：

一镇销金窟，风流奈尔何。
路随芳草远，人向夕阳多。
曲榭沈丝竹，轻衫斗绮罗。
那堪追往事，独访废襄河。

由于后湖的繁荣，使附近的寺庙也游人如织。当时燕聚雅游之地莫如宝林庵和天都庵，前者宜宴叙，后者则专供清赏。所谓"景览天都客似云，宝林筵宴日纷纷"，"半为烧香半游戏，天都庵与宝林庵"。

后湖风景，当以看新绿为第一。故上巳前后，清明时节，去后湖踏青的游人特别多。孩童则趁时飞放风筝，鹞子、蜈蚣漫天飞舞，引得游人争看：

二三月内喜天晴，草色青青画不成。
一碗粗茶嗑瓜子，布棚厂下看风筝。

后湖百戏杂陈，也是吸引游客的原因之一。有搭芦棚演梁山调者，有纱幔轻遮演木偶戏者，有唱道情、变戏法的，有玩杂耍的（走索、蹬坛、打拳之类），还有"猴子狗熊玩棍棒，雀儿老鼠打秋千"的"奇观"。白鼠为后湖特产，其表演很逗人喜爱。当时在汉口商业化风尚的影响下，时俗对妇女游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故后湖常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坐茶寮，唤烟呼茗，不以为嫌。

到了近代，汉口开埠，中外互市，市区扩大。1864年（清同治三年），为防堵捻军，又在后湖筑堡，建造硚口至沙包城墙11里。后来市区游乐场所增加，后湖渐渐冷落。加之湖滨地带地势低洼，傍依铁路，邻近租界，春夏汛期，浸涝成灾，致使市区交通、生产、贸易和居民生活诸多不便。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后湖北边筑堤30余里，堤外开辟引河，上通汉水，下达滠口，以排湖水，涸出可耕地9万余亩。

后湖渐渐消失，其芳踪无处寻觅，如今仅留下后湖乡地名和若干小湖塘。

（严昌洪）

东湖定比西湖强

“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这是朱德同志1954年来游东湖后所题诗篇中的两句。他预言东湖风景区的发展远景将会胜过杭州西湖。

西湖之所以受到游人的青睐，除了西湖本身的风景美以外，还因为西湖四周有不少名胜古迹，如保俶塔、岳坟、灵隐寺等等。其实，东湖周围也有不少名胜古迹，如果一一将其开发出来，亦将使东湖增色不少。东湖边的古迹主要有：

楚王墓　在渔光村西北凤麟嘴，原有一座楚墓，墓主为春秋时楚王熊渠之子熊红。熊红于公元前885年被封为鄂王，熊渠死后继为楚君。相传死后葬此，故称楚王墓。路旁原有一座断碑，为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所立，碑上刻有“本处禁地，不许人埋葬”，说明当时已有保护古墓的措施。在马王庙侧，有饮马池，相传为熊红饮马处。

彤云阁　相传曹操赤壁之战时路过此处，曾寄宿阁中，故又称作曹操庙。此阁在武汉大学左侧，后移建周家岭。阁内旧有“鼎足三分”匾。

郊天台　位于磨山主峰山顶，相传汉昭烈帝曾祭天于此。台已倾圮，遗址尚存。

吴主庙　在白马洲对岸的雁嘴，旧有吴主庙，纪念孙权。

白马洲　在东湖西北角上，有一小洲。相传赤壁之战时，吴国赞军校尉鲁肃助周瑜大破曹军之后，转回夏口，骑马过此小洲，马陷泥中而死，故称白马洲或陷马洲，洲西边有一冢，传为鲁肃白马之冢，1958年被铲平。

卓刀泉　东湖南有伏虎山，山麓卓刀泉庙供汉寿亭侯关羽像。相传

关公行军于此，以刀卓地得泉，泉深约3丈，水清而味甘，井口围以古石，上刻"卓刀泉"三字。庙左有桃园阁，曾供桃园结义之刘、关、张像。卓刀泉东北一里许的湖滨，有关公桥，是卓刀泉通磨山的要道。

鄂公窑　在饮马池附近，有个村庄名"四十八窑湾"。627年(唐贞观元年)尉迟敬德被封鄂国公，传说他大修鄂州(今武昌)城，在此建砖窑48座。50年代时尚存窑址4座。

放鹰台　在东湖西岸(今中共湖北省委大院内)。它的得名，一说是李白在此观看放鹰，一说是李白访李邕故居后，在湖边发现一只小鹰被套住，便解开套子，放飞小鹰。从此自己亦学习冲天飞去的雄鹰，云游四海，长吟狂歌，无意仕进了。人们把李白放鹰之处称为放鹰台，原来也是东湖一景。

九女墩　在渔光村北约一里远处有小山岗，岗上葬有太平军英勇牺牲的9位女战士(详见"天国故实"条)。

珞珈山　按乾隆《江夏县志》，此山原名"逻迦山"，俗称"罗家山"。1929年武汉大学在此建设新校舍，经著名教授闻一多提议，校长王世杰同意，将山名改为"珞珈"，以坚硬玉饰之意来象征武汉大学是当时两湖地区的最高学府。武汉大学的校舍建筑别具风格，亦是游览的好去处。

东湖周围新建的景点，亦从再现历史，保存古迹的角度立意，丰富了东湖风景区的文化内涵，如行吟阁与屈原像、磨山上的朱碑亭和楚天台、湖边的寓言公园等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些都为东湖将来赶超西湖奠定了基础。

(山风)

李白泛舟郎官湖

唐代大诗人李白于725年(开元十三年)"仗剑去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漫游江汉，多次在江夏(今武昌)、汉阳游览，留下许多名篇佳作，并使一些地名因诗而显，增加了知名度。据说，武汉"江城"之

名就得自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而汉阳的郎官湖也是由李白命名的。该湖虽早已湮没，但它的名字却因李白诗篇而长久地留在武汉人的记忆中。

那是758年（乾元元年）秋，李白因故谪贬夜郎（今贵州桐梓及正安西部一带），路过汉阳时，正出使夏口的尚书郎张谓邀请他游览城南湖。沔州牧杜某、汉阳令王某作陪。他们月夜泛舟湖上，见"水月如练，清光可掇"，乃诗兴大发。张谓对李白说："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李白为感谢主人盛情，取名为"郎官湖"，并赋《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一首为赠：

张公多逸兴，　共泛沔城隅。
当时秋月白，　不减武昌都。
四坐醉清光，　为欢古来无。
郎官爱此水，　因号郎官湖。
风流若未减，　名与此山俱。

关于此湖，宋代曾有人指为"郡城之北，束于两山之间，纵广百余步"的小湖，即今之莲花湖。其实莲花湖并不是郎官湖，因方位不对，后者在城南，曾名"南湖"或"城南湖"，而莲花湖却在城北。

那么郎官湖究竟在哪里？我们可从旧地名探寻踪迹。在汉阳城南，曾有巷名"太白巷"、"郎官巷"，虽然现已改名太平巷、朗星巷，但确为古郎湖官邸址。由于江水对汉阳南门的冲刷，到宋时，贺铸已认为此湖"为江水所并，而去城里余，犹有州渚，隐然未泯，乃湖之故防（堤）"，并赋诗云："江吞百顷尽，石刻一篇留"，说李白刻诗当时犹存。

至于莲花湖，在龟山和凤栖山之间，湖中有堤，曾有桥曰"迎春桥"，可通太平兴国寺。这里原也是汉阳较有景致的地方。但在解放前已成臭水塘。解放后汉阳区政府动员全区干部群众通过义务劳动，整治莲花湖，不仅使其恢复了昔日的风采，还增添了许多景点，月夜在湖心亭上乘凉，可见湖中倒影，龟山影憧憧，长虹千灯亮，湖岸树婆娑，湖中明月光，不减当年李白泛舟郎官湖的情趣，难怪有人建议将莲花湖借拟为郎

官湖，辟为太白公园哩。

（士心）

“坐两天牢，充一天军”
——昔日马沧湖之旅

从钟家村沿汉阳大道向西走到五里新村，然后向南拐入马沧湖路，到达武汉动物园，就可看见一片与墨水湖相连溶为一体的湖区，它就是马沧湖。今日的马沧湖，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浮舟短棹，画廊朱桥，惊禽掠岸，犹如瑶池仙屿移至人间。湖滨，一排排厂房和大树红绿相间，十分壮丽；马路上，前来游览动物园的游客络绎于途。

但是，你可知道昔日的马沧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记得革命先烈龚培元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疏雨淡烟起暮秋，朔风初动使人愁。
马沧湖上碧波冷，大别山头红叶稠。
憔悴农民酸髓血，垂髫丰富厌粱糗。
人间多少辛酸事，都付江河昼夜流。

这首诗概括了昔日汉阳县南乡人民和马沧湖的悲惨情景。

马沧湖解放前是汉阳县南乡人民通往老县城和汉口的必经之道，因此在今动物园一带，曾是一个古老的内湖水码头。乡里人要进城或到汉口，分别到松林嘴、老世城、螺丝岗、鸭港桥、南湾等码头，乘坐帆船或汽划子（机帆船），行驶于后官湖上，途经虎头山、新塘渡、张家渡、辛家祠堂、升官渡、纳税堤至马沧湖登陆。这条水路上，付船钱的规矩是：“船过虎头山，都要把钱摊；船过纳税堤，都要把钱递。”乘船者要在船上呆两天才到马沧湖。沿途有卖熟食的小船，俟汽划子过来，便迎了上去，用钩绳把小船与汽划子联在一起，小船上的人向大船上乘客兜售发糕、油条之类食品。一路上，夏日里可欣赏岸边荷花美色，冬天里可目睹猎雁

奇观。到马沧湖上坡后，徒步行走，经汉阳郊区的邓家岭、陡码头、栖贤寺、月湖堤至汉江边过河，要走一天才能到汉口闹市。因此，乡下到汉口打货的小商人怨声载道，称这种旅行为"坐两天牢，充一天军"（意思是指在船上要在弓棚里坐两天，旱路又要走一天），可见昔日的马 沧湖之旅是何等的艰难。当时的马沧湖码头破旧不堪，萧条凄凉，通往汉口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孤坟野冢连片，乞丐排列成行，哭声、求乞声，令人心酸。一到阴雨季节，路面泥泞载道，一片疮痍。

解放后，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铁路、航运、公路交通的发展，马沧湖一带也出现了勃勃生机，面貌大为改观。现在，汉阳县各镇各乡处处通汽车，从蔡甸到汉口不过两三个小时。"坐两天牢，充一天军"的艰难历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马沧湖已与墨水湖溶为一体，构成了武汉市最大的游乐动物园。园内布局新颖，有山有水，有花有鸟，犹如一幅布局协调的山水画卷。马沧湖与墨水湖一样，为武汉市区建设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喻枝英）

高山流水有知音

高山流水有知音的故事，流传 千古，脍炙人口。俞伯牙与钟子期这一对知音，千百年来成为古人生死不渝的友谊楷模。

据明末话本选集《今古奇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人氏，仕至晋国上大夫的俞伯牙，精于音律善操琴。有一年奉晋主之命使楚，办完公事，张一风帆，返乡省亲。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值中秋，适逢雨止云 开，明月当空，伯牙在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抚琴案间，以遣情怀。方弹一曲，琴弦忽断，伯牙大惊，料有人听琴，遂下船察看，见有樵夫立于岸上，经两厢辩琴论艺，伯牙始知此人非俗士，于是邀其人舟，此人乃钟子期也。此时，伯牙续弦再操瑶琴，始奏一曲志在高山，钟子期听了，赞道："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续奏

一曲意在流水，子期又赞道："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喜遇知音，上大夫与樵夫结为挚友，相约翌年中秋在钟家重聚。一年以后，俞伯牙重回故里时，子期不幸离开了人间。伯牙面对一丘新土，悲痛欲绝，便在坟前抚琴祭奠，重弹"高山流水曲"以寄托哀思，琴声惊天动地，哭声悲切，招来山中黎民百姓围观，闻琴韵铿锵，鼓掌大声而散。伯牙见此情景更为伤心，对天长吟："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吟罢，伯牙从衣间取出小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轸抛残、金徽零乱，从此碎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由此，"高山流水有知音"传为佳话，千古不衰。

如今，富有传奇色彩的伯牙台、碎琴山、琴断口、钟子期墓在何方？伯牙台，一名古琴台，又名碎琴台。据《汉上琴台之铭》记："自汉阳北出二里，有丘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伯牙名之曰琴台。"台在汉阳月湖之滨，较为确切。伯牙台北宋时已有，但历代多有兴废，解放前古琴台是断壁残垣，荒草离离；解放后，古琴台回到了人民手中，1953年武汉市总工会以琴台为址，兴建了汉阳工人文化宫。1957年拨款对伯牙台进行了全面修葺，增设了许多景点，琴台廊馆，金碧辉映，绿树浓荫，湖水拥抱，真是一处独具特色，融名胜与风景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是武汉的三大名胜之一。

伯牙摔琴之地，后人称为碎琴山，位于汉阳琴断口仙女山附近的平塘渡，现属汉阳区永丰乡管辖；琴断口应是当年俞伯牙停舟抚琴，被钟子期听到后，琴弦突然断了的渡口，位于汉阳汉水上游一个小镇；钟子期墓，位于汉阳县新农乡马鞍山前的凤凰嘴，解放前荒芜不堪；解放后，进行修整并树立新碑，上书"楚隐贤钟子期之墓"。现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现代化的汉阳商场在伯牙台边拔地而起，位于12层之上的大钟，以巍巍的"高山流水曲"向子期故乡的人民报时，召唤致力于汉阳发展的海内外"知音"，重游琴台，共建故地。

（包年生）

榴花吐蕊为谁开？

看过戏曲《窦娥冤》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剧中情节：孝妇窦娥被诬陷杀人，为了不累及婆婆，屈打成招，判成死罪。临刑前她指天发誓，若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飞溅白练，三伏天道下尺瑞雪，楚州大地亢旱三年，则证明自己实属冤枉。窦娥死后，三件誓愿果都应验。

武汉地区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它不仅载入官方正史，而且还以立塔勒碑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

在钟家村闹市附近，有座充满江南园林风韵的公园——汉阳公园。进园朝里走，到文汇堂折向左手，行 100 米左右，便可在公园西侧围墙边看见高台上红绿相映的石榴丛中，有小巧玲珑的古塔一座。塔身呈六角形，周围可 3 人合抱；连底座共 3 层，通高仅 3 米余。全部用石砌成，正面镌有"石榴花塔"4 个大字。如果沿高台拾级而上，走到塔前详览碑文，则可了解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那个窦娥冤式的故事。

当时在汉阳军(宋代行政区划名，相当于府)有一位孝妇，杀鸡奉养婆婆，婆婆吃鸡后暴死。小姑一口咬定是嫂子投毒谋害，控诉于官。昏官不辨真假，用重刑逼供信，孝妇屈打成招，被判死罪，无以自明，临刑前折石榴花一枝，插于石缝，仰天祝祷说："如若真是我毒死婆婆，此枝即枯。若是冤枉，此枝将复生。"妇死后，石榴枝果然复活，秀茂成荫，并结果实。汉阳人认为此乃天彰其冤，哀孝妇无辜受难，因立石塔于石榴花侧，以表其事。

此事最早见于记载是在《宋史·五行志》上，其文曰：

> 绍兴间汉阳军有插榴枝于石罅，秀茂成荫，岁有花实者。初，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花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

这一简单的记载被人附会，生发开来，增加了妇杀鸡奉婆母，小姑

控于官府，有司严刑逼供等情节，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情绪。既为孝妇，必有孝行，杀鸡敬婆母乃民间认为是媳妇孝行之一。民间传说中小姑形象往往不佳，姑嫂间常存芥蒂，小姑对于嫂子，不是撺拨刁难，就是搬弄是非。于是故事里出现了诬嫂杀母的小姑。封建时代，官府黑暗，吏治腐败，滥施刑罚，草菅人命，人民对贪官、昏官十分痛恨，官方正史不愿言明的情节，民间自有公论。石榴性喜温暖湿润，用扦插、压条、分株、嫁接等方法均可繁殖。石榴枝插入有泥土的石缝，完全可以成活。故石榴枝复生之事并非纯属迷信或无稽之谈。但在故事中，这种自然现象却寄托着人们对冤案受害者的同情与不平。明刑部侍郎吴廷用所题《石榴花塔》诗就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态度，其诗云：

石榴花塔存遗址，谁识当年孝妇情。
自谓杀鸡堪奉膳，岂期遗毒陷污名。
折枝再树明冤屈，累壁成基志不平。
寄与操持三尺者，须知疑滅缓行刑。

从《宋史》上并未记石榴花塔来看，此塔最先可能建于元末明初。原塔在汉阳西门外 1 里处，因年代久远，塔圮碑毁。1522 年（明嘉靖元年）主事黄一道奉敕蓄储汉阳，主管筹粮事。他听了御史朱衣的介绍，认为此事不可不传，乃于原地重新立碑，新撰碑文以记其事。原来石碑湮没，直到 1777 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汉阳知县王少林才又从民间菜园访得，于是重新修塔立碑。咸丰年间毁于兵燹，1863 年（同治二年）汉阳知府周乐重建 石塔。不久又毁。1918 年汉阳阖邑绅商集资重建 于添福巷 12 号对面。现在所见碑文即为当时所刻。1964 年移入汉阳公园现址，成为园中一景。1983 年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严昌洪）

汉阳十景名胜多

从前名胜之地多用四言句列称其景物为“八景”，究其来源，多仿自

宋代宋迪所绘山水八景：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

历史上武汉有却月湖（即汉阳月湖）八景：古洞仙踪、板桥花影、僧楼钟韵、宵市灯光、柳映长堤、荷风曲溆、琴台残月、梵寺朝晖。

又有潇湘湖（即汉口后湖）八景：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陇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茶社歌声。

明、清两代各县编修县志，也必凑足八景或十景，以示本县亦为名胜之区。明嘉靖《汉阳府志》也循例列出了"汉阳十景"，并请知府王静一一题诗以为传扬。从十景命名和王静题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明代汉阳的优美风光和太平景象。"汉阳十景"多系千古名胜，它们是：

大别晚翠：小雨过后，傍晚时分，高耸的龟山翠绿，禹功矶头一片宁静，月光照着满汀的芦苇，远处传来禹王庙的钟声。

江汉朝宗：长江和汉水合流，滔滔雪浪拍打着芳洲，滚滚波涛东归大海，云帆生来迎送万里行舟。

禹祠古柏：禹王庙里，古柏参天，"长柯偃蹇霜前劲，密叶阴森雪后坚"，柏树是大禹治水的历史见证，禹祠是对他的永久纪念。

官湖月夜：郎官湖上，鹤鸣凫浮，万里长空，明月高悬。漫步湖边，凉风拂袖，远处遥闻寺钟，近处谛听渔讴。请问广寒宫是远是近，为何嫦娥也在水晶宫？

金沙落雁：深秋的傍晚，佇立大江之畔，田野里晚稻散着幽香，江上渔火闪着微光。大江彼岸，几缕清烟飘忽，金沙洲上，数行征雁起降。

凤山秋兴：清晨秋霜洒落在梧桐树上，峰峦掩映中仍记着"秋兴亭"的旧名。"凰振风前黄鹤唳，笙吹月下彩鸾鸣"。纵然太阳的初晖能够用笔描绘，但白云簇拥处也难画成。

晴川夕照：王静题此景之诗犹如一幅生动的水墨画，颇得自然情趣，抄录如下：

历历晴川晚眺时，斜晖映树转霏微。
冲开薄雾鸦群散，写破长空雁字稀。

尘扑马头词客过，笛吹牛背牧童归。

太平景象春风里，处处和薰万物熙。

此外，还有鹦鹉渔歌、鹤楼晴眺、平塘古渡三景，也都是诗情画意般的景致、历代传诵的名胜。

解放前曾任汉阳县县长的杨干先生，根据父老告知和笔记所载，写出了这样十景：龟山洞府、铁锁沉江、晴川晚眺、鹦鹉早春、荷池香满、月湖莲舟、琴台怀古、祢墓悲秋、归元暮鼓、栖贤晨钟。他认为马沧湖边还有二景：断桥垂柳、斜阳晚渡。看来，所谓八景、十景，都是自然的客观存在与人们的主观想像相结合的产物。不信，诸位还可找到新时代的八景、十景。

（严昌洪）

黄陂十景与“铁锁龙潭”

清同治《黄陂县志》著录有黄陂十景：

鲁台望道（一作鲁台双凤）：鲁台山上有二程（程颢、程颐）筑台望鲁，缅怀孔圣的遗址，后人又建双凤亭于其上，是纪念二程的古迹。

克寨屯军：克敌军寨在县城北5里处，相传前代筑以御寇。

武湖烟涨：黄陂县境东南的武湖，相传为东汉江夏太守黄祖练武习射之处，湖面因日照受热，蒸发成雾气，在黄昏或清晨形成烟雾溟濛的景象，时人称为“烟涨”或“烟瘴”。这烟雾给武湖披上一层神秘面纱，放舟湖中，飘飘然有羽化登仙之感。

滠水冬温：滠水自北向南，纵贯黄陂全境，至五通口与谌家矶之间注入长江。此河水据说冬暖夏凉，甚是奇异。

板桥人迹：在黄陂县治西郊外有石板桥一座，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建，明永乐间重修。相传仙人曾经此桥，石上留有仙人足迹。此景之名改为“板桥仙迹”或者更恰当些。

钓台夜月：县治东北5里，有磐石临河，世传宋代隐士曾钓鱼于此。

西寺晓钟：县西木兰寺一名西寺，唐贞观年间建，明洪武年间重修，为从前朝贺习仪之所，其晓钟清脆，回荡晨空，山村田野，一片静谧景象。

木兰耸翠：此为黄陂县第一胜景。县北60里的木兰山为荆楚名岳之一，不仅以木兰将军的家乡闻名于世，而且以自然景观和道教圣地吸引各地游人香客。

甘露呈祥：县东10里的甘露山，因世传陈武帝时曾降甘露而得名。山下有甘露寺，1567年（明隆庆元年）重建，内祀二程及诸学者。

铁锁龙潭：在黄陂城内旧县署西百步外，有一潭，中有一墩，上立两根石柱，各高丈余，明成化年间被风吹折一根，所存一根不知仍在否。以前传说古萧寺有一条泥龙，阴雨天或潜或现，寺中僧伽非常害怕，恐其兴风作浪，便以锁系龙。一天晚上，风雨大作，泥龙腾空而去，后渔人在潭中捕鱼，网得长锁。萧寺不知何代所废，而潭则被称为铁锁龙潭。为黄陂十景之一。万历年间县令胡仲澜在潭上建文昌祠，久废。到1871年（清同治十年）重建文昌宫，复修正殿一重，中祀历代帝君先贤。东侧有放生池，由放生公所管理。1909年（宣统元年）进步人士打破女禁，创办了黄陂第一所女子学校——木兰女校。当时封建传统观念牢竟根深蒂固，主事者虽冲破阻力，创办了女校，但却顾虑重重，仍把女子视为必加防范的洪水，把校址设在铁锁龙潭的中心处，原藏经阁的旧址上，而且四周筑起篱笆围墙，只开一门进出，几乎与世隔绝。

（严昌洪）

归元寺
——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

归元禅寺座落于汉阳旧城西5里，即今汉阳区翠微街横路5号。始建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由白光和尚与其胞弟立峰和尚主持经营，他二人遂为归元寺之开山祖。二位法师俗姓殷，浙江吴兴人。相传白

光祖师殷德明于明崇祯年间，任汉阳知府，有感于明末战乱，百姓流离失所，遂回老家，于龙华寺剃发为僧，由他的师父慧峰和尚取法名白光。白光在清朝初年云游汉上，先在汉口十方庵挂单为行脚僧，后又入汉阳太平兴国寺阅藏，见经卷散乱破损，化缘3年修藏经。时人以此相推崇。法师又善华陀之术，为贫苦百姓施医送药。他目睹战乱频仍，灾疫横行，饿殍当道，乃于1658年先建普同塔院收殓白骨。汉上巨贾孙耀先等嘉其善道而捐巨款筹建梵宇，意在弘扬佛教。先购得原为明末文人王章甫所有之葵园为道场，然后鸠工庀材，经营栋宇。1660年建佛堂、禅堂，开始接众行道。翌年修大雄宝殿并客堂、斋堂。1662年(清康熙元年)增其旧制，建祖堂、韦驮殿与方丈室。直到1674年，藏经阁、钟鼓楼、云水堂、内外寮舍、三祖塔院及大三门方始落成。前后规治16年，苦心经营，归元禅寺初具丛林规模。白光、立峰祖师从《楞严经》中文殊法师偈语"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中取"归元"为其寺名。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汉镇巨贾李祥兴捐款助建罗汉堂。聘黄陂王姓父子塑罗汉500尊。1852年(咸丰二年)归元寺毁于兵燹。清同光年间又重建。其后屡圮屡复，殿宇不断增大。辛亥首义时，义军曾以归元寺为指挥之所，故遭清军炮击。民国年间又募化重修并扩建。黎元洪亲题"归元禅寺"、"归元古刹"、"三乘广运"匾额，使归元禅寺声名日隆，成为鄂省之首刹。迨至解放前夕，归元寺已日渐毁圮。建国后，人民政府多次拨巨款重修禅寺，使其焕然一新，并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寺院之一，使之又成为中原三省之首刹。归元寺近年佛事增多。自1984年以来开期传戒。不仅如此，归元禅寺于近年来接待了大量外国贵宾前来观光。计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界要人。平时接纳的游客据不完全统计达数百万人之多。

归元寺殿宇宏敞、古朴幽深，处闹市之中独得其妙境，其规制、风格、装饰和结构亦有独到之处。大凡寺庙之名，均为横匾横书，悬嵌于三门之上。归元寺寺名却为直匾直书。这是因为清代朝廷明文规定，只有皇帝敕赐玉玺的寺庙其匾额允许直书。而该寺于道光年间曾获此殊荣，

遂将横书匾额改为直书，从此归元寺在佛教丛林中的地位提高了。至于寺院建筑格局也与他寺迥异。大三门不逢中，却开在偏北处，而且望东向北。进三门便是前院。前院置大放生池，石栏护之。放生池两头有钟、鼓楼。前院可通3个去处，即南进韦驮殿通大雄宝殿；东去"翠微妙境"进藏经阁；南到"法相庄严"至罗汉堂。

韦驮殿正门在右首，而且方向朝东偏南，与大雄宝殿隔一丹墀。韦驮面如来而立，这乃是常制。而弥勒置于韦驮右侧对面而朝殿门，倒不多见。这里又不设四大天王佛龛更属少见。韦驮佛像是用一直径1.3尺之柏木雕成。韦驮手持降魔杵毁于"文革"，现所见之降魔杵乃今人之作，九龙腾挪，神韵不减旧杵。韦驮盔甲铠袍，神态威猛勇悍，活脱护法天神形象。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说，一日，某僧嗜酒违犯寺规，携酒入寺，过韦驮殿，见韦驮怒目圆睁，不禁心惊肉跳，酒钵坠地，以此惊动监院。监院斥他道："韦驮护法，惩治业障！"传说故事表达了韦驮神像之逼真传神。"文革"以前，韦驮神像前设有抽签卜卦的器具，因传灵验异常，故收入颇丰，有人称韦驮殿为聚宝盆。但由于这种活动既与禅宗教义有悖，又是迷信活动，所以现在寺庙将其撤去。目前韦驮殿仅设功德箱，所收功德钱亦能负担全寺开支的1/3。

大雄宝殿是一砖木结构歇山式大型殿宇，高约20米，殿中供释迦牟尼神像，佛祖趺坐莲台，两旁立阿难、迦叶塑像。坐像高约1.6丈，佛光灿烂，慈祥庄严。大雄宝殿为庙中佛事活动场所，大凡和尚早晚功课以及佛教庆典、法会、传戒、放焰口均聚于此。大雄宝殿或称大殿。"大雄"是赞颂释迦牟尼"大雄大力"德行高尚的意思，故称供奉教主之殿为"大雄宝殿。"

罗汉堂位于归元寺之南院，占地约3500平方米。据说全国有五百罗汉的寺庙仅存5个。而归元寺之五百罗汉以其巧妙的田字型布局，使得罗汉堂内的通风和采光得到科学的解决，尤其以五百罗汉的造型具称于世，堪称绝世之珍。五百罗汉造型优美，或卧、或坐、或嗔、或笑，无不栩栩如生人。瑞(典)中友协主席恬·米格尔在一次游览中风趣地说

道："方丈，这些罗汉把我们的衣服穿上，让他们走上街，人们是不会知道他们是塑像的。"据说罗汉塑像是采取的脱塑工艺，质地坚而重量轻，不怕水浸。1954年洪水泛滥，归元寺一片泽国，众罗汉漂浮在水中，洪水退后，一尊尊罗汉依然完好如故。民间盛传数罗汉可卜人之吉凶祸福，故罗汉堂每游人如织。

藏经阁是归元寺收藏佛教经典和珍贵文物的处所。计藏有《龙藏》、《续藏》、《碛砂藏》、《频伽藏》，可谓洋洋大观。珍贵文物如贝叶真经、北魏石雕、古瓷器、宋代乾德年间的陶瓷香炉等。据50年代整理的书画真迹手卷清册载，计有宋元明清民国5代，418件书画作品。作者有上至皇帝，下至各界名流。今之藏经阁建于1920年，为唐牌楼式建筑，斗拱飞檐，古朴雄奇。占地约400平方米，高25米。藏经阁的金匾悬于正中门楣，瑰丽壮观。

大士阁位于藏经阁之南，仅隔一墙，前身是百子堂，民间或谓"娘娘殿"、"送子堂"，供观音神像。旧时供桌上置一红布袋，内装有红枣、花生、鞋子、筷子。凡欲求子者可于袋内摸，如摸到筷子，意即可早生贵子。皆是谐音取意，无非是诳人的勾当。佛龛之左方壁上嵌一块摩刻，据云为唐阎立本所绘，人物半裸侧身，赤脚缓行，手持锡杖，形态生动逼真，实为难得的珍品。

（李守毅）

宝通寺
——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二

座落在武昌洪山南麓的宝通寺，是武汉的又一著名佛教圣地，寺中的洪山宝塔，更是远近闻名。

洪山位于武昌城东，原名东山。在南北朝时代即建有寺庙，当时称东山寺，距今已有1400年。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尉迟敬德封鄂国公，奉命修建鄂州（今武昌）城时，在东山寺基础上扩建寺宇，铸造铁佛，

更名弥陀寺。据宝通寺方丈源成法师回忆，解放前他曾见过刻有"尉迟敬德建造"字样的墙砖。南宋理宗嘉熙年间，抗金名将枣阳人孟珙出任荆湖制置使，为避兵乱，与民兵都统张顺将随州大洪山之幽济禅院尊众（即多尊佛像）迁来武昌东郊，连同灵济慈忍大师的"佛足"及历朝所颁告敕一齐安置在弥陀寺，并奏请赐寺名为"崇宁万寿寺"，同时将东山改名为洪山。后经战乱，香火冷落，京湖大制置使吕文德请无积禅师为之主持，该寺乃得复兴。元初毁于灾。1332年（元至顺三年）华实任该寺住持，毅然以复兴自任。他筹集几万缗经费，广求大木由江上运归。因原址地势狭窄，不宜扩建，乃夷山填壑，垒石为基，使其宽敞，大兴土木，1334年（元统二年）告竣。时人称新建之寺宇，"金碧髣髴，辉映林谷，宏模伟观，人天俱瞻"。随州、许州（今许昌）"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有黄缙作《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记其事。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之子楚昭王朱桢就藩武昌，在蛇山之阳营建楚王府的同时，在洪山重建寺庙。其后楚靖王朱均钰在1457年（天顺元年）又大修大雄宝殿等建筑。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规模大增，并更寺名为"宝通禅寺"，沿袭至今。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大司马张朝珍、布政使徐惺先后增修，使殿宇宏伟，为"武昌诸刹第一"。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再次修葺。咸丰年间又遭兵燹毁圮。1865—1879年（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修复，规模远不及前，寺内现存建筑多为当时所建。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曾设司令部于该寺。民国年间，程潜出资进行维修，未及竣工即被驻军破坏。1932年，方丈问贤法师以同乡关系请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支持和援助该寺的复产重建工作，使寺中所失去的全部房产收回。当时该寺范围甚大，山门设于岳王台（今傅家坡附近）。并在城内龙神庙（今古楼洞民主路东打火机厂附近）设立下院，作为宝通寺行馆，专供进城办事僧人食宿。此时可能是该寺鼎盛时期，香火十分旺盛。

195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使宝通寺面貌焕然一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洗劫，僧众四散，文物失落。1983年列为全国重点寺庙之

一，翌年即由国家拨款全面维修，并召回僧众，恢复佛事活动，接待海内外僧俗各界人士，还设有僧伽培训班，培训各地来的青年僧众。

宝通寺如今的山门面向武珞路，门额上"宝通禅寺"四字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山门内一大院落，中有放生池，放生乌龟出没其中。池上横跨一桥，名"圣僧桥"，原为木桥，相传无念祖师云游到此，改建为石桥。按照佛寺一般建筑格局，此处应有钟楼和鼓楼之设，但兴毁情况不见记载，只好阙如。

过桥数十步为弥勒殿，又称天王殿或接引殿。殿前左右各立石狮一只，身高丈余，一戏绣球，一抱幼狮，神态可掬。殿左侧有一口大铁钟，清咸丰年间铸造，由城内铁佛寺迁来。殿内主尊为弥勒佛，金光夺目；佛寺的守护神韦驮亦供奉在此殿内，背向弥勒而立，造像威严。左右有观音、地藏王塑像，两壁立有高大的四大天王。

由弥勒殿后拾级而上，即可达大雄宝殿。殿内一口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大铁钟还是1240年(嘉熙四年)孟珙迁寺时铸造的，铁身铜缘，形体庞大，重约万斤，号称："万斤钟"，其声雄浑，可传数里之外。大雄宝殿为正殿，供三位主尊，佛教缔造者释迦牟尼居中，身后左右为文殊、普贤两菩萨，两厢有十八罗汉。殿中有归元寺住持昌明法师所书楹联一副：

古今来宗教几何自由平等无如我佛；
东西国文明进化言行高尚独让法王。

大雄宝殿左右和后面，原来的一些建筑有的无存，有的重建，有的修缮，现有方丈室、客堂、僧寮、斋堂等。藏经楼及楼内所藏珍贵文物、经典，文革中多已毁弃。

出后门登山原有铁佛殿，殿内有铁佛二座，均为唐代遗物，系从城内铁佛寺迁来。此殿原为方丈说法处，殿下石砌暗道曾发现方丈说法用的锡杖。殿中银质舍利塔一座，八寸高，三寸宽，仿缅甸大金塔式样制成。此殿解放前已毁于大火。再上即法界宫，为宝通寺前住持持松于1923年由日本留学归来，为恢复我国密宗，依唐密金刚部五佛曼荼罗修建。原建已遭破坏，现在维修复原。该殿右侧有华严洞，深丈余，原供有

毗卢佛像，现无存。洞上建有华严亭，为游人休憩之所。最上为灵济宝塔，又称宝通塔或洪山宝塔，另有专篇介绍。

（郭云涛）

古德寺
——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三

如果说，归元寺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较好保护的话，那么，古德寺却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破坏殆尽。今天作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古德寺已在陆续修复。

古德寺的历史比宝通寺、归元寺、莲溪寺都要短。1877 年（清光绪三年），在汉口今解放大道东段，黄浦路北段一带还是一片坡地。有位法号叫隆常的禅师来到这里，建了一座小小的寺庙，名“古德茅蓬”，他便成了古德寺的开山祖。随着后湖的变迁，前来烧香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到 1905 年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据说该寺还请了藏经，加强了它在佛寺中的地位。民国初年，昌央法师主持扩建，定名古德禅寺。黎元洪当了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后，支持古德寺的改建、扩建，并亲笔题写了寺名，悬于山门之上。1921 年秋，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作，重修了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宇，塑造了各殿内供奉的大小佛像多尊。1931 年汉口大水时被淹没，水退后又继续修复，前后历时 13 年乃告竣工。

古德寺规模最大时占地 2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3600 多平方米。进山门过甬道，首入天王殿，殿内供奉佛寺守护神韦驮和四大天王。穿过殿后院落，即可达大雄宝殿。此殿参照缅甸著名佛寺阿难陀寺的建筑艺术风格建造，正方形大殿内空高达 16 米，殿内可容千人，殿顶盖有象征五佛（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佛，又名五智如来。中为法身佛，即毗卢遮那佛；南方宝生佛，表福德；东方阿閦佛，表觉性；西方阿弥陀佛，表智慧；北方不空成就佛，表事业）四菩萨（即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四菩萨）的 9 座佛塔，塔周围有 96 个莲花墩和二十四诸天菩萨像。殿中

供奉三位主尊：释迦牟尼、药师、弥陀，三尊托纱丈六金身大佛盘坐在8级莲花座上，这种三佛同殿的安排，近世少见。三尊大佛前还保留着古德茅蓬时代所供奉的三尊同名佛像，相比之下，后者的形体显得很小了，三主尊佛坛的背后为西方三圣，两廊为楞严二十五圆通及文殊、普贤佛像。

大雄宝殿左侧有方丈室、觉幻室、观音堂、藏经楼等，右侧为生活区，有寺僧寮房、客堂、斋堂等。寺后及左侧原有大片空地，是菜园和竹园。现外观犹存其轮廓。以往住僧常在50—70人左右。解放初因与广讲寺同搞生产，逐渐并入广讲寺。

（觉空）

莲溪寺
——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四

“5月10日，武汉晒湖东古盘龙山下古木参天，钟鼓齐鸣，座落在丛荫蔽日中的莲溪禅寺举行隆重的佛像开光典礼。典礼在大雄宝殿举行。身披寿字袈裟的市佛教协会会长昌明在维那师的迎请下，步入幡幢高悬的大殿，主持开光，百余名僧众随着寺内各种打击乐器的节奏，齐声颂经唱赞。昌明法师向市佛协副会长慈学比丘尼送座后，全寺40多名比丘尼众顶礼道贺慈学法师荣任莲溪禅寺住持。”

这是1992年5月12日《长江日报》所报道的莲溪寺一次法事活动的盛况。

莲溪寺是武汉市目前唯一的一座佛教“女众丛林”。它创建于元末明初，原址位于武昌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绿瓦窑地方。当时传戒挂单，香火旺盛，“为十方之丛林”，明末全部被毁。清康熙年间由法融长老在现址重建，1856年（咸丰六年）又毁于战火，仅存碑记于荒基山场。旋有正方和尚搭盖茅庵，供奉香火。1889年（光绪十五年）从四川来的医僧道明和尚再次重建。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二千余金，并四方化缘，募得水

田、山场和树木等资产，着手“重复古貌，以妥神灵”。先后重建了山门、佛殿、客堂、斋房、廊房、寮房数十间，还装塑了不少佛像，添置了经典法器，逐渐恢复到原来“十方丛林”的规模。

现今该寺所存主要建筑大都为当时所建。道明于1891年亲笔提写的寺名如今仍镶嵌在山门之上。从那时起，莲溪寺住持传了六代，即：道明——心静——体空——普昆——道根——慈学。

莲溪寺以莲花道场著称于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中。1911年(宣统三年)该寺奏准藏经，所藏佛经珍品直到“文革”前仍保存完好。同时还藏有墨玉观音、紫金钵等稀世珍宝。可惜的是，这些珍贵文物在“十年动乱”中大多散失。莲溪寺还是佛学教育基地。1928年在体空和尚主持下，筹集资金开办了著名的华严大学，聘请性洞、机通、体如等法师为教职员，3年内为佛门培养的30多名弟子，遍及海内外，这是当时全国最高佛学学府。

1959年，该寺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妥善的管理。一度开办火葬场，香火也逐渐兴旺起来。“文革”中，莲溪寺也受到冲击，僧众被逐出山门。1983年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寺庙才获得新生，先后迁出了火葬场和街道工厂，接回了流散在各地的比丘尼，并在1986年调来汉口栖隐寺慈学法师任住持，使该寺作为尼众丛林对外开放。目前寺内常住比丘尼50多人，开办有年轻尼众“爱道培训班”，学员分别来自附近各省市。

近年来，市政府及市佛协等有关方面出资60余万元，修复了5座大殿，重塑佛像30多尊。修葺一新的莲溪禅寺，环境幽静，风格古朴，笃笃木鱼声伴着青灯黄卷，正是出家人修行的好处所。

（觉空）

佛教居士团体

辛亥革命以后，汉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为了事业的发

达，不少人希望托庇于神佛的护佑，成了在家的佛教信徒——居士。居士们除了在家吃斋唪经外，还定期到寺院熏修，早期并无单独道场。

1920年，提倡佛教革新的太虚法师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发表，中心思想是利用现代社会组织，将佛教四众组织起来。是年9月，信仰太虚的汉口政、商各界居士建立了汉口佛教会，拥戴太虚为导师，推选曾任广西巡按使及湖北堤工督办的李开先为会长。下设3部：弘教部，培养传教人员；修持部，举行法会讲经；利世部，办理慈善救济事业。汉口佛教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在家学佛团体，长江中游唯一的居士组织。

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各省设立分会，汉口佛教会乃改组为汉口佛教正信会，以示区别。正信会开始时暂借汉口农会慈善堂为办事处，后通过会员乐捐和向社会募捐筹集经费，在福建路修建了新会址，前栋两层楼房，后栋三层楼房，中间天井，两边花台，大殿别开生面，设在二楼正中，上盖黄琉璃瓦，木栏浮雕，人物逼真。每月有4天为共修日，常到居士200人，遇佛诞节日，多达近千人。正信会下设7部：1、总务部；2、护法部；3、研究社（内分法相、法性、净土、真言四宗），又先后设立唯识研究会、佛学研究馆、佛学女子研究部；4、宣化团，请法师讲经，创办《正信半月刊》；5、慈济团，专管救灾及常年送诊施药，1940年创办武汉第一家殡仪馆；6、修持部，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供修4次、结众打七；7、青年部，负责青年居士的组织工作。

正信会内供奉着一些珍贵的佛像，如6尺接引阿弥陀佛金像、释迦佛丈六金身、诺那活佛、两壁百佛画像和两座转法轮、缅甸白玉佛5尺座像（已移至归元寺）、8尺高韦驮菩萨金像等。壁柜装有《碛砂藏》、《大正藏》两部大藏经。正信会为在家居士提供了集体活动的场所。由于其导师太虚的国际威望，不少国际佛教友人先后来会访问。1982年正信会恢复活动，会址亦在修复，将作为重点居士道场开放。

1931年，武汉大水，正信会成立慈善救济委员会，进行救灾活动。一部分对会长王森轒所作所为不满的会众脱离正信会，在六渡桥萧家

院另外成立静业佛堂。1934年在太虚法师的劝导下，静业佛堂改名为汉口佛教第一莲社，公推刘俊三为社长，并请太虚法师来社吃斋念佛和讲经。因前来听讲经的人一天天增多，第一莲社不断扩大其建筑，并加盖寮房，以供年老孤苦的居士、斋婆居住。

抗战胜利后，召开社员全体大会，决议将第一莲社改名为汉口佛教居士林，以容纳更多的教友。废除社长制，成立理监事会，选举李书城为理事长。重新改造后的殿堂新修韦驮像一座，添置了许多家具，每日早晚功课照常进行。解放后仍并入正信会。

此外，根据汉口妇女吃斋念佛者众多的特点，还有上下两居士林容纳尼众、斋婆。上居士林即正信会旁的女居士林，后恢复栖隐寺名。下居士林又名老居士林，即袁家墩的清济寺。每届会期，女居士们集会念佛，举行佛七法会。

1943年成立的印光法师永久纪念武汉分会，最后落脚在南京路宏春里，星期天集众念佛，后来也并入了正信会。

（翠微居士）

抗战僧尼救护队

1938年5月的一天，从香烟缭绕、佛殿森严的汉口香山寺（其址在今青少年宫）内走出了一条长长的僧侣队伍。他们个个英姿勃勃，精神抖擞，径直向大智门车站进发。沿街群众夹道相送，一路鞭炮四起，锣鼓震响，掌声不息。这批数以百计的僧侣，不是一般云游他方的行者，而是为支援抗战而组成的一支特殊队伍——武汉抗日僧侣救护队。队长是香山寺住持海镜和尚，他着一身戎装，佩一把长刀，手擎黄底白边四方旗，上绣黑字队名，引领队伍昂首前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的抗战声浪风起云涌，全国佛教界上层人士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根据"以大乘佛教的精神舍身救人"的教义，为尽保卫家园的天职，当时全国佛教会会长、上海元明堂

的圆瑛法师，首先发起组织上海佛教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是福建人，兼任当时的楞严专宗学院院长。他德高望重，声播海内外，与东南亚一带的佛教界和爱国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的爱国行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界人物许世英的支持。当时上海佛教僧侣救护队的医药物品、救护担架等所需物资经费，均由新加坡等地华侨和佛教界募捐得来。上海沦陷后，这支救护队转移到了汉口，住在武圣路成仁巷内的九莲寺中。

当时，汉口佛教会会长、香山寺院的主持海镜和尚主动与圆瑛法师联系，要求在汉口也成立抗日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欣然赞成，并很快从上海拨来资金。在海镜和尚的主持下，立即成立了由120多名爱国僧侣和少数男居士组成的抗日救护总队。下设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其中有20多名年青力壮的僧侣组成的担架队和30多人组成的比丘尼护理队。这个护理队由慈园担任队长，靖忠法师为队副。他们从红十字会请来护理教师传授抢救和护理的知识，并反复进行训练。由尚未受戒的慈学（现任武汉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带修两沙弥尼充当伤员，从头到脚学习包扎裹伤技术。

救护队在集训期间，曾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那是1938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梅神父路（今江汉北路）的一处房屋突然起火，漫天大火延及香山寺。100多名队员奋不顾身，全力抢救，才使香山寺保存了1/3，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颂。后来圆瑛法师领导的上海佛教僧侣救护队撤往重庆，海镜和尚领导的汉口僧尼救护队，则随第九十七军转战湘鄂各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海镜和尚返回汉口重兴香山寺。汉口佛教僧尼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陆川）

汉口第一公园——中山公园

汉口中山公园，地处闹市中心，每日游人如织。武汉及邻近各县的

人没有不晓得中山公园的，但是，对这座公园的历史，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很少。

中山公园最初是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的私人花园，约建于本世纪初。1914年左右，刘为笼络湖北军政府财政厅长李华堂（袁世凯所赐"将军团"的中坚分子），便将此园赠给李，李乃命名为"西园"。该园当时面积仅1680平方米，即从现在公园大门至原管理处，东侧门至图书室北公共厕所处的长方地形。1927年，汉口特别市政府将西园作为敌产没收。西园附近，有块很大的空地，属于吴佩孚直鲁豫同乡会。

1928年夏初，建筑专家吴国柄由英国留学归来，在他的建议下，经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批准，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汉口特别市长刘文岛、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的支持下，成立"汉口市第一公园办事处"，派吴国柄负责修建中山公园。经测绘，地址选在西园和直鲁豫同乡会公地范围之内。当即将上述地方用围墙围住，动用军人和犯人挖湖、堆山，并从鸡公山林场运来大批树苗，绿化全园。公园面积达到12.5公顷。园内人工湖中堆成几个小岛，小岛间架桥相连。还建有运动场、游泳池、溜冰场、民众教育馆和总理（孙中山）纪念堂。部分竣工后，于1929年6月10日先期对外开放，同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正式命名为"汉口中山公园"。公园正门（今出口处）是根据英国皇宫巴肯汉姆来设计的，门两边的石墩子上，刻有"中山""公园"四个篆体字。出口处则在今大门上首那个已关闭停用了的窄门，跟大门一样的中山公园四字至今犹存。1931年汉口洪水成灾，公园淹没，仅存湖山和游泳池之平台。1932年，仍由吴国柄主持整顿和修建。至1934年已陆续完成原有设施，并新建了"张公亭"（为纪念张之洞所建）、"湖心亭"、水阁、罗马式建筑"四顾轩"以及树枝形栏杆钢筋水泥桥（今落虹桥）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修复时新修了"日晷"（一种测时器具）。人们只知道北京故宫中有日晷，中山公园建日晷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创举。这座日晷建成后，不仅起到了报时的作用，也为公园添了一处景点。后不知何故未能保存下来，只残留了一个

空空的日晷台(解放后已在台上建造了一座山羊塑像)。

修复后的中山公园,范围扩大到今人民会场一带,较前扩大了一倍多。在修复工程进行时,汉口特别市政府下令,选定出口、入口两门之间的中心点(今中山公园正门口)修造一座蒋介石的戎装铜像:蒋介石全副军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身披黑色大氅,马翘前蹄作飞奔状,样子十分威武。

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下令拆除了蒋介石的铜像(底座1958年尚存,后拆除),并把公园假山挖掉修造一个汽车库,在树上拴军马,树被马啃光树皮枯死,有的还被砍伐去修筑工事,公园变成了军营。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18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担任湖北、武汉地区总受降官,在汉口中山公园新建的受降堂(即今餐厅),接受了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等呈上的投降书,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武汉解放后,多次进行全面翻修,面积扩大,景点和游乐设施增加,每逢节假日,入园游客日流量高达10余万人次。中山公园不愧为"汉口第一公园"。

(商若冰)

不知遗址所在的怡园

怡园,是清代中叶武汉地区名园之一。1933年王葆心著《续汉口丛谈》中载:"有清中叶……又有包云舫遐裕怡园在汉口南岸,汉阳东门外。园内有水亭,满种芰荷。今皆不知遗址所在。"那么,这个"不知遗址所在"的汉阳名园究竟在哪里?据有关专家考证和世居东门外的老人回忆,怡园就在今汉阳区莲花湖北侧。

其实怡园不是包云舫的,而是其侄包祥高(字包山)的。据1822年(清道光二年)版范锴(怡园主人包包山的好友)著《汉口丛谈》中记述的有关情况和范锴的行踪推算,怡园造园的年代大约在1800—1809年

(嘉庆五年至十四年)之间。据范锴记载：

丹徒包包山司马祥离，"业鬻汉口，风雅爱客"，"其自叙云……余以鹾务，久留汉口。有朱氏园者，无飞台重阁之瑰丽，有洞房幽室之便安。长可百弓(1弓等于5尺)，宽盈十笏(1笏约2尺6寸)。余得而修葺之，题曰怡园。"

以前本来就有园(即朱氏旧园)，只不过布局平常，到了包包山手中，才"修葺"一新。《汉口丛谈》所载包包山的一段自述，对怡园的改建"修葺"作了些叙述："余缭以周廊，增之广厦。凿深池以蓄水，澄澈晶莹；垒危石以成山，嵯峨壁削。环林素映，芳草平敷。层构踞虚，交错如星罗棋布；异卉争致，繁艳如云蔚霞蒸。仄径将穷，忽逢歧路；重门别启，顿骇奇观；车马无喧，琴棋自乐……幽闻莫比，俯仰如神。"这里所说的垒假山、缭周廊、凿深池、栽花木以至大兴楼台亭榭，无一不是重新规划，再造景观，处处体现了扬州、苏州园林的风格。由于园主人是扬州、苏州一带人，园林的风格当然跟他的爱好有关。

新建的景观有十二个。这十二景以湖为中心，沿湖造景，次第排列，构成了一座"集锦"式的园林。十二景是：亭北春红、廊西秋碧、仄径竹探、澄池荷静、薇架花香、蓉屏月影、小山丛桂、曲蹬古梅、悬岩瀑布、石洞天、平台歌舞、高阁琴书。

"高阁琴书"是十二景之主景。高阁即绿波山房，为主体建筑，最为宽敞，图书彝鼎和古玩字画错陈其间，唐代书家颜真卿的三表稿真迹亦珍藏在此。登高阁，可俯视浩浩长江，晴川阁、黄鹤楼尽收眼底。

民国初年，这座名园为厘金局师爷张香所有。北伐胜利后，张香南逃，被寇英杰部驻扎，将园中一部分辟为操场，另一部分改作营房，后又卖给教会修建天主堂，大致于1926—1927年间才最后湮没，而且毁得面目全非，难怪王葆心叹道："今皆不知遗址所在"了。

今汉阳莲花湖公园借鉴怡园十二景，已建成"亭北春红"、"蓉屏月影"和"小山丛桂"三景。根据规划，其他景点将陆续兴建。

(商若冰)

乃园——一幅“田园山水画”

武昌乃园是清代湖北臬署(按察使署)的后花园。是由一个姓刘的臬台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主持修建的。它座落在蛇山西端,位于今武昌大成路湖北省交通局汽车修配厂的旁侧,面积约三四十亩,四周绕以围墙。由于园中建筑布局形似“乃”字,故名。其范围下至大成路,上至蛇山顶部,东折与山下臬署的后墙相连。西临水巷(原名臬水巷,现名乃园)、韩家湾,南至今黄鹤楼剧场。今武昌区房地公司及乃园公共厕所均在乃园的遗址上。

乃园的主体建筑是“四忠祠”和“学律馆”,前者是为祭祀在太平天国三克武昌城战役中为清廷殉职的按察使而设,后者是教授地方官吏学习律令的场所。从臬署到学律馆和四忠祠之间,修建一座长廊,为蔽风雨用,名“七曲廊”。由此往西沿山坡修石阶,旁竖栅栏。沿山坡石阶,约行百余步,至半山腰,有“见江亭”一座。回首南望,对岸鹦鹉洲浮波泛绿,骋目抒怀。再往上可见一片梅林,植梅300株,梅林侧有堂三楹,曰“鹤梅”,横卧于山间峭壁,是踏雪寻梅佳处。山巅有台,曰“高观台”,登台纵观,江汉浮浮,烟云漠漠,洋洋壮观。往西百十步,有台曰“西升”,下临长江,南眺金口,北望青山,西视汉阳,鹦鹉、白沙二洲历历在目。下行是武士习武处,曰“射圃”。台之东偏有修竹小径,沿竹径可至一平岗,名“东坡”,在此可看洪山诸景,绿林红塔,色彩鲜丽。再沿竹径曲折而下,有清泉一泓,曰“竹池”。再下,绿树葱茏,林中有“跻绿亭”,名与景俱切。循山路出东栅到学律馆之南辟有一菜园,环绕菜园栽植梅、枇杷、芭蕉、翠竹等观赏树木,称“小圃”。圃中有亭名“暂亭”或称“沤舫”。亭旁设花架,密攀凌霄。池塘植白荷,沿池砌驳岸,绕以栏杆,一棵垂柳歪依池畔,绕有风趣。东岸一台名“竹深荷静”,西岸一台名“般若台”,栽有百年朴树,苍荫如盖。池中有假山,山上有小亭,假山与池塘间有两座小桥相连。

乃园的山麓景区，着眼于田园风光。园中建筑，不加雕饰，崇尚淡雅，益增这幅"田园山水画"之情趣。

民国时期，乃园为湖北省财政厅的后花园，园名依旧。1924年萧耀南任湖北督军时，将乃园划入首义公园，拆除了乃园的围墙，修建了陈友谅墓。1953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首义公园的亭台楼阁相继拆迁，乃园风貌随之消失。现在存有唯一遗迹是1886年3月(光绪十二年二月)的《乃园图记》石碑，被当作废砖嵌于武昌区房地公司女厕所的围墙中。

(商若冰)

歆生花园漫忆

"歆生花园"，又名"刘祥花园"，简称"刘园"，是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芦汉铁路通车后兴建的私人花园。

刘园坐落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北端，靠近循礼门，现武汉船舶公司的大围墙就是该园的主体，不过要向北延伸越解放大道、纺织品大楼，再过马路包括红艳村全部，约占地25亩。本来靠铁路那边地势高，解放大道那边地势低，建园时就高处垒山，低处挖湖，形成湖山之胜，从建有雉堞的围墙大门入园，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翠寒亭"，亭周花木扶疏，苍翠欲滴。穿亭向前，是一道伸入湖中的半岛，尽头处建"清研亭"，游人倚栏小憩，"苏堤春晓"的梦幻可联翩而来。再沿铁路一侧湖边道路徐行，前进80米即到"浮碧轩"，这是园的中心。轩呈浅绿色，歇山式重檐翘角，玻璃窗玲珑剔透，三面环水，晴日湖光潋艳，妩媚多姿，夏至莲花摇曳，香远亦清。轩堂前后两重，中间正堂，左右隔以月亮门、百花屏。轩内遍置琴棋书画、古瓶玩物，华而不腻，雅致宜人。轩后一个大花圃，千红万紫，一派芬芳。过此绕湖环游，沿途杨柳垂青，松桦并茂，冬梅秋菊，处处飘香。在中山公园尚未兴建的前30余年间，它是汉口最佳的现代林园，堪称三镇一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园一度成为民军汉口临时指挥部，给清军以很大的杀伤。1935年，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此举办防空展览，射击靶场中设有象征日本国旗和日本矮子被击中的图像，宣传抗战，影响很大，引起日人抗议，这是它最光荣的历史。

然而也曾数度蒙尘，特别在沦陷时期，被日军侵凌了7年，作为吃喝玩乐，招降纳叛之所，受到莫大的污垢，备遭摧残。至此，一代名园实已香消玉殒，空余啼鸟怨东风！

（伍之光）

杨森花园

民国年间，许多军阀、官僚多将搜刮所得，在大中城市广置地产，大修私宅。四川军阀杨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森（1884—1977），字子惠，四川广安人，是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和混战"英雄"，国民党陆军上将。1927年5月，在蒋介石策动下，他勾结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反革命叛乱，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1939年6月，驻守在湖南平江一带的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

杨森不仅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生活上也是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传说他妻妾成班，老少悬殊；儿女成排，连他自己也并不完全认识。据有人查访统计，其公开的妻妾就有12人，子女40人。此外，杨森所至之处，只要碰上看得顺眼的妇女，他总要千方百计，达到玩弄的目的，由此而弃于不顾的私生子女自是无从计数。

即便如此，杨森仍不满足。每至一处，他无不大造楼台馆舍、别墅花园，以为自己提供幽静典雅的娱乐休息场所。在故里广安，杨森筑有"涵虚山庄"；在重庆则建有"渝舍"；在泸州，杨森造了"泸庐"；在汉口则辟有"杨森公馆"和"杨森花园"。

杨森花园座落于汉口惠济二路口，原中共武汉市委印刷厂所在地，系杨森公馆之侧园。花园于1928年开始修建，占地5.6公顷。全园四周绕以垣墙，内有假山荷池、亭台楼阁、芳林名花，靠东北墙筑池垒山，亭廊相连。盛夏时节，循廊缓步，清风拂衣，芳香袭人。杨森公馆是一幢西式连底三层楼房，筑有倾斜的汽车跑道，乘车可以直达楼房门前。室内镶木地板，环形大楼梯，每层楼中间均有大客厅，在当时颇显得豪华气派。

1931年武汉大水，杨林花园受淹被毁。1949年5月武汉解放，杨森公馆由中南局接管，公馆建筑至今完好。

（朱务本）

萧耀南庄园

萧耀南（1876—1926），又名衡山，湖北省新洲县孔埠区萧家大湾人。因家境贫寒，20多岁时便离家、投笔从戎，凭着自己的机敏，从此青云直上。

1921年，萧耀南爬上湖北督军的宝座。次年又兼任湖北省省长。为了光宗耀祖，萧耀南决定在家乡大起楼台，修建庄园。

1922年，萧耀南庄园正式破土动工，迁移居民24户，耗资约70万银元，到1925年才建成。整个庄园占地40余亩，绕以全长800多米、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开有东、西两门，系石柱木栏铁大门。作为正门的东门石柱上镌刻着“两湖巡阅使，炳武上将军”字样，表明了庄园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围墙内是西式大楼、退省居室、正屋、偏室、客房、学堂、育花间、大小平台、织房、仓库、马房、猴房、花园、苗圃等。西式大楼前后共两幢，为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宽敞明亮，中以过楼相接，外形犹如两顶大轿相连。内除正厅外，还设卧室若干，用来接待贵宾。配有名人字画、新式生活用具、花卉盆景，显得雍容典雅。退省居室是萧与吴佩孚发生矛盾，说要回家“反省”时下令增修的，包括一大两小西式楼房三幢，存有

名人字画和书籍文卷，是修身、读书、休息的地方。其实他在1925年5月回来仅在此居室"反省"了两天就离开了。正屋古色古香，是老式建筑，内备老式生活用具和古董，兼缀一些花草字画。偏室和客房共十幢，布置比较简朴。学堂是其侄子萧炳臣子女和亲属读书的地方，房内光线充足，宁静宽敞。其他房屋各有特色。各房各屋之间，按中国园林风格，用花草树木、亭台轩榭、假山池沼来点缀，还用大理石雕塑上八仙，下八仙，并摆设有金鱼缸。这样，满园飞檐翘角，随处金碧辉煌，既古朴典雅，又浑然一体。

但是，庄园自筹建之日起到竣工之后，萧耀南仅仅回去过两次，住过几天。即便是他的原配苏氏及侄子萧炳臣等，亦长留武汉。居住在庄园的只有炳臣的亲属、戚友，加上厨师、奶妈、丫环、马夫、更夫、杂役、园丁和卫兵，最多时不过50人。由此可见，萧耀南庄园只是他为炫耀乡里、抬高身价的手段和其生活骄奢淫逸的象征罢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萧耀南庄园。这里先后成为仓库、学校和人民解放军驻地，曾进行过拆改。现仅存西式大楼，内设新洲县八里乡政府。紧相毗邻的八里中学和卫生所的房子，则是改建的。昔日的庄园，如今成为了八里乡政治与文化的中心。

（朱务本）

花楼街的故事

花楼街位于汉口闹市区附近，紧连江汉路，邻近租界区，是一条人烟稠密、名噪一时的古老街道。

相传明朝末年，张献忠率军进入汉口，见市面荒凉，不见老百姓，就带领起义军随从四处察看究竟。当他们来到江边时，见江滩上有间茅棚，一个青年人正蹲在棚内做饭，张献忠上前询问缘故。原来，当大兵压境时，当官的和有钱人就逃跑了，一些穷家小户听信谣言也躲起来了。这位青年认为，张帅起兵是为了百姓安乐，不会加害穷人，况且他父亲

刚去世，草草埋在江边，不忍离去。张献忠听后说："你是孝子，我现在插一面小旗在此，必无人惊扰。"并说："我见你棚子里有些打铁的工具，猜你是个铁匠，你就重操旧业谋生吧！"不一会，几个义军士兵，给这位青年人送来了粮食和燃料，又原地砌好炉子。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到江边挨着铁匠经营小生意，很快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小街市，人们叫它"孝子里"（其实孝子里的真正来历不是这样的，参见本书《孝子里与李孝子》篇）。后来，孝子里逐渐发展为一条商业繁盛的大街。铁匠去世后，人们在街口修起了一座过街楼，临街一面修了寿字格图案的栏杆和雕花窗户，楼内供上铁匠牌位，大家叫它为花楼。这条街从此也就称为"花楼街"。不久，这条街的北面又平行建起了一条新街，人们把原花楼街叫前花楼街，新花楼街叫后花楼街。

19世纪初叶的清道光年间，英国殖民者就在花楼街的附近开设了怡和、太古洋行和轮船码头，以后又在今江汉路以下设立租界，故久而久之这条街逐渐形成为洋人及官僚买办巧取豪夺、寻欢作乐的场所。当时沿路一带设有不少茶肆酒楼、食杂百货、金号银楼、当铺烟馆、舞厅赌场，真是花天酒地，通宵达旦。《汉口竹枝词》中有这样记载：

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
车马如梭人如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恰当地描绘出当年花楼街繁盛的景象。抗战期间，这条街又变成日本侵略军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渊薮。他们在花楼街一带开设了数十家"土膏店"和"售吸所"，公开贩卖和吸食毒品。当年所谓的"桃花宫售吸所"就设在这里。

抗战胜利后直至武汉解放前，花楼街仍然是投机商人麇集之地，到处都是搞金银兑换的。除街上布满金银摊子外，还有很多金银店和交易商行，因此这里被称为"金银窝子"。

花楼街也曾有过许多光辉的历史记载。如1900年以唐才常、吴禄贞、傅慈祥为首的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总部，就设在花楼街宝顺里4号。为迷惑清政府，当时门口挂着"东方译文社"的招牌。在1921年中

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革命前辈董必武、陈潭秋主办《武汉星期评论》，其社址曾设在后花楼永庆里1号致忠学校里，后来才搬到武昌黄土坡。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施洋烈士，也曾在花楼街皮业巷7号办公。他以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二七"大罢工。

解放后，花楼街大大变了样，已成为武汉市较大较全的食品、杂货、土产、海味、水果、蔬菜供应的市场之一；富有地方风味的"汪玉霞"食品厂以及"武汉海味货栈"都在这里。每天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热闹非常。

（伍文上）

"背娘舅"与保华街

不知道经常出入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新老读者注意了没有，为什么这个图书馆恰恰建筑在中山大道的路当中，把一条好端端的大马路分成两条单行线，形成了一块梭形地带？说起这一梭形地带，真令人痛心。因为这是我国腐败的清王朝屈辱卖国所留下的一桩国耻，也是武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铁证。

汉口之有租界，始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这年正月，英国凭藉1858年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到通商口岸之一的汉口来划定英租界。他们象18世纪的圈地运动一样，在汉口中心圈定"自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合地基458亩多）作为租界，并在租界的各端竖立刻有"大英国地基"字样的大石块。这是汉口第一个外国租界。

贪得无厌的英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继后又提出扩展租界的无理要求，还在扩展租界的条约中赤裸裸地写道："现在城垣之上，大小棚屋甚多，臭恶已极，理应驱逐！租界开办后，不准再有盖屋居住。"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修屋，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武汉人民的仇恨情绪因此越来越激烈，他们常常利用租界边缘这一荒芜地区，于夜深人静时，巧袭租界，突将正在站岗的印度巡捕颈脖套住，背起就跑，跑到水塘边猛力一掷了事。洋泾浜语把这种猝不及防的偷袭叫"背娘舅"。

"背娘舅"接二连三，使租界居留民（即外国侨民）惊魂不定，恐慌不已，急于要把租界边的大片地区扩占到手，作为租界的"防卫"。于是与买办刘歆生秘密交易，先后修筑扬子街与歆生路（即今江汉路从花楼街至解放大道一段）两条马路。同时，又任意强占租界外的另一块荒地（即今中山大道从南京路口至黄石路口），修建楼房和住宅（原为新昌里和金城里，1930年在新昌里旧址上修建金城银行）。这就是现在武汉少年图书馆前后这块梭形地带的由来。

之后，租界当局还从今中山大道的合作路口至江汉路口中国银行拐角处，筑起一道高墙，把租界与华界偏僻地区隔开，这道高墙实际上使中山大道的一段主权丧失了，交通被中断（仅在大智路方面留一个行人出入孔道），俨然成为异国，当时，中国银行大厦落成时，由于面临中山大道的正门被英租界的围墙所堵，只好在江汉路的侧门营业。人们如果留心一下现在江汉路中国银行门前的人行道，就会发现，它比其他地段宽些，这就是因为原来围墙占用的缘故。

1923年，汉口华商总会的部分会员集资购进刘歆生在华界的一大片地皮，在沿英租界的今黄石路、保成路一带，建成"模范区"，并经与英国殖民者的多次交涉，租界"纳税人会议"决定拆除了围墙。中国人把英国原霸占的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旁边的一段路，取名为"保华街"，以表示保卫中华领土的意思。

（伍文士）

"满园春色"一名街

"春色满园关不住"。有人从这句宋诗中摘取"满园春色"四字，写成

金字牌匾，悬挂于戏台上空，这是20年代汉口满春戏园的一种装饰，有点类似佛庙"大雄宝殿"的气势，格外显目，在当年可算别具一格。

满春戏园的前身是满春茶园，开业于本世纪初。所在的一条街因此而取名为满春街。

满春街毗连汉口江汉区闹市中心的六渡桥、三民路，是一条比较短的小街。清末时期，这一带是片湖塘。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拆除旧城堡，开辟了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硚口至江汉路一段)以后，湖塘便成了死水凼，附近四乡的大批农民陆续迁来，填土造屋，居民逐年增多，街市日趋形成。当时有一江浙商人，在此招集江湖艺人，搭台唱戏，名为"江浙公所"。后建为"满春茶园"。从此，开店的，摆摊的，喝茶看戏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当年还在茶园后面开设"天和"小染房，专染农村手工织的土布。这座小染房，就是后来的东华染整厂，现在的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的前身。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首义成功后，清廷疯狂反扑，冯国璋火烧汉口。在保卫首义成果的武汉战争最艰苦时刻，革命党领导人黄兴于10月31日由武昌渡江，设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指挥革命军与清军作战，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记录了光荣的一页。

20年代，满春茶园改为满春戏园，既卖茶，又演戏。先后演出过京、汉、楚等多种剧目，30年代初期，楚剧名演员沈云陔、李百川等荟萃于此，名噪一时。抗日战争时期，戏园于1938年秋毁于战火，园址用于喂养马匹和开一酒精厂。现在仍可以从扩建成的市第二印染厂处辨认出旧址来。

(伍文士)

华清街——多事的街

有一首《汉口竹枝词》赞曰：

华清街前马路边，鱼篮菜担免挑肩。

争回几尺中华地，留下吾民作市廛。

华清街毗连德租界，是一条窄短而繁华的小街。它的修建，有一段难忘的历史。

在德租界开辟以前，汉口城堡未拆，城堡通济门以外原名沙包，又名扬林口，水涨时也是后湖排洪的水道之一，与今华清街的麻阳口（即今华清街连结中山大道的街口）遥遥相对。自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划为德租界后，平土开路，渐渐兴盛起来。德租界的西北面与华清街相毗连，而华清街的麻阳口又为黄陂、孝感两地人民来汉的要道，商业比较繁盛，人口也因之集中，为当时汉口的一个小集镇。为了防止德租界扩展，清湖广总督瑞澂奏请清廷许可，在今华清街一带建筑灰石路，安设巡警，藉作保障。并取街名冠以"华"字，取房地产主陈景堂名字中的"景"字，定名为"华景街"。

但是，德帝国主义者对华清街一带土地仍存侵占野心，经常寻衅闹事。1913年，他们以华清街出现焚烧抢劫、威胁租界安全为借口，由德领事出马，向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湖北督军王占元提出照会，要求将华清街一带警察权划归德工部局管辖，并收取门牌捐，否则将在边界建筑墙垣。当时北洋政府驻汉交涉员不顾国家主权，竟答应将华清街一带的警察权拱手交给德国巡捕。此一卖国交易传出后，立即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殖民者这一扩占中国地界的美梦，终未实现。

华清街自修建以来，在中国人民自己的管理下，日渐繁华。民国初年，和记洋行买办、汉阳人韩永清占得地产主陈景堂所有的华景街全部产业，随后又买下街内的一个里份（即今华清里）。他在这条长不足300公尺的街上，修建了90余栋式样一致的铺面和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的菜场。1924年，汉口第一家菜市场在这里开业。菜场楼上并开设"集贤茶楼"，后改为"宁汉茶楼"（1935年7月又改为演楚剧的"宁汉戏园"）。当时，韩永清为显示这条街是他的家产，把自己名字中的"清"字，易原街名中的陈景堂的"景"字。这也就是华景街从此改名为华清街的由来。

日寇侵入武汉后，这里开始衰落下来。解放以后，华清街得到改造。现在，除有一座综合性的副食品市场外，还开辟了一处农贸市场，从早到晚，人头攒涌，繁荣远胜当年。

（伍文士）

汉口里弄的崛起

武汉旧式小巷，或者因讲求风水，或者因迁就地势，大多弯弯曲曲，高低不平，而且十分狭窄，以致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

到了近代，汉口开埠以后，在租界建筑的影响下，城区多仿西式，不仅正街上洋式或半洋式的建筑增多，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民居建筑的新形式——里弄。里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许多里弄一色二层楼房，中间留出笔直宽敞的通道，其整齐划一的景观与旧式小巷形成鲜明对照。多数里弄每栋住房的造型和布局几乎一致：石库门，进门为天井、大厅，大厅两侧是厢房。厅后是楼梯及后天井，再为厨房、厕所和后门。楼上与楼下结构大致相同，木楼梯，木楼板，房里空间较高。据建筑专家分析，这种形式的住宅，颇合当时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和经济条件，所以在清末民初建造者甚多。在成片建造时，有总体规划，或呈"工"字形，或呈"丰"字形，左右对称，排列整齐。里弄出口多，便于疏散人流和消防。缺点是弄堂里一般不植树。

汉口最早的里弄已不可考。著名的里弄有：

楚善里：位于现胜利街中段。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建，原名宝善里，后以《大学》"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之义改现名。主巷全长100米，纵横6条巷道，4个进出口，里内房屋一律两层青砖结构天井式建筑。

生成里：位于中山大道水塔对面。1901年建。原为大买办、地皮商刘歆生所有，1923年为抵偿欠款，作价交与官钱局。全里房屋均为二层

砖木结构，南里、北里共计160栋，占地1833方丈。

三元里：位于中山大道东端芦沟桥路附近。有南、北两条主巷道。清末建南里，民初建北里。因营建者沈氏派名"元"排行老三，故名"三元里"。长400米，宽4米，共有12条巷里。

此外还有清末民国年间建造的许多里弄，有的将专篇介绍其来历，如坤厚里、一三里等。

（严昌洪）

接驾嘴接谁的驾？

汉口集稼嘴（位于民族路南端小河边），不仅武汉土生土长者无人不知，而且来往于汉口与江、汉各口岸的商旅也无人不晓，因为这里是汉水入江处的一个重要码头和货物集散地。在集稼嘴码头的对岸，有一块突出的陆地，使汉水在入江前形成一个约90度的转折。这地方被称为南岸嘴，从前也是商旅云集，帆樯林立的粮食集散地。

集稼嘴原称"接驾嘴"，南岸嘴原称"南岸接驾嘴"。这"接驾嘴"到底是接谁的驾呢？其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湖北安陆在明代时曾为兴献王的封地。兴献王朱祐杭系明宪宗庶四子，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受封，1494年（弘治七年）始就藩安陆州。由京赴藩邸途中，舟次龙江，有慈鸟数万绕舟而飞，至黄州复然，人们以为祥瑞兆。后来，兴献王疏陈五事，颇得其兄明孝宗嘉许，受到比其他诸藩王更优厚的赏赐，并奠定了其子朱厚熜人继大统的基础。兴献王薨于1519年（正德十四年），其时朱厚熜年仅13岁，以世子身份综理国事，1521年4月，尚未除服的朱厚熜被特命袭封王位。几天后，其堂兄明武宗病逝。这位短命的皇帝没有子嗣，经慈寿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商议，决定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为帝，并派遣大学士梁储与定国公、驸马都尉、礼部尚书及太监等一行人以大行皇帝遗诏迎朱厚熜于安陆。5月，朱厚熜由安陆经水路入京，先沿汉水来到汉口，在入江处受到两岸官员和百姓的迎送，然后进入长江，顺流直

下，转入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即位，朱厚熜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后人为纪念此事，便把汉水入江口迎接朱厚熜的地方称为“接驾嘴”，汉口沿河流通巷至鲍家巷一段也被称为“接驾嘴河街”。

“接驾嘴”成为“集稼嘴”，中间有一个演变过程。随着时间流逝，接驾嘴地名原有的含义渐渐被人淡忘，而地名在民间相传，字音往往发生变 异，以讹传讹的结果，接驾嘴就成了“薛家嘴”，其实与姓薛的人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报驾巷讹呼为鲍家巷，送驾墩讹为宋家墩。这里地处江汉汇流处，又是旧汉口的主要街道汉正街的东端出入口，邻近农村的土特农副产品在此汇集转口，接驾嘴成为明清之际的重要码头和渡口，地名也渐渐变成“集稼嘴”了。集稼嘴是旧汉口“廿里长街八码头”之一，其他七码头是：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柯家码头、龙王庙与四官殿。现在，随着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繁荣，这一带水陆运输更为忙碌。

另外，在汉口黄陂街上段，今有又回龙巷，按旧《汉阳县志》记载，此处原有塞口寺，1404 年（明永乐二年）建，后因嘉靖皇帝临幸此地，遂赐名又回龙寺。

（严昌洪）

故国神游
——三国遗迹巡礼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武汉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为曹、刘、孙争夺的焦点，先有刘备、孙权联合抗 曹的赤壁之战，后有孙、刘两家对荆州的争夺。因此，武汉有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和传说。

武昌东湖周围，磨山主峰上有郊天台，相传刘备曾在此祭天，台已倾圮，遗址今尚存。在白马洲对岸的雁嘴，旧有吴主庙，纪念孙权。武汉大学左侧原有彤云阁，传说赤壁之战时，曹操路经此处，曾在阁中寄宿，故又称曹操庙，后武大建校，移建周家岭，阁内旧有“鼎足三分”匾，今已

不全。看来东湖也曾被曹、刘、孙"鼎足三分"。

关于诸葛亮，在汉阳县黄陵矶东椿山下，有残存城垣，相传诸葛亮曾屯兵城中，故称诸葛城。武昌黄鹤矶胜象宝塔又称孔明灯，是因为有诸葛亮曾在山头点灯为关羽水军照路的传说。

关羽驻军汉阳时，常在长江边洗刷他心爱的战马——赤兔马，今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北至禹功矶处，被称为洗马口，旁边原立一根石柱，称系马桩，明代汉阳教谕赵弼有诗赞洗马口曰：

战罢沙场洗铁骢，虎臣威已震江东。

至今水映晴霞赤，似染龙媒汗血红。

一说在禹功矶还有一洗马洞，与洗马口是"同时并著之迹"。本一石厦，明万历年间，知县陈尧卿凿为观音崖，旁建水月庵，旧有一碑，勒"振衣岗"三字。龟山左侧又有岩穴，称藏马洞，相传关羽尝牵马休息于此，也称关羽洞。武昌伏虎山麓卓刀泉有庙，供关羽像，传 关羽行军于此，以刀卓地得泉，遍饮三军，故称卓刀泉。庙左桃园阁曾供刘、关、张三结义像，泉东北湖滨旧有关公桥，是卓刀泉通磨山要道。

鲁肃为东吴名臣，传其赤壁之战后骑马过东湖小洲，马陷泥中而死。今此洲仍称白马洲，洲上有鲁肃马冢。鲁肃自身的坟冢则在岳阳，汉阳人为纪念他，在凤凰山西北坡筑有鲁肃衣冠冢，1955 年已迁龟山。另龟山西麓南傍县城曾建有鲁肃祠，今已无存。

武昌县有将军山与乌龙泉，山上摩崖除了"将军山"三个大字外，还有"文武全才世所无，将军辅国倒三吴"的诗句，纪念蜀汉大将严颜，因为他曾在此驻扎，抵御吴兵，并骑着乌龙驹找到一潭清泉，解决了农民和山上士兵的饮水难问题。

汉阳县军山镇附近有两座山，一大一小，称为大、小军山，吴魏相战，曾陈兵两山间，当系一古战场，明嘉靖《汉阳府志》云："故老相传：元时，风雨阴晦之夕，闻金鼓喊战之声，盖当时将卒阴灵之气也。"赵弼题诗曰：

二雄角立互相吞，炎祚衰微万马奔。

夜半山前风雨恶，阴魂犹自怨曹、孙。

大小军山附近的纱帽山原名百人山，相传黄盖曾率兵百人在此诈降曹操，而黄盖屯军之地在今武昌白沙洲一带的船官浦，故此处又称黄军浦。

在禹功矶与龟山头之间有一关隘，是汉阳城东北唯一通道。吴魏相争时，吴军设关于此。明推官杨枢题联云：

汉门日抱毫毫扉，
大别天开虎豹关。

因其左倚大别山，右控禹功矶，雄峻险固，易守难攻，故名铁门。明隆庆年间毁于火，旋修，上有关帝祠，题"天地正气"四字，后倾圮，由关羽52代孙关朝汉重建，1852年（咸丰二年）毁于战火，1864年（同治三年）重修。今复建之铁门关，气势雄伟，更胜从前。

在龟山头北侧，原有锁穴，即固定锁链的洞穴。《晋书·王濬传》云："晋伐吴，吴人于磧险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今山矶四石穴尚存。"

汉阳赤壁，旧传即赤壁大战之处，不可信，故不录。而江夏赤壁作为赤壁之战的战场倒有几分根据。江夏赤壁即今武昌县金口的赤矶山。《水经注》云："江水左径百人山（今纱帽山）南，右径赤壁山（今赤矶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也。"然而《清一统志》谓："赤矶亦名赤圻，一名赤壁，非周瑜破曹操处也。"总之，说是也有，说否也有，即便是蒲圻赤壁，是否为赤壁之战战场，至今也仍争论不休，因此，劝君莫道"江夏赤壁事已陈，黄州（或蒲圻）赤壁天下闻"。赤壁之战古战场究在何处，还得靠科学的态度，搜集充分的证据，进行潜心的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昌洪）

黄巢的"系马桩"

唐朝末年，发生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王、黄的队伍先

后到过武汉，在东西湖柏泉一带，流传着关于黄巢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位农民起义军首领的缅怀。

黄巢是冤句（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本是私盐贩子，曾读过书，但屡试不第，不堪官府压迫，于875年（唐乾符二年）夏聚众响应王仙芝起义。后转战山东、河南。877年3月，王仙芝部攻克鄂州（今武昌），进入武汉地区，次年3月在黄梅为唐军所败，战死。黄巢在安徽收王仙芝余部，成为全军统帅，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此后攻杭州、克福州，破广州，然后折向广西、湖南，于880年初，攻鄂州，拔其外郭。相传就在这段时间里，黄巢率师行军路经柏泉山，下令就地歇息。他翻身下马，四处找不到能够系马的木桩，因为柏泉山上，向来不长树木，传说是秦始皇鞭石咒此山为"死山"所致。黄巢与马夫四下探寻，忽见几块巨石平整光滑，既可以歇脚，又可以系马，便将缰绳系在最大的一块石头上，他自己也在一旁歇息。起义军走后，当地村民把这几块石头称为"系马桩"，世代相传，直至今日。

柏泉人民对黄巢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黄巢起义是在山东，他们却传说黄巢是在柏泉起义的。他们看了汉剧有关黄巢起义的神话故事，就将当地景德寺附会为戏中的长眉寺。有人认为，可能当时有农民在此起义附和黄巢，因姓名失传，便一齐归于黄巢身上。此说似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足以说明柏泉农民如此缅怀黄巢这种民俗现象的深刻原因。

（田雨）

凤凰山下"天完国"

汉阳凤凰山下曾有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政权"天完国"的都城，而武昌又曾作为红巾军另一政权"汉国"的都城载入史册。

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是湖北罗田人，起义前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春与黄州之间。元至正初年，有湖南浏阳彭莹玉在鄂东一带秘密传播弥勒教，集众念佛，谋举义旗。徐寿辉加入该教，发动并组织群众，准备起

兵反元。1351 年(至正十一年)9 月,他们与麻城邹普胜等起义,10 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黄州等处。他们在蕲水建立天完国,徐寿辉 被拥立为帝,以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大将军,建元"治平"。次年初,徐寿辉遣部将丁普郎、徐明远等攻克汉阳和江夏(今武昌,当时为武昌府治所在地)等地。不久汉阳、武昌又被元军夺回,1355 年徐寿辉部再克汉阳、武昌。翌年春,倪文俊在汉阳凤凰山下建造宫殿,迎徐寿辉据之。天完国遂迁都汉阳,汉阳作为天完国都仅 3 年多的时间,正值战乱时期,不可能大兴土木,所谓宫殿只能因陋就简。后迭经兵燹,早已湮没不存,今天连故址也不知在何方。

倪文俊位居丞相,握天完国实权,居功自傲,欲杀寿辉自立,未遂而逃,奔赴黄州与部将陈友谅合兵。陈友谅佯装出迎,布伏兵于城门,伺倪文俊入城时击杀之,陈友谅自称平章。1359 年,陈友谅杀另一将领赵普胜(双刀赵),迎徐寿辉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天完国都乃从汉阳迁到江州。此时 徐寿辉已成傀儡,徒拥虚器。陈友谅自称汉王,事权全归于己。1360 年,陈友谅诱徐寿辉率舟师东行,杀徐于采石江中,遂在当地五通庙自称汉帝,改年号为大义。

1361 年,朱元璋率徐达、常遇春等西上,攻入江州,陈友谅退往武昌,于是武昌便成了陈友谅政权汉国的都城。1363 年 8 月,陈友谅与朱元璋部在鄱阳湖决战,大 败。9 月,陈友谅从湖口突围出长江,中流矢,箭贯其颅及睛而死,诸军溃散。部将张定边奉陈友谅次子陈理返回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10 月,朱元璋进兵武昌,久围不克,在准备屠城之时,有"诡谲秀才"吴彻求见,吴赋诗劝说朱元璋放弃攻城,撤围返建康(今南京)。次年春朱元璋复至武昌督战,再次攻城,被围困 6 个月之久的武昌城终被攻破,陈理率张定边等出降,汉国遂灭。

(山风)

三公庙异事

在武昌城东,原有一座三公庙,唐代所建,祀助吴灭楚,为父兄报仇

的伍子胥；助越灭吴，后来经商致富不忘贫贱之交的范蠡和东汉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伏波将军马援。三尊塑像鼎足而立，本地人敬奉颇为虔诚。

这座庙在南宋时发生过一件怪事，《夷坚志》上作了记载。绍兴初年，岳飞所部抗金宋军一度驻扎鄂州城（今武昌）。从义郎左良时任金口巡检，驻地离鄂州郡城30里。一天傍晚，左良饭后闭目养神，正在休息，忽见一黄衫走卒站在门口，大声说：“三公唤你去。”左良回答说：“吾执掌巡检，三公是尊神，怎么会唤我去？”拒绝前往。过了一会，又来了一卒，也像前面那位一样说：“三公唤你去。”左良不得已，只好随他们出来，一同来到一座大官府门前。他走进门去，进入厅堂，远远望见不少人，皆著道袍裹帽而坐。他们让左良坐于末座，并不与他交谈。左良坐不住，起身说道：“我承乏残局，执掌巡检，听到呼唤奉命前来，请问有何事需我效力？”座上一人答道：“没有别的事情，我们这里丢失了一幅黄罗幔，烦请你帮助查找一下。”左良犹豫不定，一时不知怎么回答。那人又说：“其人在岳家军中。”左良叩拜退出，恍若从梦中醒来。

第二天，左良前往岳家军中拜谒岳飞，把昨天晚上神仙所说的话告诉他。岳家军素来法纪严明，岳飞命军吏查办此事。军吏不敢怠慢，在军中严密搜查，果然很快就人赃俱获，看那黄罗幔时，已毁坏一半。岳飞颇觉惊异，下令将盗贼诛杀，同时另置一幅新幔送往庙中。

（严肃）

未雨绸缪
——晋将陶侃的故事

在5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笔者曾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晋朝大将陶侃在督造战船时，叫人把木屑、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保管好，下属们都不知留作何用。后来有一天要开会，刚好积雪始晴，议事厅前余雪犹在，又湿又滑，不便行走。一向爱护下属的陶侃命人以木屑铺

地，使来参加会议的人不致于湿鞋、摔跤，众人十分感动。待到桓温伐蜀之时，又用陶侃所贮竹头作为船钉，加快了造船的速度。陶侃节用储蓄，以备急需，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大家风度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陶侃，原籍鄱阳，后徙家浔阳（今九江）。曾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时值陈敏之乱，陈敏之弟陈恢进犯武昌，陶侃出兵抵御。随郡内史应詹向荆州刺史刘弘（陶侃的上司）反映说："陶侃与陈敏有乡里之旧，现在他居大郡，统强兵，如果有异志，则荆州无东大门矣。"刘弘不相信此话，回答说："陶侃之忠义才能，我早已了解，岂会这样。"陶侃知道了，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儿陶臻到刘弘那里去，准备作为人质以表明心迹。刘弘任命陶洪、陶臻为参军，并赏给路费让他们回到武昌来，甚至还升陶侃为督护，使他与诸军并力抵抗陈恢。陶侃要以运输船为战舰迎敌，有人说恐怕不行，陶侃回答道："用官物讨官贼，为何不可，但在事情的位置上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于是进击陈恢，所向必破。陶侃的部队军纪严明，戎政齐肃，凡有缴获的物品，都分给士卒，自己并不以权谋私，所以深受士兵爱戴。后来陶侃任扬武将军，屯夏口。不久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后又为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移入两江。多次打败叛军。

《晋书·陶侃传》称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他办事很讲究效率，终日敛膝危坐，阃外诸事，千头万绪，毫无遗漏。远近书信莫不亲手作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寸阴，至于众人，应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这是自暴自弃的一种表现。"下属参佐中有些人以嬉戏耽误公事，陶侃便命人取来他们的酒器和赌具，全部扔到江里去，犯事的官员则加以鞭扑，以为惩戒。有人向他送礼，他都要问清楚礼物的来历。若是送礼之人自己制作的，虽轻微之礼也必定喜欢，加倍赏赐，表示感谢。若是非理得来的不义之财，则严辞批评，将礼物退回。陶侃有一次出游，看见有人拿着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便问道："拿这些稻穗有什么用？"那人回答说："在路上看见，随便摘来玩玩。"陶

佩大怒，斥责说："你既不种田，反而偷人家的稻谷玩。"下令将那人抓起来鞭打一顿。此后，百姓勤于农业，得以家给人足。

（曰雨）

焦度与焦度楼

焦度，是南朝时人，祖先为四川的少数民族氐人。父辈移家居天水郡略阳县（治所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少年时即有英雄气概，善于骑射。只是由于氐族遗传，容貌壮丑，肤黑如漆。宋孝武帝（453—464年在位）初年，颜师伯赴任青州刺史，命焦度护送。在途中与北魏将领豹皮公遭遇，焦度横枪跃马，冲了上去，与豹皮公大战若干回合，抓住对手一个破绽，大喝一声，一枪将豹皮公刺下马来，缴获了他的马具和武器、头盔等，并趁势手杀敌兵数十人。颜师伯启奏朝廷，赞扬焦度气力、弓马均超过常人，孝武帝便召回京城随侍左右。皇帝见了焦度，被其相貌吓了一跳，对颜师伯说："此真健人也。"

焦度为人质直木讷，口不善言，常为同僚欺负。宋明帝（465—471年在位）时，以其勇武，授为晋熙王刘燮的防阁将军，随镇夏口（今武昌）。同僚中有位夹毂主周彦，知道焦度的父讳为"明"，便经常叫唤左右一个同名的人来役使。焦度听得多了，十分气愤，呵责周彦说："你知道我讳'明'，而总是喊明做事，这不是存心的吗？"

后来武陵王刘赞为郢州（治所夏口城，即今武昌）刺史，焦度仍留镇夏口，任前军将军。477年（升明元年）宋大将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对萧道成专权，焦度转任中直兵。一次，沈攸之军麇集夏口，准备东下进攻都城，只留少数人马围守郢城。焦度为牵制沈攸之兵力，站在城楼上大骂，甚至脱了裤子羞辱沈攸之。被激怒了的沈攸之改变行军计划，转而进攻郢城。焦度亲自率兵力战。沈军举着盾牌攀登城堞，弓箭已不起作用，焦度令士卒投掷便壶、马桶，用秽物将攻城的敌军压了下去。由于这次特殊的战斗，此楼后来被称为"焦度楼"。沈攸之事件平定后，焦度因

功封为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回到京城，他向贵戚们追叙防守郢城之事时，常常脱了裤子现身说法，惹得人们大笑，其憨厚如此。

到南齐时代，焦度想向齐高帝萧道成求得一官半职。但见到皇帝时，又说不出一句话来。皇帝以其不懂政事，竟不任用他。后来亲人教他见了皇帝应说的话，大约百余言，他背诵了好几天，已琅琅上口。当再次见到高帝时，准备当面陈请。但周围人多，心里一急，背的词全忘了，只大声说道："度启公，度启公，度无食。"皇帝笑道："卿何忧无食。"立即赐米百斛。

（山风）

"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宋状元冯京轶事

冯京(1021—1049)，字当世，宋江夏郡咸宁人。自乡试、礼部试以至廷试皆得第一，即俗所谓"三元及第"。其"三元坊"建在府学，久废。曾任翰林学士、知州、知府，官至保宁军节度使、太子少师。在其未显达时，有不少佚闻趣事。

传说冯京父经商，壮年无子。其妻授以白金数笏，嘱其买妾。冯父在京师买得一妾，当了解到该妾之父本系朝廷命官，因纲运欠折，鬻女以为赔偿之计时，十分同情，不忍侵犯，遣还其父，并不索钱。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其妻，妻说："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不久妻果然有孕。临产前，邻居们皆梦见鼓吹喧阗迎状元，冯京乃生，后果中状元。

冯京未显时，居武昌，纵酒不羁。一夕醉卧郊外溪边。有一渔夫打鱼归来，困眠舟中。朦胧中似听见有人呵叱道："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夫惊起，借着月光在岸边寻找，看见一人和衣熟睡草丛中，一问，果然姓冯。渔夫立即作揖拜见，说："他日贵显，幸勿忘。"把梦中情形告诉了冯京，并请冯到船上安歇以避风露。天明后，渔夫用船将冯京送到武昌城中。后来冯京显贵，派人寻访那艘渔船，不复得见。

冯京早年贪玩，有时深夜不归。一次被巡夜的街卒拘留，当时的武昌郡守王素极力为其开脱，将其释回。后来冯京奉使关中，王素正在渭地帅兵，两人见面，酒燕甚欢。冯京作诗赠王素，中有句云："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恩。"意思说，即使改变了面貌声音（暗指地位身份的改变），我也忘不了当年被街卒拘留之事；即使后来居上（暗指自己此时的地位超过了王素），我也为难以报答你的大恩而惭愧。后人评论这件事说，一些人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拘小节，容或有之。待到贵显之后，按常人言之，提起从前的过错尚不愿听，那会主动向故人谈及，并写进诗文中去呢？冯京如此不以为讳，"可谓贤矣"。

冯京庆历年间在武昌应乡试，阅卷官腐谬寡鉴，开始要将冯京黜落，后又要放在最末一名。幸亏监试的礼部官员拆封定卷时大为不平，极力推荐冯京为第一名，后果然在廷试时一举夺魁。进京时过江，江上风涛汹涌，几乎沉没。第二年春天中状元后，再过大江，风微浪稳，舟楫安然，冯京乃题诗江亭云："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意思是说，江神也那么势利眼，见我高中了，态度也变谦恭了。这两句诗是借取唐人施肩吾及第后过扬子江诗句，施肩吾的诗抄录如下：

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
鱼龙斗闪烁，黑浪高于天。
今日步春早，复来经此道。
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这首诗哪里是嘲讽江神，实是势利小人的写照。

（严昌洪）

江夏的榜眼和探花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殿试取中第一甲者三名，一名为状元，二名为榜眼，三名为探花。江夏（今武昌）士子中进士者固不乏人，状元虽无，榜眼和探花倒出过几位。他们是：

贺逢圣，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榜眼；

陈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探花；

欧阳保极，清咸丰十年(1860年)榜眼；

何金寿，清同治元年(1862年)榜眼。

贺逢圣，字克繇。与明末名将熊廷弼同居一地，二人年少时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同为诸生时，均受到督学熊尚文赏识，熊尚文称赞他们说："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干将、莫邪为古代利剑之名，此处比喻将才。瑚、琏，夏、商时代祭祀时盛粮食的贵重器皿，比喻堪当大任的人才。天启年间，贺逢圣任太子洗马时，熊廷弼以兵部尚书第二次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抗击后金，但广宁巡抚王化贞大言轻敌，不受调度，遭到惨败，熊廷弼被连累下狱。旅京同乡官员准备联名上疏为熊鸣冤，考虑到贺、熊关系不洽，以为会受到贺的阻挠。贺逢圣却说："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以小嫌耿耿于怀，而不为其直言呢？"言毕即草拟奏疏上呈。上疏虽未救得熊廷弼，熊终被冤杀，但贺逢圣为国家大事不计私人恩怨的品质却是难能可贵的。湖广地方有人建魏忠贤生祠，魏听说上梁文(建房时颂祝的骈文)出自贺手，非常高兴，当日便去见贺，想笼络入彀，贺逢圣却对他说："您误会了，我无非是借衙陋习耳。"魏忠贤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便革了贺逢圣的职。后来崇祯帝即位，乃得复官，并两次入阁。1642年(崇祯十五年)辞归。人们以阁老视之，但他不忘当年贫贱时情形，安份守己，不搞特殊化。他在致乡亲戚友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处事的原则："公门无一字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驿不往索一骑一舟，山场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一船。"1643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围攻武昌，贺逢圣率全家投墩子湖(今紫阳湖)而死。传说其尸沉在水中6个月始浮出而貌如生时。在武昌水陆街曾建有天恩存问坊，纪念贺逢圣，久废。

陈銮，祖藉蕲州(今蕲春)，寄籍江夏。字玉生，一字芝堂。道光初年任松江知府。当时南运河淤塞，江南漕粮难以北运。在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的主持下，陈銮创办海运漕粮。他制定海运章程，招募大船

自吴淞口驶至天津，用船900余只，两次运米160余万石。每石运费仅用银4—5钱。海运漕粮获得成功，并勾通了京、津、沪三大埠的海上交通。后任苏松太道，募集民工疏浚吴淞江口，并在黄浦江上设置救生船。在江苏藩司和江西巡抚任上，重视水利建设。陈銮持身俭朴而笃义好施，在祖籍蕲州建陈氏家庙，置田400余亩，作为祀祖睦族之资。在江夏仿范仲淹做法置义田义庄，以救贫穷。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曾捐俸银数千两助赈。后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冒暑巡阅河道，劳累过度，卒于任所。

何金寿，字铁生。曾任编修。1870年（清同治九年）督河南学政。光绪初年山西大灾，疏请简派大臣巡查赈务，并于天津设粜运总局，得旨允行。1879年（光绪五年）授扬州知府。当时正值灾荒，农业歉收。他在运库借款赈恤，创办典质之法，准灾民将耕牛质钱渡荒，共收耕牛400余头，次年听其备价赎牛，不取利息，使农民得以及时播种。有一次城内当铺失火，市民大哗，有趁乱劫财者。何金寿下令滋事者照本赔偿，众人立散。1882年夏又发生旱灾，他打着赤脚到处祷雨，中暑卒于任所。遗嘱勿受商人赙赠一钱，因此贫丧不能归，遂葬扬州。

欧阳保极因缺乏资料，事迹不详。

（严昌洪）

汉阳的榜眼：萧良有与熊伯龙

汉阳在明清时代出过两名榜眼，他们是明万历八年（1580年）榜眼萧良有和清顺治六年（1649年）榜眼熊伯龙。

萧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性早慧，有"神童"之称。七八岁时，有一次到官船上谒见一位贵官。贵官想通过对联语来试探这位神童的才能，便出句云："宫舫夜光明两轮玉烛"，萧良有对曰："皇都春富贵万里金城"。此时贵官刚好要派人去办事，就对被派之人说："尔去即来，廿四弗来廿五来，廿五弗来廿六来。"萧良有认为又是出的上联，立即对出下联："静

极而动，一爻不动二爻动，二爻不动三爻动。"受到贵官的赞赏。

萧良有11岁为郡诸生，12岁应省试中副卷，15岁发科，始参加科举考试。后参加会试，一举夺魁。时张居正当国，太监冯保欲以状元送张居正之子作为巴结张的手段，遂在殿试读卷时置萧良有一甲二名，张居正子懋修竟成为状元。萧良有榜眼及第的牌坊民国初年尚在汉阳县学西。后授编修，迁至侍讲学士。张居正爱萧良有的才华，想招致门下，被萧婉言谢绝。推行改革的张居正死后受到权贵攻击，官秩被削夺，家产被抄没，诸子也被削官谪戍边地。萧良有没有因前嫌而落井下石，他为张居正抱不平说："江陵（按指张居正）非奸相也，稍持权而骄耳。今既反其秕政，收其废贤足矣，奈何复令圣主有辱大臣老母僇子名哉。"首辅王锡爵主并封三王之议，他上疏反对，结果被转为国子监祭酒。他教学生高标准要求，杜绝干谒，严格考课，使莘莘学子谨小慎微，严于律己。在史局15年，负公辅之望，自阁部卿寺以至台省，凡关于国家大计无不向他咨询。常上书议论时政，遭到时忌，给事中叶继美弹劾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侵六部之权。萧良有愤而辞职归家，居8年乃卒。

熊伯龙（1617—1669），字次侯，号塞斋，其祖籍进贤，晚号钟陵，示不忘祖。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所谓西山盖即尉武山，在今汉阳县大集镇西南。山上有普陀寺，熊伯龙曾在此苦学，据说座右墙壁为其唾处，后来每届阴雨天便有外晕如血痕隐起。此庙咸丰初年毁于兵燹，不久修复。榜眼及第后，熊伯龙由国史馆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为人赋性耿介，砥砺名节，虽在朝中做官，仍如学子一样，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多次出京主持乡试，常能发现饱学之士而加以举荐。他博学多才，工诗文，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其制举文，雄浑雅健，与清代开科状元、黄州（今黄冈）人刘子壮齐名，时称"熊刘"。

熊伯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以无神论著称。他编著的《无何集》推崇前代无神论者，选录了历代学者辟虚妄、辟佛教的言论，对王充《论衡》尤为赞赏。在"总评"和"附说"中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主要观点是

不信天命和鬼神。

熊伯龙死后，先葬于汉阳县龙冕山，乾隆年间迁至其故里大集乡新收堡，皇帝还赐给随葬品和祭品。墓冢曾被夷平，残存墓碑，现已重新修复。汉阳县城南纪门内，有熊伯龙故宅。其孙祖荫于雍正年间捐出建为试院。人们为缅怀这位诗古文名家及制艺大家，为其另立学士祠于院东，额题"流芳堂"。从前学使前来监考，都必到学士祠致祭。

（严昌洪）

唐代武昌大员趣闻

唐代在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有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等名目。在今武汉地区，州、县官员外，又有鄂岳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大员统领军事。其中有几位大员"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深得军民爱戴。这可从下面几则趣闻中窥见一二。

806年（元和元年），升鄂岳观察使韩皋为武昌军节度使。韩皋曾生小疮，让医生给他贴膏药，药膏久久不融，不能贴患处，韩皋问什么原因，医生回答说："天寒膏硬。"韩皋笑着解嘲道："韩皋实是硬。"竟不怪罪医生的疏忽（没有避其名讳），被人誉为"得大贤体"。在此之前，韩皋曾在钱塘任职时，与镇海节度使李锜不睦。后韩皋调任鄂州，李锜有次梦见万岁楼上挂冰，于是自己释梦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对韩皋更加怀恨。不久李锜起兵反朝廷，旋为部将所执，送至长安处死。朝廷果然调韩皋去任镇海节度使、浙江观察使。

代韩皋为鄂岳观察使的是尚书郗士美。一天清晨，郗很早就起床，准备去办公事。衣服穿好后，从旁边取过靴来正要穿时，忽然有一只大老鼠窜进房里，向北拱立而舞。郗士美大怒，大声呵斥，老鼠并不害怕，于是拾起靴子投过去，老鼠这才逃走。只见一条毒蛇从靴中掉下来，珠目锦身，不断吐出细长的舌头，十分可怕。如果没有那只老鼠，郗士美必致指肿足溃之患。时人以为这是郗士美"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

美”所得到的善报。

郡士美后调任河南尹，以前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州刺史、鄂黄岳沔蕲安等州观察使。吕元膺常常在夜晚登城观察。有一次守城之兵不许他上城。他的随从告诉说：“这是中丞大人。”那个士兵却说：“夜晚不能辨认，怎知是中丞大人？”仍不许登城。吕元膺只得返回。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破格晋升守城士兵为大将。后来此人竟得以入拜尚书左丞。

（士心）

二程夫子与黄陂

程朱理学的奠基者，宋代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二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谓大名鼎鼎，而他们与武汉黄陂县的关系许多人却并不清楚。

程颢、程颐兄弟人称二程夫子或二程先生。河南洛阳籍人，其祖父程遘任黄陂县令，卒于该县。父程珦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于黄陂，后来还做了县尉。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因此该县与二程夫子关系密切，不仅有许多关于二程的纪念建筑，而且还有不少二程青少年时代的传说。

黄陂县城西偏有草庙巷，是二程故居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乡坊以为纪念。该巷暑天无蚊，乡人传以为异。传说程珦夫人侯氏曾梦双凤投怀，于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贤堂生颢，次年生颐。后来二程长大返洛阳，并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们为景仰缅怀先贤，便在县城里修了一座清远亭。南宋时改称双凤亭，取侯太夫人梦双凤生二程之意。一说二程聪颖过人，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人称双凤，亭因此而得名。1463年（明天顺七年）佥事沈靖复建于鲁台山麓二程祠内，1666年（清康熙五年）县令扬廷瀛移建于山上。嘉庆年间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刘云衢捐资再修，后又遭狂风吹倒。1848年县令萧恩荫召集邑人金光杰、周超猷、周恒渠会议重建，增修石磴，环植林木，顿复旧观。现存

建筑即为当时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镌刻有《重修双凤亭记》等碑文四篇，碑额上刻有双凤朝阳图等。"双凤亭"金字匾额，为1962年重修时郭沫若所题。

二程读书时，为儒家学说折服，十分响往孔子，乃筑台山顶遥望东方鲁地，该山故名鲁台山。鲁台山在县城东边过河数十步的地方。望鲁台周围昔有苍松数十株。明景泰间同知蔡缓建二程祠于鲁台山下，岁时俎豆，祭祀二程。成化年间知县李恒改旧祠为享堂，复建新祠于前，屡圮屡建。

鲁台山东边有湖名流矢湖，相传二程练习射箭，曾流矢于此。

鲁台山下有聪明池，在二程祠内，相传蛙不鸣，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后掘土得一石龟，中有八卦，被人窃去，这四种奇怪现象不复存在。二程当年在此攻读，凿潭喻道，故池中筑亭，称涵虚亭。有碑文云："半亩方塘一个亭，森森万象入虚明，百年心印今犹古，怪得蛟蛙不敢鸣。"

池前数步为前川，即"傍花随柳"处，昔日花红柳翠，程颢曾有《春日偶成》诗记其在此春游之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二程祠前半里地有理趣林，二程当年读书时植柏为林，情与景会，理与心契，虽在陋巷，而乐得其趣。

此外，白云洞、西郊桥（又称程夫子桥）、濯水台都是二程游经之处。

（严昌洪）

黄陂文武三榜眼

黄陂县是人文荟萃之地，科举时代举人、进士之多，竟列全省前茅。如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黄陂中举人数共106人，占全省70个州县同期中举总人数的6.44%，居第三位；中进士者27人，占全省考中人数的9%，仅次于江夏县（32人），居第二位。当时涌现出文武

.三榜眼，至今仍被人引为美谈。

刘彬士（字筠圃）是嘉庆六年（1801）的榜眼。《黄陂县志》称其“自幼聪颖谨厚，动止遵礼法，父老多器重之。洎居官不以结纳植私党，不以参劾沽直名，无苞苴之私，无声色之好。”在任监察御史期间，详察案情，认真负责，纠正错案，制止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当时安徽有两个犯人缪二、李松，以故意杀人罪拟处绞刑，后刑部认为判决过重，但仍拟绞监候缓决。刘彬士在审阅案卷时发现疑点，经过深入调查，认为二犯杀人系出无心，应依过失杀人律从轻发落，刑部所拟与犯罪事实轻重悬殊，量刑不当，要求改判。他的意见被朝廷采纳，缪、李二人得免一死。在署浙江巡抚任内，仁和县（今杭州）发生闹漕风潮，许多农民拒交漕粮，以示对官府的抗议。刘彬士分别首要与胁从，仅将徐凤山等分别判刑，而其余胁从同行之人一律免予查缉，从而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后正式任浙抚，奏请添建宁海、象山等县营房炮台，以资防守；又借款兴修杭嘉湖三府水利；帮丁应行扣缴的银米，也请分别展限，以纾民力；杭州、湖州各县受灾后请缓征赋税，均得批准施行。从这些事例看，《黄陂县志》给他的评语并非过誉。

金国均（字可亭）是道光十八年（1838）的榜眼。此人事迹传世不多，只知他由编修仕至翰林院侍读、上书房行走，钦加侍讲学士衔。曾5次掌典文衡（主持考试），发现并选拔出不少人才，有的内跻卿贰，有的外任封疆。金国均性格豁达大度，不慕荣利，不屑奔竞，深得当道推重。后以父母年迈乞假回籍，养亲十余年。在服孝期间去世，年才50。

武榜眼曾大观（字静斋），嘉庆四年（1799）及第。此公聪识好学，既善骑射，尤工文词，可谓文武双全。参加乡试，一试不售，乃弃文就武，1795年（乾隆六十年）中武举，4年后成武进士，先授御前侍卫，赏戴花翎。后授枫岭游击。枫岭为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匪逋逃之薮，曾大观有勇有谋，单人匹马入其巢穴，捕匪首三人，匪众鸟兽散，疆界遂安。后荐任浙江衢州总镇、福建建宁总镇，旋升福建陆路提督。道光年间，台湾不靖，曾大观派兵协剿，有某千总在途骚扰，为严肃军纪，当场将其殴毙，

全军悚栗，治军之严，可见一斑。曾入京觐见皇帝，得嘉奖曰："真我朝福将也。"曾大观善书法，曾辑录史鉴有益身心的内容成一书，惜不知书名。后因疾告归，一年后病卒。

（严昌洪）

弃城而逃的威顺王

我们游黄鹤楼，会在楼前看到一座小小的白塔，系元威顺王太子建。这威顺王是何许人？

威顺王叫宽彻普化，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其父脱欢系元世祖第九子，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封镇南王，镇鄂州（今武昌）。两次征安南（今越南）皆败，世祖怒其丧师无功，终身不许入朝。1291年移镇扬州。

宽彻普化与其父一样，也是纨绔无能之辈。1326年（泰定三年）封威顺王，镇武昌。朝廷授予螭纽金印，拨给他怯薛丹（按突厥—蒙古语意为宿卫亲兵）500名，又自行招募，扩充至1000名。设王府，置官吏，俨然一国中之国。钱粮衣物均由湖广行省供应，岁支米30000石，银32000锭，每天还要供给王子、诸妃的饮膳。宽彻普化纵怯薛等属官侵夺民利，播弄威福，常外出打猎，践踏民田；大兴土木，广建乐园；伙同富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纵容亲兵，恣行不法，残害民众。百姓深以为苦，痛恨已极。1339年（至元五年）大丞相伯颜擅政，传假圣旨把宽彻普化召到京城加以谪贬。次年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才命其还镇。

1351年（至正十一年）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北起义，宽彻普化领兵前往镇压，战败而归。次年红巾军攻克武昌，他弃城出走，被削夺王印。关于这一仗，郭钰《悲武昌》诗作了很好的记录：

武昌兵甲雄天下，王孙节制何为者？
白马将军飞渡江，壮士弯弓不敢射。
王船来过鹦鹉洲，红旗已簇黄鹤楼。
美人散走东南道，一丝杨柳千丝愁。

战儿衔冤夜深哭，王孙独在淮南宿。
淮南美酒不论钱，老兵犹唱河西曲。
九江昨夜羽书传，九江太守愁心悬；
焉得将书报天子，哀哉不识颜平原。

1353年，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率元军恢复武昌后，才复受威顺王印还镇武昌。1355年，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等攻打徐寿辉部将倪文俊，至汉川县鸡鸣汉，水浅船搁，遭倪文俊火攻，三个儿子全部阵亡，宽彻普化则逃到陕西。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评论此段历史时认为，威顺王纵虐下侵夺民利，播弄威福，天完义兵（按，指徐寿辉红巾军，曾建天完国）遂起而进行推翻元朝的斗争，与晚清诸王弄权，湖广总督瑞澂等亲蹙镇国公载泽（按，瑞澂妻兄）之势，强横于楚中，至辛亥八月之变极其相似。两人都是弃武昌城逃走，虽然宽彻普化走入襄汉上游，瑞澂走归九江下游，然都是亡国覆辙。真是无独有偶，此论确有见地。

（严肃）

“诡谲秀才”吴彻

在元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江夏（今武昌）人吴彻，字文通，雅善吟咏，家贫落魄。元末天下大乱，他投奔陈友谅义军。陈友谅见他是个文士，十分器重，不呼其名而称为先生。向东发展的陈友谅与建康（今南京）的朱元璋发生冲突。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陈友谅进攻豫章（今南昌），派吴彻乔装外出侦探，被朱元璋部俘获。朱元璋已闻其名，亲自为其松绑，问道：“听说你会写诗，你能为我赋《天闲百马图》一首吗？”吴彻爽快地答应可以，当即吟道：

闻君何日渡江来，百骑如云画鼓催。
九十九中皆汗血，当头一个是龙媒。

此诗的意思是说，陈友谅大军不日就要渡江来攻打你们，百骑之中九十九是汗血马（古代一种骏马，一日千里），当头一个即我吴彻是龙媒天马（古代称天马来为致龙之征），暗寓陈友谅是真龙天子之意。朱元璋在一旁为其击节，终于悟出诗中含义，心中不悦，但又不忍杀害。想留在军中，又考虑到此人颇具气节，终将不能为我所用，于是就在吴彻脸上刺"诡谲秀才"四字遣还，以此来侮辱陈友谅。陈友谅见吴彻已成如此模样，十分讨厌，说："安有如此形容而可为我先生者乎？"吴彻二话不说，找了一条小舟离去。

第二年，陈友谅败死，部将张定边拥立其次子陈理为帝，还军武昌。朱元璋大军来攻，陈理死守不降，城久攻不下，朱元璋大怒，准备屠城。忽然有自称诡谲秀才的人求见，朱元璋立即召人，见是吴彻，便问："你怎么还在这里？"过了一会，朱元璋又命他题《西山夜雨》诗。吴彻应声曰：

莫厌西山夜雨多，也应添起洞庭波。
东风肯与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凯歌。

朱元璋听罢，知吴彻在请求自己网开一面，遂取消屠城的打算，返回建康。后来朱元璋得了天下，是为明太祖，屡次下诏要吴彻出山为明朝官，吴彻力辞不出，说："我面目可憎。"

（严锴）

官文督府"三大"

清湖广总督官文系满洲旗人，性柔缓，颟昧不谙政事，诸事皆决于仆从。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门丁大、庖人（厨子）大。

所谓门丁大，大小官员有事禀报官文，非得门丁同意通报，才能进见。如果门丁故意刁难，纵有再紧急的事情也办不成。所谓庖人大，官文的庖人为肃顺所引荐，而肃顺是官文的老师，又是当权的御前大臣，因此该大师傅在督府里气焰嚣张，骄横跋扈，连官文也奈何不得。所谓妾

大，官文之妾原为其宠婢，纳为妾后，狐假虎威，竟干预政事。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了笼络官文，不使掣肘，也要走姨太太的门子，他让自己的母亲收官文妾为义女，并大量贿赂，官、胡二人终于达成这样的谅解：官文只管坐镇，勿掣诸军肘，告捷则推其领衔入奏。此后，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而官文所请，朝议亦无不准，因肃顺秉国，官文是其弟子。然而自胡林翼死后，其左右更加恣纵不奉约束，遭到继任巡抚曾国荃严劾，官文终被革职。

官文当权之时，也有不信邪的人，偏偏向他的"三大"挑战。

同治初年，有一位姓姜无名字，因为会写诗，人们称之为姜诗的神秘人物，在武昌博施济众，被人们视为侠客或神仙。官文爱妾患病，遍召湘汉名医皆不能治。一随从启禀官文说："这种病不是凡医所能治好的，姜诗是一仙人，何不请他来？"官文听了随从之言，迎以舆马，侍以材官，把姜诗请了来，官文迎候甚恭。姜诗走进姨太太的房间，只见孔翠嵌壁，文窗垂绮，帐貂地铺，像到了天堂一般。姜诗指斥道："我早听说你的妾本来是灶下婢，而你的侍奉她就像自己的亲娘，每年拿盐税茶课多少万两来奉养她，我还不相信。今天看见她所住的地方，就是宫廷也比不上，证明人们的传说是可信的。你搜刮民脂民膏养一贱婢，我都替你害臊。对于这种人，我即使真是扁鹊那样的神医也要袖手旁观，更何况医术并非我的专长。"姜诗说这番话时，声叱若雷霆，须髯戟张，目光炯炯四射，官文吓得噤不能声，等他缓过神来，姜诗已经去了，派人急追也未追上。

有个马弁曾经做过官文的娈童（同性恋对象）而被提升为副将，恃宠而骄，竟置王法于不顾，白天闯入民家欲强奸民女，女不从，遭杀害。女之父母到府县鸣冤，府县均不敢过问此案。当时署理湖北布政使是陕西人阎敬铭，知道此案原由后极其气愤，急忙赶去谒见官文要求将马弁绳之以法。官文以生病挡驾不见。阎敬铭说：我有要事，必须面陈，如果大人有病吹不得风，我可到卧室去见。"门丁仍然不答应。阎敬铭又说："中堂大人生病总有痊愈的时候，等病愈后一定会传见，我不如住在这里等。"说完就叫随从把被子抱来，在督府官厅睡了三昼夜。巡抚、司道

各官多方劝解，阎敬铭坚持不动摇，并发誓说："不斩弁不还署！"官文只得亲自出来接见，并在阎敬铭面前长跪不起。阎岸然不为所动。巡抚严树森正色道："丹初（阎敬铭字）也太过分了，中堂大人不惜屈体至此，你就不能稍开一面网吗？"阎敬铭不得已，扶起官文，与他约定，立即革去马弁之职，押归原籍。官文答应下来，叫马弁出来向阎大人叩头谢恩。阎敬铭忽然变色，大喝"拿下！"众差役把马弁抓起来，脱了裤子，重杖40棍，打得他皮开肉绽，哭爹叫娘，最后发遣回家。完事以后，阎敬铭才向官文谢罪，官文吃了哑吧亏，有苦难言，以后更加敬怕阎敬铭。督府"三大"的威风当然也就减了大半。

（严昌洪）

裙带风一例
——陈夔龙妻改变朝廷成命

在刘声木所著《萇楚斋随笔》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鄂督陈夔龙调任川督，其妻许夫人禧身乃已故军机大臣、尚书许恭慎公庚身之从堂妹，惮于路远不愿随往，亦有人为之上闻，奉旨调任直督。王道不外乎人情，此等举措无关宏旨，犹有康、乾年间君臣如家人谴意。许夫人禧身以一妇人而改恩命，尤我朝所未有也。

这段文字揭露了清朝末年吏治的腐败。陈夔龙不愿到偏僻艰苦的四川去做官，竟利用其妻在朝廷开后门改变"调令"，明目张胆地搞裙带风。

然而这段文字却有两处错误。第一，陈夔龙调任川督时不是鄂督，改变调令后任的职务不是直督而是鄂督。事实是这样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陈夔龙任江苏巡抚。1907年9月4日补授四川总督，并未赴任，而在1908年3月又调补湖广总督。改变朝命指的就是此事。陈夔龙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1909年11月23日（宣统元年十月十一

日)的事。虽然这种越调离京城越近的情形与走后门不无关系，但后者并无改变调令的问题。

第二，陈夔龙能改变朝命，靠的是夫人许禧身的关系。但起主要作用的恐怕并不是因为许夫人是已故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的从堂妹，许庚身已故多年(1893年死)，谁会为他的堂妹夫说话呢？该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位许禧身夫人早就巴结上当时的权势人物，拜了庆亲王奕劻为义父。陈夔龙自八国联军之役由顺天府丞迁升府尹以来，一直平步青云，历任河南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等职，还多次应召陛见。连日本人田原天南编的《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上都指出，陈氏之所以有如此顺境，是因为他得庆亲王的信任，并懂得宦海沉浮的诀窍。陈夔龙有昏聩贪婪的奕劻为奥援，这在当时的湖北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当年《湖北日报》刊载插画一幅，画一龙伏于石上，题词为"这石龙，真无用，低头处南山洞，镇日高拱不动，徒劳地方香烟奉。虽有王爷撑腰也是空，勿怪事事由人弄。"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在赛勒奕劻、袁世凯贪私误国的同时，也评击了陈夔龙等人贪缘比附，结党营私的行径。这些史实，《苌楚斋随笔》的作者不知为什么闻所未闻。此真前人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严昌洪)

张济川一日"三捷"

张济川是湖北黄陂县人。年青时，才气横溢，放荡不羁。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入省应试时住在汉口南城公所一家妓院里，与妓女杨喜宝打得火热，考试结束后，流连喜宝香巢不愿回乡，简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没过多久，乡试榜发，张济川竟获解元(乡试第一名)。送喜报的人直接来到杨喜宝家里，喜宝听说张公子高中，自然十分欢喜。但当时张济川不在家，喜宝带着报喜的人到处寻找，好容易在一间烟馆里找到，

张济川正在那里抽鸦片过瘾。烟客们闻讯，群起向张、杨二人祝贺，好不热闹。张济川原先以为能够考中就是万幸了，今天听说是高中解元，更是不亦乐乎。

众人正喧哗时，门外有人拿了一份筹捐彩票开彩号码进来，大家立刻围了过去观看。张济川前几天购有一张这样的彩票，拿出来把号码一对，竟获2等奖，可得银2万两。烟馆的主人听到这些好消息后说："张公子功名钱财，一日并至，实在是一件少有的奇事，一定要买两竿鞭炮来放。"鞭炮买来后，就在门口放了起来，人们闻声而来，一时贺客云集，里巷竟至水泄不通。

杨喜宝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激动，忽然对张济川说："妾有幸侍奉贵人，实是前生缘份，敢请公子马上为我脱籍，充当公子妾媵，永远侍候公子。"烟馆主人在一旁极表赞成，并怂恿说："杨小姐给公子带来了好运，公子若能与之结百年之好，今后还当大发。"张济川马上派人去把妓院鸨母找来，当即立下赎身文书，交付银票，带着杨喜宝回家去。

张济川一天之内，既中解元，又发大财，复又得美人，时人称为"一日三捷"，好生羡慕。可惜的是，张济川晚年出任蒙古都护使署秘书长，在俄国军队于1918年占领库仑(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时惨死塞外。

(严肃)

阅马厂与红楼

阅马厂(亦作阅马场)与红楼，是武汉市民熟悉的地名和建筑物，但能道出它们来历的人却不多了。

明代的教场称作阅兵楼，在武胜门外，有演武厅3间。清顺治年间，湖北巡抚刘兆麟在蛇山南麓重建新教场，称为阅马厂。它是清军练兵演武的操场和举行武科考试的考场，也设有演武厅。清军绿营兵的营房也在该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被裁绿营兵起事，推夏逢龙(夏包子)为首，在阅马厂建立总统兵马大元帅府。自那以后，阅马厂就成为人

民举行反抗斗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在此筑台"讲道理"(宣传革命),并举行了进军南京的誓师仪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在阅马厂红楼内建立了湖北军政府。

红楼原是清末湖北咨议局所在地,始建于1909年(宣统元年),1910年落成。为一组建筑群。占地面积18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红色楼房,故有"红楼"之称。形式类似近代西方国家的行政会堂。上下2层,面阔73米,进深42米。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上层顶端正中有教堂式望楼,是西欧古典建筑风格,气派非凡。门窗线条精巧,外墙壁饰有禾穗、莲花等图案的浮雕,显得古朴典雅。主楼后方另有一座两层结构的楼房,原是咨议局议员公所,为议员住宿休息处。两侧各有一排红色平房。正前方出口处装有铁栅大门两扇,大门两侧为门房。由上半部装有铁栅的红色矮墙自门房向两旁平伸与左右两侧的平房和主楼后的议员公所连接,形成一方形院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按照原计划,着手组建湖北军政府。因湖广总督署受战火破坏,一时不能修复利用,经议决以咨议局办公楼作为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办公之用。军政府一度代行中央革命政府职能,因此,阅马厂和红楼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为国内外所瞩目。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均设在红楼内。翌年春,在此召开湖北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毛泽东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中共湖北省委也曾在此办公。

1979年3月,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横幅。1981年经全面修葺的旧址被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目前正式开放的房间有按原貌复原的会议厅,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住所和办公房等。原主楼两翼的办公用房则布置了反映辛亥革命的辅助陈列和其它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临时展览。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喻枝英)

孙中山铜像与黄兴铜像

孙中山和黄兴是中国近代两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纪念这两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人们在辛亥革命发源地——武汉铸造了中山铜像和黄兴铜像，以供纪念并让后人瞻仰。

孙中山铜像在武汉地区共有两尊，一尊在汉口三民路，一尊在武昌阅马场。

汉口的孙中山铜像位于民族路、民权路和三民路交汇处的广场中央。铜像的建造是1927年2月间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国共合作还未破裂，前来参加会议的宋庆龄、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人提议在武汉树立孙中山铜像。1928年，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财政局局长吴国桢等开始筹建。当时有人担心国内设计不好，主张请外国人设计。但经过反复商议，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国的雕塑艺术家江小鹣设计。1931年铜像在上海铸造成功。当铜像运抵汉口时，由于大水淹没市区及铜像安放地，使工程被迫停工。1932年10月，继任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下令继续施工，工程由营造商李万和负责，由工务局工程师吴国柄督办。1933年4月下旬竣工，同年6月1日下午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当时人们称赞孙中山铜像的铸造成功"使国内艺术大放光彩"。孙中山铜像通高6.15米，其中像高2.15米，占地面积30平方米。铜像背南面北，免冠着中山装，右手执杖，左手微垂，右脚直立，左脚向前，造型庄重，形像传神。像座呈方形，大理石砌成，每方嵌有长0.91米，宽0.33米的汉白玉石。正面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像"七个字，其它三方曾有"像赞"，"文化大革命"期间磨毁。铜像四周还有花坛与护栏相围，显得庄严肃穆。

武昌的孙中山铜像位于阅马场广场中央。北面背倚武昌起义军政

府旧址，南面正对拜将台纪念碑。该铜像于1931年8年建造，设计者仍是江小鹣。像通高6.1米，由铜像、像底座和基座3部份组成。铜像为全身，高2.32米，身着中国的传统服装长袍马褂，右手执礼帽，左手柱杖，面南而立，双目远眺，举止庄重，栩栩如生。像底座为铜质正方形，基座呈方形，以上乘麻石砌筑。正面原铸"精神不死"四字。其它三面均刻有"像赞"的铭文。50年代后期皆被磨平。1963年之前在正面铸"孙中山先生之像"七字。1981年和1986年曾两次进行修葺。汉口和武昌的两尊铜像均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黄兴铜像位于汉阳龟山东麓，江小鹣设计，汉口永茂隆营造厂铸造，建成于1933年。黄兴铜像建成之初立于武昌蛇山临江山头。1955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迁于大桥武昌桥头南侧。1985年10月移现址。铜像移至龟山的原因是：1911年11月3日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后指挥了著名的"阳夏保卫战"，龟山一线是当年主要战场之一。在地势上，依山傍水，视线开阔。铜像背依龟山，面临长江，通高5米，其中像高2米，基座以麻石砌成。塑造的黄兴像西服革履，笃实厚重。黄兴手撩大衣襟，双目远视东方日出，近视长江之水，气宇轩昂，一如当年威仪。像座四周的麻石上刻有浮雕花环，花环中嵌有白色大理石板，正面中央的大理石上刻有"黄兴先生之像"字样，其余三面刻有由蒋介石领衔署名的《黄克强先生像赞并叙》，记述了黄兴的历史功绩。黄兴铜像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喻枝英）

"床下都督"黎元洪

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门前祭坛高筑，祭坛前香烟燎绕，坛上黄帝轩辕氏灵位庄严肃穆，灵前摆设香案，陈玄酒，旗立两侧，鼓乐喧天，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跪读祝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三呼万岁。这是湖北军政府祭黄帝仪（一说为祭天大典）的盛典，也是黎元洪视

职的庆贺大典。

辛亥革命首义取得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巅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它的湖北军政要员纷纷躲藏逃跑，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龚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着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场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上以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是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的事实。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咨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象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

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死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

10月13日，革命军的炮队击退了清政府的兵舰，黎元洪得知此消息后，表面上一副苦脸，但暗中已开始盘算，准备接受革命军的要求。这天下午，他开口同革命党人甘绩熙和陈磊说起话来。甘说："你这几天总是苦脸对待我们，太对不起我们。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今天成绩，抬举你做都督，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复说："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陈磊接着说："你的辫子就对不起我们，现在武汉三镇人人都剪辫子，你身为都督，就该做个模范，先剪掉辫子，以表示决心。"黎此时也顺水推舟地说道："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我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就是了。"

甘绩熙见此状，立即报告有关方面，并请来了理发师。理发师请示道："都督剪去辫子，留多长头发？"黎元洪答道："剃个光头"。不到半小时，理发师便给黎理了个光头。这时的黎元洪头是圆的，肩是圆的，身子也是圆的，肥头大耳，顶放青光。蔡济民在旁打趣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嘻嘻一笑说："像个弥勒佛"。一句话惹得周围开怀大笑。黎元洪去掉发辫后，吴兆麟还特地买回一挂鞭炮，以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去掉长辫的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道："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

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黎元洪的一席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也才有了10月17日祭天大典中黎元洪的就职表演。以上就是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一段曲折经过。

（喻枝英）

黎本危的醋劲与改嫁风波

黎本危是黎元洪的妾，据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芬说，她是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以3000元钱买来的（其实武昌起义时已随侍身边）。黎本危本名危文绣，略通文墨，为黎元洪所宠，气得黎前面的妾陶氏自动离去。危氏比较开通，有时尚能帮助黎元洪处理某些事务。1912年4月，孙中山访问武汉时，危氏与孙的两位千金有所接触，甚至达成联手创办女子学校的意向。在黎元洪的支持下，危氏于1913年初果真办起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就在这段时间里，黎元洪因工作上的原因，与社会上新女性常有接触，引起危氏醋劲大发，并发生勃谿风波。民国初年，各地提倡男女平权，一时间，一些知识妇女多起而参加女权运动，或办学、或参军、或参政、或追求婚姻自主，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然因事属初创，不免有矫枉过正，越出常轨的现象发生。1912年初，沈佩贞以安徽女青年代表名义来鄂，常出入都督府，毫无避忌，因沈原本是一位浪漫的女性。据传黎元洪有时留其共餐，渐渐发生暧昧关系，泼辣的沈佩贞以此要挟黎元洪，黎害怕她张扬，赠给一万元来封她的嘴。事情被危文绣知道了，大兴问罪之师，并逼使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了湖北。沈佩贞带着黎给她的钱到了北京，又是上书，又是演说，又是要嫁唐绍仪，又是充当袁世凯的"洪宪女臣"，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汉阳有位开化女子吴淑卿，看见军政府招募新兵的告示，上书黎元

洪请招女兵，黎以军中皆男子，婉言拒绝。吴不甘心，再次上书，力辩男女不应有别，黎元洪被纠缠不过，允其招女兵一队。后来吴淑卿与陆国香发起组织女子师范学校，黎元洪亦拔银2000两资助。吴当上了该校校长，因校事常来见黎。其人艳丽风流，黎元洪颇乐意与她周旋。危文绣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竟背着黎元洪假借都督的名义将吴淑卿撤职。

黎元洪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瀛台之时，只有危文绣随侍身边。黎、危均爱吃洪山菜苔和樊口鳊鱼，袁世凯为了羁縻黎元洪，总是命京汉铁路局用火车按时运京，供黎、危食用。1923年曹锟发动政变逼黎下台去天津时，黎将总统大印托付给危文绣，嘱她带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藏起来。曹锟让人拦截了黎的专车，黎无计可施，只好通知危氏将印信全部交出。从此事可知黎对危的信任。

1928年黎元洪病逝天津。几年以后，危文绣不容子黎氏后人准备再嫁，但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甚至把她从寓居的青岛驱逐出去。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35年2月只身南下，打算在西子湖上觅一禅庵，青磬红鱼，了此残生。恰此时有社会名流熊希龄老夫(66岁)续弦少妇(35岁)，社会不独无所指摘，且定情新词，登诸报端，传为佳话。危氏痛感男女不平等，乃依熊氏新词略加改窜，另成一阕寄《申报》发表在17日该报《妇女园地》专栏。词曰：

往事嗟回首，叹年来惨遭忧患，病容消瘦。欲树女权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黎公去，谁怜蒲柳。天赋人权本自由，乞针神别把鸳鸯绣，青岛上得相手，琵琶更将新声奏。虽不是齐眉举案，稍慰冥寿，相印两心同契合，恍似当年幼。个中情，况自旖厚。礼教吃人议沸腾，海滨浜无端起顽沤，干卿事，春水绉。

危氏此着还真有点作用，不仅得到《申报》编者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引起上海舆论对男女不平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几天以后，孙敏掌投书《申报》，以《男女对照表》的形式将危文绣的再嫁和熊希龄的续娶进行了比较：

黎本危再嫁王葵轩，新故交谪，逐出青岛。

熊希龄续娶毛颜文，宾客趋贺，欢腾歌清。

经此风波以后，黎本危是否追求到自由和幸福，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严昌洪）

为科学献身的徐建寅

1901年3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汉阳火药厂拌药房。该厂总办、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及委员、五品衔候选知县戴振麟，五品顶戴监生杨荫桓、蓝翎把总储仁发等与众工匠正在进行批量生产无烟火药的试机工作。

先是，徐建寅通过刻苦钻研，用镪水、酒精、棉花等物自行配制成无烟火药，已于上月初步试验成功，药力颇为充足，惟烧后稍有渣滓。徐建寅殚精竭思，穷加研求，于本年3月25日亲手制成无烟火药数磅，再次试验已无渣滓。

这天，按照计划，准备多生产一些这种火药，徐建寅等亲临监工。厂房内机器轰鸣，徐建寅与工匠们看着无烟火药经拌合、碾磨，陆续生产出来，脸上洋溢着极其兴奋的神情。这时，机器越转越快，轰鸣声越来越大，负责指挥生产的工头根据徐建寅等的指令高喊开慢点，但机器开关和控制枢纽均在墙外，司机人等没有听见，结果，开机过快，搅拌机器摩擦发热起火炸裂，轰然一声，拌药房被炸毁，在场的官员、技师和工匠共14人同时被炸死，尸骸焦烂、碎裂，收敛不全，惨不忍睹。著名火药专家徐建寅就这样以身殉职，为中国军火工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徐建寅，字仲虎，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系著名化学家徐寿之子。自幼承家学，曾随其父在曾国藩湘军安庆军营管理军械所，研究格致、化学、制造等均有心得，参与创制的黄鹤号轮船为中国自造轮船之始。徐建寅经委派办理金陵、上海、山东制造局，历任福建船政局提

调、中国驻德使馆二等参赞，遍游英、德、俄各国，考求工艺，阅历既深，所学益进。又与英人傅兰雅等翻译西学有用之书多种。后被张之洞奏调来鄂，派委湖北营务处暨教吏馆武备总教习，于营务利病悉心体察，勇于任事，不避嫌怨。不久又委任办理省城保安所仿造黑色火药事务。徐建寅自造机器，精思仿制，历时3个月便造成黑色火药，试验时爆炸力几与英、德各国所造无异。

汉阳炼钢厂、无烟火药厂先后建成，但所聘洋匠久未来鄂，张之洞便委派徐建寅总办钢药二厂，设法仿造无烟火药。徐建寅"以大局未定，时事日紧，军火尤为要图，毅然以设法造成为己任"。正当他研制无烟火药取得初步成果时，却不幸以身殉职。这不仅是湖北军事工业的损失，也是近代中国科技界的损失。事后，经张之洞奏请，得清廷批准，徐建寅等均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赐恤。

（严肃）

大智若愚
——华蘅芳为仆所愚

华蘅芳，江苏无锡人，我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数学方面贡献尤为突出，其钻研科学技术的精神更是脍炙人口。清咸丰年间，西学初入中国，各种西方科技书籍陆续出版，他与徐寿（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贪婪地汲取西书中的新知识，互相砥砺，一面学习，一面实验，偶有疑难，两人讨论，日夜不休，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有一次读到三棱玻璃可以分光为七色，而手头又没有这种玻璃，便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用以检验、证实自己所学到的新知识。他把全心身投入科学研究和译书、授徒方面，而个人生活却十分马虎，有时竟为仆人所愚弄。

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聘华蘅芳主持武昌算学馆。其弟子苏星舫曾向人说过这样一件趣事：华蘅芳为人谨厚。在武昌时身边带着一个仆人料理起居事宜。该仆人不安份守己，常常盗窃主人的东西去当钱零花，而

把当票仍放回箱子里，华蘅芳并未发觉。这年冬初，华蘅芳准备取皮衣御寒，打开箱子一看，哪里还有皮衣的影子。诘问仆人，仆人回答说："前些时主人缺钱用，命我拿去典当，怎么就忘记了呢？"华蘅芳怒斥仆人，说没有这件事，你在说假话。仆人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取出当票，笑着说："自己藏好了，自己又忘记，还怪我说假话。"华蘅芳被弄得下不了台，十分恼怒，只得挥手叫仆人走开。

还有一次，一位西方人让自己的女儿跟华蘅芳学算术。该女绮年玉貌，其他中国学生都为其颠倒。每天上课西女一到，学生们便丑态百出，加以调笑。一天，此情此景被华蘅芳看到了，觉得十分奇怪，就问弟子们为何吵闹。众人不便回答。华蘅芳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了，你们是为一个人才吵闹的。你们怎么像乡下人一样，看见洋人就感到惊畏呢？"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学生还有调笑之事。其为人忠厚可见一斑。

（严肃）

词人老去风情不减
——王湘绮与"侠妓"王金玉

民国初年，汉口名妓"四大金刚"之一的王金玉有"侠妓"之称。此人貌甚美丽，小脚，稍微有些胖，也可谓体态丰盈。颇会伺候人，不事喧哗，爱与人拉家常，说故事，娓娓不倦。擅长扮演汉戏正旦，《重台分别》、《状元祭塔》、《孙夫人祭江》等长段唱腔，都能引吭高歌，丝丝入扣，使人听后有回肠百转之感。其居室在汉口三分里，另有别业在法租界长清里，别业中悬名人书画甚多，毫无脂粉气。

清朝末年，有山西人某氏，以候补知县赴湘候差，过武汉时，与王金玉相识，流连于王金玉处月余，情好甚笃。谁知此人到湖南不久，即染重病，临死前写信给王金玉，以后事相托。王金玉接信，异常悲痛立即亲自去长沙，料理该候补知县的后事，负责运柩回晋。当时交通不便，灵柩由湖南运到山西，所耗银钱极多，都由王金玉一人承担，虽然负债累累而

毫无怨言，所以人们多以"侠妓"目之。

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召湖南名流王闿运入京任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湘潭人。清末著名学者兼诗人。进京途中路过汉口，武汉要人在王金玉别业设宴招待。王闿运见别业幽雅净洁，不似一般妓院勾栏，大为赞赏。当时王闿运已70余岁，竟与王金玉盘桓数日，不忍离去。他为王金玉亲笔题写锤金纸扇一柄，字皆蝇头小楷，共400余字，弥足珍贵。另又书条屏一轴，录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律诗一首，有"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句，也是正楷，足见其闲情逸致不减当年。古人谓"伺人老去风情减"，而这位湘绮先生，老则老矣，然其风情不减于少年。此事在青楼中竟传为佳话。有人1925年在王金玉别业中还见过王闿运所题纸扇和条屏。

（山风）

地皮大王刘歆生的自吹

"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这是民国初年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在面谒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时大言不惭的自吹。

刘歆生，乳名刘祥，派名人祥，别号歆生，清光绪初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柏泉刘家嘴（现属武汉市东西湖区）。幼年家贫，为人赶放鸭群，后随其父刘作如来汉谋生，替人放牛挤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天主教徒，他成年后也受洗入教，并逐渐学会了英语和法语。后通过教会关系进太左瑞洋行充职员。1899年，20余岁的刘歆生因八面玲珑，善于钻营，被正在汉口设行开业的法商看中，一跃而为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又兼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买办，随后他独自开设阜昌钱庄，充当"二道贩子"，从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借人低利放款，再以高利转借贷出，从中牟取暴利，开始发财致富。接着又在襄樊等地设庄收购白芝麻，再由汉口运往上海出售，贱买贵卖，为数又多，几趟生意下来，竟赚了纯利纹银50万两，经济势力更加雄厚，大大提高了他在商界中的地

位。

刘歆生在同西商的交往中，听说汉口市场将日益发展，周围毗连的地皮必将因此而大涨其价，就认定有利可图。加上其义兄、时任上海立兴洋行买办的刘长荫的怂恿，他便决定投资经营地皮。自有资金不足，便向其他银行钱庄大量贷款。

当时，汉口上至硚口下至沙包（今一元路）的城垣，尚未撤除。城墙之外一片湖沼，城基之内也多是水凼土坞，一般人很少注意，他则大量购进。后湖的土地，在张公堤未修之前，一到夏初水涨，即成水乡泽国，每年仅能争取一季收成。农民急于卖地度日，刘歆生便先在四界插旗杆为标，然后乘船循线按划桨次数为计量单位，以每桨一串或 800 铜板的低价购进。1905 年张公堤建成后，堤内大片低洼地不再受水泛之灾，变成了良田。刘歆生所买到的上自能落口，下迄丹水池，西抵张公堤，南至铁路边的地皮，便奇货可居了。

1907 年，汉口拆去城墙，修建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硚口至江汉路一段），刘歆生所购后城内外的大量地皮，又盼来了发财的机会。他在循礼门车站外（现武汉电池厂处）开设了一个铁工修理厂，雇用廉价劳动力，专门安装修配自用的轻便铁轨和运土机车，并有计划地运土填基。建后又大兴土木，依据地势和街道的不同方向，分别在现江汉路由胜利街口起至铁路两边以及生成里等地建成铺面和住宅，租给别人使用，收取利润。

与此同时，刘歆生还承包了英租界填基筑路的土方工程。当时英租界当局为了便利交通，繁荣租界内的市场，拟自长江边一码头起，经太平街（今武汉关至鄱阳街口），再由后花楼街口起，向西延伸修一条直街，以接通湖南街（现胜利街）、湖北街（今中山大道江汉路以下）。因经过的这一段土地属刘歆生所有，几经交涉，刘歆生提出让基筑路可以，但必须以他的名字作路名，英租界当局同意了他的意见，故此路建成后，便命名为歆生路（现江汉路）。刘歆生同时与这条路向南垂直开辟歆生一路、二路、三路（现江汉一、二、三路），把这块地皮与繁华街市连接

起来。接着，他在与汉口商界殷实户发起开辟建设汉口模范区（今江汉路起，下至大智路，西至铁路边，东至中山大道）时，又在今南京路北段开辟一条马路，并以其长子之名命名为"伟雄路"。这时，上自今民意路，下至江汉路和中山大道外侧，直至大智路，经他逐渐整理经营成铺面栉比鳞次的街市。同时还为其他业主把所有在这一段的地皮，统统整理成为地基，建成大片住宅，构成闹市的雏形。而他所有的地皮价格和房屋的租赁率也大为提高，获利甚巨，成为名符其实的"地皮大王"。

（朱务本）

孔庚监狱写春联因祸得福

孔庚，别号雯掀，湖北浠水县人。幼年读书，颖悟过人，属文敏捷，很有才气。年未20考上秀才。但他却反对科举制度。后来他在本县联络一些青年读书人，捣毁本县儒学，被捕解省，羁押于武昌府候审处。

时当岁暮，孔庚嘱狱吏购红纸，书写如下春联，张贴牢房门侧：

天将丧斯文，未丧斯文，羑里示良谟，玉汝于成担大任；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神州沉苦海，问君何术救同胞？

上联中的"羑里"，即囚禁周文王的地方，在今河南汤阴县北。此联贴出后，同狱者谓其胆大妄为，必招巨祸。越数日，适张之洞的亲信、代理臬司事兼学务处总办梁鼎芬年终巡监，一见此联，大为吃惊。便询问狱吏此联是何人所写，并当即指示此案由他亲自提审。过年后，梁果然亲自提讯。梁对孔说："你是个读书人，应好好读书，为何犯上作乱捣毁儒学？姑念你年轻盲从妄动，免于追究。"接着又说："你有才，为了使你上进，自新，我批准你进经心书院深造。"孔庚听了，喜出望外，万分感激。当即回答："学生还有老母在家，我被押后，母亲日夜啼哭，请求准我回家省母后，再回省就学。"梁鼎芬听了，欣然同意，掀髯（梁是大胡子，时称梁胡子）叹曰："好呀，有孝子才有忠臣，有忠臣才有孝子。准假一月让你回家探视。"

由于梁鼎芬的赏识和推荐，孔庚在书院学习毕业后，又以官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并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孔庚历任大同镇守使、湖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民政厅长、国民参政员等职。他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梁鼎芬对他的知遇之恩。

孔庚于1950年2月病逝于武昌，终年78岁。

（草原）

萧楚女、李四光改名趣谈

被董必武同志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党的理论战士、青年的明星"的革命烈士萧楚女，原名萧秋，1896年秋生于湖北汉阳县城区鹦鹉洲（今属武汉市汉阳区）一木材商人家庭。13岁时即在汉口、武昌的杂货铺和茶馆里当学徒和堂倌，后曾到九江、芜湖、南京、上海等地当过小贩、报童、水手和伙夫，备尝险阻艰难。1911年，15岁的萧秋投身湖北新军，武昌起义后参加汉阳保卫战。不久，辛亥革命失败，萧秋目睹山河破碎，国势险危，悲愤交集，忧心如焚，曾喟然长叹："大江滔滔，何处是归程？我有救国的志向，又怎样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呢？"有一天，当他独自沿江堤散步，低头吟诵着古楚国诗人屈原《离骚》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诗句时，似乎觉得这诗句也唱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苦闷。在他看来，女性者，乃伟大、纯洁的象征也。于是，他取了屈原诗句中的"女"字，前面冠以生养自己的故土的名称"楚"，作为自己的名字，暗寓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和愿望。

萧楚女改名以后，常在报上以"楚女"为笔名发表文章。他文思敏捷，笔锋犀利，见解卓越，思想先进，因而他写的文章，颇受读者欢迎，在青年中广为传诵。不知情者纷纷来信，或打电话到有关报社，要求见一见这位才华横溢、文采华美的"妙龄女郎"，当面求教；有的甚至写信向他求爱。为此，萧楚女不得不登报声明"楚女"并非女性，更不是"妙龄女

郎”，以消除误会。

说到李四光，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而对于他名字的来历，知道的恐怕就少了。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街下张家湾一贫寒家庭，幼时靠打柴为生，但他勤劳好学，聪敏灵巧，因而当他向父母提出想进省城读书时，父亲李卓侯二话不说，走东家，串西家，硬是向乡亲借了一笔路费，资助他去考武昌高等小学。1902年冬天，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来到武昌水陆街湖北省学务处报名，准备参加考试。因初到大城市，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在填写报名单时，李仲揆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了“十四”两字，当他发觉填写错了时，因无钱再买表格，便将“十”字加上几笔改成“李”字，把名字写成“李四”。但转念一想，“李四”这名字太俗，不好听，正在为难时，抬头看见中堂上挂着一块写有“光被四表”的横匾，不觉计上心来，在“四”字后又加了个“光”字，他想，四面都有光明，这意思很好。从此以后，李仲揆便叫做李四光了。

（朱务本）

为中国工运献身的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工人运动中英勇牺牲的林祥谦等烈士，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为中国工人运动献身的第一人却鲜为人知。他是谁呢？这还得从1913年6月汉阳兵工厂的罢工风潮说起。

湖北都督黎元洪投靠袁世凯后，中国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汉阳兵工厂就成为了北洋军阀的武库。袁世凯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南方孙中山一派革命势力，加紧了兵工厂的生产，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工厂总办（厂长）刘庆恩在发工资时却以贬了值的银元纸币与铜元官票对成搭发，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暗受八折亏损”。工人们要求全发官票，黎

元洪借口"共体时艰"加以拒绝。于是全厂工人举行罢工，以作抗议。枪弹分厂的司书马子仲（南京人）、炮筒分厂工头梁瀚生（广东人）等经革命党人联络，在罢工中积极进行活动，发动和组织工人与反动当局展开斗争，并进一步破坏兵工厂生产，以便挫败袁世凯、黎元洪利用兵工厂军火打内战的阴谋。在他们首倡下，6月1—3日无一人到厂上班，罢工工人封锁厂门，将机器上要件拆卸收藏，用石头掷击前来诱劝工人复工的刘庆恩，并具禀都督府，诉说工人困苦情况，控告刘庆恩种种营私舞弊之事，要求工资全发铜元官票。当局迫于"军情紧急，不可久任停工"，不得不答应工人要求，将分成配搭纸币办法改订，所有工人工资在二十元以下者，概发铜元官票，不搭银元纸币，在二十元以上的工头、技师，仍分成搭发，总办、总工程师等则概发纸币。工人们在取得初步胜利正准备复工之际，黎元洪却逮捕了梁瀚生，以"私通破坏党，阴谋破坏兵工厂"的罪名将他处决。

关于此事，1913年6月15日上海《时报》报道说："黎公即派卫队渡江访问梁、马二人住处，将梁拿解来省，交军法处讯究；马则闻风他遁。前日已由军法处将梁讯明，以'纠众罢工，意图煽惑'八字为其罪案，请黎公令将梁斩决，悬首于该厂前示众；马则悬赏一千元捕拿。"

工人们得此噩耗，义愤填膺，结成团体，继续罢工，抗议反动当局的罪行。特别是广东籍工人，坚持斗争，要求撤换刘庆恩，使枪弹、炮筒两个分厂停工多日。他们还串联造币厂、武昌纱、布、丝、麻四厂广东工人，准备举行同盟罢工。黎元洪在"工人联合声势日甚"，刘庆恩又因此事而处境尴尬的情况下，将其撤职。迫于严酷形势，为保存实力，汉阳兵工厂工人才开始复工。经过这次斗争，工人们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工业同盟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梁瀚生就是目前所知道的为中国工人运动献身的第一人。

（严肃）

"劫收"大员"四大金刚"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从峨眉山上下来，

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分赴沦陷区，展开了一场对日伪各类物资的大接收。这次对抗战胜利果实的接收，手段之卑劣、行动之毒辣无异于抢劫，因而人们痛恨之余，将接收改为"劫收"。

武汉于1938年沦入敌手，是华中地区最有油水的沦陷区，这次自然是"在劫难逃"。抗战胜利的消息刚在武汉传开，从"地下"钻出来的（指国民党潜伏在沦陷区内的人员）、从天上"飞"来的（指乘飞机从湖北省政府当时的省会恩施来的人员）、从水上"游"来的（指乘船从当时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来的人员）各类大员纷纷聚集武汉，凭着各自的后台、各自的特殊身份、采用各种手段对武汉敌伪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文化、经济部门展开了劫收。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袁雍以"军事委员会汉口军事特派员"、"中央党部汉口党务特派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汉口行政特派员"三个"钦差大臣"身份，俨然成了国民党在汉口党政军一把抓的唯一人物。由于他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近水楼台，他第一个进入武汉。

另一个进入武汉的实权人物，是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谢士炎，他的头衔是"第六战区汉口前进指挥所主任"。他从恩施飞到武汉，在长官部尚未到达之前，前进指挥所是武汉地区最高领导机关，代表长官部行使一切权力。因此，在当时武汉日军和汉奸心目中，谢士炎等于是那时武汉的"蒋介石"，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对于他，只有唯命是从。甚至当时大大小小冒充的"钦差大臣"，由谢士炎报告给长官部之后，均以"前进指挥所"的命令，一一卸下了"特派员"的招牌。

此外，当时还有两个炙手可热的头面人物：徐怨宇和唐新。

徐怨宇当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主任。他的任务本规定为接收日伪的新闻通信机构，恢复中央社武汉分社，可是由于他是新闻记者，接触面广，又有一个"湖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干事"的头衔，所以"劫收"的面也相当广泛，除了新闻机构理所当然地被他接收外，许多文化机构如电影院、伪中日文化协会湖北分会、汉口日本"千代洋行"等也都在他的"劫收"之列。

唐新是军统局的高级骨干。当时是国民党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同时又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有大量美军顾问在内的特务武装——湘鄂赣边区中美行动总队队长。驻地虽在江西修水，但对武汉及外围地区经常进行渗透活动。日寇刚一宣布投降，他就亲自率全部武装特务直奔武昌。几经周折，直到国民党军队正式进入武汉以后，才进入武汉。唐新并无受降任务，亦无"法定"接受对象，但由于他是军统要员，又是湖北人，抗战前已经在武汉搞过军统组织，有一定社会基础，加上现在又有美国撑腰，有最新的武装队伍，所以他在武汉也是显赫一时的"大人物"。

这四员大将先后进入武汉，各显神通：有的"劫收"高楼大厦据为己有；有的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有的卖放汉奸收受贿赂；有的争权夺位，强占地盘。这么一来，房子、车子、金子、票子（法币、美钞）、位子（官位）源源而来，当时社会上称之为"五子登科"。人们将这四位"劫收"大员称为"四大金刚"。当然，这"四大金刚"并不是神话中的"鹰家四兄弟"，而是对这四个"劫收大员"所造成的劫收"德政"一种无声的反抗。

1949年夏天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这"四大金刚"有的逃往台湾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的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死去；有的则在经过一段曲折的路程之后投向人民了。

（商若冰）

话说武汉童子军

中国童子军是"舶来品"。它起源于20世纪初英国陆军中将贝登堡将军所撰写的《童子军警探》一书。1912年，该书由外国传教士带到武昌文华书院，在教会的支持下，首先在文华成立童子军，并派教友严家麟主其事。可以说，中国之有童子军，是武汉开始兴起的。文华童子军的组织与训练均依照英美等国，并绝对听命于教会。

1915年，上海有些非教会办的公私立中、小学也纷纷成立童子军。

接着、江苏、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许多公私立中、小学都相继办起了童子军。各地教会办的童子军都受教会领导。非教会办的童子军有联合组织的，如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北京童子军委员会等，与教会互不隶属。没有联合起来的，也不受教会支配，各自为政。

武汉非教会创办的童子军首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不久，武汉其他非教会办的公私立中、小学也都办起了童子军。

1926年，国民党决定利用童子军的组织形式来培育青少年，决定创办"党童子军"。1929年国民党"三大"召开，对党童子军的发展极为重视，经国民党第21次中常会作出决定，党童子军改称"中国童子军"，不久由蒋介石亲任司令，戴传贤、何应钦分任副司令，规定各省、市成立童子军促进会。

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在武汉公私立中小学大力发展童子军，决定第一批在武昌、汉口共成立童子军35团（武昌中学6团，小学14团；汉口中学5团，小学10团），并成立了武汉童子军促进会。

1933年，中国童子军总会派陈潮中来武汉成立童子军励进社武汉分社，主要任务是审查和吸收社员，了解分析武汉童子军训练活动情况及童子军教练员的表现。

1934年蒋介石来武汉视察，决定亲自检阅武汉童子军，地点在汉口中山公园运动场。武汉有男女童子军3000多人接受检阅。蒋介石发表了讲话，要求童子军发扬"智、仁、勇"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从此这"天下之达德"成了童子军的精神支柱。

武汉童子军以校为单位，每校一团，团以下为队，多以民族英雄命名，如"史可法队"、"文天祥队"、"岳武穆队"等。童子军服装由各校统一订制，用毛呢或卡叽布料制成，左胸佩带长条白底红字（或黑字）"中国童子军"符号，还配有水壶、干粮袋、警笛、军刀等物件。抗日战争期间，武汉童子军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办墙报、街头演讲；空袭时协助军警管制灯火，照顾市民进入防空洞；组织宣传队慰问演出等。

1938年4月4日(当时为儿童节),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时任军委会总政治部副部长)还亲切接见了湖北省童子军代表团,并发表了讲话。

武汉沦陷后,汪伪所办学校也有童子军组织,是日伪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武汉解放后各校都建有中国少年儿童组织,童子军即自动消亡。

(商若冰)

保卫武汉的三大空战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以后,即把进攻的战略目标对准华中重镇——武汉。他们首先凭借其空军优势,以其霸王队木更津等机队经常进袭武汉,狂轰滥炸。我国空军中有志爱国之士,同仇敌忾,奋勇出击,建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战绩。其中最激烈的有三次大空战。

1938年初,日本空军向我国空军投下了一道战书,是以牛革制的皮筒用小降落伞降落,空投到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上面写着:"中国空军:你们有胆,约期会战,否则投降!"

当时驻在武汉地区的我国空军部队有,空军第九总站,空军轰炸第一、二、三大队,空军驱逐第四、五大队,再加上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大队和战斗大队。当接到日本空军这种盛气凌人的挑战书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请战杀敌。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后,决定应战。

2月18日这一天,晴空万里,能见度好,上午9时许,武汉市空袭警报拉响了,日本空军的重轰炸机50架由战斗机护航,从时针11—12航向列队向南,以3000米高度、400km/小时航速,向武汉进袭。

中国空军指挥部调集武汉基地所有空军力量,由汉口王家墩机场以及孝感、武昌南湖、沙市、宜昌、九江、南昌多地起飞,机群从四面八方汇拢,上升到5000米以上上空俯视,紧逼围攻。把敌机拦截于距武汉中心区100至150华里的地带轮番战斗。自10时开始,一直打到下午4时,长达6个小时,把狡猾的日军木更津等机队咬住不放,打得敌人东逃西窜,仓皇地把所带近百吨杀伤弹七零八落地丢掷荒野。

这次大空战，共击落敌机 24 架，击伤 10 架，敌人死伤近百人，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这次大空战，我方计损坏飞机 4 架，空军第四大队长李桂丹，副大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等壮烈牺牲。国际主义朋友——苏联空军志愿队战斗机大队长拉黑曼诺夫等，也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继 2.18 大空战以后，接着又进行了 4 月 29 日和 5 月 31 日两次大空战。

4 月 29 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寇空军为天皇祝寿，为木更津航空队报仇，出动飞机 36 架，大举进袭武汉。我国空军派第三、四、五大队，配合苏联空军志愿队 E—15、E—16 战斗机，共 60 余架迎战。这次空战，共击落敌机 21 架。战斗中，我空军飞行员陈怀民驾驶的飞机受伤，他迅即调转机头，与一敌机在青山地区迎头猛撞，同归于尽。为悼念陈怀民烈士的英勇牺牲精神，抗战胜利后，汉口市政府于 1946 年将日租界的一条南小路改为陈怀民路。

5 月 31 日的大空战，日寇出动驱逐机 36 架、掩护机 18 架。经过激战，敌机被我击落 14 架，我机亦有 2 架坠毁。

当年 6 月 5 日，武汉市民在汉口总商会举行追悼会，深切悼念 4 月 29 日和 5 月 31 日两次空战中牺牲的我国空军孙金鉴、杨慎贤、陈怀民、张效贤等烈士。

为了纪念苏联空军志愿队支援我国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1956 年 3 月在汉口解放公园修建苏联空军烈士墓，大理石铸成的墓碑刻有 15 位苏联烈士的英名，他们血洒中华大地，在中苏友谊史上写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篇章。

（伍文士）

中山舰金口遇难

中山舰原名永丰号，因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时，孙

中山先生登上该舰与叛军坚持斗争而改名。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随着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我重要战略城市，北平、天津相继失守，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海军部就调集了包括"中山"舰在内的49艘军舰进入长江下游布防，以"拱卫京畿"，并扼阻日本海军舰队西进长江。迫京沪沦陷后，武汉一时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成了日寇下一步进攻的重要目标。1938年秋，骄横的日军开始对武汉进攻，武汉军民齐心协力进行抵抗，由此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武汉会战。

会战临近时，中山舰奉命由岳阳开赴武汉，停泊在汉口外围的江面，担负着从嘉鱼、新堤至武昌金口一带的警戒任务。那时舰上装备很差，主副炮已被拆卸下来安装在长江的几个要塞上，只剩下瑞士制的70毫米火炮两尊；英制火炮两尊和法制高射炮一门等。尽管如此，全舰官兵仍然斗志昂扬，决心为保卫武汉与敌人血战到底。

10月24日上午9时，日寇一架侦察机从东飞临金口赤矶山"中山"舰停泊处的上空，舰上高射炮即开炮对空射击，敌机仓惶逃遁。舰长萨师俊据此断定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乃下令全舰官兵严阵以待，作好战斗准备。中午时分，中山舰接到开往汉口执行任务的命令，刚刚起锚，就见日军6架轰炸机迎面飞来，并向中山舰俯冲投弹。这时萨舰长一声令下，舰上的火炮和友邻军舰的火炮瞄准目标一齐发射，舰艇上空顿时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两架敌机当即被我炮火击中，拖着长长的烟柱栽倒在江里，舰上官兵一片欢腾，斗志更高。不料正在这时，位于舰首的高射炮，由于连续发射时间过久，突然出现故障。射击一停，敌机即乘机向舰艇俯冲下来，轮番轰炸，第一颗炸弹落在敌机旁的水面上，舵机舱当即被炸而漏水，轮机操纵失控。接着又有五六颗炸弹相继落在舰艇上，锅炉舱被炸，江水涌进舱里；指挥台崩塌，右机关炮位被毁；舰上多处起火，舰身逐渐倾倒……萨舰长在指挥台被炸时身负重伤，他的一条腿被炸断，鲜血淋漓，但他全然不顾，依然指挥若定，并向全舰官兵高喊："坚

守岗位，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此时舰上的官兵已伤亡大半，剩下的人仍拼死抵抗，他们用手提机枪对空射击，决心与军舰共存亡。

“中山”舰终因受创过重，舰体倾斜度越来越大，一面顺水漂流，一面逐渐下沉。当勤务兵黄珠官背着舰长下救生艇时，军舰已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时绝灭人性的日寇就低空飞行，用密集的机枪朝救生艇扫射，将小艇击沉。“中山”舰于1938年10月24日下午3时50分沉没在金口龙床矶江底，自萨师俊舰长以下25位官兵与舰艇同归于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杀敌事迹，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悲壮的一页。

（陆川）

武汉的鲁迅逝世周年祭

1937年10月19日，在汉口黄陂路青年会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祭。

武汉在历史上曾是光辉夺目的英雄城市，但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武汉变成了一块沙漠。直到抗战发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开拓者荟萃云集武汉，被窒息了的武汉，燃起了抗战的熊熊烈火，成为抗战的斗争中心，成为抗战的实际首都。千千万万的群众活跃起来了，数以百计的抗日救亡团体行动起来了，被人们称之为“沙漠”的武汉热闹起来了。鲁迅逝世周年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

这天，从江汉关轮渡码头上坡沿马路至黄陂路挤满了人：有的在围观华北流亡学生表演街头剧，有的随着来来往往的歌咏队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有的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有的穿制服、拿警棍的警察以及腰挂手枪的宪兵在人群中来往穿梭。气氛热烈，形势严峻。

上午9时，纪念会开始，在主席台就座的有胡风、郭沫若、洪深、洗星海、王莹、柯仲平、金山、胡愈之等。

紧接着，一些对鲁迅充满情感的讲话排山倒海般地倾泻出来。人们

称赞鲁迅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作品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争精神；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对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和反动文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等等。还有人指出，鲁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积劳过度和肺病的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虽然鲁迅只活了55岁，但他的生命所闪耀的光辉却指引人们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照亮人们从迷信、愚昧、落后、保守的深渊解放出来。鲁迅的嘴不再说话了，而鲁迅的话将永远活在生者的心里。

随后，王莹女士朗诵了高兰所写的悼念鲁迅的诗歌。内容简劲有力，咬字发音清晰爽朗，铿锵有力，节奏感强，表情丰富。听众以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心底的共鸣。

散会时，有两个人被大家包围了，一是胡风，二是冼星海。

胡风身体高，胖胖的，与人亲谈、亲切和蔼，他是这次纪念会主要的筹备人。

冼星海面庞小，身体细瘦，一口浓厚的广东话，大伙儿要他打拍子唱了好几首救亡歌曲。还有些青年学生拿出纪念册请他签名题字，他写上了《青年进行曲》中的歌词："前进！中国的青年！"并注上了五线谱音符。

最后，由于警察向会场负责人索取签到簿未能得逞，双方争吵，军警粗暴地撕下了几张标语，甩破了几个茶杯，灰溜溜地走了。他们的恶作剧怎么也抹不掉纪念会所留下的深刻的、难忘的情景，怎么也动摇不了为怀念鲁迅而树在人们心中的最壮丽的纪念碑。

（吴先铭）

汉口人力车夫血泪史

人力车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19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由于

它比西式马车简便、廉价，又比轿子先进，在人力众多的中国很快得到推广。武汉的人力车大约在前述时间稍后一点由上海传来，逐渐成为武汉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主要代步工具。人力车夫处在社会最底层，不仅为达官贵人跑断了双腿，洒尽了汗水，还要受租界中外国侵略者的凌辱毒打，那里的大街小巷洒满了人力车夫的血泪。但是，武汉的人力车夫也是不好惹的，他们利用同行工友受迫害的事件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抗暴斗争。

吴一狗案

1911年1月21日（清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薄暮时分，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应城县人，家住后湖），拉车在英租界行走，途中遇到英国巡捕头黄胡子，问黄要不要坐车，黄用警棍敲了一下车子，吴以为他想坐车，便将车停下，无意中车轮碰到黄的脚，黄大怒，一棍将吴击倒，连踢几脚，吴当即毙命。在场有4名中国人看见，颇为不平，捕头又将此4人拘送捕房关押。捕房西医验尸后，谎称吴一狗系"气殴"致死，命人抬往租界外后城马路，嘱华警召人认领。吴一狗家属和后城人力车夫及填筑后湖的民工闻讯赶来，确认吴系被殴伤致死，当夜将吴尸抬回捕房论理。夏口厅丞王国铎一面派巡防营兵丁前往弹压，一面带同仵作赶来验尸，亦称"委系病死，毫无伤痕"，草草赏薄棺一具，装殓钉封，命差勇押送出界，企图平息事端。

次日，后湖一带人力车夫和填湖民工一律罢工，包围巡捕房，提出抗议。英领事竟调海军陆战队上岸弹压，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华人，击毙14人，伤10余人。群众返奔，与清方前来镇压的文武官员相遇，发生冲突，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击伤王国铎及江汉关道齐耀珊等。湖广总督瑞澂见事态扩大，派提督张彪率兵前来"和平弹压"，示威群众才陆续散去。后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方抚恤死伤者，反被英领事借口乱民损毁租界设施索赔2万元而了事。

龚银保案

1913年6月17日，车夫龚银保在汉口大智门下俄租界厕所旁小便，被俄国巡捕房的59号安南籍巡捕看见，不问情由，用木棒劈头连击数十下，龚银保鲜血淋漓，顷刻倒地，又被59号用脚猛踢，立时毙命。59号欲将尸体置之租界之外，讵各车夫大抱不平，不约而同，一律罢工，将凶手扭住，同时用车把龚尸一并送往巡捕房。一时租界中往观者甚多，并向俄巡捕房抗议。俄领事闻讯，调集俄国水兵，荷枪实弹，分途鹄立，所有行人不准驻足，企图以武力相威胁。

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恐酿成意外风潮，特派宪兵前往弹压，一面电请黎元洪派员交涉。汉口商会亦照会俄领事要求惩凶。23日此案开始预审，双方证人证词针锋相对，英、德、日各国医生验明确属伤毙，而俄、法医生则争谓病死，互相争执，不能解决。后俄领事见各团体大动公愤，请人转圜，允给安葬抚恤费若干，而59号则不认行凶，不予惩办。龚银保案终沉冤莫申。

徐典案

1925年2月17日，汉口英租界人力车夫徐典正拉车前进，忽遇一汽车迎面驶来，他将车子往旁边一闪，不意误撞英租界巡捕，当即被拘押于捕房。无论徐典如何解释误撞的原因并赔礼道歉，凶残的巡捕仍对他拳脚相加。徐典竟被活活打死，巡捕房将尸体偷偷装棺封钉，企图掩盖罪证。人力车夫此时已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案发后，人力车工会立即向英国侵略者严重抗议，并发布宣言，向各方呼吁。各界公团先后响应，纷纷抗议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并要求收回英租界。英租界巡捕房并未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借故捉拿车夫，严加处罚。3月3日，英租界车夫全体罢工，提出5项条件，虽经汉口警察署长等出面调停，工人仍坚持斗争。英租界当局见团结起来的人力车夫不可轻侮，乃被迫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者，严命巡捕不得殴打车夫，由中国

官厅依刑律惩凶，抚恤徐典家属 300 元。5 日，人力车夫才复业。

“四三”惨案

1927 年 4 月 3 日下午 4 时左右，4 名日本水兵在汉口某处乘坐人力车至南小路某日本酒店门首下车，仅付给为数甚微的车费，车夫要求增加两枚铜元，日本兵不允，双方发生争执。日本水兵大冈胜芳竟飞腿猛踢华兴公司 148 号雇车的车夫，致使车夫身受重伤。街上一工人上前救助，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附近民众闻讯大哗，纷纷奔赴现场援救。酒店内的几名日本水兵亦赶来挥刀向人群刺杀。怒不可遏的民众奋起自卫，徒手抓获行凶日本水兵 6 人和助纣为虐的日侨 4 人，押至湖北省总工会拘禁。日本驻汉总领事调遣水兵 200 余人登岸，进行武力恫吓，领事馆的日本驻军也驾起机枪扫射示威群众，当场打死 7 人，打伤 10 人，造成“四·三”惨案。

武汉各界民众群情激愤，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向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人们在武昌、汉口举行追悼会，罢工、罢课、罢市，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收回日租界，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问题委员会在错误思想指导下，谈判不力，仅商定非正式解决办法 6 条，“四·三”惨案却被搁置起来。

水杏林案

1928 年 12 月 17 日，汉口车夫水杏林拉车在日租界同德里附近行走，被进行巷战演习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炮车轧死，日本侵略者为抵赖罪责，谎称水杏林系患腹膜炎致死，上年“四·三”惨案所激起的民愤尚未平复，民众对日军新罪行义愤填膺，各界团体联合组成“水杏林案后援会”，并在 1929 年 1 月 8 日，发动了全市各业总罢工，组建纠察队，对日租界实行经济封锁，日本侵略者对罢工工人进行反扑，殴打、拘捕日工厂的罢工工人，水杏林的哥哥水裕林也被捕遭到殴打。为避免扩大事态，国民党汉口市交涉署与日本驻汉领事进行秘密谈判，达成日本总领

事出面道歉，抚恤水杏林遗属4600元等协议4条，宣布水杏林案正式解决。

（严昌洪）

“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位于武汉关侧边的苗家码头，是一三惨案遗址，1959年由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一三惨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出师北伐，到10月10日，依次连克长沙、汉口、南昌和武昌等重镇，大败直系军阀吴佩孚，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亦狼狈逃窜。长江一带是英帝国主义蓄意经营的领域，吴、孙又是英帝国主义庇护多年的走狗，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震撼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早在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6月11日和6月23日，又先后在汉口和广州制造了六一一惨案与沙基惨案。当时，武汉学界致电北洋军阀政府时，就明确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主张。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三中全会，也主张“特别注重反对英国”。

北伐开始以后，英帝国主义不仅以钱财和军火援助北洋军阀，反对中国革命，还调遣多艘军舰来华，直接向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挑衅，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公然炮轰四川万县，以致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当北伐军逼近武昌时，英帝国主义极力煽动列强采取一致行动，妄图阻止北伐军前进。北伐军攻进汉口后，英帝国主义故意阻挠，不许北伐军经过英租界追击吴佩孚残部。还通过在英租界出版的英文《楚报》，大肆诋毁武汉地区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同年11月26日，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划下，驻武汉的各外国领事，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缔武汉工人运动”。

1926年12月26日，在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等主持下，武汉各界人民分别在武昌汉口召开了反英大会，大会发出了宣言，要求我国政府对英经济绝交，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就在这一天，英国油轮在黄冈团风江面撞沉我国商轮，使我400名同胞遇难。消息传来，武汉人民怒不可遏，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突出，斗争也更加尖锐了。

为了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从1927年元旦起，在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三镇人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开展宣传活动。目睹三镇人民的欢腾景象，英帝国主义心里不是滋味。

1月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江汉关（今武汉关）侧边的广场上演讲，秩序本来很好，英国水兵却突然结队冲过来，用刺刀驱杀听讲群众。当场将缝包工会会员李大生和年仅10岁的方汉山的肚子刺穿，肠子流出；还有几名工人受重伤；轻伤者30多人。这就是令人切齿的一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武汉地区群情激愤，各群众团体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当场议决了8条对英办法，并推派14名代表到国民政府去，请政府据此向英领事提出严重交涉，限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请政府采取断然行动。

1月5日中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挥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今友谊路）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员海员工人周和亮坐着划子绕进英租界江边有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的地方上岸，送来了示威队伍的袖章。在那里等待的人群，在一些带有袖章的带队人的指挥下，立刻汇合成几股洪流。在太平街（今江汉路南段、鄱阳街到江边一带）游行的群众，一鼓作气的越过了英租界里密布的铁丝网和堆积如山的沙包，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打开了英租界紧闭着的铁门。内外的示威队伍会师后，沿途高呼口号，占领了英租界巡捕房，在一些屋顶上升起了我国的国旗。

由于举国上下一致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纷纷声援，构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坚强后盾。中英双方累计进行了16次谈判，陈友仁据理力争；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马利理屈词穷，终于在2月19日签订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收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盘距了66年的"国中之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震惊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新纪元。

（徐明庭）

一三里与工人运动讲习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倡议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该校设在武昌黉巷（今名红巷）。至今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名场所。可是，就在同一时期，汉口有一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因为旧址没有保存下来，《武汉市志·文物志》也没有记载，所以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两天后，参加"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的各界群众，冲进并占领了英租界。1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英租界的公安、行政事宜。

由于群众的建议，位于原来英租界辖区内的湖北街同丰里（今中山大道黄石路口对面）立即改名为一三里，以示对一三惨案中死伤者的悼念与慰问；并以之激励来者。由此可见当年武汉的民心与民气。

同丰里改名为一三里后，在刘少奇、林育南等同志的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及时将原来设在汉口铁路外德华学堂（今市六中）内的工人运动讲习所，迁到一三里9号，刘少奇负责讲授《工会组织工作》和《工会经济问题》；董必武、李立三、陈潭秋、林育南与恽代英等同志分别担任

《国民党农工政策》、《劳工运动史》、《中国民族运动史》、《工会应用文》、《国民政治经济状况》等课程的讲授。该所培训的两期学员毕业后，均由湖北省总工会派往武汉及其他各县的工会工作，对各地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一三里仍然恢复了同丰里原名。于此同时，有人在名为《太阳灯》的报纸上提出建议：希望把江汉关到怡园的这条路（今江汉路南段），改名为一三路。因为这条路的东边原属英租界；并且江汉关的侧边就是从前英帝国主义制造一三惨案的地方。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当时的市政当局采纳。

（徐明庭）

两个“六一惨案”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六一惨案”均发生在武汉。同为反动统治者破坏、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一是1919年6月1日，湖北省督军王占元和省长何佩瑢在武昌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一是1947年6月1日，国民党武汉行辕、武汉警备司令部包围武汉大学枪杀学生、血腥镇压。

1919年5月6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激起武汉学生的爱国激情。5月17日，武汉26所大中学校在中华大学开会，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31日，武汉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定总罢课，声援北京。

湖北当局对学生反帝爱国的行动，大肆镇压。6月1日清晨，派大批军警把守各校校门，禁止学生外出。还令军警巡逻街道，戒备森严，下午，各校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军警当即捕去数十人，殴伤武昌高师陈开泰等十余人。反动当局为了进一步破坏学生爱国运动怒潮，于2日勒令各校提前放假，学校食堂停伙，限令学生三日内离校。6月3日，学生不顾禁阻，坚持冒雨游行。再次受到镇压，又有数十名学生受伤，仅中

华大学受伤学生就有9人，被捕学生数十人。反动派一连串的倒行逆施，震惊了全国。

28年之后，1947年学生爱国运动席卷全国，武汉地区各校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活动。武汉大学学生于5月19—22日开始罢课，23日继而游行，还联合武汉各学校于6月2日大游行、总罢课。并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工人、店员一起行动，罢工、罢市。反动统治者惊恐畏惧，武汉行辕、武汉警备司令部、武汉稽查处出动武装军警一个步兵营、一个宪兵连、一个警察分队分乘8辆汽车，于6月1日凌晨3时，封锁包围武汉大学，分别在男女宿舍、教授住宅区搜查，将刘颖、缪朗山、梁园东、金克木、朱君允5位教授押上汽车，还将学生14人、工友3人捆绑上车，接着用机枪向四方扫射，打死学生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3人，伤19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清早，由代校长刘秉麟（校长周鲠生因公去了南京），会同教授6人赶到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向正在参加该会开幕典礼的行辕主任程潜严正交涉。随后，全体学生提出4点要求：①撤办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枪决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及肇事凶手；②立即释放武汉大学及武汉各校被捕教职员工和学生；③公葬死难学生、抚恤死难学生家属；④切实保障人权。

血案消息不胫而走，其他学校推派代表来到武大吊唁，要伸冤复仇！要血债血还！北大、清华等校罢课声援，表示抗议！

6月22日，举行追悼会，灵堂悬挂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6月23日出殡，学生千余人从珞珈山校园出发，经武昌市区过江到汉口闹市区，声势浩大，围观者一叹一顿地哭泣。同学们抬着烈士棺柩，用血的铁证控诉反动派的罪行。清华大学挽联和另外两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武大"六一"三烈士　　千古

血洗清眼睛，血照亮大地。

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清华大学敬挽

武大"六一"殉难三烈士　　千古

××××敬挽

武大"六一"三烈士　　千古

？

！

育杰中学全体同学　　敬挽

第二副挽联除落款外，完全无字；

第三副系张学良将军创建的、设在武昌的东北育杰中学所挽，上下联只画了两个巨大的标点符号，可称为无字挽联。这几副挽联动人心弦，启人深思！

武汉解放后，武大校园建有"六一烈士纪念亭"。立碑记载了"六一"惨案经过："…围绕本大学黉舍之内，遽尔骚然，以出人意外，师生仓卒

不知所为，一任其排阀执讯而已。天既明，而枪声骤起，移时始解去，计鞭蓝动束挟以同走者二十余人，创而呻吟于室者十有九人，肝脑涂地饮弹毕命者则陈如丰、王志德、黄鸣岗三人也……。”

此即震惊中外、举世骇然之武大“六一”惨案也。

（吴先铭）

“六一惨案”祸首“投江自杀”假相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武汉当局纠合了党政军警宪特，以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为首，对武汉大学进步师生进行疯狂迫害，开枪打死3人，打伤和捕走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事件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公愤。当时，由于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对祸首胡孝扬撤职惩处。但是，学生们仍不罢休，形成了非枪毙胡孝扬不足以平民愤的局面。

不几天，武汉各报突然刊登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查办、胡孝扬畏罪潜逃”的新闻，有的报纸指责彭善纵凶脱逃，议论纷纷。后来，报上又刊登“胡孝扬畏罪投江自杀”，并公布了胡写给彭善和他的老婆的两封遗书。

胡孝扬究竟是怎样“投江自杀”的？原来，胡当稽查处长，是稽查处的顶头上司、第六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阮成章保荐的，阮成章感到，稽查处不抓回胡孝扬，是无法向社会交待的，因此，他一手策划了这一假相，要稽查处宣布胡孝扬畏罪投江自杀，并把胡写的两封遗书也公布出来。

为了证明胡孝扬确实投江自杀，阮成章玩弄了一个借尸替身的诡计，他要稽查处副处长李铁生派可靠的人去武汉下游经常漂浮溺尸的阳逻，找了具身材矮小、蓄有平头、面目模糊的尸体运回汉口，随即稽查处发布新闻，宣称胡孝扬投江自杀经证实，尸体已在下游寻获，而大肆张扬，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法院和有关机关共同验尸。

在汉口四明公所(殡仪馆)验尸那天,阮成章亲临现场,由汉口地方法院首席检查官郑大纶主持检验,因为他是稽查处的高级法律顾问,对这件事自然是很"帮忙"。事前,阮曾要李铁生嘱咐胡妻抱尸痛哭,谁知那女人不懂事,进场是哭了,可开棺的时候,竟吓得颤抖失色,怯步不前,勉强哭了几声。阮成章见有的记者窃窃私语,惟恐露出破绽,节外生枝,便当即命手下人将那女人带离现场,而后又故作姿态地对李铁生等说:"胡孝扬屁股上不是有一颗黑痣吗(其实是事先已知尸体臀部有一颗黑痣)?"李铁生见机立刻随声附和,并指使法警进行检查,当然发现了那颗黑痣。这样,短小身材,平头,黑痣,家属哭认,稽查处人员公认,以及记者、来宾在现场的见证,都成了胡孝扬投江自杀已死的"法律依据",总算是蒙混过去了。第二天,武汉各报把验尸情况都作了长篇报导,社会上的议论才暂时平息下来。

然而,事隔年余,接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刘庄如,先后收到胡孝扬两次写给他的亲笔信,事实戳穿了胡孝扬投江自杀的骗局。

(伍文士)

蒋介石怒杀韩复榘

1938年元月24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被蒋介石枪决于武汉。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枪毙的最高级将官,一时间震及全国,为当时的重大新闻之一。

韩复榘,河北霸县人氏,生于1890年,20岁从戎,一直追随冯玉祥的左右,征战18年,从普通一兵一直升至方面大员,可谓官运亨通。中原大战后,韩部进驻黄河以北,从此,韩复榘便一直坐镇山东,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抗战爆发后,韩复榘对最后胜利无甚信心,采取消极作战的态度,自始至终想保持自己的实力,以求苟安。当日寇侵占平、津,沿津浦线直

趋而下时，韩不思抗敌，反而密派代表与敌酋接洽，希图妥协，无奈敌军要以韩宣布山东独立，充当汉奸为妥协条件。而韩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以达其保有实力之目的，并不愿当汉奸，由于双方谈判距离太大，当然也就无法谈得拢了。但是，敌人已看透了韩的心思，总还是寄希望于韩当汉奸，而并不欲逼其抗战，因此，津北段的日军迟迟没有过黄河，等待韩的叛变。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视战争势态而随时准备入川。此时驻在山东的韩复榘仍然稳坐城头，对日军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致使敌寇恼羞成怒，于12月23日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迫近济南。蒋介石在武汉得知后，发出十万火急电报，命令韩复榘"不得放弃济南"。而韩对蒋的命令置若罔闻，竟率10万人马弃城而走。日军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长驱直入，济南就这样沦入敌手。当韩退至泰安时，蒋又急电其"死守泰安"。而韩已经到达济宁了，泰安于31日陷入敌手。次年元月5日，日军又攻陷济宁。以致津浦线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敌军如人无人之境。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命令韩复榘不要把后方置于第五战区范围之外，韩哪里听得进去，回电声称："现在全国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闻后大为恼火，又电令他"扼守泰安"。韩回电申明"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韩复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撤再撤，不听调遣。其眷属及家私早已运往豫西，军需物资亦正向南阳运送。到1938年初，韩的大部人马已撤至鲁西南与河南交界的各县一带了。

韩复榘视军令如儿戏，因此得罪了李宗仁和蒋介石；而且蒋又得到密报，知晓韩复榘企图搞反对他的三角同盟。在此之前，国民党重庆密电检译所还破译了日本驻济南总领事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大意是：本人最近访问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问韩："一旦中央军退入山东，贵主席将如何处理？"韩答："当迎头痛击。"这份情报是蒋介石下决心除掉韩复榘的主要罪证之一。

1938年元月10日，蒋介石由汉口来到河南开封。次日主持召开了有45名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机关算尽的韩复榘对蒋介石早有防

范，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会利用召开军事会议对他下手。果然，蒋在会议中下达了逮捕韩复榘的命令，并连夜由戴笠、龚仙舫带大批宪兵、特务将韩押解到武昌平阅路（今彭刘杨路）30号楼上，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羁押。

19日，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组织高级军法会审，以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濬为审判官。24日晚7时，有两名特务走进押解韩的楼上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韩随二特务刚至楼梯上，看到院内布满全副武装的宪兵，他已预感到情况不妙，遂借口回房换鞋并转过身去，特务随即向他开枪，韩当即身中数弹，命归黄泉。

（萧志华）

洪帮"寨主"杨庆山

四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人，对于"寨主"这一名词大多不甚了了；即使有些了解，也是从武侠小说或曲艺戏剧中知道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寨主"就是占据山林、独霸一方、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简言之，就是土匪头子。谁也没有料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现代化城市武汉，在解放前就有不少的"寨主"占"山"为王。他们占的"山"既无花草树木，又无怪石流水，他们的"山"实际上是帮会组织的"山头"，是他们称霸的地盘，抖狠的势力范围。在这众多的"寨主"中，最凶狠最有权势的就是"栖霞山"、"太华山"的"寨主"，国民党的"少将"杨庆山。

杨庆山又名杨震，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黄陂横店镇，父亲是皮匠，在汉口华景街（今华清街）一带谋 生。杨庆山虽然跟父亲学会了绱鞋手艺，但却不安本分。跟当地地痞流氓学会了拉帮结派、偷鸡摸狗、一拍二诈三丢手 那一套。时常呼朋引类，自称"英雄好汉"。

当时在武汉，洪帮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帮会组织，1907年杨庆山经人介绍，加入了"栖霞山"，成为洪帮大爷文志广 的"兄弟"。

民国初年，洪帮"开山"、"设堂"，由秘密转向公开。杨庆山由"栖霞

山"跳到当时势力颇大的"太华山",投靠大爷黄子丹。杨庆山当时在洪帮地位很低,是个典型的"浑水"(即什么坏事都干),他偷盗奸淫,欺弱助强,强买强卖,无恶不作。

1924 年,杨庆山"开码头"到上海,拜在清帮头子张啸林名下,又入了清帮,进而结识了上海"闻人"清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杨虎。

1926 年蒋介石到达上海,他利用清、洪帮这股势力镇压工人革命运动,黄、杜等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杨庆山也成了"江汉闻人"。1927 年杨庆山当上了上海禁烟局吴淞口检查所所长,他利用权势,篡了文志广、黄子丹的位,当了"栖霞山"、"太华山"的"寨主。"

1930 年,何成浚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时,杨庆山爬上了绥靖公署侦缉处"少将处长"的宝座,当了国民党的"将军"。后来又当了行政院某部"专员"。说来好笑,堂堂的"将军""专员"每天还要拿笔练字,他不学"柳体","颜体",而是专门写"杨震"、"行"、"可""照准"、"承准"等字,以便在国民党的官样公文或报告上签字画行。

杨庆山虽然"从军"、"参政",但对洪帮"事业"仍然抓得很紧。1930—1938 年,他在武汉大开山堂,广收兄弟,杨的"兄弟"遍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工商、文化各界,权势显赫,1934 年他母亲死了,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都送了挽联,气派之大,令人瞠目。

1938 年武汉沦陷前夕,杨庆山携带娇妻美妾逃往重庆,他在重庆照样开堂,当"寨主"。还当了国民党财政部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对日寇未发一枪的"国府要员",却回武汉大发"劫"收财。他"劫"收了汉口黄兴路天福里二号一幢三层楼房作为自己的"公馆"。他在公馆中设置"经堂"。每日还要抽空诵经拜佛以修来生。

杨庆山知道光有"寨主"头衔没有官职办事不方便,所以他从来不放弃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的职位。他回汉口不久,就当了"中华海员工会汉口分会"理事长、"汉口市善堂整理委员会"理事长、"汉口市商会"常务监事、"汉口市参议会"参议员,后来还当了"国大"代表。

武汉即将解放时，杨虎山再次逃难重庆，并在重庆搞"洪门弟兄反共大游行"，后见大势已去，便逃到綦县青城山出家当了"道士"，妄图逃脱人民法网。1950年被重庆人民公安机关逮捕押解武汉。1953年10月13日判处死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商若冰）

王世杰不怕挖祖坟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首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众多职务，在现代法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方面卓有建树。

1929年3月，王世杰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之命，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正式校长，当时，武汉大学正处于筹建初步阶段，珞珈山新校址虽已勘定，但还是满目疮痍的荒山，乱石成堆，杂草丛生，各项事业百端待举。王世杰莅任之初，就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应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具备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大学"，决心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规模宏大，十年后学生可达万人的大学"。

但是，当施工队伍开进工地平土打基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陡然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恶浪，湖北省政府先以所谓"占用民地过多"为由发来紧急公文，后又附和"破坏坟地抛尸暴骨"的无理取闹，要求武大"尊重民意"，立即停止新校舍建筑工程的施工。省议员程国藩等人一面联名向南京政府控告，一面带人闯进武昌东厂口王世杰的校长办公室捣乱，还接二连三地聚众示威、大搞游行请愿，大发宣言传单，闹得满城风雨。暗地里，他们又从邮局成包成堆地给王世杰寄恐吓信，扬言他胆敢侵犯他们的坟地，开山建校，他们就要和他拼命，并声称要到崇阳乡下去挖他的祖坟，企图逼他让步。

面对这股邪恶势力，王世杰毫不畏惧，从容镇定，每天照常往返上

下班，并多次到新校舍建筑工地鼓励所有参加施工的人员："无论外界形势怎样恶劣，我们的建校决心绝不稍有动摇，建校工程，也决不能稍有停顿"。对于从崇阳老家跑进省城相劝的一些好心的族人，王世杰表示：建设武汉大学，"这是我对国家百年大计的贡献，也是对培育了我的故乡父老兄弟的最有意义的报答。为此而作出任何重大牺牲，我都心甘情愿，绝不后悔。祖坟被挖了，照样可以修复，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想用这种恐吓手段把我吓倒，绝对办不到"。另一方面，王世杰积极寻求南京政府的支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有关坟主分别疏通，对症下药，进行细致耐心的说服动员和实事求是的具体帮助，从而消除了纠纷，平息了这场建校风波。其后，一向难以说话的坟主如安徽会馆等带头迁坟，武汉大学得以在三、四年时间内建成，所谓到崇阳乡下去挖他祖坟的事，终未发生。

（朱务本）

吴国桢照相馆结姻缘

吴国桢，字叔贤，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生于湖北建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汉口市烟酒事务局局长、土地局局长、财政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职。1953年辞职移居美国，1984年6月6日病故。他是民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而这，又与其夫人黄卓群对他事业上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关于他同黄卓群女士的结合，说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是1928年间的事情，当时吴国桢26岁，担任汉口市财政局局长。有一天，独自一人在街上行走的吴国桢，不知不觉来到一家照相馆门前，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相馆门前橱窗里陈列的相片，这一看不打紧，吴国桢觉得眼前一亮，腿象生了根一样钉在那里，半天也舍不得离去。

原来，这家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这少女的眼睛秋波流慧，十分动人；其神态风姿绰约，妩媚自然。相比之下，旁边陈列着的当时以饰荡妇娇娃而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相片则未免有些矫揉造作。仕途上正春风得意而爱情上尚一无所获的吴国桢，强烈地感到这少女正是自己要找的意中人，他一头闯进照相馆，向职员打听，方知这位少女是汉阳铁厂厂长黄金涛先生的长女，名曰黄卓群，那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这相片是她放假回汉时所照，被相馆私下加印放大，陈列于橱窗内，以招徕顾客的。

回到家里，吴国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同其兄长吴国柄谈起此事，问他是否认识黄金涛。那时，吴国柄任汉口市政府参事，负责中山公园等市政建设工作，因业务关系与黄金涛相识。吴国桢闻之大喜过望，再三央求其兄为之作媒 。黄金涛知道吴国桢曾留学美国，又年少有为，有此财政局长作乘龙快婿，也不辱没黄家门楣，故吴国柄一说，便点头应允。

眨眼又到了放假的时刻。趁黄卓群回汉之际，吴国柄夫妇在汉口美国海军青年会欢宴黄金涛一家，邀吴国桢作陪。在宴会上，吴国桢亲见黄小姐，惊为天人；她那口流畅的英语，更令吴国桢赞叹不已。由此两人便一见钟情，1930 年春结为眷属，当时的汉口市市长刘文岛破例为这位颇有才干的部下证婚。

（朱务本）

《俄华词典》与陈昌浩

您知道吗？原苏联的第一部《俄华辞典》是武汉人士领导编纂的。

在汉阳读初中的时候，学友胡大昇送我一本袖珍《俄华辞典》，我爱不释手，经常翻阅。但当时年幼，对它的主要编著者陈昌浩一无所知。辞典后面 有俄、华文地名对照表。表中不仅有武汉，还列有武昌、汉阳、汉口这样的小地名，凭直觉我猜测这编辞典的人一定与武汉有关。及到长

大，懂得的事情多了，这才知道，《俄华辞典》的编 者陈昌浩不仅确是武汉人，而且是我的汉阳同乡。

陈昌浩(1906—1967)是汉阳县人。1926 年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国共青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把他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为他日后成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翻译家奠定了基础。1930 年回国，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1 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地区成立时，年仅 25 岁的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他参加过长征，到陕北后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失败后返回陕北，1939 年到苏联养病。

1943—1952 年他在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了大量俄文书籍，在他的主持下，几位苏联人士一起编著《俄华辞典》。这部辞典是十月革命后在苏联编辑的第一部《俄华辞典》，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俄华辞典》。这部辞典首先是供苏联读者研究中文和从事翻译之用，同时也可供中国人在研究俄文和阅读俄文书报时利用。编著者们在《序》中肯定了陈昌浩的巨大功绩："在陈昌浩同志领导下工作的编著者同人，认为必须对陈昌浩同志表示深刻感谢，因为本辞典内极大部分是他编著的，若没他参加这一工作，本辞典是不会迅速出版问世的。"这部辞典于 1951 年由苏联国立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1953 年由北京的时代出版社修订出版。修订本序言肯定了这部辞典的作用："现时已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俄文的高潮，大家都感觉到工具书不够，陈昌浩等同志编著，由苏联国立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的的俄华辞典，在目前我国各种俄华文辞典中，可说是一部选材精湛、注释新颖的辞典，它对于我国学习俄文和作翻译工作的同志们给了很大的帮助"。

这部辞典一版再版，到 1959 年 5 月第 8 次印刷时，印数累计达 37 万余册。《俄华辞典》的出版，对中俄文化的交流，增进中俄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我们作为陈昌浩的同乡也感 到荣耀。

(严昌洪)

陈时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中华大学是我国学府中第一所私立大学，由著名教育家、爱国者陈时于1912年在武昌创办。

陈时号叔澄(1891—1953)，湖北黄陂人。其父陈宣恺系前清举人、进士。陈时是他的第三个儿子。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陈时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先后在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东京宏文学院学习。

陈时在日本留学时，对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十分崇敬。他坚信"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立下了教育救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

1911年春，陈时回国不久，参加武昌起义，为实现其振兴中华的愿望，欣然毁家兴学。陈家先后捐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籍3000余部，趁辛亥革命鼎新之机，为取"振兴中华"之意，将学校命名为中华大学。并从许多方面汲取福泽谕吉兴办庆应大学的经验。

非常有趣，庆应大学和中华大学，福泽谕吉和陈时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

庆应大学在日本是最早的私立大学，中华大学在中国是最早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培养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中华大学为祖国、为社会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广大校友散居长城内外、海峡两岸、欧美各国、东南亚等地区；庆应大学设大学、中学和小学，中华大学亦然；福泽谕吉终生不从政，致力于教育事业，陈时亦是官禄不动其心。黎元洪、萧耀南等各个时期的当权人物有的想拉拢陈时，有的想收买中华大学，陈时始终坚守中华校园，强撑苦斗，惨淡经营。陈时在中华大学20周年纪念特刊上撰文：

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

痛呼天；每逢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算到艰谋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仔苦茹辛向前进！

陈时将毕生精力和家中财富倾注在中华大学的教育事业上，陈时与中华大学血肉相连，可算一位清苦的教育家。

中华大学制定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在该校先后任教的有施洋、黄侃、刘博平、黄焯、刘凤章、邹昌炽、艾毓英、成序庠、鲁润玖、夏维海、胡伊默等。同时还聘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四光、泰戈尔，杜威等中外思想家、学者到学校讲学。

值得提到的，抗战时，武汉转进前，与陈时颇有私交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于1938年曾密函陈时，劝陈留在武汉不走，共建"东亚共荣圈"，旨在拖陈下水，为日本在华中充当如周作人在华北扮演的文化汉奸。在大是大非上，陈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义无反顾，断然拒绝了重光葵的劝诱。克服重重困难，举校迁往重庆，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吴先铭）

郭沫若与第三厅

在武昌昙华林、风景秀丽的凤凰山下，有一所占地面积130亩左右、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的学校，这就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武汉市第十四中。抗战初期，这里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机关所在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史学家郭沫若等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

上海、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党政机关要员与各党各派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各地流亡青年云集江城，武汉已成为事实上的抗战军事和政治中心。1938年1月9日，应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陈诚的邀请，数月前刚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也携夫人于立群由广州到武汉。

当时，郭沫若不知道陈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到汉以后才得悉是蒋

介石决定军委会内恢复设置政治部，已钦定其亲信陈诚为部长，拟请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任副部长，下属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则由在文化界声望很高的郭沫若来担任厅长。对此，疾恶如仇的郭沫若不愿履任。他向周恩来申述理由道："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而"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周恩来听完郭的话后，向郭强调了三厅工作的重要性，劝他"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并坦率地表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蒋介石、陈诚等人的本意不过是要郭沫若做个挂名的厅长，而实权则想派复兴社干将刘健群来执掌。2月6日，陈诚在事先根本不同各位副部长及三厅厅长郭沫若商量的情况下，突然于部务会议上宣布刘为副厅长。蒋、陈的这一阴谋，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坚决抵制。郭沫若于会后即愤而去职，出走长沙，这一来，三厅陷于难产。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不得不作出让步，撤走刘健群，陈诚并表示"一切事情可以商量"。这样郭沫若始在3月1日又回到武汉。当天晚上，郭即向陈诚提出：三厅的工作计划、人事安排与经费预算，必须由"我们提出"。迫于形势，陈诚只好一一表示同意。

1938年4月1日，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宣告成立。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主任秘书阳翰笙，傅抱石、钱远铎等任秘书。

三厅下设五、六、七共3个处，每处设3个科，编制定员300多人，胡愈之、田汉、张志让、洪深、郑用之、冯乃超等任各处处长和科长，另外，三厅还附属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一个孩子剧团，一个漫画宣传队、一个电影制片厂和5个电影放映队。总计有2500人左右。

三厅成立后，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在武汉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原来死气沉沉的武汉顿时成为抗日热潮空前高涨之地和全国抗日救亡

运动的中心。

1938年10月21日，武汉沦陷前夕，三厅的工作人员离汉疏散到长沙，郭沫若在送别他们之后仍留在武汉，坚持战斗到10月25日，才在隆隆的炮声中和胡愈之一起乘船离开武汉。

（朱务本）

“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在湖北罗田县，有一座普通的坟墓，但其墓门上镌刻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题辞：“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在这里安息着的被称作“国宝”、“人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湖北著名地方史志学者王葆心。

王葆心（1864—1944），字季芗，号晦堂居士，罗田人。早年入黄州书院、两湖书院肄业。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举。清末历任罗田义川书院院长、两湖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学部主事、礼部郎中。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图书馆总纂。1922年居武昌，历任武昌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北省立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总纂等职。

王葆心潜心研究湖北地方史志，著述颇丰。与武汉有关的著作有《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汉口丛谈》是清嘉庆、道光年间寓汉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范锴所著笔记，所记多为武汉掌故。王葆心是什么时候为《汉口丛谈》写续书呢？《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根据王葆心之子王夔武1933年所写《为〈汉口丛谈〉跋》指出：“民国十八年，周贞亮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曾将此复校钞本（按指《汉口丛谈》）示王葆心，王氏‘览而善之，欲为付刊未果’。后来王葆心从徐星槎处得此钞本，又命其子王夔武‘写一副本藏之’，并‘应新闻社之请，敷陈楚故，即广是书之旨，成《续谈》、《再续》二种，携之鄂中。’”从前言

中"后来"二字看来，王葆心从徐焕斗（星槎）处得《汉口丛谈》钞本，并写《续谈》、《再续》二种书，当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的事。其实不然，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的开场白后面注明系"丙辰"(1916)秋仲所作。《汉口丛谈校释》前言把王夔武跋中"先是"当作了"后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的原因，除了"应新闻社之请、敷陈楚故，即广是书之旨"外，还为了效"范、黄并时之唱和"。范锴当年写《汉口丛谈》时，有安徽歙县人黄承增（心盦）"相与兴往情来，翱翔坛坫，《汉口漫志》与之并作。"王葆心对文坛上这种"休明鼓吹，双管并鸣"的风气销歇甚久颇有感慨。1915年，徐焕斗的《汉口小志》出版，王葆心读后，乃决定写《续汉口丛谈》与之唱和。

王葆心认为记述汉口历史的书太少，因此，采用了《汉口丛谈》的体例，于"见今"外，"述古旧尤详"，举凡武汉旧典轶闻，就所绎知皆予综述，"用诏后生，聊补缺佚"。他指出自己的书与范锴的书不同之处在于："范君生盛世，意主发抒性情；我生值危乱，志在网罗放失，故范书爱文藻，此作重见闻"。

《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与《汉口丛谈》一起于1933年由武昌益善书局印行。王氏两书广搜逸闻遗事，对武汉地区历史、山川、灾异、人物、文献等莫不抄引转述，是今人了解武汉掌故的重要史料。

（严昌洪）

熊廷弼巧帮冯梦龙

熊廷弼与冯梦龙，一位是威震辽东的武将，一位是名传江南的文人，他们之间却有师生之谊。熊廷弼巧帮冯梦龙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仍能获得教益。

熊廷弼(1569—1625)原籍南昌，寄籍江夏（今武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任江南督学，试卷全部亲自批阅。阅卷时将几条长

凳连接起来，把试卷一字儿鳞摊于长凳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朱笔，一目数行，每当读得佳作，则用大酒樽痛饮，以表达心中喜悦之情；若遇荒谬劣作，则舞剑一回，以抒胸中郁气。凡有高才，无一遗漏地拔擢出关。

冯梦龙(1574—1646)为吴下才子，亦出自熊廷弼门下。梦龙为通俗文学作家，所撰《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曾在青年人中风靡一时，甚至有因斗叶子(赌博)致倾家荡产者。那些青年的父兄认为冯为教唆者，群起攻之，并告到官府，使冯梦龙面临纠缠不清的诉讼。

当时正值熊廷弼罢职在家，冯梦龙乘船沿长江西上，到江夏来向老师求援。二人相见寒喧之后，熊突然问道："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小曲，你带了一、两本送我吗？"冯十分尴尬，不敢正面回答，连声责备自己，然后道出了不远千里来求援之意。熊廷弼说："这事不难办，不必耽心。先吃饭，容我慢慢想办法。"一会儿饭菜上桌，仅枯鱼、焦腐两碟，粟饭一盆，冯梦龙见此简陋饭菜，面露难色。熊廷弼对他说："晨选嘉肴，夕谋精粲，你们吴下书生大多如此，像这样的饭菜当然是不可以款待你的，然而大丈夫处世，不应对饮食要求太高，能够饱餐粗粝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说罢自己带头大口吃起来，冯梦龙吃了一点表示意思。饭后，熊廷弼交给他一封信，嘱他顺道转交给熊的一位好朋友，求援之事，只字不提，临走时抱了个大冬瓜相赠。瓜重数十斤，冯梦龙弯腰接住，心里很不高兴。他抱不动那么重的瓜，还未走到船上，便把瓜扔了，上船鼓棹而去。

船行数日，在一个大镇停泊，熊廷弼的老朋友就住在那里。投书进去不久，主人即亲来船上拜会冯梦龙，并把他请到家中，华筵奇肴，妙妓清歌，盛情款待。散席后，主人向冯梦龙深深一揖，说道："先生文章霞焕，才辩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颈企踵，欲一睹先生丰采。今有幸得先生亲降寒舍，是天助鄙人，乃三生有缘。但念吴头楚尾，两地相距遥远，简陋寒舍也不可能长久留住先生。现备有一份薄礼，以赠先生从人，望勿推辞。"冯梦龙不解其故，婉谢而别，回到船上，则见白银300两早已

送至舟中。冯梦龙回到家里，方知熊廷弼已致书当道，被告之事刚被撤销。

对于熊廷弼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冯梦龙，曾有人评论说："盖熊公心爱犹龙(按：冯梦龙字)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穷，则假途以厚济之，怨谤之集，则移书以潜消之。英雄举动，其不令人易测如此。"

(严锴)

江夏书画家趣闻

江夏(今武昌)著名书画家除了明代画状元吴伟 以外，在他前面还有梅行思、黄休复、李康年等人。

梅行思，《图绘宝鉴》又作梅再思。五代南唐时人。在李后主(961—975)时曾充翰林待诏。善画人物、牛马，而最工于鸡，并以此知名，世称曰"梅家鸡"。他所画的斗鸡最精彩，其赴敌之状，昂然而来，耸然而待，鬃毛怒瘿，莫不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再看他画的闲暇之鸡，觅食饮啄，雌雄相随，众鸡雏散漫奔跑，呼食助叫，态度有余，真是维妙维肖，人见人爱。据说天下最著名的一幅鸡画，是陈康肃家收藏的一轴《笼鸡》，一笼之中，神态各异，号为神绝。其所画人物，有《十才子》、《河岳精灵》、《举人过关》、《谢女咏梅》、《寇鲍骑牛》等图传世。

黄休复，字归本，宋人，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前后在世。自幼攻读经史，通《春秋》之学，曾校《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善画人物，留心顾(恺之)陆(探微)之艺，深得其趣旨。家贫，常鬻画养亲，行达于世，恬淡无争。能文，著 有《苑亭客话》十卷、《益州名画录》两卷行世，后者于1006年(景德三年)成书，李畋为之序。

李康年，宋代大书法家，字乐道，约与苏轼同时代。好古博学，至白首仍心醉六经古学，黄庭坚谓其"所著书章程句断，绝不类今时诸生，身屈子万夫之下而心亨于江湖之上。"其书小篆尤精，晚年可描篆，下笔自

可意，直木曲铁，得之自然，连秦丞相李斯、唐少监李阳冰的水平也相去甚远。李康年在其父母忌日，用小篆工整地书写了一部《般若心经》，为其亲追福。他请苏轼为之跋尾，颇得好评。

奚仲瑛与他的哥哥奚伯瑄以学行显于时，但是书画家人名词典中不见著录，仅陈诗《湖北旧闻录》录有其事。奚仲瑛之父隐居种竹，父死后，奚仲瑛画了一幅《竹隐图》以申孝思。丁鹤年《题竹隐图》诗云："昔有君子，隐居种竹。载笥著书，垂竿钓玉。委顺暮年，孰继芳躅。二子秀发，郁若沧浪。文章云锦，节操冰霜。图诸座右，庶几夔襄。"

（严锴）

"江夏画派"的鼻祖
——"画状元"吴伟

吴伟（1459—1508）是明代江夏（今武昌）籍画家，字士英，一作世英，号鲁夫，更字次翁，又号小仙。自幼失怙恃，龆龄流落海虞（今江苏常熟），被布政使钱昕收养于家，陪伴其子读书。吴伟经常偷偷地玩弄笔墨，学画山水人物。有一次作小画一幅，在画上题字曰："白头一老子，骑驴去饮水。岸上蹄踏踏，水中嘴对嘴。"当时才7岁。钱昕见画，十分惊奇，便问他："你想做画工吗？"吴伟点头称是，钱昕立即拿了许多好笔好纸给他，并在生活上给与优厚的待遇，以培养他成材。传说吴伟幼时曾戏为师母画肖像，老师知道了，大发雷霆，把他臭骂一顿，画像当然被收缴去了。后来师母去世，老师想画下夫人的像作为纪念，谁知画了多少张都不像，最后竟用吴伟所绘的肖像供奉堂上。

弱冠之年，吴伟到了金陵（今南京）。虽未拜师而所画山水人物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画名日起，明成化年间，成国公朱某延至幕下。一见面即以"小仙"呼之，因以为号。宪宗皇帝召至京城，授锦衣镇抚，供奉仁智殿。吴伟性格戇直，有气岸而豪放，好剧饮狎妓。有人想要得到吴伟的画，那么请载酒携妓前往，一定能如愿以偿。一天，吴伟喝得酩酊大醉，

突然被皇帝召见，只得蓬首垢面，踉踉跄跄前行，由中官扶持入殿，向皇帝行礼，宪宗见状大笑，命他速作一幅松泉图。吴伟下跪时不慎弄翻墨汁，便信手涂抹，一会功夫画成，只见苍松挺拔，清泉潺潺，风云生屏幛间，颇得自然之趣，周围人看了，无不露出钦佩的神色，宪宗感叹道："真仙人也。"

吴伟出入宫廷，奴视权贵，一些人求画又多不给，于是得罪了不少权势人物，他们在皇帝面前常常揭其短处，终于被放归金陵。明孝宗即位后，再次被召入宫中，奉命作画，得到皇帝嘉奖，授锦衣卫百户，并赐"画状元"印章。两年后因病乞归，居金陵秦淮河之东岸。

吴伟画人物出自吴道子，纵笔不甚经意，而奇逸潇洒动人。画山水树石均作斧劈皴，现藏故宫博物馆的《灞桥风雪图》为其代表作。他的画宜作祠壁屏幛。曾游山西杏花村，剧饮后口渴难当，向一老妪讨了一杯茶喝。第二年再过杏花村，好心的老妪已去世了，吴伟挥笔追写其像，聊表怀念之情。老妪之子看见母亲遗容，栩栩如生，不觉悲从中来，抚画大哭，向吴伟求得肖像珍藏，千恩万谢。还有一次，吴伟在友人家宴饮，酒酣作画，戏取莲房（莲蓬）蘸上墨汁，在纸上印下几处圆形的墨痕。众人皆不知他的用意，正纳闷间，只见吴伟忽地站起，纵笔挥洒，立成一幅捕蟹图，非常神妙，赢得一片喝彩声。

孝宗喜欢马（远）、夏（珪）画风，而画院中戴进、吴伟均承马、夏，成为一时风尚，号为"浙派"（马远、夏珪均为宋时浙江钱塘人）。吴伟不忘祖籍，又自号"江夏派"。以后师吴伟画法者日多，江夏画派逐渐壮大，浙派渐归渐灭。

1508年6月（正德三年五月），明武宗遣使召见。吴伟剧饮之习未改，使者到后，仍沉湎酒色，尚未出发，便中酒而死，时年50。

（严谱）

闵呆子为啖牛脯而作画

闵贞，字正斋，是清代汉口有名的画家。祖籍南昌，祖父时始迁汉

口，故又作汉阳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对双亲苦苦的思念无法排解，到处请人为父母画遗容而均不像。他于是刻苦学习绘画，以写真传神为其追求的目标，数年之后，终于达到维妙维肖的境界。偶于市中见一妪酷似其母，即延至家款留数日，摹其形于绢素；又见一叟有似其父，亦请来画像。他把画的像给人们看，有认识其父母者都夸他画得极像。他便恭恭敬敬地装裱起来，悬于家中画室，早晚焚香，并率妻、子同拜，每餐饭必祭父母，数十年如一日，人称"闵孝子"。由于他整天悠悠忽忽，非狂非痴，有些人又喊他"闵骇子"，犹今人之称为"呆子"。一时间其知名度大大提高了。

闵贞晚年工粗笔山水，学习陈洪绶（明代画家）技法能够做到点墨成趣。画人物，笔墨奇纵，衣纹随意转折，豪迈绝伦；画仕女善作直笔勾勒，越是远看越妍丽，其白描罗汉几欲乱李公麟（宋代画家）之真。篆刻专宗秦汉，得当时名家器重。

他在生活中有个嗜好，即特别喜欢吃牛脯。有的人向他求画被他婉言拒绝后，就总是先偷偷煮好牛肉，加许多佐料，弄得香气扑鼻。然后把闵贞邀至家中，闲谈中闵贞闻到牛脯香，就垂涎三尺，故意问是什么这样香。于是主人便留吃饭，谎称牛肉未熟，同时拿出白纸砚墨请他作画。这时闵贞一定欣然挥毫，洒洒数幅，每到得意处，竟忘记牛肉熟了没有。

闵贞交游甚广。清乾隆年间到北京游历，作《丰瑞图》、《奉馔图》等，一些名家亦乐为其画题咏。时值西藏宗教领袖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晋京朝觐，皇帝命为其画像，如意馆的供奉画家们所画之像无一得其仿佛者。大司空金某推荐了闵贞，闵贞到班禅下榻的嵩祝寺为其画像。刚一画到眼睛，班禅的随行人员第巴班等都惊叹画得像极了，十分传神。画像完成后，得到朝廷白金、文绮的赏赐，名声更大了。

闵贞家住汉口大通巷后面，他从北京回来后，新筑小楼一栋，题名"看山读画楼"。白天宾朋满座，宴饮嬉游，夜晚则叫仆人磨墨预备，楼中高烧银烛，四壁皆挂灯，照得满屋雪亮。桌上置有果盒、茶壶等，闵贞则倚胡床假寐，睡醒一觉起来，马上提笔作画，精神倍增，所作画则特别来

神。

（严昌洪）

美术家的摇篮——武昌艺专

华中地区唯一的高等美术学府——湖北美术学院，拥有绘画系、工业设计系、环境艺术系、美术师范系和中专部、卫星电视美术教育部等四系二部，共十三个专业。此外，每年还招收中国画、油画、雕塑、中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工业美术的染织、装璜等专业的硕士生。但是，七十余年前，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专建校时，却是个仅有 4 间民房，两个班 14 名学生的私立学校。

1920 年，蒋兰圃、唐义精先生在武昌芝麻岭创办了武昌美术学校，后迁址武昌水陆街新校舍，改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唐义精系武昌县金口镇人，始任该校教务主任，后任校长。经过他四处奔走，多方筹款，7 年内使简陋的学校发展成拥有新校舍，24 个班 800 多名学生的“艺术之宫”。1928 年艺专请在校兼任诗词课的著名诗人、武汉大学教授闻一多撰写校歌，歌词为：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大江流日夜，　大别龙蛇走。
危楼百尺名黄鹤，　独立江岸碍中流。
河山好，风景幽，　自古有才生三楚。
吾校惨淡经营立，　发扬文化绵悠悠。
舞乐八方，　粉绘千秋。
愿吾侪努力全修，　复兴我伟大民族。

这首歌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谱曲，传唱一时。

由于唐义精的支持，武昌艺专的学生运动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张执一等共产党人以艺专为据点，让“左联”出版《支前》、《江

天》等刊物；田汉等人以该校为依托，演出革命戏剧。学校还创办了文艺刊物《歌笛湖》，成为学生发表进步作品的园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艺专被日机炸毁。唐义精带师生向西迁校，先在宜昌，后到宜都，最后将校址定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坝李家祠堂。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而且还作画义卖，捐款抗日。

1944年3月24日，唐义精与其弟唐一禾由江津赴重庆参加有关美展的会议，因轮船失事，全船400余人全部遇难，唐氏兄弟亦在其中。唐义精是我国著名美术史家，著作有《中国美术史》、《艺术教育》、《湖北画人辑略》等。

抗战胜利后，艺专迁回武昌。解放后，政府接管了该校，经过几次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后，定校名为武汉艺术师范学院、湖北艺术学院。1985年美术分部单独建制，湖北美术学院成立。

建校70余年来，武昌艺专这个美术家的摇篮，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唐一禾、杨立光，金维诺等就是武昌艺专培养出的武汉籍美术人才。

油画家唐--禾，原名义和。先在北平艺专肄业，1927年转入武昌艺专读书至毕业。1929年赴法勤工俭学，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留学5年，作画3000多幅，1934年回国时几经交涉，仅带回部分作品。抗战时任艺专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带领学生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们绘制的抗战宣传画，在当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唐一禾除积极参加抗战宣传外，还坚持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教学和创作。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湖北美术学院出版的《唐一禾画集》里收录了他的《伤兵之友》、《女游击队员》、《穷人》、《村妇》、《胜利与和平》等表达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抗战胜利的信念和对劳动人民的痛苦深切同情的作品。

湖北美术家协会主席、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前湖北艺术学院副院长杨立光先生，1940年毕业于武昌艺专。他擅长油画肖像创作，主要作品有油画《长江大桥》、《马学礼像》、《老妇人像》、《炼铁工人像》及

宣传画《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等等。现在，杨先生还兼任湖北省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正在为美化湖北而奋斗。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亦是武昌艺专的学生。他一直从事着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史论集》就是其代表作。

武昌艺专建校70年来，硕果累累，桃李芬芳。它培养出来的美术专门人才，活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描绘、装点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该校师生有数以千计的作品和设计选送参加全省、全国和国际文化交流及展览，有数百件作品在国内外获奖，亦有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人民大会堂、各地历史纪念馆、博物馆、大型厂矿、工程都有该校师生创作和设计的作品。

（胡永弘）

汉口市警察局长策反内幕

1949年的4、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号角，吓坏了盘踞在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小头目。他们各怀鬼胎，私下活动，各奔前程。

当时，身为国民党政府汉口市警察局长的李经世，更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但并未得到重用而飞黄腾达。直到1943年初，才在湖北省银行当了一名"专员"，被派到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1945年王震将军率领的南下支队一度解放了崇阳大源一带，李经世被俘获。在搜查他的房间时，意外地发现书架上摆了几部马列著作。身为国民党官员，竟学习研究马列著作，这种异常情况引起部队首长的重视。经过深入调查，根据李经世的情况，部队邓政委认定他尚不属于国民党顽固派，于是将他立即释放，还请他出席当地的军民联欢大会，并要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邓政委的厚待使他十分感激，也给他一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年8月，日寇投降，李经世在返回武汉途中经过武昌法泗洲时，又被新四军部队截获，并被当成了国民党特务头目。战士们把他关在一家磨坊内，绑在柱子上。又是那位邓政委认出了他。经李经世说明情况，邓政委立即亲自给他松绑，一如既往以礼相待，并向他分析了抗日胜利后的形势，指明了人民必胜的前途，勉励他下决心摆脱旧影响，好自为之。李经世回到武汉，曾向家人和老友谈瀛（《新湖北日报》副社长）谈起过这两次奇遇。

李经世回汉依然捞官不成，便投入了桂系的怀抱，于1949年当上了汉口市警察局局长。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挥戈南下，武汉面临解放前夜。白崇禧暗里策划，准备撤离武汉。为稳住李经世，白崇禧要他将家眷送往广西桂林安顿。历经沧桑的李经世，早已洞悉白崇禧的用心，当面满口答应，内心却惊恐万分。他对妻子说："白老总要你们到桂林，实质上把你们当人质，如果不去，必定会使他产生怀疑，招来杀身之祸。"夫妻经过密商，决定妻子先把孩子带到桂林，然后找借口离开桂林到重庆姨妈家暂住，到时再由李经世设法去接他们。

李经世送走了家眷，自己则每天到市政府上班，表面上镇静如常，而一踏进家门，便心态毕露，唉声叹气。

李经世的老友谈瀛这时已担任了汉口市政府的参事，他经人介绍，和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的余杰建立了工作关系。谈余两人经过研究，决定尽力争取李经世。

3月的一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李经世收到一封署名"江维汉"的来信，信中写到"邓公太忙，特嘱我转告：鄂南握别，法泗重逢，邓公对你仍时在念中……。是非功过，决于一念，望能鉴往知来，善自选择。"李经世阅信后十分感动，收信当天就去找谈瀛，告之此事。谈马上向余杰作了汇报。这封信正是余杰写的。他听了谈瀛的汇报正准备亲入"虎穴"找李经世时，李却等不及了，他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约"江维汉先生"到某饭店面谈。不久，余杰在弄清了李经世的意图后，即由杨慧闻先生陪同与李经世见了面。经过双方交谈，李经世的疑

虑消除了。从此，李经世投靠人民，走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经过李经世的一系列工作，动员保警大队长胡武一块起义；调整下属分局长人选；教育大多数员警接受党的政策，准备投诚；成立"临时戒严指挥部"维护武汉"真空"时的治安。这样，在解放大军进入市区前全市人心安定，秩序正常。5月16日下午，全市一片欢腾，迎接解放。李经世作为一名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跟武汉一起获得了新生。

（商若冰）

张轸智斗"小诸葛"

解放前的武汉，是国民党新桂系的一统天下，新桂系二号人物、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坐镇武汉。他身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集军政全权于一身，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声势显赫。

1949年的武汉，像一座火药库，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白崇禧眼看大势已去，准备从武汉向南撤退，国民党大小军政官员个个人心惶惶，各找退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在女儿、女婿和旧部的劝说下，迫于当时的形势，接受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方敬之等的意见，准备率部起义。不料事机不密，张轸部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将张轸准备在武昌金口、法泗洲驻地起义的事向白崇禧告了密。因此，白崇禧命令张淦兵团的第七军各师5月10日从江北撤至江南后不再继续南撤，而在贺胜桥以北停留下来，对张轸的亲信部队辛少亭的一二八军采取包围部署。

5月12日下午，白崇禧给在贺胜桥的张轸打电话，通知他13日下午到长官公署开军事会议。那时，第七军李祖霖、刘月鉴两个师的部队对十九兵团部和一二八军正作包围态势，情况紧张。因此，张的部下都不同意他去武昌，认为去了凶多吉少。为了不引起白崇禧的怀疑，张轸毅然于13日清晨，乘吉普车到了武昌，在长官公署面见白崇禧。在一间

警卫森严的客厅里，白把张迎进坐下后，便拿出总参谋长顾祝同的电报给张看："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看完电报后对白崇禧说："我是拥护代总统的，元旦通过河南省参议会的通电叫老蒋下野是拥护李德公（即李宗仁）的表现，为什么到现在反而不相信我呢？至于同共产党发生联系，那是长官让我做的呀！"白接着说："我是相信你的，如不相信你怎么会把电报给你看呢，不过你的部下靠不住，听说最坏的是鲍汝沣和辛少亭。"张又说："鲍汝沣没有人，只有一个亲信的警卫连，他是个空头师长。我回去调他为高参就是了。辛少亭也是个光杆军长，是随我走的，他的师长涂建堂与我关系很近，张玉龙（三一二师师长）是我的外甥，张继烈（三一四师师长）是我侄儿，都是听我的，部队没有什么问题，请长官放心。"白说："我们准备恢复河南省政权，你把师长以上人员都找来开会，商量看谁愿意回去，可以委他兼河南省主席，并兼豫、皖、鄂边区的指挥官。"就这样，双方唇枪舌剑战了几个回合，心里都是明白的，谁也没有说真话。张最后说："要叫他们都来开会，也得留个看门的呀！"白说："你就在我办公室打电话好了，打了电话后今晚请你到我家，给你准备好河南家乡饭吃。"张轸见此情形，知道事情不妙，便趁白和副长官夏威商量其他事情的时候，跟长官公署王参谋长（此人系张轸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说："白长官要扣留我，我得赶快走，他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解大便去了。"说毕，即出了长官公署，先到胡林翼路（现民主路）十九兵团办事处交代了几句话，即驱车直奔金口，脱离了危险。张轸逃回金口正准备起义时，白崇禧又从汉口打来电话，对张轸说："翼三，你还是来武昌吧，千万不要误会。"张回答说："顾墨三要扣留我，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拒不回武昌。

5月14日，张轸派往马鞍山口的部队，遭到三兵团第七军的攻击，张轸打电话质问白崇禧："为什么你要第七军打我们？请命令李本一军长马上将部队调走，否则我们也有四五万人，一定会发生冲突的。"白假惺惺地说："李本一部队是路过你们那里，根本不是打你们的，你们也不

要打，你赶快回武昌，和我一起坐飞机去湖南找颂公（按即程潜）去。”张轸怎肯上当，当即严辞拒绝。以后白又打来3次电话，张轸再也不理他了。

5月15日，张轸率十九兵团1个军、4个师的官兵在贺胜桥金口一线起义，投向人民。张轸跟“小诸葛”白崇禧这场斗智，以白崇禧的失败而告终。一向自命足智多谋的“小诸葛”也终于失算了。

（商若冰）

黄陂三姊妹

黄陂三姊妹指的是50余年前牺牲在反动军阀胡宗铎、陶钧屠刀下的陈兰、陈惠、陈克勤三烈士。

陈兰，原名陈惠兰；陈惠，原名陈惠清；陈克勤，原名陈喜珍。她们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西门桃花庙陈家湾一乡绅之家。陈兰、陈惠的父亲陈蔚林，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曾参加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率先在桃花庙实行减租减息，开仓济贫，并积极支持子女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三姊妹的母亲曾参加黄陂县的放足运动，积极支持黄陂县女子学校的兴办，对子女的学校教育很重视，对她们的婚姻不搞包办。父母的开明、家庭的支持，大革命气氛的熏陶，对陈氏姊妹的正确成长，走上革命之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重要因素。早在1926年陈氏姊妹就读于武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黄陂县木兰中学时，她们即接受革命真理，秘密参加了革命工作。

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有力地推动了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当时，桃花庙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陈兰、陈惠、陈克勤三姊妹便是妇协的发起人。她们走村串乡宣传革命真理，发动农民和妇女反对土豪劣绅和封建礼教。1927年1月，陈氏三姊妹受黄陂县地方党组织派遣和推荐，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大队学习。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陈氏三姊妹经组织

安排回到乡下，与黄陂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坚持地下斗争。她们分头串联农协与妇协保存下来的骨干，想方设法恢复了党组织与黄陂河口、北乡地区党的积极分子的联系。

1928年夏，中共鄂东区委派人来黄陂县整顿党的地下组织，黄陂县立第一小学教师赵怡阶同志出任黄陂县委书记。同年11月，因叛徒出卖，赵怡阶、陈惠、陈克勤等被国民党黄陂县政府逮捕并解送武汉军法处。审讯时，陈惠、陈克勤遵照赵怡阶同志的嘱咐，谎报年龄，结果军法处判决陈惠两姊妹"未成年误入歧途"，转送武昌第一模范监狱感化院，赵则被杀害。

在感化院里，陈惠两姊妹又与监狱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用绝食等手段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秋，因族中长辈、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出面具保获释。不久，陈氏三姊妹投奔洪湖苏区。

1929年冬天，陈氏三姊妹因党的工作需要，被调到武汉参加中共湖北地下组织的整顿恢复工作。1930年冬因叛徒出卖，陈氏三姊妹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军委成员陈华(陈兰丈夫)、长江局从事兵运工作的陈生龙、唐钟书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1月被枪杀于武汉关江边。

(宋务本)

杨永泰被刺案探秘

1935年冬，日本军阀侵华日亟，蒋介石在舆论压力下，不敢公开满足其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但又惮于公开决裂，深感外交问题十分棘手。经过郑重考虑，乃将善于周旋应付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调任外交部长，遗缺调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接充。因杨在行营时专横跋扈，与国民党各派系积怨甚深，只好将其外调，缓冲一下。于是走马换将，张去杨来。其实都是"政学系"当权，换汤不换药。

杨到湖北接任省主席，武汉学生强烈反对。虽然军警当局尽力保

护，接印视事，但爱国青年积愤难消，亲日派嚣张如故，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杨永泰亦因此而丧生。翌年，杨永泰被刺，全国震惊，蒋介石令军警当局限期破案。但幕后主使者及发案时间，言人人殊，极不一致，至今仍有疑问。现虽时隔半个多世纪，事过境迁，不过，雪泥鸿爪，留其一星半点，仍为必要。

关于杨永泰被刺原因，有的说是胡汉民亲信国民党中宣部长刘芦隐所指使；有的说是"复兴社"邓文仪因报复而派人所为；还有的说是"C.C"因权力之争，下令"特一科"（特务处第一科）干的。甚至"湖北王"何成濬也因支持过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而涉嫌。互相猜疑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内部有关领导层彼此怀疑，造成了混乱。最后还是军统局查明此案是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所为。他们纯真赤诚，热血满腔，不满于政治腐败，特别是对亲日派丧权辱国之行径更为痛恨。大家自筹经费，购买枪支，专门刺杀亲日派头目黄郛、张群、杨永泰等人。那天在刺杨现场捕获谭戎轩（化名成燮超），后来又捕获了掩护谭戎轩行刺的龚柏舟。国民党为免扩散影响，令司法机关以普通刑事罪处理。到1938年尚未判决，时值武汉战局紧张，乃将谭等二人押解后方。途中龚柏舟跳水脱逃，生死未卜。谭戎轩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清理积案，谭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而结决了。

关于杨永泰被刺月日，有的说是5月6日，有的说是10月25日。言之者说是亲见，有的甚至是当年的办案人员。谁是谁非莫衷一是。但根据报纸及档案资料，10月25日是确凿的。那天，杨夫妻二人应法国领事之请，过江赴宴，回武昌时，在江汉关差轮码头被刺身亡。为什么会有前者之误呢？因为5月6日那天，武汉发生过一次反日侵华的游行示威。日方提出严重抗议，杨永泰曾到汉口日本总领事馆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时抗日怒潮高涨，此种行径自然受到社会谴责，纷纷诅咒杨永泰"不得好死"。几月以后，杨果然被刺了。记忆上的时间差很可能是因此引起的。

事后，民间流传嵌有杨永泰姓、名、字的对联。横幅："杨子为我"，直

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卿幸已死，民安国泰。"（注：扬永泰字畅卿）

（马德旺）

陈启天与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是一种抹煞阶级本质，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欺骗人民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在中国国内鼓吹国家主义的第一人，就是黄陂人陈启天。

陈启天（1893—1984），字修平，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民军北伐队。1912年秋入武昌中华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别科。1917年在中华大学中学部执教国文。1919年加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毕业后任中华书局编辑，主编《中华教育界》。

1923年12月，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曾琦、李璜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标榜国家主义。同月，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上，陈启天第一个在国内散布国家主义谬论，反对马克思主义。

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相继回国，陈启天、左舜生等会同他们一起，于10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宣称要开展"醒狮运动，就是中国国家主义运动"，故又称作"醒狮派"，这标志着国家主义派的初步形成。

国家主义派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到处宣扬"全民革命"，鼓吹"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是他们所说的"国贼"，并不是指军阀官僚，而是他们所谓的"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外抗强权"，并不是指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指援助中国革命的苏联，"不是即时主张什么反帝国主义"，并且"均照旧遵守"与各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既成条约"。因此，它遭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诸如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严厉批判，也受到所有明白真相的青年人的抵制。

1925年，陈启天正式加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不久当选为中央执委兼训练部主任。1926年6月，陈启天、余家菊应邀来武昌中华大学讲

学。陈在演讲时说："学生该读书救国，读经救国，至于政治上的事，应由极有权威的政府去管，学生不得干预。"他的话还没讲完，就有人高喊：国家主义派勾结军阀投降外国，是卖国贼！有的人并冲上讲台同陈启天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结果在学生中发生了一场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斗殴，陈启天在校方请来的警察及其喽罗的保护下，始得以离开中华大学。

1929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中国青年党。陈启天被选为该党检审委员会委员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左舜生等在上海创办《国论》和《民声周报》，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11月被选为青年党中央常委兼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47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经济部长、工商部长。两年后随国民党去台湾，曾任中国青年党主席等职。

（朱务本）

僧房认子报夫仇

宋时鄂州（今武昌）邑尉吴季谦（愈初）曾破获一起劫盗案，案情离奇，并表现出古代妇女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

有某郡倅（通判）者，携妻儿乘船旅行，谁知船家是江上劫盗。船行至江心，强盗露出本来面目，将郡倅杀死。欲杀郡倅之妻时，发现她颇具姿色，便威胁道："你能从我乎？"该妇女回答说："你如果能依我一事，我也就能依从你。否则快快将我杀死。"强盗问其中原故，妇女从容说道："我事夫十年，到今天已经了结了。惟有我儿，才几个月大，我想将他放到江中漂流，如果有机会被人救去，养育成人，也好让我夫家有传宗接代之人。我然后跟从你，决无怨言。"强盗同意了她的要求。他们用一个黑漆圆盒盛了小儿，盖上襁褓，并放了两片碎银在他身旁，使其随江水流去。

妇女成了强盗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一天，强盗将船停泊在武昌岸边，与其妻一起到某寺庙设供敬神。他们来到僧房放杂物的地方，黑漆圆盒就在那里，妇女一见，认出此物，惊喜和恐惧交织在心头，几乎晕倒。于是她对强盗说："我老毛病发作了，需要在这里休息一下，你出去，不要打扰我。"强盗走后，妇女乘机偷偷问寺中和尚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盒子，和尚告诉她："某年月日在江滨拾得，里面有一婴儿和白银，我收养了他，到处为他求乳食，他已长大，在此有很多年了。"妇女让人把孩子喊来一看，像貌酷肖其父。妇女便将事情的始末详细地告诉了和尚，并说出强盗的住处，请和尚设法报告官府，捉住强盗，为夫报仇。和尚听后，十人感动，立即向邑尉吴季谦密报，邑尉派人一举将强盗捕获，处以极刑。妇女报了夫仇，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到老家去了。

吴季谦呢，因为破了这个案子，很快便得到升迁。

（严昌洪）

两世姻缘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鹦鹉洲受江流冲刷，发生崩陷，露出了一座唐墓，出土了韦皋妻墓志，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因为在此以前，流传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方墓志的出现，证明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湖北旧闻录》引《云溪友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时，四川有位相公名韦皋，到江夏游历，住姜使君家中。姜氏小儿荆宝，已开始学习经书，虽然喊韦皋为兄，但像对长辈一般地尊敬他。荆宝有个婢女叫玉箫，才10岁，姜家让她侍候韦皋的母亲，她亦能勤于应奉。两年后，姜使君进京求官，家眷仍留江夏。韦皋则易居头陀寺。荆宝时常遣玉箫到韦皋处应奉。玉箫年纪稍大些后，两人渐渐产生了恋情。一天，陈常侍得韦皋叔父来信，信中嘱陈立即发遣韦皋回川归觐。陈常侍把信给韦皋看了，赠给他舟楫，让他启程回乡。仍恐其留恋玉箫，滞留不归，请他们不要相见，并将船停在江边，催其速行。韦皋恋恋不舍，含泪写信给荆宝告

别，荆宝接信立刻与玉箫同来，既悲且喜，荆宝叫玉箫跟韦皋去。韦皋以耽误省亲的时间太久，不敢带玉箫同去，于是与荆宝、玉箫约定："少则五载，多则七载，来接玉箫。"并留玉指环一枚和诗一首赠玉箫。5年过去了，韦皋并未回来。玉箫常常到鹦鹉洲上祈祷，祝愿心上人早日归来。又过了两年，到第8年春上，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死。姜氏感于其节操，以玉指环戴在她的中指一同殡葬于鹦鹉洲上。待韦皋再来时，玉箫已不在人世，韦悲痛欲绝，立誓非玉箫不再娶。

如果说，鹦鹉洲韦皋妾墓志的发现证明《云溪友议》所记载的故事并非完全出于杜撰的话，那么，后人关于"两世姻缘"的传说却显得十分荒唐。人们编成戏曲，有《两世姻缘》、《玉环记》、《鹦鹉洲》等，在明清时代多有上演。剧中情节除了以上韦皋、玉箫定情，韦皋失约，玉箫殉情等内容外，还说韦皋后来做了四川节度使，遇到相貌酷似玉箫的箫玉，经朋友撮合，二人结为夫妻。成亲之日发现箫玉手指上长有肉环，与韦赠玉箫的玉环相似，而最巧的是，箫玉的生日即玉箫的死日，说明，箫玉为玉箫的再世。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良好的愿望也许就是人们杜撰"两世姻缘"的动机吧。清叶敬昌《鹦鹉洲玉箫墓》诗写道：

芳草洲边遽绮罗，指环再世受恩多。
西川他日油幢返，曾否香坟酹酒过。

（严昌洪）

黄鹤楼九老诗会

黄鹤楼既为武汉第一大名胜，墨客骚人寓汉者无不题诗记之。从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到毛泽东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清康熙年间黄鹤楼九老诗会却因缺乏记载而鲜为人知。

据王葆心编《再续汉口丛谈》卷一载，康熙某年中秋日，蒋玉渊与孝

感明经高骞(字处厚)、沔阳游士凤(云子)、华容严首昇(平子)、武进毛会建(子霞)等九位老人作九老会于黄鹤楼。《楚风补》上载有严平子当时所作诗一首,诗云:

香山自昔附头陀,聊假偏衫赴栅莎。
序齿嫌予居第一,挥毫怯敌句无多。
云开列岫来黄鹤,月涌遥天漾白波。
却笑仙人曾堕泪,仙人何地不摩挲。

九老诗会赋诗一定很多,惜未得见。他们还准备刻印《清诗选》,而当时清代为时尚不过几十年,就着手为《清诗选》,难怪王葆心说他们"时人爱风雅便如此"。这样规模的老人诗会,且活动比较频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文人集会,悬为厉禁,惟诗会不在禁止之列,故组织诗会者较多。九老诗会合湖南、湖北两省诗人为之,开创两省诗人唱和之风气,此后,湖南、湖北各有两湖诗社的组织出现。乾嘉时,蕲州有两湖七子唱和,而道光中,李星沅等在湘潭又创两湖诗社,有《两湖酬唱集》四卷。两省文事,如此前后不谋而合,盖有黄鹤楼九老诗会之遗风。

当时有一诗人田舜年(号九峰)充容美宣慰使,正在鄂西少数民族地方任职,唱和无人,颇有感触。得知诸先生同集黄鹤楼为九老会,兼有清诗之选,十分羡慕,呈诗九老会云:

遥闻江汉聚耆英,黄鹤楼前杖履轻。
高士旧为三径主,德星近傍九秋明。
方瞳待辨荆山璞,直钓应收渭水璜。
捧袂青云难攀得,渴中长自仰金茎。

田氏又有《寄子霞先生》一首云:

江城风物近时清,为有奇人把袂行。
上客由来令楚重,仙翁端合作韩兄。
优游极浦兰舟远,缥缈高楼玉笛横。
谁道在山为远志,仅从天际望长庚。

从这两首诗中，既可见田九峰文彩之胜概，又可知其好贤之诚切。王葆心说："彼居蛮地，岂今之自诩文明者所解耶。"

（严昌洪）

"莫笑鹆眼石，不换蛾眉人"

有的人对自己心爱的东西千方百计地保护之，有的人喜欢上别人的东西挖空心思去谋取之，于是就出现了下面"巧取"、"豪夺"的故事。

清朝嘉、道年间，安徽歙县人吴美堂在汉口做盐业生意，发了大财。此公有一癖好，即喜欢搜集各种稀奇物件。他用重金购得一方石砚，贮水处有圆形斑点，大如五铢钱，小如芥子，外有晕至千余重，人称鹆鸽（即俗所谓八哥）眼，是砚中珍品，自然视为宝贝。有一次乘船，吴美堂又拿出此砚把玩。讵料遇到大风浪，船翻溺水，等到被人救起时，此公手上仍紧紧握着石砚。可见其珍惜石砚甚于生命。

有山陕商人名安阿三者，亦以富有和豪爽闻名于汉上。他听说吴美堂有一方鹆眼石砚，先请宾客携带厚礼前往求砚，遭到吴美堂的拒绝。后以借观为托词，把砚弄到手，再出重价定要买砚，又被拒绝。于是，安阿三设盛筵款待吴美堂。酒席上安阿三唤出家中六位美姬，指着那位最美丽又会弹琴的女子要求与吴美堂换石砚。吴见安出此一策，要索回石砚是很难的了。他便假装答应，说："请你明天把砚拿出来，等我赋诗与它诀别总该可以了吧。"安阿三非常高兴。

吴美堂回家后，马上找了个大力士做自己的随从，第二天一齐来到安家。安阿三拿出了石砚，吴故意叹息、抚摩，做出舍不得的样子，趁安不防，突然把石砚交给大力士拿走，安阿三追之不及，气得半死。吴大笑着掉头离去。

此事在汉上传为笑谈，黄冈人吴德芝还为这事写了一首题为《砚不换妾行》的诗：

莫笑鹆眼石，　　不换蛾眉人。

我石患难曾同身，　蛾眉虽好来方新，
得新捐故何辜恩。
九宾设次险一掷，　谁知赵璧竟不失。
君仍巫山寻雨云，　我自南宫拜袍笏。
高人嗜好各癖痴，　一事风流两得之。

（严昌洪）

第一支劳动人民的足球队

旧中国的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谋生尚来不及，本无心思打球。然而，世上之事也有例外。

大约在1933年至1936年，硚口的一些平时爱看球赛的人，其中有赶马车的、杀猪的、卖小菜的和跑堂的以及一些小商小贩、店员、小学教员，在人称陈麻线的线铺老板陈绍棠的组织下，成立了"联欢队"。这是武汉第一支劳动人民的足球队。

"赶马车的也配打球?!"

"看杀猪的出洋相啊!"

"联欢队"刚刚诞生，人们就议论纷纷，讪笑、讽刺不绝于耳。但"联欢队"并不畏惧这些风言风语，全队十几个人，团结一致，决心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时间紧张，他们每天干完活计就练球；没有场地，他们就在硚口江边的一些空地踢球。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加上同行伙计们的大力支持，"联欢队"的球艺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一个技术比较熟练的球队。

当时，武汉的足球队伍有两支劲旅，一是省会警局队，一为汉口警局队。队员都是职业的，这两个队霸占着汉口中山公园足球场等场地，"联欢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这两个队不敢直接见仗，都怕踢输了球，保不住饭碗，但又想显露一手，"联欢队"的成立，恰为他们提供了对手。他们认为，对付"联欢队"不在话下，可以稳操胜券；而"联欢队"则认为，

这正是锻炼球技的好机会，输赢无须计较。因此便答应这两个队的邀请，进入中山公园同他们对仗。踢球的时间久了，次数多了，"联欢队"不仅提高了球技，而且摸透了这两个队 的球路。后来，"联欢队"与这两个队都踢成了平局。硚口的球迷们为此大放鞭炮庆贺，并异口同声地称他们为"杠子队"。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联欢队"才被迫解散。

（朱务本据王惊翔《武汉第一个劳动人民的足球队》改写）

武汉的古老书院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所设立的讲学肄业之所。最早的书院可上溯到宋代四大书院，即白鹿、石鼓（一说嵩阳）、应天、岳麓书院。自明以后，书院为习举子业而设，数量愈增。清朝在 1657 年（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立。直省省城所设立的书院，由政府拨给经费，供给师生膏火。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选聘德才兼备足为多士模范的人担任，并不分本省外省和已仕未仕。书院生徒，则用各州县推荐与直省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考核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入院肄业。

武汉的书院较为著名的有江汉、晴川、经心、两湖书院等。

江汉书院

江汉书院系在明代提学葛寅亮的主持下创办的，以江、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原址在武昌文昌门内。清顺治年间定为直省书院，迁至忠孝门内巡道岭（今粮道街武汉中学处）。康熙年间，巡抚陈诜、张连登等次第修葺，巡抚林天擎集多士肄业，捐资供给。雍正中，朝廷赐帑金千两，总督德沛又捐资若干，规模有所扩大。学生主攻功令文、试帖诗，按月官、师二课，官课自总督至武昌知府，每月讲课一次。后江夏县、汉阳

县令亦来讲课。师课则院长每月讲课一次。官课考试有奖金，师课有膏火无奖金。1739年(乾隆四年)曾拓地扩建，内设十贤祠，祀濂溪、二程、横渠、考亭、南轩、陈良、公孙龙、任不齐、赵复等；又有德教祠，祀筹建书院督抚司道及历次输资有功书院者。又有题名碑记，凡诸生中式者，皆镌名其上，以资鼓励。

江汉书院于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武昌时被毁。1862年(同治元年)湖广总督官文和邑绅陈庆溥集资重建。1867年，书院山长雷以諴呈请鄂督李鸿章批准，进行扩建，补修了斋舍，使肄业生员达2400名，课程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宋明先儒著作。次年，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到各府主持考试，将各府诸生才学优秀者送江汉书院肄业，除筹给膏火费外，还捐购经史书籍皮置院中，以便学生们能育习研摩，专务实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已为总督的张之洞根据新形势，对书院进行改章，除传统课程外，又增设天文、地理、算学、兵法等科目。本院分教习多由经心书院分教兼任。1902年并入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

晴川书院与凤山书院

晴川书院是汉阳府所属书院，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建。院址初在汉阳南纪门内。1800年(嘉庆四年)汉阳知府刘斌利用赈济余款购置张姓民宅改建书院，院址遂迁至试院西(今解建路武汉三中处)，"晴川书院"院名亦为刘斌手书。咸丰年间毁于战火。1865年(同治四年)知府钟谦钧率辖属集资重建，成为所属5县生童肄业之所。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汉阳府中学前堂。辛亥革命后一度改名晴川中学。

汉阳凤山书院，原为明代赵蕃、蔡锴读书处，当时名气不大。到清季复建，以古学课士，始有闻于时。后改为汉阳府中学堂后堂。

经心书院

经心书院是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所设。当时他见原有江汉书院规

模太小，不足以容纳多士，乃于1869年（同治八年）商请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在武昌三道街学署别建精舍为课士之所。后改为文昌书院，院址迁火星堂文昌宫（今湖北实验小学后面）。到李瀚章督湖广时始定名经心书院。入院肄业学生由学政在各县诸生中亲自选拔调取。书院宽阔，住宿条件优越。学舍分经、义、治、事四斋，每斋20人，入各一室。课程有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经心书院培养出不少高材生，当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4名高材生因病物故后，张之洞亲自作诗哭悼，称《四生哀》，足见其重视人才。1891年（光绪十七年）湖北前学政赵尚辅等捐廉倡复将经心书院迁回学署右舍（今武汉市警官学校处），更名为经心精舍，规制仍旧。1897年书院改革，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叶瑛、姚炳奎、蒋克武、曹汝川等分任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分教。曾在书院任山长者有李寿镕、谭仲修，曾任监督者有吴兆太、纪相聪、刘鸿烈等人。1902年清廷下令书院改为学堂时，经心精舍与江汉书院一并改为勤成学堂。

两湖书院

湖北书院名气最大者当属两湖书院。张之洞由粤督改任鄂督后，下车伊始，便视察经心、江汉各书院。时值大水之后，经心书院地滨都司湖，水痕犹在，墙字多倾圮；江汉书院屋舍很狭小。经心书院监院诸人趁机报告说："二十年来积学好古之士多出其中"，纷纷请求重修书院。江夏（今武昌）县绅陈庆溥等愿以自己所有的都司湖产业捐入书院。湖南旅汉人士亦请附入肄业。于是定议重修。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张之洞主持下建起了两湖书院。经过培筑基址，修理水道，环湖建有斋舍200间，南斋10栋100间，为湘籍学生所居，以子、丑、寅、卯等为名序；北斋10栋100间，为鄂籍学生所居，以甲、乙、丙、丁等为名序；加设西斋2栋40间，供商籍诸生肄业，以戊、亥名之。开办之初，得茶商捐输，按茶价千分之一提取，每年得银一万余两，以为办学经费。后茶商有烦言，于是裁捐另筹。

1891 年，张之洞札令湖北、湖南两省学使通饬各属，选调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的秀才各 100 名入学，因茶商捐助办学，另收录茶商子弟 40 名。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还可兼习有关科目，另设算学、经济两门为兼习课。每月朔日为官课，望日为分教师课，称“朔课”、“望课”。各课延聘名师分教，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书法家杨守敬、数学家和翻译家华蘅芳、音韵学家沈勇植以及易顺鼎、杨锐、汪康年、姚晋圻、周树模、陈三立、屠寄、邹代钧等名流都曾任教该院。两湖书院不设山长，而设提调一人主管，监院二人副之。后改提调为院长，以梁鼎芬充任，继任者有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每月官、师二课，都严于考核，学生成绩提高很快。1893 年乡试时，该院肄业生中式者达 23 人之多。1896 年仿学堂办法进行改革，月课改为日课，分经、史、舆地、算学四门，后又增设格致、兵法、体操等课。诸生按日上堂听课作笔记，分教按日查斋，严格管理。每学期大考一次，张之洞亲临主持。后改选调制为招考录取制，保证了生源质量。学制 5 年，合格者择优咨送请奖录用，不合格者令其归家。有一部分优秀学生还由官费送出国深造。自立军领导人唐才常、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都曾是两湖书院学生。

1903 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不久又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

钟台书院

除了官办的各种书院外，商业繁盛的汉口还有不少商办书院，既是会馆、公所集议之所，又是商籍子弟读书肄业之处。

汉口钟台书院是咸宁商人的会馆，初名淦川公所（咸宁有淦水河），道光中叶扩建，改名钟台书院（咸宁有钟台山）。1854 年（咸丰四年）毁于兵燹。1868 年（同治七年）旅汉咸宁商人在县绅雷以諴的发动下，集资重修了钟台书院，并购买房地产出租，以租金作常年经费，供给膏火和奖金开支。该书院选拔旅汉商人子弟之俊秀者入学读书。74 岁的雷以諴亲自主讲。书院中供奉咸宁先贤唐李邕、宋冯京和明孟养浩之神主，

岁时祭祀，以笃忠良而励后进。后改为立志中学和钟台小学。今为清芬幼儿园。

（严昌洪）

近代学堂的兴起

武汉地处中原，素为文物之邦。近代以来，新式学堂陆续兴办，文化教育发达。特别是张之洞督鄂后，开办了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

中外互市以后，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张之洞在武昌建立了一所专修商业外语的方言商务学堂，当时把外语称为“方言”。学员以两湖书院40名茶商子弟为基础，扩招至50名，次年6月正式开学。该学堂除外语外，其他课程一仍旧式书院之旧章，当然难以培养学贯中西、通晓洋务的通才。

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将方言商务学堂改为湖北自强学堂。自强学堂初设课程为方言、格致、算学、商务4科。1896年7月，学堂改订章程，保留方言、算学两科，格致、商务停开。方言分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文字，1897年增设日语，共计5科。学制5年，4年在堂学习，1年出国游历。自强学堂是当时湖北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新式高等学堂。1898年自强学堂迁入原农务学堂旧址，改名为方言学堂。

武汉的近代学堂一般习惯分为文武两种，文学堂侧重学习文、理科目，武学堂侧重学习军事知识。1896年8月，张之洞为“储将材而作士气”，在武昌创办了近代第一所武备学堂。学堂聘请了2名德国军人和6名日本军人作为该校的军事教官。学员名额为120人。凡文武学员、贡生、监生、文武候补员弁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皆准报名考录。学堂所设课程为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营阵攻守运动等。此外，还学操枪、操炮、马术、行军、布雷、体操等。该学堂在张之洞的专心经营下，名噪一时，在全国都有相当

的影响。兵部侍郎铁良在视察了各地武备学堂之后指出："武备学堂之规模宏富，条件精详，成材多而功用著者，当以湖北为最"，"是该堂为武才之渊薮"。

为培养各类学堂之教员，1906 年 9 月，张之洞在湖北设立了当时两湖规模最大的官立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该校学制 5 年，课程有修身、读经、中文、官话教育、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化学、博物、手工、音乐、体育等，以经学、教育学为重点。招收范围以湖北学生为主，兼收湖南及四川、浙江学生。毕业后，须在两湖地区的中小学堂服务 3 年。

张之洞督鄂期间，不仅注重开办各类新式学堂，对中小学堂的设立也十分重视。从 1903 年起，他在湖北创立了东南西北中五路小学堂。这些学堂的设立为湖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东路小学的学生。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和驻英大使郭泰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曾是南路小学堂的学生。

武汉早期的近代学堂自创办之后，虽然也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格的考试、录取制度，但和现代学校相比，它在学制、学生年龄、毕业去向等各个方面都不如现代学堂那样规范化。在学制上，学生在堂学习的时间都比较长，如湖北自强学堂学制长达 5 年，有些学堂对学习期限没有明文规定，学习好的可择优录用或资助留学深造，没有找到合适出路的还可以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下去。学生年龄在招生时也放得很宽，年龄大小不受限制。如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学生年长的有五六十岁，年幼的只有十五六岁，父子同堂共读的决非绝无仅有。

从学生待遇看，学生入堂学习后所享受的待遇相当优厚，学生一律公费。如五路小学堂的学生入学之后，除了所用书籍、文具、伙食、灯油之外，还供给有制服、礼帽、靴子（每两个月一双）、卧被、枕席、床帐等，每月还请人替学生洗衣理发。又如文普通中学的学生入学后均在校内膳宿，待遇极优，概不收费。每月朔、望打牙祭，平时三荤三素，住调养室的，另丰荤盛食。入学时，每人发给青宁绸袍套及雀顶帽、兰羽短制服，布质棉服和单制服各一套。棉、夹被各一床。此外，还按月考成绩发给奖

金，超等 8 元、特等 6 元，平等 4 元。在当时，优秀学生每月所得奖金即可赡养家室了。武备学堂的学生甚至每月发给赡家银 4 两。因此，学生们在没有比之更好的出路时，是不愿意轻易离开学堂的。由于学堂对学生的待遇优厚，因此，学生们成为社会上令人羡慕的学生老爷。

（喻枝英）

早期警察及其警务、警风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创建湖北新军之际，率先倡办警政。他认为"警察一事实为吏治之实际，教养之初基，……东西洋各国视为内政之第一大端"，"今日讲求新政，采用西法，此举洵为先务"。

湖北省城原有保甲制度，名义上是为维持地方治安而设，实际上不过为首县办理差役征发之事，地保往往借端需索扰民。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首先在省城武昌裁撤保甲，创办警政，设立武昌警察总局，以武昌知府梁鼎芬、试用知府金鼎总办局务，并由臬司（按察使司）负责督理。在城内分设东、西、南、北、中 5 局，城外分设东、西、水、陆 4 局。酌采外国章程，先募练警察步军 550 名，警察马军 30 名，清道 夫 202 名。从上海雇来曾经当过捕头的英国人珀蓝斯充当警察总目。警察经费除以原有保甲经费充用外，大部分取自房捐。后张之洞又制定了分年裁汰绿营的办法，将所节军饷充警察经费。

说来有趣，当时新募警察 员弁，多为无业游民，不熟悉警章警务。所穿制服，类似衙门里的差役所穿的衣服，每天手执木棒，蹀躞街隅，无一定岗位，无一定专责，既不自重，亦不为人所重视。不但月薪 很低，"俯仰无以自给"，而且一有不合，就遭哨弁（巡逻兵）和专办（警察 分局头目）的笞责。由于草创阶段的警局还包揽了部分市政建设和管理工作，如修理街道、开通沟渠，建造市亭、扫除垃圾、安装路灯等等，主要街道则比较清洁，一些地区的菜亭统一划地建造，使市容稍有改观。

后来，一面陆续派弁目、官员赴日本学习警务，一面自办警察学堂

教练警兵。1904年还对警察总局逐步进行整顿，在门外设立"禀箱"，有递禀文者即行投入，按时取阅；在判事处添设"控铃"，规定遇有来不及具禀紧急情况，就向该处摇铃，局员闻声，随时出审，绝无阻格。湖北开办警察的虚誉一经传出，邻省也以为楷模，安徽在整顿省城警察时，就曾派员来鄂抄取章程作参考。省城武昌的警察已具雏形以后，逐渐推广至汉口及各府县。1907年设置巡警道，专管警察事务。

在清政府反动统治之下，警察并不能起到保护人民，保卫地方的作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所谓"便民"的规章制度渐渐成为一纸具文，警察扰民甚于保甲。《清稗类钞·讥讽类》中抄有一段稗史，说梁鼎芬办理警察，人怨其严，曾相率罢市数日。当时所募警察，无论冬夏，头戴暖帽，红绿绒顶，身穿红号褂，绿袖口，白团心，下著黄色土布裤，一人之身，五色俱备。又仿上海菜场式样，筑屋数楹，晨收小菜捐，午后收洋杂货摊捐，夜收医卜星相捐，所收之捐用于警察经费。有人制作一副联语戏赠梁鼎芬曰："一目不明，开口便成两片；廿头割断，此身应受八刀"，横额为"黄粱一梦"。盖暗寓梁鼎芬姓名而咒之。

1906年汉口盔头巷发生盗窃凶案，为首者正是"执警棍衣警服巍然立于站岗之位次"的警察。1910年(宣统二年)也曾发生汉口警察总局坐办徐传笃"挟妓观剧，恃势寻衅，妄责无辜"，大闹满春戏院的丑闻。敢于执法的警察则遭到打击报复，某局专办为依法惩治一名依附豪贵的赌场主而丢了官。连后任湖广总督瑞澂也承认："所谓保卫商民之巡警，反以扰害商民，扰害商民且不足，复波及于往来行旅"，警察局几成盗匪歹徒"逋逃之薮"。巡警道冯启钧"信用私人，纵容劣弁"，"溺职殃民"，在他的庇护、纵容下，缉捕营管带徐升兄弟父子三人"藉势估恶，肆意横行"，"鱼肉良懦，扰害闾阎"，民愤极大。1908年汉口摊贩群起罢市并捣毁警局的事件，就是警察平日为非作歹所生积怨的总爆发，瑞澂上台后，为平民愤，不得不奏准将冯启钧革职，将徐升等人正法。

(严昌洪)

武汉邮政、电信之始

武汉旧有信行数十家，为人传递信件、交汇银两，颇称稳妥。清朝末年学习西法，创设邮政，信行逐渐被淘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以前，武汉尚无独立的邮政机构，邮政附设于江汉关，称海关"拔驷达"(英文邮局POST的译音)。1897年2月正式成立了汉口邮政总局，原设花楼河街，洋楼数层，规模阔敞。入民国后改设英租界三道街二码头，规模有所扩大。同年在武昌设立邮政分局。截止1920年，汉口有邮政支局8处：硚口、大王庙新街、黄陂街、白布街、大智门车站、华景街、三元里、刘家庙江岸(属二等局)；邮寄代办所3处：茅庙、易家墩、新沟。武昌、汉阳也设有若干支局和邮寄代办所。到1947年，武汉三镇有邮政局3个，支局14个，代办所60处。

电信方面，武汉的电报局比电话局创设要早。1884年(清光绪十年)，宁汉电报线路竣工，并与沪宁线接通。汉口电报局附设于老熊家巷河边轮船招商局内(今沿江大道民生路口原长江航运候船室 处)，用莫尔斯电报机与上海通报，是为武汉地区官督商办的第一条电报干线。3年后，汉口至武昌过江水线架设成功，设武昌电报局于三佛阁(今解放路书院街处)。先后与四川、湖南、河南、北京等地开通电报。1907年，汉口电报局改为官办，人民国仍旧。1920年在英租界天津路建筑新电报大楼。1912年武汉地区即有8条电报线路，面到1922年架设无线电台，武汉电讯更是四通八达。1927年，汉口电报局定为全国4个特等局之一。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电报局兼办电话。1902年汉口、武昌始设电话局，初为商家创办。辛亥革命后，1915年交通部出资18万元将汉口电话收归国有，武昌电话亦同时国有化。租界电话原与内地分开，也由交通部出资9万元收归中国办理。此后，汉口电话始归于一。原来电话局的房屋机器均不适用，乃于大智门购建新屋，换装新机，1917年迁入，

改为汉口电话总局，以武昌电话局为分局，局长坐镇总局，以一会办经理分局。1921年秋汉阳亦设电话分局，从此武汉三镇均开办了市内电话。1930年省建设厅在汉口设立湖北省长途电话管理处，开办长途电话业务，1934年全部改用自动机交换。

（士心）

武汉铁路、火车之始

有了铁路，自然有了火车。武汉是什么时间始有铁路呢？

武汉在旧中国，只有两条铁路干线，一是北上的京汉线，一是南下的粤汉线。京汉铁路是武汉第一条铁路。此路北端起点原在北京城外芦沟桥，故最初称为芦汉铁路。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芦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在武昌签订，确定了清政府向比利时银行团借款修筑芦汉铁路的意向。后在上海签订了正式合同。在此之前南北两端已动工兴建，分别建成了玉带门至滠口段和芦沟桥至保定段。1899年正式用比款筑路。至1905年底全线建成，全长1214.5公里，1906年4月1日举行全线通车典礼。

芦汉铁路终端位于汉口硚口玉带门，在那里设有一间票房（车站），总车站则设在大智门，1900年开始建设车站大楼，1905年竣工，二层砖木结构，方斗形铁皮屋面。另在循礼门、刘家庙、谌家矶设有票房。谌家矶向北建有跨沦河、滠水等河的三道铁桥，是当时仅次于黄河大桥的三座大型桥梁。

京汉铁路的通车，使原先依靠长江、汉水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又有了通向京城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铁路通车后，汉口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了1/4以上。工商界人士张寿汉在1911年刊行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中指出："观近年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大一倍，伟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皆此铁路之力。"

京汉铁路横贯汉口，对汉口市区的发展也带来了莫大好处。原来比较荒僻的玉带门、大智门一带，发展很快，相继建立了许多仓库、工厂、搬运所，附近的贫民茅舍也次第改为商店，辟为市场。大智门一带1906年还是荒芜未治之地，而到1911年已是房屋林立，居民众多了。正如《夏口县志》所云："猥自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地寸金。"江汉道道尹张履春为该志所写序言也指出："继创铁轨，宦商益集，冠盖往来，奢靡日趋。"

1912年8月动工兴建的粤汉铁路，直到1936年才全线通车。

（严肃）

中国第一所幼儿园
——湖北幼稚园

1902年秋，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通称"壬寅学制"。《章程》对幼童教育规定，6—10岁，先受4年蒙学教育。1903年，湖北巡抚、护理湖广总督端方根据《章程》饬令拔款，创办湖北幼稚园于武昌阅马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幼儿园。

幼稚园开办时即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表明了办园宗旨：幼稚园"重养 不重教"，"以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基础。"由于当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幼稚园办园方法也是仿效日本幼稚园的，幼稚园免收学费，园内分设二科，一是幼稚科，招收4—9岁幼儿，进行学前教育，请日本女师范生担任"保姆"，开设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课程；一是保育科，又称附设女学堂，招收15—35岁的女性，专门学习幼儿师范，培养幼教师资。这便是近代中国幼儿师范教育的发端。

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提倡"蒙养家教"相结合，规定在各省府州县以及较大城市的育婴堂及敬节堂，均应附设蒙养院，给3—7岁幼童以4年蒙养教育。

张之洞回湖广本任后，认为端方在幼稚园内附设女学堂，聚集青年妇女，与《奏定学堂章程》不符，于1904年7月下令裁撤原来幼稚园附设女学堂，将在这里学习的妇女并入同时开办的育婴学堂和敬节学堂，又在幼稚园内增设小学堂。

1938年，武汉沦陷，幼儿园停办。现在，武汉幼儿师范附属幼儿园就座落在这中国第一个幼儿园的原址上。

（胡永弘）

《鄂州约法》的诞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拉开了推翻腐朽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帷幕。

武昌起义爆发后，随即成立了指挥机关——湖北军政府。但是，军政府大都督的职位却旁落于清军协统黎元洪之手。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宋教仁在大家都埋头忙于军政事务之时，却注目于民主立法，以排除封建官僚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势力，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他于10月中旬抵达武昌后，即与居正、汤化龙等人商议制定一部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其效力等于宪法的根本大法，并以为各省首倡。他说："武昌起义在行动上已为全国首倡，而根本大法也要争取作出表率。鄂州约法不过是这方面的尝试，希望以后全国民众都来注意这个共和国的立法工作"。于是，他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草拟出《鄂州约法》七章六十条。经约法起草委员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后，湖北军政府于10月19日颁布了这部《约法》。

辛亥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能清醒地意识到制定法律，特别是制定宪法的重要性，这与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悉心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是分不开的。留学期间，他除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各国的政治制度外，还翻译了俄、日、英、德、美、奥、比利时等国的政治制度概

要与官制的书籍，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些都为他后来草拟《鄂州约法》、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为描绘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打下了思想与理论的基础。

《鄂州约法》是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约法，它反映出湖北军政府资产阶级性质，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基本上勾画出以总统制为蓝本的共和国方案。它颁布后，各省纷纷效法，对当时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后来成为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这表明武昌起义对后来民国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鄂州约法》的产生，宣告了清政府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而被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立宪派 所追求的"君主立宪 "方案已成为历史的垃圾。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了民主制共和国的形象。然而，《鄂州约法》也反映出资产阶级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

（胡永弘）

景明大楼美军淫舞案

44年前在汉口发生的"景明大楼美军淫舞案"，是国民党当局卖国投降政策的产物。这件震惊中外的美军和其他外侨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的特大案件，竟在国民党当局的包庇纵容下不了了之。

景明大楼在汉口鄱阳街青岛路口（原49号现为53号，人称"民主大楼"），原系英国人办的"景明洋行"。抗战胜利后，景明洋行停办，这座大楼成了一座外侨公寓，住 在这里面的外籍侨民，有英国人、犹太人，而以美国人居多，美国空军临时招待所就设在这里。

1948年7月22日，住在景明大楼的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大班（即副经理）利富即将调离汉口，他同美国空军军官乔治·林肯密商，准备在景明大楼5楼举办一场舞会，快活一下，为掩人耳目，对外名义是为

利富送行。他们找来了曾在江汉歌厅和天星歌厅担任乐队负责人的赛拉芬(又名西来宾,菲律宾侨民),要他出面拉乐队,并请中国妇女参加伴舞和伴宿,不准中国男人参加。利富当即将几十张印好的粉红色纸画(横折式,正中绘有女人裸体画像,画旁两侧英文,一是"酒与女人",一是"快乐")作为请柬,交赛拉芬约中国妇女们到会。

赛拉芬领命后,立即跟菲侨克劳兹和他的中国姘妇章月明等商量,决定由自己和克劳兹组织乐队,章月明出面邀约中国妇女,章月明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头佬杨玉麟,通过杨的关系,找江汉歌厅歌女莎莉等,并通过她们四出找人,后来章又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刘宝山,要他找人伴舞,刘则找到失业舞女曹秀英,要她动员中国妇女去参加舞会,并许以厚利。曹见有利可图,当然十分热心。她不仅邀约了同屋的张太太、杨太太等,还与赛拉芬的中国姘妇谭碧珍一起,找来了刘太太、罗太太等10余人,连曹秀英的女儿也参加了。当然除赛拉芬、利富、乔治·林肯等数人外,其他人都以为只是伴伴舞,根本不知还要伴宿的事。

舞会共有30多人参加,其中有达官巨贾的太太和如夫人,也有不少名门闺秀。其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曹秀英,而年龄最小的则是曹的15岁的女儿。这些参加舞会的中国妇女,除极少数是职业舞女外,多数则是前来赶时髦参加"社交"活动的,也有的是为过舞瘾而来的。

8月7日晚7时许,参加舞会的人均已齐集景明大楼5楼,除舞伴全系中国妇女外,20多位"男宾"则全部都是外国人,其中以美军最多。美国人有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职员陆惠人、佛兰克、史塔司博以及美国侨民李琪、卡尔顿、格鲁、卡来尔等。英国人有江汉关水上视察赫达生等。利富和乔治·林肯是这场舞会的主人。

舞会开始前举行鸡尾酒会,男女混杂,淫声浪语不绝于耳。更为奇特的是舞会女伴都由利富等给每人胸前挂上一块小小的本质花牌,上面绘有一幅男女两性猥亵的彩色淫画,据说这是美国传统的"吉祥物"。一些中国妇女不知究竟,只好莫明奇妙地任它挂在胸前。

晚上9时半,仆役刘忠泉奉利富之命将电梯上锁,舞会旋即开始。

一时间淫曲声起，男拥女抱，个个如醉如痴，跳得忘乎所以，谁也不知大祸将临。

几个曲子以后，洋人乘着酒兴，借酒装疯，动作开始粗野起来：有的强吻女伴，有的在掐腰摸身，有的……，见此情形，不少良家妇女纷纷寻找各种借口逃离舞场，舞会组织者之一章月明当然心中有数，也趁机悄悄溜走。尽管走了几个女伴，舞会却照常进行，洋人们更加疯狂起来，有个美军军官将曹秀英当众按倒在地，将曹的内衣、短裤统统扯破，此时，一声口哨，电灯突然熄灭，舞场内一片混乱，中国妇女的呼救 声和洋人们的淫笑声混杂一团，乐队人员纷纷溜走，曹秀英拼命挣扎才从后楼"太平门"逃走，其余胆小的、体弱的、年少的均难逃厄运。

当晚 12 时许，侥幸逃出来的歌女巧巧找到未逃出来的歌女莎莉的母亲一起赶到汉口市警察局反映情况。几经周折，一直挨到 8 日凌晨 3 点左右，警察六分局巡官马步云才来到景明大楼，但此时舞会早已散场，人员均已离去，仅有利富和乔治·林肯在场，他们只说为利富送行的舞会已经结束，其他任何细节均不肯透露。但现场上和沙发上残留的衣裤碎片和木制淫画牌以及遍地碎酒瓶烟蒂，足以证明舞会的混乱情景，但由于利富坚不吐实，现场又无人证，马步云等只好快快而返。

纸总包不住火，8 日上午，《中国晚报》记者杨钰通过关系了解到一些情况。在找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而遭到拒绝后，杨钰便在当日的《中国晚报》上把这桩丑闻捅了出来，接着，汉口的大小报纸和外地报纸纷纷刊发消息和评论揭露这一丑闻。消息传开，举国哗然，武汉的街 头巷尾、茶楼酒肆，市民们纷纷议论。海外侨胞得知这一丑闻，无不义愤填膺。荷属东印望加锡华侨小学学生周海利、张文正、梁赖芳、简得智等 4 人远隔重洋直接写信给汉口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护国家尊严，严惩凶犯。

人民的呼声，舆论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但他们惟恐事态扩大，"影响中美邦交"，一面派人向新闻界疏通，要记者们"顾全大局"；一面传 讯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

5人，要他们承担罪责。除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侨民赛拉芬早在此事公开揭露时逃往香港外，其他参与此事的美军军官和美英籍侨民们一直逍遥法外。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将章月明等5人各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妨害风化、意图营利"。让他们做了洋人的替罪羊。

时值人民解放军大举挥戈南下，武汉即将解放，国民党官员作鸟兽散，除少数报纸作了尾声报导外，这桩辱国辱民、轰动世界的特大案件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商若冰）

满城争说"双钉案"

45年前发生在汉口的一起"双钉血案"，不仅轰动了武汉三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而且传遍了全国各地。

其实，案情是十分简单的，简言之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谋财害命。为什么这桩普通案件能引起如此轰动的效应呢？其原因有三：

第一是作案人是一个武汉首富人家的子弟。首富人家的子弟腰缠万贯，还要去谋财害命。不能不令人震惊。

主犯刘佑方，当年27岁，武昌人，住原北平路32号（今北京路武汉新闻出版局内），是武汉首富、著名中药老店刘有余堂的后代刘宜生之子。刘有余堂资力雄厚，在武汉地区颇有影响，刘佑方被祖父刘文钦、父亲刘宜生视作"传宗接代、光耀门庭"的希望，因此，从小娇生惯养，虽然上了复旦大学，却是个典型的纨袴子弟。先是在其父开设的宜丰银号任经理。后因其狂嫖滥赌亏欠甚多，被其父解职，并停止对其经济接济。

1947年4月，刘佑方自设万兴企业公司，自任经理。请来小学同学杜国正（刘佑方帮凶）担任会计。刘娶有一妻一妾，平日骄淫奢侈。虽善于招摇撞骗，财源不竭，但嫖赌恶习不改，挥金如土，仍常感捉襟见肘，欲壑难填，乃起谋财害命之心。

第二是被害人汪绍伯也是一位富商。他当年36岁，安徽太平人，原住汉口苗家码头83号。其父汪继轩是中纺公司武汉办事处职员，汪绍伯则是荣丰祥纱号的经理。经常到汉口纱业市场等处赶场。汪为人忠实，在纱帮市场上很受信任。

汉口纱帮市场在汉口利济路纱业公会，是做棉纱投机生意的场所。一些皮包公司在这里买空卖空。当时纱厂出售棉纱，开出提货单(行话称为"纱单)，不记户名，不限提货时间，纱单在市面上如同股票一样流通。棉纱市场的交易，就是这种纱单的买进抛出。刘佑方打着万兴企业公司经理的牌头，经常到市场上去，因而结识了汪绍伯。

第三是作案手段离奇毒辣。刘佑方因赌博输钱，亏空太多，无法弥补，便想出了谋财害命的办法，目标对准了汪绍伯。

那是1947年11月3日上午10点多钟，刘佑方与会计杜国正坐上汉口天津汽车行出租的小轿车神气十足地来到纱业市场，找汪绍伯谈生意，说有20台棉纱托汪卖出。汪绍伯在市场上兜了一个圈子回来对刘说，20台棉纱已成交，买主是敏记新纱号，言定价格合计法币5亿4千9百万元，已开出支票慎裕钱庄3亿9千5百万元，新德钱庄2亿5千4百万元，约定到刘佑方家中一手交纱单，一手交支票。

当日上午11点多钟，刘、汪、杜3人乘车，离开市场往北平路开去。车到中山大道盐业银行(今工商银行江岸区办)门前，刘叫杜国正下车回家准备饭菜(实为杀人准备)，接等客人，刘与汪则继续乘车到长清里慎裕钱庄将支票"照票"(即核对支票，鉴别真伪)后再转到北平路刘家。刘将汪引到地下室，转过两道弯才到万兴企业公司办公的地方，这里只有一张写字桌和两张旧藤椅，还有一张杜国正睡的床铺，光线暗淡，阴森可怕。

汪绍伯在藤椅上刚坐下，刘佑方拿出手枪对准汪绍伯说道："不准动，不准说话。"汪连忙说："有事好商量，何必如此。"这时，杜国正闯进办公室，拿出绳子不由分说地将汪捆绑，再用蘸过阿罗方(一种麻醉药品)的纱布、棉花蒙上汪的口鼻，等汪昏迷过去后，刘便从汪的衣袋里取

出慎裕和新德两家钱庄的支票，然后将两个3寸长的铁钉钉进汪的太阳穴，结束了他的生命。

随后刘佑方喊来家中的黄包车夫杨行正，谎称杜的同学病了，要送回家，当即将汪绍伯抬上车，用被子盖着，拉到球场街上智中学（今六中）附近，把汪绍伯抬下车后，刘要杨行正回去了。另叫了一辆人力车，出钱1万5千，拉到今姑嫂树二道棚子（过去这一带十分荒凉）附近。正当刘和杜动手将汪的尸体抛入水田中时，正在近处做活的农民程子奎等望见，十分惊疑，大声喊叫，追赶来将刘佑方抓住（杜这时已跑脱），扭送警察十二分局。当场检验尸首，发现死者左右太阳穴各钉入一个3寸长的铁钉，断定是一桩谋杀案无疑。并从刘佑方身上搜出小刀一把，3寸长的铁钉一个，表链一根，挂表一个，法币115万元，两张钱庄支票，总金额为5亿4千9百万元，协大钱号、宜丰银号空白支票各一张，"刘佑方"私章一枚。

当晚警察十二分局连夜审讯，得知详情，又派人赶到汉阳东门麻巷7号，将帮凶杜国正缉捕归案。又派人将刘家车夫杨行正抓来。

正因为以上三条原因，所以这桩双钉谋财害命案成了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案件发生后，舆论大哗。

尽管刘家用收买死者家属、贿赂法院和警察局、聘请律师、买通报社老板等手段企图挽救刘佑方的一条命，即使为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但终因影响太大，谁也不敢一手遮天。最终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按盗匪杀人罪判处死刑，杜国正判无期徒刑，杨行正无罪释放。11月19日，刘佑方被五花大绑，装囚车押赴刑场，沿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到新华路刑场，行刑士兵打了7枪，才结束了刘佑方这个罪恶的生命。

（商若冰）

奇特的社会产物——武汉的茶馆

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历来商业繁盛。在唐宋时期，武汉最繁盛的

地区先集中在武昌南市，后逐渐移到汉阳东、南门。到了明末清初，汉口出现了"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的繁荣景象。随着商业的日趋发达，交易日益频繁，来往客商逐日增多，作为商人进行交易，行人旅客休憩品茗的茶馆也应运而生。清道光年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就描写了当时汉口茶馆的盛况："无数茶坊列市廛，早晨开店夜深关。"并记述了"涌金泉"、"早逢春"、"望湖泉"等著名茶楼。据有关资料，1933年，武汉三镇各类茶馆已达1300多家，真乃极一时之盛。

武汉的茶馆大致可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3类。

大型户，馆面较为宽敞，一般设在楼上，雇用茶房（工人）10余人，内有头倌1人，负责管理业务。茶桌（俗称"八仙桌"）至少在三四十张以上。茶具十分讲究，一般用盖碗茶具，也有用红瓷茶壶泡茶的。茶叶多采用二、三号"毛尖"。冬季有火炉取暖，夏季原用布叠折成的土吊扇，用人工拉送，后多改用电（吊、座）扇。馆内设有雅座，备竹木躺椅若干张，冬用狗皮褥子，夏用竹席，一般季节用长毛巾铺垫，茶资比普座略高。有些进行地下交易的客商或谈私房事的人，就常常到雅座品茗休息。不少茶馆还辟有静室数间，供客人抹牌赌博，从中抽头盈利。有的还附设有小型酒馆，制作各种面点及小炒，同时兼营香烟、糖果、瓜子、花生之类生意。为方便茶客，有的还附设有理发店。当时这类茶馆较有名的有怡心楼、洞口春茶楼、江南春茶楼、话雅茶楼、德华茶楼、武汉第一楼、临城茶楼、忠信茶楼等。

中型户比大型户规模略小些，一般雇请茶房3—5人，头倌1人，没有雅座，茶具、茶叶都不太讲究，茶资也较便宜。白天以卖茶为主，晚间就演出评书、皮影戏、楚汉剧清唱等，聚众抹牌赌博另辟有静室，与大型户相同，如安乐泉茶馆、凤台茶馆、汉泉茶馆、一洞天茶馆等就属此类茶馆。

小型户茶馆是社会下层阶级经常聚会的地方。它一般只有二三间房子，十几张茶桌，较为简陋。茶房通常只有1人，老板和老板娘一般只招呼客人抹牌。晚上也有评书和皮影戏等活动，这类茶馆有的有招牌，

如杨鹤茶社，清香茶社等，有的则连招牌也没有，或以茶馆为名，或冠以姓如某家茶馆等。

武昌、汉阳的茶馆跟汉口的茶馆不同。如徐家棚的一些小茶馆，专供粤汉、平汉铁路线上的旅客休息候车之用（旧时没有长江大桥，京广线不能直达）。黄鹤楼上的茶社专供游人少憩品茗，钟家村只有二、三家露天茅棚茶馆，供扫墓人休息解渴。

三四十年代，每到夏天人们总想找一处纳凉处所，于是，新市场（今民众乐园）、长江饭店（今军人饭店）、中南旅社（今"六门"桥南商场）都开放"屋顶花（茶）园"，出卖清茶、冷饮供人们消夏。租界内的维多利亚（今市政府大礼堂处）、新生花园（今健康幼儿园）、天星花园（今江岸区文化馆）也卖起茶来了。不过他们用的桌椅茶具跟茶馆不同，多用小型方、园桌、活动靠椅和高级玻璃杯，具有一点现代气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卖茶几乎成了茶馆的副业，什么走私贩毒、买空卖空、打架扯皮、谈判 纠纷、抹牌赌博、帮会聚会、特务活动等都可在这里进行，业务十分复杂，所谓"开的是闲门、来的是闲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人们认为坐茶馆者不是"三教九流"之辈，便是好吃懒做之人。到了解放前夕，武汉的茶馆大都成了黑社会活动的场所了。

（商若冰）

"九头鸟"典出何处？

一提湖北人，尤其在谈到极少数湖北人的不光彩行为时，人们最容易想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俚语。兹举一例为证。本世纪30年代，蒋介石来湖北视察，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夏斗寅，经常在蒋面前哭诉与蒋关系极好的国民党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如何处处与他为难，妨碍他施展省政。有一次竟跪在蒋介石面前，涕泣陈词，要求蒋公开表示支持他。夏斗寅这种摇尾乞怜的丑态和以疏间亲的无知行径，使蒋介石非常恼火，在一次军政要员会议上，蒋大发脾

气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交由湖北人自己管理，不但不好好地干，反而互相攻击，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佬，真是难缠。"

为什么人们会把"九头鸟"同湖北人联系起来呢？说来话就长了。

"九头鸟"源出于古老神话传说。《太平御览》引唐人《三国典略》说："南北朝时南齐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另一唐人著作《岭表录异》亦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这是我们迄今所看到有关"九头鸟"传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通常，鸟类是只有一个头的。一只有九个头的鸟自然便是怪异的东西，因此，"九头鸟"被认定为妖鸟或不祥之物。意义几经流变，后多用来比喻奸诈狡猾的人。然而也有说九头鸟好话的。张君房《脞说》云："时人语曰：'天上有九头鸟，人间有三耳秀才。'"三耳秀才是《续搜神记》中的一个人物，额上生一耳，尤聪俊，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

至于把湖北人比作"九头鸟"，一般认为与明代张居正的改革有关。张居正(1525—1582)，湖北江陵人。曾为内阁首辅。他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以图富国强兵，改革措施对暂时稳定明朝的封建统治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触犯了一些贪官污吏、豪强地主的利益，他们无奈之极，便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语诅咒张居正，以泄私愤。自此以后，这句话便在民间慢慢流传开来，多含贬意，认为湖北人多诈，正如天上的飞禽中数九头鸟最诡谲一样。

其实，湖北人中有好有坏，狡猾奸诈者只不过极少数而已。今天，人们也并不把九头鸟看作绝对的坏，如有的产品就敢以九头鸟做商标，把湖北佬的好名声打到全国去。有的报纸则开辟"九头鸟"专栏，专门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与九头鸟(湖北佬)的陋习作斗争。

(朱务本)

漫话除夕旧俗

从清代到民国年间，每到腊月的最后一天，人们为辞旧迎新格外忙碌，各项活动以求“兴旺”与“吉利”为要旨。

出远门的人千方百计要赶回家吃年饭，称为“团年”。吃年饭前先放鞭；并且要在天亮以前开始吃，为的是“越吃越亮”，象征前途光明，饭桌上的全鱼照例不吃，取“年年有余”的吉兆。吃饭时不泡汤，据说可以避免来年淋雨。

没有用上自来水以前，家家的水缸要满储清水，保证新年三天内有水用，寓意是“福水长流，子孙富足”。以卖水为业的挑夫因此要大忙特忙。

妇女们赶做“过年鞋”，“过年穿新鞋，喜事一齐来”。男人们收拾屋宇，贴门神，换春联，用五张雕花的红纸贴在门楣上，称为“挂楣签”。桌上花瓶中多插柏枝，谐音是“百子”。还有天竹、冬青等，取“长青”之意，小瓷盆中养水仙花，并在其腰部加上一道红纸箍。

黄昏喂家畜，务必使其饱餐，特别要喝咐狗子，不能乱咬人。夜晚祭灶神，因为他在过小年（腊月二十四）时“上天言好事”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欢迎他“下地降吉祥”。祭过灶神，全家人齐集堂屋，祭天地、祖先，拜尊长，表示“辞年”。尊长用红纸包钱给晚辈，通称“压岁钱”，希望能够“压祟”。老幼人等尽可能通宵不睡，名为“守岁”。说是这一夜人的魂魄都要到平日所属的香火庙中去“参庙点卯”，如果睡着了不利于魂魄回归附体。万一有老幼不能支持通宵而去睡觉的，称作“挖窖”，是去挖窖藏的金银。婴儿的摇窝里要放葱、蒜与剪刀等，祈祷他日后“聪明”、“会打算”，并能“剪除百邪”。十岁以下的小孩要在上衣背后佩戴“皇历头”（即历书）和“花麻见过”的红布条，期望来年不染天花、麻疹诸疾，并避免一切灾难。

守岁时由专人负责在堂屋的香案上燃烛烧香，香烛将尽则及时更

换，敲三声锣，放一挂鞭。每间房屋点一盏灯，并使其彻底不熄。从"起香"到下半夜，人们在起伏不断，远近相应的爆竹声中，等候着"出方"，开门向当日喜神所在的方位（历书上有记载）拜祷。这是吃年饭以前的一项重要活动。

（徐明庶）

春节习俗琐记

旧社会过春节，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在那时却是一本正经，一点不能马虎。

正月初一天不亮以前，各家户主根据历书记载的当年喜神所在的方向，在户外焚香燃烛，向天拜祷，称为"出行"，又名"出方"。头一天一定要在这里贴一张红纸帖，上书由"出行大吉，对我生财"这样的吉利语组成的四个复合字："财对衔奎 财对"。出行时叫一个小孩抱几块劈柴，进门时连喊："财来了！财来了！"讨一个"开门彩"。

进门后，家长率领全家祭祖先，晚辈依次给尊长拜年，尊长按照晚辈的不同情况，分别讲几句相应的吉祥话。

初一到初三的拜年也有讲究：初一拜父族；初二拜母族；初三拜妻族。假如不照这个次序行事，必将受到"欺祖灭伦"或"宠妻灭母"的责难。初三以后才轮到向一般亲友拜年，首先要选择一家有钱有势，至少在某方面的条件比自己强的，据说这就叫"人往高处走"。否则你这一年就要走下坡路了。

亲友之间往来拜年，听到客人敲门，去开门时先说："有慢，有慢"，表示歉意。主人没有来开门，客人则边敲门边呼喊："有请贵府开财门喽！"客人进屋就坐后，主家奉上用红枣、莲子和桂圆煮的元宝茶，并连声道贺："恭喜您家端元宝！"

有的人喝两口茶，坐一会就走，称为"拜跑年"。关系密切一点的则留下来喝年酒。中等以下人家多数是以四碗菜肴下酒，富裕大户是用有

九个方格的正方形的木制"春盘"，一次端出九个冷碟，过一会再上一个火锅，客人喝几口酒，动几次筷子即行告辞，例不吃饭。来了必须留餐的亲友，就用长方形的"条盘"不断地上茶，酒菜力求丰盛。

拜年时，假若主方的当家人外出，客人即留下名片，也算是登门磕了头，对方有小孩的，主客双方给小孩拜年钱；主方有佣人的，客人要开利市钱。是否拿礼品，或者拿什么样的礼品，是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假如下属给上司拜年，或者虽非上下级关系，但是有所求于对方，那么礼品的档次越高越好，因为这是名正言顺的"上供"的好机会。

由初一到初三，各家一般不煮生米，吃的是过年时剩下的"接年饭"，盼望总是"这样有吃有剩"。有时用面条、豆丝、粉条与糍粑等当顿。三天之内不动油锅，免得来年生活受煎熬。三天之内不向户外泼残水，倒渣滓，怕的是把"财喜"弄出去了。

初三午后，焚香敬神，称为"送年"。这时，各处寺庙庵观掌管香火的人出来沿家收年饭，年饭施舍完了的用米代替，不能露出丝毫吝啬之色。老人说"越把越有，富贵长久"。

初三过后，人们除继续拜年外，还要相互"请春酒"，藉此联络感情。所请对象都是经过考虑与选择的，因此，有时也出现单方邀请的情况——吃酒不还席。

从初一到初十，老人们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门观天色，相传有"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麻十豆"的说法，遇上某一天的天气不好，那一天所属的那一行在来年就不兴旺了。这当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然而人们对此却深信不疑。

元宵节以前，大人们还要筹划和准备玩龙灯或者接龙灯的事宜，小孩们则闹着上灯市去买花灯。汉口的灯市在四官殿与存仁巷；武昌的灯市在司门口和青龙巷；汉阳的灯市在西 大街一带。

（徐明庭）

龙腾狮跃闹元宵

岁岁元宵，今又元宵。一到这个节日，我就想起童年时观灯的场面。

有龙灯处必有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为了让龙灯顺利前进，只好借助流星开路。在长绳的两端各系一个镂空的铁皮圆球，内装烧着的板炭，两手相距一度握住长绳，左右开弓，交叉地甩成一个个的同心圆圈，火花不停地从球体空处溅出。观众唯恐沾火星，不得不让出一条路。

一条条的龙灯罩着颜色各异的龙灯衣子。玩龙灯的人穿札脚裤，长排密扣阔镶边的对襟上衣，头包英雄巾。额前或鬓角缀有颤巍巍的鲜艳绒球，一步三摇，犹如在和风中摇曳的花朵，漂亮极了。假若有人放鞭迎灯，龙灯立刻在噼噼的爆竹烟雾中，随着左右旋转的龙珠翻腾起舞，鞭爆放得越多，玩龙灯的越是攒劲，锣鼓动地，"哦嗬"喧天，孩子们高兴得欢蹦乱跳。

"神龙游九州，狮子不过沟"。玩狮子不能超越约定俗成的此疆彼界。

狮子还有文武之分：玩武狮子要会一些武术，在驯狮人的逗引下，披着狮衣的两人配合默契地摇头摆尾，张牙舞爪，翻滚扑跌，作出千姿百态。驯狮人则打八叉，摊"一字"，摔空心跟头，使出浑身解数，博得一阵阵欢笑和掌声。

文狮子的任务是跟随托香盘去说沿门彩的人，只在各家各户的香案前略显婆娑之状就可以了。说彩者肃立于香案侧边，熟极而流的彩词一泻而下："狮子玩得喜盈盈，前来庆贺到府门。一庆风调雨又顺，二贺国泰民安宁……"围观的人们分别在上下句垫上"喜呦"、"喜呀"的帮腔，抑扬顿挫，一唱众和。纵非"绕梁三日"，也说得上是"响遏行云"。使人们沉浸在欢乐的心情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中。

紧随在龙灯与狮子后面的，往往还有踩高跷和采莲船、蚌壳精等等。

踩高跷者是成群结队的，穿着戏曲中人物的服装行舞作戏。所踩的跷就是绑在脚下的两根丁字形木棍。初出道者踩的约有半人高；资格越老所踩的跷就越高。群众对此有一句形象的比喻："真是踩到半天云里去了！"踩跷的人难以站在原地不动，如果不能进或后退，也要不停地

踏步。假如要休息则扶着路边建筑物的墙壁门窗，或树木、电线杆等，有的就干脆坐在平房的屋檐上。在最高的高跷的旁边，间或也有人耿着长长的杉木条，以供踩跷者扶持着小憩。听老辈人说：踩高跷的数汤林口（今汉口一元路东南端江边地带）最有名，1823年（清道光三年）刊行的《汉口丛谈》中已有记载，还有人为此写过一首长诗。

在一锣一钹有节奏的敲击声中，一只竹扎纸糊彩绘的小船轻盈地荡出来了。两鬓染霜的艄公划桨，妙龄少女立于船中，舵婆拿一把破蒲扇在船后扭捏作态、插科打诨。少女和舵婆都是男性妆扮的：前者俊扮；后者丑扮。绕场一两周后唱起来了："采莲船唛（哟哟），划得快（呀嘿），恭喜老板（呀喂儿哟），大发财呦（划着）。"然后又敲锣击钹划船，接着再唱……。这样表示吉祥喜庆的唱词可以见景生情地唱上好多段。主词归艄公领唱，衬词群众齐唱，虽然没有人指挥，领唱与齐唱却是严丝合缝，浑然一体。既整齐，又热闹。

采莲船划走后，蚌壳精出场了，一位小伙子化妆成美丽姑娘，藏身在高与人齐、开合自如的两片大蚌壳中，渔翁以舞蹈的身段撒网捞蚌。蚌壳精不仅巧躲善避，有时或用连环腿踢对方，或用一侧的蚌壳撞击敌人，有时还运用合拢的蚌壳把渔翁拱倒在地，甚至借蚌壳的一张一合之势把老汉夹住，使其进退两难，煞是狼狈。经过一番斗智斗力，渔翁艰难地夺取了胜利。每当出现搏斗的高潮，观众无不紧张，有的人看得连眼睛都不眨。

蚌壳是纸糊篾扎的，为什么三番五次在地上打滚，居然一点不破损？虽然有的蚌壳衣子是布做的，但是蚌壳胎子毕竟是竹篾制品，为什么能承受那样的折腾而不散架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我至今还是弄不清楚。遗憾的是，那时我没有想到去问问那样有能耐的蚌壳精。

（徐明庭）

数罗汉与大士阁求子

汉阳归元禅寺创建于明末清初，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武汉至

今保存较完好的丛林。

从古朴、庄重、典雅的外三门，步入禅寺，遍游众多的建筑群落，使你觉得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要数罗汉堂，武汉地区流行的一种占卜方式"数罗汉"，就是在这栩栩如生的罗汉群中进行的。

现在全国有五百罗汉塑像的寺庙，最著名的有5处：北京的碧云寺、四川新都的宝光寺、苏州的西园寺、昆明的筇竹寺和汉阳的归元寺。这5处的罗汉雕塑，各有特色，闻名遐迩。传说，汉阳归元寺的五百罗汉为黄陂县王姓父子二人用12年时间塑造的。"数罗汉"的习俗要数武汉地区最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归元寺的罗汉堂建筑布局呈田字形，田字正中，正座是阿弥陀佛，侧座是千手观音，前厅为"皆大欢喜"弥勒佛，背座是护法神韦驮，后殿是阿难、迦叶、文殊、普贤簇拥着释迦牟尼佛，四周列坐五百金身罗汉。五百罗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反映了千变万化的生活情态，每一尊雕塑又各自唤起一种生活联想，形形色色、活活生生：或笑逐颜开，洋洋自得；或愁眉不展，心事重重；或腾云驾雾，飘飘欲去；或棋逢对手，胜负难分；或掌上托婴；或怀中抱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纯朴的人情味，这哪里是佛国圣地，简直是一幅人间生活画卷。

所谓数罗汉者，是从本身年龄这一号罗汉数起，如当年20岁即从第20号罗汉数起，依次顺数到第20个罗汉（即40号罗汉）止；还有一种数法，即随便选一尊罗汉数起，数到当年本身的年龄那一号止，其大小年龄，均依次类推。两种说法，均要数到自己的序数的那一尊罗汉，对照罗汉神态来应验心事：当数到面貌带笑者，以为必有好运，喜滋滋；当数到面貌哀愁或盛怒者，便认为不吉利，老大不痛快。当然，这些纯属巧合，不必当真。欲以此来卜知自己或亲友的命运，实乃笑话。这种活动虽盛行，但信者不多，如今已成了一种游戏。

早年，每届农历正月初间，善男善女赴罗汉堂拜佛，有如潮涌，所烧檀香，烟尘如雾，无法张目，但游客仍源源而入，挤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为数罗汉问卜而来。当今，前来归元寺罗汉堂参观的游客如织，往往以

其不同的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的兴趣，在这里指指点点，品评自己数着的罗汉，喜怒哀乐，各自心领，并讲述着各自采集的神话故事，谈到动人情处，往往引起一阵欢笑，实乃一乐事。如偷信，或许会带来不悦。前几年竹溪县一对新婚夫妻，数罗汉数出了无端烦恼，小夫妻险些分道扬镳。起因是女青年数罗汉二次都数到大肚罗汉和罗汉前面落出一小罗汉，男青年生疑，刚结婚几天那有孩子，莫不是……，女青年抱屈哭诉，在路上执意不走。后经人苦口相劝，解开了男青年心里的疙瘩，小夫妻终于和好如初，双双离去。这告诉人们，以罗汉的表情来预卜人生，实在是一种蠢事。

"大士阁求子"的习俗也源于归元寺。在翠微古池的一侧有一建筑为大士阁，因供奉的观音尊为大士故名。此阁民间又称为"百子堂"、"娘娘殿"等，并流传着娘娘殿求子的旧习：早年女子结婚不孕，婆婆抱孙心切，丈夫得子心急，这对女子思想压力较大，在邻里老人的指点下，不孕女子背着众人，偷偷地跪到娘娘殿敬佛求子，双脚跪在蒲垫上，虔诚地敬香，少顷，在娘娘像后边摸出一双鞋子，或一双筷子，揣在怀中即刻返家，认为这样就可以怀孩子或快生贵子。来年如得一子，就高高兴兴地前往大士阁娘娘像前烧香还愿，并投钱入功德箱中或给予和尚钱财，有钱人家还为菩萨贴金装裱，这种旧俗，实乃封建迷信，今天基本绝迹。

（包年生）

木兰山进香旧话

坐落在武汉市黄陂县北30公里处的木兰山，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12载的巾帼英雄木兰将军的家乡。从隋唐以至明清，山上先后修建了"七宫八观三十六殿"，共有神像上千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所有殿宇和山寨的寨墙完全不用泥沙，都是以青岗石大小交错、互相嵌压，干砌成功的。这分明是古代能工巧匠们聪明才智的结晶，却被说成："要不是

菩萨保佑，哪个不用泥沙能砌墙呢？”帝主宫下的乌龙泉，是不含或仅含少量可溶性钙盐与镁盐的软水，把硬币贴在水面，可以浮住不沉。缺乏这方面物理知识的人偏把它当作“仙水”。加上祈嗣顶、磨针洞、百子殿、棋盘石等有关的神话传说，把木兰山的菩萨渲染得神乎其神。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刊行《续辑黄陂县志·山川》也象这样介绍木兰山：“上有玉皇阁、真武殿，四方朝谒者多灵验。”因此号称荆楚名岳的木兰山，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曾经吸引了近到武汉，远至其他几省的香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每到木兰山“开山门”的时期，除了三五个人一伙的以外，还有临时性民间组织“亮子会”。

如果看到很多“善男信女”，在肩上或胸前挂着上有“朝山进香”字样的黄布袋，有人还捧着内燃檀香的小香炉，或者拈着一柱线香，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黄陂县行进，前面有人举着或扛着木制的山帘，山上是一些神象，这就是“亮子”。他们是到木兰山去敬菩萨。

在队伍出发的前两天，由头人（一称会首）延请僧道设坛打醮，名为“祈脚力”，求菩萨保佑他们腿脚有劲，能够上木兰山。凡是参加进香的人，先期必须斋戒沐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们认为，不象这样不足以表示自己的虔诚。

队伍起行后，有人沿途打锣，有人带头高宣佛号。一人先念：“南无—阿弥陀佛”；众人接念“无量寿佛”。好象领唱和齐唱一样，既整齐，又有节奏感。有人即令累了，声音嘶哑，仍然跟着念佛，惟恐菩萨听不到他的声音。这还不算，一路上还要来上好多次的“匍伏叩首”，每次磕头前，有人发号施令，大家都听他指挥。队伍中虽然年龄层次不同，但面容都非常严肃。

故老相传，上木兰山进香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菩萨就会怪罪下来。但是，他们所谓的谨言慎行简直“谨慎”到诚惶诚恐的地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冒犯了神明。武汉民间曾经流传一些类似神话的笑话。例如：有个年轻人要上路了，他的妻子嘱咐他，莫忘了到祈嗣顶抽一张灵签（因为他俩结婚三年还没有生育）。一边说，一边把一些解手

纸放在他胸前挂的黄布袋里："去来这远的路，你不用解手纸吗？"事也凑巧，这个青年下山后突然腹泻，直泻得全身无力。回家后，不断地埋怨妻子，不应该说："破口话"。

有趣的是：木兰山附近的居民倒不象远处的人那样，把木兰山的菩萨说得灵验无比，朝山进香的也不如远处的踊跃。因而流传下来一句俗话："木兰山的菩萨验远不验近"。

朝山的人，回家时必定要在山上买一些小喇叭、筷子、木汤勺与木刀、木枪之类，分赠亲友。受赠的人非常高兴。"一人至诚去进香，一方都沾菩萨光"。谁又不愿得到"佛光普照"呢？积习相沿，也产生了一句俗话："不为蒙（方言，寻找之意）喇叭，不朝木兰山。"引申开去，凡是为了某种原因去做某件事时，就以此作比喻。

进香的人，在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有不少"瞎子"分散坐在香客们必经之处的路边乞求施舍，你把了钱，他会连声道谢："菩萨保佑你老大富大贵，发子发孙。"若是你不把钱，等人走过去几步，他就睁开眼睛骂："上山跶（方言，跌）断手，下山跶断脚"。

不过这种骂人的话只是用于零散香客，亮子会是成群结队的，其中总有一些人准备了零钱沿路开发，所以不会挨骂。对于这种以"靠山吃山"为手段，在农闲时捞外快的人，菩萨为什么不降罪呢？曾经有人向老辈人请教这个问题，得到的是一声呵斥："年轻人不懂事，莫瞎问！"

近几年，木兰山作为风景区重新开放，武汉去的游人再没有看到那些"瞎子"了。道理很简单，只有旧社会，才有那种名堂。

（徐明庭）

洪山菜苔趣闻

武汉人都爱吃洪山菜苔，关于洪山菜苔的一些趣闻想必也爱听。

菜苔本名芸台菜，俗称油菜，红色者称红油菜。洪山菜苔即属于红油菜。种植此菜需要肥沃的土壤，较低的气温，一般是秋植冬撅。其紫干

亭亭，黄花灿灿，茎肥叶嫩，素炒登盘，清腴可口。据说洪山宝通寺一带的菜苔味道尤佳，他处所产均不能与之媲美，以致有一种说法，以宝通寺钟声所到之处为范围的地方出产的菜苔是正宗，"距城（武昌城）三十里则变色矣，洵别种也"。王景彝《琳斋诗稿》有咏菜苔一首：

甘说周原荠，辛传蜀国椒。
不图江介产，又有菜苔标。
紫干经霜脆，黄花带雪娇。
晚菘珍黑白，同是楚中翘。

关于洪山菜苔的来历，在武汉地区流传着一则美丽的传说。据《武汉通览》所载，相传1700多年前，洪山脚下有一对恋人，名叫田勇和玉叶。一天他俩到洪山游玩，被绰号叫"恶太岁"的杨熊撞见。杨熊见玉叶容貌美丽，乃令打手抢人。虽经田勇奋力相救，但寡不敌众，双双被乱箭射死在洪山之麓，两人的鲜血染红了洪山下的土地。杨熊一伙也被雷电击毙在山腰。当地的农民将田勇、玉叶就地掩埋，不料次年秋天，坟堆周围长出了紫红色的菜苗。乡人勤浇水，常施肥，紫红色的菜苗竟抽出肥嫩的菜苔。当年适逢灾荒，粮食颗粒无收，乡人以坟边的菜苔充饥，摘了又长，越摘越多，人们赖其渡过了荒年。乡人纷纷采集菜籽，自家种植，并挑到城里去卖。城里人吃了觉得甜脆清香，赞不绝口，于是红菜苔在洪山一带得以推广。

红菜苔拿食、素炒都具有独特风味，而一个民间故事所介绍的红汤蝴蝶面更是以红菜苔为原料的美味佳肴（请参见本书《美人店的蝴蝶面》一文）。

人们相信名人，名人喜吃的食物也可得到大众的青睐。于是，关于洪山菜苔便出现了"剐地皮"的典故。王葆心《续汉口丛谈》上记载："光绪初，合肥李勤恪瀚章督湖广，酷嗜此品（按：指洪山菜苔），觅种植于乡，则远不及。或曰'土性有宜'。勤恪乃抉洪山土，船载以归，于是楚人谣曰：'制军剐湖北地皮去也'。"民国初年，湖北都督黎元洪离开武汉到北京当大总统后，他的如夫人黎本危爱吃洪山菜苔，每届冬季必派专差

到洪山调运菜苔。1949年元月，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飞来武汉为蒋介石说项，破坏和平运动，但毫无结果。临走前，他想到洪山的红菜苔是闻名已久的特产，今后还不知能否吃到，便对湖北省主席张笃伦说："今晚到洪山去买300斤红菜苔，以便明晨带回南京去。"有人写诗讥其事云："从此辞却鄂州路，空载洪山菜苔归。"

解放后社会发展，每年冬春送往北京供鄂籍老干部佐食的洪山菜苔，由民航班机运去。如今，更有保鲜硅窗塑料袋包装，港澳的鄂籍同胞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洪山菜苔了。"刮地皮"云云，已成为历史上的笑谈。

（严昌洪）

"秋来倍忆武昌鱼"

公元221年，割据江东的孙权见曹丕代汉称魏帝，刘备亦在蜀称帝，遂作称帝的准备，自公安迁鄂（今鄂州），取"武而昌"之义，改鄂为武昌。229年，孙权即帝位，改元"黄龙"，迁都建业（今南京）。265年，吴国末代君主孙皓又自建业迁都武昌，扬州诸郡百姓溯流供给武昌帝室、官僚消费，劳役烦重，怨声载途，甚至有人劫持吴主庶弟孙谦，抗议迁都加重了民众负担。左丞相陆凯乃上疏引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极力要求还都，孙皓终于返回建业。

这段史实使武昌鱼的名声大振，以此事入典的诗词历代多有，著名者如南北朝时诗人庾信所作《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唐代诗人岑参《送费子归武昌》："秋来倍忆武昌鱼，梦著只在巴陵道。"宋代诗人范成大《鄂州南楼》："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可谓典故活用，更使武昌鱼扬名天下。

仔细品味这些诗词佳句，可知"武昌鱼"本来是对古今武昌地区所产鱼类的泛称，包括了鲫鱼（细头鱼）、鲴鱼、鳊鱼、鳜鱼（桂鱼、鲈鱼）等肉嫩味美的上等品种。黄鹤楼前江中有回流，漩涡波纹呈梅花形，俗称

“梅花水”，据说其中所产鲤鱼味最鲜美。同治《江夏县志》载：“鲤鱼三十六鳞，惟黄鹤矶头鲤鱼三十七鳞，其味肥而美，立冬后腌鱼者喜买之。他省呼之曰‘楚鱼’。”

解放后，经过科学鉴定，确认梁子湖（由武昌县和鄂州市共辖）中的团头鲂才是名副其实的武昌鱼。50年代初，我国鱼类学专家、华中农学院教授易伯鲁等通过梁子湖所产鳊鱼进行观察、鉴别，发现了三个鳊亚科鱼种，即长春鳊、三角鳊和团头鲂类，前两种鱼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江湖，唯团头鲂系梁子湖独有，故称之为“武昌鱼”。团头鲂与三角鳊同属鲂，但据易伯鲁的研究，团头鲂有几个主要特点：一、团头鲂吻端纯圆，同三角鳊比较，口略宽，上下曲颌曲度小；二、团头鲂的头一般略短于三角鳊；三、团头鲂尾柄最低的高度总是大于长度，三角鳊尾柄的长度和最低高度几乎相等；四、团头鲂腰的中室是最膨大的部分；五、团头鲂腹椎和肋骨13根，三角鳊却只有10根；六、团头鲂的体腔全为灰黑色，三角鳊为白色，带有浅灰色色素。

但是普通的市民并不能辨别这些特点，常常把所有的鳊鱼都认作武昌鱼而介绍给外地来的客人，客人们也便一面品尝着清蒸鳊鱼或花酿武昌鱼、杨梅武昌鱼，一面吟咏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高兴地感谢主人的盛情。

（山风）

热干面与名小吃

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各地人的口味各异，武汉的小吃也就品种繁多，各具特色。这些丰富多彩的小吃，也是爱在外面过早（方言，即早餐）的武汉人喜爱吃的早点，其中热干面最普遍而又最具特色。

武汉的热干面，已有50年历史，它与我国山西的刀削面，北方的炸酱面、四川的担担面、两广的伊府面齐名，合称五大名面。热干面既不同

于凉面，又不同于汤面、质量上乘者，上口时香气浓厚，耐嚼有味，具有独特的风味。

说起热干面，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30年代初，汉口长堤街住着一个名叫李包的人，他以卖凉粉和汤面为生。有一天，他将没卖完的面条煮到七成熟时便捞起，晾在案板上，不小心将油壶里的麻油泼在了面条上。他灵机一动，索性多倒一些油在里面，拌匀后在案板上摊凉，第二天早上，他就将这种拌了油的熟面条放入沸水中烫几下，然后放入碗中，加上卖凉粉用的芝麻酱、葱花、酱萝卜丁等佐料，面条立即散发出香味，诱人食欲。人们争相前往，吃得津津有味。别人问他卖的什么面，他脱口说道："热干面"。此后他便专卖热干面，并向求教者传授手艺。

在武汉，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有热干面供应，而汉口蔡林记的热干面光滑油润爽口，味道鲜美，独具特色，备受青睐。

除了热干面外，"四季美"的汤包、"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以及大街小巷均可买到的面窝，这些都与热干面一样是武汉小吃百花园中的佼佼者。

水饺，全国各地都有，只是称谓不同而已。有的地方叫抄手，有的地方叫馄饨，有的地方叫包面，我们武汉人则叫它水饺。武汉"谈炎记"水饺以汤鲜、馅多、原料纯真、煮法考究、造型优美取胜。该店的水饺，食之爽心润腹，余香满口。

枯炒牛肉豆丝，自然是老谦记的最正宗了。老谦记枯炒牛肉豆丝，选用新鲜豆丝、牛里脊肉、香菇，玉兰片及其他调味品为主要原料，精心煎炒，油炸好的豆丝，色泽黄亮，味道鲜美，香脆可口。豆丝是武汉的特产，其制作工艺是，用绿豆和细籼米按四六成或三七成的比例分别备料，分别浸泡，然后混合磨浆，在锅里摊成薄片，等凉后再卷成筒切丝。

武汉的面窝外酥、内软、中间脆，是武汉人爱吃的大众化食品，已有百余年历史。美国学者加斯特在华中师范大学访问期间喜欢上了面窝，回国时特地上街买一个炸面窝的铁窝子，准备回到美国后仿做，并在美国朋友中炫耀自己在中国学到的手艺。

如果您有机会来武汉，丰富多彩的武汉小吃，一定会使您流连忘返。

（胡永弘）

美人店的蝴蝶面

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年），洪山附近有家专卖面食的小铺子，招牌本来是“悦来”，取“近者悦，远者来”之意。然而，某些轻薄之徒看到经营者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遂呼其为“美人店”。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反而把“悦来店”的招牌淡忘了。这个店里出售的一种蝴蝶面远近闻名，供不应求。她的经营方式也与众不同：一年只做五个月的生意，红菜苔上市才开张，红菜苔罢园就歇业。在这段时间中，也只限清晨接待顾客，每人供应一碗，以一柱香为度，香点完了立即挂牌“明日请早”。

有一年，住在司门口的一个富家公子慕名前往，接连两次都是去晚了一点，虽经一再恳求，那位姑娘仍不肯破例，连冷板凳都坐不成。第三天，这个公子天不亮就去了，总算吃到一碗垂涎已久的蝴蝶面。从此每日必到，成为座上常客。两三个月后，公子想最好“美食美色”二者兼得，因此请人说合，情愿出重金娶那位姑娘为妻，即令为此破产也在所不惜。姑娘看到他为了区区一碗面，不避风露，不怕路远，不辞劳顿，每天必到，的确是情有独钟，终于应允了这门亲事。腊月二十八结婚后，到了正月初四，不仅没有象往年那样循例做生意，还在门上贴出了“自即日起，永远歇业”的启事。过了几天，有人在启事旁边粘了一张花笺，上面是仿照唐人崔护“人面桃花”的诗意而写的一首打油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黄汤相映红。玉人不知何处去，空令食客怅春风。”这一来，更加激起了顾客的公愤，经辗转打听，弄清原因后，纷纷责备这公子，不该只图自己享艳福，而剥夺了大家的口福。公子考虑到众怒难犯，和新婚妻子商量，办了几桌酒席，招待往日顾客，并当众公布蝴蝶面的制作办法，大家才怀着惋惜的心情散去。

原来蝴蝶面的制作方法是：以鸡汁调精粉，擀成象纸一样的薄片，用铜制模型按压成栩栩如生的一只只蝴蝶，蝴蝶翅膀上缀有极细的山楂片的星星点点，和其细如发的青梅丝，红、绿、白三色相映，成为一种精致悦目的工艺品。

面汤也有讲究：选购宝通寺一带出产的红菜苔，掐去菜苔尖，用余下的部份榨取汁液；配上火腿、银鱼、虾米及香菇等等；佐以清澈甘冽的龙泉水，放在用橡壳做燃料的文火上面煨，三沸以后，滤去火腿等物，留汤备用。

顾客登门时，先热汤，再下面片，起锅前投入少许菜苔尖。一经品尝，面片既爽口，菜苔尖又嫩又脆；汤汁鲜而不腻，不由你不为它的色、香、味叫绝。

这些诀窍公布后，虽然有人如法炮制，并在原址整天营业，但生意总不及以前"美人店"那样好。据分析除了用料欠考究，火候未掌握好以外，还有三种原因："美人店"只在清晨营业，顾客是饥者易为食；每人限购一碗，少吃多滋味；过了一炷香时间停止供应，物以稀为贵。看来"美人店"的那位姑娘对"顾客心理学"是颇有研究的。好事者还加上一条：后来执业者是五短三粗的黑汉子，其形象不能给人以美感。这就是说顾客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徐明庭）

武鸣园里吃河豚

近几年来，日本盛行河豚宴，有的访日归来并曾经品赏过这种名菜的人，就认为这是彼邦的特殊风味。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汉口有一家以烹饪河豚出名的餐馆一武鸣园。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曾经在这里领略过河豚的美味。当时，闻讯前往"观梅"者络绎不绝，留下了"名伶名肴两相彰"的佳话。

汉口人吃河豚的历史，有据可查的至少可以上溯到1840年（清道

光二十年)，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赞扬道："鱼虾日日出江新，鳊鳜鲴斑味绝伦"。诗中的斑鱼，就是河豚的俗名。

1919年，梅兰芳应汉口合记大舞台经理赵子安的邀请，到汉口作第一次演出。同来的有王凤卿、姜妙香、朱素云、姚玉芙等名角。按照当时的规矩，梅兰芳在演出前，先要到武汉的一些头面人物家中"拜客"。受拜访的人则设宴为他洗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被邀到汉口襄河边鲍家巷的武鸣园去吃河豚。终席后，梅兰芳赞不绝口。他后来回到北京，逢人就说：汉口的餐馆，数武鸣园最好。

梅兰芳在武鸣园里吃河豚的事，直到1933年还有人在汉口的《镜报》上发表过一首竹枝词，词曰：

口之于味亦犹人，到底梅郎赏识真。
舍命但求能适口，武鸣园里吃河豚。

可惜的是，武汉沦陷后，这家创建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享誉武汉独一无二的名肴河豚餐馆，被迫停业。从此，人们再也吃不到河豚了。

(徐明庭)

近代汉货精品

在今天改革开放大潮之下，武汉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汉货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涌现出一批驰名中外的汉货精品。

汉货精品的出现不自今日始，在近代，武汉就有不少产品荣获"国优"称号和国际奖牌。

1910年(清宣统二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我国首届商品博览会，当时称为"南洋赛会"。仅汉口获得一等赤金牌奖的产品就有4项，即美棣学社的绣字、彩霞公司的绣画、肇兴公司的新式绸缎、兴商公司的茶砖。取得二等镶金银牌奖的产品有9项，即周鼎孚的轧花机、熙泰昌的红茶、段义泰的金丝绒、太久保的罐头、雅森永的漆器、厚牲祥的茶叶、利华公司的制皮、向洪盛的仿古铜器、义顺成的漳绒。获三等奖的产品

则更多。

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了一等金牌奖，其中有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各种铜器、信记和兴商等18家公司、商号的茶叶也名列榜首，获二等银牌奖的有昌记等4家的茶叶，郑炳兴、姚太和、义太和的各种铜器、同义厂的猪鬃等8项。

从这些获奖产品可以看到，武汉的茶叶、刺绣、铜器、皮革行业中都有名优产品。武汉的砖茶在近代远销欧美，而汉绣、汉锣、汉纹皮则都是正宗汉货和名牌产品。

汉绣的历史悠久，清代和民国盛极一时，清咸丰时代的汉口织绣局，集中了大批优秀工匠绣制官服和挂品，一些绣铺所绣戏衣、桌围、寿帘、屏风、敬神和赛会用的一些古装品，金碧辉煌。汉口的绣铺多集中于绣花街。汉绣的名声虽然没有苏绣、湘绣那样显赫，但其针法却有自己的特色，为其他名绣所不及。汉绣以人物、花饰见长，主要表现手法是"平金夹绣"，具有色泽浓艳、华丽多彩的特点，装饰味浓，适于绣制挂品，前述在南洋赛会获金奖的绣字、绣画就属于此类。

武汉铜器亦有数百年历史，汉口打铜街是作坊比较集中的一条古老街道，近300年来一直是全国铜响器制造中心之一。武汉铜响器中以铜锣为最佳，俗称抄锣。汉锣与苏锣、秦锣、京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锣，它具有品种齐全、发音宏亮、圆润集中、起手灵活、吃槌省力、能长调门等特点。

武汉皮鞋在国内市场享有一定声誉，这与制作原料汉纹皮的质量好有密切关系。汉纹皮是选用优质黄牛犊皮精工制成的一种全粒牛皮革，适于制作高档皮鞋。汉口牛皮巷、磨子桥和武昌梅隐寺、郭家街的熏皮作坊在清光绪年间已负盛名，戴起瑞皮坊、巫兴记皮坊所制皮革尤为上乘汉货。近代化制革厂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由张之洞创办，厂址在武昌保安门外南湖之滨，后由继任鄂督赵尔巽接办，建厂经费由官钱局划拨，机器设备购自德商。机器生产改革了传统工艺，但保存了汉纹皮的特色。此外，名酒汉汾1919年也曾在巴拿马国际赛酒会上荣获

奖牌。

（郭淑芳）

武汉著名老字号 （中药业）

古老的药店叶开泰

汉口叶开泰中药店始创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有385年的历史，应该是武汉老字号中的“老中之老”。曾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同为中国四大药店之一。1956年公私合营，制药作坊并入“健民制药厂”。药店延至1963年改为国营江岸区中药店。改革开放后，又恢复原牌名，永葆青春。

叶开泰的先祖叶文机遭逢战乱，因懂医术明脉理，从江苏来汉口，在大码头鲍家巷赁一店屋，悬壶应诊，是为“叶开泰”之始。此后相传17代，一直是独资经营，前店后厂。从清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业务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自设作坊，狠抓质量。制参桂鹿茸丸，要选一等石柱参、正安桂、马鹿茸；制八宝光明散，麝香要用杜圣兴的；配制追风虎骨酒，虎骨要选购前有凤眼后有拜骨的腿骨来熬胶，并配用高度汾酒浸泡两年以上。所有自制成药，进药时无不严格把关，使用道地药材，绝对做到“宁缺勿滥，不好再来”。因而得以畅销湘、粤、赣、皖、豫、陕各省和港澳远至南洋。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到处肆虐，叶开泰顺着社会上仇视洋人的心理，宣传抵制洋货，西药害人，以扩大中药销售；乘开明人士提倡禁鸦片之机，大力宣传参桂鹿茸丸的功效，不仅能治病，且能戒烟。

历经300余年的叶开泰，历尽沧桑，业务财产有起有落，从第三代叶宏良起，注意培养教育好子孙，不少人进入仕途，不少人亦官亦商。其间最著名的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在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掳去，带到印度加尔各答，据传敌人要他穿戴朝服朝靴，锁在玻璃房中，叶名

琛不胜侮辱仰药自杀(实为病卒),保持了民族气节,这也使得叶开泰大大赢得声誉。辛亥年间,叶开泰毁于战火,元气大伤。叶凤池以陕西候补道主持店务。此人足智多谋,长袖善舞,重建店屋,精选老药工,加强管理,制止家族挥霍浪费,1912—1927年25年间,积累资金达白银104万两。

1931汉口大水后,叶开泰呈衰落趋势。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人员星散,部分人员迁入法租界,在车站路开一分店,就是现在挂着叶开泰牌号的中药店。

"同登寿域"的金同仁

金同仁药店是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黄陂街四官殿开业的。创始人金次屏,为一宿儒,曾历任江西南丰县知县,江西法政学堂监督,喜爱探讨中医药理,一次参加北京同仁堂乐家宴会,见到该店办得有声有色,既能济世活人,又可获取厚利,决意回武汉开设一个相当规模的金同仁药店。药店新张之日,他挥笔书门联:"同登寿域,仁跻春台",阐明他开药店的宗旨。

随着武汉城市的发展和社会需要,大革命前后,在特一区(前系德租界)坤厚里和武昌长街(今解放路)火巷口各设一分店。

药店货源分自制、批进。凡诸炼丹、制丸、熬膏和自制新药以及切片、研末等加工业务,都在杨家河堆栈进行。自制药必先请医家搜集古方,研究鉴定;加工雇请有经验的老药工作业。凡贵重药品人参、鹿茸、燕窝、银耳等,则派人至产地购进。另外还办了养蜂场、糟坊、酿蜜酿酒以供制丸、配药之用。更特殊的,还饲养了梅花鹿,每到冬季招来众人,公开宰鹿,藉以大事宣传。又如"制半夏"本属药店寻常事,而该店却标明"金锅制半夏"以示高众一格。

金同仁的自制虎骨木瓜万应追风药酒、五加皮酒尤为出名,甚至远销外省。原因是汾酒窖藏至少一年,药料比例严格,一丝不苟,每日售出几百瓶,节日达上千瓶,成为该店重要财源之一。

从长远着想，该店开业之初，特别办了学徒训练班，每晚授课两小时，学习写字、珠算、读药性赋，背诵汤头歌诀，学习三年，学会写、算，并能按处方配药的，提为店员。后来该店和分店的经理、骨干多从此提拔。

从金次屏起都注意收集古医书籍，所做古方、偏方和自家整理的药方千余种，1955 年公私合营时全部 献给国家。近年来改革春风吹遍江城，事隔 37 年，"金同仁"药店的老招牌又出现于五马路口。

以饮片闻名的陈太乙

辛亥革命时，清军在汉口纵火，汉水沿岸精华丧尽，一些大药店相继下迁，1914 年陈太乙中药店在今民权路崛起。该店资金雄厚，职工众多，设有制药作坊，自制饮片不下千余种，均按古方精工炮制。销出饮片，得到医生和病家的信任，占领了这片市场。1955 年公私合营后，药房归并，店面消失。最近又在民生路、花楼街口恢复了"陈太乙"牌名。

洪帮大爷开设的初开堂

初开堂药店是处于中山大道佑安里口（今六渡桥百货公司隔壁），面对三民路，系洪帮大爷杨庆山等于抗战前集资开设的，以销售饮片为主，兼制丸散膏丹。由于地处冲要，历来生涯鼎盛，加之该店主人与汉口各善堂有较密切的联系，善堂成批进货，销售量很大。现"初开堂"的金字招牌仍在原处，熠熠生辉。

此外，武汉著名的老中药店，如江汉路的保和堂 ，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开业的，达仁堂是杨寿丰创业于清光绪年间。在民国初年开设的刘有余堂、太和堂都有一定的名望。但 1955 年后，已不在市面上露面了。原在汉口前花楼街开设的刘天保药店，解放后改为国营，迁往青山，近年来已有较大发展。

（刘莉）

武汉著名老字号 （绸布业）

妇孺皆知的谦祥益

汉正街百年兴旺的谦祥益衡记布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誉满三镇，妇孺皆知。近百年来，除因时局影响，经常是顾客盈门。

谦祥益起源于山东章邱的孟传珠，他从挑货担起步，开布店，开染坊，积累了大量资金，遂到北京独资创设谦祥益布店（以后称总店），经过四代经营，业务大大发展，在全国各大都市天津、上海、济南、开封相继设了分店。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谦祥益第二代老板孟继富、赵春山来到汉口，在戏子街（今人和街）初创谦祥益布店，着重批发。至 1895 年再在汉正街开设一家规模较大的“谦祥益衡记”绸布店。该店用人，按照北京总店的标准，从职工中挑选忠于孟氏，肯为孟家服务、有能力、有工作经验者分任“掌柜”、“照场”。工薪按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划分，差别颇大，店员也分 3 等。每年终结，按等、按成绩奖给红利。30 年代总管可得红利 10 厘，掌柜可得 7.5 厘、4 厘、3.5 厘、1 厘不等，店员也分得数目不同的奖金。管理上分四大部门，十多个专柜，权责分明。

清末民初，民间衣着，大都依靠土布，土布粗厚而耐穿耐磨，但不好看。扬长避短，那就莫过把白布予以染整加工，使之成为色泽鲜光而又经磨的三宝蓝布一宝蓝官布、宝蓝竹布、宝蓝洋布。该店看准了这一点，集中力量，狠下功夫，尽量做到价廉物美。对于色泽不均的次布，则分等打折，决不以次充优，备受大众欢迎。远自郊县、荆、襄、豫、湘、陕的商贩纷至沓来，最好时期，年销 130—140 万银元。

解放后 1956 年公私合营，1958 年改为国营，定名为“国营谦祥益商场”，经营布匹、百货万余种。

悦新昌绸缎局

解放前在繁华的江汉路与中山大道转角处的"悦新昌绸缎局",货架上百彩纷呈,购货人推进涌出,十分引人注目。1952年招牌换上"江汉绸布公司",老店新张继续营业,直到现在更加兴盛,是武汉绸布商店老字号仍在原址保持原貌的商店。

"悦新昌"创设于1918年,是老采章绸缎局店东孙汉钟与杭州悦昌文绸缎庄王颂坚合资经营的。在此之前,孙汉钟预见歆生路(今江汉路)与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必有大发展,遂在两路交接处新建3层大楼新式铺面。绸缎备货齐全,苏州、南京、镇江、湖州所产之新花色新品种,应有尽有。开业后,销售畅旺,年营业额达50万两。

由于内部人事纠纷,风波迭起,抗战前后,元气大伤,1947年宣告破产停业。这时华口绸缎公司胡梅堂与东华染厂集股,顶接下来,仍用"悦新昌"招牌,开张营业,大获其利。至1949年,物价一日数涨,货物售出不够补进,奄奄待毙。

解放后,党和政府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绸缎呢绒销路不畅,江汉路几家销售绸缎呢绒的商店,也不例外。悦新昌负责人汪祥法,联合九大、荣康、鸿祥三家将悦新昌改为"江汉绸布公司",1952年元旦开业,经营棉布、灯芯绒、卡叽、华达、府绸、香云纱等,营业鼎盛,一时江城无双。1953年营业额达旧人民币286亿元,获利10亿元。1955年进入公私合营的行列。后改国营,现仍屹立于"商业文明一条街",迎接如涛如潮的顾客洪流。

当然,武汉老字号绸布店还有不少,如汉正街的瑞记、太恒庆,黄陂街的和记、大成、时新昌和江汉路的鸿彰永、荣康以及武昌的三义等布店和上下怡和,可是大多早已停业,1955年后再看不到它们的招牌了。

(华缓)

武汉著名老字号 （餐馆业）

经营楚乡名菜的老会宾楼

老会宾酒楼位于汉口最繁华的闹市中心三民路，经营楚乡名菜兼及万方需求，数十年来，上至名人显宦，下至贩夫走卒，众多食客无不慕名而至，高兴而归。这座酒楼，原名"会宾"楼，第一代老板汉阳人朱荣成，文化低，"会宾"两字是他的儿子朱世泽从中华书局出版《中西菜谱》因袭而来的。"会宾楼"开业于1929年，论资格不算太"老"，何以要自充"老"呢？那是因为武汉沦陷后，日本商人在会宾楼附近也开设一座日籍"会宾楼"，企图以假乱真，同会宾楼抢生意。颇有胆量的朱荣成找到日本领事馆控告，败诉后愤火中烧，即将会宾楼招牌上加一"老"字，成为"老会宾楼。"

老会宾楼主要经营湖北风味、楚乡名菜。其著名产品有湖北三蒸、东坡肉、明珠桂鱼、掌上明珠、全家福、蟠龙切卷、清炖甲鱼、焖甲鱼、红烧滑鱼、葵花豆腐等 。

日本投降后，酒楼营业一度兴盛，真正起飞时还是解放以后。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政府拨款160万元，兴建6层大楼4000平方米，1982年大楼落成开业，以武汉市国营第一流酒楼全新面貌迎宾。

以鱼菜为主的大中华酒楼

大中华酒楼是一家鱼菜为主的餐馆，三四十年代曾在武昌驰誉一时，至今不衰。当时武昌城区狭小，大中华地处平阅路（今彭刘杨路）柏子巷口，法院在右手对街，湖北省政府也迁到对面梳妆台，人杰地灵，生涯鼎盛。

1930年，大中华酒楼在芝麻岭（今武昌邮局对面）开业，1932年修建马路，迁至现址。酒楼一楼一底，底层卖经济客饭，一菜一汤，饭管饱，

三、五角钱，学生、小职员和收入不多的劳动者川流不息。二楼经营名菜，以鱼为主，如清蒸鳊鱼、网油松鼠桂鱼、糖醋桂鱼、五彩桂鱼、牡丹桂鱼、银丝桂鱼、烧青鱼划水、烧肚脍，并兼及其他菜肴，以后又扩建了三楼，宴会频开，嘉宾接踵，省会无匹。

解放后，大中华酒楼营业更加发展。1966年改名"新中华酒楼"，1968年再改"武昌饮食部"，1971年新建四层大楼落成，面积1600平方米，比原大中华扩大了4倍，外表焕然一新，内部安装也实现了现代化。在此期间，重点研究"武昌鱼"的烹饪，有所创新，如扬梅式武昌鱼，花酿武昌鱼，做到色、香、味三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备受嗜鱼的顾客和海外人士的称赞。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大中华酒楼恢复了老牌名。并在原楼两旁扩建两栋更高的大厦。

小笼汤包四季美

小笼汤包，原是下江风味的小吃食品，清末民初就曾溯江来到江城，适应汉口居民宵夜的习惯。1922年汉阳人田玉山，在后花楼交通路对过一个侧巷内，开了个熟食店，经营小笼汤包和猪油葱饼。这个所谓店，是个只有几张半园桌靠墙摆设的小而窄的店堂，开始叫"美美园"，后来看到又圆龙寺、长堤街有两家下江馆子，挂出早已著名的"四季美"的招牌，田玉山想美美园店虽小，但地处闹市区，也有意改换招牌。不料他的侄子田泽春竟在隔壁开店，打起"四季美"的牌号，激怒了他，索性挂出"老四季美"的招牌了。

田玉山从南京请来了烹饪好手徐大宽师傅，待如家人，徐师傅也把自己视为田家的一员。先做葱油饼，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这是老四季美迅速发展的最关键的一着。由徐师傅建议，做起小笼汤包来。汤制作程序严格，第一步熬皮汤，做皮冻，第二步做肉馅，第三步制包，最后"一口气"火候，都要一丝不差。用料选上等，肉皮要绝对新鲜的，肉馅要一指膘的精肉，蟹黄汤包要用阳澄湖大鲜蟹等，不得以次充优。如此食鲜

物美，倍受江城人民的爱宠。解放初期，生意进一步兴隆，因狭窄的旧址已不足以迎接四方来客，遂至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会之处，建筑起四层大厦，由小吃店发展成为大餐馆，四季美小笼汤包因而驰誉遐迩。

豆皮大王老通城

“老通城”，原名“通城”饮食店，是1929年汉阳人曾厚诚在大智路口开办的。开张之初，只供应早、中、晚点。1947年，抗战胜利，曾厚诚从大后方回武汉，在原址复业，大事修饰，扩充店堂，增加经营品种，改招牌为“老通城”食品店，以示其资格老、手面大。

曾厚诚听到曾在武汉几处工作的名厨高金安制作豆皮的手艺出众，重金聘用，有意以高师傅的拿手“三鲜豆皮”为突破口，作为本店产品的特色，在三楼高处安装“豆皮大王”的霓红灯，招徕顾客，果然大奏奇效。

豆皮原是湖北农村的食品，传到城市，用糯米、香蕈作馅子，很受食客欢迎。武昌王府口“杨洪发豆皮馆”开业于清同治年间，是武汉最早的豆皮馆，出售光豆皮，具有油重、外脆、内软特色，人称“杨豆皮”。后来发展为什锦豆皮、三鲜豆皮。老通城的三鲜豆皮，是以“杨豆皮”为主要源流博采众长而制成的，正如“豆皮大王”高金安所言：“不能说武汉豆皮由我高金安首创，因为在我之前已有不少的同行前辈，我是吸取他们的经验，并有所改进。”

1953年，曾厚诚逝世，他的子女都是革命干部，不愿继承，请求国家接管。1955年元旦，成为武汉第一家私营改国营的商店。同年11月，奉市委指示，在惠济路口分设了一个支店，1958年4月3日和9月12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来支店品尝了三鲜豆皮，留下了“国营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成为老通城店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老大兴园与“鲳鱼大王”

“老大兴园”餐馆位于航空路口，它的前身只叫“大兴园”，汉阳人刘

木堂创始于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原址在汉正街升基巷13号。光绪年间,刘木堂的徒弟吴云山继承经营,大有发展。这条不满百丈的升基巷出现几家以"大兴"为牌号的餐馆。民国初年,吴云山为保住"大兴园"这块招牌,托人送礼,请夏口县罗知事书"老大兴园"四字做成金字招牌,藉以独保牌名,招徕食客。

老大兴园主要以烹调湖北风味菜肴为主,后来发现武鸣园的鲴鱼特别鲜美,吸引了很多上层食客。1936年,吴云山以50银元一月的高工资,把烹调鲴鱼的名厨师刘开榜请进"老大兴园",挂牌"鲴鱼大王",于是两块招牌相得益彰,名声更大。

鲴鱼,又叫鲢鱼,体长,吻锥形,体呈粉红色,背灰、腹白、腠肥且厚,肉质细嫩。常栖息于长江底层,尤以湖北石首、簰洲、笔架山一带为最佳。宋代诗人苏东坡闲置黄州时,对食品诸多研究,他曾赞鲴鱼:"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一经品题,流芳千古。

刘开榜的红烧鲴鱼非选自石首的活鲜的不可,辅以特制的鸡汤,佐料齐全,火功适宜,食客莫不视为珍品。刘开榜的烹调鲴鱼的技术代代相传,不断创新。论"鲴鱼大王",刘算"开榜"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则是曹雨庭、汪显山。

从"筱陶袁"到"小桃园"

北方人待客都要请人吃饺子;武汉人家来客,饭桌上少不了一碗汤,请客喝汤,是待客最尊敬的方式之一。武汉人都有喝汤的习惯,汉口有家"小桃园"煨汤馆,就是为适应武汉人的胃口而开设的专业煨汤馆。从40年代初这家馆子开业算起,有近50年的历史了。

这家馆子的创始人陶坤甫和袁得照,原来都是汉口天主堂医院厨房厨工,陶是西餐厨工,袁是中餐厨工。1944年12月9日美国飞机轰炸沦陷了的汉口,这家医院被炸毁,陶、袁两人同时失业,只好各谋生路,一个帮工,一个做小生意,藉以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陶坤甫在胜利街兰陵路口（今兰陵路64号）一片废墟上清了一块空地，搭了个10平方米的小棚子，卖豆浆、糯米包油条等小吃，袁得照也到这里炸面窝。但生意清淡，很难维持生计。陶、袁二人在一次交谈中，商量如何摆脱困境，陶坤甫在医院做西厨时，对煨汤技术颇有研究，他根据武汉乃至湖北有喝汤的爱好，建议开一个专门煨汤的馆子，袁得照十分赞成。于是，两人合伙在这里卖起了牛肉汤和八卦（乌龟）汤。由于精工细作，物美价廉，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八卦汤的肉鲜嫩，不仅营养丰富，还有滋阴补肾强身的功效。他们选料是用半斤以上的活乌龟。宰杀前先放入水中，待吐净腹中脏物后，再破壳、挖肉、分肠、取蛋、去皮，然后解刀洗净，入锅爆炒。最后经过煨、焖等11道工序，再配以各种味料按份额放入罐内，小火温炖。其汤稠浓，龟肉鲜美可口，因此八卦汤名声日显，生意十分兴旺。

陶坤甫、袁得照掌勺煨汤，配合得法，每天掌握进销环节，所进牛肉、乌龟都要十分新鲜。解放前夕，法币、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这家馆子的煨汤一日三易其价，食客仍然不减。

1948年，随着营业日渐兴隆，于是小棚子扩建为20多平方米的店堂，可以放3张桌子。又先后增加了母鸡汤、甲鱼汤、排骨汤、鸭子汤、鸽子汤、猪蹄汤等十多个品种，各有特色。尤以母鸡汤最著名。据陶坤甫先生撰文介绍：他们的鸡汤专用黄（皮）孝（感）母鸡，这种鸡肉嫩油厚，不同于肉粗、骨大、味淡的河南鸡。经过宰杀、去毛、破腹、取内脏、去头脚、切成1寸半长的块状。入罐前，先用猪油、葱白在锅内一炸，再用生姜、白糖、精盐、料酒并鸡块倒放锅中爆炒，同时放入少许清水，待水欲干未干，鸡肉成黄色时起锅，然后放入砂罐煨到八成熟，起火停放一刻钟，再上火，焖透后按份量装入瓦罐小火温炖。这样煨出的鸡汤肉嫩酥烂，汤清油黄，醇香味美。

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许多顾客说，这样好的煨汤，也该有个招牌，陶、袁两人一合计，仿照三国时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以两人姓氏取店名，但因他们只有两人，就想在陶袁二字前加一"小"字。而"小"字只有3

划，怕生意只做得3天，就将"小"字改成13划的"筱"字，起了个"筱陶袁"的店名。那年头挂牌谈何容易，起码也要摆酒请客，燃放鞭炮，他们无力支应，只好等夜深人静时把招牌悄悄挂出去。谁知警察还是来找麻烦，汤喝了不给分文，还说不卫生，把陶袁两人抓到局里关了一天一夜，后来在六渡桥请了他们的客才算完事。

1979年，年近古稀的筱陶袁煨汤馆副经理陶坤甫建议将店名改为"小桃园"，新建的八层楼店堂一、二层已开始营业，近5000米的营业面积超过解放前的50倍。由"筱陶袁"到"小桃园"，店新、人新、品种新，50年的老店历史增添了崭新的一页。

武汉历史上的著名餐馆，如"得月楼"、"杏花楼"、"吟雪楼"、"蜀珍"等等，不胜枚举，只是随着经营情况的变迁多已歇业，市面无处追踪。而今保持原牌的除前所述，还有"德华楼"、"冠生园"、"江南春"等。而自民国以来，曾张盛帜于江汉路中段的"普海春酒楼"（今武汉第二物资商场左右三个门面，三楼三底），中西餐点俱备，南北名菜齐全，历为军政要员，国内外贵宾宴会之处，现已消声匿迹，是颇为可惜的。

（林青　商若冰）

武汉著名老字号（食品杂货业）

250年的老店汪玉霞

武汉食品商店中最老的牌号要算"汪玉霞"，创始于1738年（清乾隆三年），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

汪玉霞的第一个老板叫蔡玉霞，原是安徽休宁人汪士良的姨太太，蔡开店用己名而从夫姓，故称"汪玉霞"。最初为一小店，设在汉正街灯笼巷口，只卖些茶叶、甜食等小商品。蔡玉霞死后，汪士良之长孙汪国柱继承。嘉庆初年，因白莲教大起义，清廷封锁九江关，汪国柱在此所开油榨坊，桐油积压，不得下运，心急如焚。一日老仆窥见九江关关督鸣锣过

街，关督原系汪士良生前好友，汪国柱前往具拜帖求见，关督告知三天后开关一个半时辰，嘱其作好准备。其时大批桐油困泊关口甚久，急欲抛出，汪国柱乘机压价，收购3000万斤，待至开关时刻，抢先出关下运南京、上海，突获暴利，旋在各地开设当铺、行号136家之多，小小汪玉霞因系祖业特别重视，每年年终召集各地商号掌柜来吃团圆饭，总结工作。店内职工则有"一年二十四辈(初一、十五打牙祭)三大醉(元宵、端午、中秋三节)，开张谢神不在内"的招待。

汪玉霞一向是前店后厂，以销定产。生产规模不大，全系人工操作。自己生产的食品有酥糖、酥京果、碱酥饼，颜色黄润，香气扑鼻，食之清脆爽口，人们称之为"泡酥"。其用料讲究，糖择上好的太古糖、台湾糖，大批购进长期存储，使糖的油卤吐出，溶头好；油用驻马店的麻油，颜色清亮；芝麻用武泰闸的，皮薄肉厚；鸡蛋用阳罗的鲜货；面粉用上好的；糯米要筛选一样的粒子，泡上70—80天，再按照独特制作程序，制成成品。其他自制芝麻绿豆糕、月饼、五香瓜子，五香干子，也都经过内部品赏、鉴别，绝不滥竽充数。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染上鸦片瘾者甚多，抽烟以后，口觉苦味，大都喜爱吃甜食，食品行业生意兴隆，汪玉霞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该店历经九代，其间"兄弟阋墙"，曾分裂为"两记"、"合记"(后花楼)，但终于保持"汪玉霞"这块金字招牌。解放后经过合营到国营，一度改为"新华食品厂"，后又恢复原牌"汪玉霞"，美誉长青。

"一大把"蚕豆起家的曹祥泰

武昌曹祥泰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开业的，历经三世，由小摊贩发展成为武汉数一数二的大杂货店，还是兼有机米厂、糟坊、肥皂厂和钱庄等相当规模的企业。

曹祥泰创始人曹南山，13岁时丧父，幼年就负担上事老母下蓄弟妹的责任。邻居见他无以为生，凑点钱，让他提篮子卖蚕豆。人们买他的蚕豆，他总给人家抓一大把，比别的小贩多，久而久之，"一大把"出了名，

曹南山也多销多赚。后来又做水果生意，由提篮到挑担子，渐渐有了积累。一年夏天阴雨变冷，河下到了大批西瓜船，瓜价大跌，他预料久雨必变晴转热，连买带赊进了两船。不几天，果然天晴暴热，西瓜价上涨十倍，这一下就赚400串。拥有相当资金，择地武昌长街新街口（今解放路）开起了"曹祥泰"，卖水果，兼卖杂货。

第二代曹南山的长子曹云阶接办杂货店，兢兢业业，办起了糕饼坊，自制中式糕点，品种多，质量好，特别是各式月饼、绿豆糕和腌制盐蛋，每逢节日，商店门口，总是排起了购货人的长龙。他自抓进货，与本市和沪苏厂商有往来，且和英美洋行有联系，"僧帽牌"洋烛，"美孚牌"煤油和香烟都委托该店代销。

次子曹琴堂，有科学知识，自办工业，先倡祥泰肥皂厂（今中华路），生产"爱华""警种"等肥皂。"警钟"肥皂行销广东及华中各省。

1956年曹祥泰杂货店进入公私合营，旋改国营，更名为"工农兵副食品商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祥泰"牌名重新露面，焕发青春。

过世纪的伍亿丰

"伍亿丰，挤不通"。这是武昌市场一句旧的口头禅，描绘了伍亿丰铺店内外的顾客众多生意兴隆的景象。

清咸丰年间，伍家模14岁时就在湖南做行商，精通业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今粮道街胭脂巷口（当年胭脂山通道，蛇山洞均未开辟）创办伍亿丰杂货店。

伍亿丰除经销一般杂货、糖食、糕点、肥皂、煤油、水果等主要进货外，自身设有酱园和烛房。酱园规模较大，酱缸由粮道街店后一直摆到胭脂山上，达400口之多，每年黄豆上市，即大量囤积，备一年之用，将黄豆做成元丕，趁盛夏伏天晒酱，制酱油，质好味鲜。平时收购各种蔬菜，自制酱菜，其品种有：辣酱、酱萝卜、酱姜、酱瓜和醋，并腌制春菜、雪里红、[illegible]头、豆角、蒜苗、腐乳等等，烛坊制烛所用油脂为牛油、皮油和木子油，烛芯则是用棉花搓成的，腊烛品种有条烛、风烛、金字烛、画花方

烛、龙凤爪烛，分芯烛等，多种多样，行销三镇，远及农村。

伍亿丰发展很快，全盛时期多达 8 个分店，还在汉阳办 1 米厂，1 个糟坊。1967 年进入国营，改为胭脂路副食品商店，80 年代复名"国营伍亿丰商店"。

老锦春酱园

汉口老锦春酱园的酱菜，香、甜、脆，久负盛名。该店前店后厂，亦工亦商。所经营的酱品，种类繁多，计有蓑衣酱罗卜、酱瓜、紫苏豆、 头、甜蒜头、泡蒜苗、酱海带、京冬菜、南丰菜、臭面筋、糟鱼、糟鸭、咸鸭蛋、青红方、五香干子等等。

酱厂制作酱菜，特别考究，如蓑衣罗卜，选用上等黄州罗卜，酱好后，切成可掩长的蓑衣形，再以冷却的冰糖水浸泡晒干。酱瓜则将青嫩的小黄瓜泡进甜面酱缸，每天深夜转缸一次，把瓜上沾的面酱一条条地抹掉，如此连续转缸 20 多次，才算成品。盐蛋，一定要到沙湖进购新鲜鸭蛋，经过精工腌制，阴藏一定时期，经验查盐蛋内全部变成"朱砂黄"才算达标。

老锦春是镇江王家独资经营的祖传老店，位于汉口黄陂街大龙巷口，清末第二代老板王春卿，中过秀才，留学日本，任教荆州书院。主持店务后，钻研医理，自选 中草药配方，泡制"长春药酒"滋补益寿，为该店畅销品种之一。

该店除经营酱园外，也自制糕点，经营杂货。解放后，专作酱品销售业务，现改为国营"味锦春"。

以往的杂货店，按现在的供应范围讲，应属于副食商店，差不多每条街都有，其中大进大出、批零兼营的著名的大杂货店，还有黄志成、天福记、贺恒昌、方大成、陈立丰、虞恒泰等近百家，只是继承人经营无方，解放前多已衰落，今已无影无踪。（阳玄桦）

和利汽水厂发家小史

武汉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每到盛夏，赤日炎炎，酷热难当。人们工作、生产之余，喝上几口清凉的饮料，当然十分惬意爽心。现在，汽水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是一般群众都能享用的解暑佳品。可是，在20年代初叶，汽水却是一种奢侈品，由于售价很贵，一般劳动人民是无力问津的。

早在1858年(清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势力侵入武汉，英国商人蜂拥而至。每年夏天，都要从英国运来啤酒、汽水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供其享用，不仅价格昂贵，且十分不便。

英国人柯三和克鲁奇看中了汉口这块黄金宝地，便辞职合伙开办冰厂。他们从英国购来了一套小型制冰设备，在汉口法租界霞飞大将军街(今岳飞街)购地建房，于1911年上半年开始生产机制冰块，工厂定名为"和利冰厂"，取二人"和"气生财，合伙谋"利"之意。机制冰清洁卫生，冰块量足质好，很快挤掉了人工生产的天然冰，占领了市场。

与此同时，法国商人纳加利在法租界海寿街开了一家小规模的人工制造汽水车间，生产"荷兰水"。到了1918年，英商赞育药房参加投资扩建，作为该药厂附属工厂，定名为"赞育汽水厂"，并从英国运来了新机器，正式成为汉口第一家机制汽水的工厂。由于机制汽水生产过程中需用冰块，而这些冰块全从和利冰厂购来。

柯三和克鲁奇看到汽水销路大、利润高，又合伙开办了一家汽水厂，即"汉口和利汽水厂"。1922年开始生产"和利牌"汽水，注册商标是一个有古宝塔城楼的圆形图案。从此以后，两家外商汽水厂生产的和利汽水与赞育汽水垄断了武汉三镇及邻近县、省的市场。汽水主要消费对象为咖啡馆，舞厅、歌厅、跑马场、洋行、银行、海关和各驻汉领事馆等高级场所。普通市民只有"望水兴叹"。

1931年，克鲁奇病逝，和利冰厂和汽水厂均由柯三独自经营。数年

后，柯三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无力兼顾两家工厂，有意把汽水厂卖掉，但因售价太高，长期未能售出。

1937年，汉口同和米厂经理兼油商刘耀堂，想以英商名义保护他在汉口的产业，便于1938年以银元16.7万余元，买下了柯三汽水厂，但刘在购厂10天后即携带大部分资金前往重庆经营，随即武汉沦陷，和利汽水厂在日寇"军管"下，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市上销售的汽水，多半是英商生产的赞育汽水和日伪开办的"汉皋汽水厂"的产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耀堂父子恢复了和利汽水厂的生产，并更新了设备，调整了人事结构，转变了经营作风，汽水年产量达到12万打以上，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而赞育汽水厂和汉皋汽水厂由于业务不振，都相继停业，和利汽水厂以每月黄金8两（后减为4两）的租金，取得了赞育汽水厂厂房和全部设备的租赁权。这样，武汉的汽水市场成了"和利汽水"的一统天下，不久，和利冰厂也被汽水厂兼并了。

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利汽水厂由公私合营到国营，成为生产滨江牌汽水的武汉饮料二厂，70多年的老厂焕发了青春。

（商若冰）

经营有方的国货公司

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是武汉中心百货大楼的前身。公司首创于1937年12月，次年9月即日寇侵占武汉前夕被迫停业。1946年10月10日复业后，不到三年，武汉解放，该公司即被人民政府接管，初属中南区百货公司领导，1950年7月15日起隶属武汉市百货公司，正式换上"武汉市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招牌，成为武汉市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新型商店之一。

武汉中国国货公司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部分股金来源于中国、交通、新华三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与四大家族藕断丝连，因而它是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商业企业。它的经营管理，以聘任经理制代替掌柜

负责制，积累了一套经营管理的经验，具体表现在：资金运用，实行柜组定额管理；采购计划，实行营业部审批管理；服务态度，实行服务规则管理；团结同业，实行平抑物价管理。尤其是在服务态度上，职员若违反了服务规则，必按章严惩不贷。

公司既名中国国货公司，那么，专营国货自然成为其经营特色之一。公司复业时，曾将《武汉日报》、《大刚报》、《华中日报》、《和平报》等当时武汉地区的四家大报头版头条的版面包下来做了3天广告，说明"完全国货，挽回权利"的宗旨；同时还在报纸上开辟一块"国货之光"园地，对顾客宣传爱用国货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登上"如有人在买去的商品中发现一笔是外国货或是改头换面与鱼目混珠的冒牌国货，赏伍拾元"的话语，以推动国货事业的发展。

公司的经营特色之二是真正以顾客为上帝，在花色品种上，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既有高档品，也有大众货，以满足各阶层顾客的需要。同时顾客将商品买走后又拿来退或换，公司都采取特殊办法给予解决，不搞"货物出门，概不退换"那一套，这样，既使顾客满意和感激，又为公司带来了信誉，真正做到了"信誉第一，顾客第一"。

（朱务本）

"外圆内方"
——周恒顺的立厂之本

周恒顺机器厂是武汉的一家老厂，它的前身是周天顺炉坊。19世纪60年代，周家第八代经营人周庆春将炉坊从武昌大堤口搬到汉阳双街。他认为，干事业不能靠天吃饭，必须通过自我努力，而且要持之以恒，才能顺达起来，因而在1866年（清同治五年），正式改招牌为"周恒顺"。开始仍沿用泥模土法铸制香炉、神钟、汤罐、鼎锅等日用铁货，如黄鹤楼的大铜顶、汉阳归元寺的大香炉鼎等，都是用这种方法铸造的。迨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周家第九代周仲宣主持炉坊业务以后，这

个手工作坊才正式改为"周恒顺机器厂"。

周仲宣聪明勤奋，思想开放，继承祖业以后，他顺应形势的发展，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广揽人才，从生产轧花机入手，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在旧中国的数十年间，周恒顺机器厂陆续生产出蒸汽机、卷扬机、抽水机、蒸汽抽水机、制茶机、造币机、煤气机、轮船等多种机器产品，与此同时其厂房、设备、业务不断扩展，相继在各地开办了几家子公司和五金分号，并经营上海华成电器厂等单位的产品，资本不断增大，到抗战前夕，该厂在武汉成为仅次于扬子机器厂的第二大机器工厂。

抗战期间，周恒顺西迁重庆，成为民生轮船公司附属企业，改名为"恒顺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抗战胜利后，汉阳恒顺机器厂恢复生产，但已无昔日雄风，其后是3年内战，苦苦撑持而已。1950年11月，经济非常拮据的汉阳厂经中南财经委员会批准，与中南工业部公私合营，定名为"中南工业部公私合营中南恒顺机器厂"。1954年武汉大水，迁往武昌解放桥附近，改组为武汉动力机厂。1958年合并为关山工业区武汉汽轮发电机厂。

在解放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周恒顺这个民营企业在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搏斗竞争中能够幸存下来，并逐步发展，与它坚持"规矩方圆"的立厂之本有很大关系。该厂注册商标，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古训立意，正中是一个圆规和一个直角尺，外围一个正方框框，再外则是一个圆圈。寓意是以圆规角尺代表规章制度，信赏必罚，技术上要按质量标准、严格把关。"内方"就是对内要严格、一丝不苟；"外圆"就是对外要灵活，圆通应变。这个"规矩方圆图"集中体现了周恒顺的服务方针和管理原则，也是它从夹缝中闯出一条生路、规模由小到大并为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借鉴。

（朱务本）

武汉地区主要教堂

以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三个教具有规模的

宗教活动场所称为教堂(Curch)。解放前后，武汉市内共有教堂约 90 所。其著名教堂有：

武昌大堤口天主教教堂是武汉地区最早的教堂，当清道光皇帝于 1846 年 2 月(道光二十六年元月)发布上谕解除了康熙以来 120 多年的禁西教政策以后，第二年大堤口已有教堂行封立主教的活动。后经 1885 年(光绪十一年)、1893 年的扩建，内可容信徒 400 余人。大堤口教堂是武汉地区最早的西式建筑构造，也是汉口辟为商埠以前的唯一教堂。但这座教堂因属危房，于 1991 年经批准拆毁。现存武汉地区最早的天主教教堂系 1866 年(同治五年)建造的花园山天主堂。

汉口上海路天主堂，为武汉地区天主教最大教堂，现在开放，有经常性宗教活动。该堂于 1876 年建成，古罗马式，地基高，窗户小，教堂呈十字形，正殿后侧左右各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气势雄伟，全堂建筑面积为 1024 平方米。

座落在汉口黄石路的基督堂荣光堂，建于 1931 年，初建时以进入华中地区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杨格非命名而称"格非堂"。解放后改名荣光堂。该堂建筑面积 1191 平方米，为武汉最大教堂。堂舍落成时，耗用建筑费银洋 56000 圆，连同地皮共耗银洋 101500 圆。教堂共两层，第三层系假层，为大型聚会唱诗班席。礼拜大堂设在第二层，楼下一层为办公、社交之所。本市基督教和盛大聚会多在该堂举行。

美国基督教在武汉所建的最早的教堂为武昌昙华林圣诞堂，建于 1870 年的圣诞节。解放前，教会所办大中学校在校园内均设有教堂，供信教师生礼拜之用。圣诞堂自建成以来，曾为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华中大学的校内教堂，直到 1951 年，持续 80 年，为武汉市教会学校内时间最长的教堂。该教堂至今仍屹立如旧，为湖北中医学院使用。

在汉口鄱阳街—天津路交界处的一座绿色建筑物是东正教在汉的唯一教堂。19 世纪下半叶，此间住有许多俄国茶商。因俄国以东正教为国教，在汉第一位俄领事与俄茶商即在 60 年代末筹资建堂，1876 年由

俄茶商波特金从俄国运来建筑材料，初建活动教堂。接着由俄茶商伊望诺夫出资将教堂建成为砖木结构，并于1878年将该堂产业捐献给教会所有。该教堂为六角形单层建筑。中轴线前后有门；其它4角为厚墙身逐皮收进的尖拱窗户。屋顶作穹窿圆形，铁皮屋面，建筑外表均漆成绿色，顶部立大十字架，并有风向仪。教堂建立于此街面高出50公分的地基上。该堂成立以来，主要为在汉之俄国侨民的宗教活动场所，神职人员解放前也系俄人，解放后虽换了中籍神职人员，亦为被称作阿尔巴津人的俄满族混血后裔。

（梅川）

韦棣华与武汉第一所图书馆

我国在19世纪以前只有传统的藏书楼，还没有面向社会为开启民智而设的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产物，而在中国社会予以介绍推广进程中，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韦棣华系美国纽约人，生于1862年，1900年来到武昌，第二年即在武昌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文华书院任英文教职。她在美国学的是图书馆专业。她身居武昌31年直至逝世，终生致力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突出事迹有二：

第一件事，她创立湖北省第一个近代图书馆。坚持图书馆工作要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方向。韦女士在文华书院任教开始即1901年，就在该校的一所八角房子里，陈列图书期刊，供学生随意阅览，也可外借，此为湖北地区图书馆工作的滥觞。到了1903年，经韦女士精心筹办，一所粗具规模面向校内外读者的图书馆开办。1904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出版的月刊《Spirit of Mission》6月号，曾以《文华书院图书馆介绍》(《The Boone School Liberary》)一文报导了由韦棣华女士于1901年创办以来的发展情况，文章还附有一张照片，反映戴着瓜皮帽的青年学子在该图

书馆借书、阅读的热烈景象。这一图书馆到1910年被扩建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定名为“文华公书林”，意即为民众化之公开图书馆。公书林大楼经过80多个春秋的风雨，至今屹立如旧，为湖北中医学院的大礼堂。“公书林”不仅面向武汉三镇的广大读者，而且还在各公私中、高等学校里设立图书馆分点，每隔两周由“文华公书林”负责更换一次，以此推动各校图书馆的成立。韦棣华的图书外借活动曾引起校内当权派的强烈反对，但她却始终坚持为社会民众服务的办馆方向。

第二件事情，韦女士在武汉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图书馆专业学校。为了促进这一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女士曾以私资保送两名文华大学学生去美国学习图书馆专业。这二位青年学成归来，即协助韦棣华在1920年3月建立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科，招收大学肄业二年的学生入学，此为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到了1930年，才正式独立定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址在武昌高家巷（清末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旧址）。解放前，我国曾有几所著名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业，但都是时断时续；唯有“文华图专”经历了30多年艰难历程，坚持办学而从未中辍，一直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与不遗余力的推动者。文革前，我国各地大型图书馆的主要学术人才几乎都出自文华图专。

（梅川）

湖北最早的西医院和第一位西医

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院是哪一家？

答曰：座落在汉口汉正街汉水桥畔今之市立第四医院——解放前名普爱医院是也。

19世纪基督教自西方初传来中国，由于政治、文化、语言的隔阂，难以接触中国的百姓群众；以行医为手段接触中国群众进行传教，是当时传教士主要办法之一。英国基督教未失礼会（后译循道会）传教医生师

维善(F. P. Smith),就是为着上述目的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7日衔命来到汉口;过了8天,他在汉口彭家巷挂起"普爱医院"的牌子,开始应诊。普爱医院是华中地区的最早西医院,师维善也因而成为第一个采用西方医术为武汉市民治病的西医。

武汉百姓初见西医治病疑虑甚多,不敢轻易就医。师医生通常采用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金鸡纳霜丸等4种西药。于治疗皮肤病、眼疾、疟疾、发热等多发病,具有明显的疗效,逐渐获得武汉人的信任。又加免费诊治,更受到贫穷市民的欢迎,登门就医者络绎不绝。据当时的教会英文杂志《Chinese—Recorder》报导,自1867年7月后的9个月中,在门诊部受诊的武汉市民有6576人,住院病人96名。师维善在汉期间,还将他用英文写就的西医小册子译成中文,于1867年在汉木刻出版,书名《保免拦除》,8开纸17页,印数1000册。无疑,这是湖北地区最早的一本西医书。

维善爱医院之后,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1866年9月在汉口后花楼街办起了仁济医院,1928年迁至今中山公园附近改名协和医院;1875年元月,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办起一所医院,解放前名同仁医院,即今之市立第三医院。以上三所医院为武汉地区最早为中国百姓治病的西医院,皆为来汉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所办。

武汉教会所办医院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还在报刊登载"施医送药不取金银孔方"的免费医疗声明。但到80年代后,则改为"无依者可免费,殷实者请乐捐"的取费制度,自19世纪末叶起其服务对象偏向于上层,并收取极其昂贵的医疗费与住院费。

(陈忠)

花园山育婴堂的万婴墓

看了这个题目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一个以抚育婴儿为宗旨的慈善机构怎么会变成万婴墓?看了下面这段史实,人们心中的疑团就会迎

刃而解。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是美国天主教区主教艾原道主持创办的。1924年12月，他打着"拯救黎民"的幌子，在花园山办了个圣约瑟诊所。后将邻近原意大利天主教堂之文学书院房屋数栋，辟为育婴堂，于1928年开始接受婴儿。1942年美籍传教士郭时济、徐赉德接替死去的艾原道而分任正副院长，主持堂务。他们利用宗教活动之便，向中国群众进行欺骗宣传，说如有养不活的婴儿、孤女，他们可以免费收养。进堂后可享受"牛奶面包"，"有书读，可参加各种文娱活动"等。不少武汉贫穷人家受骗上当，将子女送进育婴堂，企望给子女一条生路。

这个育婴堂规矩特别：平日大门紧闭，只在门右侧墙上开一小洞供呼叫传讯；送婴者不准入内，只能将婴儿从小洞中送入，由一老妪专门接收并出具收条，收条上明确规定"以后不准看望、不准领取、生死存亡不准过问"。

婴儿入堂后，先"受洗"（宗教仪式），再取教名，然后送入育婴室。室内，几十个婴儿挤在一起，饮食便溺并入一床，仅由早先进来的十一、二岁之盲残孤女照看，每天既无牛奶，又无面包，仅以米汤菜羹喂养。夏天，蚊蝇叮咬，腥臭难闻；冬天，冻饿交加，鼠啃虱咬。凡入堂婴儿，要闯过"冻、饿、闷、摔、烂、毒、咬、病"等"八死"难关，才能活下来。一个仅几个月的婴儿焉能闯过这"八死"关，所以惨死者多，幸存者少。据《方济各会士在中国》杂志载：花园山育婴堂在1927—1938年11年间，共收婴儿7813名，死亡7683名，幸存130名，死亡率为98.3%。郭时济等在寄住梵蒂冈的一份报告中也供认，从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的4年中，共收进婴儿757名，死亡718名，幸存38人，死亡率高达94.8%。据统计，这个堂从开办到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时的23年中，共虐杀婴幼儿16000余名。对这么多死去的婴幼儿，原来一律用箩筐成批运往草湖门螃蟹岬掩埋，后因当地居民强烈反对，便改在花园山南麓后围墙脚下挖坑掩埋。所以，人们便把这里称为"万婴墓"。

解放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武汉市分会，接管了花园山育婴堂，人

们在墓地挖出无数具婴儿白骨，无不义愤填膺。1951年5月26日省市各界人士8万4千余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控诉大会，幸存的孤女刘翠英上台揭发，控诉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根据群众请求人民政府立即逮捕了郭时济、徐赉德两名帝国主义分子，并绳之以法。

1952年元月，经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花园山"万婴墓"前树起高达6米的四方形的"死难婴儿纪念碑"。墓碑正面镶大理石，上镌墓志铭："这里是被帝国主义分子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骨骸，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里，让我们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商若冰）

三镇善堂与汉口慈善会

晚清、民国期间，武汉的社会救济，由地方慈善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举办，而以地方慈善机构为主。在众多的地方慈善机构中，设置广、规模大、义举多者又首推善堂。清咸丰、同治年间，武汉三镇的善堂已星罗棋布。到光绪年间，武昌有益善、敦善、积善、普安、衡善、福善、培济、敦义、从善、滋生、永安、聚善、培善、滋善、新河等善堂，其中积善堂创办于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是武昌最早的善堂。汉阳县有敦本、怀善、厚善、永安、普化、大生等善堂。汉口有自新、安善、道生、培德、从善、惠慈、厚善等善堂。到1949年武汉解放时，武汉三镇的善堂发展到154家，居全国都市之冠。而在三镇诸多的善堂中，又以汉口的善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其中历史悠久较有名气的有济众、潜仁、仕善、仁善、滋善、敦实、广济、镇安、圣惠、复善、宝善、从仁、济生、普化、惠济、同善、慈善、慧心、培心、永安、楚善、永修、愿善、求实、依善、敦仁、开化、怀义、天元等五十余家，有的善堂如安善、从善、惠慈、厚善、自新等几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培心堂规模尤为阔大，创始于1866年，初在熊家巷，1881年（光绪七年）就八角亭遗址扩充义塾、粥厂。1887年迁移洪益巷内。清廷多

次颁给"克广德心"、"培养天和"一类的匾额。1907年又设学堂。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颁"慈祥恺恻"匾，冯国璋颁"黉舍归仁"匾。

善堂、慈善会、善庄名称虽各各不同，但其性质大致略同，都是从事社会救济事业，其义举、施舍项目一般有"施药送诊、红船救生、施送板棺、收埋白骨、兴办学校、暂屋义冢、施送寒衣、施送饥米、施送暑药、施送路茶、恤孤救寡、惜字宣讲、救火救灾、施种牛痘"等十几项，泽被贫苦民众。

善堂一般是由武汉工商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救济团体，它像商店工厂一样，基金雄厚的可以办大的善举，规模小基金少的只做些日常小型救济工作。善堂的规模大小关键在于"首士"(即捐献财物的人)的大小、多少和号召力的强弱而定。"首士"中有的是殷实富裕的大户；有的是良田千顷的乡绅；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达官、军阀；甚至有一些地痞流氓依仗势力也当上了"首士"。号召力强、基金雄厚的善堂除有大量流动资金外，大都置有不动产——房地产收取房地租金，如化善堂置有化善里房产，敦实善堂有敦实里房产，自新善堂有自新巷房产，济生善堂有济生巷房地产等。汉口的一些地名如安善巷、宝善堂、济生巷等都留有善堂的痕迹。有的善堂还经营出售花板寿木(棺材)、代卖寿衣、开办殡仪馆等业务，扩大收入来源。规模小的善堂则主要依靠善士们的"乐捐"维持日常开支。

在善堂"首士"中，有的人则是乐于捐助，有经常的月捐，有临时赈灾的捐款，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有玉皇经、观音经、关圣经的诵经活动，有盂兰会、宣讲圣谕活动等)的捐款，并不担任善堂中的任何职务。有的"首士"一旦被选为或被"神权"指派为堂主，就有职有权，不管是在人事、财经及日常一切具体工作各方面都是堂主说了算。堂主为了控制善堂，就指派自己的亲戚六眷担任管事，管财、管钱的要职，就连一个香工(专为迷信活动燃烛烧香的杂工)也是堂主的亲信。

善堂既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有些不肖之徒便千方百计钻进善堂，打着社会救济的幌子，假公济私，乘机敛财，为非作歹，被人们称为"善

棍"、"善痞"。

善士们捐献财物，多数不愿公布自己的姓名，有的是本着"行善何须人见，积德自有天知"的信条，有的则是怕露了财惹来麻烦，有的是为了摆阔气，要派头。这么一来，在善堂公布的帐目中只有"无名氏乐捐××元"的记载，如果出现了几十上百位"无名氏"而帐上只记载一二十位"无名氏"，那些多余的"无名氏"的捐献自然流进了堂主及其亲信们的腰包。这还算是小玩意、小把戏。如果遇有赈灾、救荒、迷信活动（如诵经、祈祷、斋戒等集会），善堂就准备了《功德无量簿》（募捐簿），递到善士们面前，请君乐捐。当捐款人捐上几百上千元而只写上"无名氏"三个大字时，站在一旁的经管人员便马上奉上一句"您老人家功德无量！"而在心中却暗自好笑，又是一个"红帽砣"（即受愚弄而不自觉的人）。其实，这些所谓"红帽砣"并不甘心受愚弄，他们只是因前述种种原因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身份，而睁只眼、闭只眼罢了。这样的无头帐，是任何高明的会计师也无法查核的。

1910年（清宣统二年），汉口的各善堂首士和商绅集资在城垣马路外（现汉口中山大道市一医院隔壁）成立汉口慈善会，作为各善堂联络之组织，并办有中西医院和孤儿院（慈善会会址现为武警湖北总队，左边孤儿院现为市民政局主办之新汉塑料厂，右边中西医院现为市一医院）。1927年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各善堂联络事宜改为该会办理，而汉口慈善会的济贫事项仍继续办理，直至解放。

武汉解放后，1950年3月即对原有善堂的财产和所办事业进行登记清理。1950年5月成立武汉市善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7月跟会馆一起成立武汉市善堂、会馆联合会（即善会联），由武汉市救济分会领导，施行慈善救济业务。1956年，善会联所办事业及财产分别移交市教育、卫生、民政、房地等局接管，由政府负责施行救济等事宜，历时近百年的民间社会救济团体——善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商若冰）

阳逻浮尸与培心善堂

从前，武汉人家若因故有人失踪，常常要派人到阳逻去寻找尸首，怕的是失踪者投了长江。为什么在武汉投江，要到新洲县的阳逻去寻尸呢？这与阳逻江边的浮尸现象有关。

阳逻镇原属黄冈县，1951年新洲县建制，属新洲。1983年新洲县划归武汉市，阳逻成了武汉市一个重要的港口。古代曾筑有阳逻堡。江边有观音矶（似今之武矶头），矶上有大士阁。明清时代的阳逻，似无突出的浮尸现象，当时人们的诗作描绘江边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请读宋犖《阳逻大士阁》：

阳逻江边赤石矶，峥嵘高阁带斜晖。
千帆风雨当窗过，万顷烟波傍栏围。
白鸟衔鱼栖佛座，红桃映水出禅扉。
宋元战法传来久，吊古悲歌几振衣。

这哪里有浮尸累累，江水腐臭的痕迹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长江上游的浮尸到了阳逻江边就不走了。其原因陶幼安在《阳逻培心善堂兴废记》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释："长江水自天兴洲东端会流以后，流向由东北折向东南，又与武湖外溢之水汇合，奔腾直下，因受武矶头矶石的阻滞，以致在阳逻沿岸形成一股回流和串串漩涡，一些沉没的物体便在这里泛起，并且不易随波离去。旧社会水上交通事故频繁，遇难尸体大都于此处漂浮汇集，由于无人收殓，浮尸腐化臭不可闻，江水亦因此污染。"由此可知，阳逻浮尸现象与天兴洲和武湖水有关，而天兴洲的形成约在清代中叶。故明清之际的阳逻江边并无浮尸现象，以收殓浪尸、抢险救生为己任的培心善堂则始创于道光年间。

据说，道光初年，阳逻附近窝子湾的两名监生雷鼎和雷朝辅，看见江边浮尸腐臭的情景，产生恻隐之心慷慨解囊，在武矶头下搭起棚子，

雇船打捞浮尸，掩埋于矶旁小山岗上。当时溺水之人不少，每年约捞尸百余具。山岗上埋尸多了，人们便把它称为"浪尸山"。这可视为培心善堂的前身。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雷鼎、雷朝辅又邀了士绅程飞熊、胡敬之、童万春、徐畏三等人集资创办培心善堂。他们除自己带头捐资外，又四处募款，购得8石5斗稞田和官汉湖1/4的股份，将所收租谷和渔税作为开办经费和常年维持经费，建房一栋，置船两艘，雇请专人从事打捞浮尸和殓葬工作。1864年(同治三年)起，官府拨款支持此项善举，每年由汉黄德道署拨银96两，黄冈县署12两。后来，黄冈和阳逻在汉的官员、富商也给以资助，培心善堂的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殓死，而且救生，添置了两艘红船，善堂也改名为"培心堂救生公局"。

培心堂的红船每天出动，或捞尸，或救生。培心堂名声远播，因此常有人来登记寻尸或委托捞尸。凡捞起的尸体与登记的形貌、特征相符者，即通知登记人来认领，尸主以捐助的形式酬谢。对无主尸体，也进行形貌、特征和遗物登记，然后置于木匣掩埋，以备日后有人认领。培心堂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好事，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辛亥革命后不久，武昌一日商纱厂暗杀中国工人多名，将尸体抛入江中以消灭罪证。军政府收到死者家属控告后即向厂方调查，日商矢口抵赖。军政府派胡广才、李书城等人到阳逻查访，在培心堂捞起的尸体中认出了被害工人，获得铁证，迫使日商认罪，并赔偿了损失。1918年4月25日，轮船招商局的江宽号客轮被段祺瑞随员所乘楚材号兵舰撞沉，得救325人，捞获尸体280人，失踪75人(一说死亡近千人)。280具尸体大多是阳逻培心堂捞起的。

解放后，培心堂改为阳逻人民福利委员会，仍从事救生和捞尸活动，经费由国家社会救济款中开支。70年代以来，由于武湖的建设和长江翻船事故的减少，阳逻江面很少出现浮尸漂流，1974年取消了固定的拣尸专班，培心堂原有房屋也改建为工厂。

(严肃)

游弋江、汉的救生红船

《清稗类钞·舟车类》抄录的一条资料说："红船，长江有之，用以救生，故亦曰救生船。遇有客舟之厄于风潮者则拯之，迁其人、物于红船中。"这样的红船在武汉也有。救生船之所以漆成红色，盖有别于普通船只，且有示警作用。

1738年(清乾隆三年)清廷颁上谕曰："湖广地方，三湘七泽，水势汪洋，凡有应设救生船之处，著该督抚确勘，照江南(按：指长江下游一带)一例办理。"根据这一旨意，武昌、汉阳各在有关江段设立了救生船。这是武汉官办救生船之始。1746年奉部批复，准湖北救生船照内河战船年限修造。据同治《续辑汉阳县志》记载，仅汉阳县即有救生船10只。《江夏县志》则云："救生局在城西滨江，分守徐公设巨舟以救溺，委耆民司之，因置亭。"

至于民间置救生船，当以汉阳敦本堂为最早。敦本堂系汉阳县绅商于1823年(道光三年)捐资建立的善堂，堂址在晴川阁左。倡议者为侨寓汉口的江都商人胡晓岚、胡元父子。当时以大江风浪险恶，船多覆溺，虽有官设救生船只，但江面辽阔，不能遍及，特设救生船数只，无风时泊禹功矶下，有风则游弋巨浪中，遇有不测，驶往拯救，积年以来，救活无数生命。

到了近代，汉口也有救生局的创办。1863年(同治二年)部分绅商在存仁巷建敦实堂，除一般善堂的业务外，还从事救生活动。1871年，堂中绅商戚席臣、周芸青、刘步瀛、刘晋侯等鉴于每年夏季襄河泛涨，水势湍急，往来船只常遭覆没，乃创议筹款造红船两艘，常年上下游弋，遇险护救。当水流汹涌之时，在关圣祠、五显庙、接驾嘴、打扣巷四处各设义渡两只，以渡因普通木划停渡而阻隔两岸的行人。又设护划20只，分泊于各险要之处，专司救护行船。设救生局于汉阳南岸，专理其事。有救了人或船来堂报告者，论功施赏；有捞获浮尸送堂者，当即棺殓，葬于该

堂义地。辛亥革命时，堂友星散，经费不充，一度停止了救生活动。3年后，经堂首汪美堂、刘钟三、杨树滋、陈介眉及各堂友竭力筹画，始复旧观。

此外，济生堂、永安堂、普化堂亦各有红船两只，或巡河，或巡江，对遇险船只实施救护。义渡方面，仁济堂有4只渡船，停砖口及关圣祠；卫生堂两艘，停五显庙码头。武昌的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亦设救生船，分布江面，随地设局，从事救生活动。

救生船和义渡的设立，减少了洪水、风涛时航运的损失，方便了三镇居民的交通，是一大善举。红船，乃当时人们眼中的水上救星。

（严昌洪）

敬节堂里嫠妇泪

中国封建时代，要求已婚或已聘的女子在丈夫或未婚夫死后守节，不再嫁人。所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马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形成一种极其严格的节烈观。夫死后，妻或者以身相殉，或者一辈子守寡，就可称为"烈妇"或"节妇"，受到官府的旌表，社会的赞誉。如果再嫁，或者偷情，就是失节，要受到家族的惩罚，世人的唾骂。然而由于外界男性的干扰和内在情欲的煎熬，特别是没有经济来源为生活所迫，寡妇"失节"的事时有发生。于是，为了维护礼教，维持风化，接济贫穷嫠妇的生活，封建卫道士们便想出了让节妇集中居住，与外界隔绝，给以生活补助，以便保持节操的办法，那就是设立敬节堂。

晚清时代，各省府厅州县以及大市镇均设有敬节堂，又称恤嫠堂。武汉敬节堂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清同治年间。敬节堂有官办的，也有官督民办的。有称敬节堂，与育婴堂分开办的，也有称育婴敬节局，包括抚育节妇未成年子女的。在武昌，官方办有敬节堂和育婴堂，且不止一处。1904年（光绪三十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关于"于育

婴、敬节二堂内设蒙养院”的规定，将武昌宾阳门（今大东门）内之敬节堂改为敬节学堂，挑选粗通文理之节妇一百名作为傅母科正额，以培养家庭女教师，同时开办育婴学堂，培养乳媪（保姆）。至于历年旧有之敬节、育婴两堂，听其循旧办理。民办的敬节堂在候补街，同治年间创立，属永安局（善堂）的一项善举。以“保全节义，守节抚孤”为宗旨。由地方绅商集资兴办，推举十八首事经管。北伐后改为妇孺所，属湖北省立救济院管辖，变为官办。抗战后改称武昌市救济院妇女教养所。

在汉口，商办的育婴敬节局，创办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由绅商张明斋发起，曾春山、毛润泉诸人赞助，开始仅办育婴局于得胜街之同生善堂。3年后在存仁巷堤街创办育婴敬节总局。辛亥武昌起义时遭兵燹焚毁，张明斋率各节妇及其子女百余人避至蔡甸，始免于难。1913年经绅董呈请夏口知事，拨抚恤款项下例银12500两重建敬节局，规模比原先有所扩大。官办的育婴敬节局在硚口，比商局晚设一年。明为官款，仍取之于商。武昌起义时无人照料，同样赖张明斋之力，各节妇不至流离失所。复由张明斋禀请知事查验拨款，改官局为上局，总局为下局，均归商办。1915年经大商人捐资，又有扩大。

汉阳的敬节堂在东门内东正街。其演变详情因资料缺乏不能尽述，惟敬节堂前有一石坊，横额书“名节完全”4个大字，两边联为：

湘水东来，江上泪流斑竹血；

夕阳西下，城边塔映石榴红。

“泪流斑竹血”，可说是敬节堂内节妇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各处敬节堂建筑式样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节妇们居住的号子，大门长年紧锁，除了清明给亡夫上坟，十月“送寒衣”各放假3天外，平时不许外出，有特殊情况，如亲属婚丧喜庆，虽可请假，但不能超假，否则予以惩戒甚至除名。外边的人也不许进去。用水在大门边设水缸，挑水的人从外边将水倒入枧槽流入缸内。大门上有洞，家人探望，隔门通过小洞谈话。米菜等日用物品或者由堂内杂役代买，或者由小贩挑到门边通过小洞交易。节妇带进堂内的未成年子女上学出入，则使用特制的

大转桶。转桶直径约2尺，高约3尺，中间有铁条轴心，安装在大门上或门侧边，桶边开一个口子，可容10岁上下的孩子钻进去，用手、脚一推，或者由别人帮助转动，洞口便由门内转到门外，小孩就可出去了。这样的敬节堂，与牢房有什么两样呢？难怪有的节妇说："我们名为守节，实同坐牢"，"进堂以后就像进了棺材"。

号子里，每个节妇包括带来的子女住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在走廊上烧火做饭。生活来源，主要靠堂内所发生活费，贫穷节妇无人接济，便做些针线活补助；富家大户有娘家、婆家的接济，还有的带来了积蓄，生活就比较好些。如果社会动荡，堂内供给没有保障，节妇们的生活则十分艰难了。子女中男孩长到15岁，必须出堂居住，女孩则不论。子女在外长大成人，可将母亲接回家赡养，就算守寡守出了头。至于守"望门寡"的妇女（即为未婚夫守节的处女）和没有子女的寡妇，则空守一生，终日以泪洗面，直到老死，晚景十分悲惨。

敬节堂是封建礼教下的产物，所谓节妇贞女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随着社会的进步，妇女地位的提高，敬节堂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严昌洪）

"大水冲了龙王庙"
——近代武汉大水灾

"大水冲了龙王庙"，是用来说明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的一句俗语，而在武汉，真有大水把龙王庙冲了的时候。汉口在长江和汉水汇流处，原来有一座龙王庙，大约建于清初。道光年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描写道：

龙王庙口汉江连，急浪惊泷似箭穿。
水果行开飞阁上，渡江船舣木排前。

面对长江巨浪、汉水急流的龙王庙，是武汉历次大水灾的见证人。

武汉历史上的水灾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且不说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的大水，它使汉口江湖不分，一片汪洋；汉阳仅存龟山，万户鳞集；武昌城内半为波涛，舟行于市；金沙洲房屋全部没入水底。也不说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的大水，据汉阳归元寺壁上水迹碑的记载，它比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的大水还小五尺。下面我们重点介绍武汉近代的几次大水灾。

1848年夏，长江、汉水流域"大雨五旬"，灾情之重为百年所未有。史料记载："楚中大水，武汉成浸"。武昌城内水深丈余，汉口成为泽国，漂没民命货财不计其数。汉黄鄂沔间，"槛楼属道"，灾民编芦苇席地而栖，天炎如炙，老弱俱病，以至水退以后，亦难重建家园，"无不生计萧条"。

人们尚未透过气来，第二年夏天又一场大水，比上年小不了多少。据1954年进行的洪水遗迹调查测量结果水成河，飘流什物无算"。三镇奸商囤积居奇，米价飞涨，竟至每石8000文以上，杂粮亦飞涨不已，油每斤涨至700文，日食小菜无不较从前价高3倍。

1911年夏，武汉三镇又遭洪水浸袭。武昌河街的缆子街、筷子街、下新河成为泽国，屋宇被积水冲塌者比比皆是，低处水已及屋一半，上下两警区及武昌船关、毡呢厂、红砖厂、农业学堂均在水中。金沙洲、白沙洲、鲇鱼套一带被淹之家总计在千户以上。汉阳东关地势低洼，洪水入城，居民皆宅水而居。城外江边河边被淹亦不下千户。汉口全镇除后城马路及临江大堤地势稍高外，水已浸入夹街及后花楼，上路硚口上下左右，被淹不下三千余户。

民国年间，以1931年水灾最大，江汉关水位最高已达28.28米。长江、汉水沿岸堤防大多非漫即溃。武汉三镇被洪水包围，7月31日汉口丹水池堤段首先决口，8月2日，大水冲破单洞门，汉口悉成泽国，市内"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周"。江汉路至六渡桥一带，均以小舟、木排或架桥往来。8月13日，武昌筷子街堤溃，17日积玉桥、徐家棚堤溃，城内溃水盈尺。当晚，汉水漫过汉阳河堤，根本无法抢护，汉阳城又被漫在水中。当时报刊统计，三镇溺毙者约2500人，中暑病死者

每日不下300—400人；房屋被淹者达4万余户，灾民和失业者多达44万，损失或谓惨重。

此外，1921年、1935年、1948年都曾发生过程度不等的水灾。

为什么在旧中国武汉水灾如此频繁呢？主要是历代统治者不重视人民的安危，上面拨来的堤工款和下面募集的堤工捐常常被一些官员中饱私囊，使得堤防长年失修，即修亦草率从事。遇到险情又不能采取有力措施，竭力挽救。结果，滔滔洪水，人为鱼鳖，受灾被难的仍然是广大民众。而对龙王庙的迷信也是造成防洪措施不力的原因之一。从前，每到涨水季节，人们便前往龙王庙烧香，求龙王爷保佑。1929年汉口修路时，龙王庙被拆除。1931年夏天洪水袭来，民间盛传拆了龙王庙，开罪了龙王的谣言。当局派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负责防汛，他对谣言深信不疑，亲自到江边设案焚香，三跪九叩，祈祷龙王爷宽宥拆庙之过，保护武汉三镇。事后，他并不组织人力物力保堤防洪，而是把希望寄托在龙王爷的保佑上。结果，酿成当年的特大水灾。

（严昌洪）

大火烧不尽，劫后又复兴
——明清时代汉口大火灾

汉口市廛始盛于明，其火灾之多且巨亦肇于明。明代《汉阳府志》记载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汉口曾发生大火，被火之详情却不可考。这是汉口火灾第一次始见于载籍。其后重大火灾可考者有如下一些：

万历丁未之火

明代时，把今汉阳南岸嘴一带亦称为汉口。清初《汉阳府志》记载，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一天早晨，自汉口崇信坊（即今南岸嘴一带）火起，延烧东阳坊一带，至莲花堤转入汉阳城，毁朝宗楼（汉阳东门城楼）及门内人户，又延至城外南门。被火区域之大，可以想见。而当年又值大水灾，田地尽没，仅存大别山（龟山），市镇屋舍颓圮无数，流离饿殍以数

万计。4年后，朝宗门、南纪门才由知府舒体震重建。

范锴《汉口丛谈》所记几次大火

1623年(明天启三年)汉口大火，伤人无数，至有一家死53口者。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7月，江口失火，烧回龙寺、四官殿庙宇、房屋数千以上，人民淹焚而毙者不下千百。次年10月汉阳城失火，烧府署头门鼓楼、南纪城楼、朝宗城楼、县学、明伦堂，居民房屋不可计数。1698年汉口失火，延烧数千家。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7月，汉口由义坊失火，延及大智坊、杨林口无人住处方止，人民水火死者不计其数。1768年10月，江口失火，延及南岸，湖南粮船与红船(救生船)、客舟烧毁甚多，人民死者惨不忍言。

嘉庆庚午之火

汉口镇商贾居民庶杂，户以10万计。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四官殿左近之药肆不戒于火，随风蔓延，上至朱文公祠，其中大小横街夹巷二、三十处，前后上下，围将八、九里，悉被其灾。风势虽不猛烈，但飘忽不定，以致商贾家属和财产转移数处，仍不获免。至二十二日晨，始熄，被灾数万家，街市尽成焦土。然以商业重镇，不难重建，一月之内，屋宇齐兴，凡百商家，俱复旧观。

道光末隔岸新河之火

汉口淮南盐商盐行虽在汉口，因盐船大而且多，则常泊于对岸之塘角，那里新开一河，水曲而回旋，用以泊船。当时有大盐船420艘，互相牵系，余外又系小船600余只，9/10为估客船，间亦杂有官舫。首尾联络，势若蛇蟠，以便绝风涛，避寇贼。1850年1月1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入夜，舟人醉饱，皆已安寝。一艘大船中一名盐丁摊灯吸鸦片烟，突然一火苗上腾，渐延及什物船篷，以至于焚至樯竿。俄而火光冲天，众舟人从梦中惊起，迷骇昏乱，不知所之。千船固结，仓卒不可割分，人们上窜下跳，皆不能幸免。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晨未止。浮尸罩江波，腥臭不可闻。灾后无棺可殓骸，只有一席裹一尸，至数千百具，实为一场浩劫。人们认为这是盐商蠹国病民，纵侈暴殄之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光绪戊戌中秋之火

1898年9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时值中秋佳节,午夜,汉口突发大火,火源起自后花楼天一阁(今生成里内),经由后花楼延烧至半边街、广益桥、纬子街、万年街、大夹街、汉正街、河街,直到襄河边流通巷,连小河内木船亦被殃及。广益桥一屠宰坊圈有10多头牛的栅栏横拦街头,堵塞交通,以致许多老弱妇孺难以逃出,纷纷葬身火海。

宣统辛亥之火

1911年7月11日(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晚11时,汉口新码头河下泊有洋油帮船数十只,某船所雇工人因窃取洋油,不慎将灯花坠入油中,顿时火起。时值北风正猛,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各船解缆莫及,延烧至沈家庙河下、宝庆码头。内有一着火船只,飘流至对岸汉阳高公桥白鳝庙一带,引燃该处所泊大小船只数十艘。两处之火愈烧愈大,汉阳岸上双街一带尽成焦土。虽水龙、救火车(洋龙)竭力救护,终不克收效,直至次日下午风停火乃止,计烧去船只约千余艘,烧毙人口约20余名,淹毙约10余名,受伤不计其数。

宣统辛亥北军之火

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清军为把起义民军驱出汉口,乃于晚间在华界纵火,自张美之巷起,直上至五显庙一带,大火焚烧4昼夜,连外国所设堂院皆毁,而汉口中国大都市,竟成焦土。事后有人调查统计,被焚地区包括:河街上至大通巷河下止,中街至安善堂止,后街至马路止,下街至招商局止,黄陂街后,仅帝主宫、万寿宫两处尚存,余尽被烧,大智门一带至新马路兴业银行旁止。统计华界房屋烧去十成之九。汉镇精华,至此殆尽。

汉口多火灾的原因,旧有二说。康熙时熊伯龙主入事说,他在所撰《四官殿碑记》中说,引起火灾的原因主要是竹篱茅屋太多所致,建议毁易。同时代的唐裔潢主风水说,其《风水论》认为黑山位居戌方,是一座火库,大火是黑山采石凿破火库所致。地方官们既有下令拆除茅屋的,

也有下令禁止黑山采石的。人事说和风水说孰是孰非，今天当然是一目了然的，而在当时，人们真不知如何措手。

（严昌洪）

旧汉口的堂子姑娘

武汉在清代道光年间已是“人员杂五方，商贾富兼并”的“楚中第一繁盛处”。到了近代，随着城市日渐繁华，来往人员增多，社会风气日下，以出卖妇女灵肉为生的特种行业——妓院也兴盛起来，“娼妓”人数空前增加。

娼妓在封建社会中为下九流。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妓院老板，俗称“王八”、“鸨儿”之类。妓，则是专指出卖皮肉的妇女，俗称“堂子姑娘”或“婊子”。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汉口已有妓院数百家，多数散居在今汉正街附近之大火路、青莲路一带。1862年(同治元年)汉口开埠后，妓院逐渐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的上、中段)、歆生路(今江汉路)以及大智门车站附近发展，每院蓄妓二三人、八九人不等。江岸地区一章姓乐户家，设帐房，雇杂役，蓄妓20多人，在那时可算大妓院。

妓女中以年龄、姿色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等级，各等级的妓女住不同地方，接客收费标准因等级不同而有差别。又以籍贯和来源的不同分成不同的帮派，有苏(州)帮、扬(州)帮、湘帮、本帮(湖北各县市)和杂帮(河南、四川等省市)。王葆心所辑《汉口竹枝词》中，对歆生路的三分里、四成里就有细致的描绘：“十家八九是苏(帮)扬(帮)，更有长沙与益阳(湘帮)，夹道东西深巷里，个侬浑似郁金香”。

由于历届反动政府明禁暗纵，甚至靠花捐为其增加财政收入，使公开卖淫愈演愈烈。据统计，汉口有营业证、经政府批准公开卖淫的所谓“公娼”，在1928—1949年间，除少数年份外，每年均在千人以上。至于未经登记的暗娼，1933年国民党官方估计，为3000余人。汉口沦陷时，

日伪政府更是为娼妓业大开绿灯，1940年汉口还有日本官方设立的"军妓院"。

清末、民国时期，妓院称为"乐户"业，由政府制定管理办法：一曰"征收捐税"。计有乐户捐、旅馆寄居花捐、妓女执照费、乐户执照费等。1915年，汉口警察局全年征收此项税捐银洋55500元，占该局24项捐税中的第二位。二曰"确立标志"。妓院门前挂政府统一制发的"门灯"和"乐户住处"标牌，妓女胸前戴"识别花"。三曰"定期检验"。即检查妓女是否患有花柳病。四曰"规定娼区"。即划定妓院营业地区。

从事乐户业的，多与警察、特务、宪兵、保甲长、清洪帮分子及地痞流氓相勾结，法租界长清里乐户王某，丈夫是洪帮大爷，干儿子是警察局第七分局所长，女婿是警察五分局局员。磨子桥妓院老板彭汉卿，开设妓院22年，是洪帮"景阳山"的大爷，手下有流氓打手40多人。他的妓院中被迫害致死的不可胜数。有位名叫小红霞的姑娘长了"杨梅疮"，彭汉卿竟以给她治病为名，将她绑在板床上，用烧红的铁条刺入溃烂的阴部，将疮烧焦，然后用剪刀一剪一剪地剪掉，再在伤口上抹上食盐。小红霞受此毒害摧残，活活被折磨而死。彭汉卿竟连棺木也不施舍一副、命人用破席一卷，草草掩埋了事。1938年8月，汉口一妓女被老板残害致死后，分尸8块，装入木箱中丢弃姑嫂树郊外，这一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但因妓院老板后台"硬"，这一恶性案件竟不了了之。

妓女出卖灵肉的收入，除向官方交纳捐税外，还要受"王八"、"鸨儿"的剥削。按照当时的"规矩"，他们对妓女的剥削方式有三种：一叫"本家"，多系小时卖身入院，与鸨儿母女相称，其卖淫收入全归妓院。二叫"捆帐"，以契约形式先由妓院付给妓女或其"亲属"一笔钱，在契约规定时间内（三数年不等），卖淫收入全归妓院。三叫"分帐"，收入对半或三（妓女）七（妓院）、四（妓女）六（妓院）分成。

操皮肉生涯的妓女，大都由于贫困难以维持生计；有的被丈夫抛弃；有的被人拐卖；有的卖身还债。也有极个别的人是贪图享受，自甘堕落。汉口临近解放时，娼妓业达到高峰。据1948年汉口警察局统计，全

市公娼有1429人，妓院554家，暗中以此为生者几达1万余人。当时较好的妓院多在法租界长清里、辅义里和江汉路联保里一带，下层的则分散在贤乐巷、土当、文书巷、沙家巷、桃源坊、磨子桥等处。

娼妓业的泛滥，势必造成性病流行，遗毒社会。1946年，汉口市立医院检验妓女600多人，患梅毒及淋病者占2/3以上。同年该院皮(肤)花(柳)科统计，每天平均门诊病人120人，其中性病患者占20%左右。

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取缔妓院。1952年9月10日凌晨2时，出动公安干警1013人，封闭全市妓院，收养妓女251名，逮捕罪大恶极的乐户老板52人。从此，猖獗一时危害社会的娼妓业从汉口消失了。妓女们经过学习、治病、培养劳动观点、掌握谋生技能，全部妥善地得到安排。妓女们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商若冰)

洪帮帮规种种

洪帮，又称"洪门"、"汉流"，在西南各省洪门兄弟之间统称"袍哥"。社会上俗称"红帮"的"红"字，系音传失真，实则应为"洪"字。它是建于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团体。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格的帮规，还有一套秘密的联络暗号，旧时的武汉，最大的黑社会势力就是洪帮。

洪帮以"开山立堂"为组织形式，每一个"山"配有一个"堂"。在西南各省则不是开"山"，而是设"社"。不论是"山"或"社"，都是洪帮中的一个单位。凡入帮者，不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甚至父子叔侄，一经入"山"(社)，就成了某个"山"或"社"的"兄弟"，所谓"肩膀一齐，都是兄弟"，父子、叔侄可以同"堂"。

每个"山"(社)设有山(社)主(或称寨主)、副山(社)主(副寨主)和内人堂、外人堂(或称内堂、外堂)等八个不同职名，入帮者，男的互称"兄弟"，女的互称"四姐"、"七姐"。"四姐"职名为"金凤"，"七姐"职名为"银凤"。如武汉沦陷时期，军统、日伪双栖女特务谭三姐(柯小脚)就是

洪帮中的外堂四姐，后就用"柯金凤"的假名从事特务活动。

入帮"兄弟"、"姐妹"对山主（寨主、社主）则称为"龙头大哥"，"大哥"主宰一切，如对"大哥"不敬，或违反帮规，就会处以"三刀六眼"（三刀刺入对穿，即为六眼）。

洪帮原为秘密组织，到了民国时期，"开山"、"设堂"由秘密转向半公开，这个山头的兄弟可以跳向另一个山头。武汉流氓头子杨庆山开始加入文志广的"栖霞山"，一下子跳到当时势力颇大的"太华山"，成了黄子丹大爷的"兄弟"。

洪帮向有"清水"、"浑水"之分。所谓"清水"，是指不偷不拿，不抢不掠，不杀人放火，不奸拐妇女，不取不义之财，是一群有正当职业的"袍哥"。所谓"浑水"，则什么坏事都干，无恶不作。其实，到了清末民初，早已"清""浑"不分了。

洪帮的政治口号，初期为"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前夕，又提出"反清灭满"或"亡清灭满"。到了30年代，洪帮则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鹰犬，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1949年，洪帮的头子们在汉口搞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武汉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别看它名字好听，实质上是以反共为宗旨，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反革命机关，武汉的洪帮头子杨庆山、夏光宇、周汉卿等都是这个组织的头面人物。

洪帮还印行有一种秘密小册子，名曰《海底》，里面记述洪帮各种帮规、暗语、黑话，只发给帮内兄弟、组织。

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解散了这个反革命组织，洪帮头子杨庆山等被处以极刑，横行社会数百年的黑社会帮会烟消云散了。

（商若冰）

"翻戏党"及其拆骗手法

在旧社会，武汉有个"翻戏党"，党徒们设骗诈财、坑害百姓的案件时有所闻。

所谓"翻戏党"，是一帮流氓、地痞、帮会分子纠合在一起的流氓集团。他们针对不同对象，投其所好，妙施手段，巧设骗局，使人中其圈套而不自觉，被骗之后却无处投诉，他们对人"翻而戏之"，故人称"翻戏党"，也叫"拆白党"。

武汉的大流氓韩玉山，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是一个有名的"鸡杂鸭杂"(稽查的谐音)。他纠合一帮流氓、地痞、打手，在汉口胜利街同兴里斜对面一幢西式洋楼里设立"大本营"，专门设局骗人财物，是翻戏党的"窝子"。这幢楼房内设舞厅、客厅、餐厅，房屋宽敞，设备齐全，中西合璧，古色古香。武汉军政要员的照片、题字挂满客厅，俨然一副大公馆、大官邸的派头。正因为有这种"气派"，才能使人不怀疑，被骗之后也不敢随便声张。这幢"公馆"内的男仆女婢、大小"夫人"，待人彬彬有礼，穿戴雍容华贵，其实都是翻戏党的党徒。武汉的翻戏党文有国民党官僚暗中撑腰，武有流氓打手出面抖狠，所以他们有恃无恐，每每出师大吉，闹得武汉人心惶惶，谈翻戏党色变。

翻戏党的拆骗手段，用他们的两句术语来概括：一曰"正账"；二曰"反账"。所谓"正账"，是说用假赌具(如灌铅的骰子等)或明比假赌(抬桥子等)诱人赌博，使人输光，藉以骗人财物。所谓"反账"，是引人入圈，约定共同拆骗他人，其实是拆骗其本人，不过用的是反面手法，所以谓之"反账"。其拆骗手法也是因人而异，用他们的黑话说来就是：想做官的用"纱帽"头子；爱贪色的用"美人"头子；想发财的用"经济"头子。目的就是把别人的钱财骗到自己的手中。

翻戏党拆骗有"三步曲"：

第一步："前手"：由一些外表十分"体面"的党羽出面找对象(多为巨商富贾、公子少爷)，用各种"头子"投其所好，与之建立"感情"，使人堕入圈套，成为"空子"(读为"控子")。

第二步："后手"：另有一批人马，打扮豪华，腰缠"万贯"，在"阔公馆"内豪赌，由"前手"邀约"空子"前来参赌，务必先让其尝到"甜头"，然后使用假赌具，使"空子"带款亲自动手。表面上是说欺骗其他"空子"

(其实这些"空子"都是翻戏党党徒),结果这个真"空子"大输特输。输光后"前手"还佯装关怀,慷慨借款,给他"赶本",不过要当场立下借据。这样,使"空子"不仅成为参与假赌博的当事人,而且成为一个债务人,使他有口难辩,无法申诉。即使"空子"有所觉查,告到官衙,但党徒有借据在手,至多也是普通债权纠纷或一般赌博行为,无论如何也扯不到"拆白"的案情上去。

第三步:"了事":翻戏党担心被骗的对象太多,容易出事,便找有"头面"的人出面找"空子",用软硬兼施手段,迫使就范,不敢提被骗之事。

旧社会,翻戏党在武汉猖獗一时,拆骗案层出不穷,如胡端记纱号老板胡端之被骗案、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侄儿被骗案、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程师黄琼初被骗案均轰动一时。其拆骗手法也是花样翻样,千变万化。

其实,翻戏党的骗局尽管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骗,只是因为受骗人利令智昏才受骗上当。如果人人洁身自好,不贪恋不义之财,任何狡猾的翻戏党也是无法害其奸的。

(商若冰)

"花会"与花会迷

花会是一种三十六门赌。其赌具是一个两条金龙画像绕其旁的朱漆小四方盒,用绳吊着悬挂 在大场神龛前面,故名吊筒。吊筒内装待开标的纸卷。纸卷有人物像、动物像和题纸 。人物像和动物像有 36 种,分别代表着"明珠"、"必得"、"正顺"、"汉云"等 36 个名目。如蜘珠打明珠,老鼠是必得,猪打正顺,牛是汉云,等等。题纸大小约 5 公分,上写似诗非诗、似谜非谜的五言四句,名目蕴含其中。如"横陈灯光照,卧床烧烟泡,一气呵下去,兴趣百倍高"中前两句讲的是"瘾君子"躺在床上吸大烟,烧烟泡时,眼睛离灯很近,有如瞩目寸光,蕴含了"必得"这个名目。

花会的总机构叫“大场”，场内供奉有“女神”像，像旁绘有36支花，神座在木龛内，外垂帐幔，显得极其庄严，大场下有“分场”、“航船”（临时摆桌子，收打花会钱的场所）、“划子”（行走街巷向猜花会的人送题纸、收钱的）等。大场每日开筒两次，第一次在上午12时，第二次在下午9时。下午开筒，就把次日的题纸送到打户，次日上午收第一次，下午6时收第二次，由“划子”把打户写的条子和赌资一并交给“航船”，再由“航船”汇集交到“大场”。开筒时，猜中了的赢钱，反之则输。打花会的人，绝大多数是娼妓和富贵人家的姨太太、小姐。

相传花会起源于广东，以后逐步发展到长江沿线各大城市。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即有花会出现。花会赌场，最先有人设在当时的法租界内今车站路一带。到了1933年，上海流氓李阿己挟资来汉，在汉口开设花会，并自任“大场”主持人，以其徒众分任“分场”、“航船”、“划子”的负责人。从硚口到江岸，凡是娼妓、姨太太们麇集的地方，都有其徒众的足迹。到了开筒的时候，李阿己必长袍马褂端正立在“神龛”前焚香、点烛、烧黄表，郑重其事地向“神”礼拜一番，然后登上特制高凳，令人将吊筒取下，接到手中，打开木盒，取出纸卷，念给打花会的人听。因此，花会又是一种迷信色彩很浓的赌博形式。

花会的36门赌中，花会组织本身占了35门，打的人只有一门，因而赌者往往是“凶多吉少”，即或偶然猜中，36倍赔注中，花会组织还要从中抽走6倍，赢家仅得30倍，所以花会实际上是一骗取钱财的工具。但因为下注大小不限，每日开筒两次，增加了中标机会，一旦猜中，则可获利36倍，因而吸引了许多不明内情的人。有的甚至成为“花会迷”。那些迷信的“花会迷”，梦见了什么打什么，看见了什么猜什么。迷信思想最重者，为了发财，或则陪死人睡觉；或则将死人的尸骨挖出来供奉；有个别人竟将自己亲生子女杀死，瞒着丈夫将尸体藏于床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死人托梦给她们，第二天按梦中情形打花会。其结果，很多人不是弄得倾家荡产，就是搞得家破人亡，可见花会为害之烈。

抗战胜利后，随着花会骗术的暴露及其他娱乐行业的兴起，汉口花

会才告消声匿迹。

（朱务本）

“丐帮”探秘

旧汉口是个消费性的商业城市，灯红酒绿，华洋杂处，畸形繁荣。有钱的人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没钱的人衣不蔽体，沿门乞讨。据民初编纂的《夏口县志》记载，汉口有户籍的丐民为454人。到1946年汉口的乞丐达1000余人。到解放前夕已达5000余人。这些乞丐讨饭的手法各各不一，大体上可分为下列6种：

一、路讨：即挨门挨户讨，站在路口讨，尾随行人讨。二、艺讨：以打莲花落、渔鼓、大鼓、快板、唱小曲等简单艺术形式沿门求施。三、骗讨：用纸铺地，上书编造的“悲惨身世”，跪求路人施舍；有化妆成瞎、跛、瘫、伤等求乞的。四、苦讨：有头上插香、手臂插针、穿鼻挂灯、筷子插喉、脑门钉钉 等惊险骇人动作，使人同情以求施舍的。五、节讨：每逢民间节日如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八月十一至十五日、腊月二十四至三十日等，人们喜气洋洋地过节，容易施舍。六、喜讨：遇有婚丧、满月、做寿、乔迁、开业等红白喜事，上门要赏钱。但是，不管是用哪种办法行乞，乞丐的活动均由丐帮所严密控制。

汉口的丐帮（即乞丐的帮派）属“三江”、“两湖”派系。“三江”派一说为浙江、江苏、江西，一说赣江、闽江、浙江。“两湖”派的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各地又分许多门宗。清末，汉口的乞丐多为两湖派系，有刘华堂、彭钧启等门宗，每一门宗下又分字派，刘门宗的“字”派分“文房四宝寿吉昌，河西金玉堂，沙洲凤凰啼”等17个字，每“字”下再以“字”收徒。如前7个字派中的“宝”字，下有“财源茂盛”四小字，称“宝财”、“宝源”、“宝茂”、“宝盛”；“寿”字下有“红灯高照”四小字，称“寿红”、“寿灯”、“寿高”、“寿照”；“吉”字下有“本子白世”四小字，称呼同前一样，即在“吉”字下加四小字。彭门宗立了三个门户，一为“金银铜铁

锡”；二为“正大光明，红丝有余”，三为“可德元康，春夏秋冬，”其中以第一门户中“铁”字派最有势力。乞丐们以门宗字派各霸一方，至解放前夕，汉口丐帮头目管辖地段为：“王鸡子”（均为外号）管居仁门至硚口；“海里蹦”管利济路至居仁门；“王二楼”管汉正街至武圣路；“铁李拐”、“邹老五”、“十不全”分管民权路；“歪大爷”管一洞天（大智门正街）至江汉路；一洞天至沿江大道由“熊麻子”总管，下有王起万、王起香、陈州、张启瑞、岳铁牛、王铁角等甲头分管；刘家庙一带为铁宝、铁成、铁针把持；其他地方有黄麻子、朝鲜胡子、铁条、铜玉山、红脸泡子等甲头占据。他们除按地段发展各自的势力外，还在国民党汉口市政府举办的“乞丐收容所”（今汉正街存仁巷三官殿）内发展组织。彭钧启第三门户中“德”字派甲头罗万林，从1927年汉口举办乞丐收容所起，即在所内当管乞丐的队长，到1949年的20多年中，他盘踞所内，开山门收徒弟，发展的徒子徒孙达一二百人。他们在所内奸淫女丐，买卖人口，打人行凶，无恶不作。乞丐收容所成了丐帮的重要据点，成了乞丐养成所。这恐怕是国民党官方始料所不及的。

在丐帮中的势力范围内，一概不许外来乞丐行乞。如发现有外来乞丐，则由丐帮头目出面处置，先问其有无帮口，若自称是丐帮同祖，就互相“清谱”，各自说出自己从师的文武先生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下三襟”（即师兄弟），查向明白，可款待三天。若是未入帮者，则将其毒打后驱赶出境（势力范围）。

俗话说：“朝庭有法，江湖有礼。”汉口的丐帮有一套严格的帮规，共有10项禁止干的事，入帮者不得违反。这10件事是：1越边抽舵（指偷乞丐周围人家的东西或偷乞丐同行的东西）；2顶色卧莲（指嫖同行之妻）；3点水发线（指充当内奸泄密告发）；4引马上槽（指暴露了所做之坏事）；5溜边拐将（指借同行的东西不还或拐走别人的徒弟）；6挑灯拔火（指在同行中挑拨是非）；7欺孤傲相（指欺压同行中的老弱孤残人）；8遭逃扯谎（指欺骗自己人而逃跑）；9偷言耳哄（指偷听别人私话外传）；10迷糊吃大（指讨得的钱财不公开交出）。如违反了以上条款，轻则罚

跪，用荆条打耳光；重则割舌头、剁手足、挖眼睛，甚至装入麻袋投江、活埋。

入丐帮先得拜师，拜师前要向甲头叩头认师，然后随甲头乞讨或偷窃，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甲头认为满意时再交香烛钱，择吉日行"开水烧张水"（即收徒）仪式，并由文先生向入门者宣读帮规，武先生教其乞讨技术，讲解刑具，并由师父盘问刑具（如竹筒、锥子、刀子等）用途，对答无误，才算正式入帮。

这里要说说"甲头"。戏剧《棒打薄情郎》中金玉奴的父亲就是甲头，甲头平时不行乞，却过着优裕的生活。有的有小乞丐服侍起居，有的蓄婢纳妾，有的出入有自备"包车"（即人力车，但比一般人力车豪华气派，有脚铃，毛毯等设备）代步，不少甲头经常入出茶楼、酒肆、妓院、烟馆、赌场之中，众乞丐称他们为"大老板"。甲头财源主要有：1 徒弟敬奉；2 收甲头钱；3 买卖乞丐（以乞丐充当壮丁）；4 蓄养童丐等。是乞丐们的血汗养活了甲头。甲头实质上是小恶霸，地头蛇。

武汉解放后，市民政部门对 5000 余名职业乞丐进行了收容改造，接管了贫民收容教养所（即乞丐所），对这些职业乞丐按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表现好坏分别进行了处理，职业乞丐这一社会丑恶现象始从汉口消失。

（商若冰）

·下编·

龟蛇锁大江的传说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这是毛泽东1927年所作《菩萨蛮·黄鹤楼》的上阕，它像一幅水墨画，描绘了烟雨苍茫中龟蛇二山紧锁奔腾长江的壮丽景象。

龟山、蛇山的海拔高度分别为90.02米和85.12米，比起巍巍昆仑、高高喜玛拉雅来，不过是两座小土堆。但山不在高，有人传扬则名。龟山、蛇山借助古今诗人的佳作名篇，已扬名海内外，武汉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

龟山、蛇山是武汉地区最早的"主人"，也是这里沧桑巨变的见证人。我们编写武汉掌故，不能不首先写到它们。

汉阳龟山，东起长江边，西临月湖旁，全长1730米。其最古老的名字叫翼际山，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之为大别山。三国时陆逊曾为东吴江夏太守，屯兵于此，并建鲁山城，由此可知龟山又有一别称为鲁山。一说鲁肃曾屯兵山上，故称鲁山。

武昌蛇山西起长江边，东止大东门，全长约3500米。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西部1000多米夷为平地，建了引桥。蛇山原名黄鹄山，山下称黄鹄岸，江边水湾称黄鹄湾。古时"林涧甚美"，风景颇秀，故李白有诗云："东望黄鹄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宋时因鄂州治城在山上，一度称石城山。还有一名为金华山。分地段又有黄鹄山、殷家山、黄龙山、高观山、大观山、棋盘山、西山等名称。中部的高观山，元时作高冠山，明时称长春山。

龟山、蛇山的名称出现较晚。由于二山，一座"若巨鳌浮水上"，一座

“缭绕如伏蛇”，“雄踞江之东西，势若龟蛇环卫”，当地的民众在明末以来便逐渐以龟山、蛇山呼之。如果说翼际山、黄鹄山是它们的本名，那龟山、蛇山则是其俗名。俗名叫响以后，本名反倒不显了。

传说龟、蛇二山是大禹手下两员大将所变化。大禹治水时，命二将竭尽全力制伏长江水患，但由于水怪厉害，仍时常兴风作浪，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两员大将为了战胜水怪，以自己的身体变作龟、蛇二山，将水怪永远镇压在山下。龟山头伸出江边部分称“禹功矶”，上面建有禹王庙（又称禹稷行宫），就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龟、蛇二山束锁住了江流，限制了沙洲涨没的范围，使武汉地区有了长期不变的深水港，倒是事实。而且，龟蛇锁大江的地势，奠定了长江大桥的基础。龟山、蛇山这种有利武汉交通运输发展的客观作用，比两座山的登临和观赏价值要大得多，但却往往不被兴致勃勃的游人所察觉。

（严昌洪）

汉阳古城的兴废

汉阳在汉代属沙羡县境，隶江夏郡，郡治在安陆。沙羡县原治金口，东晋时迁鲁山（今龟山）却月城。

却月城是汉阳县境内的第一座城堡。在月湖附近，今汉水入江所经之地，东汉戴监军所筑。周回180步，高6尺，形如却月，故名，亦名偃月垒。黄祖为江夏太守时，治石阳，别屯却月城，守沔口。208年（汉建安十三年）孙权派凌统、董袭破黄祖军，屠却月城，城废。

刘表之子刘琦以却月城被屠，又在鲁山之南，凤栖山西，月湖港之东筑鲁山城，并作为江夏郡治。后吴江夏太守陆央亦治此。南朝时齐竟陵太守房僧寄曾守此。

齐张乐祖率数千人助房僧寄，据鲁山城东北近江岸处，以土筑城垒。后房僧寄等投降梁，城为梁所废，故名梁废城。

梁武帝萧衍在黑山北筑城以守鲁山，名萧公城，系军事所用之版筑土城。朱衣《萧公城》诗云："鞭驱十万人，版筑飞尘埃。"可见筑城工程之浩大。

606年(隋大业二年)改汉津为汉阳县。621年(唐武德四年)设沔州，治汉阳，故李白有《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诗。当时在凤栖山筑汉阳城，周长1072丈(一说1772丈)，有8个城门：东有迎春门，南有沙洲门，西有孝感门，北有汉广门，东南有朝天门，西南有汉南门，西北有下汉门，东北有庆和门(一作庆贺门)。1121年(宋宣和三年)水涨城圮。嘉定初年，知汉阳军黄干多次上禀两司总帅请筑城，竟未施行。或说1274年(宋咸淳十年)才按照黄干的建议建起了新汉阳城，然查当年史实，元军攻宋甚急，入冬陷沙洋、新城，复州(今天门)降元。元军在阳逻堡破宋夏贵之军，汉阳军、鄂州降元，似无建新城之可能。

明朝初年，在原城旧址上改筑新城，周长756丈，辟4门：东朝宗门、南南纪门、西凤山门、北朝元门(后塞)。汉阳城规模初步定型。3个城门上分别有城楼。朝宗楼为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知府程瑞初建，1448年(正统十三年)千户密福等重建。正德以后知府孔凤、千户朱凤、陶震重修，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史褒善又重修。南纪楼、凤山楼亦为程瑞初建，知府孔凤等重修，知府刘本用重建。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大火毁朝宗门、南纪门，4年后知府舒体震重建。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占汉阳，城毁。至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曲圣凝、守备董朝禄分修里城，增高数尺，重建南、西二门楼。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汉阳，在城西筑外城，掘街道为濠。太平军退后，清军毁外城，知县黄式度平濠。1880年(光绪六年)，知府严昉、知县李辖修西城。

1928年，汉阳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拆除大部分，余下西门及两侧一段城墙在1950年全部拆除，如今东门、西门、南门仅作为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严昌洪)

武昌城的变迁

武昌有城，是从223年(东吴黄武二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险，高观枕流”，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周围仅二三里，为版筑土石城。此城宋时仍存。

汉代有沙羡(音夷)县，治涂口(今武昌县金口)，239年(东吴赤乌二年)孙权筑金口堡守沙羡县，故又称沙羡城。至晋武帝以后，沙羡县治始移夏口城。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孝建元年)在夏口城立鄂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鄂城。

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鄂城约二里。

隋文帝于589年(开皇九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原治在金口)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舆地纪胜》上说：“鄂渚在县西黄鹄矶上三百步，隋立州以渚，故名鄂州。”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为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宋仁宗皇祐初年，鄂州知州李尧俞重修。

武昌城基本定型是1371年(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该山始包入城内。城周约20里，辟有9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牌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有小东门。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武昌城时，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望泽门为望山门，竹牌门为文昌门，草埠门为武胜门，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武昌城垣于1927—1928年撤除，从1371年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以来，共存在了556年，其间8次修葺，今仅存的起义门，系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而重建的。

（严昌洪）

汉口堡的兴建与拆毁

今之汉口，原与汉阳相连，是汉阳县属地。即使在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两地以河为界后，汉口也一直属汉阳管辖，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设立夏口厅，汉口始与汉阳分治。因此，汉口一直没有如汉阳、武昌那样环绕四周的古城垣。据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的考证，汉口曾有过5个堡垒：扬口垒、白阳垒、牛湖堡和两个汉口堡。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第二个汉口堡，即晚清时代仅存在40年的汉口堡。

汉口成为商业市镇以后，常患后湖水灾。1635年（明崇祯八年）汉阳府通判袁焻提议在汉镇后面修一条大堤，以防后湖湖水泛滥。大堤上起硚口，下至堤口（沙包，今一元路靠近长江处），全长约11里。旧称袁公堤，今为长堤街。因掘土筑堤，堤外便挖了一条深沟，宽约2丈，汉水从硚口灌入，襟带市廛，因名玉带河，这一堤一河是汉口最早的人工屏障。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和捻军在武汉一带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固守汉镇，抵御义军进攻，决定在袁公堤外再筑一道城堡。1864年（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县令孙福海与汉口绅商胡兆春等协议，筹集商款，筑堡开濠。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堡基密钉木桩，堡垣用红石砌成。堡外挖一条深濠，堡内培植坚土。为通出入，开辟8个堡门，自西至东为：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堡上建有炮台15座。3年后又加高培宽，并建上、中、下三闸蓄泄洪水。

汉口堡修筑以后，不但没有起到抵御农民起义军的作用，反而束缚

了汉口市区的扩展。夏口与汉阳分治后，即议撤去城堡，创修马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置汉口马路工程局，准备修筑汉口马路。当时民智未开，拆屋让路之举难以实行，便拟拆毁汉口堡来修筑马路。1907年拆堡修路工程开始，上起硚口，下迄歆生路(今江汉路)，同时动工。修路前后，张之洞正筹集经费赎回比利时欲立租界私购的土地(今刘家庙一带)，于是议以此路地皮变价集资，作为赎界之用。此议遭到汉口绅商的反对，蔡昌墀等连连上禀力争，张之洞乃另向官钱局筹款赎界，而此路仍为本地所有。此路当时称为后城马路。修成之后，从前人迹罕到之处，变成轮轨交通，店铺林立的闹市。这就是今日中山大道的上段和中段。

(士心)

洪山上的塔

位于武昌东部的洪山，古称东山。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金人南侵，为避兵乱，荆湖制置使孟珙等人将随州大洪山的灵峰寺(原名幽济禅院)迁移到武昌东山，该寺所供奉的慈忍大师的双足亦同时迁来，朝廷赐名"崇宁万寿禅寺"，东山亦改名洪山。"崇宁万寿禅寺"座落在洪山南麓，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改名宝通禅寺。

宝通寺后有一座宝塔，名灵济塔，俗称洪山宝塔。此塔建于元代，是为纪念"以身代牲"，祈雨救民的慈忍大师而修建的。洪山宝塔矗立在宝通寺后偏西靠近山顶处，高约43米，是一座砖石仿木结构的楼阁建筑。该塔呈八面形，每面的外壁上皆嵌有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的塔记。塔身共有七层，逐层内收，威武挺拔，内有梯道盘旋而上。来此游览的文人学士为宝塔每一层题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雅号：一柱擎天、二仪当下、三山半落、四顾茫然、五云多处、六合清朗、七级浮屠等。

1874年(同治十三年)大修时，将塔顶增高5尺，并安上了文笔峰式铸铜塔刹，使宝塔外形比以前更加壮观。洪山宝塔是武汉最高最美的宝

塔，在它的衬托下，宝通禅寺更显得庄严雄伟。

在洪山的西南山麓，还有一座小塔——兴福寺塔。传说在夏至中午时分，兴福寺塔无影，故又名无影塔。从塔身刻有的纪年看，无影塔建于1270年（南宋咸淳元年），原塔址“下有浪花井，其脉通江，井水常沸腾，建此塔以镇之。”

兴福寺塔是仿木石砌结构的重檐楼阁式建筑，高11.25米，采用了我国古塔中少见的四层八面的偶数分层法。此塔内实外坚，在四壁上各砌有一个雕有姿态肃穆、潇洒生动的佛像、菩萨、罗汉、天王、力士、供养人像等的假门。

兴福寺塔于近世开始倾斜。1963年由洪山东麓迁往西麓时按原状恢复重建。该塔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是武汉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由于洪山宝塔与它外形相仿，又比它晚建60余年，故有人说，洪山宝塔是仿它而建。

（胡永弘）

九峰山与无念禅师

九峰山石门峰一带，是武汉近郊的公墓区。在公墓区的北面，绿树掩映着的红墙里面是九峰山烈士陵园。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柯良材、邓乐意等6位革命烈士就长眠在这里。每逢清明时节，前往祭扫亲人亡灵的人流，络绎不绝地涌向这寂静肃穆的墓区，给它增添了几分生机。

九峰山位于武昌（古称江夏县）东50里处。这里修竹林荫的山径，喜迎客至的松柏，潺潺的涧流，使人来到这里，宛如来到“桃花源”，一种新奇之感油然而生。

九峰山以宝盖、石门、钵盂、狮子、沙碧、阳逻、马铎、黄粟、丁管等环列的9座山峰得名。九峰中以宝盖峰区域最大，风景也最为优美。九峰上的瀑布分流而下，汇集于山麓的卧龙桥下。

天下名刹九峰山正觉禅寺，位于黄柏与石门诸山之间。从卧龙桥进入山门，门内矗立着一座大雄宝殿。从这里拾级蜿延而上，可达寺庙的最高处狮子峰。据明代贝翱所撰的《九峰山正觉禅寺碑文》记载，开山人是一代高僧无念禅师。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楚昭王为尽孝心，特遣使召请应山宝林寺道谊颇深的无念禅师来大洪山崇宁万寿禅寺，为其母作普渡。相见后，两人话语十分相投，楚昭王更加敬重无念禅师了。于是，他恳请禅师留下，并表示要择址为他修建禅定之所，禅师欣然同意。此后两人不谋而合选址于九峰山宝盖峰。宝盖峰上有狮子峰，直指蓝天，前与钵盂峰相对，地势幽深，树石茂繁，潺潺涧流，左右交注，汇为大池，正觉寺岿然中处，更显得奇秀特异。无念禅师在这里潜心修炼，长年坐禅毫不懈惰。楚昭王也常抽空前来看望他，还常馈赠一些四时水果给他。

明太祖高皇帝得知其名后，便遣官召禅师进京。见面后一语即合，太祖非常高兴，特设一榻以赐坐。太祖要委他以官，但禅师力辞不受，太祖只好赠其宫中服饰一件以表心意。临别时，太祖赐禅师黄金钵、盂、净瓶各一个。由光禄寺具果馔招待，送其还山。第二年，太祖又遣官赐其松花实二器，御制诗文一轴。并赐名寺庙为九峰山正觉禅寺。于是，无念禅师名声大振，前来参拜者接踵而至，其弟子亦喜跃精进，各有所得。

无念禅师于永乐初年圆寂后，葬于狮子峰下的舍利塔。

（胡永弘）

八分山与白云洞

八分山在江夏县东南50里，即今武昌县城纸坊附近。此山有水分流如八字，故名。《建康录》曰："武昌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分八字，数不及九"，指的就是八分山。山旁在明时还有因山得名的八分湖、八分院。

半山腰有飞锡泉，唐贞观年间有骆禅师游方（按：佛家语称为"飞

锡”，即持锡杖云游四方）至此，建为道场，故名。该泉无论久旱、甚雨，两不盈涸，朝廷赐庙名为灵济庙。据说建庙以后，很少有灾荒，一方百姓获益不浅。1187年（宋淳熙十四年）赐封该庙为嘉泽侯，1193年（绍熙四年）再加“显应”二字。1200年（庆元六年）夏旱，地方官奉命祷雨于庙，大获甘霖，四郊沾足，遂成丰年，又赠“灵惠”二字。相传元代郡守李贞登山祈雨，“有巨蟹如白龙入潭，黑龙渤起，雷雨大作。”此庙后不存。明清时代，在山顶有八分寺，又有慈云寺。山巅有子午石，身方顶圆，群石环之，遇旱祷雨皆在石前，故八分山在清代为省会朝山。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湖广总督汪志伊亲至山上祷雨，并于子午石正面镌“八分山之神”，左旁镌“子午 石”共8字。

八分山南麓，有一个前后贯穿的天然大溶洞，名白云洞，俗称石洞。据任平《白云洞》一文（载《文史报》总第6期）介绍，全长约300米，分前洞、中洞、天井（天窍、天窦）和后洞四部分。洞口朝南，呈圆形。洞口右上壁刻有“白云洞”三字，为明代兵部尚书、江夏（今武昌）人熊廷弼所书。洞口两旁原有一对武士石雕，是朱元璋驻兵于此攻打武昌后所建。前洞内右侧有两支洞，《江夏县志》称为凉洞和暖洞。前洞后部有一石窟，中奉观音雕像，高丈余，是为无梁殿，殿名三字俱逾尺，亦为熊廷弼手书。石窟寺在江南少见，而像这样建于岩洞深处的石窟寺，更是一绝。中洞是一长形通道，洞壁全为钟乳石。穿过中洞，即到天井。《江夏县志》载称：“（进洞）东折半里，仰见天窦。”所谓“天窦”，是洞顶有“天窗”通外，外边天光射入洞中。在天井左石壁上刻有“雷闪洞开”四字，使人对天窦顿生无穷联想。后洞为白云洞出口处，有两个出口，一为北口，一为东口。出北口，豁然开朗，青山叠翠。出东口，向上攀登可达八分山顶。洞内石壁上尚有明、清人石刻多处，如“两间磅礴，一个崆峒”，“足飞”等。清咸丰年间罗泽南曾驻军于此，刻有“水流云在”四字。

（田雨）

木兰山与木兰古寨

黄陂县北30公里处，有一座山，古代叫建明山。因其北山突兀向

天，南山迤逦浑圆，形如一头仰天怒吼的狮子，故得名青狮岭。据传，唐代木兰将军就出生在建明山北10余里的双龙镇一户千总家庭。木兰父亲朱寿甫，年逾花甲没有子嗣，故经常登山求嗣，后得一女，取名木兰。木兰18岁时，突厥入侵，父亲年迈不能应诏远征，于是木兰便女扮男装，代父从军12载，因她"扫灭羌胡，功悬日月"，朝廷封她为将军，但她不受朝禄，乞归故里，老死闺阁，葬于木兰山北面的将军凹。旧有碑碣，墓前建一祠，即将军庙，乡人岁秩祭祀。明中丞张涛题联云："人夸烈女心如石，我爱将军勇过男。"乡亲们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于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将建明山改称木兰山。

木兰山海拔约600米，山上怪石陡崖，千姿百态；名贵花木，蔥郁成林；七宫八观三十六殿，精巧宏丽。"木兰耸翠"为黄陂十景之一。但它最引人入胜的是永不枯竭的磨针涧，奉祀木兰将军的祈嗣顶，木兰凯旋时朝廷赐冠之所"玉皇阁"以及好汉坡、棋盘石、舍身崖等流传着优美动人的木兰故事的地方。说起永不枯竭的磨针涧还有一段小故事呢。相传木兰的母亲为了教育女儿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长年在山涧边磨铁棒为针，后来这山涧的水长流不断，至今尚未枯竭。

木兰山的主峰"第一天峰"上矗立着"玉皇阁"，还有真武殿，为道教圣地，四方朝谒者络绎不绝。"玉皇阁"与它东面山峰上的"金顶"交相辉映。在金顶玉皇阁下的山腰处，有一座古寨叫木兰古寨。

木兰古寨采用的是"干砌法"，即不用石灰沙浆，而用青岗石交错间压干砌而成，颇具民间建筑的特色。木兰古寨依山就势，蜿蜒起伏于木兰山主峰的腰间，全长约5华里，高约3公尺，据史料记载，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古忽必列攻打鄂州(今武昌)，9月，他率军渡过淮水，沿滠水南下，围兵于黄陂县。当地人民由于对异族的恐惧和对外族入侵的仇视，纷纷上山筑起了这座防御侵扰的山寨。

木兰古寨的整个寨墙上都可以通行，除中寨门(南天门)外，还有东西南北4座寨门。东南两门可攀登而上，西北两门是嵌于悬崖峭壁间，可望而不可及。另外，在每座寨门上都建有门楼，门楼两旁各置土炮2

门，还设有滚木雷石等，以抵御来犯之敌。在古寨的西面开阔处，面对漳水的寨墙上，还筑有一座烽火台，它用于监视渡漳水之敌，一旦发现敌情，台上立即点火报警，于是四座寨门便会紧紧关闭，把入侵之敌阻挡在寨门外。作为古代防御工事的木兰古寨，在历史上起到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军事堡垒作用。

（胡永弘）

九真山的"九"

清陈诗《湖北旧闻录》介绍九真山时，著录有董谷《九真山记》一文，董谷何时代人，不详，文内说他曾为汉阳郡守。董谷到九真山游雨后大发感慨曰："昔九华晦于汉，知于唐，雁荡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真之山不知自今乎？"九真山今天真正知名了，建在那里的湖北省电视制作中心拍摄基地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

九真山在旧汉阳县治（今汉阳区）西南90里处，位于太白湖北岸，主峰高276米，东西延绵16公里，周围50余公里，是武汉地区最高的山。九真山原名五藏山，因传说有仙女炼丹于此，867年（唐咸通八年）改名为仙潜山。又因有九峰相向而峙，俗呼为九真山。

九真山的一些事物常常与"九"有关。首先自然是相向而峙的九峰。站在主峰九真山上，俯首四顾，可见群峰罗立，为龙衣、朝冠、走马、黄鹰、陈湖、稽工、崇阳、同山等八峰，一个个皆瘦削若雕刻，蜿蜒如龙蛇，远若趋拱，近若侍卫。游行山中，危崖深壑，万卉盛长，草木之气芬馥袭人，左右皆成一色，翠光欲滴，应接不暇。

相传在此炼丹的仙女亦是九位，她们齐聚一峰，设坛炼丹，山顶炼丹台、山下炼丹井、炼丹成功羽化升天的飞升石皆一一可指，明人赵弼有诗咏此云：

重叠峰峦千仞高，九仙栖此乐逍遥。
石坛尚有丹炉在，夜夜神光亘碧霄。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既然九真山有仙人，人们来朝拜祈福一天天多起来，于是山上有了九真庙，山下有了九仙观。

传说九真山下又有九泉，其水秋冬不涸，清冷可爱。于春夏或旱，郡守斋洁，请其水，辄应。不知是古人的附会，还是时过境迁，地理环境发生了变迁，今天怎么也找不出九眼泉水来。当地人说，只看到一泉双井，一泉即虾子池，水甚清澈，秋冬不涸，大旱之年，是乡民饮水的来源；双井即九真庙下约 200 米处的枯木井，一对井连在一起，一口井里有水，另一口井却干涸。

甚至连山下菖蒲洞所产菖蒲，也是一寸九节的，其实人们拔起菖蒲数其根，最多只有六节。

九真山为什么有这 些与"九"有关的事物呢？当地老教师王仁佑在《九真山话旧》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或许是古人想突出'九'字，显示此地的特色。难道不是吗？九真山，有九个真人炼丹，九个山峰，九条泉流，连菖蒲的根也是九节，可以说九真山已经'九'化了。在《易经》上阳爻称九，魏帝曹丕还说：'九为阳数'。总之阳为光明、吉利之意，焉得不以'九'名之呢？对于这些'九'，我看还是从'极多之意，非指实数'来理解为好。"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有的"九"，如九峰的"九"还是指的实数 。

（严昌洪）

吹落乌纱帽　变作镇水山
——纱帽山的来历

在汉阳旧县城（今汉阳区）西南 80 里的长江边，有一座不高的孤山临江峙立，形似乌纱帽，人称纱帽山。当地民谣描绘了此山的美丽风光："纱帽山貌好，青峰江水抱，山在水中立，水在山边绕。"纱帽山与武昌金口镇附近赤矶山隔水相对，形成武汉南大门的咽喉之地。

纱帽山原名百人山。《水经》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

(按即赤矶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郦道元注称，三国时东吴黄盖引百人带十船柴薪 在此设伏，参加 了打败曹操大军的赤壁之战。故此山称为"百人山"。

百人山因其形似乌纱帽而又被人们称为纱帽山，好事者还因此发挥联想，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武汉通览》所著录的故事是这样的：传说古时此地常患大水，皇帝遂派大臣禹青前来治水。有一年，暴雨骤起，江堤决口，禹青站在决口处捶胸顿足，毫无办法。忽然一阵狂风，吹落他头上的乌纱帽，落于缺口处，顿时变成一座山，堵住了江水。纱帽山因以得名。

《晴川往事》所刊《纱帽山的变迁》(作者王庆和)一文所述故事略有不同。战国时有位大臣来此治理水患，他为官清正，体察民情，仿效大禹治水，到处奔波，辛勤劳动，终因力不能及，水患并未治住。在他告老还乡，乘坐木船途经此地时，仍是茫茫一片大水。他面迎江风，站在船头大发感叹之际，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江涛呼啸，他头戴的乌纱帽被风刮落江水，木船在江中摇晃颠簸，他连声惊叹："天灭吾哉！吾命绝乎！"诅料乌纱帽落水处，陡起一座小山，木船在山边靠岸，人船均转危为安。人们为了追念这位清官，便将此山称作纱帽山。

我们不必去怀疑乌纱帽是否真能变作镇水山，也不必深究战国时代有无乌纱帽，传说毕竟是传说，它寄托着人民大众对征服洪水，国泰民安的愿望和对为民治水，造福百姓的清官的期待。

(严　锴)

三镇古堤漫忆

游过杭州西湖的人，一定对白堤和苏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堤相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筑(其实原来已有，称白沙堤)，而苏堤则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知杭州时筑。这了纪念这两位曾为杭州人民造福的父母官，人们把他们所筑的西湖堤分别称为白公堤(俗称白

堤)和苏公堤(俗称苏堤)。

在武汉,也有几条以主持筑堤的官员命名的堤,那就是武昌的熊公堤和郭公堤、汉阳的郭公堤、汉口的袁公堤和张公堤。

据黎少岑《武汉今昔谈》载,在武昌城南有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江夏人熊廷弼所筑的熊公堤。1612 年(明万历四十年)熊由南直隶(今南京)督学任上被免职回乡,发起募捐,倡修堤闸,本人变卖家产捐款数千金,官商人等共捐资万金以上,修筑了武昌城至金口的堤段,故址为今武金堤。

武昌的郭公堤 在宁湖(菱湖)湖心,自长街(今解放路)至新开路二里,都统制郭果所筑。(见同治《江夏县志》)

汉阳的郭公堤在东西月湖之间,即今汉阳文化宫立交桥至江汉桥一带,是 1752 年(清雍正二年)汉阳知府郭朝祚为方便交通所筑,堤两边月湖景色引人入胜,汉口士女常挈侣渡河,来郭公堤上踏青,观赏湖景,有诗为证:

大河南岸郭堤悠,柳绿莎青三月头。

人面赛花还赛雪,广藤轿子揭帘游。

相比起来汉口袁公堤与张公堤规模要大得多。袁公堤系 1635 年(明崇祯八年)汉阳府通判袁焻倡议修筑。上自硚口,下至堤口,约长 11 里,绕汉镇后面,以防后湖水溢。后居民渐集堤上,房屋栉次鳞比,成为街道,称为堤街,此街并非在汉口堡建后形成,道光初范锴著《汉口丛谈》时已有,且比较繁盛。堤外取土处成一深沟,汉水由硚口灌入,至堤口入江,称玉带河。

张公堤称后湖官堤。汉口后湖在春夏汛期,常常漫涝成灾,虽有袁公堤、汉口堡为之抵御,然只能保旧汉镇的安全。汉口开埠,中外互市以来,在今江汉路以下地方,租界和铁路仍受洪水威胁。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即拟筑长堤以防水患,但因经费短缺未成。1904 年始饬江汉关道详细踏勘,纠工筑堤,长堤起自硚口皇经堂裕丰垸(当时称为铁路 1 号地方,为京汉铁路尽头),向北经长丰垸旧堤,至杜

家湾东拐，向东北方向经姑嫂村、戴家山，至牛湖广福寺前堤角（当时称为铁路150号）止。全长30余里，堤外开辟引河，上通汉水，下达滠口，以排湖水。1905年春初步筑成，使后湖一带涸出田地10余万亩，泽国皆化为市廛，为汉口市区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时加培修。解放后利用堤顶修建公路，成为汉口外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以上以主持筑堤官员命名的古堤外，武汉还有几条著名的古堤：

花蕊堤，又称花堤，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武昌知府陈邦和知县陈基主持修筑，主要防止湖水外溢和江水内侵，因宋元时代城南右隅有花蕊门，故名。故址在今平湖门至文昌门内，现尚有花堤街，是武昌最古老的堤防遗址。

万金堤，在武昌武胜门外今大堤口一带，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派军队修筑，堤上还建有压江亭，以镇风涛。据明武昌知府郭正域《武昌府重修江岸记》称："万金堤，半在城内，居民栖止其上，为闾阎。"可见明代时此堤有一半已不起作用，到近代，更是半圮半没。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武昌遭到一次大水，城内半为波涛，舟行于市，损失巨大。经此次水患后，官府更重视城外堤防的作用，经知府张以谦请得朝廷同意，大修城堤，自王惠桥（今解放桥）沿江至阅兵楼（明代教场，在武胜门外），堤长1135丈，高、宽均在4尺以上，自王惠桥至洪庙无岸处，以青红石垒驳岸，高、宽一如城堤，又铸铁牛4头镇之。

武昌城南至金口原有的熊公堤，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周天爵筑为大堤，但年久失修，仅有堤形可按，每年夏间必为江水灌入，数十万亩良田悉成湖荡，居民弃耕，生活极形困苦。武昌城北至青山，民间于长江春涨时筑土埂临时防水，但全不足恃，一经夏涨或春水稍大，便致漫淹，将沙湖、大小郭郑湖（今东湖）连成一气，自江岸抵磨山一带，一片汪洋。清宋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利用湖北赈捐余款，力筹大修之举，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先修成红关至青山30里大堤，称武丰堤，为今武青堤前身。后修成白沙洲至金口60里大堤，称武泰堤，即今

武金堤前身。旧有石驳岸增筑加高，武胜门外未有驳岸处一律加修石驳岸。内湖之水，须有闸以资宣泄，旋在南北各修水闸一座，南边巡司河上称武泰闸，北边东湖出江口处闸称武丰闸。武昌两堤两闸的建设，保护了农业生产，方便了来往交通。

在汉阳，除了月湖上的三条堤——东头的杨柳堤（又名免潮堤，明正德初年知县蔡钦修筑）、中间的郭公堤和西头的龙灯堤（初名三搁石堤，清雍正年由一僧人捐修）外，沿江东门至南门一线有护城石堤一道，1738年（清乾隆三年）修建。在凤凰山与龟山之间则有永丰堤（又称为新丰堤），始筑于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当时是为了勾通月湖，后来有了郭公堤，它成为汉阳西门至汉口武显庙码头的重要通道。另在城外三里坡药王庙至沌口，有始建于1506年（明正德元年）的20余里长的栏江堤，屡毁屡建，至1827年（清道光六年）商人集资重修后，曾改名江永堤，以求江堤永安。

以上这些古堤坊，不仅在修筑当时具有抵御洪水，便利交通的功能，而且经解放后不断维修加固，一部分至今仍在发挥防洪作用，大部分作为道路使用，方便了市郊的交通。

（严昌洪）

澹灾伟画
——金水闸的修建

武昌县金水闸于1935年5月建成开闸放水。该闸修建纪念碑上“金水闸”三字为蒋介石所题，足见当时这项工程的重要性。

金水河流经武昌、咸宁、蒲圻、嘉鱼4县，有600平方公里水面，中部地势低洼，每到夏秋汛期，长江的水便从金水流域出水口——金口倒灌诸湖，毁坏农田，其境内农民被迫而弃耕捕鱼，离乡背井。

在武昌县修建排水闸是消除涝灾、开发金水流域的一项重要建设工程。国民政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于1924年秋便着手对金水河的

水文地形进行勘测，1929年完成了泄水闸、过船闸、拦洪坝的设计方案。此方案得到国民党行政院、建设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交通部的批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国民党各要员纷纷在印发的《金水流域整理计划草案》一书上题词，以示重视。行政院长谭延闿题词为"澹灾伟画"，立法院长胡汉民题词为"治水有方，横流无害"。1932年，蒋介石巡视武汉，批准修建金水闸。

1932年冬组织民工截河筑坝未成，1933年复用铁丝笼装石块沉入河中，才将拦河坝筑成。1934年春，金水闸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金水河尾闾禹观山处凿洞设闸，闸身穿山而过。该闸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共设3孔，每孔高为7.68米，宽为6.65米，泄水流量为104.6m³/秒。修闸过程中三次发生闸孔塌方事故，死亡60余人。从勘测设计到竣工，费时11年，耗资90万银元。

金水闸是武昌县一座最大的排水闸，它使金水河水位一般控制在吴淞口零点的20—80米之间，其受益面为91.5万市亩，灌溉面积为30万亩。1936年，武汉行营在此建立了金水流域国营农场，沿河农民亦在此开垦湖荒，扩大了耕种面积。

遗憾的是，由于经费问题而未能修建过船闸，从而使金水河上航行的船只不能直达长江，导致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胡永弘）

"谁人垒石架长虹？"
——三镇古桥巡礼

本世纪50年代有了引为骄傲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和江汉桥、汉水铁桥以后，武汉人把从前的那些古桥差不多都忘记了，即使提到人人熟悉的硚口、六渡桥、积玉桥或西门桥，也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街区的地名来看待的，很少思考从前那里曾有过怎样的一座桥。这也难怪，像赵州桥那样保存完好的古桥，在三镇范围内，几乎找不

出一座了。随着沧桑巨变，许多桥湮没了、毁圮了，许多桥屡毁屡建，不仅面目全非，名称也几经改变。然而，那些古代桥梁，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武汉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

武昌城里原来有九湖，有些湖互相沟通，为了方便交通，一是筑堤，二是架桥。据说武昌长街（今解放路）原为古南湖堤，堤上曾有广平桥，这恐怕是武昌城里比较早的桥梁了。墩子湖（紫阳湖）与长湖之间有座紫阳桥，建于明代，风景美丽，是游人常去的地方。每到中秋节的晚上，则是妇女的世界，因传说桥上石头玲珑多孔，是夕妇女暗摩石窍则可生子。王景彝《琳斋诗稿》中有《中秋竹枝词》记此俗曰：

涂山剖石古曾传，炼石持人一转关。

就使摩挲真应手，生儿也带一分顽。

在城东北有清风桥，将作为黄鹤楼风景区的组成部分予以重建。在平湖门内，明月湖上曾有明月桥。城外晒湖堤和南湖通巡司河的出口，分别有踏步桥、通惠桥和长虹桥。长虹桥在起义门外东南方向，现仍在，是通南湖机场的主要通道，面貌已不是明清时代旧貌。

在城南巡司河上，出望山门有一桥，今称解放桥。最初时，这里是一座浮桥。请看明代《湖广图经志》的记载："在望山门外，两圻相峙，商贾萃焉。渡者假以舟楫，或遭覆溺。知府冒政乃造舟为梁，人免前患，称为冒公桥。岁久圮坏。正德十二年左布政使周季凤措银八百余两，嘱知府沈重修巨舰十七，上设栏槛，两岸砌石，民甚称便。"到楚恭王英燇时，由楚王府出资改建为木桥，因名王惠桥。1936年改为水泥桥时，更名中正桥。解放后改今名。出保安门亦有一桥，建于王惠桥后，故称新桥。此处最先由明兵部尚书熊廷弼建石礅一座，梳形，3丈宽。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改建木桥，并筑石礅两座，名额公桥。后毁于兵燹，1912年由益善堂修复。此桥原为风雨桥，桥上有木架布瓦顶棚。1956年大修时拆去。

在汉阳，有武汉历史上记载最早的桥梁——迎春桥。它于1107年（宋大观元年）前后建于莲花湖中莲花堤上。桥头曾有当时儒士所书"近

春”二字，笔力苍劲，宛若游龙。明代诗人赵弼有诗咏迎春桥景色曰：

谁人叠石架长虹，江水流来汇泽通。
绿野年年二三月，野花芳草总春风。

汉阳包括迎春桥在内的桥梁多在古汉阳城外。出凤山门（西门）约2里，有西门桥，原名永安桥，始建于元末，1467年（明成化三年）通判石磐重修，此桥为当时通京城的唯一要道，官民迎宾、送行活动多在此进行，故桥头两端建有风雨亭、迎宾阁。有诗描写送别情景曰：

长亭相伴永安桥，送君惜别雨萧萧。
莫待柳叶焦黄瘦，早托鱼雁传捷报。

西门桥也是香客游归元寺的必经之路。50年代此桥犹存，后桥下水枯，改建道路时拆除。现从西大街与西桥街的断处仍可想见当年有桥连接的情形。城北月湖东杨柳堤上有高公桥，是1732年（清雍正十年）知府高纲及绅士甘晶祺捐资兴建，故名。湖中郭公堤上有三眼桥，又称月湖桥。城南南纪门（南门）外夹河上有南门桥。此外还有小桥、青石桥、桥上桥、东月湖桥、业林桥、一字桥、品字桥、聚仙桥等，难以缕述。

在汉口，主要是原玉带河上的32座桥。根据范锴《汉口丛谈》的记载，这32座桥从西到东是：玉带河桥、大桥口（今称硚口）、小桥口、董家桥、广麟桥、天保桥、绳武桥、燕家桥、太清桥、指月桥、大通桥、长寿桥、卧龙桥、飞虹桥、玉泉桥、赵家桥、万年桥、永清桥、燕山桥、多福桥、裕麟桥、玉虹桥、宝林桥、三元桥、六度桥（今称六渡桥）、万寿桥、广益桥、保合桥、太和桥、双寿桥、通津桥、出江木桥。以后又陆续增修了一些桥，如1385年（道光十四年）所建的保寿桥等，使玉带河上桥梁增至37座。诸桥多是汉镇去后湖的通道，把市廛和郊游之地紧紧地连接起来。黄孝河上则有东板子桥、西板子桥以及三眼桥等。这些桥多为木板桥或石拱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玉带河和黄孝河均已湮没，以上古桥大多无存，一部分仅仅作为地名残留在人们的生活中。（严昌洪）

古江汉亭与雄楚楼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指出：“黄鹤山，宋人建有江汉亭，惟其遗址今

不知所在，即自来江夏志及省志均佚不载。吾考此亭当在南楼蛇山间，绍兴中南轩先生张栻所建，曾撰文记事。……盖南宋时一名迹，今则绝无知者矣。”为了使今人了解古代武昌的这一名胜古迹，我们将江汉亭作一简略的介绍，并纠正王书中失考处。

首先，清同治《江夏县志》有关于江汉亭的记载，其《建置志》云：“江汉亭在府倅厅，宋倅张栻记。张芸叟《南迁录》云：‘鄂公字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理更秀。’”王书谓自来江夏志均佚不载，显系失察。

其次，江汉亭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建亭人为鄂倅(按：即鄂州通判)叶楠，而不是王书所说的绍兴年间(1131—1162)张栻所建，张栻仅仅为亭取名并作记。章采《武昌江汉亭忆南轩》有句云：“张刘精爽知何在，安得同来赋远游”，在江汉亭回忆张栻(南轩)，所忆的是“赋”，即张栻曾作《江汉亭记》。郑清之《江汉亭百韵》诗亦云：“斯亭名者谁，儒林得鼻祖。昔贤惟南轩，心学绍东鲁。”“遗墨尚淋漓，隶刻照亭柱。”说的是张栻为江汉亭题名。可惜的是张栻所作《江汉亭记》一时搜求不到，若在，这些疑问都可迎刃而解。

至于江汉亭的地理位置，所记不一，从郑清之前引诗中可以判断出大致方位：“环城得修岗，雄胜著台府。上有江汉亭，凭高欲寄举。云旗护左方，南楼以为辅。飞甍立崔嵬，才去天尺五。”王书考此亭当在南楼蛇山间，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这样高的地方修建亭榭，真是别有一番风光。从“星辰近梯级，岚霏日吞吐。横陈极苍茫，万象互仰俯。晴光敞双明，景物姿枚数。炊烟接空翠，下列十万户”的诗句来看，江汉亭的气势甚至可同黄鹤楼、南楼相匹。

雄楚楼在武昌西北城隅，今解放路与中山路连接处一带。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记曰：“雄楚楼，今尚鳞列，人士多乐侨居。楼依山城为之。明隆庆中，巡抚署在其前，至万历初，都御史汝阳赵贤巡抚武昌，始择癣后建此楼。崇祯癸未毁于兵。清康熙十五年上元徐德来为布政使，因旧地重建之，实则在明代时为抚院署后园之楼也。”该楼在咸丰初又毁于兵燹，光绪间布政使王大经重修。早年建此楼可能是作为抚院后园

接待宾客之处，后几经变迁，成为民居。辛亥武昌起义前，革命团体共进会领导人刘公来汉，卜居雄楚楼10号，另一党人杨玉如夫妇亦同寓于此楼，故雄楚楼一度成为革命机关，与武昌起义相关的有些活动就是在此进行的。

（严昌洪）

古镇金口与留云亭

武昌长江上游60里处的金口镇，在古代曾长期作为郡治、县治，又是繁荣商业口岸，地理位置重要，历史悠久，是武汉地区一座名镇。

金口为金水入江处。金水古时又称涂水，自咸宁县西北入武昌县，经斧头湖等湖泊，北流至金口（亦称涂口）入江。汉代时置沙羡县，治涂口。三国吴时筑金口壘，仍为沙羡县治。金口大约从那时起逐渐繁荣起来。327年（东晋咸和二年）今河南境内的汝南郡人因避战乱流寓长江南北之沙羡县境，朝廷专门设置了又一个汝南郡来管理这些流民，因称"侨郡"（相当于飞地）。郡治设于涂口，沙羡县治迁夏口（今武昌）。当时著名诗人陶渊明曾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描写金口夜色为：

叩枻新秋月，　临流别友生。
凉风起将夕，　夜景湛虚明。
昭昭天宇阔，　[illegible]川上平……

376年（晋太元元年）废郡设县，仍治涂口，并以其地为汝南实土，隶江夏郡，不再作侨县。隋初，改汝南县为江夏县，仍以涂口为县治。至589年（隋开皇九年）江夏县治才迁武昌城。清代时，因金口的重要地位，先后设金口水驿和金口巡检司。清曹申吉有《金口驿》诗描写当地形胜：

中流争峡过，　清绝楚南天。
缓急知风转，　帆低觉浪悬。
乱绪千尺岸，　午霁一江烟。

更问荒村宿， 衡阳何处边？

金口自古以来是巴蜀、浔阳（今九江）、扬州一带商人往返的“黄金口岸”，“蜀楚帆樯金口下，东南天地水乡多”，是金口商业繁盛的实录。1875年（清光绪元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开辟长江上海至宜昌航线，中途停靠金口港，是今武昌县水域有新式客轮之始。著名的金水闸亦建在金口附近。

金口镇北约1里处有槐山，又称金矶山，亦有因山麓石矶下波涛迅急，商旅惊骇而称为惊矶山的。与汉阳县大军山隔江对峙，“两山斗咽喉，群石矗牙齿。行客无限愁，横吞一江水”的诗句形容了其形势之险要。槐山下原有槐山寺，今已不存，惟有寺前两棵唐代所植银杏树，仍虬曲多姿，浓荫蔽日。

据说槐山顶部原有达摩亭，相传南朝梁时来华的天竺（今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是从这里折苇渡江，北上嵩山少林寺的。后人为纪念他，建亭塑像以祀之。明代时，在达摩亭故址上重建一亭，后根据清人段以懿（金口人）“昔有黄鹤在汝南，城迁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亭春秋，白云千载留槐山”之诗意命名为留云亭。当地人亦有称亭为达摩亭者。留云亭清末被毁，民初重建。亭高15米，为两层六角形塔式亭，飞檐上翘如翼，可凭栏鸟瞰大江和帆影。若要远望，可自留云亭西行至望江楼，天高云淡之时，可眺望黄鹤楼、晴川阁和长江大桥。

槐山脚下江边，有明代所建麻石驳岸，用以便利船工、纤夫溯航拉纤，使悬崖峭壁之间履如平地。驳岸共3层，高13.7米，气势雄伟，经数百年水冲浪激而完好无损。1982年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严锴）

“无陂不成街”
——汉口的黄陂人与黄陂文化

黄陂是武汉市的一个郊县，南与汉口接壤。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

武汉三镇有许多黄陂人，汉口尤多，他们把黄陂农村文化带到大都市里，对武汉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黄陂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长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遗址就位于该县滠口附近叶店村境内的盘龙湖畔，从发掘情况和出土文物来看，盘龙古城是当时汉江下游的手工业中心，已有商业交往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北宋大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就诞生在这里，关于二程青少年时代生活和学习的遗迹与传说，给黄陂士子以深刻的薰陶。黄陂县中举和进士及第人数在湖北省名列前茅，且产生了文武三榜眼。近代史上因靠近汉口，得风气之先，办学堂、演文明戏（话剧）等活动都走在各县前列。

然而在旧时代，黄陂的经济还是很落后的，元代诗人郝经《陵川集》有《宿黄陂县南》诗一首，描写了他眼中的荒凉景象：

茅屋欹斜竹径荒，稻畦残水入方塘。
营屯未定夕阳下，雁点秋烟不著行。

在这种情况下，黄陂人外出谋生的人数逐年上升，而且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有"手艺游子遍天下"之说。

黄陂既与明清商业名镇汉口接壤，因此，外出谋生的人首先来到了汉口，他们有的沿滠水来到今江岸区一带，多是手艺人和做苦力者，也有在后湖筑墩从事渔业或农业生产的。有的则沿黄孝河来到四官殿以下沿江一带，多是船帮和经商者，他们在前花楼一带集中居住，形成了带地域色彩的街道，即黄陂街。据王葆心《续汉口丛谈》考证，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已出现，居肆商民多为黄陂、孝感人。而当时黄陂、孝感二县还不隶属于汉阳府，而分别隶于黄州府和德安府。两县士民认为本县离府治太远（300里），而距汉阳仅数十里，且汉口早已有了黄陂街，可见黄、孝与汉阳关系密切，他们在清代提出了两县宜隶归汉阳的请求。1729年（清雍正七年）遂划二县隶归汉阳府，此后，黄陂与武汉的关系更为密切。汉口开埠以后，黄陂人进城者更多，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又在沿江大道经洞庭街、胜利街到中山大道之间出现了一条黄陂

路，后来，因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系黄陂人，此路改称黎黄陂路。

除了黄陂街、黄陂路为黄陂人比较集中之处外，汉口各地差不多都有黄陂人杂居，以致竟有"无陂不成街"的俗语。黄陂人一多，满街都可以听到黄陂话。那浓重的方音充满了乡土气息，黄孝人听了感到亲切，汉口人听了觉得有趣。楚剧由于与黄陂花鼓戏有渊源关系（下文还要述及）固然使用黄陂话，而湖北大鼓竟也用了黄陂腔，相声、评书里有时也要插点黄陂话以加强气氛，即使是人们开玩笑，也爱学一两句黄陂话。黄陂话给武汉人的生活增添了喜剧色彩和幽默情调。

黄陂的能工巧匠在从前武汉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泥水匠、木匠、铁匠、铜匠以至磨剪铲刀的、修伞补鞋的、打豆腐卖水饺的，有许多都是黄陂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做手艺做出了名牌产品，如，响彻神州、响遍全球的高洪泰铜锣的创始人高青庵，是黄陂甘棠乡人；刀青钢白铁分明的曹正兴菜刀的创始人曹月海，是黄陂祁家湾人；谈炎记水饺则是由黄孝人经营的水饺担子发展而来的，谈炎记早期的老板谈志祥也是黄陂人；曾在花楼街、江汉路一带摆摊刻字的黄陂人朱绍安、王道钦、廖华亮等都是技艺精湛的雕刻艺人。黄陂的泡桐店素称"泥塑之乡"，其泥塑工艺品颇具特色，尤其以塑佛像见长，相传系黄陂王煜父子所塑的归元寺五百罗汉，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且历久不朽，令香客游人叹为观止。

以前为武汉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楚剧，更是黄陂文化的一大贡献。黄陂风俗，农历正月十五玩灯的时候要唱戏助兴，称为"灯戏"。一百多年前的早期灯戏主要是竹马、高跷及歌舞小调，其唱腔为鄂东一带的"哦呵腔"，用打击乐器锣、鼓、钹伴奏，没有丝竹乐器，一人唱，其句尾由后场人帮腔，唱、白均用黄陂方言。这种灯戏，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有条件的村庄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班，逐渐由业余向半职业班、职业班演化，从草台走向正规戏台，从民间歌舞、小调发展到情节剧，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剧种——黄陂花鼓戏。道光年间，黄陂花鼓戏已进入汉口，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有所记载：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

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土荡又写作土塘，在今民生路、统一街口一带，那里是黄陂人较多的地方，演出仍是草台形式，且比较粗俗，其"浪语油腔"被官府视为"淫戏"，而遭到禁演，所以当时并未形成气候。约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唱花鼓戏的同庆班正式进入汉口德租界的清正茶园演出，受到市民欢迎。到民国初年，为汉口戏剧界所认可。1926年8月，黄孝花鼓戏艺人以"湖北进化社"的名义加入湖北剧学总会，经总会研究，将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其后，楚剧便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汉剧并称为湖北两大剧种，看楚戏成为武汉市民当时的主要娱乐，楚剧界中黄陂籍老艺人李百川、江秋屏等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除了楚剧直接由黄陂花鼓戏演变而来以外，更早形成的汉剧、京剧与黄陂文化也有渊源关系。汉剧的前身叫汉调，它的主要声腔为"皮黄"，即二黄与西皮相结合的一种唱腔，"二黄"，相传导源于黄陂、黄冈二县（一说"二黄"即宜黄腔），"西皮"系由襄阳沿汉水传入武汉的秦腔与本地黄陂腔相结合而形成的。皮黄与北方昆曲有雅俗之分，它高而不折，扬而不漫，由湖北艺人带入北京以后，深得京中人士欢迎。进京的徽班吸收汉调及昆曲的一些唱腔与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了京剧，皮黄也成了京剧的主要唱腔。

黄陂民俗对武汉人的影响不止于汉剧和楚剧这些，其他如黄陂食俗中的"三合"或"三鲜"（肉丸子、鱼丸子和肉糕）已成为武汉人宴饮待客的常用菜肴，黄陂婚俗中的"三元汤"（鱼丸、肉丸、汤元，科举时代取连中三元之意）也被武汉人所模仿。到黄陂木兰山去朝山进香更是往日武汉人一大重要活动，因有专篇记其事，兹不赘。

总之，黄陂人在汉口的开发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黄陂文化丰富了武汉人的生活，影响着武汉的风俗习惯与民众心理，黄陂文化与汉口文化的融合，是城乡文化互相影响的典型一例。

（严昌洪）

江楚名区长春观

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浩浩荡荡的武昌大东门外，风景妩媚的黄鹄山（蛇山）尾部，有一处景色清幽、建筑典雅的游览胜地，它就是武汉现今仅存的一座具有典型道教艺术风格的建筑群——长春观。

不知哪位先哲说过“天下名山僧占尽”，也不知哪位先贤道出仙境的“洞天福地”总与方外结缘。不错，长春观就是具有先知卓见的方外人很早就开辟的一处洞天胜境。明媚秀丽的黄鹄山山势至此伏而又起，唐代著名的诗仙李白《望黄鹄山》诗中所说的“中峰倚红日”处，就是指的古长春观这一段。相传，古代此地多松，故有“松岛”之称。道教始祖老子曾应他的弟子之邀赴庐阜“会五老”，到了江南鄂州之后，没有停留，即西转而到湖港之乡、双峰山麓的长松岛。人们为了纪念他，附会说此松岛即长松岛，曾建有老子宫。老子宫虽属传闻，但是古代的方外人在秦汉、唐宋各代却因此兴建了“先农坛”、“神祇坛”、“太极宫”和“太清宫。”南宋的朱熹在他的《鄂州社稷坛记》中真实地记载了这块风水宝地：“城东黄鹄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

元初时，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号长春子，仿效佛教创建丛林制度。他多次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封赏，掌管天下道教，随南下的鞑军（元军）救人出水火。鞑军所经之处，就是邱氏弟子施教之处，于是，荆湖之地的邱氏弟子为祭奉长春真人，在松岛上修建了以邱氏道号命名的长春观。

明世宗年间，长春观“仙真代出，为湖北丛林特著，屋宇千间，道友万数，香火辉煌”。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九，长春观都要举行隆重盛大的邱祖会。邱处机生于宋代绍兴戊辰年正月十九日，传说十八日午夜天仙真人下降，齐为邱长春祝福。此间，仙真幻化无穷，或为乞丐，或为羽客，善男信女若是有缘见到，可以获福无量。所以，十九日这天，武昌、汉口和

汉阳的道众云集长春观以冀会仙。这项活动后流为民俗，叫“迎春会”，也叫“燕九节”。《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此作有《燕九竹枝词》，以描绘与会道众冀仙的渴望之情：“才走星桥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结”。

长春观还藏有历来被道教认为宝中之物的全套明版《正统道藏》，加之神像、神龛、法器、匾额完整齐全，陈设古雅，使长春观被誉为“江楚名区，道子云集之处，黄冠皈依之所。”著名的音韵学者钱大昕，在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慕名而来长春观阅查《道藏》，在来成楼写下了《三洞藏华序》。英国李约瑟博士著的《中国科技史》一书，其化学部分引用了《道藏》中的许多资料。

长春观的远近闻名，与该观的历任监院、方丈广结善缘是分不开的，清代名士来长春观阅藏查经之人继踵而至，莫不称赞监院朱合真交结甚广，慈悲大度。1865年（同治四年）在北京白云观主持传戒的律师张耕云，应长春观监院干本贤、金教法之邀千里迢迢来观开坛说戒。1925年，天门县龙潭出家的22代龙门正宗传戒律师刘嗣授与监院侯永德携手开坛说戒，受戒道众454人同载《湖北长春观乙丑戒坛登真录》，武汉的军、政、商界大员云集，高朋满座，黎元洪赠匾“大愿圆满”，萧跃南赠匾“道岸同登”。

古时名地多纷争。由于长春观地处武昌要冲，观宇建筑屡遭兵焚又屡次重建。清末太平军与清军曾经三次争夺武昌城，长春观常常是战火熊熊，硝烟弥漫，残垣断壁。清王朝在湖北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官文的七律诗《观焚》就是绝好的见证：

古观焚如岁月迁，何谁火里种青莲。
春风料峭双峰树，郁气氤氲万缕烟。
每意沧桑增阅历，欲寻洞府学神仙。
有缘到此空休返，且上回头普渡船。

1864年，龙门第十六代宗师何合春从武当山来此发愿，得到官文及江南提督军门李世宗捐助，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使长春观“庙貌森严、回复旧观。”清朝诗人王柏心为此作有《过长春观》诗：

山川俯仰劫灰余，在观重开阆苑居。

紫府琼台仍缥缈，元都金阙故清虚。

长春观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也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1926年，北伐军为了攻克北洋军阀在长江中段的最后据点，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武昌城下鏖战。叶挺独立师驻扎长春观，并在三皇殿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曾在观内暂住。邓演达在此督战时，衣袖被子弹击穿，俄国翻译纪德甫殉难于观内。为此，郭沫若挥泪痛悼北伐英烈：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笔彤。

今存长春观格局是1864年何合春率众仿明代建筑风格，以斗拱柳檩纯木为结构重建的。全观分左、中、右三路而进，中庭有四进。首进是红墙青瓦的灵官殿，内供镇守山门之神"五枢火符天将"，煞是威武。绕一巨鼎，经"五龙捧圣"，拾级而上是拔地突起的太清殿。高约5米的道教始祖太上老君鎏金塑像供奉正中，后侧左右是老君弟子南华真人和尹喜真人。东西殿壁上绘有以孔子问礼和老子修真、讲经说法，出函谷关为题材的大型彩色壁画。穿阆苑、蓬壶月门，沿花径直上七真殿。内供有全真教的创立者王重阳的七个弟子，代表着七个不同的教派：龙门派的邱处机、遇山派的马钰、南无派的谭处端、随山派的刘处玄、嵛山派的王处一、华山派的郝大通、清静派的孙不二。出殿登石阶即上暗含玄理的"地步天级"，由左右分级而上即晤会仙桥。古传，在殿内遇不见道人，若是在会仙桥上恰遇道人，即有"仙缘"，当你排除了凡心杂念之后，还可以聆听到仙乐呢！越过会仙桥，再向上攀，则是长春观的第四进殿宇三皇殿，红墙碧瓦的殿内供奉着华夏民族的祖先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氏。三尊座像，貌相原始，四尺高许，四肢坦露，只着叶衣。

三皇殿是长春观的最高点，在这里极目俯瞰，四院里建筑宝瓶压脊，单檐舒翼，古树虬蟠，亭榭楼阁，令人心旷神怡。有白鹤闻经声飞来栖止于观的"来鹤轩"，也有双手捧净瓶，仪态端庄的"慈航大士"；有赞

美政绩卓著地方官的"甘棠"摩崖，也有镌刻着"长春琼玑"，"天皇宝诰"的功德祠壁；有十方救苦难的子午种亭，也有终南修道后游历江湖的吕洞宾显化的"还丹井"。

气势宏伟的长春观，觅高尤需更上一层。站在三皇殿，铁路高楼尽收眼底。想必只有到了这里，才能真正领会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神秘之真谛。

（陈德传）

九宫八卦的元妙观

古老的汉阳，名胜古迹遍布。在这众多的胜迹之中，有一处"曲径通幽"之地，便是格局独具匠心的元妙观。明都御史吴廷用曾游此观作诗云：

玄妙仙宫汉水边，参差台阁翠微连。
瀛临北斗腾丹气，下瞰南溟霭碧烟。
鸾缈凤鳞环太乙，森严龙虎秘真铨。
长生欲访安期决，云散瑶空月满川。

元妙观创建以来的一千多年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始建时在汉阳县治东边，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当地官府委托中妙真人叶靖庵重新修建，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初年，赵廷兰任县令时，该观移至城西。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楚昭王有疾"，官府"大修境内名地"。此间，元妙观在荆州江陵副都纪王智明羽士主持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扩建与修葺，从此"殿庑门阁皆精丽"，曾一度为"有司岁时程延之所"，汉阳府管理道教事务的地方衙门"道纪司"设置于观内，著名道士韩明善曾在道纪司任职。知府刘汝松更是元妙观的常客，在一次醉酒之后当即挥豪作诗：

为访谈玄处，　岩扉碧藓重。
雨篱深薜荔，　露井落芙蓉。

醒酒常凭石，　开云独种松。
晚登龙胜绝，　江上有青峰。

据史料载，元妙观是武汉地区道教开山最早的一座十方丛林。土生土长的我国道教祠宇，一般规模宏大的都经帝王敕额命名，也正由于帝王的青睐敕颁，元妙观随着帝王的更迭曾经三易其名。967年（宋乾德五年）王修创立道观后的13年，宋睦宗赐名"天庆"。1312年（元皇庆元年），令改"玄妙"。清康熙年间，又因避讳康熙帝名（玄烨），更名为"元妙"。难怪出家于元妙观30多载的宗胜道人感慨道："出家人虽心在方外，但身躯、宫观却离不开方内。"

元妙观的建筑形式在武汉地区的道教宫观中是别开生面的。从龟山之巅俯视，整座观宇平面呈葫芦形，九宫八卦的格局令你如痴如迷，九宫八面，八卦九角，每一宫的设置，每一面的布局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都有一个神秘的传说。第一宫是红墙碧瓦的灵官殿，内供奉道教护法大神"王灵官"。它是宋徽宗十分崇敬的林灵素之弟子，因为人耿直，道教请其镇守山门。除此之外，还供养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方之神，按金木水火土五方形排列，取"生天生地更生仙，生人生物渐渐繁，生生不已"之意，象征长生根本，以壮威仪。第二宫三清殿，供奉玉清、上清、太清神像，取"老子一气化三清"之意。"三清"为道教至高无上之尊神，即道教最早的崇拜所谓"先天地而生，无世不存"的太上老君，道经中第一级中位尊神"元始天尊"和太上道君"灵宝尊"。第三宫和第四宫是与三清殿并列的邱祖殿和吕祖殿。邱祖殿供奉长春真人邱处机。吕祖殿供奉道教北五祖之一的纯阳帝君吕洞宾。世传他曾足登黄鹤矶（蛇山）留下了"黄鹤楼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炼丹砂"诗句。第五宫是玉皇殿，供奉玉皇大帝，与之并列的是第六宫雷祖殿和第七宫文昌殿。雷祖殿供奉司理风雨雷电的雷公电母，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三重大殿后是第八宫三官殿和第九宫大士阁。三官殿供奉所谓"天官、地官、水官"，道教认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殿房脊雕有天龙，成盘旋状。大士阁供奉慈航道人。

元妙观内林木成行，风景宜人。大殿后有一颗百年榆树，树下葬有开山祖师通灵道长王缘。为此，明朝诗人赵弼曾行立榆树下吟诗赞颂元妙仙宫的夺目光彩：

崔嵬楼阁倚晴宫，昔有真人伏虎龙。
一点红尘飞不到，丹房常被白云封。

（陈德传）

神灵之宅的武当宫

蛇山环抱其间，殿宇依山而建，杉榆松桧摩天翳日，石桥假山百折逶迤，这就是历来被认为是"乾坤秀萃之所，神灵之宅"的武当宫。

武当宫是武汉道教四大丛林唯一冠以"宫"名的道教圣地。据《大岳太和山纪略》载，位于湖北省均县以南的我国道教著名的洞天福地武当山，不仅自然景色标奇孕秀，而且各路神仙羽士云集，自1275年（元至元十一年）武当山道士鲁大宥由北方访全真道归故里，与汪真常在武当山传全真道法，度弟子百余人，至此，武汉方始有全真道活动。素有"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之誉的武当山，殿宇大多受明成祖朱棣敕额，亦多以宫命名。相传鲁大宥的弟子发愿来到黄鹄山麓建造了武当山的行院，由此而得名武当宫。

同其它丛林一样，武当宫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垂青。包含着古代社会宗教意识与民族文化的我国道教，追求的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武当宫的历任住持刘嗣授、江宗善等不仅重乐、贵术，好养生之道，且精通中医中药。希图"得道成仙、消极虚静、超脱自在，不为物累"的达官显贵，便与道教投缘，大修名祠，以求长生久视。明代撰修的《寰宇通志》载，武当宫原建于武昌平湖门内，即古黄鹤楼的东面，洪武初年续建，1445年（明正统十年）重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又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并立有"重建武当宫碑"。清光绪初年，官府又将宫"移建学府宫西"。

移建后的武当宫，旧址原是武昌府的城隍庙，殿宇坐北朝南，背依

蛇山，山门正对南天门，传说此宫30年出一地仙，60年出一天仙，山门双壁书有1米见方的"龙虎"二字，雄浑粗犷，挺拔遒劲。进入山门即入仙界，按道教说法，山门外属俗界。武当宫以"秀萃"闻名于我市道教四大丛林之间。灵官殿、玉清殿、三皇殿掩隐在绿树丛荫之中。每座殿宇前古松参天，四时花卉沿墙栽种，宫内右边是古天鹅池，传说天鹅曾来此饮水，嬉戏，道童来池中取水时可隐见天鹅的倒影。红尘俗路的若隐见天鹅则一生将吉祥如意，天鹅池水甘甜，明目清心，可以制酒。宫左假山错落，古槐葱郁，碑石林立。假山与戒台之间架有一石桥，桥下泉水葱绿，菖萍清翠。这里的每一条花径、绿树成荫，可以通达每座殿宇。玉清殿里的神龛最为精美，有二龙戏珠和双凤朝阳装饰，龛下是雕刻精巧的石座。龛上陈设的珍珠彩灯、宝瓶、香鼎等均为武昌府的要员所赐，每临真武的诞辰，这里钟鼓长鸣，香烟缭绕，磬声悠悠，为古观庄严道场 增添无限情趣。一入此境，颇有脱俗之感。幽致清雅的庭院，庄严肃穆的殿堂笼罩了这座"神灵之宅"的古朴、神秘。

斗转星移，随着该宫最后的住持柴永仙的仙逝，香火稀疏，树[illegible]去。而今行立武当宫的旧址，只留下空空的回忆。

（陈德传）

闹市街头的大道观

相传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信奉道教的潜隐默修之士，无不喜遁居幽静之林。然近代的汉口辟为商埠，商品经济发达的利济路，却有一处远近闻名的道教圣地。由于它地处人口稠密的闹市街道，所以称作大道观。

大道观的历史虽不久远，但因它地处商业中心，知名度远远超过其它丛林。大道观原基是一个水塘，塘边有一供人祈拜风调雨顺的玉皇亭。清道光年间，扩建为一庙，取名玉皇阁。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住庙道人李敏无力扶持，遂将庙产全部捐给道友杜圆椿。杜即拓展为一十

方丛林。庙产属道教徒，凡是道友皆有挂单居留的权利。民国初年长春观监院侯永德发起募化，委派知客裴至德主持督建，重建后的大道观规模大大超过从前。总占地面积1632平方米，建筑面积2461平方米，有殿宇、客房、堂库7栋。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殿宇大都节约空间，山门灵官殿和玉皇阁设计为上下两层，还在临街开设有9个铺面。得天独厚的环境，商界财团的辅佑，民国年间，香火甚旺，经忏收入较为宽裕，常住道众多达70人。

大道观以经忏活动著称于武汉道教丛林。1945—1950年期间，经忏活动最为兴盛，每年半月以上的经忏法事多达十几次，小型焰口，斋醮几乎天天不断。身怀绝技的高功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尹景山任高功时，大道观的经忏法事更为频繁。尹高功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尤其是他咏诵辞章，抑扬顿挫，步虚韵调的行腔时而婉转，时而铿锵，使得场下的信众如痴如醉。所以，汉口的大商富户做法事都乐意请他主坛，甚至排队专等他做。

大道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玉皇圣会"。按道教说法，昊天玉皇大帝尽管有四御（四大天帝）协助佐理天上地下、天道运行的事务，但每年腊月二十五日至正月初九，他仍然要降圣下界，亲自出巡视察下界的情况，考察众生道俗的善恶良莠，以便赏善罚恶。在这一天，大道观要举行隆重的道场迎接玉皇大帝的法驾降临。当天半夜子时举行接驾仪式，全体道众跪在玉皇阁前，恭敬迎接，诵经礼忏，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山门鼎盛，香火绵延，道德兴隆。红尘俗路，施主玄客，涌进山门道观，敬香还愿，以求岁岁平安，丰衣足食。汉口几个大商号或某些慈善团体集资请做《高上玉皇本行经》，念经者多达36人，时间延续49天，法事包括上表、供天、炼度、专炼、上供、发遣、亡斗、开启、结彩、青玄朝、请圣、召孤坟等等，以使玉皇在出巡下界的半月中，充分享受到人间的香烟恭祝，在其诞辰吉日（正月初九）的下午回銮返还天宫。

1952年随着住持裴玉德的仙逝，观内住持人由于长期空缺，更由于

道士们纷纷放弃经忏职业，积极参加手工业社的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兴盛一百多年历史的大道观宗教活动至此划上了句号。

（陈德传）

旧武汉的“长街”与“正街”

一座城市的主要街道是该城市经济、文化乃至历史的展示橱窗。主要街道可以千百年一以贯之，也可以随着城市的扩建而发生转移。武昌的主要街道从宋元时代的长街到如今的解放路，街名几经改变，建筑代有更易，但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主要街道总还是那条街。而汉阳则不同了，如今的主要街道在钟家村一带，旧时代的主要街道显正街反而显得十分冷落了。旧汉口的主要街道汉正街，虽然由于小商品市场的建立而依然热闹，但现在汉口的主要街道却转移为中山大道了。

武昌解放路古时称长街。据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江夏）南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说明武昌长街之名宋代已有。当时指的是蛇山南面的街道，街两侧有宁湖、都司湖、西湖、歌笛湖等湖泊，统称南湖，故有的书上说长街原为古南湖堤，中曾有广平桥。宋元时代，随着城外江边南市的繁盛，长街已十分热闹。到明代，将南楼下 蛇山凿洞，山南北街道始得以贯通，南起望山门，北至司门口，全长五、六里，成为真正的长街。清代时，分地段有司门口、南楼、芝麻岭、兰陵街等地名，而人们习惯上统称长街，至今年长者仍有是称。明清时代，此街不仅店铺林立，生意兴隆，是武昌经济中心，而且一些著名的古建筑也座落在街 的两侧或附近，如南楼、雄楚楼、武昌府文庙、三佛阁、两湖书院等。南端的望山门附近和北端的司门口是官署比较集中的地方，从湖广总督署到省、府衙门不少就设在这两处。当时长街的热闹情景用肩摩毂击，冠盖如云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原街比较狭窄，全用条石铺砌。1935 年全面扩建，不仅拓宽街道，改为水泥路面，而且南

北延长，南至中正桥（今解放桥），北达中山路，并将长街命名为中正路。解放初改用今名。

古汉阳的主要街道为正街，东端称东正街，中西段称显正街，它像一条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从古汉阳城的中部穿过，东起朝宗门（东门），西出凤山门（西门）与西门正街、西门外正街（后合称西大街）衔接，全长不足两里，与古城垣同时建筑，足见当时汉阳城之小了。汉阳府、县衙门多位于街的北侧。在汉水改道之前，随着南纪门外市场商业的繁荣，显正街上也商贾云集，熙来攘往，商贸活动比较活跃，以致短短的正街容不下许多商家，店铺建筑延至西大街上，西门外的这条大街也成为汉阳的主要商业区。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镇崛起，武汉商业重心由武昌、汉阳两岸转移到汉口，汉阳经济衰退，渐渐变成了"有城无市"的落后城镇，显正街逐步冷落。本世纪50年代，汉阳开始向工业城转变，而商业中心、政治中心却转移到了钟家村一带，显正街的地位已不那么"显"了。

旧汉口的主要街道原来也称正街，从1926年起称为汉正街。汉水改道以前，汉口与汉阳相连，汉正街所在地还是一片芦苇滩。明代天顺年间始有人居住。汉水改道后，商船云集，居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慢慢地形成街道。诚如范锴《汉口丛谈》所云："沔水（按：即汉水）于郭师口直冲入江，而汉口遂有泊船之所，乃市列渐盛矣。兹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鳞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汉正街由于一系列码头的兴建而更趋繁盛，乾隆时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故街上除了商店以外，还有很多骡马店、客栈、堆栈，供过往商人歇息或囤货。汉正街行政上分为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前二坊为上路，属仁义司管辖，后二坊为下路。上八行包括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药材、纸张等行业，齐行敬神在沈家庙；下八行头则包括各种手艺作坊，齐行敬神在三义殿。各行帮又有自己集会敬神之所。称为会馆、公所，大多以寺、庵、殿、书院等命名。明清时代的汉正街一直是汉口的主要街道和商业中心。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

后，商业中心逐渐移到六渡桥至歆生路（今江汉路）一带，汉正街日渐衰落。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军为攻占汉口，竟放火焚烧民房，汉正街变成一片瓦砾。后来着手重建，但终未能恢复旧观。由于靠近汉水，与附近农村交通方便，民国时慢慢演变成小商品专业市场。今天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固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而我们仍然不难看到解放前小商品市场商业传统的影响。

（严昌洪）

武汉名人路

以历史人物的名字来给街道命名，是纪念名人的一种好方法。武昌和汉口有一些街道，或者曾以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或者现在仍保存着名人路名，或者几经变更，现又恢复了名人路名。

先看武昌。武昌长江岸边有一条临江大道，紫阳路至前[illegible]路一段，从前称为张江陵路。张江陵即张居正（1525—1582），湖北江陵人。明代大政治家、改革家，官至首辅（内阁掌实权的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前后当国10年，推行“一条鞭法”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死后不久，受权贵攻击，追夺官爵，籍没家产，累及家人。明熹宗即位后始得平反昭雪。

今武珞路上段（阅马场至大东门）原称宾阳门正街，一度改名熊廷弼路，以纪念明代被冤杀的这位江夏（今武昌）籍的大将。熊廷弼（1569—1625）官至兵部尚书，辽东经略。在抗击后金的战斗失利后退至关内，魏忠贤指使党羽诬陷他侵吞军资，被冤杀，传首级于九边，弃尸骨于荒野。崇祯帝即位，始诏许其子持头归葬。

今民主路解放前称胡林翼路。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1855—1861年（清咸丰五至十一年）任湖北巡抚，是与曾国藩齐名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刽子手。

今紫阳路在1936年时曾命名为张之洞路，以纪念这位著名的洋务

派代表人物和湖广总督。

武昌的主要街道解放路古时称长街，1935年拓宽改建成水泥路，易名中正路，为蒋介石树碑。武昌解放时改今名。

以上几条名人路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今尚存的名人路有中山路，起于长江边的大堤口，沿武昌老城向东向南经大东门、火车站，折向城南巡司河，沿河北岸向西至解放桥，与解放路相接。还有彭刘杨路，原名平阅路（平湖门至阅马场），1948年为纪念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而易名。文革中一度改称革命路，1972年恢复今名。

汉口最著名的名人路当然要算中山大道了。这里的上段和中段清末民初称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以后，改称中山马路，以纪念孙中山先生。1946年元旦正式命名为中山大道。

纪念民国名人的还有黄兴路，原系法租界巴黎街（1943年改名天隆街）和新仁黎街（1943年改名华宝街），1946年两街并称黄兴路。1967年改名保卫路，1972年恢复今名。

蔡锷路，最早为法租界的福煦大将军街，亦名福煦路，1943年4月改名星光街，1946年为纪念护国战争功臣蔡锷而易名。文革中一度称滨江路，后恢复今名。

黎黄陂路，原名黄陂路，传说系黄陂旅汉人士修建于1900年。后划入俄租界，改建为夷玛街。1946年为纪念黎元洪而改名黎黄陂路，因黎亦黄陂人。1967年改称韶山路，1972年一度再称黄陂路名，1982年恢复现名。

陈其美路，原为俄租界领事街，1925年3月收回俄界时改名南皮路，纪念张之洞。因张系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946年易名陈其美路，以纪念辛亥革命曾任沪军都督，后被北洋军阀暗杀的陈其美（1877—1916）。1955年改名洞庭小路。

在合作路与黄陂路之间的兰陵路是以湖北新洲人、军阀萧耀南定名的。萧曾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省长。萧姓郡望为浙江兰陵，萧耀

南人称萧兰陵。兰陵路在字面上与萧耀南的关系不那么明显，故未遭更名。

林森路，原德租界的皓街，今一元路，在1946年曾一度改名林森路，以纪念曾在辛亥革命中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1932年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1867—1943)。

抗战爆发之初，空军少尉陈怀民(约1915—1938)迎击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壮烈牺牲，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麟(1898—1937)和该军第54师师长刘家骐(1894—1937)在晋北抗日，同时遇难。为纪念这些爱国将士，1938年8月武汉各界人士提议以他们的英名作为路名，因战事紧急，武汉失陷而没有付诸实施。抗战胜利后，武汉人民更加怀念他们，于1946年将原日租界的南小路命名为陈怀民路，鳌昌小路命名为郝梦麟路，新小路命名为刘家骐路。同时还将成忠街改名为张自忠路，纪念1940年在鄂北抗日阵亡的第33集团军司令兼59军军长张自忠(1891—1940)。这些路名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都曾取消，而代之以红卫路、红胜路之类的名称。1985年全部恢复纪念这些爱国者的路名。

此外，外国侵略者在各自的租界内以各国的名人命名了一些街道，如俄界的亚历山大街、法界的霞飞将军街、克勒满沙街和威尔逊总统路等，因带有殖民侵略的烙印，理所当然的要为中国人所摈弃，将霞飞街改名为岳飞街，将福煦大将军街改为蔡锷路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严昌洪)

用"三民主义"命名的四条路

汉口市区繁华地段的三民路，北起今中山大道六渡桥立交桥南侧，南至孙中山先生铜像，是汉口解放前除租界和中山大道以外的最早的一条柏油马路，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而命名的4条道路之一。同时以"三民主义"命名的，还有邻近三民路的民生路、民权路、民

族路，而三民路是这3条路的中心枢纽。

民生路位于今中山大道以东，起自今武汉工艺大楼侧门前，直抵沿江大道17码头，横贯花楼街、黄陂街，全长850米，宽约20米，为沥青路面。筑路之前，这条线巷路曲折迂回，车辆不能通行。1929年5月，动工拆除路旁房屋，历时数月，修成一条柏油马路，时被誉为"宽宏大道"。这条路是汉口著名的商业街，解放前有两家金号（俗称银楼坊）就设在这里（一家现为交电商店，另一家现为皮鞋店），还有几家布店（原称公平、国大）、茶馆（活雅茶楼，现为工艺大楼）、餐馆（时运春酒楼等）和饭店（长江饭店）。

民权路西接三民路与民族路的交汇处，东抵王家巷武汉轮渡码头，全长866米，宽约22米，沥青路面。明崇祯年间（1628—1644），这一带是玉带河下游，河上架有木桥、石桥。清嘉庆年间（1796—1820），玉带河逐渐淤塞，相继填平成市，形成街巷。今广益桥、太和桥地名就是当年诸多桥梁的遗迹。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协会、以毛笔著名的邹紫光阁和陈太乙中药店都在这条路上。

民族路北接三民路，南抵汉水边集稼嘴码头，全长570米，宽约20米。解放前是沟通汉口和汉阳的主要道路，集稼嘴的木划是汉口汉阳往来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这条路是在原长胜街基础上于1928年拓建的，工期历时5年。

以上4条路，都是在刘文岛任汉口特别市市长任内修建的。

汉口沦陷后，日伪将民生路改为"至善"路，民权路改为"铭新"路，民族路改为"维新"路。"文革"中，以上这几条路又改为"人民四路"、"人民三路"和"东风路"。直到1972年才恢复原名。

（商若冰）

武汉行业街

一条街道经营同一行业的作坊或店铺比较多，就形成具有特色的

行业街。行业街大多以行业命名，顾名思义，街名本身就是商品广告、购物向导。武汉的行业街出现比较早，都是手工业作坊集中之地。

清道光初年范锴所著《汉口丛谈》卷二所列载汉口坊巷之名中，已出现不少行业街名。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称："街名一半店名呼，芦席稀稀草纸粗"，说的就是行业街的得名。在正街有打扣巷，可能是制作花结的；剪子街，生产刀剪；靛行巷，生产和销售染料；衣铺街，裁缝店或服装店集中之处。在中路有纬子街，即今统一街，可能是纺织纬帘的地方；花布街、白布街，即今之花楼街一带，分别销售花布和白布。中路后有戏子街（今人和街），可能是唱戏艺人聚居之地；打铜街，南起花楼街，北抵统一街，是铜匠集中之所。据称，这里的铜匠打造铜质的茶壶、脸盆、墨盒、烟袋、锁、蜡台、香炉，精巧美观，经久耐用，多是汉货精品，因此，打铜街的名声远播。在河街还有砖瓦巷、草纸街、袜子街、芦席街，顾名思义，这些街巷分别是砖瓦商店、造纸作坊、织袜作坊和芦席商店比较集中的地方。除《汉口丛谈》记载的这些行业街，汉口在晚些时候还出现过绣花街、篮子街、铁坊巷、纸马巷、五彩坊、灯笼巷、牛皮巷、皮业巷、药帮巷、麻线巷等。

在武昌，有一条筷子街曾驰名一时。此街位于今临江大道大堤口至前进路段。明朝末年江西吉水县一批制筷业的工匠随人口大迁徙来到了武昌，在江边筑堤而居，继续从事筷子生产，他们将竹子在堤旁小湖中浸泡，把制成的筷子撒在堤上晾晒。久之，当地居民把堤称为筷子堤，把湖称作筷子湖。后来在湖畔形成一条专门生产和销售筷子的街道，名为筷子街。晚清时代，此地筷子作坊达100多家，所产筷子销往全国各地。武昌另有一条灯笼街，专门生产和销售灯笼，亦是一条有名的街道。此外还曾有过豆腐巷、绳业街、砖瓦巷、箍桶街等。

在汉阳，有棉花街，即今阳新街，从前是弹棉花工人聚居地。稍晚出现的洋油街，是搬运煤油的工人聚集之处。

这些行业街的形成、发展，以至驰名，说明明清时代武汉手工业的繁盛。

（严昌洪）

汉口的"雨花台"——铭新街

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外的雨花台，是著名的历史遗址。解放前数十年，无数先烈在此留下可歌可泣的史迹。解放后，这里兴建了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6.8米高的石碑题写了"死难烈士万岁"的碑名。

汉口有一条铭新街，也是一处历史遗址。20年代以来，曾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街头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因此人们称这条街为汉口的"雨花台"。

铭新街平行于中山大道以北，横贯江汉路与黄石路之间（现已延长至大智路）。1927年7月15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宁汉合流"共同反共，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铭新街便集中了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全套机器：卫戍司令部、法庭、监狱、刑场。武汉卫戍司令部设在现大智街办事处这栋花园式楼房里，法庭（军法处）旧址现为武汉市劳动局。监狱（看守所）设在卫戍司令部与军法处之间的裕润里内。后来，裕润里不够用，又把司令部后面的榆荫里也作为关押革命者的监狱。刑场就在铭新街头云 樵路（今黄石路）旁的一块荒地上（即现在的黄石路中学、荣光堂这一片地方）。此处位于余记里的后面，故屠杀烈士们的"布告"上都写为"绑赴余记里后坪执行枪决"。

国民党桂系胡宗铎、陶钧进驻武汉后（1927年冬至1929年春），这时已达屠杀革命者的高潮，卫戍司令部和军法处同设在现武汉市劳动局那栋房子里。那一时期，在铭新街上经常可以目睹烈士就义的情景。有次一批就枪杀了26名革命者，把刑场都排满了。因为他们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武汉人称胡、陶为"屠户"。

1951年，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同报社记者谈起当年铭新街上烈士就义的情况时，就谈过：铭新街就是武汉的雨花台，要告诫我们的子孙，当经过铭新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先烈。（萧志华）

防汛险段龙王庙

汉口沿河堤的防汛险段龙王庙，不仅备受地方各级领导和防汛部门的关注；而且还受到中央的重视。有一年汛期，周恩来总理还曾经从首都打电话询问："龙王庙的情况怎么样？"前两年，中央水利电力部召开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100多位代表，曾专程来汉视察龙王庙。

龙王庙的身价为什么这样高呢？既然它是这样有名，在如今武汉的地图上，又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地名？它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答案是这样的：从新沟到龙王庙，是汉江下游流经武汉市区境内的一段，计长62公里。河槽平均宽约340米，最窄处是龙王庙的出口，仅有180—200米。河道上游宽下游窄，好象漏斗，到了龙王庙自然就形成水深流急。偏偏南岸是龟山下延的余脉，不易冲刷。北岸的岸线呈突出弧形，既受汉水洪水顶冲；又受长江激流淘刷，以致岸陡脚虚。经过水下探测发现：这一带的堤脚河床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冲刷坑，极限冲刷深度达－15米，冲刷坑的数量多得不可胜数，这就是导致地基沉陷的潜在因素。不同程度的地基沉陷当然要促使驳岸和防水墙发生裂缝。在战争年代，这里的驳岸曾经遭受轰炸，留下了暗伤。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使这一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险段。

200多年以前，人们还确信水里有龙王，为求龙王保佑，免遭水灾，人们在汉水入江口的北岸（今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码头），修了一座龙王庙。庙的规模虽不大，每年的夏秋两汛，香火却特盛。1931年，在这里还上演过一出闹剧。

1930年，汉口市政府工务局为了修建沿河马路，拆除了这座庙。第二年三镇淹大水。有些人说："这是拆了龙王庙，惹得龙王爷发脾气。"于是延请某寺高僧，在该地筑坛念经，朝夕拜祷。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也亲临拈香，冒雨跪在渍水中，向江面三跪九叩首，哀求龙王爷大发慈悲。高僧也向众人保证："不出七日水必退，否则贫僧当跳进江中去质问龙

王。"到期，水仍不退，群众纷纷质问该僧，该僧出尽洋相后不辞而遁。著名报人蔡寄鸥因作歌以讽之：

"大善士，信神明；大和尚，显威灵，筑高台，念黄经，焚香合十蒲团坐，宛似当年法海僧。今日不退水；明日不退水，水晶宫里问龙王，不信龙王不讲理。台上法无边，台下水无涯，善男信女齐喧哗，和尚此时心如麻；弃了木鱼，丢了铙钹，脱了袈裟。"

龙王庙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拆除了，但它的名称却作为区片地名的泛称流传至今。按照防汛部门约定俗成的说法，把汉口沿河堤从桩号 39＋200 到 40＋100 的长 900 米的这一段，通称为龙王庙险段。

龙王庙的特殊地理位置，还曾经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注意，他在所著《建国方略》中谈到武汉建设的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并且一再提到龙王庙："在整治长江堤岸，吾人须填筑汉口前面由汉水合流点龙王庙渡头起，迄于长江向东屈折之左岸一点。此所填之地，平均约阔五百码至六百码。如是，所以收窄此部分之河，全河身一律有五六链（每链为 1/10 海里）之阔。又令汉口租界得一长条之高价土地，于其临江之处也，此部之价，可以偿还建市所费之一部分。汉口将入江处之急激曲折，应行改直，于是以缓徐曲线绕龙王庙角；且使江汉流水，于其会合处，向同一方面流下……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

因为龙王庙口"急浪惊泷似箭穿"，现在有规定不准停船。但是，在清代中叶，这里却是可以泊船的。当时汉口镇有 8 座码头，其中的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接驾嘴和柯家码头，都是专渡汉水的渡口；四官殿是专渡长江的渡口，只有龙王庙是兼渡汉水与长江的渡口，和其他 7 处相比，这里更为热闹。当年是怎样停船的呢？那是嘉道之际大盐商李祥兴想的办法，以大木料扎成几丈长的木簰，宽度为长度的一半，用特粗木桩和铁链系于江岸，外以泊船；内以长跳接岸。过客商旅，无不称便。

（徐明庭）

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

20世纪80年代末叶，在汉口解放大道以北，出现了一条与之平行的主要干道——建设大道。大道两旁高楼入云，街心花坛姹紫嫣红。就在这条繁华的大道上，下面平卧着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这条地下长龙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明朝中期，那时的汉口屡遭水患，每逢夏秋水涨，全市沦为泽国。1635年（明崇祯八年），袁公堤（今长堤街）筑成后，堤外之渡桥东北方向有一较大湖汊，四季潴水不涸，人称"十八汊子"。那时没有公路和铁路，从黄（陂）孝（感）来汉口的人，多坐船从府河顺流而下，经"十八汊子"，穿过汊子之间的连通港，直达汉口中心的土埕（今统一街文书巷上首）。当时的土埕，是一个水陆码头，有一首《柳枝词》这样写道："土荡（即指土埕）临歧即灞桥，不曾离别亦魂消。青青惯送朝天客，也向风尘折瘦腰。"生动地描绘了亲友送别的情景。

"十八汊子"汊子与汊子之间，宽窄不一，窄的地段两舟须相擦而过，秋冬水浅，还须拉纤而行。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后，汉口日渐繁荣，黄、孝与汉口间来往船只增多。"十八汊子"之间的连通港被扩宽，形成了一条小河。因能通黄陂、孝感，故得名黄孝河。

当年的黄孝河，两岸垂柳成荫，芦苇茂盛，湖中野鸭成群，河水清澈见底，水草丛生，游鱼可观。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督鄂时为了围垦后湖，兴建了一道大堤（人称张公堤），并在黄孝河上游岱家山修了一座排水闸，黄孝河出水口被长堤斩断，湖泊被围垦造地，河道流量受到限制。加之京汉铁路汉口至信阳段建成通车，黄陂、孝感至汉口间的水道运输逐渐为铁路所代替，黄孝河逐步成为汉口地区工厂、居民排放污水的沟渠。

解放后，汉口城区不断扩大，黄孝河两岸修建起大批工厂和居民区，工业、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河中，致使河水发黑发臭，河道淤塞，脏水

漫溢，蚊蝇孳生，污染严重，殃及四周。据有关资料统计，这条长12.4公里，宽20至30米，水深3米，汇水面积为84.6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3条下水道干管通达，每天约有50多万吨污水排入河中，然后抽排入长江。虽然在岱家山、后湖先后建立了两座排水站，但远远不能适应城市排水的需要，每逢雨季，更加排泄不通，造成汉口城区大面积渍水。仅1982年和1983年两次特大暴雨，就使汉口地区渍水面积达37.6平方公里，占汉口城区总面积的68.4%。黄孝河这条曾经繁盛一时的利民小河竟与南京秦淮河、上海苏州河、天津祥水河齐名，列为全国四大城市害河之一，武汉人民气愤地称它为"汉口龙须沟"。

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全面治理黄孝河。1985年10月5日正式动工，经过近4年的艰苦奋战，黄孝河已深深地埋入地下，代之而起的是十里长、以桂树为主的桂花一条街——崭新的建设大道。

（商若冰）

武汉第一座水塔

今天，水塔在武汉已不算稀奇事，大一点的企事业单位均有自己的小型水塔，有的呈圆柱形，有的作漏斗状，可以说水塔林立，给千家万户用水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武汉的第一座水塔却因为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不再为市民供水了。这座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水塔，由于一直耸立在汉口闹市中心（中山大道中段江汉路附近），对武汉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

武汉这座最早的水塔，系原既济水电公司所建。既济水电公司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浙江籍商人宋炜臣联合湖北、江西两大商帮集资创办，得到鄂督张之洞的支持，公司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宋炜臣任经理。总公司设在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电厂设河街大王庙河沿。自来水厂设硚口外宗关上首。

水塔于1908年开工兴建。由英国工程师穆尔设计监造，广荣兴营造厂承建，1909年(宣统元年)建成。水塔曾在英国保险公司保险，期限70年，业已届满。塔体占地556平方米，建筑面积8120平方米，水塔主体作八卦式，即建筑平面为正八边形，每边外缘长8.2米，内缘长7.75米。西南突出部分为楼梯间，是边长4米的正方形，内设木梯200级，可盘旋而上。塔基部分深15米，挖土3万方，用5层花岗石灌水泥沙浆砌成。塔身高41.32米，分7层。第一层外墙为花岗石砌成，第二层以上为红砖清水墙。一至五层设有房间。第二层为生产工作室，装有水表，可观察全市用水量。第五层为水柜底部，能听见水声，有8英寸铸铁水管3根，两根上水，一根下水。用机器吸水至塔顶。第六层为水箱，圆桶形，底面直径18.67米，壁高7.33米，箱壁用双层半英寸厚的钢板铆接而成，水容量1500吨，主要用于调节中心城区供水压力。水箱内装有浮锤式自动关闭系统和其他设备。第七层为了望台，上有重1000多斤的铸钢警钟一具，悬挂在8寸工字钢横梁上。安排4人日夜轮流了望，遇有火警，白昼悬红旗，夜晚燃红灯，同时敲钟报警，先乱钟30响，再以响数告知火警地区：一响是洋火厂至华清街，二响是歆生路至前花楼，三响至堤口，四响至四官殿，五响至沈家庙，六响至大王庙，七响至武胜庙，八响至仁义司，九响至硚口，声闻遐迩，家家知晓，各处水龙闻声紧急驰救。

水塔在解放后继续发挥作用，到70年代末，由于武汉市供水事业的发展，水塔已完成了供水的历史任务。现已开辟为水塔商场(既济商场)。高大的水塔如今同许多现代化高层建筑比起来，显得矮小了，但它作为武汉的早期近代文明的一种标志，长久地屹立在汉口市中心，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严　锴)

梅神父医院与梅神父路

在汉口循礼门外江汉北路，有一所专门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

院，它是由原意大利天主教会所办的“梅神父医院”改建而成的。提起“梅神父医院”，还有一段令人伤心的往事。

那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梅占春奉天主教汉口教区之命，到该教区所辖应城县廖家寨一带从事传教活动，历时20余年。应山县有一贫苦农民雷幺，逃荒到应城矿区做熬盐工，因揭发盐号资本家用小秤卖出，大秤收进的手法剥削农民，被罚到矿区天主教堂服劳役“赎罪”。在天主堂，梅占春对雷幺百般凌辱，不仅不让吃饱睡好，反而动辄打骂。雷幺不堪虐待，逃出了天主堂，回到应山天子岗家乡，邀集一帮穷苦农民，举起义旗，杀富济穷。雷幺为了报复在矿区教堂所受的侮辱与毒打，亲自到应城将梅占春抓获。应城县长深恐因此得罪洋人与教会，派人找雷幺商谈，愿以一万银元赎回梅占春，同时密报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请求派兵进剿。并派矿警到天子岗抓走雷幺之兄雷三，扬言如不放出梅占春，就要杀死雷三。雷幺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坚决处死了梅占春。

梅被雷幺处死后，汉口怡和街（今上海路）天主教堂负责人、意大利传教士索尚铎向意大利政府报告，意政府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赔款和严惩凶手。索尚铎还到法国驻汉领事馆（当时，法租界当局行使罗马教皇授予的在汉天主教保教权）跟领事密商，由法国领事与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联系，向萧耀南多次要挟。法意两国并派军队来汉示威。当时，北京政府和萧耀南慑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惟恐事态扩大，命令应山县政府杀害了雷三，并下令通缉雷幺。萧耀南还秉承北京政府的意旨，在索尚铎和法国领事召开的会议上，除向法意两国赔礼道歉外，还同意从汉口盐业税内拨出36万银元作为赔偿费。

索尚铎将赔款的一部分交给时任应城石膏公司董事长的陆德泽筹建一所医院，并在循礼门外买一空地动工兴建。1929年1月4日，医院建成，除医院房舍外，还建有对外开放的天主堂和神职人员住宅。该院占地57.708亩（约4万平方米），由陆德泽任院长。他们为纪念梅占春神父，将医院命名为“梅神父医院”。当时萧耀南虽已死，但北京军阀政

府为讨好洋人，还同意将医院所在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梅神父路"。

195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了"梅神父医院"，改建"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并将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梅神父路"，改名为"江汉北路"。

（商若冰）

人间地狱——汉口难民区

1938年10月25日，日寇首先侵入汉口，27日，分别占领武昌、汉阳，自此，武汉三镇陷入敌手。武汉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苦苦地熬过了整整7年。日寇占领武汉不到一个星期，就圈定了"难民区"。

何谓"难民"？日本强盗把因各种原因来不及逃走而留在汉口的市民统统称为"难民"。把"难民"集中到一个地区居住，便于统治管理，这就是"难民区"。日寇占领武汉的第一件"德政"就是圈定"难民区"。

汉口难民区开始的范围，是上起硚口，下抵利济路（当年的汉正街以北称利济巷，以南称大王庙），前抵襄河边，后抵中山大道。四周布满铁丝网。那时的利济巷，宽不足3米，在这条小巷中间摆下带刺铁丝的木制横形障碍物，还接通电源，把小小的利济巷一分为二，分割开来，不准翻越。利济巷中对门对户的街邻有事不能直接往来，必须绕道汉正街，再绕过障碍物，才能会晤。如果有谁图方便试图翻越障碍物，必致触电死亡，即使侥幸不死，被日寇发现也不会轻饶。

整个难民区只有两个路口供"难民"出入，一为硚口汉正街，一为利济巷汉正街口，由日本军方设置哨卡，最早由日本宪兵站岗值勤。所有"难民"在这两处出入，必须手持"安居证"（通称派司，又称"良民证"），脱帽弯腰，向值勤日军鞠躬行礼，方准放行。否则，轻者遭日军拳打足踢，重则拖到日本宪兵队审问，毒打，灌盐水，上电刑，甚至以游击队罪名处死。后来，由于"复归复业"的人增多，"难民区"亦随之扩大，从利济巷延伸到大夹街新街口，日本宪兵队设在长堤街三民路口，把长堤街筑墙封闭。

"难民区"起初没有任何管理机构，只有教会组织由主教孟良佐负责成立的汉口难民委员会，在汉正街循道会(今市四医院近邻)办公，由该地牧师沈文卿负责。凭该会发出的"难民证"领取大米，施救难民。普爱医院(今市 四医院)院长江虎臣协助办理送诊施药，救治"难民"。

不久，日军汉口军特务部派两名日本军官，指使汉奸蓝熙周出面成立"武汉各界联合会"，会址设在汉正街维新巷口米店内，办理"复归"(逃离武汉的人回到武汉)"复业"(商户重新开业)事宜，促使汉正街店铺开门营业，藉以繁荣市面，提供流通，粉饰太平。后因"难民区"范围扩大，该会迁至汉正街淮盐公所内办公，日军军特务部派朝鲜人李福贤为"飘托"，成为该地的"太上皇"。在"武汉各界联合会"的策划下，在至公巷对面湖南会馆开设了"难民区"独一家戏院——联合戏院，演出汉剧；在余庆里口开设了第一家酒楼——随园酒家。"难民区"开始"繁荣"起来。

日寇对"难民区"统治极其严酷，派有维新路宪兵分队、三民路警备队分哨、松田兵站部苦力收容所等，汉奸组织有警察总监部的警察分局，严密控制"难民区"的活动。1940 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特别市改组为汉口特别市，将"难民区"更名为"华中区"，范围下延到集稼嘴。伪警察总局在汉正街成立了 3 个警察分局，下辖 13 个警察分所，还建立了 5 个联保办事处，加强保甲控制。还有一些伪组织如中江实业银行中华区办事处、汉口特别市政府教养所、华中东亚青年联盟等都在这里建立机构。小小的"难民区"成了日伪统治的集中营，人间活地狱。

日寇在"难民区"可谓坏事做尽。他们在"难民区"拉差，凡年轻力壮者统统抓去服劳役。开放烟(鸦片)、赌、娼，毒害中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即封锁"难民区"，挨户搜查。1939 年夏，在淮盐公所里，日伪武汉各界联合会为庆祝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演戏庆祝，被国民党潜伏人员投了一颗手榴弹，闹得日伪方面惊恐不安，在"难民区"开展大搜捕。伪汉口地方法院院长黄炳炎、应城膏盐公司理事长杨辉庭 、伪湖北省财政厅长张若柏、共和党总务部长谢立生等大汉奸被暗杀后，汉奸们人心

惶惶。日寇宪兵队认为作案者必定在"难民区",因此每当汉奸一人被杀,日寇军方和特务立即对"难民区"施行梳篦式的穿堂入室、翻箱倒柜的大搜查,闹得"难民区"鸡犬不宁。日伪特务还在"难民区"搜捕"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妄图扼杀抗日力量。

抗战后期,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军曾多次空袭武汉,在"难民区"投下了许多炸弹和燃烧弹,虽说炸毁了日军几座仓库,给日寇以心理上的压力,但却使成千的"难民"炸死烧死,酿成人间悲剧。1945年抗战胜利后,"难民区"自然撤销。但日寇的滔天罪行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商若冰)

武汉三条文化街

武汉素为华中重镇、文化名城,有三处可称为文化街。一是武昌察院坡、横街头,二是汉口交通路,三是汉口统一街。

武昌文化街源远流长。清末民初称司门口到横街头一段路叫察院坡(一度改称胡林翼路,今称为民主路),新、旧书业在此集中,形成武汉三镇最早的文化街。

1867年(清同治六年)武昌就创设了官书局,光绪初年,一些书商适应科举需要到横街头开始出售经、史、子、集和"闱墨"等类木刻板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邹代均、邹永喧父子在此开设了我国最早的舆地图社——亚新地学社,先后出版过30多种编印准确精美的地图和地理书刊,后在察院坡自建大楼继续营业(今武昌区第一门诊部)。

1920年,革命先烈恽代英在横街头创办了"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发行了《共产党宣言》和《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革命书刊。董必武、陈潭秋与许多革命先辈常到这里看书选书。

横街头的书铺多以收购推销古旧书如湖北官书局的书、前朝失散的书、孤版书和当时的旧书、旧课本,以供选购。有的偶尔买到追踪多年

的古版孤本如获至宝；一些穷学生廉价买到正需的教科书、工具书，也喜不自胜。书馆还兼卖字画，文人雅士或附庸风雅的富商财主，来此观赏和浏览的亦颇不乏人。

抗战以前，武昌公私学校林立，学生众多，图书需求量大增。新书业如商务、中华在察 院坡设武昌分馆、分局，发行课本和辅助参考书；上海兴华书局、上海文化书店、群益社相继设分支机构。鼎盛时期，新、旧书铺多达 32 家。

武汉沦陷时，日寇实行奴化教育，汪伪提倡汉奸文化，这里书业瘫于瘫痪。胜利后，物价飞涨，书业周转不灵，未见起色。

汉口交通路文化市场后来居上。 1925 年，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的上、中段）水塔对面建生成南里，靠歆生路（今江汉路）后侧建生成北里，南里北里之间形成一条街，名为交通路。此前 1922 年就有个体书铺在此出售四书、皇历之类的书。交通路开辟后，书业崛起，到 1935 年已达 6 家。接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相继开设分局分店，商务印书馆在路口对面中山大道一侧建了分馆，大多以发行教科书为主还兼营文具用品，它们或资金雄厚、牌子老或后台硬、销售手段多，几乎垄断了三镇所有学校学生需要的图书、文具市场。另加上文汇仪器公司、龙门书局又占领了实验仪器、测绘仪器和外文、译著书的发行阵地，他们长袖善舞，把销售触角伸到华中各省。抗战前至武汉撤守期间，交通路的书业，除原有的老招牌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左派书店来此开业；许多进步刊物如沈钧儒、李公朴主编的《全民》，邹韬奋、柳湜主编的《抗战》，刘季平主编的《战时教育》；与之相反的右派刊物如陶百川主编的《血路》，也纷纷成立编辑部和发行所。市场繁荣，斗争激烈。

抗战胜利，原有书店大部复员，且有增加，共达 15 家。报刊则有《大刚报》、《武汉时报》、《自由论坛》等 20 多家，占全路铺面 2/3。中共地下党"联营书店"（包括生活、上杂、新知、群益）宣传马列主义，发行的新书中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有苏联版《联共（布）党

史），还有《大众哲学》等，为追求革命的人士提供了购书的阵地，门市拥挤非常。该店实际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站，转运了很多中原突围的同志。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曾先一步在同一条街上举办了"建国书店"（军统）"正中书局"（中统），还来御用的中国文化出版社、独立出版社、胜利出版社，由于他们出版宣传独裁、反共、反人民的书刊，常见读者稀少，门堂冷落。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联营书店的业务，侦察进步人士的活动。

在这条街上还有众多的旧书摊，他们以两边生成里巷口为其营业场所，一个巷口两边两个摊主，中间留条人行道。白天摆书摊，夜间收书做睡床，主要收、销学生的旧课本、参考书，低价进，高价出。古今中外凡有书籍或各旧报刊、禁书不论整套或单本，都在经营之列。不仅学生可以买到廉价课本，不少收藏家还买到宋、元、明、清的古版本，配到不少珍品。作为新书业的补充，他们的贡献是特殊的。摊主中有的人经过长期钻研，成了鉴别版本的专家。

统一街图书业面向农村。清同治年间，人们在汉口江汉交合处半月形堤上建屋，分别形成半边街、土堂街、港屯。1928年，兴建民族、民权、民生路，半边街一带房屋拆除，将这一条街合并称为"统一街"。由于黄陂、孝感农村小调在这里流行，以供应木刻小戏本为主的书铺开始出现。可是统一街图书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却是日寇侵占武汉期间以后的事。

1938年，日寇飞机轰炸，军队溯江进攻，武汉书业大部内迁，中国百民的商业移"难民区"，统一街正处难民区内，除原有的广益书局汉口分局、同文堂书局外，新开的书店和由交通路迁来的书业广文书局、宏文堂、昌文书局和昶昌、恒昌永画片店，均是本地人开设的，称为"本帮"。他们自产自销四书、五经、《三字经》、《皇历》、《百家姓》、楚剧、汉剧、豫剧唱本和木刻的图书。还翻印商务的新国文。"洋帮"则有上海的广益、兴华、东亚、文馀、大新书局和泰昌永画片社，发行自己的出版物，他们控制了上海货源，如发行量巨大的精印彩色年画、灶神；销售"大达图书

供应社"的一折八扣(定价高)的牛皮封面的章回小说,如《江湖奇侠》、《江湘女侠》、《峨嵋剑侠》、《孟丽君再生缘》等皆为抢手货,迫使"本帮"一定程度服从调度。

抗战胜利后,教科书发行量大,商务、中华、世界可以得到政府低价的纸张配给,稳获厚利。统一街的书店则无此条件,可他们很不甘心,于是由广益发起联合7家书店成立"湖北书局",从上海购进纸型,用次等纸张印刷教科书供应农村。他们的批发网,一度撒到湖北全省和湘北、豫南部分农村,年销书画、教科书10多万册、张。

(刘　莉)

火巷与水巷

人们救火有这样的经验,如,救森林大火,在燃烧点周围砍倒一片树林,作为隔离带,以防火势蔓延到更宽的地方去;救街道火灾,也常将着火点与未着火街区之间的房屋拆掉一些,以阻止火势蔓延。这种经验启发人们,能不能在建设街道时候,预先辟出一条条的"隔离带",在万一发生火灾的情形下,不至于延烧整条街道呢?这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城市街道的建设中便出现了火巷这类建筑。

在武昌,火巷的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时武昌最繁盛的地方莫如南市,而南市常发生火灾,使地方官十分头痛。南宋孝宗时,赵善俊被任为鄂州知州,时值南市又发生大火,便急忙赶来上任。为安置灾民,他减免竹木税,发放粮食赈济饥民;为绝后患,他采取了疏通古沟、创设火巷的措施。据说武昌有火巷之名,就是当时所创火巷的遗迹。

汉口城市较晚,火路、火巷的出现也较晚。从《汉口丛谈》所列街道坊巷名称来看,嘉庆、道光年间已有谢家火路、大火路、新火路,还有作为火巷而不以火巷为名的巷子多条。这些火路、火巷多为汉口商人的义举。如,永宁巷,就是扬州府甘泉县(今并入江都县)人李茂所建。《扬州府志》所载李茂墓志铭中云:"李茂,……尝客汉口,人烟稠密,多迫子火

灾。茂赎民舍若干栋，辟巷里许，名永宁，全活甚众。”大兴巷、大亨巷也是清雍正年间汉口商人邬光德购买民房拆为火巷的。今天，汉口仍有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永宁巷等街巷名称，就是当年火路、火巷的遗址。

隔离作用仅是火巷的一种功能，其另一种功能是便于取水救火。具有后一种功能的，还有水巷。旧时汉口居民生活用水主要靠江水、河水，为方便挑水，沿江沿河一带辟有许多水巷，居民和以卖水为生的水工，每天穿梭一般挑着水桶或推着水车来往于水巷之中，弄得那里一年四季湿漉漉。《汉口丛谈》上说：“以卖水者辘轳转运，所过之处，日无干地。”《汉口竹枝词》亦云：“坐空向满一沙滩，士女哄嗔行路难；九达街头多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若遇火灾，灭火所用的水要经过水巷从河边运来，水巷则更显得重要。

（田雨）

汉口“墩子”何其多

打开武汉市区交通图，在汉口地面浏览一周，你可看到西边的易家墩到东边的黄家墩一连串以“墩”为名的地名。据有人统计说，汉口共有65墩。汉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墩子”呢？

“墩”字之义为“土堆”。汉口今长堤街以北，原为一片湖沼地，统称后湖。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露出水面，形成墩台，附近的渔民、农民或外地逃荒来的灾民、难民逐渐迁移到墩子上去居住，天长日久，人口繁衍，便出现了一个个以墩为聚落的自然村。来晚了的人家没有现成的墩子可住，就围垸成墩，自立门户。于是，后湖中有了许多住人的墩子。清朝末年张之洞修筑了后湖长堤以后，溯出了大片湖地，墩子已不再是湖中的小岛，而成为陆上的高地，上墩居住的人更多了，村落的范围扩大，某某墩、某某墩渐渐成了以该墩为中心的那一带地方的统称。

这些墩的名称大致可分三类，从中可看到各个墩最初居民的状况。最多一类为姓氏墩名，如易家墩、陈家墩、韩家墩、崔家墩、江家墩、罗家

墩、查家墩、曾家墩、萧家墩、王家墩、唐家墩、贺家墩、袁家墩、郭家墩、张家墩、金家墩、黄家墩、李家墩、常家墩、谢家墩、蒋 家墩、余氏墩等等，说明这些墩子最早的居民或者是聚族而居，或者是一家独占，这种状况如同张家湾、王家村、李家庄、陈家巷一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第二类以外地地名为墩名，如鄂城墩、天门墩等，说明这些墩子上最早的居民多半是由鄂城或天门逃荒来的灾民，这些墩子如同黄陂街一样，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某些特点。第三类是石桥墩、马池墩等，反映了当地地理上的某些特点，如有座石桥，或有个马池之类的建筑。其他如新墩、妙墩等各有特色，难以一一分类了。

（严锴）

汉口的会馆、公所

会馆和公所是同乡或同行的人们为了互助和自卫而建立的一种松散的社会团体。全国各地有许多这样的组织，它是明清之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产物。而到民国，近代社团兴起以后，它走向衰落。

汉口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出现了"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这些外来商贾，按地域行业结成帮派，如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福建帮、山西陕西帮、徽州帮、药帮、船帮、钱帮等，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便称为会馆或公所。由商人出资建屋，其建筑互竞豪侈，以显示本帮的实力和地位，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曰：

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

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

作者注云："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巨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

叶氏谓"汉口会馆如林"，到底是多少？据1920年《夏口县志》的统

计，汉口各会馆、公所约 200 处，经各会馆、公所联合会（成立于 191[illegible]年）会长江顺成、余士熙的调查，确有建设年代者有 123 所，年代不详者 56 所。这些会馆、公所，推举有会首、会董进行管理，下设庶务、管账、文牍等人员协办日常事务。会馆、公所的传统功能主要有如下 5 个方面：

一、祀神。通过祀神使旅居异乡的游子或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同乡或同行共同祭祀保护神（如江西人信奉的许真君、福建人信奉的妈祖、山西人信奉的关帝等）或祖师（如木匠信奉的鲁班、织工信奉的机神、药材商信奉的药王等），可以增进同乡、同行的感情联系，使大家通达义理，同心协力。了解祀神是会馆、公所的一项重要功能，就可明白许多会馆、公所何以直接以神殿名称来命名，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山陕会馆称关帝庙，船帮公所设在[illegible]来庵，鹺商公所设在大王庙，豫章公所以九华庵为办公和集会之所。

二、义举。旅居他乡的游子，最怕孤单伶仃，生老病死无人相助。[illegible]考会馆、公所之建立，往往先从暂厝、归葬等慈善事业发起，故互相扶助是会馆、公所的又一重要功能。如宝庆会馆的日常活动中就有济助同乡、安葬死者、开办学校等事宜。许多会馆、公所都重视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子弟，故一些会馆、公所以书院命名，如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钟台书院即咸宁会馆、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凌霄书院即粮行公所、三才书院即命理公所（算命者的组织）、琴溪书院即川邑正记船帮公所。

三、公约。会馆、公所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共同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其成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公所所议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关于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和守望相助一类的规定。而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则是会议同业规则的场所。所订规章制度以勒碑的形式公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在武汉这类碑刻保存不多，更缺乏人去搜集整理，公诸于世。据说江西会馆万寿宫（故址在今市七中处）仅有半截这样的石碑存留。怀庆会馆所建的药王庙还残存有两块购地契约碑。

四、自卫。会馆、公所在同乡、同行遇到外来的压迫、攻击时则会发

挥团结自卫的作用。如湖南宝庆帮最初所建的宝庆码头被徽帮占据以后，宝庆会馆就纠合本帮船民，与徽帮械斗，夺回地盘，而且加以扩大。

五、合乐。会馆、公所还具有娱乐功能。岁时伏腊，演剧酬神，同乡叙桑梓之情，同行联樽酒之欢。所以一些会馆、公所建有戏台、看楼，留有大片空地作为游乐场所。皮业公所后来竟能改为长江大戏院，盖因为它原先就有这样的功能。有的会馆、公所按园林风格建筑，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息的场所。陶云汀为长沙会馆所撰楹联就是这种情景的反映：

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墙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

共明月千里兮，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严昌洪）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这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流传在武汉一带的谚语。所谓好过渡者，似指渡口多、渡船捷、渡资廉。

渡口多，是因为长江和汉水把武昌、汉阳、汉口分隔开来，三镇间的交通在古代只能靠渡船。渡船多了，各占码头，渡口自然就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增长，渡口也在不断增多。据范锴《汉口丛谈》所引《汉阳县志》资料，汉口在明清之际有六个渡口：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接驾嘴、四官殿。在郊外则有郭师口、平塘渡、聚店渡，这些都是那时汉口渡河过府城汉阳之路。到了道光年间，按范锴的说法：“今则处处有渡，‘招招舟子，邱须我友’矣。”民国年间渡口相对固定，龙王庙、打扣巷、大水巷、鲍家巷、集稼嘴、泉隆巷、武圣庙、大王庙、硚口等处都是过汉阳的划子码头。武昌过江的渡口也不少，而以平湖门和汉阳门最为重要，一般往汉阳者在平湖门唤渡，往汉口者在汉阳门唤渡，这是明万历年间以来的习惯。汉阳过河的渡口与汉口略同，过江的渡口则在晴川阁、东门、鹦鹉洲等处。

武汉过渡的船以木划子为多，明清时代称为“双飞燕”。《清稗类钞》

引康熙年间刘继庄《广阳杂记》记载："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捷而稳。"陈诗《湖北旧闻录》著录朝纯玉《汉阳渡口》诗一首，中有句云："汉阳窥鄂渚，夹岸走长虹。小艇双飞燕，中流五雨风。"正是由于双飞燕这种"捷而稳"的优点，小木划子成了旧武汉的主要渡河工具。每只划子可坐 6 人，渡江的划子只准坐 5 人。载人少，在渡口等齐人的时间则相应短，开渡快。但这种小木划子亦有缺点，风浪大时则不安全，只得停渡。这时，官府和慈善机构（善堂之类）所设置的义渡就可发挥作用了。义渡是一种大木船，配置船工较多，可在较大的风浪中行驶。义渡的设置缓解了行人因木划停渡而阻滞两岸的困难，实是一大善举。长江上因江面宽，江流急，风浪大，少以木划渡江。1574 年（明万历二年），左布政使陈瑞在长江置"巨舰"8 只，由江夏县（今武昌）岁补水手 12 名，招募船家领班，在江上摆渡。这是从前官渡之始。清光绪年间，仍有这种官渡，可坐 50 人。这种大船备有帆，遇风可借风行船。如遇逆风而张帆，谓之"走戗"，有"一戗输一戗赢"之说。

关于渡资，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民初以前，武汉三镇居民过渡都是乘坐不收取力资的几只"义渡划子"。这实是一种误解。武汉的这种"义渡"，如前所述，不是平时摆渡的小划子。《夏口县志》上是这样说的："当水流汹涌之时，子关圣祠、五显庙、接驾嘴、打扣巷四处各设义渡二只，以渡行人。"平时摆渡的木划子是收费的，前引刘氏《广阳杂记》中还记云："汉阳渡船……且取值甚廉，一人不过制钱二文，值钱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仅数文。"这是康熙年间渡资。直到光绪年间，仍是 2 文，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记曰："光绪辛卯，予初入鄂，其时渡江附官渡者，每人给钱二文，满五十人足陌（百）而开渡。划船亦略同。"200 年来，不论官渡、私渡，不论大船、小划，渡资总是维持在 2 文的水平，真是够便宜了。

难怪人们要说：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严昌洪）

清代汉阳两相国

清代汉阳出了两位大学士，即康熙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和咸丰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大学士这种官衔，唐代始置。明朝中叶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清朝原来也是以大学士为内阁主官，相当于宰辅。军机处设立后，大学士的职权被军机大臣取代。但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之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被称为相国。大学士为满汉各二人，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殿和文渊阁、体仁阁、东阁三阁之名入衔。汉阳出了这两位相国，在当时来说，也是汉阳人的荣耀。然而，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品性不同，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两人的遭际甚至迥异。

注意平政刑的吴正治

吴正治(1618—1691)字当世，号赓庵，祖籍江南。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累迁至右庶子，授江西南昌道。他工作认真，体恤民情。上任不久即到年关，政府官员们都按惯例放假了，他却单人匹马巡察 各县监狱，查出非法拘押系狱者多人，全部释放。此举赢得民心，史称其"在任旬月，剧盗尽平"。后迁陕西按察使，所到之处以清廉著称。下车伊始，他即调阅旧案，偶得一纸，上列某犯罪名皆为国法所不容，但并未得到惩处。他想这一定是地方大恶霸，以行贿得以延搁。通过明查暗访，果然证实了他的想法，上报朝廷审理，将该犯斩首，为地方除了一害，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乘势把积案处理一空。

吴正治在任刑部侍郎期间，江南诸生欠赋者200多人被逮下狱，尽拟监候，他认为这些人赋已补完，无他罪待勘，继续关押不妥，提议释放。但当时惯例，汉官不得启奏，他便请满侍郎上疏，说："如果受到责罚，罪当坐我。"疏入得准，诸 人得以放遣。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

议，如，奉行敕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状外指扳宜禁、私嫁条例宜酌等等，皆切中时政。特别是建议停止满人圈地强夺民田，被清廷采纳，终于停止圈占土地，停建营房，缓和了满汉矛盾。在任兵部督捕侍郎时，旗下逃人之禁正严。吴正治利用法律有亲属容隐之条，提出遇父子窝逃被人举发，逃犯可照常治罪，而窝留者免坐，并鼓励家长携逃人首报（投案），逃犯按自首例减罪。他还针对猾者利用逃人立法肆毒乡里，一经妄扳，里井骚动的情形，率同官合词陈请，废除连坐十家之例。

1681年（康熙二十年）授吴正治武英殿大学士。他为人正直，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敢直言。有一天，康熙帝翻阅朝审册，看见有一犯人以刀刺人股致死抵法，便说道："刺股非致命伤，可从宽处理。"吴正治反驳道："当念死者无辜。"康熙帝连忙改口说："不是想赦免他，可缓决几天。"过了几天，康熙帝又阅朝审册，看见一囚犯判了死刑，就问道："此囚尚可活不？"众大臣皆以情况属实，该当死刑来回答皇帝。只有吴正治奏曰："皇上一念好生，臣等敢不奉行德意。"退朝后立即详细地重勘案情，果然发现可以宽免的理由，于是该囚得以减刑免死。

吴正治后来以原职退休。74岁时逝于江宁（今南京），后与夫人张氏合葬于汉阳南乡小荟之原。

迷信误国的叶名琛

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并拜体仁阁大学士。围绕他的拜相，有种种迷信传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叶名琛拜相与风水有关。当时人们都认为湖北全省风水系于黄州城外之青云塔上。道光季年，青云塔倒塌，乡中风水先生到北京，游说鄂籍京官修复此塔，并谓此塔果复，鄂中当出封拜之人。当时沔阳陆建瀛和叶名琛均在翰林院中，陆建瀛负馆阁重望，同僚认为他入阁乃意中事，但颇不信五等封秩之说。而在京官中，以陆、叶二人主张修复青云塔最力。不久该塔重修告成，不数年，陆建瀛荐膺两江总督，

叶名琛旋又由司道升两广总督，以剿"匪"功并力阻洋人入城功，授体仁阁大学士，赐封一等男爵。前此封拜之说应验于叶名琛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阁衔，体仁阁最不吉利，嘉道以后尤甚。有一本书曾历举体仁阁大学士，大多非获咎即遇祸，或不久即捐馆。张之洞拜相未及3年便告终；叶名琛亦此中之一人，故无好下场。

在迷信盛行的旧中国，有这些传说并不奇怪，就是叶名琛本人，也是封建迷信和腐败政治的牺牲品。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宜。他夜郎自大，盲目拒外，声称要"雪大耻，尊国体"，"凡遇中外交涉事，……每接文书，辄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英国侵略者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获悉3艘英舰驶入珠江攻占猎德炮台的警报，竟笑曰："没有事，太阳下山，他们自己会走的。"并下令珠江水师偃旗息鼓，勿向英人放炮还击。对于英军的挑衅，他既不谈判，又不力战，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57年(咸丰七年)12月，英法联军攻入珠江白鹅潭，向叶名琛发出了要求入城和赔款的照会，叶虽复照拒绝，但又不与广州将军、广东巡抚等官员计议战守之策。他一生迷信吕洞宾，家中还设有乩坛，此时他扶乩更勤，一切军政大事均取决于对乩语的解释。僚属见形势危急，请下令调兵设防和召集团练，他均不许，却按乩语上说的宽慰众人："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讵料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联军便大规模炮击广州城，叶名琛见乩语不灵，知在劫难逃，就逃匿起来。第二天广州沦陷，侵略军大肆抢掠、搜索。几天以后，侵略军终于在左都统署花园的八角亭里将叶名琛搜出，抬到城外英舰上。他的随从曾暗示他应投水自尽殉国，但他佯装不懂。他被英人挟持到香港，每天应英人之请写字作画，随从劝他勿署姓名，乃题"海上苏武"四字。后来被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在镇海楼上，还日诵《吕祖经》，不废吟咏。1859年4月病死，英人将其遗体和诗作运来广州归还中国。读了他的诗后，人们深憾其玩敌误国，为其下评语曰：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所有。

下面据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载《庸盦全集续编》卷下)录叶名琛诗作两首,以见其被囚海外时之心境: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观。
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严昌洪)

张之洞生活琐闻

清代官场中人,爱玩古物成风,湖广总督张之洞尤酷嗜此道,自命精于古物的鉴别。由于当年古玩的行情好,利润巨大,仿古的赝品也应运而生,而且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有一年,张之洞在京以高价购得一古鼎,斑烂璀璨,价值连城,张极为得意。回鄂时大张筵席,请僚属共同欣赏。置鼎于案,插梅花一枝于鼎中,注水少许以润花。不意酒过三巡,鼎下竟有水徐徐流出,满堂惊愕而大为扫兴。经仔细检查始知鼎非古铜所制,而为纸板仿制。张始 知为古董商所骗。此事一时被传为笑柄。

张之洞饮食起居与常人有所不同。他每天下午 2 时始入睡,至晚 10 时乃起治事。幕府中人及僚属,有事请谒皆在深夜,甚至候至天明始获传见。总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上 10 时以后。与张之洞商洽公务,往往谈至翌晨出署。有时会客谈话未已,张之洞忽然闭目假寐,甚至沉鼾,置客不理。客人不好惊动,只可退出。为此,大理寺卿徐致祥还参劾他辜恩负职,奏疏中说:"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李瀚章查

明具奏。李瀚章复奏回护，措辞极妙，说："誉之者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轻描淡写地就给他掩饰了过去。

在饮食方面，张之洞最嗜食鲜果及糕点蜜饯等物，其办公桌旁设有小几，上置各种鲜果、糕饵十余盘，以备随时取食。每日正餐亦必设水果数盘及中外佳酿若干种，先以果类佐酒，饮毕而后进餐。踏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

张之洞还喜爱养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而且还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由此可见他对猫的偏爱与宽容。

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全国朝野送挽章者甚多。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

死者长已矣，云门石甫同怅望；

魂兮归来乎，朝云暮雨各凄其。

此联中之云门、石甫，皆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即樊增祥、易顺鼎之号。联文寓讥诮二氏之意。朝云、暮雨据传是张的两妾之名。

张之洞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早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重，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人们谈及此事时说：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隅云云。

（喻枝英）

"丫姑爷"张彪

张彪（1861—1927）是清末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后又提升为湖北提督。此人出身行伍，并无文韬武略，为什么会成为湖北新军的最高长官呢？这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搞裙带风有很大的关系。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他即追随左右，充当内跟班。他颇知阿谀奉迎，深得张之洞的宠信，被从戈什哈（满语，简称"戈什"，为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拔擢出来，历任巡捕、巡防哨官、副将等职。为了笼络他，张之洞将府上的婢女嫁其为妻，张彪于是有了"丫姑爷"的绰号。

此人目不识丁，绝无知识，只知取宠上司，故他所重用的人也是工于媚术者。张彪所辖两协统（相当于今日旅长），一绰号王草包，一绰号刘粉头，仅以此二人便可知张彪军队的素质。他仗着自己是张之洞的丫姑爷，有恃无恐，贪婪成性，侵吞各类军需款项，包括军衣费、军鞋费、医药费、柴草费等百余万两。遇有生日嫁娶，必令各营送礼，编为福、禄、寿三号，福字 8 两，禄字 4 两，寿字 2 两。有的军官三字全送，即使下级军官至少必送一字，均由军饷中扣除。张彪广有产业，在大东门外、保安门外、李家桥、文昌门内等处均有房地产。

张彪的倒行逆施，造成军纪混乱，军心动摇，引起士兵不满。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军中发生鼓噪，士兵们围攻张彪，将其殴辱，并且杀了他心爱的坐骑，"全城汹涌，几酿大变"。

作为湖北新军的主要头目，他充当了清廷镇压群众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活动的急先锋。汉口摊贩反巡警压迫的暴动，汉口人力车夫反英军暴行的示威，都曾遭到张彪亲率营兵弹压。

张彪的种种劣迹，终于遭到进步舆论的抨击，或作文揭露，或绘画嘲讽。1909 年（宣统元年）新春，《湖北日报》刊载两幅政治漫画，一幅《石龙》讽刺鄂督陈夔龙，另一幅《怪物图》，画的是一个石洞，一兽蹲伏洞内，额上有王字纹，颈腹都作黑色。题词为："似虎非虎，似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因牝而合，与獐同巢；恃洞护身，为国之妖。"很明显这是讽刺张彪的，不仅有其名（彪），而且还寓有其事，"因牝而合"，指丫姑爷事，"与獐同巢"，"恃洞护身"，指他得到张之洞的卵翼。后来创刊的《政学日报》亦刊载漫画讽刺张彪。这些进步报纸均遭到当局的封禁。

最有趣的是晚清作家李伯元在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以张之

洞与张彪的这种丑恶关系为素材，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该书第38回《丫姑爷乘龙充快婿，知客僧拉马认干娘》写道：湖广总督湍多欢的九姨太房里有个大丫头宝珠，虽与湍制台两厢有情，但无法收为妾。制台为赎前愆，就认她为干女儿，将她嫁给署理督标右营游击的戴世昌。"宝小姐"欢喜人家称呼她"姑奶奶"，以为这样才合她制台干小姐的身份。制台的十二姨太不买账，说她不过是个"丫小姐"。戴世昌做了总督"东床"后，很快升了官，许多文武官员都来巴结他。他趾高气扬，瞧不起同寅，同寅便讽刺他为"丫姑爷"。戴世昌夫妇厚颜无耻，竟利用制台干亲的这种地位，牵线搭桥，营私舞弊，收受了投机钻营者成千上万的贿赂。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彪先是负隅顽抗，后来偷渡汉阳，逃往汉口刘家庙，最终成为鄂督瑞澂的替罪羊，被清廷解除兵权，出走日本。

南北议和后，张彪在天津日租界作寓公，修建了一栋宽敞豪华的住宅——张园。1925年清 废帝溥仪由北平(今北京)逃到天津，张彪让出张园，给溥仪居住，并亲为打扫清洁，表示忠心。

（严昌洪）

梁鼎芬驱逐章太炎

张之洞督鄂期间，梁鼎芬是张之洞幕府中的重要成员，颇受张之洞的赏识。历任两湖书院山长、武昌府知府、湖北学务处总提调，在推行新学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梁鼎芬不仅是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而且对满清王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但对戊戌变法却首鼠两端。1895年8月(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由康有为联络、帝党赞助，维新派重要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时，梁鼎芬秉承张之洞的旨意，积极支持，由张之洞捐金5千列名强学会，11月又列名上海强学会。次年，北京强学会遭查禁后，张之洞为了讨好清廷，一反常态，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曾经参与起草章程、并担任上海强学会发起人的梁鼎芬这时也积极支持张之洞查封上海强学会。

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张之洞为了向清廷效忠，为了表示他与维新派观点的不同，还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于是在纺纱局创办《楚学报》（按：实为《正学报》，刘记有误），以梁鼎芬为总办，以王仁俊为坐办，主笔则是大名鼎鼎的大学问家章太炎。章太炎是俞樾的高足弟子，著有《春秋左传读》一书。张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请章太炎为该报主笔。但周围的人时有议论，说今后梁鼎芬与章太炎必至用武，因为梁鼎芬与章太炎的政见不同。

果然不出所料，该报第一期出版，章太炎撰文，洋洋6万言，大都是排满言论。梁鼎芬阅后大怒，连声说道：反叛反叛，杀头杀头。并急忙乘轿到总督衙门，请求捉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制罪。朱克柔、邵仲威听说此事后，急忙跑去找王仁俊商量，说："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是个疯子，逐之可也。"坐办王仁俊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急忙上院，见梁鼎芬正要求张之洞拿办章太炎，王仁俊急忙将他的看法一一道来，并说："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张之洞也觉得只好这么办，于是吩咐梁鼎芬速去照办。梁鼎芬气势汹汹，怒无可泄，急忙回去命章太炎立刻离开报馆，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并命轿夫四人，将章太炎按倒在地，以短轿棍杖打章太炎的屁股。打后，蜂拥逐之，将他赶出报馆。章太炎被逐后，身外无物，朱克柔、邵仲威乃为他购置衣服和棉被，并买船票将他送回上海。这就是章太炎作为一个革命党，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在张之洞幕府中与梁鼎芬共事的一段经历及最后被杖逐的结局。事后，如若章太炎为某个问题与别人争执不休时，有人就戏言道"叫梁鼎芬来"，章太炎乃微笑以对。

历史学家汤志钧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一书中，不仅指出刘成禺书中《楚学报》系《正学报》之误，而且评论说刘所记梁鼎芬杖打章太炎的情节夸张失实。梁、章是有矛盾的，梁逐章也是事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又是这样记述此事的：梁鼎芬一天对章太炎说："闻康祖诒（即康有为）欲作皇帝，你听到没有？"章答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

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惊失色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并怫然不悦。梁鼎芬向张之洞报告了这一情况，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之洞乃馈章以仪程5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

（喻岐英）

从“武昌县开国子”到“鄂王”
——岳飞与武汉

在蛇山中部山顶上，有一座岳武穆遗像亭，它是为纪念南宋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而建立的。早先，在武昌城东，还有岳飞庙，始建于1170年（宋乾道六年），当时匾额称“忠烈庙”，而后来武昌的群众习惯称为“岳王庙”，那是因为宋宁宗为激励诸将，曾于1204年（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武汉人民800年来一直怀念岳飞，除了出于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外，还由于岳飞与武汉有着特殊的关系。

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国向中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北宋政权灭亡了，新建的南宋政权在投降派秦桧等人把持下，避敌南逃，金军乘势大举南下。岳飞满怀爱国热情，投入了抗金的行列。

岳家军军纪严明，英勇善战，收复了大片失地。1134年（绍兴四年）岳家军打到湖北，收复了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等地，岳飞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驻军鄂州（今武昌），旋又晋封“武昌县开国子”（一种封爵称号）。岳飞在鄂州紧张地进行北伐的准备，偶得半日闲暇，登上了黄鹤楼，遥望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满怀悲壮地写下了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而在这之前，他曾在别的地方也写过一首《满江红》，那就是传诵千古的“怒发冲冠”名篇。有些书上说岳飞在鄂州写的就是后面这首《满江红》，可能是由于词牌相同而生的误会。《登黄鹤楼有感》全文如下：

遥望中原，苍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寿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声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次年，岳飞改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封"武昌郡开国侯"。

1140年，岳家军从鄂州出发，大举北伐，一直打到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宋高宗出于对大将的猜忌之心，秦桧害怕抗金的胜利破坏了他的议和计划，削弱了自己的权势，他们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从前方撤下来，然后罗织罪名，于次年十二月将岳飞杀害于杭州狱中。

岳飞的军队"将和士锐，人怀忠孝"，"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深得鄂州人民的爱戴。岳飞死后，即使在南宋王朝的高压政策下，鄂州人民十家之中有九家都把岳飞的绘像挂在家中，晨昏奉祀。岳飞身先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一钱不私藏"，岳飞旧部一直怀念他，为他的冤死鸣不平。1161年夏，御史中丞汪澈到鄂州岳飞旧部巡视，校官们向汪澈申诉岳飞之冤，当汪表示愿向朝廷报告时，官兵们哭声如雷，纷纷表示要"为岳公争气"！

1162年宋高宗禅位，孝宗即位，立即平反岳飞冤案，追复原官，发还财产。后又在鄂州为其立忠烈庙，直至赐谥武穆。宁宗时又追封鄂王。岳飞"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却永远活在武汉人民心中。

（严昌洪）

从学徒到兵部侍郎

历任清朝礼、工、户、刑、兵部侍郎的袁希祖（1809—1861），字荀陔，号寄生。祖辈世居浙江上虞。其父在汉口经商，故附籍汉阳。8岁时父

亲去世。母亲倪氏一面抚摩着他的头发，一面哭着说："孩子，我们孤儿寡母，家徒四壁，没有钱送你去上学。但我不愿荒废你的学业，让我给别人做针线活来供你自学读书吧。"谁知家里越来越穷，竟无以为生，不得已，母亲又对儿子说："我们已无法维持生活了，你不如改业去学经商吧。"于是袁希祖找到一家商店，做起学徒来。

在商店里，袁希祖白天侍等算账，晚上继续温习功课。跟他一起干活的伙计们看不惯他，常常到老板那里打小报告，结果袁希祖受到训斥。颇有骨气的袁希祖跑回家来，哭着向母亲说："孩儿不愿做商贾，我的志愿仍然是读书养母。"当时他才 16 岁。

袁希祖回家后，日夜淬厉于学习，发愤读书，对于科举考试的那一套越来越精通。参加童生试，被考官拔置第一名，得补弟子员。汉阳府夏太守早闻其名，便召他入衙署中办事。1837 年(道光十七年)中举人，10 年后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国史馆纂修。参加大考(一种翰林、詹事的升职考试)，获二等四名，升转为侍讲，后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1859 年(咸丰九年)出任福建正考官。除吏部以外，历任礼、工、户、刑、兵各部侍郎，足见其多面才干。

袁希祖为官恭谨，但遇权贵弄柄，威福自擅，又不肯折节下之。1860 年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北京时，曾三次上疏力主议和，以保全社稷。后北京陷落，咸丰帝逃到热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握朝廷实权。袁希祖不满意他们的作为，上奏将他们斥为弄权误国的奸臣秦桧、严嵩，言辞之激烈，见者为之悚惕。疏入留中，竟安然无事。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正蓄谋排斥这些顾命大臣，次年终于发生辛酉政变，载垣、端华、肃顺等失败身死，追随他们的人一个个都被清洗。袁希祖因曾上疏弹劾肃顺等人，并未受到冲击。当年 12 月，旧疾发作，溘然去世。

(严肃)

学台充刑台，冤狱难平反
——黄陂胡瑞澜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凡看过以《杨乃武与小白菜》为名的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的人，对案情已知大概，兹不赘述。这个案子翻过来以后，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夺职者有16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又10余人。这里所说被革职的学政，就是黄陂县武湖沙口楼子墩人胡瑞澜，时任浙江学政。《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将其名书为胡瑞兰，称其系江夏（今武汉市武昌）人，均误。

胡瑞澜（1818—1886），字观甫，号筱泉。道光进士，官至礼部、兵部、吏部侍郎，曾多次外放学政。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生在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初由余杭知县刘锡彤审问，再解送杭州府，由知府陈鲁刑讯定案，以因奸谋夫罪判小白菜葛毕氏凌迟，杨乃武斩立决。杨乃武姐杨淑英、妻杨詹氏先向浙江按察司，后向北京都察院申诉，均坚持原判。

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明“浙江复讯重案，意存瞻徇，请派大员查办”。清廷下令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集此案人证，秉公严讯，务期究出实情，以成信谳”。并警告说：“倘学政见好同官，代为回护，仍照原题含混结案，别经发觉，定惟胡瑞澜是问。”胡瑞澜奉旨，诚惶诚恐，因案情事关重大，曾奏请另简大员会审，未获批准。胡瑞澜只好督率委员提犯亲讯，经过“连日熬审”，维持浙省原判，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企图就此结案，以保全浙江省各级官员。慈禧太后照例将奏折发交刑部核议。胡瑞澜的复审，遭到许多人的不满，给事中边宝泉弹劾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要求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究，但遭到清廷拒绝。

1876年，在浙籍京官、都察院和监察御史王昕等的强烈要求下，慈禧太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得不承认胡瑞澜复讯未协，谕将该案解交刑部办理。刑部开棺验尸，证实小白菜之夫葛品连“委系无毒，因病身

死”。由于翁同龢的促成，清廷终于为杨乃武平反昭雪，而浙江省参与审理过此案的官员均受到惩处，余杭知县刘锡彤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浙江巡抚杨昌濬和胡瑞澜等均被革职。上谕对胡瑞澜的处分结论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

对于胡瑞澜这种态度和举措的原因，人们作了不同的评论，有的说杨昌濬向他威逼利诱，刘锡彤向他重金行贿，有的说他在两湖派和江浙派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违心地站到了两湖派一边，因为他是湖北人；还有的说他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诉，学台充刑台，冤狱难平反。

胡瑞澜革职后回乡种田兴菜，过隐居生活。后经翁同　保奏，于1883年复起用，以四品京堂任太仆寺卿，后又放广东学政。

（严肃）

“天国”故实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席卷湖北，太平军三克武昌，四占汉阳、汉口，在武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九女墩

在东湖风景区，从梨园附近的渔光村向北走约1里左右，有一座小山岗。岗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石纪念碑，碑的正面上部“九女墩”三个大字赫然醒目，下部镌刻有董必武撰写的《九女墩记》。其他三面刻有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难先等人的题词或题诗。碑后一座半圆形的坟墓，即为太平军9位女战士的埋骨处。据说1855年（清咸丰五年）太平军再度攻占武昌城时，有9位妇女参加了起义军。翌年，武昌失陷，这9名女战士在清军的围剿追堵中，英勇战斗，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在东湖岸边。当地乡民将她们合葬在小山岗上，为避免清军的摧残，不以坟名，而称之为“墩”。

“郭中巾帼九英雄，壮烈牺牲后世风。”解放后，人民政府出资培修了陵墓，建立了纪念碑，让后人永远纪念这9位无名女英雄。

江、汉浮桥

太平军在攻占武、汉三镇期间，曾在长江和汉水上架设了一组浮桥，使天堑变为通途。

1852年12月，太平军分水陆两路由湖南直逼武汉，水路大军于22日攻下汉阳，陆路亦进抵武昌城外。为迅速攻占武昌，太平军决定架设浮桥，夹江为营，加强攻城力量。24日由太平军典水匠唐正才设计，集中艨艟大舰，用铁锚固定，排列江中，以鹦鹉洲之木条，汉阳城之板障铺设其上，一夜之间架起浮桥两座。一座由汉阳鹦鹉洲至武昌白沙洲，一座由汉阳南岸嘴至武昌大堤口，“直贯武昌城下，人马往来，履如坦途”。29日太平军攻占汉口后，又在汉水上架起一座浮桥，位置相当于今汉水铁桥处。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下了武昌城，16日，在汉阳晴川阁至武昌汉阳门，大致相当于今长江大桥处，又架浮桥一座，天王洪秀全经此桥人省城，驻抚署，改大厅为天朝殿。这长江上的第三座浮桥还方便了民间商贸，民人往来。四座浮桥将三镇连为一体，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起义农民的胆识和智慧。

“双料举人”与“状元游街”

1854年8—9月间，天王洪秀全命安徽、湖北两省举行乡试，开科取士，以解决人才奇缺的问题。湖北乡试正掌考官为翼试状元杨启福，副掌考官为翼试榜眼张友勋。其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帖，惟题目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而以太平天国官书为命题范围和答案依据。试文首题为《真神独一皇上帝》，次题为《皇上帝乃真皇帝》，试题为《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待何为？》全省各地赴武昌应试者近千人，取中约800人为举人，其中以兴国州（今阳新县）人为多。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中试者赴太平天国地方官府报名，择优

给以资斧之助，用舟车送往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参加会试。太天军西征失败后，曾国藩、胡林翼把这些人称为“伪举人”，大肆捕杀，抄戮之惨，以兴国为最。

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太平军占领武昌，开科取士，东王杨秀清任主考。全榜中者600余人，仅兴国州中375人，状元刘某亦兴国州人。状元之文称“三皇不足为皇，五帝不足为帝，惟我皇帝，乃真皇帝”，东王大加赏识。用黄缎写榜，榜仍贴司门口照墙上，名多榜长，用黄缎两匹，绕贴内外照墙三匝。并在阅马厂搭高台，集600余名新贵于台下，天王点名，东王自为传胪唱名，礼毕，行状元游街仪式。查天王、东王俱在，当是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时，但当时太平军在武昌停留时间仅20余天，根本来不及举行科考，而且太平军势力尚未到达鄂东，兴国州不可能有那么多初通文墨的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考试。刘成禺所记，盖系上述乡试之误传，状元云云，盖系解元之误。

也是刘成禺所记，黄冈人刘鹏，年少能文章，但历次科试均名落孙山，太平军在武昌开科取士时，他却中了举人，时人称为“伪举人”。后来张之洞于光绪年间设两湖书院，刘鹏已年近七旬，仍入选为肄业生。第二年中举，人们又称他为“真伪双料举人”。

清王朝祭台上的牺牲

太平军前后在湖北地区活动了几年，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死于是役者竟有五六人之多：有的死于战场或自尽殉清，被谥为“文节”公；有的贪生怕死当了逃兵，被斩首示众。总之，都成了清王朝祭台上的牺牲品。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城时，湖北巡抚常大淳负隅顽抗，走投无路，投井自杀。

1854年太平军西征军到达湖北时，湖广总督吴文镕因与湖北巡抚崇伦有矛盾而互相推诿牵掣，结果吴文镕死于前线，崇伦也未落得好下场。关于他们的龃龉，有两个颇有意思的朱批谕旨值得一提。崇伦任巡

抚时间较长，满以为鄂督张亮基被罢后自己会提升，谁知朝廷派来了吴文镕取而代之。吴上任后，简军实，明赏罚，总揽镇压起义军事宜。崇伦不能有所作为，耿耿于怀。太平军攻打田家镇时，崇伦想率兵出御，实欲与吴分权。两人会奏上去，奉朱批曰："汝等皆欲出城耶？"结果崇伦未能成行。等到太平军进逼武昌，崇伦又想藉出兵以逃跑，被吴文镕阻止，崇伦更加怀恨在心。吴奏报守城情形，奉朱批又曰："汝等竟皆不出城耶？"崇伦从中窥知朝廷对吴已有看法，便落井下石，秘密上疏弹劾，谓吴拥兵自守，自己欲有所作为而苦于无权无兵。朝廷得疏，愈益震怒，数下谕旨指责吴拥兵玩敌。吴不得已率孤军出城，屯黄州堵城。2月12日正值农历元宵节，太平军攻其不备，放火烧营，清军大溃，吴文镕投水塘死。崇伦心怀叵测，竟以总督失踪奏闻，后署总督台涌到任，才得实情奏报朝廷，吴最终得到朝廷以战死优恤，谥"文节"的报赏。

武昌危急之时，崇伦谋脱身走避，一会儿以丁忧乞归，一会儿又以病乞罢，搞得朝廷大怒，将其革职。太平军再占武昌时，他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受到曾国藩弹劾，将被逮治罪，乃服毒自尽，以病故上闻。清廷后来鉴于督抚同城的种种弊端，于光绪末年取消了这种制度，同城巡抚被裁撤，湖北在1904年以后就没有巡抚了。

在崇伦丁忧之时接任巡抚之职的青麐并不比崇伦勇敢。在太平军攻城时，他出武胜门督战。城中忽然火起，潜伏在城中的太平军内应，清军尽溃，武昌失守。青麐想自杀，但被部下簇拥着逃到长沙，折赴荆州。1854年8月8日朝廷以"弃城而逃"，"越境偷生"的罪名将其正法。

1855年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城时，巡抚陶恩培投紫阳湖死。后亦被清廷谥为"文节"公。

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军抵武昌，巡抚胡林翼由太湖率部返救武昌。其派遣助攻安庆的主力遭到惨败，急得他在武昌吐血而死。

一个行省有这么多封疆大吏死于镇压农民起义军之役，在清王朝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足见太平军在湖北的军事活动给了清王朝反动统治以多么沉重的打击。

（严昌洪）

首义"三武"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由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又都是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辛亥革命前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将"三武"汇集在一起，他们一起组织革命团体，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他们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队伍内部随之出现分化，曾一起并肩战斗的辛亥"三武"也开始互相倾轧，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至被革命的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悲剧。

首义"三武"的矛盾与纠葛，主要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的权力分配问题，一是对待黎元洪的态度问题。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地区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在着门户之见。随着起义时机的成熟，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革命党人提出了两团体联合建议。围绕着这一联合问题，孙武和蒋翊武之间出现了"二武"争雄的局面。

合作的建议最初由共进会提出。当孙武派陈孝芬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说道："合作固然好，将来我们一定要上他们的当。他们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处。"但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在1911年5月1日举行第一次商谈联合的会议。在会上，双方的谈话并不令人愉快。蒋翊武说："现在文学社在军营中发展力量很大，我们合作后，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是可以成为主体的。"孙武听罢也不肯认输，立即回答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都有联系，……据初步统计，人数超过文学社，我们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会议未获任何结果。6月14日举行了第

二次会谈。会上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后，在湖北领导人选的问题上也作出了具体安排，议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议处理。后来，李春萱在《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对这一局面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样划分，职权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它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伤痕再添新疤。

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人物，两者一拍即合。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

孙武和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后来伙同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隐与同盟会相抗衡。

孙武由于个人的权势欲没有得到满足逐步发展到分裂革命队伍，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新作了几天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这样，一个以推翻孙武为直接目的的行动在酝酿着。

1912年2月27日晚，以共进会会员黄申芗牵头，以文学社成员为主体的倒孙运动发生了。他们佩戴"群英会"徽章，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的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威。孙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汉口。群英会事件后，孙武被迫去职。后来，他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在首义"三武"中，张振武和蒋翊武的结局都不如孙武。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蒋翊武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

后来，有人对"三武"作了一个结合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这也算是对首义"三武"的一个总体评价吧。

（喻枝英）

湖北"三怪"

"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号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于以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这是张难先所撰《石蘅青先生言论集序》对"三怪"一词的解释。然而，时人既然称他们为"怪"，一定有其"怪"处。读了下面的轶事，其"怪"自有注脚。

廉介刚毅的石瑛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冯自由说他是"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石瑛24岁中举，本已踏上仕途，但他为求富国强兵之术，情愿背井离乡，负笈西渡，到欧洲留学。在法国海军学校学习时，因学校歧视中国学生，不许听潜艇、水雷课，石瑛与同学向国华不安于这种待遇，竟潜入资料室取走挂图跑到比京一家照像馆翻拍，被法国当局发现驱逐出境。后两度去英国学习，先后获"超等成绩"文凭和博士学位。其留学时间之长也是少有的，先后两次留学比、法、英达18年之久，1922年回国，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已是44岁的中年人了。其后，任北伐军上海高昌庙兵工厂厂长、武昌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湖北、浙江建设厅长，展其所学，皆有特殊建树。

1932—1935年，石瑛出任南京市长，在这个冠盖如云，权势压顶的首都，甫上任就在报上登出《石瑛启事》，宣称拒绝推荐私人。由于石早以刚毅正直、资格老、不畏权势著称，蒋介石说项碰壁，也一笑置之。整顿市政，别人是欺软怕硬，他却偏要摸老虎屁股。清查房主，催征捐税，把矛头指向豪门；整顿外商财捐，首先制服英、德大洋行；修建沿江大马路，下令拆除洋商占线的房屋。他见不少权要人物用小汽车接送子弟上学，大为恼火，通告不准学校门前停放小汽车。

此时，日本侵华步骤加剧，行政院长汪精卫谬谈"中日提携"常遭石的痛斥。日本新闻界访华，汪精卫打电话要石率领市府科长以上人员到机场迎接，石答"决不迎接敌人。"并通知市府全体放假。随即提出第三次辞呈（以前曾两次辞职，均被挽留），拂袖而去。1937年年底，石任湖北建设厅长时与中共合作在应城汤池开办训练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某私下劝石："你何苦呢？与共产党打得火热，是会找麻烦的。"石则说："找麻烦的就来吧，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却不许人家起来抗日。共产主义难道比亡国还可怕？我是宁可受制于共产党，甚至死于共产党，也不屈于日本人的。"

圣洁苦行的严立三

1936年西安事变前个把月，某天傍晚，从徐州到南京下关的三等客车上，下来一个穿短装登芒鞋肩背简单行李的读书人，住进小客栈，吃大碗饭；终夜窸窸窣窣；谁都不知他是曾经做过师长、厅长等大官的严立三。后来他的学生见到他的日记，才知他此次西北之行，甚为艰苦。夜半回到南京，投下关小客栈，由于周身奇痒乃解衣视之，只见虮虱成群。前段奔走劳累，尚不觉得。终夜窸窸窣窣，原来是在抓虮捉虱。

严立三（1892—1944），名重，以字行，湖北麻城人。1928年任湖北民政厅长时，愤于胡宗铎、陶钧之飞扬跋扈，干预省政，不过半年辞职，退隐庐山。他相中山南太乙峰下仅10余户人家之太乙村，筑小屋，取不忘劳苦之义，曰"劬园"。用竹管导水入厨房，自己动手种菜、打柴、做饭，劳

动之外，潜心读书。山居8年怡然自得。先后读书50余种。1942年旅川，不断到图书馆读书、找资料，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大学释义》凡10余万言，自费出版200部，分赠图书馆和朋友、学生，是为他平生治学的结晶。

1937年抗战军兴，严得蒋介石电邀出山，未予理睬。追上海失守，南京岌岌可危，蒋再派陈诚去庐山敦请，严以"赴国难，求死所"的心情应召，蒋欲任严为湖北省主席，严力辞，几经磋商，陈诚任主席，严任民政厅长，代理省政。武汉陷敌前，组织军民工商内迁，保存国力，建立联合中学，安置学生青年，供食供衣，使之在烽火中弦歌弗辍。省政府迁恩施后，严禁烟毒，严惩贪污，后方肃然。严以省主席之尊，箪食瓢饮，布衣布履，不乘轿，不坐小车，按规定属于他个人所支配的省主席办公费，分文不取，拨为奖学基金。

1940年陈诚返任省主席，严久存思退之心得以实现。自请去宣恩晒坪垦荒，居长潭河难遮风雨的破屋中，还到宣恩中学兼义务教师。1942年膺选国民参政员，只领参政员薪俸，退回省府送来的待遇，自谓无功不受禄，不拿双份。

严先生一生廉洁奉公，以"苦行僧"自持，一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1944年在宣恩偶感风寒，竟致沉疴，经战区长官部派车强行接至恩施，集中西名医会诊无效，于4月30日逝世。弥留之际，朋友、学生多人随侍在侧，问他有无遗嘱，只见他口唇嚅动，断续地说出"有罪要火葬。"悲天悯人，死不瞑目。后来，陈诚在他的《石叟丛书》中追记严先生说："综观他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

嫉贪如仇的张难先

1930年12月的一天。西湖湖光潋艳，杭州车站冠盖如云，浙江省政府高级官员和地方士绅，成行列队，正在欢迎新任省主席张难先的到来。可是这位张主席有点古怪，布衣布鞋，仅带简单行李，同下层老百姓一道挤下三等车，叫乘黄包车，直奔梅花牌，径向门卫说明身份进入省

府。使得省府上下大吃一惊，风气为之一振。

张难先(1874—1968)，字义痴，湖北沔阳人，1904年与刘静庵、朱子龙等组织湖北第一个排满革命机关——科学补习所，该所被摧毁后，又参加"日知会"。旋因叛徒出卖，张与刘静庵、梁钟汉、殷子衡等8人先后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四越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在李亚东、季雨霖幕，不能合作，回沔阳读书、种菜、教蒙馆，生活难以自给。

1920年张去北京，在北洋政府参谋部当录事，其时，毕业于陆军大学的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供职，地位相若，交谈甚欢，遂称莫逆。1922年李南返投效孙中山，数任军政要职。1926年元月，琼崖克复，张得李之揄扬，受任琼崖各属行政委员，亲入市井，访贫问苦，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张青天"的颂声，遍于全岛。

1928年，张难先任湖北财政厅长，到任后大刀阔斧，首先废除了积弊80多年的厘金局，撤销重重关卡。从各地方驻军头目手中收回擅自增设的税收机关，开拓直接税源。集中任免财政税务人事权力，建立全省统一税收制度和收、支、存、核四权分立的财务管理制度，通过明察暗访，将积弊甚重的宜昌官桥、武穴稽征所多处作弊人员予以惩处。1932年，张任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亦敢于摸老虎屁股。他不避权势，认真弹劾贪污违法事件，其中著名大案如：①湖北水利局长陈克明乘1931年武汉大水灾之机，浮报抢险经费，经查报销单据多属伪造，由"剿总"撤职逮捕。②汉口市长何葆华肆意敛财，生活腐化，密请置诸重典(因消息泄露，何犯潜逃)。③南京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借其亲戚、贵州省府秘书长双清之妻，夹带大批烟土，由渝乘轮过汉，张据报亲率员警上船检查，将烟土与双清之妻一同截获，解送总部，可惜数月后处理情况不明。而监察大员亲自出马办案的消息，却已传遍街巷。再如鲸吞湖北堤款数十万元案之首犯刘文静，下新河借名敲诈商船案首犯万顺祥，移送总部军法处证明无误执行枪决。而总部秘书长杨永泰专权阻扰，许多整肃要案，下落不明。张鄙夷杨之为人，但不能制其跋扈，终因其蒙蔽中央提取湖北堤工专款之议成，张力争不能挽回，愤然弃职而

去。

1932年，张难先以甫卸省主席职务的耆宿身份，不惜纡尊降贵，当了一个半月的县政府秘书，更是一件时人不解的怪事。因有专篇叙述，兹不赘。

（欧阳骅）

省主席当县秘

因行径奇特哄动故里而被乡人冠以"疯子"绰号的湖北沔阳人张难先，字义痴，生于1874年，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曾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南京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国民党参议员等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他与湖北阳新人石瑛、湖北麻城人严重，被世人并称为"湖北三怪"。"省主席当县秘"即是发生在张难先身上的"怪"事之一。

1931年12月，张难先卸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于次年初漫游西安、洛阳后回到武汉。5月中旬，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委任张之老友范一侠为沔阳县长。当时，地势低洼的沔阳经1931年大水灾，生活极其艰苦，居民相率迁徙，十室九空，又有谁愿意到这个地方去呢？故范一侠连一个适当的幕僚也找不到。一日，范去拜访张难先，张很诧讶，问道："你为何还没有去？"范一侠据实相告："沔阳情况不好，延聘秘书科长，均无人愿往，我一人如何能去？"张难先沉思了一会道："我同你去，做你的秘书。"范以为他是开玩笑，大笑而去。没想到第二天，张难先竟携上行李到范一侠住处，促其上路。范见其意坚决，也就不相推让。由此，张难先竟以甫卸省主席职务的耆宿身份，不惜纡尊降贵，当了一个半月的县政府秘书，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之笑谈。武汉的报纸，还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省主席屈就县府秘书"的消息。（朱务本）

“密青天”与“密疯子”

密（或写作宓）昌墀（1852—1919），字丹阶，号孑公，汉阳县巨龙岗兰图嘴（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清光绪十八年（1890年）进士，授山西徐沟（今属清徐）县令。该县在太原南边不远处，地当交通孔道，老百姓爱打官司，是一个老大难的县。密昌墀上任后即着手处理积案，随讯随结，不留悬案。每遇疑难案件，则轻骑简从，下乡察访，弄个水落石出，一时有“密青天”之称。有一天他来到某村，乡民把他迎入社内，一老者哭拜于地。他问老者有何冤枉，老者回答说无冤。又问无冤为何哭，老人稽首说道：“小民活了八十岁，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为了百姓的事情到处奔波的官，所以感动得流下泪来。”

密昌墀曾两次被慈禧太后召见，召见时应对情况各种记载有很大的出入。1899年经锡良举荐，密昌墀进京在仪鸾殿受到召见。对于这次召见的情形，《夏口县志》本传的记载为：密昌墀“始陈时政得失，继论当世人才，终而调和两宫，奏对数时之久。侃侃而谈，声震殿壁，两宫皆为动容。既退，诏军机处存记”。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记载为：密昌墀“极言两宫不睦之害，谓荣禄典兵，刚毅理财，国亡无日。孝钦怒其戆，弗纳。”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为：只西太后一人召见，光绪帝未参加，密昌墀问：“皇上为全国臣民之主，何以未御殿廷？”西太后答以皇帝病重，正遍召各省名医救驾。昌墀进一步奏陈皇上临朝之重要性。西太后闻言，拍案大怒，曰：“汝言皆离间我母子，着速回陕（山）西原任，不准留京。”

次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路经徐沟时，第二次召见密昌墀。关于这次召见，《夏口县志》本传说：召见时，密昌墀“痛哭失声，两宫亦泫然泣，谕曰：‘王大臣误我，汝前所言予犹记忆，今召见汝特欲闻直言耳。’因痛陈出走之非策及拳匪妄诞状，慈圣颔之。以一小臣而令两宫感泣，洵异数也。”而《清稗类钞·谏诤类》却是另一种说法：“两宫入境，宓仅以白饭黄鸡进献，孝钦颇不悦。次日召见，将痛

斥之，而密先伏地大哭，历言近年种种政治之不良，又信任乱民，致酿巨变，以后求皇 太后、皇上须励精图治，屏绝奢华，以示毋忘在莒之意（即离开故土，流亡在外）。后以其言戇直，怒甚，立命革职，将予以重惩，德宗毓言解之，乃驱逐回籍。"《清稗类钞》此条不知抄自何书，颇多错误，所记召见情形并不可信。

以上各家记载虽有出入，但反映密昌墀戇直敢言的品质却是一致的。这种品质还使他获得了"密疯子"的绰号。关于这个绰号的来历，赵三堂在《湖北才子、鄂中宿儒密昌墀》（载《汉阳文史资料》第二辑）一文中作了交待："后来他又上折指责太监李莲英敲诈勒索，大臣误 国等弊端，引起当权者的不满，经山西巡抚岑春煊上奏弹劾说他诬告大臣，实为'疯子'所为，后被太后贬职回乡，人称他'密疯子'，这个绰号后来救过他的驾。慈禧和光绪死后，密昌墀电呈摄政王及军机处，请杀袁世凯以谢天下。张之洞时掌军机处，有意回护，便说："此山西革职知县密昌墀，绰号'密疯子'，可不必理。"昌墀得以无事。

密昌墀返乡后绝意仕进，教书度日，并致力公益事业。修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他曾向张之洞上"两禀一书"；争铁路商办，他曾进京请愿；为根治水患，他曾发起修筑平城垸。他那种热爱桑梓，造福乡里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严昌洪）

汉口"末代市长"晏勋甫

1949年1月21日民贼独夫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从"总统"宝座上退了下来，李宗仁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就在这蒋家王朝危急存亡之秋，失意退役的国民党"陆军中将"，戎马半生的晏勋甫却临危受命，从南京来到汉口，担任汉口特别市市长。

1893年出生子湖北汉川县的晏勋甫，曾在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深造。1927年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以保定军校同窗之谊，提拔晏为

参谋长。唐失势后，晏一度回到湖北，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不久投靠蒋介石，并在十年内战期间担任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二厅中将厅长。"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元老程潜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派晏勋甫为第一战区的参谋长，名曰辅佐，实为暗中监视程潜。晏在任程潜参谋长期间，对程的豁达大度，有长者之风十分钦佩，加上程潜对他又十分真诚，使晏勋甫越发感到蒋介石的虚伪狡诈，从此，他们之间感情日益加深，晏将蒋要他暗中监视程的原委向程和盘托出，程潜听了十分气愤，对晏勋甫关心自己的行动十分感激，两人乃至两家之间的感情更加亲近。

1946年5月，晏勋甫调任国防部测量局局长，主管全国的地形测量事宜。因坚决反对美军冲洗航空摄影底片与陈诚发生冲突，遂于1947年退役回到汉口。此时，国统区正在普遍开展所谓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活动，晏勋甫以汉川籍元老的身份，被选为"立法委员"，并到南京立法院就职，由一职业军人变成了地道的政客。并在"总统"竞选中结识了桂系智囊人物邱昌渭，全力帮助桂系首脑人物李宗仁参加"总统、副总统"竞选。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对晏勋甫也就另眼相看了。

1948年秋，晏勋甫在会见老长官唐生智时，两人对当时的时局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交谈，一致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在政治上又失信于民，早晚 间势必垮台。唐还劝晏不要当蒋介石的"殉葬品"了，并神秘地告诉晏，他在湖南已跟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联络了一些地方武装，劝晏勋甫尽早捞个省主席之类的职务当当，以便更好地活动。晏勋甫听了唐生智的这番话，大为畅快，从此一起投身于"和平运动"。

1949年1月蒋介石隐退后，李宗仁任"代总统"，汉口特别市长徐会之辞职他去，市长一职空缺。李宗仁为"酬谢"晏勋甫帮助自己竞选之情，便委晏勋甫出任汉口特别市长。晏离南京赴任前，包了一架专机没有直接飞往汉口，而是去了长沙，在那里会晤了老长官、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此时的程潜已与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有了联系，其部属亲信也倾向投靠人民，程、晏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晏勋甫在长

沙短暂停留后，回到汉口，即专程去拜会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他从2月16日正式到职视事，到5月16日武汉解放，仅仅当了3个月的短命官，成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的"末代市长"。

晏勋甫上任不久，汉口著名工商企业家林厚周和夫人阮冰奉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的指示，专门做晏勋甫的策反工作。林厚周和晏勋甫有同乡之谊，晏的叔叔晏道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此时正在从事反蒋活动，并与林厚周关系十分密切。林便利用这一关系，请晏道刚做晏勋甫的工作。晏勋甫很快表态，决心弃暗投明，及时完成了江汉军区布置的各项任务。

武汉解放前夕，晏勋甫机智地排除了白崇禧的种种干扰，同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警察局长李经世等共同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晏将旧市府的文件、档案、武器、车辆、机器及物资完好地交给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受到了吴德峰市长的表扬。不久，晏勋甫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9月下旬，晏勋甫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1961年，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历程，享年68岁。

（商若冰）

寇英杰电话局碰壁

寇英杰系萧耀南部下师长，其人瘦削矮小，不像军人，然急燥暴戾，动辄骂人，酷嗜鸦片，又好美色。曾纵横汉上，为国人侧目。许金城辑《民国外史》上记有他两则小故事。

寇英杰在20年代任京汉铁路信阳至汉口段护路司令。一天，想用电话通知朋友来打牌，屡接不通。当时汉口电话尚非自动机，女接线生告以占线，请他稍等片刻。寇英杰不信，就在电话中骂接线生"混蛋，王八羔子"，接线生也还嘴骂他："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三级。"寇英杰生平只骂别人，从未被人骂过，此番挨骂恼羞成怒，马上气呼呼地说："你

妈的，你等着，看老子夹揍你。”说完带了4名卫士，直奔电话局而来。时电话局在英租界，由于借款关系尚属英人管理。接线生领班为一英国女士，已获知其事，认接线生无过。为防寇英杰闹事，派了两名印度兵守护接线室门。寇英杰一行冲入电话局，直接找到接线室。印度兵先将他的卫士喝退，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寇英杰说要进接线室。印度兵告诉他，接线室重地，非本局人员不能擅入，如果有事，可见领班，并把寇英杰引到会客室。一会儿领班同翻译到，寇大声说接线生骂人。领班说：“顷闻实君先骂接线生，接线生以骂还之，适足相消，两不为过。”寇令将接线生交出，领班说：“接线生为我所领导，非英国领事公文，我不能交出。”寇英杰仍喋喋不休地叫骂，领班回敬他：“君为军人，当知礼节，再骂，我们将以暴客相待。”说完令印度兵逐客，寇不得已，悻悻而去，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

1924年前后，坤伶碧云霞在新市场大舞台演出，风姿绰约，妩媚天成，出演花旦，简直荡人魂魄。寇英杰也被迷住，千方百计要将她弄到手。他在大同旅社租了一间房，通过招待王某把碧云霞找来，碧开始不答应，寇多方威胁利诱，碧终于投入寇的怀抱。寇英杰自从与碧云霞发生关系后，甚为眷恋，每晚演出结束，即到旅社，召碧同宿。时间一长，春光泄露，许多人都知道了寇碧二人的暧昧关系，原来为碧云霞捧场的一些青年戏迷，都鄙视她，不再来她看的戏，碧云霞的生意骤然冷落。其养母对此情形非常恐慌，埋怨寇英杰不该独占她的摇钱树，以致影响生计。寇颇不高兴的说：“无人捧场，干脆停演。”养母说：“吾女可以停演，吾家不能辍食呀。”寇生气道：“你有人，我有钱，自今日起，云霞与戏园解约，多少身价，我出了。”养母开始索价10万元，后由王某调解，只给了7万元，寇英杰纳碧云霞为妾。军阀作恶，国人奈何。从此以后，舞台上再也看不见碧云霞的倩影了。

（严昌洪）

“屠户”和“三蛋将军”

胡宗铎和陶钧，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的毕业生，跟桂系二号人物

白崇禧有同窗之谊。1923年他们共同投靠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实力苦干，取得李、白、黄信任，成为桂系中湖北籍军人集团的首脑人物。1927年，桂系夺取了两湖（湖北、湖南）地盘，在"鄂人治鄂"的幌子下，胡宗铎以第十九军军长就任武汉卫戍司令，陶钧以第十八军军长就任副司令，在湖北进行血腥统治。人们称之为"胡陶"。随后，成立了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胡宗铎任督办，陶钧任会办。所谓"卫戍"，就是保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清乡"，就是清除中国共产党。其实，这两个单位都是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志士的专门机构，它们的分工是：卫戍司令部负责武汉地区，清乡督办公署则对湖北全省各县负责。

胡宗铎投靠桂系最早，是鄂籍军人集团的一号人物。创业期间，需要陶钧为之卖命，所以胡对陶多所包容。每次胡升迁，陶也 随之升迁。胡宗铎任纵队指挥官时，陶是胡手下团长，胡任十九军军长时，陶任师长、副军长。不久，将刘佐龙十五军残部和一些省防军成立十八军，胡又保荐陶任军长。陶钧名义上是副职，什么副司令、会办等等，实际上大权在握，生杀予夺，言莫予违。

陶钧对共产党的方针，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治乱世，用重典"，"杀一儆百"，"以杀为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杀"字。从1927年秋，到1929年春，是湖北反动统治时期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候。

国共合作时期的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中共党员）、财政厅长詹大悲、财政厅秘书主任危浩生等都是由胡部师长、十九军参谋处长兼汉口公安局长林逸圣亲自出马在日租界逮捕的。未解卫戍司令部，未经审讯，未获得任何证据，子被捕当晚深夜，李、詹二人被押到汉口济生马路，当街枪毙。危浩生不是中共党员，又无任何把柄，许多人为之向胡、陶求情，陶感到不耐烦，指示用"甘心附逆"四字作罪名，将其杀害。

有一次，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开了一批"犯人"名单的签呈向陶钧请示。这批"犯人"案情轻重不一，拟定的处理办法也不同，有的交保释放，有的还待继续侦查，有的可以定案但刑期不同。陶接过签呈，一言不发，信笔一圈，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字，

连写签呈的军法官的姓名也圈在内。余良才用手一指说，"这是法官"。陶这时才意识到圈没有圈准，一面改划，一面说："法官不杀"。其草菅人命，可称今古奇观。

胡陶嗜杀成癖，当年湖北许多有为青年和革命志士，几乎被摧残殆尽。据黎少岑先生统计，1927年底，汉口一次年关大屠杀，就杀了100多人，据张人骥先生统计，另一天杀了97人。许多著名的革命志士如邓雅声、唐鉴、向警予等均被胡陶杀害，因此人们送他们一个"雅号"——"屠户"，也算"名副其实"。

1928年秋，湖北省政府成立武汉市市政委员会，胡宗铎以省府委员兼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陶钧兼委员。市财政局为增加税收，简化税制，举办营业税，遭到大商人和商会头面人物反对。有次省政府委员会开会，汉口商会纠集了几千人到省府请愿，要求制止举办营业税。胡陶威权赫赫，又是他们制定的办法，所以出来接见。胡宗铎带着杀气对商民们说："以前王占元、吴佩孚和后来的汪精卫，都曾向你们勒索过巨款，你们都不吭一声，现在我们举办营业税，合情合理，而你们却再三反对，还要兴师动众，威胁谁，混蛋，王八蛋！"陶钧在一旁，更是火冒三丈，挥手呼喝："滚蛋，快滚蛋！好大的狗胆，你们以为我不敢枪毙你们！"一面说，一面叫卫队把机枪抬出来，摆起扫射的架势。参加请愿的商人立即四散逃走。

连珠炮似的"混蛋！王八蛋！滚蛋！"出自堂堂将军之口，"三蛋将军"的"美名"立时传遍了武汉三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商若冰）

"烟土大王"出任禁烟处长

神州之大，无奇不有，旧中国尤甚。本世纪20年代，武汉的"烟土大王"赵典之出任禁烟处长一幕，便是一桩奇而又奇的怪事。

赵典之（1878—1952），字焕章，武昌县豹澥乡人，两岁时父亲去世，

后随母下堂，因家贫而无心向学。经人介绍，到武昌自强学堂做杂役，以好逸恶劳，个性顽劣被开除。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到汉口大夹街叶福泰丝绒店当学徒，因与同业抢生意而被打成重伤，卧床几月。从此便刻苦学习武艺，练得一身功夫，为日后"青红满盖"的汉流生涯打下了基础。

1900年，赵典之与一些习武的朋友，在土当（牛皮巷）做牛羊皮、猪鬃等过手生意，从中牟利，因此而结识了吴老么（文卿）、梅老么（癞痢）等地痞流氓，并通过他们与日、法租界的包探同时也是著名的包运私土的头目傅坤山、姚春阶等有了交往，找到了走私烟土的门径。但他于此道毕竟是初出茅庐，因而十余年间，获利不多。倒是在经营皮毛、杂粮、棉花等方面，赚了几万两银子。

大约在1916年，经傅坤山等介绍，赵典之与后为民生公司常务董事的鲁履安合作，在生成里设福记公司，大做烟土生意。其后又与牛皮帮铁子禄、李敬之、齐玉成等集资组织万泉公司，兴建大同旅社。铁子禄原是北洋军中的军官，赵典之通过他与吴佩孚部工兵团长李耀廷攀上了关系，并邀请李的副官王世珍来担任大同旅社的经理；又通过李、王的关系，先后结识了陈嘉漠、何佩瑢、寇英杰、石星川、刘佐龙、周际云等达官贵人，并经常邀他们到旅社来吃喝嫖赌，从而为其以后的暴发提供了条件。

当时，对于烟土营运，统治湖北的王占元一方面采取放纵政策，从中捞取油水；另一方面慑于社会舆论压力，成立军警督察处，委李耀廷为处长。这军警督察处在1922年改为禁烟督察处，表面上是缉私机构，实际上助纣为虐。赵典之既有重金贿赂李耀廷，并请他当了花楼街顺风公司的股东，自然，李耀廷便投桃报李，对赵关照备至。因此，当特业公会成立后，赵典之便当上了会长。

赵典之当上了特业公会会长以后，公会成了他的合法权力场所，为他垄断汉口烟土市场创造了条件。为了进一步拉拢李耀廷为自己撑腰，赵典之利用特业公会筹了一笔巨款，买下吉庆街退思里的两栋房子，送

给李耀廷做公馆。于是，在1924年，李耀廷便委派赵典之为武（武昌府10县）黄（黄州府8县）禁烟总处处长。赵从此缉私走私，并以合法身份在武、黄地区派销缉来的私土，无本万利，大发横财，到本世纪30年代初，已拥资百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烟土大王"。

（朱务本）

洪帮首领周胜余

周胜余，又名周汉卿，湖北黄陂人。是跟洪帮寨主杨庆山齐名的武汉地区大流氓。20多岁时在汉口旧德租界扛码头、当力夫，结识一般惯盗如哈巴老九之流，专做"架子楼"（即窝脏、销脏）买卖，一混20多年，成了华景街一带的"地头蛇"。

清朝末年，周胜余经人介绍拜在当时武汉著名的洪帮"大爷"潘义名下，当了一名小兄弟，这成了他在华景街抖狠的资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潘义因杀人越货案发被杀，周胜余依仗他的势力，接替潘义当上了"天目山"的寨主。从此，周胜余在华景街大开香堂，广收兄弟，一时间，汉口有名的地皮流氓萧济川、李春山、邓堂、余海山等都投到周寨主的"麾下"，连桂系军阀统治武汉时期的汉口市警察局长汪以南也成了周的兄弟，其势力越来越大，汉口的戏院、茶楼、赌场、酒馆、妓院、码头等各个场所，都有周胜余的"影子"，真是势倾江汉，显赫一时。

民国时期，周胜余依仗汉口军、警势力，开设赌场，大发横财。1928—1929年间，他在汉口法租界巴黎街（今黄兴路）的红房子聚赌，勾结法租界巡捕房翻译尉迟巨卿等开设"俱乐部"（实为赌场），进场赌博者均要购买5元一张的门票，每天仅门票收入就高达2500银元。赌场内还设有酒店、鸦片烟馆、妓院，集吃喝嫖赌之大成。每天抽头钱收入就达300银元以上。害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而周则捞到了数以万计的不义之财。

在流氓社会中，着重"义气"二字，周胜余深知其中奥妙。1923年冬，

洪帮大爷范明山与汉口禁烟督察处秘书黄文卿的小老婆私通，事被黄侦知。一天，范明山正与黄妾在今保成路天隆里一间小房子里幽会，黄文卿带领十几个打手破门捉奸，逼范明山和黄妾喝下两杯硝镪水，送了这对狗男女的命，成为当时轰动武汉的桃色新闻。黄文卿当众扬言，谁敢收范明山的尸，也要请他喝硝镪水。周胜余为了显示自己的"胆略"，表现自己的"义气"，硬是派人将范明山的尸体抬到华景街铁路外通济善堂收殓。此后，周胜余名声大振，更加巩固了他在洪帮中的地位。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驻武汉后，有人通过洪帮大爷王子琳，收买洪帮兄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周胜余等一批大爷都参加了。宁汉分裂后，王子琳罪行败露被革命政府处决，周胜余等洪帮流氓纷纷外逃。直到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等叛变后，周胜余才又回汉口公开露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洪帮大爷田东山(军统特务)拉拢，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也拜在周胜余的名下，当了"心腹大爷"。从此，大批军统分子纷纷加入洪帮，以周胜余为首的洪帮分子也加入军统，洪帮、军统完全合流，成为蒋家王朝的鹰犬。

武汉沦陷后，周带着家人和一帮喽罗逃到四川，在沙市、宜昌、巴东、万县、重庆等地广开山堂，大收兄弟，继续为非作歹。日寇投降后，周胜余回到汉口。当轮船到达汉口六码头时，竟有三四百人列队欢迎，并将鞭炮一直从码头放到周的家中(华景街)，沿途10余里，路人侧目。第二天，有人在群宴楼(今怡和服装店)摆四五十桌筵席为周洗尘。排场之大，连国民党的官员也自叹弗如。不久，周以军统分子身份"劫收"江汉一路上的海陆饭店，并在该店三楼公开摆设香堂。这时，不少军统分子都是周的兄弟，周又与另一洪帮寨主杨庆山狼狈为奸，成为洪帮首领，武汉一霸。

武汉解放后，周胜余逃往乡间，隐姓埋名，以图东山再起。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逮捕了他，并判处死刑。

(商若冰)

“中国女神童”冯铸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孙中山先生偕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宋子文、孙科、章士钊、景耀月、陈汉元、魏宸组、庞青城等20余人，应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邀请，于4月9日从上海抵达辛亥首义之区武汉。第四天上午，同盟会湖北支部在武昌阅马场蛇山坡附近的湖南会馆单独召开欢迎大会，欢迎总理孙中山先生，同时欢迎协理黎元洪（辛亥首义后，黎元洪被推为同盟会协理）。孙先生等步入会场后，见会场悬挂着许多祝颂的对联。其中有一幅特大字体的隶书对联，为一年仅11岁的女童冯铸所写。联为：

所作空前绝后

其人长乐永康

上句颂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下句祝愿孙中山先生事业顺利、身体健康。不仅内容得体，而且书法遒劲。这样一幅作品，出自一个年幼女童之手，使孙中山先生及其随员们叹赏不已。

冯铸，字冶吾，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黄陂县冯家塘人（今属武汉市）。幼时随伯父冯家颍练习书法，七八岁时已能写斗大的字。后随父专程到江浙向著名书法家清道人学魏碑，向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学篆隶。10岁时，武汉不少商店争相请她写招牌、楹联、匾额，名声传播远近。辛亥武昌首义后，冯铸的父亲将她的卖字所得，全部捐给民军。此时，黎元洪收她为义女。1913年，巴拿马世界儿童艺术展览会上，冯铸的作品获金质奖，被誉为“中国女神童”。她31岁时，丈夫病故，生活艰难，逐愁苦致疾，于1949年7月去世，终年仅48岁。

（李修鲁）

恶有恶报
——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不得好死

北伐战争前，汉口有个警察厅长，名叫周际芸。此人生性残忍，是北洋军阀最毒辣的爪牙，在汉横行十几年。从1913年起，经他杀害的革命党人，在数百人以上，特别是1916年华景街一役，被其逮捕枪毙者就有几十人之多。人民对此屠夫衔恨人骨。

1926年北伐革命军到达武汉，周际芸于当天便仓遑逃回天津原籍。他在汉口的财产和存款全部被革命政府没收，带回天津老家的钱为数有限，不久即陷入困境。到1928年旧历端午节前，周际芸因债台高筑，节关无法渡过。他搜索枯肠，忽然回忆起汉口某参燕号还有他的存款5000元未被没收，于是派他的儿子到汉口提取，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务必于端午节前赶回天津，以救燃眉之急。

周际芸的儿子是个浮荡青年，到汉口取款后一头扎进妓院，竟乐而忘返。等到钱花光了回家时，已是中秋将近。周际芸严诘他为何迟迟不归，取回的钱款到哪里去了。小周眼看搪塞不住，只得从实禀明：款已耗尽，今已一钱不名。周际芸一听，暴跳如雷，大骂道："这笔钱是全家用来度日的唯一存款，竟被你在妓院花光了，我要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说完，马上取下佩刀用力向儿子刺去，结果小周一命呜呼。当时儿媳抱着3个月的男孩站在门边正瞧丈夫受训，心中还有点幸灾乐祸，突然看见公爹刺杀丈夫，大惊失色，忙将孩子往地上一扔，准备去救丈夫，诏料用力过猛，孩子已脑裂毙命。媳妇眼见夫死子殇，极其悲恸，也自刎而亡。周际芸见眨眼之间儿子、媳妇和小孙子都遭惨死，痛悔不及，也在夜间悬梁自尽。周际芸一家虽然惨死，但民众并无同情，谈起这件事时，一些人就说周际芸在汉口杀人太多，因而得此报应。

（田雨）

楚王府轶闻

中国封建时代，取得天下的皇帝，一般都要封自己的儿孙为王。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登极3年，即大封诸子。其第六子（庶出）朱桢被封为楚王，在武昌建藩邸。终有明一代，楚王府在地方政权以外，俨然一独立王国。然王府与地方在政治、经济上又多有联系，楚王的统治像影子一样影响着武汉地区的社会生活。关于楚王府的活动，正史记载不多，稗官野史倒有一些轶闻可供谈助。

封建亭与楚望台

在武昌城东南梅亭山上旧有封建亭，因纪念朱桢封王而建。朱元璋在元末攻打陈友谅之子陈理，曾驻扎梅亭山。陈理投降时，朱元璋正好得到皇六子出生的报告，当时非常高兴地说："他日以此子为楚王。"1370年（洪武三年）正式分封时，朱元璋似乎把自己说过的话忘记了，封朱桢为齐王。然而铸造宝玺时三次都没有成功，他这才记起来，说："朕昔驻梅亭有言，其王楚乎？"乃改封朱桢为楚王，宝玺这次一铸而成。同年，在江夏（今武昌）高观山（今蛇山）南麓，南至大朝街（今复兴路）、东至阅马场，西至长街（今解放路）一带地方，兴建楚王府，"宫广二里，表倍之，瓦石为城"。王府内遍筑宫殿楼阁，十分豪华。王府正门称"镇楚门"，在今湖北医学院附一医院门诊部一带，那里从前称王府口。1379年竣工，1381年朱桢来武昌就藩，在梅亭山上建封建亭和楚望台，后者为楚王登台遥望南京，表达对父母思念之情的地方。

愍王为世子所弒

朱桢为第一代楚王，称昭王。下传八代楚王，他们是庄王孟烷、宪王季[illegible]、康王季堪、靖王均钺、端王荣[illegible]、愍王显榕、恭王英煃、末代楚王华奎。其中愍王和华奎未能寿终正寝，前者为世子所弒，后者为农民起

义军张献忠部投入长江。其事详情如后。

憨王显榕世子英耀喜欢上了其父的宫人方三儿，在他的相好陶元儿等人谋画下，把方三儿诱出宫外幽会。显榕知道后，将方三儿囚禁在北院，并笞杀元儿。英耀惧怕父亲怨恨自己，心中惴惴不安。不久，英耀又与妓女宋么儿好上了，跟手下卫卒刘金商议，将么儿藏在英耀所居的缉熙堂。显榕闻讯，准备惩罚刘金。刘金便唆使英耀与其党羽徐景荣等谋叛。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灯节期间（农历正月十八日），英耀张灯置酒宴请父亲显榕，并在夹室另设酒菜宴请叔父武冈王显槐。正喝酒间，刘金与同伙田尧等突然出现在显榕座后，用铜瓜击显榕的脑袋，立毙，显槐大惊，上前相救，亦被击伤左肋，由从者挟持逃出。显榕左右朱恩侍夺门出，缒城出王府报告抚按。英耀将显榕之尸移入宫中，命长史孙立等以中风上报，并通崇阳王显休等保奏英耀袭封。谁知抚按已先将实情报告了朝廷，世宗逮英耀入京，告太庙，焚尸扬灰。其他参与谋弑行动的26人皆凌迟，立等弃市。显休等革减奉禄3/10，显槐等得到赏赐，王位则由英耀之弟英煜袭封，是为恭王。

华奎假王案

恭王无子，病逝前，令宫女胡氏诈为怀孕，恭王死后，王妃宣布胡氏生遗腹子双胞胎华奎、华璧。实际上华奎是王妃之兄王如言之子，华璧系王妃族人如棠舍入王玉之子。按明朝规定，此属异姓冒爵，先有仪宾汪若泉上奏揭露，朝廷让抚、按查处，王妃坚持说系胡氏之子，事乃寝。后有王如言女婿、宗人华越联络宗人29人入奏，以华越之妻王氏系王如言之女而知实情为根据，提出"二孽皆不宜冒爵"。华奎一面重贿朝中有关大员，一面上疏反劾诸宗人，神宗遂有"勘楚"谕下。但阁部大员，言人人殊，互相龃龉，事情真相终不能明，神宗最后为维护宗室体面，认定华奎为真王，将拒收贿赂，坚持勘楚之议的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郭正域（江夏人，颇知假王事）罢官，楚宗人也受到处分。

楚宗人造反

楚宗人从此与华奎积怨甚深，1604年又有“楚宗之乱”发生。为了感谢神宗保全之恩，华奎拿出大量银子助建宫殿。宗人闻讯，数百人渡江至汉阳府公馆，将华奎准备解京白银4扛全部抢去。汉阳府急闭城门，分巡副使周应治仓皇请示巡抚赵可怀后，带领军人捉获宗人30余人，裸体加梏，鸣金鼓送回武昌。诸宗人见了，愤恨不已。两天后，宗人聚众3000余人，冲入抚院，遇周应治等，加以痛打，周逃窜到赵可怀内衙神厨中躲藏。赵可怀出面劝止，众宗人将其击杀，周应治乘间弃印而逃。宗人返回楚王府，大肆劫掠而散。事闻朝廷，将闹事宗人逮捕治罪，斩2人，赐死5人，余皆禁锢。

华奎被沉入江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围攻武昌，在籍前相贺逢圣入见华奎，商议守城事。华奎命人拿出朱元璋分封时赐楚王之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余无有。”贺逢圣哭着离开了王府。不久，因无军饷，新招募的楚新兵(多承天、德安之溃兵)不再为明王朝卖命，打开保安、文昌二门迎接起义军进城。华奎被义军沉入长江，王妃自杀。张献忠见王府库中有许多金银，叹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邵长衡《悲武昌乐府》唱道：“朱胡子，真庸儿；‘屠伯’至，无孑遗。金宝如山积，不为战守计。故相言之楚王怒，宫中但有金交椅。朱胡子，真庸儿，葬鱼腹，何足悲。”

龙泉山下楚王陵

九代楚王除华奎外，死后均葬于武昌龙泉山。龙泉山原名江夏山，汉舞阳侯樊哙葬子此地天马峰下。汉朱桃仙善堪舆之法，为寻龙脉到此，见两岸如门环，以峰锷二巨石似斗兽状，见一股泉水在盘阿之内，“大旱不涸，阴则云雾覆其上”，“色碧味甘”，乃赞曰：“此灵泉也，不可

蚤，凿之，则雷雨至矣。”唐代宰相李磎作《灵泉记》，称：“泉以灵名，非有蛟龙之与处而后为灵也，以山能兴云雨，致风云而始为灵耳。”此后江夏山改名为灵泉山，后又演变为龙泉山。历代多有名人葬于此地。楚昭王朱桢生前常游灵泉山，对那里的风光景物十分赞赏，感叹道：“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晚年派人为自己寻找牛眠吉壤，经堪舆家测定，以天马峰下的夹谷地带为“仙壤”，乃决定辟为陵园。但那里已有樊哙墓，怎么办？只有把他赶走。楚王府的人制造了一块石碑，上书“此处本是楚王地，借与樊侯五百年”，埋在樊哙墓附近，后当众挖出了石碑，大肆宣扬天意，然后把樊哙墓迁葬于山南一侧，就这样达到了霸占墓地的目的。自昭王以下共8代楚王及24位王妃均葬于此地，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楚王陵园。此乃是“昭王赶樊侯，灵泉变楚陵”的一段故事。

（严昌洪）

从“反日英雄”到大汉奸
——叶蓬罪行录

叶蓬凶悍狡诈，心狠手辣，怀有强烈的野心。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疯狂追求，作为生活的目的，从不考虑自己的手段。

叶蓬号孛孛，湖北黄陂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1929年任国民党13师74团上校团长，后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1931年任武汉警备司令兼警备旅旅长。

1935年，叶蓬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在汉口循礼门刘祥花园警备旅驻地举办防空演习展览。入门，举目可见巨幅东北失地图，图面上印有岳飞书写的“还我河山”四字，又在打靶场的目标上画有日本太阳旗，还画有两个日本兵的形象。叶蓬踌躇满志，以“反日英雄”自诩。嗣后，日本驻汉领事认为这是对日本国旗、对日本国民的侮辱，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将叶蓬撤职查办。国民政府屈从日本的无理要求，将叶蓬调为铁道部铁道队警总局局长。从此，叶野心受挫，心情沮丧，不安于位，一心另想高

就。无奈受到张群和陈诚的掣肘，不能有所作为，叶满 怀愤懑之情，曾对友人说："齐之不用则之楚，楚不用则之晋。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又说："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总不能默默无闻，碌碌无能。"一气之下，迳往香港，180 度大转变，撕破"反日英雄"假面具，沦为大汉奸。

叶蓬投敌后，先后充当汪伪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武汉绥靖公署上将主任、伪湖北省主席、伪陆军部部长等等。

叶蓬骄横善变，当其效忠蒋介石时，曾在他的办公室 里书写："我为领袖而生，我为领袖而死"的字条贴在墙上，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叶一忠"，表示虔诚地一心一意地忠于蒋介石。

之后，气候剧变，叶蓬认贼作父，当其充当汪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粉墨登场时，在"就职演说"中竟然鼓吹"中日合作，积极反共，群策群力，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

1943 年叶蓬以军事代表团身份赴日本觐见天皇，奴颜婢膝地说："一定要效忠大日本，一定要赤诚地报效天皇！让中日亲善之花开遍大东亚共荣圈。"还在广播中叫嚣："蒋介石用张群、陈诚这些祸国殃民之徒，助桀为虐，荼毒黎民，民之憔悴于暴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众人所梦寐以求者，旨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诚如是，则天下黎民仰望大日本皇军，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叶蓬有奶就是娘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肉麻至极！无耻至极！

1945 年抗战胜利，叶蓬在武汉被捕。叶的老婆兰秀成多方活动，愿以全部财物救他一命，曾求助何应钦，何说："叶蓬结怨太多，如今事实俱在，不便进言。"

1946 年冬，经陈诚拟好签呈，由张群面呈蒋介石批准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吴先铭）

黄卫军是什么货色

黄卫军是一支道道地地的汉奸军队，是日本军阀残害中国人民的

鹰犬。自从黄卫军出现在湖北、武汉地区，这里的人民就饱受其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黄卫军的头子熊剑东，浙江昌化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在冯玉祥部当过参谋。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后，充当国民党军淞沪游击司令、军统局上海情报站站长，从事特务间谍活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被日本特务逮捕，经大汉奸周佛海斡旋获释。后由周资送赴日留学。适逢当时日本侵华派遣军的宪兵司令，是熊剑东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通过这层关系，受到优待，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熊剑东感激涕零，就认贼作父，当了汉奸。为了向主子邀功，他向日本天皇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大日本帝国的扶植下，建立一支确保黄色人种的军队来创造"大东亚共荣圈"(名"黄卫军"。对于奴才的一片"忠心"，天皇喜形于色，当即"准奏"。

熊剑东领受"皇命"，当即返华招兵买马。在新堤(今属洪湖)附近收编一股土匪约300余人，枪200余支，还拼凑了一部国民党散兵游勇，总共1400余人，枪枝1100余支，于1941年4月正式"开张"。熊剑东自任"军长"，他的难兄难弟、狐朋狗党、三亲六眷都被拉来当"官"受"爵"。整个部队编为3个团、一个特务营，按日本军方命令，黄卫军受冈村宁茨指挥。

该军成立编训仅两个多月，冈村宁茨即令开赴监利螺山驻防，被国民党部队击败，熊本人也负了伤。此后，更加得到日本军方赏识，熊也更加趾高气扬。他在汉口六渡桥府西一路一带(当时日寇划定的军事区)整训黄卫军。日本军方特补充大批武器弹药，大批军服和军用物资，以及军马12匹。。

经过这次扩编，黄卫军的兵力增强一倍以上，熊升任总司令，邹平凡升为参谋长，还新近成立了混成总队(辖炮兵、机枪各连)，由朱绍文任总队长。其他大小官员均有升赏。该部集中整训3个月后，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检阅式，阅兵式后还沿中山大道一线游行，并在戴家山实弹射击，大显熊剑东的威风。

当时，日寇在武汉所指挥的伪军番号很多，如汪步青八十二师，金亦吾三十四师等等。都是人多枪少，群众说他们："一被盖两旅，两枪成三师。"这些伪军不及熊剑东的实力雄厚。因此，日本军方再一次扩充黄卫军，将汪步青师和上海的王天才（原太湖地区著名土匪）部拨归黄卫军，将黄卫军编成两个师，官兵8000余名，枪支6000余支，熊仍任总司令。还在汉阳训女中学旧址（今23中）成立军校，训练后备力量。

黄卫军扩编后，日军以"以华制华"策略，命令该军向汉、沔、川及襄河一带"扫荡"，与新四军作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使襄河一带的人民十室九空，鸡犬不宁。

1942年8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各地伪军均改称陆军称号，汪精卫与熊剑东商量，将黄卫军编成两部分：一部留武汉，编号陆军二十九师，由邹平凡任师长；一部由熊剑东带到上海，编成周佛海的税警总团，周自兼总团长，熊剑东任副总团长。黄卫军这支汉奸部队才烟消云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熊剑东执行了"反共"政策，蒋介石不仅不怪罪熊，反而任命熊剑东为"上海先遣支队司令"。汉奸一跃而为"地下工作者"，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

1946年，熊剑东奉蒋介石之命，率汉奸部队进攻苏北解放区，被新四军击毙。蒋介石竟命 军统头子毛人凤主持"追悼会"，对这个一贯与人民为敌、执行日伪"杀光、抢光、烧光"反动政策的汉奸竟如此哀悼，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

（商若冰）

狱中十三姊妹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武昌武胜门外震寰纱厂的工人，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白色恐怖和资本家以及由工贼组成的"工改委员会"的残酷虐待，为夺回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庄严的

权益，展开了正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因震寰纱厂资本家开除剪发女工而达到高潮。

是年11月，震寰纱厂的一些女工，因感蓄长发既不便劳动，又不安全，于是纷纷剪去长发留短发。这原本是极平常的生活小事。但纱厂的资本家和工改委员会竟小题大做，以剪发就是"共产分子"的莫须有罪名，无理开除10余名女工，企图借此杀鸡儆猴，压制工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斗争。

事件发生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各界劳动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声援震寰纱厂被开除女工的宣传、慰问活动。11月28日，当由武昌中山大学女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挥舞小旗，扛着横幅标语，在寒风中精神抖擞地行进到纱厂区附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工贼、流氓们的棍棒与铁尺的袭击，马坤、纪李华、梅玉珂等20余人被抓，后来，她们中有13人被送到"武汉卫戍司令部"裕润里看守拘押，绝大多数是中大学生。

在狱中，这13位女同志一起生活、战斗，革命情谊与日俱增。她们按出生年月先后结成姊妹，陈慕兰25岁年龄最大是大姐，二姐至十三妹依次为：马坤、纪李华、许蕴达（原名闻道）、梅玉珂、彭端淑、袁仙芝、沈晓香、胡颖杰（原名庆康）、吴静逸（原名瑞芳）、黄自纯、周游（原名奚女娴）、钟超（原名张凤兰），这13姐妹中，有9人是中共党员，其余4人为共青团员。

12月18日晚，十三姊妹中年龄最大的5位与许白池、吴[illegible]、田常、李子芳等4位中大男学生在"打倒国民党"、"打倒工会改组委员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走赴刑场，英勇就义。

（朱务本）

斗级营七姐妹

1926年黄埔军校由广州迁武汉，招收第五期学生。湖南考区考取

男女学生200多名，其中有7名女生，校部指定住武昌斗级营高升旅馆。她们都是湖南女师(校长徐特立)的学生，按年龄结成为七姐妹：大姐周铁忠、二姐周佑德、三姐谢鸣冈、四姐王容箴、五姐谢翔霄、六姐谭珊英、七妹黎树蓉。

湖南录取的学生多，校方要甄别淘汰1/3，学生反对，推举代表向校部请愿，女生代表是周铁忠和谢鸣冈。但校部坚决不允，她们不得不改姓名或籍贯重新报名。谢鸣冈改名谢冰莹，周铁忠改籍贯为湖北斗级营。因为湖北并没有斗级营县，结果6人都考取了，而铁大姐名落孙山。

那时，由谢冰莹的两个哥哥介绍了几个"五皮"干部(皮鞋、皮带、皮鞭、皮绑腿、皮手枪套)给她们做朋友，铁大姐虽未考取，但她的对象是王牧平，他很能干，首先介绍她看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传记，使她很满意。不过后来，铁大姐继续革命，王却离开了大陆。二姐周佑德，后参加广州起义，作战时牺牲。三姐谢冰莹，人很聪明，写作能力强，但因为恋爱、家庭等问题纠缠，在王明路线时期，受到党内严厉谴责，于是对革命抱着游离态度，后来到了海外。铁大姐说："如果我不被捕，在我与邓颖超接上关系时，会带她到延安去。"四姐王容箴，会唱歌，大家称她金嗓子。她的对象林木森，学问思想，都不及她，她干脆不理。在军校毕业以后，他又入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五姐谢翔霄，她的丈夫陆机，是国民党空军的高级军官，奉令轰炸苏区，但他率队飞到荒山野岭把炸弹扔掉，不愿中国人炸中国人。六姐谭珊英，七妹黎树蓉，军校毕业后，总在一起。黎一直在党的机关工作，后来被捕牺牲。谭珊英曾到西北与三姐共同工作过一段时期，至今在湖南某女师教书。

在斗级营时，七姐妹中，只有周铁忠及小妹黎树蓉是中共党员。在军校学习期间，其他姐妹都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牢记恽代英的毕业训词，每个人都是一粒革命种子，无论到哪里都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至于那几个"五皮"干部没有一个成为共产党员的。所以铁大姐说"七比零"。

(符其实)

湖北女师学潮

1922年，湖北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潮。它震撼了了武汉三镇，沉重地打击了顽固的封建势力，被誉之为湖北妇女革命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湖北女师位于武昌紫阳湖畔，是一所培养女子师资的专科学校。这所学校自1909年（清宣统元年）创办始，就向学生灌输"三从四德"的腐朽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校规束缚学生的身心自由。"五四"运动后，校长王式玉和部分教员仍满脑子封建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严禁学生自由通信，禁止读新书报，更不许过问政治，几乎把女师办成了一座修道院。

但是，"五四"运动的浪潮是无法阻挡的。它越过女师的高墙深院冲激着学生的思想。特别是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共产党人到校任教后，先进思想极大地触动了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师学生。他们成立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思想迅速觉悟起来。她们开始进行自身的解放斗争，纷纷向父母要求解除包办的婚约；剪除长辫子，蓄短发；敢于触犯束缚他们的校规，不经批准就径自出入校门；还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1921年11月，为庆祝"太平洋会议"开幕，他们上街游行，发表宣言，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校方。

女师学生的变化引起社会上封建势力和校方的不满。他们将此变化归罪于新聘的教员，并首先从刘子通开刀。1922年寒假期间，校方以宣传"过激"的"事名"为由，解聘了刘子通。开学后，学生们十分气愤，在"妇女读书会"成员夏之栩、徐全直、庄有义、杨子烈、陈媲兰、袁溥之、袁震之的带领下到校长办公室，质问王式玉为什么解聘刘老师，要求把刘老师请回来，否则不上课。王式玉拒绝了学生的要求，遂酿成罢课风潮。但是校方采取分化手段对付他们，提出愿意罢课者签名，结果只有夏之栩等12人签名，只好复课。斗争无经验，不会做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

初次罢课斗争失败了。

但是夏之栩他们并未甘心，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上述7位同学与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刘昌群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团的组织，成立了团支部。董必武、陈潭秋等党的领导人也常来对他们加以指导，商讨斗争方法，思想上更加成熟。他们把各年级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还向教育界提出改革教育制度，赶走八股教员，活动十分活跃。

学生们的觉醒和激进活动，使封建卫道士们惊慌不安。为了杀一儆百，1922年暑假，女师校方以让他们转学为名，开除了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义、陈媲兰和袁溥之、袁震之7位同学。

暑假过后，学生们纷纷返校，徐全直等5人照常入校。进步青年李文宜、戚无德联络了一批同学，告诉大家学校开除了7名同学是错误的，鼓动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就这样，当校方挂出开除学生名单的牌子时，李文宜和兰淑文带领同学冲进了校长室，要求他收回开除学生的命令。大家义愤填膺。李文宜就带头高呼："打倒教育界蠹贼王式玉"等口号，并摘下牌子，拿到王式玉的面前，摔在地下，踩得粉碎。

接着湖北省教育厅也挂出了开除夏之栩等5人的牌子，当局的横蛮行为激起了同学们的强烈义愤，她们毅然举行游行示威，并来到省教育厅请愿。他们冲进教育厅各办公室，打开全部电灯，席地而坐，表示这场斗争是光明正大的。

女师学潮在武汉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武汉学联率先发表宣言，号召武汉中学以上的学校全体罢课，声援省女师学生。许多师生、家长、工人和店员纷纷带着点心和水果到教育厅慰问，鼓舞他们的斗志。

女师学生在教育厅静坐坚持了两天一夜，但教育厅当局仍拒绝同学们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局势，这样僵持下去对学生不利，于是董必武、陈潭秋便发动陈时、李汉俊、李麟方、刘觉民、袁达三等社会名流出面斡旋。结果，校长王式玉引咎辞职，被开除的5名学生离开学校，另找教员给他们上课，毕业时发给毕业文凭。（陆川）

断子绝孙的刘桂狗

1913年，辛亥起义后任湖北第四师师长的杜锡钧，调任汉口镇守使。使署下设稽查处，其主要任务是查缉盗匪案件和镇压革命党人。担任稽查处长的就是汉口有名的流氓头子刘桂狗（本名刘友才）。

刘桂狗是在汉口熊家巷、苗家码头长大的，从小流氓成性，与熊家巷一带的小流氓结成百余人的团伙，人们侧目而视，称为一百个"小老子"。刘长大成人后，开始在沿江码头招摇撞骗，盗窃财物，成为河码头的"大摆队"（即头头）。从在木船上小偷小摸发展到盗窃轮船上的整件货物。

当时，英、美、法、德、日、俄、荷7国的货轮也常发生整件货物被盗窃事件。各国驻汉领事都知道刘桂狗是个著名的地头蛇，对沿江码头情况熟悉。于是请他担任7国"包打听"（即侦探，稽查）。从此，刘桂狗名声大振。他通知其党羽，以后不准偷外轮上的货物，因此，刘桂狗深得7国领事的信任，给他奖赏，并要他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刘也甘心为虎作伥，堕落为民族败类，洋人的忠实走狗。

汉口镇守使署稽查处成立后，刘桂狗因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辛亥起义元勋孙武的部下，又是7国"包打听"，跟洋人关系密切，而当时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和杜锡钧都要跟洋人打交道。因此，刘桂狗成了稽查处长的合适人选。虽然刘桂狗流氓本色未改，声名狼藉，却正好"以毒攻毒"，利用他熟悉流氓帮派盗贼内幕的有利条件，便于破获盗窃案件。

刘桂狗上任后，便将手下大小喽罗派为稽查人员，形成一股强大势力，横行武汉三镇。所有酒楼、戏院、妓院、马场、架子楼（窝脏处所）以及社会上的流氓团伙大摆队、小摆队、翻戏党、拆白党，蝴蝶党等，都要买他们的账，向他们进贡财物，否则就要受到打击陷害。对于革命志士，他们更视为仇敌，肆意捕捉，宁可错杀，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掌握生死大权，能真能假，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保匪保盗，诬良为匪，三镇人民恨之

入骨，背后称他们为"鸡杂鸭杂"("稽查"谐音，喻之为鸡鸭内脏，不是正经货)。

刘桂狗当了处长，自以为身份不凡，与工商界、银行、洋行等处头面人物交往，并将所得的非分之财投资各类工商企业，取得董事长、理事长、名誉经理等头衔，并与王占元等合办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又办华商跑马场。并花极少数钱，将花楼街口的汉口大旅社霸占到手。

刘桂狗平日除好嫖妓、赌博、赛马以外，还特别爱好斗蟋蟀，凡有善斗的好蟋蟀，总要千方百计地弄到手。他打听到他的好友尹长(又是他的部下)得到一条好蟋蟀——枣青，便要尹长献出。那知尹长羽翼已丰，不买刘的账，刘怀恨在心，竟妄加罪名将尹长处以死刑。临刑前将尹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路经民生路张美之巷口时，尹的父亲在人群中大喊："尹长，放'值价'些，莫怕死！"，行到方正里口时，尹的妻子也大叫："尹长，放'值价'些，老娘不会丢你的脸！"尹13岁的儿子也高声喊叫："爹，儿子长大了还要'玩入'的。"虽说够不上"悲壮"，但也暴露了刘桂狗的狠毒无情。

刘娶的女人，人称"喜太太"，没有生育，喜太太前夫之女，与刘勾搭成奸，成为"娘做大，儿做小"，也未生育。1917年刘桂狗病死，连个披麻带孝的儿女也没有，人们骂他"绝子、绝孙、绝外孙。"

(商若冰)

活捉汉奸汪步青

汪步青，湖北汉阳人，原为国民党八十二师的一个营长。日寇进攻武汉时，他带着部下逃回汉阳，在其家乡汪家场一带招兵买马当起了土匪。日寇打到汉阳，他摇身一变，成了伪定国军的副军长，公开为虎作伥。1942年春，被我新四军十五旅全部打跨，但在日寇的扶植下，他又卷土重来，当上了伪和平救国军的军长，像一只被打过的落水狗，蹲在燕子窝一带，为日寇看守长江水运交通线。他一来，就挤掉了我方好几

处税卡。不搞掉汪步青，我军的活动就有困难。同志们撇着一肚子气，决心找他算账。

1944年秋的一天，我新四军汉沔支队，为摆脱日寇在银莲湖东的"扫荡"，便决定转移到银莲湖西去活动。

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军60多人，乘坐10多只渔船，轻快地穿过银莲湖上的烟雨，穿过芦柴林，向西划行，把敌人的枪声远远地丢在后边。快到下官棚时，支队长范敏夫突然接到尖兵船的报告："下官棚台子树上好象有哨。"一听说有敌情，每只船上的战士都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并加快了速度。前面3只小船，像箭一样同时射上岸边。

"什么人？"台子树上的哨兵，发出了惊叫。接着就是"砰"的一声，驱散了湖上的平静。

两军相遇勇者胜，支队指导员胡学思像一只猛虎，喊了一声："冲"！便领着机枪班和便衣队的十几个战士，跳下水去，扑上台坡。他抱着挺轻机枪站立着对准拥来的敌群，猛烈扫射。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遭遇战，以我军大获全胜而结束，60多个敌人变成了俘虏。

打了半天，这股敌人是谁呢？经过审问俘虏，原来是汉奸汪步青的部队。但一问汪步青在那里？俘虏们都乱了口供。这个说："我们当兵的不晓得。"那个说："刚才一起来的，现在到那里去了说不上。"也有的说："可能坐船到别处去了……。"

夜幕渐渐地笼罩了大地，牛毛细雨仍下个不停，晚风吹来阵阵凉意，分头搜索的同志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看到汪步青的影子。为了捕捉汪步青，部队就在下官棚宿了营。

半夜里，站岗的战士小许忽然发现一个黑影，他一边喊"站住"，一边提着枪飞快地向黑影逼去。黑影被逮住了，是个浑身湿淋淋的小孩。领进门来，就着灯光一看，原来是大家都认识的李静华。他向大伙一五一十的讲了他怎么到这里的经过。

原来李静华跟着一个叫汪老五的战士在我们游击队里呆过几天，汪老五牺牲后，他回了家。后来汪步青把他抓出来当勤务兵。今天刚到

这里，枪声一响，他跟着汪步青跳水到芦林里去。汪步青在水里受不了，叫他上来看看动静，他才悄悄地从屋后爬上岸来。一上岸，就被发现了。

在同志们的劝说下，李静华表示愿意引大伙去找汪步青。

警卫排和手枪队的同志们，点上火把，由李静华带路，来到湖边。他指着一片黑黝黝的柴林子说："就在这里面。"手枪队的同志们举着火把，放开嗓子高声喊道："汪司令，出来吧！""我们是范支队，出来吧！"柴林里一点反映也没有，战士们急了，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了上枪膛。这个说："快出来，新四军优待俘虏。"那个说："莫跟他罗嗦，开枪。"

"莫，莫打枪，我出，出来。"不一会，一个黑影爬上了台子。他瘦高个，尖脸，缩着头，举着双手，在火把圈中不停地发抖，并不断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这个在汉阳一带罪恶多端，万人痛恨的汉奸，就这样被我新四军汉沔支队活捉了。为表示他"愿意抗日，将功赎罪"，他当即写下了一封信，给他在上官棚的侄儿、伪和平救国军警卫营营长汪长香，要他天亮时到下官棚来接受新四军的改编。从此，汪长香的100多人枪就被改造成了抗日武装。伪和平救国军的残部，全部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陆川）

徐祝平娶日本女谍

徐祝平是湖北荆门人，曾参与辛亥革命襄河起义。此人学识阔富，文彩亦好。民国初年在东北娶日本贵族女子芳子为妻。1914年，徐携妻至北京。芳子在外交界颇活跃，与日本人来往甚密。当时日本政府"二十一条"尚未正式提出前，芳子已知道全文，不动声色地告诉了徐祝平。徐祝平密陈袁世凯，袁阅后为之大惊，并认为徐祝平消息灵通，备加赞赏，还发给他玉章一枚，嘱其今后凭此章继续进呈日本情报。徐祝平自以为可以通过芳子弄到不少日本情报，殊不知芳子在徐祝平不知不觉中也获得了更多的中国情报。

1918年，日本人在汉口创办华文《湖广新报》，由于芳子的关系，聘徐祝平为该报总经理，1921年湖北各界发动驱逐王占元运动，有关驱王的言论，受当局控制的中国报纸一概拒登。人们便把有关文章送《湖广新报》发表，一时间，《湖广 新报》成为驱王运动舆论阵地，而徐祝平夫妇因此而深得鄂人推崇。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湖广新报》是日本在中国中部派遣队的舆论机关。凡与芳子接触过的中国人，看见她雅静温婉，善于酬应，对丈夫伺候无微不至，无人不认为她是一位完全中国化的夫人。

后来《湖广新报》于1922年停刊了，但日本军政要人到了武汉，大多仍去拜访芳子。徐祝平与其他中国人把这种拜访看作是正当交往，并未产生怀疑。1928年，芳子重病缠身，徐祝平因贫困而无法请医生治疗。日本驻汉领事知道后，促令日人在汉所办的同仁会医院接芳子入院治疗。没有多久，芳子病死，日本领事竟奉政府电令亲往致祭，并为芳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徐祝平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以为这些不过是日本贵族应有的仪节。直到火化时，徐祝平为芳子整理殓衣，突然发现她的颈项间竟有一枚日本高级特务证章。徐祝平惊愕不止，与芳子同居十余年，从未看见这个东西，至此才发觉床头人实为一国际间谍，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士心）

短命的伪共和党

1940年5月的一天，在汉口兰陵路转角处一座小红楼（现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图书馆），一块写有“共和党总部”大字的招牌突然冒了出来，随后出版的《共和周刊》上，两条口号十分醒目，一条是“拥护汪（精卫）先生的新中央政权”，一条为“拥护汪先生实行三民主义。”然而，在“共和党总部”门口交叉放着的两面大旗，却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再加和平、反共、建国黄三角小旗的汪记“国旗”，而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

军政府所用过的那种"铁血十八星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况且，该党既然标榜拥护汪伪政权，为什么总部要设在武汉？既然声称拥护汪精卫实行三民主义，那么为什么要在伪国民党之外又组一个党？有这个必要吗？

这，说来话就长了。

1938年10武汉沦陷后，日寇在武汉先后策划建立了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伪湖北省政府、伪武汉参议府。在当时百业凋敝、四乡不靖的情况下，这些伪组织的财政支出，单靠营业税、田赋、牌照税、房地捐等地方税难以维持，必须依靠所谓"国税"。当时的"国税"以食盐专卖收入和鸦片公卖收入为大宗，其次是货物税、印花税等所谓统税。故在伪维持会时期就有了伪武汉盐政管理局、伪武汉禁烟局和伪武汉统税局。伪维持会取消后，这三个局由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管辖。待到伪湖北省政府成立，这三个局既不便单属伪市政府，也不便单属伪省府，于是划归伪武汉参议府管辖。但每个伪组织都可分得一部分"国税"和统税。这三个局因此而成为他们的禁脔。1940年4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准备把这三个局的收入，收归伪中央所有，这对于日军汉口军特务部和武汉的伪组织来说，当然是极不情愿的。但他们又不好硬抗，狡猾的日军汉口特务部长柴山少将便乘5月他与伪国府财政部长周佛海的谈判尚未达成协议时，勾结伪湖北省长何佩琼，策划成立"共和党"，在"国税"节余款中，划出百几十万元作为该党补助费和总裁机密费，实际则落入了他们及其他一些汉奸的腰包。因此，所谓"共和党"，不过是武汉伪组织和汪伪政府相互争权夺利的产物。

伪共和党以何佩琼为总裁，伪武汉参议府议长石星川是副总裁。其组织章程规定，总部设秘书厅和总务、财务、组织、宣传、社会、农工、妇女等七部，每部分处，处下设科，共有二三十个处，七八十个科，实际上则是个空架子，存在期间，既没有成立过一个支部，也没有登记过一个党员。在虚张声势一段时日后，12月13日宣布解散。

（朱务本）

“魔术师”顾顺章“变”成了叛徒

1931年4月初，汉口新市场重金聘请了一位名叫“化广奇”的魔术师到该园雍和厅（后改为中山纪念堂）演出。因演技高超，颇受武汉观众欢迎。

一天晚上，化广奇照常到该厅献演，当这位中等身材、身躯肥胖的魔术师一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中，他从原来“空空”的一口木箱中放出一只小白兔时，观众的掌声和欢笑声几乎淹没了整个大厅。

演出圆满结束后，他卸妆走出新市场侧门，潇洒地挽起一位等候他的白衣女郎的玉臂，径直到“世界旅馆”去欢度良宵。当他和女郎情意正浓时，几个手持家伙的便衣顺顺当当地将他擒获，当即被押到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

在侦缉处，魔术师故作镇静，质问为什么将他抓来，当侦缉处长明白无误地告诉他“顾顺章先生，我们候你多时了”的时候，这位化名化广奇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才脸色煞白地低下头来。

顾顺章，又名黎明，上海吴淞人（一说湖北人）。曾任中共中央六届政治局委员、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领导参加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曾受党派遣同陈赓同志一道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党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顾顺章调上海工作，并参加了中央特委，负责领导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由于他为党作了些有益的事，捞到了资本，便得意忘形起来。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里，他经常单独外出，寻花问柳。对他这些恶劣的行径，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但顾对党的批评阳奉阴违，继续我行我素。此次因事来汉，不注意隐蔽自己，甚至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终于被特务识破遭到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未经动刑，便将党的重要机密、重要机关、重要领导人一一和盘托出，致使中共鄂西诸县苏区及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机

关被破坏，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他还向蒋介石当面献策，妄图破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缉拿周恩来、钱壮飞等同志，幸事被钱壮飞获悉，紧急向李克农同志报警，才使顾的阴谋破产。

顾顺章被押到南京第二天——1931 年 4 月 28 日，就跑到苏州，出卖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恽于 1930 年 4 月 19 日被捕），使恽代英惨遭杀害。

早在顾顺章在特委工作时，由于顾腐化堕落，陈赓曾对何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看到顾顺章叛变。"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鉴于顾顺章叛变对党的危害极大，中共中央于 1931 年 5 月 21 日专门发出 223 号通知，号召全党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

顾叛变后，加入了蓝衣社。他野心极大，想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组织一批以叛徒为骨干力量的山头，遭到了中统头子陈立夫的忌恨。到了此时，顾的作用已完，于 1935 年被中统枪毙了。自古叛徒没有好下场，信哉斯言！

（商若冰）

柳亚子题曹立庵印谱

我国民主革命前辈、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是武汉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曹立庵先生的挚友。亚子先生长立庵先生 34 岁，两人可谓"忘年之交"。

早在 1944 年，立庵先生在重庆，就结识了亚子先生，并为他先后刻了 20 方印章，其中著名 的有"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二子居然能革命，诗人毕竟是英雄"（与郭沫若同志联句，上联为亚子先生句）、"上天下地之庐"（亚子先生和毛主席《沁园春·雪》中有句云："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和"亚子之玺 "、"柳亚子六十以后作"等。

1945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应蒋介石三次电邀赴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曾亲笔书赠《沁园春·雪》给亚子先生。亚子先生请毛主席用印，主席

说没有。亚子先生便说："我送你一对。"回到寓所急忙转告立庵先生，要他立即为毛主席刻印。立庵先生受命，连夜为毛泽东主席刻出两枚印章，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一为朱文"润之"，由亚子先生转呈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就在《沁园春·雪》的手书上加盖了这两枚印章。这次治印之后，亚子先生题诗赠立庵先生。诗为：

《再题曹立庵印谱》

篆刻雕虫是壮夫，子云识字太模糊。
秦新剧美玄文贱，抵得曹生铁笔无。
由来名士爱英雄，北海能知玄德翁。
愿觅螭章珍凤家，好教持献大毛公。

亚子先生作诗，立庵先生治印，是珠联璧合的艺术珍品。亚子先生曾为立庵先生写了一首《短歌行·为曹立庵赋》，他在诗中撷出："大儿孔文举，小儿扬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和"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等句，要立庵先生刻成两枚印章，以表示对"斯、毛真英雄"的赞美，并写来跋语，嘱曹刻在印侧："余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勒此，溯其源，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亚子先生还"虑昧者不察"，又在题曹立庵印存中写道："荒谬怜余自绝伦，斯毛并世两完人。王生罗曼祢生傲，知是前身是后身。"立庵先生根据亚子先生诗意，乃仿白石老人刀法刻了一枚印章，文曰"荒谬绝伦"，送给亚子先生。不料在"史无前例"期间，康生之流泡制了一个"反动印章案"，祸及柳亚子，株连多人，立庵先生为此挨批挨整被打成"反动分子"。亚子先生早就预言"昧者不察"，特写跋语说明。而康生之流在这两枚印章上大做文章，则是故意制造冤案，藉以整人，已经不是什么"昧者"了。

如今，康生之流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亚子、立庵两位先生合作刻治的这两枚印章，在文坛上传为佳话"。

（商若冰）

推门竟是弹冠客

"一任专员便长民，绿衣信使变财神，推门竟是弹冠客，谋道求诸粤海滨。"这首嘲讽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组织省府班底的打油诗，颇堪玩味，而"推门竟是弹冠客"一句描绘的情景，足以令人捧腹。

朱鼎卿，湖北黄冈人，与曾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及民政厅长的朱怀冰是排行弟兄。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汉口第九补给区司令的朱鼎卿突然被发表为湖北省主席，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要求他将省府班底组成人员名单于3日内报南京政府行政院。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朱鼎卿，只好请时为湖北省实业公司董事长的四哥朱怀冰和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三青团湖北支团部书记刘先云等人到汉口兰陵路湖北省实业公司办公楼来商量。他们决定由原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彭旷高任民政厅长，原邮政管理局局长许季珂当财政厅长，著名土木工程师陶述曾任建设厅长。在研究到教育厅长人选时，他们几乎一致属意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的廖啸，但廖坚辞不就。正在为难时，忽然房门一推，一个脑袋伸了进来，但旋即又缩了出去。与会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郎维汉若有所思，一拍桌子，笑道："教育厅长有了，就由刚才推门的王介庵担任。"朱怀冰等相顾一笑，竟表示赞同。于是教育厅长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介庵是湖北省教育界武昌高师派的头头之一，曾当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督学。在朱鼎卿等人协商组府的那天，他来汉口出席湖北省实业公司董事会，因咳嗽出来吐痰，四处找不着痰盂，以为室内有，便推门一望，见朱怀冰等人在座，似有要事在商，故立即缩回去了。没想到竟因此而捡来了一个厅长的职位，自然高兴得了不得。可惜好景不长，容易得来的东西失去也容易，不久武汉解放，他的教育厅长职务也如昨日黄花，徒给后人留下了"推门竟是弹冠客"的笑柄而已。

（朱务本）

张若柏得印丢命

张若柏，湖北汉阳人，清末自费留学德国，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历任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科长、参事及湖北省禁烟局总务科长等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经张在禁烟局任职时的旧交、时为日本汉口军特务部翻译的湖北黄陂人袁范宇推荐，日本特务到法租界复兴街95号张府，请张若柏出来组建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一向热衷于当官发财的张若柏竟认贼作父，甘心事敌，立即满口应承下来，唯因曾有算命先生说他命中注定不能做正印官，心里尚存疑惧，故伪维持会会长一职，他推给了浙江宁波人计国桢，而自己则出任秘书长。

1939年4月1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伪维持会结束了短命的不光彩的历史，该会原职员中90%以上失业，仅留用9人。但为日寇办事十分卖命的张若柏不仅没遭日寇抛弃，反而调入伪湖北省政府任秘书长。次年10月1日，改任伪湖北省财政厅长，执掌着"（伪）湖北省财政厅之印。"对此，据当时任伪湖北省政府科员的章沔回忆说，他去见张若柏时，张坐在圈椅里，不无得意之色。

哪知第二天（10月2日）早晨，当张若柏从寓所（原一德街俄商新泰茶行，在今沿江大道）坐上汽车开往码头，准备过江去伪湖北省财政厅时，刚走出车门即遭枪击，命中胸部，刺客则当即逃逸。等把张若柏拖到万国医院（今武汉市中医院）时，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已经断气，恰恰应验了算命先生关于不能做正印官的话。

（朱务本）

王铭章灵榇过汉记

看完影片《血战台儿庄》，我想起了抗战初期，在与那场血战有关的

战斗中，以身殉国的王铭章师长的灵榇运回四川原籍安葬，经过武汉时的情景。

1938年3月16日，日本侵略军猛攻山东滕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国民党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所部官兵，固守滕县达36个小时之久。虽然城沦身殉，但毕竟牵制住了日本矶谷部队的主力，使我第二线兵力得以从容部署，为其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举国上下，对于滕县的血战及王铭章等之殉国，给予了很高评价。

同年5月8日上午，王铭章的灵榇到汉口。大智门车站里面的两个月台上下，挤满佩戴白花的人们，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八路军代表 罗炳辉、齐光早就来了。国民党军政要人到场的有何成浚、吴国桢、郭忏等；孔祥熙、何应钦与陈诚也派来了代表。工、农、青、妇、教育、文化及救亡团体等各方面的众多代表也参加了迎榇盛典。

举行了公祭仪式后，参加迎榇的几千人将王师长遗像送到了汉口市商会礼堂，灵榇则另停他处。

市商会从大门到礼堂，搭起了素色的牌坊和天棚。礼堂里挂满祭幛和挽联，香案前放着一排排的花圈。王师长遗像的上方是蒋介石写的横幅"民族光荣"。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五人送的挽联是："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顽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和刘伯承、贺龙、林彪、罗炳辉 分别送了两副挽联。叶挺和项英送的祭幛，上书"民族之光"。礼堂门上悬着汪精卫送的蓝缎横幅"英灵不朽"。行完安灵礼后，才结束了上午的哀悼仪式。

傍晚，郭沫若以四川人的身份，对原籍为四川的王师长壮烈殉国之事举行广播演讲，由两家电台同时播出，借此激励川军全部出川杀敌。

9日上午，蒋介石亲自到灵堂致祭。

晚上，政治部在光明大戏院举行的雪耻与兵役宣传大会中，特增加《王故师长挽歌大合唱》，悲壮激昂，听众无不动容。广播电台也同时播送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挽歌大合唱，同仇敌忾的气氛弥漫于三镇上空。

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吴克坚的题为《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滕县之血战与王师长等之殉国，是以自己的牺牲换取整个战局的胜利”。

10日，王师长督战殉职之血衣运抵汉口。送到灵堂陈列。衣上血迹斑斑，碧血象征着丹心，令人肃然起敬，越发加深了对王师长的悼念之情。

11日，《新华日报》与《武汉日报》分别刊登了陈诚的《敬悼王故师长铭章》和王文撼的关于寻获王师长遗骸的经过的两篇文章。

从8日到14日，王故师长的灵榇在汉口停放一星期，综计参加公祭的有5万多人。送花圈、挽联与祭文的源源不断。

15日上午，在汉口循礼门车站的高大素彩牌坊下，由钱大钧主持送榇礼，参加者达7万多人。当王故师长的家属及41军的军部同人致祭完毕后，覆盖着大幅国旗的灵榇缓缓地移到了满扎白彩的灵车上。浩浩荡荡的送榇队伍开始出发。国共两党的党政军要人均参加执绋。所过之处，行人均肃立脱帽致敬。沿途商店和住户都摆设香案进行路祭，鞭炮一家接一家的放。

正午时分，到达江边民生公司码头，在吴玉章、罗炳辉及何应钦、吴国桢等人的率领下，依次排列的队伍举行了祭礼，中外记者纷纷抢着拍照。礼成后，灵榇移入民族轮，众多的花圈和挽联把宽大的舱房布置满了。素烛高烧，香炉里散发着氤氲馥郁的香烟，在哀乐声中，专轮启碇向上游驶去。

（徐明庭）

戴笠行宫和雨农图书馆

戴笠，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他是浙江江山人。出身黄埔军校，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后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复兴社的特务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

作使命所主任，是一个破坏革命、残害人民的刽子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戴笠手令军统局建立沈阳、北平、上海、武汉四个办事处，到这四个大城市进行"接收"。武汉办事处的主任是军统局"四大金刚"之一的黄陂人鲍志鸿。"戴笠行宫"就是鲍志鸿为了讨得主子戴笠的欢心，不惜重金而建立起来的。行宫设在旧法租界巴黎街25号(现为黄兴路31号，即湖北省新华书店办公楼)。此处原是敌伪湖北省长大汉奸何佩琚的公馆，属敌伪财产。鲍志鸿抢占这栋法国建筑物后，花了价值四五百两黄金的巨款，全面修整、粉饰，购置全套新高级家俱，满铺花毛地毯，连餐具都是从江西景德镇定制运来的。

行宫建立起来后，戴笠还来不及住过，于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而摔死。军统武汉办事处为了表示对这个特务头子的"纪念"，又以戴笠的字号"雨农"，把行宫改建为"雨农图书馆"。

雨农图书馆是一所不对外开放、没有读者光临的图书馆，实际上是军统特务的掩护所。这里经常出入的人并不多，偶尔还有小汽车，馆内到底摆设多少图书，怎么摆设的，搞些什么活动，谁也不得而知，谁也不愿也不敢去问。因而这个图书馆也就显得特别寂静、阴森可怕了。

雨农图书馆隔着一条小巷的另一栋三层楼中(即现黄兴路33号)，就是军统局关押革命志士的看守所，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那楼上打弹子。这里打弹子的人就是监视所谓"政治犯"的一伙特务爪牙。打弹子是他们在执行特种任务掩护和消磨时间的方式。

武汉解放前夕，这个"雨农图书馆"和隔壁的"弹子室"，随着军统局武汉办事处的逃跑，也就无影无踪地消逝了。解放后，这里成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办公楼，真正的文化事业办公楼。

(萧志华)

刘镇华妾与小杨月楼私情

军阀刘镇华(1883—1955)，河南巩县人，1933—1937年曾任安徽省

政府主席、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他在汉口置有寓庐，供其第三妾居住。该姨太太为刘镇华生了一个儿子，母以子贵，甚得刘镇华的宠爱。

刘镇华常在前方督战，丢下年轻美貌的三姨太独居汉上，无以消遣，每日里只往戏园观京戏。当时著名演员小杨月楼正在汉口演出。小杨月楼是一个美男子，扮像俊美，深得女观众的青睐。三姨太频往看戏，也被他搅得心旌飘摇，两人来往接触中，发生了暧昧关系，两情缱绻，周围人大多知道他俩的秘密。

绯闻后来终于传到刘镇华的耳朵里。一般说来，杀人如麻的军阀即使把不忠诚的小妾公开处死，也是没有人敢于追究的，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但刘镇华颇有心计，并不动声色，派了副官到汉口来接三姨太到前方去团聚。三姨太心中有鬼，本来已坐立不安，现见刘镇华一反以前不带家眷上前线的做法，忽然派人接她到军中小住，便知道一定是东窗事发，此去必凶多吉少。所以她在与汉口戚友辞别时，忍不住痛哭失声。

三姨太到了前方，见丈夫刘镇华并无异状，仍热情地接待她，她心中稍稍安静了些。刘镇华对三姨太说，河南家中有要事，自己公务在身，不能回家，叫三姨太回家代为料理。临行时派了两个卫士随护。离去不久，大概3人走了几十里路，卫士突然回来报告说，盒子枪走了火，弹中姨太太，当即殒命。刘镇华故作惊讶和悲痛，但发下话来，枪枝走火，是无心过失，对两名卫士未予追究。后来卫士私下告诉别人说，所谓枪枝走火，实为刘镇华唆使他们干的。

刘镇华于1937年退出政坛，1949年去台湾，后病死台北。

（严肃）

萧耀南暴死之谜

萧耀南，字珩璐，湖北省黄冈县萧家大湾（今属武汉市郊新洲县）人。北洋政府时，萧做过炳武上将军、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兼省长。

1926年阴历正月初二，萧突然在武昌督署烟榻上暴死。

萧是怎么死的？后来曾传说与其部属陈嘉谟有关。萧耀南一死，时任第二十五师师长的陈嘉谟即亲往督署逼索督军大印，于是传说萧系被人置毒于烟枪内而毒死，而主事者为陈嘉谟。其背后则有所谓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

这一传说不甚可靠。因为陈嘉谟是个大老粗，倘真奉有吴佩孚的密令，则刺杀萧耀南只需在萧逐日去督署时，在其所经过的长街上，随时可以下手，再说陈之二十五师为萧之唯一嫡系部队，萧死陈继，顺理成章，何需亲至督署逼索大印，甚至派人置毒于烟枪内。陈若逼索，反而使人认为他乃毒死萧之主要人物。此举不合情理。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萧耀南之女婿李玉珂因其妻（萧之女）病故续弦，租居武昌萧家巷22号楼下。据李对人言：1926年春节前，吴佩孚向萧耀南催逼军费，并思在鄂发行军用券500万元，又思盐斤加价。萧穷于应付，自忖如按吴所需尽情搜括，己系鄂人，日后如何见家乡父老。因而深受刺激，益以体虚外感风寒，遂在督署病倒，未及回汉口家。经西医诊治，萧不能眠，留有安眠药3片，并嘱每次只能服一片，当时萧之过继子萧福臣，也是鸦片烟瘾很大，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他觉得这样小的3片药，就是一次都吃下去，也未见得有什么效，因此就一次都给萧吃了。结果萧耀南陡转肾炎，加之安眠药中毒，心力衰竭，因而死亡，萧耀南之死，这也可备一说。

（程华）

张少帅主持球赛

解放前汉口博学中学（今武汉四中）的足球队不仅是一支蜚声武汉足坛的劲旅，而且在中南5省也颇有名气。因此便引出了一则在30年代中期张学良在博学主持球赛的趣闻轶事。

1934年初，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到了武汉，东北大学的足球队流亡

关内，也追寻少帅的足迹来到了武汉。他们是怀着乡土失陷、背井离乡的痛苦心情来汉的。那时，“博学”的足球队正远征湖南长沙，长沙4支强队轮番出战，但“博学”小将，力战群雄，过关斩将，奏凯而还。张学良听了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并想到了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的处境，便动了借体育比赛振奋人心的念头。遂把东北大学足球队请来，向博学中学下了战表，约定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举行友谊比赛。

比赛那天，风和日丽，早在开赛前的几个小时，球迷们就纷纷赶来了。位于张公堤畔宽阔的博学中学足球场，早被球 迷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来得稍晚的人们只好在张公堤上顺坡或坐或立。不少老先生还带来了茶壶酒瓶。这天来看球赛的约3000余人。好客的武汉人民既想看关外同胞与江城子弟在球场的较量，更想亲眼目睹一下张学良将军这位少帅的风采。

不一会，张学良和夫人轻车简从来到博学中学，两人仪容端庄，态度和蔼，从列队欢迎的学生队伍中，鼓掌通过。少帅夫妇来到大操场，上了司令台，满 场欢声雷动。张公堤上的人，都自动地站了起来，争睹少帅风采。只有在树上的人看得最为清楚。那时，张将军的保卫人员，看到树上有人，十分紧张，大声呼喝“妈拉巴子”，要他们赶快下来，保障少帅安全。可这些人拒不服管，双方各不相让。后经接待人员多方说明，他们是热情好客的球迷，不会对少帅的安全构成威胁，风波始告平息。

双方入场，练习攻门，银笛一鸣，双方布阵。按照赛前的约定，这场比赛由张将军中场开球，当裁判哨声吹响后，少帅用轻盈灵巧的脚法，把球 向左侧一拨，球便向中线不偏不斜滚去，观众无不齐声喝采。博学队人虽小，但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踢球技术又好，最后以头球破门，赢了东北队。满场球迷，兴高采烈，欢声震天。

那天张将军和夫人坚持把球赛看完，在运动员和裁判员退场后，才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乘车离去。

后来，少帅传话，说中学生能敌大学生，“博学”名不虚传，应予嘉奖。来年请校长带队，到东北再赛。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张将军雄

心不小，可能想从日寇手中夺回东北，恢复我中华领土。这使博学师生，十分感奋，当时有学生即兴赋诗一首云：

盘旋冲刺建头功，战场球赛本相通。

若无三千父老助，遂教胡马渡云中。

以球赛讥评时事，暗示要战胜日寇，不许敌人南下，一定得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才能达到目的。青年学生有此见解，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陆川）

夏寿康“忧容”“庸相”

民国初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因阿谀奉承袁世凯，血腥镇压反袁势力而显赫一时。1920年，徐世昌任总统，湖北人吁请“鄂人治鄂”、“军民分治”，徐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

夏寿康，字受之，号仲膺，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新洲县仓埠镇井字山村龙王墩。27岁赴京会试中进士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曾作为清廷学部“政治考察团”成员赴日本考察。1909年（宣统元年）当选为湖北咨议局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任武昌革命军都督府政事部副部长、湖北内务司长、民政长、国务院政事铨叙局局长、袁世凯政府参议院议员、肃政厅肃政使、副总统秘书兼大总统政治咨议、少卿、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平政院院长等职。

王占元本来要独揽省军政大权，对夏寿康到任十分不快，拒不移交。夏对此专横武夫，无计可施，竟在汉口租屋三间，另组设省政府，结果门可罗雀。王占元仍不放过，遇事多掣肘。一日，夏拟渡江至汉口，王遂派卫队驾车护送。刚出汉阳门时，突遭一人持手枪伏击，未中，夏之两名保镖立刻将射击者抓获，带往汉口审讯，乃王所遣之刺客。继而王又令孙传芳派兵包围省长公署，使夏不安于位。夏寿康任职150天即被逼迫下野，不久积郁成疾而终。时人对夏身居要职，却不能施展抱负以治天下而惋惜。好事者撰联讥笑曰：

夏有忧容，只为胸中心窍少；

康本庸相，况兼足下小人多。

此联属拆联中的"拆字格"。"夏"与繁体字"[illegible]"，"康"与"庸"字形似；篆文"康"字下有四点，近似四个小"人"。可谓谐而谑了。

（刘作忠）

追悼"三·一八"烈士联争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表现出空前的革命性，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重点之一。发生在1926年间的追悼"三·一八"烈士联争事件，便反映了武汉地区青年学生昂扬的斗志。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活动，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残酷镇压，死伤多人。这起惨案激起群众的极大愤怒。武汉各个学校，以为死难学生举行追悼会的形式，抗议段政府的无耻行径。4月2日，在湖北省立法政大学的追悼会上，学生送的挽联很多，其中有一副写道：

谓诸君赴汤蹈火而不辞，山岳为之崩颓，风云为之变色；

幸同志执锐披坚其未已，魔障终当扫尽，革命终当成功。

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革命青年视死如归、信念坚定的革命情怀。可是作为法政大学校长的张知本，却送了一副别有用心的挽联。联曰：

殉人以身哀稚子，

挥泪和墨吊冤魂。

意思是说"三一八"惨案牺牲的是幼稚无知的孩子，受人利用而死得冤枉。这副对联挂出后，学生们众口大哗，一致要求把它扯下来，当时任教务长的国民党人邓初民得知后，劝告学生说："张先生是校长，不好不挂他的挽联；他既写了挽联，总算是支持这个追悼会，这一点仍是难

得的。”但愤极的学生们起初还是坚持要扯掉，僵持到深夜，才勉强接受了邓先生的意见。不过他们又连夜赶写了两副对联，针锋相对地驳斥张知本，以正视听。其一为：

不失赤心非稚子，
本为国家岂殉人。

其二为：

出师未捷先为痛，
视死如归不是冤。

挽联写好后，学生们将它与张知本的挽联挂在一起。对此张氏也莫可奈何。

（朱务本）

断指争路与割肉血书
——武汉保路风潮中的动人事迹

1909年10月（清宣统元年九月）的一天，在汉口四官殿，云集着武汉各界群众数千人。只见一热血青年正在台上作慷慨激昂的讲演。讲者声泪俱下，听者群情激愤。讲着讲着，只见那一青年突然拔出刀来切断自己的手指，台上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感泣。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陶勋臣断指争路的动人场面。

事情的发生还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出现了风起云涌的保路风潮。保路风潮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铁路主权，反对清朝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场运动首先在湖北兴起，它的领导者是湖北咨议局和立宪派，但投入保路运动的则有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和商人。声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真是令人惊叹。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陶勋臣断指争路，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等等。

1909年，当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草签《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的消

息在日本报纸披露后，湖北留日学生立即集会抗议，并打电报给张之洞阻止借款，同时还推派留日学生张伯烈、夏道南为代表回鄂鼓动拒款斗争。10月2日，张伯烈和夏道南回到武昌，湖北咨议局召开千人以上大会欢迎。张伯烈在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发言，痛陈借款祸害。11月湖北绅商军学界组成了湖北铁路协会，他们有组织地开展拒款筑路斗争，频频召开讲演会，唤起民众舆论。在汉口四官殿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上，到会者近三千人，学生、军官、绅商、士兵等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演讲，甚至连农民和算命先生也登台演说。农民余民三登台演讲，洋洋数千言，慷慨激昂，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星士（算命先生）黄孝春也在会上发表演说，并捐钱四串充作协会经费。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一次保路大会上，第二十九标二营士兵陶勋臣演说时力数清廷无道，媚外辱国。说到激愤处，当场拔刀断指，以表示誓死保路的决心。这样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幕。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革命党人张振武、纪雪眆曾特地去慰问陶勋臣。纪雪眆还为此赋诗一首："三百年来痛虏氛，誓当歼贼出人群。拔刀断指意何激，再现军前南霁云。"陶勋臣断指争路的消息一经传开，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社会各界纷纷踊跃集资认股。一时间，工商界、学堂师生、新军士兵和工人市民亦纷纷认股，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千余人集资达1万多元，武昌金寿帮土工团泥木工匠3000多人，将公款7000余串认股，16家泥木作坊工人各认股1元。陶勋臣更自备资金，奔走呼号，只身到黄冈、麻城募款，为集资修路而四处奔波。

1911年六七月间，湖北省咨议局召开数千人大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其中爱国军人、学生占大多数，他们慷慨陈词，"大呼救国"。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并在此后，将十六字"制成铜版，遍载于全国报章"。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何海鸣写《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发表，鼓吹反清暴动。瑞澂阅报大怒，即逮捕海鸣、大悲入狱，并封闭《大江报》。于是舆情更为愤激，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武昌起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喻枝英）

革命党人筹款奇招

在中国近代革命党人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也有一些引人发笑的轶闻趣事。邹永成麻醉婶母，居正盗金菩萨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邹永成麻醉婶 母的故事有二种说法。

早年，湖南革命党人邹永成与黄兴、谭人凤等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但经费却十分拮据。为了筹措经费，邹永成提议绑架自己的堂弟，借此向伯母索要赎金，然后将此赎金充作活动经费。于是，邹永成按计划把迷药放入酒中，灌醉伯母及家人，待同志们把堂弟掳走后，他便装醉睡在邻室，当家人发现堂弟被绑架后惊慌失措时，他又装模作样地到处寻找，最后劝说伯母拿赎银 800 两将堂弟赎回。

另一种说法是，邹永成自日本回国后，在武汉拜访了孙武，当问及湖北革命活动的情况时，在座的焦达峰叹息道：革命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只是经费极难筹集。邹永成听后说道，我婶母有很多金饰，可设法弄些来充作经费。经过商议，约好由邹永成将自行配制的麻醉品于早餐时放入酒及馒头中，待婶母醉倒后，孙武等人便前来取金饰。结果，当孙武等如约前来，还未进门，便见其婶母站在堂前谈笑风生，吓得孙武等人瞠目结舌，暗暗叹息自制的麻醉品没有奏效，无可奈何，只好垂头丧气而归。

湖北革命党人居正盗金菩萨之举，则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大家都为经费拮据所困扰时，居正忽然想起，在他的家乡，距他家 80 里之遥的洗马坂镇上的达城庙里供奉着一尊金菩萨，便建议将此金菩萨盗来熔化，将其金子充作活动经费。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派他与焦达峰前往查看达城庙的地理位置。随后焦达峰便返湖南邀约了一

位大汉来相助，他说，此人身手健捷，定能取金菩萨出山。于是居正忙着筹备行资，邹永成等人解囊代买电筒、锥子、斧头等工具，一切准备就绪后，焦达峰等一行8人便直奔达城庙而去。他们一路兼程，冒着大雨赶到达城庙时，已是夜半时分。焦达峰等先行抵达的4人从后山坡凿墙而入，他们斩断铁锁打开神龛，却撼不动金菩萨，不得已，只好用铁锥将其底座凿空，推倒，然后拖入后殿支解。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支解下菩萨的一只手和一些小碎块。焦达峰只好命令将整个金菩萨送出洞外，等他们出得洞来时，天已破晓，乡人已早起耕作了。为避免事情败露，他们将金菩萨包好投入塘中，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取。返汉后，他们向机关部汇报了此行经过，当时有人嘲笑他们吞没了金菩萨，居正解嘲道：戏剧中有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周郎尚有此失，何况我等。

（胡永弘）

奇文共欣赏
——汉口审判厅为孀妇改嫁之判词

寡妇再嫁，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被道学家们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社会上则加以歧视，因为根据传统道德标准，"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要求妇女在丈夫死后，不是以死相殉，便是要守节至老死。

到了清朝末年，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受到西方自由结婚思潮的冲击，开始发生动摇。在刑律改革活动中，开明的官员和法学家已经提出妇女无夫和奸不为罪的意见。事实上，一些勇敢的孀妇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有藐视"守节"传统而再嫁的。这些现象反映在司法上，便有了汉口审判厅为孀妇改嫁所作的奇妙判词。

据旧报记载，湖北有一官家孀妇，依附公爹某太守住在汉口。该妇女不耐独守空房的寂寞，与外面男子租屋同居。事为公爹侦知，控告到官府，案子由汉口审判厅审理，审判厅推事章某审理完毕，公布了这样

一纸判词：

以孀妇改醮，律本不禁。况现值立宪时代，婚姻更可自由。惟尔系宦裔，当明大义，虽讲自由，亦不应越乎范围之外。如古来名儒之母，改嫁者固亦不少，然而潜逃在外，未免太不自爱。

这份判词，从法律学的角度看，是极不合格式的。一般判决书，应根据犯罪的表现和程度直加断语，先斥其不当如此，然后再定处理办法。决不能多牵枝叶，尤其不应多绕圈子，为犯罪者体量、开脱。然而这份不伦不类的判词，自有章推事的苦衷，受新潮流的影响，不能反对孀妇改嫁；依新刑律的规定，也不能给无夫与人同居的妇女定罪；但在旧的习惯势力面前，在某太守的官势面前，又不能不斥责几句。从判词中找一些理由、根据为孀妇开脱的情形看，这位章推事倒是在用巧妙的方法与顽固势力作斗争。难怪判词在报上一公布，马上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谓其"不讲法理，缺乏依据，简直是蛊惑人心"。

（士心）

急公好义的汉口商人

明清之际的汉口，是繁华奢靡的商业重镇，在世人眼里，汉口是利薮和市侩充斥的地方。然而事实上，汉口商人急公好义，特立独行者不乏其人。《汉阳县识》称，乾嘉之际，汉口市商殷盛，新建人裘行简任汉阳县令，十余年中，凡官中有事劝募于市人，无不响应，甚至称贷捐赀，以博声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答案是："盖承平时人好行义惠然也。"下面的几个事例足以说明汉口商人的义举。

汉口商人李本忠，早年来往于川鄂间经商。每过三峡，见群滩怪石嵯峨，罗列江心，险象环生。夏日涨水时，层浪盘涡，挟湍流以与石斗，船夫撑篙，稍有偏斜，就会人船撞裂，漂流千里，不知所底。到了冬季，天寒水涸，纤道出没崖石间，高者插云霄，下者濡体足，一旦牵绳断绝，万牛不能挽回，虽骨肉至亲亦无从援手。李本忠常见这类悲惨事件，颇为哀

伤与同情。他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便捐资数十万金，雇民工将横梗江心的巨石铲除，在纤道上树立木标记，以便纤夫行走。此后商旅往来，舟行上下，减少了许多危险。一人出资，众人获利，功不可没。有《平滩纪略》记其事迹。

汉口还有父子两世行义举者，那就是邬光德、邬明适父子。1727年（清雍正五年），湖北受灾歉收，四乡饥民流入汉镇。邬光德见灾民无所栖止，出资搭盖棚寮百间，使他们得以安身，又拿出大批粮食来赈济，以补官赈之不足。灾民安顿下来后，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曹庄地方濒临河水，邬光德又捐款筑长堤数百丈，并设义渡、建石桥、置义冢。他博施济众，隆冬时节施衣散粥，以拯贫民。他还捐田20石，银数百两，作为普济堂、育婴堂日常义举的经费。汉口市廛稠密，一失火则蔓延不止，邬光德出钱买民房拆为火巷，大兴巷、大亨巷就是他当年建造的火巷。1747年（乾隆十二年）以义行受到清政府旌门（门上悬锦旗）表彰。

邬明适继承父志，以捐助公益为己任。江夏（今武昌）沙湖滨临长江，遇涝灾即道路淹没，无法通行，明适捐3000两银修筑长堤10里，方便行旅。乾隆中叶，汉口两次遭到水灾，他雇人伐木建浮桥多处，使汉镇交通和商业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虽耗千金亦毫不犹豫和痛惜。遇荒年总是捐粟施粥，救济饥民。后来也受到旌表。

（严肃）

孝子里与李孝子

汉口不仅有邬光德、邬明适父子那样的两世义行，还有两代孝子。

汉口花楼街附近有孝子里，是清康熙年间黄氏两世孝子的故居。沔阳黄金阶，幼随父居汉口。事亲至孝，母亲生病，日夜焚香祷神求自代，其母竟获痊愈。后母亲去世，黄金阶手刻母亲遗像，奉祀如生前一样。按照传统丧礼，他在母亲坟前结庐而居，守墓6年（一般为3年）。世传他的孝心感动上苍，遂有白鹇来此筑巢，一根麦杆生两穗，一枚灵芝长五

茎的异事发生。黄金阶这种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表彰。庐墓期间，官府每天派人送来柴和米。后来学使王瑄又把他拔入学校，给以功名。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受到旌表。

黄金阶之子黄仪也是一位孝子。父亲重病，黄仪痛哭流涕地跪在医生面前请求救父一命。后父亲不治而殁，家贫不能安葬，他守在棺材边哀号3年如一日。既葬之后，亦结庐守墓3年。据说夜间有巨蟒守护其庐，墓周围田地里种的瓜都是一蒂结二瓜。黄仪之母何氏，29岁即守节，至50岁去世，他哀伤痛苦如居父丧，见者无不感动流泪。人们感念黄氏父子的孝行，将其住地称为"孝子里"。黄仪在1723年(雍正元年)也受到官府的旌表。两孝子牌坊建在花楼街下，咸丰年间毁于兵燹，1862年(同治元年)在汉阳月湖堤钟楼下立碑记其事，取代被毁的牌坊，使两代孝子的事迹得以流传。

可以与《夏口县志》所录上述两世孝行相媲美的，还有《汉口丛谈》中记载的李廷梓千里寻母的故事。李廷梓，字煌柱。事父尽孝，父死后丧葬尽礼。侍奉嫡母惟谨，尽量使她生活得愉快舒适。嫡母病，他祷神愿以身代。嫡母卒，亦庐墓3年。其生母张氏，早年被其父休弃离家(一说因兵乱逃散)，长期没有音讯。守父孝3年满后，李廷梓乃外出寻找生母。他徙步遍访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历时10年，终于在彝陵(今湖北宜昌)一座尼庵中找到母亲。他把母亲接回家中奉养，直到18年后去世。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得官府旌表。彭念堂以此事为题材，写了一首《寻母谣》，表彰这位孝子：

娇儿堕地呱呱哭，哭声未歇遣母出。
临别含凄摩儿顶，十步五步屡回瞩。
春花生树头，　秋叶落树根。
儿长不见母，　洒泪辞里门。
东浮三江南七泽，十载悠悠空白云。
心炼铁石衣裹土，西陵乃获慈母身。
铜山圮，　钟声起，

母与儿，　　合千里，
母既衰老，　　儿已壮齿，
负母归家补儿嬉，母悦儿还泪如水。
嘻呼嘻，　　羊跪乳，
乌反哺，　　人间乃有李孝子。

（严辟）

冯玉祥与抗到底社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出任第三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于1937年12月初来到武汉，住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其时江城的抗敌救国运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各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但对通俗文艺独有所钟，尤其是在他自己所谓作"歪诗"方面很有些力。蒋介石既然不给他具体的军职让他带兵在前方同日寇作战，那么以笔代枪宣传抗战吧。在他看来，只要"抗战到底，建国必成"，因此他邀集了老舍、柯容、老向（王向辰）、赵望云、贾午、苏子涵、宋凤等部分作家与画家，于1938年元旦正式成立通俗文艺团体"抗到底社"，并在同日出版了《抗到底》半月刊。冯玉祥为创刊号写了《献辞》和诗歌《可爱的伤兵》。主编之一老向撰写的《发刊词》表示："抗到底这个名称，充分代表着本刊的特征，我们要拒绝妥协，永不屈服"，"我们不说大话，但绝对不说软话，不说于抗战无益的话，更不为谁造消闲趣话，我们愿以血为墨，使文学化为武器赠与全国同胞。""我们都希望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都有炸弹般的力量，炸碎敌人的阵垒。"

抗到底社成立后，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的理论探讨，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广泛利用大鼓词、快板、数来宝、山歌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新内容，并在六渡桥、江汉路等闹市区举办"拉洋片"、"诗画配"等演出活动。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冯玉祥，不仅积极筹资支持《抗到底》杂志的创

办，并经常在杂志上发表一些“丘八诗”，笔伐敌寇，针贬时弊，1938年3月在汉口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了他的《抗战诗集》。他还走上街头进行宣传，约请赵望云等画家绘制一些大张的抗战宣传画，又请名作家老舍等仿照“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为之撰配一些通俗易懂、顺口押韵的解说词，放到街上让民众看，深受欢迎。

（朱务本）

七月社与时调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全面抗击日寇侵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随着北平、天津的先后沦陷，上海、南京的相继失守，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重要机关，各党各派各界著名人士、各地流亡青年云集江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数量众多的文艺社团，先后在汉出现。七月社与时调社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两个。

七月社因编辑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胡风为主要负责人，丘东平、曹白、柏山、亦门、邹荻帆、田间、艾青等人是其中坚力量。1937年9月11日，《七月》周刊在上海创刊后因时局变化迁来武汉，于同年10月16日在汉口改为半月刊继续出版。七月社以抗战为己任，在自己的刊物上公开提出：“在神圣的火线下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也得用坚实的爱憎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因此，它尽量团结“倾向上能共鸣的作家”，以刊物为主阵地，通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形式，描绘祖国惨遭日寇铁蹄践踏蹂躏的苦难，歌颂人民英勇战斗的不屈意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充满豪壮的革命激情，受到群众的欢迎。其中报告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曹白的《受难的人们》，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诗歌如艾青的《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北方》，田间的《给

战斗者》；小说如萧军的《第三代》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名篇。此外，《七月》还曾出版过两期特刊，一期是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期是纪念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的。

1938年元月，七月社曾举办过"抗战木刻画展览会"，展出抗战作品300多幅，参观者达6000人次。以后，又相继召开过3次大型文艺座谈会，邀请聂绀弩、吴奚如、鹿地亘夫妇、冯乃超、萧军、萧红、楼适夷、宋之的、艾青、田间、吴组缃等人参加，围绕"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等专题开展热烈讨论，对繁荣抗战文艺起过促进作用。

武汉时期，《七月》从1937年10月16日到1938年7月16日，共出版过3卷18期。江城沦陷后迁往重庆改为月刊，继续出到1941年9月第七集第一、二期合刊后终刊。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文艺期刊。在七月社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七月派"。

时调社是以"左联"领导的原"中国诗歌会"成员穆木天、蒋锡金、叶平林、蒲风、彭慧、柳倩、伍禾等人为主体的诗歌团体。所谓"时调"，顾名思义，就是"时代的调子"之意。时调社的目的与任务是："救亡歌曲的制作、国防诗歌的创作、通俗诗歌、朗诵诗歌、歌谣、民间俗曲的编撰。希望诗歌运动有好的开展，也想叫诗歌工作者能在救亡运动中多尽些力。"时调社于1937年11月1日在武昌创办诗歌刊物《时调》，它的宗旨是致力于诗歌的大众化工作和朗诵诗运动的开展，尽量地发抒诗人们抗战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狭隘的个人感情的复活，而是伟大的民族集体的英勇的情绪。它以冯乃超的诗《宣言》作为创刊号发刊词。在这首诗中，冯乃超大声疾呼："诗人们，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藏在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带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时调社存在期间，曾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篇，如穆木天的朗诵诗《武汉礼赞》和大鼓词《八百个壮士》，蒋锡金的山

歌《鬼子凶》，王亚平的莲花落《浦江水》，平林的歌谣体叙事诗《血泊里生长》、《我们不叫中国亡》，丁郎的歌谣《萝卜菜》、彭玲、彭慧两姐妹的民间曲调《八杯茶》、《农村妇女救亡歌》等，都是通俗流利、感情真挚、令人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诗歌。1938年5月，时调社还曾发起召开"通俗文艺座谈会"，商讨诗歌的通俗问题。发表于《时调》上的《民族叙事诗时代》（穆木天）、《悲哀的云涛》（蒲风）、《我们这一分队》（王亚平）等，反映了抗战初期诗歌创作的特点。而艾青的《诗歌的路》、穆木天的《关于抒情诗》等诗歌理论文章，则就抗战诗歌的创作，发表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时调社及其主编的诗刊《时调》，是武汉抗战初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和诗歌刊物。

（朱务本）

抗战电影与《抗战电影》

1938年1月29日，在阳翰笙的倡议下，会聚武汉的电影界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这是一个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派中政治倾向不同但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目的是要让每个电影工作者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要使每一部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武器，使它深入军队、工厂和农村，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电影的战场。

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昌正式成立。不久，原"汉口摄影场"改组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隶属由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从事抗战电影的摄制工作，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

从1938年1月至10月，通过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中制"共摄制了3部故事片和50部纪录片、新闻片、

卡通歌曲片。这些影片在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上起过良好的作用，有的还曾送到国外放映，引起了强烈反响。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舒绣文、魏鹤龄主演）系1938年1月在武汉摄制完毕，它以"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历史为背景，描述农民刘山一家，在宁静的田园生活被"九·一八"战火摧毁之后，辗转南逃，并经6年艰辛而重建家园，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没想到"八·一三"的炮声又把他这种美好的愿望化为过眼云烟，使他醒悟到中国之大，"跑到哪里都跑不了。"于是他毅然奋起，义灭充当汉奸的胞弟刘四，带领乡亲们投入了保卫土地的战斗。影片公映后，引起很大的震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消息和文章，称赞这部影片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入了我们的心坎"，是"一部崭新的国防电影作品"。它如故事片《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高占非、黎莉莉主演）、《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陈波儿、袁牧之主演）及纪录片《台儿庄歼灭暴敌》、《平型关大捷》、《上海血战史》、《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凯旋记》等等，都形象生动地向人民展示了前方的战斗生活，有力地鼓舞了军民的爱国热情和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

为了宣传抗战电影，并从理论上对抗战电影的制作加以指导，以使轰轰烈烈的抗战电影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1938年3月31日，作为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抗战电影》杂志在武汉创办，创刊号刊载的由主编唐纳执笔的《发刊词》指出了抗战以前电影艺术方向中所存在的弊端，欢呼新的抗战影片的诞生，斥责了"眼睛吃的冰琪淋，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软性电影"的恶劣影响，指出："看看别一方面罢，神怪武侠片在东北的流行，早已没有人要看的《火烧红莲寺》等等又在上海放映了，'软性电影'论者中的个别分子竟堕落到成为日本利用的工具，受日本的津贴和指使来摄制麻醉同胞的'软性电影'了。"《发刊词》最后还号召中国电影艺人"以开宋拉来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但是，总的来看，《发刊词》内容比较空泛，也没有提出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具体任务。

《抗战电影》报道了当时在武汉摄制的抗战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情

况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电影动态和消息，并在《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专题下，发表了阳翰笙、史东山、袁牧之、应云卫等10余人的讨论文章，就国防电影的提出、意义及开展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争鸣。此外，它还登载了剧照及新闻纪录片图片等共91幅，可谓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抗战电影》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抗战时期全国唯一的一份电影专门期刊，虽然仅出一期即告终刊，但在研究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其价值弥足珍贵。

（朱务本）

“好一记鞭子”
——《放下你的鞭子》在武汉街头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我国全面抗战爆发，但由于蒋介石抗战不力，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田汉、洪深、阳翰笙、崔嵬、郑君里、赵丹、金山、舒绣文等云集武汉，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利用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唤醒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当时，在汉的作家和戏剧家们，除创作和演出大量的京剧、汉剧、楚剧以及话剧外，还广泛地开展了活报剧、街头剧、独幕剧的创作和演出。其中，由崔嵬改编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特别受到武汉三镇群众的欢迎。此剧采用街头卖艺的形式演出。其故事内容主要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有一家父女逃到关内，四处卖唱谋生。有一次女儿（香姐）由于饥饿演唱不好，被老父责打，被一工人冲出制止，始由老父说明东北沦陷后敌人残暴横行、民不聊生的惨状，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崔嵬不仅是本剧的改编者，而且是主角的扮演者。他曾与陈波儿合演于西北归绥一带，还与张瑞芳合演于北平香山。由于演出成功，使这出街头小剧闻名于长城内外。在武汉，崔嵬是与当时南

京《风流剧社》的著名演员王苹合演的（王苹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名导演）。当时，他们生动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武汉的观众。有一次在黄鹤楼演出时正遇日机轰炸，但围得密不透风的观众竟不肯离去。演员们面对敌人的淫威，更是怒火中烧，坚持演下去。一位卖茶的老人上前拦住崔嵬的手说："飞机来了，你和你姑娘（指扮演香姐的王苹）快到我家躲一躲吧，我家就在那边山脚下。"崔嵬笑着回答："老大爷，我们还要演戏哩！"老人说："忙什么，躲过敌机的轰炸再出来卖艺！"老人竟以为他们真的是流落江湖的卖艺人。

此后，著名演员凌子风和黎莉莉，丁里和王苹，金山和王莹等都联袂演出这幕戏，还进行过比赛。金山、王莹演得深沉、细腻，被誉为"文鞭子"；凌子风、黎莉莉演得火爆炽烈（黎学过歌舞，武功好），被誉为"武鞭子"，都获得了银杯。他们每次动人的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每次不等香姐端起付钱的小筐筐，钞票包着的铜元就从四面八方扔进场内，落在演员的身上、脚边。他们将这些钱作为慰劳金，全部捐献给在前方流血奋战的将士们。

1938年6月10日，武汉人民为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在汉口大舞台举行文艺晚会，金山和王莹也登台演出了这出戏，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赏。

此后，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放下你的鞭子》几乎成了每个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的必演节目。武汉的《拓荒》、《友联》、《雷雨》剧社，在救亡活动中表现最活跃的学生《警钟吼声》歌咏队，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排演过此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日的作用。

此外，如《三江好》、《最后一计》等独幕剧，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把这三个戏合称为打向敌人的"好一记鞭子"：它重重地打在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身上，大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武汉的话剧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陆川）

昭文新报
——中国内地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

武汉最早的近代报刊有两种，一种是英文的《汉口时报》，又称《汉口泰晤士报》，它创刊于1866年1月6日（清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这是一份西式报纸，专供旅汉英美人士阅览。报馆设在英租界，由美国人汤普生负责编辑，富瑞德负责排印。日出4版一大张。由于当时旅汉西方人尚少，报纸发行不甚兴旺，发行两年后，因经营困难而停刊。一说至1876年（光绪二年）停刊。

另一种是中文的《昭文新报》，它创刊于1873年8月8日（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六日）。已故报刊史专家戈公振在其著作《中国报学史》中称："我国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该报创办者与主编为中国人艾小梅。他仿照香港、上海已出的中文报刊，出版了中国内地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考其报名，"新报"者，当时指为西式报纸，如上海《申报》所说："查新报之设，创于泰西，所以使下情能达，时事周知也。"用今天的话说，新报就是不同于中国传统邸抄、京报的近代报纸。"昭文"盖取《左传》上"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之义，有显扬文彩之意思。

《昭文新报》的内容以奇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用木刻活字，黑墨水印刷，为十折小型张，四六版（亦称四六栏，是当时最通行而又通行最久的版式，对开纸每面两版，每版四栏或六栏），遍售各埠。武汉向无此举，初办此报，不免人情未习，取阅者不多。后改为五日一期，改用白鹿纸，装订成书，印刷质量也有所提高。后来仍因销路不畅，经费支绌，未及一年，便宣告停刊。

《昭文新报》像最初的一滴水珠，在茫茫报海中早已无影无踪了。但当时它的出版，确是武汉一种新事物，给三镇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并开内地华人办报之先河，为草创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带来了鼓

舞。(申报)在报道《昭文新报》创刊的消息时评论说："倘能于各行省及大都会之处，遍设此馆，则南北不至有风尚之殊，山泽不至有情势之隔，将来汇而存之，可以作野史，可以备轩轾矣，岂不美哉！"

(严昌洪)

江流呜咽无处诉
——清末民初两度"大江报案"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曾发生两度"大江报案"。

辛亥革命前的《大江报》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任经理兼主编，何海鸣任副主编。报馆设在汉口新马路52号。该报每日"著论攻剿时政，鼓吹革命"，在新军士兵中声誉日增，但却颇遭官府嫉忌。1911年(清宣统三年)夏，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江报》连续刊发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乘势倡言反清革命。前文为何海鸣所作，揭露政府对外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批评国民伏阙上书作和平的反对，不足以动政府，这两种"和平"都将使中国走向灭亡。后文为黄侃(署名"奇谈")所作，认为中国已病入膏肓，和平改革固无力回天，则无规则之大乱倒可以使人民于深创巨痛中顿改亡国之观念而奋起救国。

这两篇时评无异于两颗召号人民起来进行武装革命的信号弹，使湖北当局惊恐万状，在当年8月1日(阴六月初七)由鄂督瑞澂饬令巡警道王履康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大江报》查禁，并将詹大悲、何海鸣投入监狱。

《大江报》被查封后，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有人在该报馆门口张贴许多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足见人心未死，公道尚在。詹、何二人在法庭上从容辩论，慷慨陈词。此案延至9月(七月)，汉口地方审判厅宣布判处詹、何二人各监禁一年半。追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二人始得出狱。

1912年3月，詹大悲、何海鸣等又发起复刊《大江报》，宣称"大江报卷土重来"。新《大江报》于6月10日正式出版，何海鸣任经理，凌大同、戴天仇任主笔。报馆迁至汉口后花楼街笃安里。这几位是当时激进派革命党人，他们以监督袁世凯、黎元洪为己任，遇事敢言，《大江报》成为同盟会在武汉的重要言论机关。复刊未及两月，至8月8日，又被临时副总统、鄂军都督黎元洪查封，其罪名是该报刊发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鼓吹社会主义的文章并著社评加以推崇，宣扬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何海鸣、凌大同等逃往上海。次日，黎元洪通电全国，称《大江报》诸人为妖人，攻击该报"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至于除去政府，取消法律，实属大逆不道，狂悖已极"，竟请各地对何、凌等一体严缉，就地正法。这就是第二次"大江报案"。

案发后，武汉及全国各报群起谴责黎元洪"违背国宪，蔑视人权"，呼吁取消全案。上海《民立报》刊发时评《江流呜咽》，全文如下：

去岁闰六月七日，亡清鄂督瑞澂，封禁汉口《大江报》，《大江报》之在革命史中，盖亦有纪念之价值者也；

不谓民国今日，《大江报》又以被封见告。五色旗翻，而江流呜咽如昔，言论自由更于何处求之也，悲夫！

9月，凌大同由上海潜归陕西省母，途经汉口时，为黎元洪侦知，即行逮捕，旋遭秘密枪杀，既不标真实姓名，又不公布罪状。凌大同为民国时期湖北地区惨遭军阀杀害的第一位报人。

（田雨）

华字《楚报》的创办与被封

清朝末年，在武汉有两份《楚报》出版，一份为英文《楚报》，英文名为《The Central China Post》，直译为《华中邮报》，是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英国传教士、汉口圣教书局经理计约翰创办的，报馆设在英租

界新昌里。另一份为中文《楚报》，它是作为英文《楚报》的附张于次年4、5月间出版的，由大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出面主办，冯特民经理，吴趼人主笔。华字《楚报》在香港注册，报馆设于汉口英租界。日出一大张，不久扩大版面为两大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爆发后，吴趼人辞职离汉返沪，革命党人 张汉杰应聘接 任主笔。《楚报》职员多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在冯特民的组织下，"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不久，《楚报》因披露一份涉外合同，被当局下令查封。

《楚报》所披露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合同？时人欧阳瑞骅所撰《冯特民传》记载："鄂督张之洞与英人密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特民觅得全文，竟夜抄出，悬载报端，撰文掊击。"而老报人管雪斋1936年发表的《武汉新闻事业》一文却说："光绪三十一年，他（按指张之洞）为修筑川粤汉铁路，向外商订立借款草约，尚未签定，被《楚报》探得，将全文登载，并且附加按语，说他不应有这丧权辱国的行为。"刘望龄先生在《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中采用了前说而把英人改为美国。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

查修筑川粤汉铁路借款草约事发生在1909年（宣统元年），管氏所记显然有误。至于1905年，张之洞先后签订了两个合同，一个是与美国签订的赎回粤汉铁路修建权的草约，此系好事，当不会被进步舆论评击。另一个合同是 为了交付赎路款而与英国汇丰银行签订的息借110万镑的协议。此合同虽不要回扣，也不以铁路作抵押，但仍附加了以粤、湘、鄂三省膏捐作抵，将来粤汉路或新修铁路如须借洋款或向外洋购买器材，应由英国银行优先承办，三省各继任督抚均应按此原则行事等条件。这个合同为英国取代美国插手三省路政开了方便之门，实为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终究丧权辱国。《楚报》所披露的若是这个借款合同，当事对方应为英国而不是美国。看来，欧阳瑞骅的记载比较可信。

张之洞自认为这笔借款"不折不扣，不以铁路作抵"，"借款方法，甚为公道"。而《楚报》却作为丧权辱国的行为加以抨击，当然会触怒张之洞。张之洞以"泄露机密"罪名，札饬夏口厅严办。华字《楚报》在创办未

久即遭查封，主笔张汉杰也被判处10年监禁。诚如管雪斋所言："汉口报纸报人不好的遭际，这便是第一次。"

（士心）

"现世报"与《现世报》

"现世报"是武汉的一句俗语，它来自佛教的"现世现报"，或称"现报"，原指人们所作善恶之事得报于今生今世。而俗语中的"现世报"多含贬义，谓做了坏事之人，不待来生，现世就会得到恶报。也有将此三字理解为"献世宝"的，谓活宝以丑态献之于世。世俗于小儿嬉戏时，观其涎脸顽皮之态，常常笑骂曰"现世报"，表面好象是在骂他，其实含有喜欢的意思。

清朝末年的武汉报人，不知是哪里来的灵气，用"现世报"做了一种报纸的名称。1906年12月11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凡订阅了《公论新报》的读者同时收到一份《现世报》。这是一份什么报纸呢？纳闷的读者读到题为《诸君请看最有趣最可笑之现世报》的出版广告时，疑窦乃释。该文称："今本报用之（按指"现世报"三字）为名，盖以笔墨为嬉戏，博阅报诸君之一笑。可以破闷，可以消闲，非玩世不恭之谓，亦非侮弄当世豪杰之谓也。庄子之言曰：道在牛马，道在屎溺。齐髡之言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优孟以谲谏著，东方以诙谐见。太史公谓：谈言微中亦可解纷。诸家之言，即本报之宗旨也。"原来它是一种以登载小品文字与妓女广告为主的一种"花报"。该报日出一张，主要栏目有要电、游戏文章、齐东语、小说、词海、世说、楚词、花史、笑林、图画等。由蔡萼仙主办。报馆附设于《公论新报》馆（汉口熊家巷后正街）内。创刊时，免费随《公论新报》送阅15天。所以《公论新报》的订户也收到了《现世报》。

这种"花报"，格调很低，说好听点是消闲小报，说难听些就是黄色新闻，或嫖界指南。在此之前已有日报增设"花事"栏目以吸引读者，而

以"花事"为主旨的"花报",《现世报》可算武汉第一家。此后《繁华报》、《游戏报》、《花世界》、《花报》、《自由花报》等等,层出不穷。这是报纸商业化趋势的必然结果。

而到1911年8月(清宣统三年闰六月),又有人看到一种名为《现势报》的小报,同样地专载游戏文章及花丛轶事,但却标榜"点缀风雅,维持社会"。从其转载《中国商务日报》的论说《国有国有,只怕变之外国所有》来看,不知是否受时局的影响,办报人想触及点时势(现势),遂把《现世报》易了一字而成为《现势报》。由于转载的那篇社论以激烈的言词鼓吹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被汉口当局以"淆乱政体,扰害公安"的理由传讯该报经理邓作云,报纸也随之中止了发行。

(山风)

王国光与《汉口中西报》

王国光(1873—1939),字华轩,号凤文,黄冈人,清末秀才。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受改良主义影响,在汉口开办了维新印书馆,后又从事报业,先后独资创办了《武汉小报》、《汉口中西报》、《汉口中西晚报》、《汉口日报》;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才辍业。他的报人生涯长达35年之久,是武汉报人中卓有成就者。

《汉口中西报》是湖北历时最长的商办报纸,创办于1906年,报馆设在汉口花楼正街宝顺里。该报前身是德国人经营的英文《汉口中西捷报》的中文版,王国光接办后,将它与自己创办的《武汉小报》合并,独资经营,自任经理。

以"开通风气,提倡商务学务"为主旨的《汉口中西报》,共开辟了上谕、论说、译电、时评、演谈、本省公件、紧要新闻、内国纪闻、外国纪闻、本省纪闻以及短篇小说等11个栏目。该报"注重世界知识",把国际要闻列在重要篇幅,以唤起国人注意。此外,以营业为目的,用大量的篇幅刊登广告和言情小说,发行文艺副刊《汉口见闻录》,随报分送,不取分

文。所刊多为趣味性文字，以招揽读者。如1911年8月19日刊登讽刺视学员的打油诗："某某视学员，终日吸洋烟；去岁曾关店，今年又卖田。艳妻有孪疾，哲嗣患疯癫；真道无因果，一门十不全。"该报还在报头上刊载报道节气的"时宪书"和报道气候温度的"风雨表"。该报由王氏自办的维新印书局印刷，每天出版两大张。

辛亥首义后，清军南下进攻武汉，在汉口放火，该报馆毁于大火而停刊，1913年9月15日复刊，报馆改设于后花楼街百子巷内。

《汉口中西报》发行量在全国居第六位，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它曾作为武汉当时参加全国新闻团体的唯一报馆，于1910年9月出席了中国报界俱进会南京成立大会，1928年5月，又作为万国新闻博览会武汉报界唯一参展者，出席了在德国科隆举办的博览会。

1916年秋《中西报》发行三千号，举行纪念，并发行专刊，大总统黎元洪书赠"觉世功深"匾额祝贺。1936年11月28日，《汉口中西报》特发《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刊》，隆重庆祝发行满万号，社会各界著名人士亦纷纷著文或题词，以示庆贺。于右任题词为"万志竞向"，张学良题"声名洋溢"，李宗仁题"唤醒国魂"。武汉沦陷前夕，《汉口中西报》被迫停刊。

自1903年独资创办《武汉小报》到1917年创办《汉口日报》，王国光办报经历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开创了武汉报业史上私人办报历史最长的记录。

王国光办报始终坚持"纯粹商办性质"，"绝不卷入政潮之漩涡"，坚持独资经营，从不接受官府、政团的津贴。因此他能经营30余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胡永弘）

《江汉日报》插图讽时政

清末《江汉日报》是一份内容激进，倾向革命的报纸。1908年3月

17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正式创刊,姜旭溟经理,金缄三、胡石庵、公无等编撰。该报栏目很多,尤以社说、调查、小说、插画富有特色,有的放矢,大胆泼辣,被誉为汉上报界之"诤诤者"。当时政治漫画兴起不久,该报以生动形象的画面和简短通俗的说明吸引了大批市民阶层读者。据刘望龄编著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的介绍,《江汉日报》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刊登了不少政治倾向很强的漫画,似投枪、匕首,使当道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使民众受到教育和鼓舞。下举各例,选自《黑血·金鼓》所著录。

同年3月25日(二月二十三日),插画为一士绅,手牵一断线风筝,风筝上写"求开国会",题诗为:"风筝断线仍无主,国事教侬唤奈何"。讽喻国会请愿运动在清政府的阻碍下一无所获,前途渺茫。

3月27日(二月二十五日)刊发政治讽刺画《立宪海》,画两河汇入大海,河标"专制河",海署"立宪海",上题诗句:"滔滔东逝咽余哀,大海狂澜势不回,愿其沧瀛同一色,湛恩洋溢未须猜。"嘲讽清朝所谓预备立宪,实为专制之变相。

4月17日(三月十七日)用"同人"名义发表题为《实行之社会主义》插画,表明本馆同人所怀抱之宗旨及目的。画中为一5级台阶,顶端立一富翁,下端有一满身补丁之穷苦人手指台阶,一学子挥动铁铲铲土,铁铲上书"铲平"二字。寓消灭贫富,平均地权之深意。

4月19日(三月十九日)刊发插画《第十九层割舌地狱之惨状》,画面为一刽子手挥刀割舌,刀上书一"律"字。暗寓《大清报律》,被宰割者四,一言"我这舌头拼着你割了吧",一言"我久已无有舌头了",一言"我虽有舌头,却是一张不说话的哑巴嘴",一幼童吓得掉头逃跑,狂呼:"怎么了,快跑去找一个西医来医舌头。"此画嘲讽《大清报律》将舆论打入最底层地狱。

5月4日(四月初五),日本帝国主义借朝鲜移民问题侵占中国领土间岛的事件发生后,连日刊发政治漫画,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其中一幅上画毛茸茸的大魔爪,下画祖国美好山河,上书"会看巨灵手,攫此山河

去——因间岛事感作”。另一幅为花柳低垂，圆月斜挂。上题诗曰：“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一月空圆”。隐喻祖国山河破碎，惨遭帝国主义掠夺。

5月22日（四月二十三日）刊发胡石庵诗画，画面为一木残枝，花朵凋落，题诗曰：“恨煞东风无道理，偏向残枝着意忙”，评击美国虐待华工。

《江汉日报》因所刊插画参预现实政治，鞭挞当道，具有浓厚的反帝色彩，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从6月9日（五月十一日）起，被迫取消“插画”专栏。至8月14日（七月十八日）《江汉日报》终被清廷饬令湖广总督陈夔龙查禁。（士心）

南洋大楼

座落在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下首、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它始建于1917年，1921年竣工。整个大楼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有5层，系水泥钢筋结构，墙壁以麻石砌筑，十分坚固。大楼坪台上中有一尖顶，两边各有一圆顶，为汉口的西式楼房之一。

南洋大楼原是南洋华侨简氏两兄弟所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所在地。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了汉口。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南洋大楼成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即设在此楼。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这里举行，从而谱写了一段国共合作的光荣历史。

武汉沦陷期间，南洋烟厂拆迁到重庆营业，汉口的生产完全停顿，其在硚口仁寿路的厂房和南洋大楼均被日军占用，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得以收回。

武汉解放后，南洋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其业务迁至硚口烟厂内合并办公，改名为“武汉卷烟厂”。南洋大楼成为

烟厂职工宿舍。1959年6月被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洋大楼内职工宿舍迁出，在1986—1987年间修葺一新，设南洋商场、大华饭店、大华歌舞厅于此楼内。入夜灯彩辉煌，白天人流如潮，成为中山大道上热闹处所之一。

（朱务本）

武汉新式旅馆第一家
——汉口大旅馆

辛亥革命前，汉口接待过往旅客的处所只有旧式的旅栈、客栈、号栈，所有留宿旅客都需自带行李，栈内只提供房间、床铺、桌椅、灯水，设备极其简陋。

1913年，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的部下、"四堂"之一的刘玉堂（另三堂为丁笏堂、汪性堂、杨爱堂）等设新式旅社，汉口才开始有近代新式饭店、旅馆。

刘玉堂在辛亥革命前开办过"新大方楼"，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他凭着开旅栈的经验，一面极力怂恿孙武出面号召股款；一面联络武汉稽查处长刘友才（即刘桂狗）出面组织人员。刘玉堂以为，孙、刘（友才）二人均有社会地位，绝对无意经营此项业务，事如办成，经理一职非己莫属。所以在筹备期间，以刘玉堂出力最多。

三人商量同意筹建旅社之后，一面收集股金，一面选定后花楼口（今江汉路花楼街口）为建旅社地点。这块地皮为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所有，因债务关系，被"刘票债权团"所掌握，不能变卖，只能租用，当时议定租用期为30年。就在这块地皮上，兴建5层西式楼房两幢，分为东西两栋：东边的是正屋，较为宽敞，为旅社本部；两边的为"西楼"，房屋较为窄小。屋顶有露天花园，建有亭台楼阁，宛如空中仙境。全楼用电梯上下，是为汉口各高层建筑有电梯之始。旅社建筑完工后，定名为"汉口

大旅馆”，屋顶花园称为“楼外楼”，有杂耍、清唱、茶社、酒厅，已具备游戏场的雏形。这在汉口也是破题儿第一遭。

至于旅馆房间布置，两幢总共有百余间，所有陈设，均是刘玉堂从上海、广州各地选购，有铁床、沙发、红木和柚木家具，富丽堂皇，这在汉口旅馆业中也是第一流的。

汉口大旅馆款金总额为国币 2 万元，除孙武、刘友才、刘玉堂三人自认相当数目外，其重要募股对象为“华商总会”（系夜总会性质，专以赌博为唯一消遣）的一伙人，多半是洋行买办 之流，刘友才亦为其中一员。

旅馆于 1913 年正式开业，刘友才自任经理，拟以刘玉堂为副经理。刘玉堂大失所望，不肯就副职。但刘友才官居土皇帝——武汉稽查处处长，玉堂也不敢得罪，只得悄悄离开汉口大旅馆，不敢预闻其事。

当时，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其军需处长魏联芳常常往来于该旅馆。其他一些军政要员如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云、夏口县知事侯祖畬等，也每晚来旅馆相聚，而所有往来汉口的北方军人，亦每每下榻该旅馆，无形中俨然成为军人俱乐部。在王占元督鄂期间，所有政治上的一切罪恶勾当，如卖馆、包税、行贿、刺探军情、结党营私均出自汉口大旅馆。

1918 年刘友才病死，刘玉堂以为该旅馆有隙可乘，便怂恿孙武出面邀集各股东开会，成立董事会，公推孙武为董事长，刘玉堂为经理，于 1919 年元月接管 汉口大旅馆，刘玉堂终于取得了 5 年来梦寐以求的经理职位。不久，孙武、刘玉堂因争权夺利而倾轧。当萧耀南继 任湖北督军时，孙便向萧耀南密告，说刘玉堂是诈骗其侄萧炳臣的“翻戏党”的幕后操纵者。于是萧下令逮捕刘玉堂，刘闻风逃往上海，孙武遂以董事长身份接管了汉口大旅馆，派邓杰卿为经理，实际掌握了该旅馆的全部财产和经营大权。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汉，孙武亦避居上海。武汉的烟土大王、以旅馆事业托黎斯自命的赵典之乘机而入，他以极低价邀收汉口大旅

馆股票，并联合周星堂接管了汉口大旅馆，改名“扬子江饭店”。

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该饭店，改办“军人饭店”。后拨交地方经营，改名“人民饭店”。近年来，政府投资将该店修葺一新，这家近80年的大旅馆旧貌换新颜。

（商若冰）

璇宫饭店今昔谈

位于汉口江汉一路的璇宫饭店，是一家久负盛名、迄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专门接待国际旅游者的三星级涉外大旅馆。这家饭店，是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汉口华商总会于1928年联合投资、由景明洋行外国建筑师事务所仿照上海永安公司布局设计、汉协盛和正兴隆两家营造厂承建的。1928年开始施工，1931年落成开业。整个饭店为5层钢筋水泥混凝土框架结构，顶层平台建有标志塔。沿江汉路一侧的三层为新华百货公司（今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沿江汉一路一侧的一至四层为璇宫饭店，第五层为“凌霄游艺园”（今璇宫舞厅）。内部设备先进，服务配套，有两部电梯上下，设有中西餐厅、会议厅、弹子（桌球）房和带卫生间的高级客房、全店安装了暖气系统，为汉口第一流的大饭店。

该店讲究服务质量。30年代初，饭店员工就规定要穿工作服（当时称“号衣”，纯白色，左胸印有工号）才能上岗服务。客房免费提供茶叶、火柴、手纸，服务员可为顾客代购日用品或代办其他事宜，饭店还为旅客提供洗衣服务。饭店环境幽静，卫生条件上乘，旅客确有宾至如归之感，饭店营业兴旺，长盛不衰。

璇宫饭店原为集资合股兴建，其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产权为合资不动产，按股分红。由于各种原因，曾发生多次股权、产权转让。最重大的一次是1936年，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以国币128万元转租给中国银行信托部。当时中国银行直属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实际为宋子文财团所把持，璇宫的资产遂由民族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1938年10

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占领了璇宫，该店被迫停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官僚和帮会势力支持的万少珊接管了饭店，万自任总经理，恢复营业。1949年春，武汉即将解放，万少珊出走，童伦之、蔡楚藩分任正副经理，维持营业，直到武汉解放。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5月26日璇宫作为官僚资本由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童伦之、蔡楚藩向交际处办理了移交手续。从此，璇宫饭店开始了新的历程。

璇宫饭店联系着历史：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该店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 代表马歇尔等三人组成的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来汉，办公地点就在璇宫饭店。1950年以后，多次接待外国政府代表团、歌舞团、体育代表团和外国专家。多次为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服务。还派出优秀的厨师和服务员到北京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处服务。璇宫饭店生意越做越活，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老店焕发了青春。

（商若冰）

宝庆码头与宝庆会馆

清初，汉口已具商业城市雏形，为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各地结队驾船而来的客商，因同乡、同行等各种关系形成帮派，并在长江和襄河（今汉水）沿岸抢占码头。嘉庆初年，由湖南宝庆府所属邵阳、武冈、新宁、城步、新化等县来的船帮（宝庆帮）就在长江汉水交汇处、龟山头斜对面的汉口岸边辟有码头，这是汉口的宝庆码头。此外，在月湖堤、鹦鹉洲、白沙洲，宝庆帮也建立了码头。

汉口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即为徽帮（安徽人）所据。嘉庆中叶，宝

庆帮青年船民何元仑出谋划策，运动清廷侍读学士、新化人刘光南，勾结地方官府，圈占大水巷附近河边方圆三衙之地，作为宝庆码头用地和宝庆帮船民居住区。徽帮不甘，数次寻衅，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到1856年（清咸丰六年）何元仑在湘军将领曾国荃、刘长裕的支持下，纠合船民，大败徽帮，并乘机扩大地盘，把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大片河岸土地据为己有。但冤冤相报的结果是械斗持续不断，直至武汉解放才告结束。

道光年间，汉口宝庆码头区域，已有数千居民。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何元仑又发起筹建了宝庆会馆。使日益增多的宝庆帮船民结成一个团体。会馆为长方形的古三进式结构，坐西朝东，前门在宝庆二街，后门在板厂一巷。大门上用麻石板雕刻"宝庆会馆"四个大字，每字一尺见方，正楷书写。大门两侧是商店，为会馆所设。进了大门是操场，为舞龙灯、演戏看戏之处所。操场后面是会馆办公楼，中间是大厅，两边是二层木结构房屋。办公楼后是天井，天井两侧是连接办公楼的楼房。天井后面则是学校。

会馆成立后，选举何元仑为首任会长，并设有庶务、管账、文牍等协办会馆的帮内事务，掌管码头财产的管理、洽谈生意、抢夺活计、争夺码头、开办学堂、扩建住房、济助同乡、安葬死者等一切重要事宜。近90年的惨淡经营，使码头日趋繁荣。1937年，汉口宝庆码头出售商品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价值近300万光洋；人口达四、五万。当时新化县城才3万人，宝庆码头人口超出新化县城，地盘也比新化县城大，因此人们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而宝庆人则不无得意地哼着"头顶太阳，眼睁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的歌谣。

抗战爆发后，汉口宝庆码头船只多数被征军用，绝大部分船民迁回湖南，会馆活动减少，码头日渐衰落，解放后码头才获得新生。

（朱务本）

“瓷瓦描青”的万寿宫

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所描写的“瓷瓦描青万寿宫”的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位于今武汉市第七中学所在地，它是在清康熙年间，由江西南昌、临江、吉安、瑞州、抚州、建昌六府在汉商号集资建筑而成，为旧汉口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建筑物。《新生月刊》曾这样描述道：汉口的会馆建筑最为宏壮者，一为黄帮的帝主宫，一为江西帮的万寿宫。今之万寿街即因万寿宫得名。

相传万寿宫是祭祀在江西治水有功、造福人民的许逊（号真君）的宫宇。关于许逊治水，民间有这样的神话般传说：许逊少时的同学在河里洗澡，该生口吞天上降下来的红宝珠，后来变成一条孽龙，连年作怪，使洪水泛滥，五谷淹没，房屋崩坍。正在山上修道的许逊闻讯，急赶下山，在南昌与西山之间，与孽龙展开了一场恶战，终于制服了孽龙，并用铁链将它锁在西山古井内。此后，地方连年太平，五谷丰登，人民为表谢意，乃兴建宫宇，取名万寿宫，尊许逊为“福主菩萨”，万世祭祀。因此，天下的万寿宫并不只一个，汉口的万寿宫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汉口万寿宫占地约4000平方米，结构简单壮硕，体型简朴而气魄雄伟。因江西产瓷，故墙壁屋顶大都使用瓷制品，色彩鲜艳，金碧辉煌。连瓦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大门两边宫墙突出，对放着两尊高大的石狮。门上面是雕刻有“万寿宫”大字的大理石……进得门来，是大舞台，台前有大天井，可容纳观众上千人。宫宇中间，正对着门的大殿是万寿宫，左为仁寿宫，右为扶桑宫。万寿宫供奉着福主菩萨，龙凤雕刻极为精细，帏帐华丽。一对锡制插烛座子，足有一人高。大型铜铸香炉和铁铸宝塔上铸有诗文，四周圆柱上有壁画和墨书题记，古色古香，瑰丽雄伟，再往后走是小宫殿、小花园、假山荷池、亭台楼阁……景致十分优美。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占汉口后，东王杨秀清

曾住在宫内，处理军政事务。1934年，大殿被国民党军队放火烧毁。抗战期间，此宫又遭到日机轰炸，受到彻底破坏，幸存至今的只有两株高达20余米的古银杏和半块 立有规章制度的石碑。今日七中的教学大楼全是解放后所建。

（朱务本）

中国最早的地图出版社
——武昌亚新地学社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地图的研究及其应用。早在公元前800多年的西周初年，我们的祖先就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用它来选建洛阳的城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图，但是说起我国最早的地图出版社，则应为近代才出现的武昌亚新地学社了。

武昌亚新地学社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社址在武昌胡林翼路（现为民主路）196号。它前后经营了54年，直到1953年与国内10余家私营地图社合并，在上海成立"地图出版社"后才停业。

亚新地学社的创始人是湖南新化县人邹焕廷，清朝末年，其堂叔邹代均，从英国归来，本其所学，在武昌创立"武昌舆地学会"。当时邹焕廷在这里做编印地图工作，由于他精明能干，勤于钻研，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为了发展邹家的地学事业，他意欲独立开办编印地图的机构，在邹代均的同意和资助下，筹款5000元，携赴日本购买机械器材。回来后即创办"亚新地学社"，社名的由来，是取"亚洲"和"新化"之首字。

亚新地学社初建时，因陋就简，规模很小，除有100平方米的厂房外，仅有两部手摇四开的落版石印机，由学会提供资料参与编纂地图。印刷方面，则由其家人亲戚自行操作，不支工资，艰难创业，形成家庭工厂。

此社的第二代继承人是邹焕廷 的儿子邹伯庚，曾在东北某大学教过地理。他主持社务，精心细致，又善于管理，业务日见发展。第三代是

邹伯庚的长子邹新垓，毕业于清华大学地理系，担任社中编著翻译工作，颇有建树。抗战前夕，这个地图出版社已拥有280余人，成为一所专门编制和出版地图及地学书刊的出版社，还在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等地设有分支发行所，其销售遍及全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社于1938年迁到湖南新化县城西门外，新建厂房8000余平方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武昌原址。以后，它的规模逐渐缩小，到解放后，全社职工只有34人。

这个出版社存在的54年中，共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地图和地学书刊达300多种，地图有教学用图和参考用图两大类。如《袖珍中华分省地图》、《袖珍新世界列国图》、《中国析类分省图》、《湖北省明细地图》等。地学书刊方面有《地学集刊》、《世界地理纲要》等。这对于我国文教科研，特别是测绘事业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地图的普及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陆川）

洋人的俱乐部——波罗馆

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4月，英国首先建立汉口租界，到1946年2月，收回汉口最后一块租界。85年间，列强凭借武力，在汉口江岸地区先后划出了英、德、俄、法、日五块租界，并在租界内建立了各自的波罗馆。

波罗馆亦称波楼馆，即俱乐部。日本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的娱乐场所不称波罗馆，而一直称俱乐部，这是因为日语非拉丁语系之故。

波罗馆的产生是因租界建立后，外国人纷至沓来，有财政外交人员、军人、巡捕；有银行、洋行、工厂、公司的职员；有教会、医院、学校的负责人；有以上人员的家属，还有常来常往的水兵等。这些洋人大多长期过着奢侈的生活，毕竟有钱，有时间和有娱乐消遣的需要，因此，波罗馆便应运而生。

1878年(光绪四年),英租界首建波罗馆,20年后,俄、德、法波罗馆与日本俱乐部相继开办,其具体地址是:英波罗馆在今鄱阳街与南京路交叉处西南角,市二医院职工宿舍区;德波罗馆在今洞庭小路5—7号;俄波罗馆在今鄱阳街兰陵路口东南角,鄱阳街小学北侧;法波罗馆在今胜利街车站路口东北,铁路职工食堂所在地;日本俱乐部在今胜利街山海关路口东北。各国波罗馆均拥有一批会员,日本俱乐部有会员70多人,英、德、法、俄波罗馆有会员300多人。

波罗馆设施豪华,各馆间争奇斗富。一般都设有弹子(台球)房、牌室(打扑克或轮盘赌)、滚木球(保龄球)房、板球房、酒吧间、餐厅、图书室、理发室和游泳池等。后又有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足球场等。也有教授汉语及讲学场所。日本俱乐部有击剑房、弓道(射击)房和棋艺室等。英国波罗馆还有兵器陈列室,展出英国兵器的发展历史和先进武器。其目的无非是炫耀其老牌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威力,也可以起到军火广告的作用。各馆、部允许他国侨民入内活动,唯独不让华人入内。

各波罗馆、部既供洋人男女老少闲时娱乐,全家欢聚,也是洋人宴请、谈生意和互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场所。

洋人在波罗馆玩尚不过瘾,1904年,以英侨为首的法、德、俄洋商合组为四国俱乐部,在租界外今解放公园一带购地800亩,创建"西商跑马场"。跑马场和波罗馆不同之处在于:它允许和欢迎中国人前往观赛和参与赌博。一些中国人有侥幸发财的心理,大购彩票、马票,使赛马会的老板大发横财。

不管是波罗馆也好,俱乐部也好,洋人吃饱喝足和玩够之后,总是要打中国人的主意的。这既是历史,更是教训。

(黄兰田)

所谓"模范监狱"

清朝末年,地方官吏对人民冷酷无情,往往滥用非刑,拷打逼供,造

成许多冤狱。湖北的官僚们也是一样，人民以轻罪被逮捕入狱，官吏荒怠不理事，案子一拖再拖，滥押久系成风。狱卒丁役则借端凌虐敲诈，索贿不得，以私刑加诸犯人亦是常事。加之牢狱黑暗，污秽不堪，故有"人民不死于罪而死于久系"之说。

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本着"恤刑狱"以"结民心"的构想，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即严饬各属改善监狱管理，指出滥押久系为虐政之一大端，"或疾疫凌虐，日久瘐毙；或废业糜费，因而破家：此虽无杀人之迹，亦与杀人无异"，要求严禁滥押久系之风。1898年，他又指示按察使对江夏(今武昌)县监狱加以改建。原监狱屋宇狭窄昏暗，犯人拥挤不堪，污秽不洁，常年疫气薰蒸，因疾病瘐毙的现象时有发生。按张之洞的要求，改造后监狱，采用西式，应该屋广院宽，通风避湿，器具齐备，整洁宽舒，与平民住房无异，使被禁押之人不受法外丝毫之苦。然而这种要求，在实际执行中，打了很大的折扣。1904年按察使司又饬令各属选择宽敞地基，建设迁善习艺所等机构，派工匠对犯人进行职业教育，通过劳动改造其懒惰之心，予以自新之路。并要求监狱和待质所(拘留所)升高地板，疏通沟道，随时打扫清洁，焚薰药料，以防疾疫。

1905年11月，在江夏县署东边购买民地，建设新的监狱。依照日本东京及巢鸭两处监狱的规模和式样设计建造，于1907年6月竣工，关于移禁、典狱、守卫、习艺、教养等管理方法、教育卫生规则，均兼采东西各国成法，作为全省监狱的样板，取名为"湖北省城模范监狱"。在这所监狱里，被押犯人的环境和待遇稍有改善，但狱吏贪墨积弊之风一仍其旧。而且，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时，模范监狱和其他监狱一样，成为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工具。

(严肃)

洋奴、洋"法"和巡捕房

租界上的巡捕房，如今的青年大多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机构。可在

当时的租界，它却是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对中国人民可以任意侮辱、迫害甚至无故杀害的"阎王殿"，人们谈起巡捕房，无不谈虎色变。

巡捕房即租界警察科的别称，科主任称大保正，协助科主任的人称二、三、四保正，一律由"洋人"担任。巡捕长则都由中国人担任，这些人都是洋奴买办、地痞流氓。

巡捕房有巡捕100余人，有时达到200余人，由中国人和一些殖民地的流亡者组成。如法国巡捕房的巡捕便是由中国人和安南（今越南）人组成的，安南人有枪，称为"手枪队"；中国人不给枪，只发一根木棒，称"警棒队"。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各国领事豢养，用以欺压中国老百姓的走狗。

巡捕房还有一些文职人员，帮助租界主子出歪点子、馊主意，法租界巡捕房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尉迟巨卿就是法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讨好巡捕房的大保正法人蒲苏鲁，千方百计地让蒲苏鲁大发"中国财"。他自己则勾结毒品贩子，在巡捕房包庇之下，推销吗啡、红丸、鸦片烟土等，从中大发横财。他还开设了皇宫舞厅（今教工俱乐部）、星光球场（今健康幼儿园）、钜源盐号，并用敲诈手段购买土地，建筑房屋。他对旅馆、妓院、烟馆每月都要收取保镖费，多则五六百银元，少者也有一两百银元。因此，他成了汉口的大富翁，是条典型的地头蛇。他娶有四五个老婆，还要去玩歌女、舞女。尽管他如此作恶多端，可是不管是武汉沦陷后的日本人，还是抗日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把他捧为上宾，原因很简单，一个"钱"字帮了他的忙。直到武汉解放，共产党掌权，他才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巡捕房镇压劳动人民的"武器"，便是那个所谓《工部局市政府章程警察附则》。这个"附则"条文繁琐离奇，人们不知怎样才算遵守了这个"附则"的规定而可免予被罚。如"附则"规定："倒提鸡鸭之类在路行走者，拘罚"；"马车夫套马不慎擦破马皮者，拘罚"；"肩挑负贩走人行道者，拘罚"；"家庭卫生不合标准者，拘罚"；"行人高声谈话或大声喊叫者，拘罚"，等等。这些条文，不但超出了违警范围，且语言含混，极尽侮

辱之能事。试问：怎样才不算"高声谈话"？怎样才算合乎"家庭卫生标准"？谁也说不清楚，说穿了不过是为巡捕随意"拘罚"找个藉口而已。特别令人不解的是："倒提鸡鸭"、"擦破马皮"亦在"拘罚"之列，难道人不如鸡鸭犬马？

更令人气愤的是："附则"还规定"华人擅入草坪（那时从今合作路江边到接通英、法、德、俄、日租界江边的草坪，内设有靠椅，类似简易公园，专供洋人散步游览之用）者，拘罚"，这和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华人与犬概不准入内的"的牌子同出一辙，把堂堂的中国人当成亡国奴了，想来令人可恼可恨！

当然，"附则"的这些条文只是针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因为外国侨民违反了"附则"，按照"领事裁判权"由该国自己处理；即使是中国人违反了"附则"，只要有钱交一点"保释金"也就可以安然无事。劳动人民违反了"附则"交不起"保释金"，就只有尝尝"铁窗风味"了。

看看这段屈辱的历史，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

（商若冰）

吴天保演《哭祖庙》

吴天保的拿手戏很多，但是，最叫座的要数《哭祖庙》。该剧的情节是：三国时，魏将邓艾攻下绵竹，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听信谗臣之言，决定开城投降。其子北地王刘谌以背城一战苦谏，后主不听，反将他踢出宫门。刘谌看到事情无可挽回，准备以身殉国，并告诉妻子崔氏。崔氏深明大义，持剑自尽。刘谌随即杀死两个儿子，跑到昭烈庙中向祖先哭诉，自刎而死。

汉剧界原来没有这个剧本，它是由京剧界传来的。清末著名的京剧改革家、表演艺术家汪笑侬，有感于国事日非，为了托古喻今，抨击当时的政治生活，才是创作了这个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剧本。他在大连、上海等地演唱这戏时，政治影响非常大。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汉口的丹桂茶园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京汉名角合演,不但营业很好;两个剧种的演员还得到了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就在这时,汪笑侬将京剧剧本《哭祖庙》送给汉剧泰斗余洪元;余洪元则以汉剧的传统剧本《刀劈三关》回赠汪笑侬。后来,余洪元在汉口担任了汉剧天春班的客座教师,把《哭祖庙》交给了他的爱徒,由三生转学一末的小天文,可惜小天文在 19 岁就死了,因此,这出戏没有在汉剧舞台上树起来。

1924 年,出科五年刚刚才 21 岁的吴天保,接触并爱了上这个剧本,认为适合自己演出。正式上演后,果然誉满三镇。抗战初期,在汉口市剧业同人组织的几十场劳军募捐义演中,吴天保一再主演《哭祖庙》,以此激励民心士气。1938 年 9 月,吴天保率领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第一队,从长沙到重庆等地,第一天的打炮戏都是《哭祖庙》。借剧中人刘谌之口,痛斥刘禅的丧权辱国,屈膝投降的行径,激发大家同仇敌忾,坚定抗日意志,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汉剧界流传的《哭祖庙》有两种脚本:一为陈春芳演出本;一是吴天保演出本。前者是将汪笑侬的原本略作更动;后者是在龚啸岚等艺术家的相继帮助下,对汪本进行删削,把原来演出时间的 105 分钟压缩到 70 分钟,显得更为精练。经过几十年反复的锤炼与加工,吴天保充分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将刘谌这个末代王孙演得栩栩如生,非常感人。

吴天保并不因为《哭祖庙》是一出唱工戏而忽视念白,他牢记梨园界的一句老话:"千斤道白四两唱",遇到念白同样是全力以赴。这出戏的定场诗和紧接着的五句 73 字的念白,吴天保处理得四声清楚,尖团分明,音调铿锵,字字入耳,把汉剧三生的念白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迎来了该剧的第一个满堂彩。

第二场跪唱的西皮垛子,运腔新颖,不同流俗,成为脍炙人口的唱段。尤其是最后一场由二黄倒板、二黄回龙、反二黄、反二流和二黄摇板等五种不同板式组合的成套唱腔,更是将生、末、净、外之长于一炉。如果演唱者的后劲不济,是难以驾驭这几十句言前辙唱词的。吴天保偏

能倾喉高歌，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越到后面越是珠圆玉润，并且响遏行云。分明只有他一个人在唱，却好象天地间尽是吴派唱腔，让你过足戏瘾。行家们都明白，反二流唱段中的去声字是不便行腔的，吴天保居然化腐朽为神奇，巧妙地利用切分音，山断云连，既中绳墨，又不板滞，准确地烘托了人物情绪。对于突破七言或十言常规的唱词，吴天保也能匠心独运，挥洒自如。例如有一句是"那时节，我的父皇，睡在怀中，昏昏沉沉，睡梦之间，直到如今，我的父皇他睡了数十年。"共计33字。还有一句是"直到如今，我父皇，焚符弃玺，反缚舆榇，率领着军民人等，文武百官，匍匐尘埃，投降邓艾，比那刘璋王更惨不堪。"长达43字。一般演员认为不好上口，吴天保却唱得跌宕有致，顿挫得宜，以情带声，借声传情，把儿子对昏庸父亲又恨又怜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不由你不为他鼓掌叫好。刘谌自刎前有一句唱词，陈春芳唱的是"你看我凤子龙孙也只这般"，最多只能博得观众同情。吴天保改为"我刘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就把在大势已去的典型环境中慷慨殉国的这位孤臣孽子的典型形象塑造得更为高大。

汪笑侬主演的《哭祖庙》是唱工多做工少；吴天保则结合剧情[illegible]和加强了做工与舞蹈身段，合着音乐节奏载歌载舞，改变了单调僵化[illegible]似清唱的表演模式，形成浑身是戏，满台是戏，开创了汉剧三生唱做并重的新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1年9月，武汉电影制片厂将《哭祖庙》与《磐河桥》作为吴天保的代表剧目，摄进戏曲艺术片《留住汉宫春》。

1962年1月，为庆祝武汉汉剧院成立，董必武赠诗有句云："尊重吴陈派，宏宣江汉声。"年近花甲的吴天保在汉口清芬剧场示范演出了《哭祖庙》。

1967年，吴天保去世，这位"汉剧大王"的这出名剧就成为绝唱了。

（徐明庭）

在汉口演京剧的第一个外国人

30年代，京剧在汉口已十分盛行。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金少山

等名演员曾先后到汉演出。汉口观众对京剧的欣赏能力已相当高，不少戏迷也能粉墨登场，京剧演员要想在武汉走红，实非易事。

1934年6月，德籍女演员雍竹君应邀从北平（今北京）来汉，在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大舞台演出11天，场场客满，一时轰动武汉。与她一同来汉演出的有谭派老生杨宝忠、龚派老旦卧云居士、杨派武生吴彦衡。他们演出的戏目有《钓金龟》、《挑滑车》、《打鼓骂曹》等，压轴是雍竹君的《贺后 骂殿》。她扮相美丽，程派唱腔韵味十足，深受观众赞赏。演出期满，又应新市场之请，加演4天。4天中，她演了《玉堂春》、《四郎探母》、《得意缘》、《六月雪》，亦是场场满座，观众喝采不绝。

雍竹君的父亲雍克（译音），曾任北平市德国驻华领事馆参赞，后在北平开设"宝珠酿酒公司"。雍竹君从小就在北平德国学校读书，聪慧过人，能讲中、英、德、法等国语言，特别喜欢京剧，幼年常到北平戏院看戏。父亲见她喜欢京剧，便请专人来家里给她教戏。开蒙老师有寿一臣、吴富琴等人。经过几年的严格训练，加上她颖悟好学，共学会50多出戏。以后，又经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指点，终于使她在京剧之国里，占有一席之地。

雍竹君不仅是第一个在汉口登场演出的外国女京剧演员，也是在我国京剧艺术中相当有造诣的女演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张定国）

"小叫天"高月楼"响"遍武汉

楚剧名家高月楼原名高雨，1908年生于湖北汉阳县永安堡。幼时家贫，流落汉口，靠捡破料度日。1919年拜楚剧名演员、人称黄孝花鼓三大名旦之一的余文君为师。余虽主演旦角，但能戏极多，教高月楼习生行，两年后便登台演出，艺名"小叫天"，主演过《安安送米》等戏，深受观众欢迎。1925年高月楼大胆创新，打破"楚剧无武戏"之说，演出连台武戏《红玫瑰》，场场爆满，"小叫天"由此响遍武汉。

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没收军阀所有的“新市场”，改名“血花世界”，共产党员李之龙担任主任。李之龙为改革发展楚剧，特在“血花世界”主办“楚剧进化社训练班”，由刘艺舟等任教。高月楼参加训练班学习三个月，深得李之龙、刘艺舟、傅心一等喜爱，被推举为楚剧同学会副会长。训练班结业不久，高月楼在李之龙等的辅导下，在“血花世界”排演时装新戏《父归》、《农家乐》等改良剧目，获得成功。

1938年，高月楼参加了郭沫若、田汉在武汉领导的“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并随“阅艺楚剧宣传队”赴川演出。在重庆6年中，高月楼演出了一批新编楚剧剧目，使楚剧在四川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被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胜利后回到汉口，同沈云陔等同台演出，声誉日隆。

武汉解放后，任武汉市楚剧团副团长。他所扮演的人物，个性鲜明，表演有创造性，被同行们誉为“性格演员”。他的代表剧目有《潇湘夜雨》、《断桥》、《宝莲灯》等。在《九件衣》中扮演的申大成，《孔雀东南飞》中扮演的焦仲卿，均获奖。

（商若冰）

花鼓戏、楚剧和沈云陔

花鼓戏（又称西路花鼓戏）从它萌芽的那时起，就被人们视为“淫戏”，受尽了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和摧残。当时地方上的恶势力勾结官府强加给花鼓戏许多罪名，用下令禁演、捕捉艺人、焚毁戏箱等残酷手段对它予以打击，使花鼓戏的声名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当后来花鼓戏演员组班来汉口时，官府竟下令不准演出。艺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托庇”于汉口租界，在殖民主义者和黑社会势力的控制下，忍受惊人的剥削，还不敢堂堂正正地标出花鼓戏的名称，偷偷摸摸地演出谋生。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汉口，革命怒潮席卷长江。当时汉口最大的游乐场新市场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接管，将新市场改名为“血

花世界”。“血花世界”的领导人、共产党员李之龙表示同意接纳花鼓戏到华界演出，由“血花世界”在三楼开辟剧场专演花鼓戏。由于花鼓戏备受歧视，所以，总政治部提出要给花鼓戏定名，经湖北剧学总会中戏剧界的前辈欧阳予倩、刘艺舟、朱双云和傅心一等共同研究，将花鼓戏定名为“楚剧”（因汉剧原名楚调）。从此，楚剧成为湖北新兴的剧种，受到湖北地区观众的喜爱。

楚剧表演艺术家沈云陔，原来也是花鼓戏演员，少年时代用过“十岁红”的艺名。1918 年前后，他由新洲原籍来到汉口，拜名丑李小安为师，从此在舞台上为改革、振兴楚剧奋斗了 60 个春秋（1978 年逝世）。

楚剧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还是一个“七紧、八松、九偷闲”的乡班子，在农村立足是绰绰有余，但进入武汉这个大城市，显然不能满足城市观众的要求。沈云陔认为：楚剧“家底薄”（这是沈的口头禅，即班社少，剧目少，传统不深厚之意），不博采众长，提高质量，就不会有生路，他与楚剧老一辈艺人在李之龙的支持下，大胆革新，曾改编了话剧剧本《父之回家》和《费公智自杀》以及整理传统老戏《玉莲汲水》等剧。正由于这样，楚剧从组织形式到剧目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个小型乡班，发展到近百人的大剧团；剧目由“花鼓戏开了锣，不是喻老四便是张德和”，发展到古装、时装、文戏、武戏、连台本戏样样都有；演员行当也由“小旦、小生、小丑”，发展到生、旦、净、末、丑一应俱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团体云集武汉，沈云陔号召楚剧艺人不仅要学习汉剧、京剧；还要学习话剧和其他表演艺术。和沈云陔经常合作的老艺人殷殿坤、高月楼、陈梅村以及中年一代的演员袁璧玉、熊剑啸、高少楼等首先起来响应，这对丰富楚剧剧目，提高表演艺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沈云陔更是身体力行，他的不少好戏如《软玉屏》（秦腔移植）、《夜梦冠带》（巴骏汉剧移植）、《杀狗惊妻》（川剧移植）、《庵堂认母》（锡剧移植）、《打金枝》（河北梆子移植）等都是向兄弟剧种学来的，成了楚剧的保留剧目，常演不衰。当然学习决不能生搬硬套。他说：“手不伸出去，就学不到别的剧种的长处；脚不站稳，根不扎深，就会被别的剧种同化。”沈云陔

提倡的这种虚心学习和善于学习的精神，不仅影响了他的同辈，而且也教育了下一代演员。那些解放后在戏校学习的学员，都把学习兄弟剧种和各老艺人的拿手好戏作为自己的必修课程。楚剧的发展、变化，沈云陔功不可没，他不愧为"楚剧新艺术的开拓者"，"振兴楚剧的改革家"！

（商若冰）

演戏的革命军都督——刘艺舟

刘艺舟原名必成，后来因用演戏来唤醒群众革命，才改名木铎，字艺舟。刘原籍鄂城，随家迁武昌。从小勤奋好学，关心国家大事。17岁那年，居然上书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变法维新。张之洞认为他有虎劲，不久，便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化专修科留学。

但是，刘艺舟并没有埋头死读书。他非常活跃，爱交游、[illegible]。很快就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一批革命志士，并加入了同盟会。他时常去看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的"春柳社"演出的新戏如《黑奴吁天录》、《热血》等，认识到艺术的魅力，便决定了走"搞戏剧，干革命"的道路。

回国后，刘积极从事宣传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戏剧活动，并在上海挂牌演出文明戏（即话剧）。演的也是《黑奴吁天录》等剧目。他演的老黑奴，真挚动人，为广大观众所津津乐道。

1910年（宣统二年），他组织剧团到北京演出，后又到大连、威海卫一带演出。他所组织的剧团，既是文艺团体、革命宣传队，也是一支革命武装。1911年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他对剧团同志们说："痛饮黄龙，光复神州，此其时矣！"便率领一支革命军从大连渡海南下到山东，占领了登州（蓬莱）和黄县，出任登黄都督兼民军总司令。不久，他就放弃这两个职位，再度来到上海，见党中人与袁世凯妥协之风甚浓，不觉心灰意冷，决心脱离政界，继续编演文明戏，在上海南市的新舞台演出。孙中山和黎元洪还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的名义送了他一张金丝绒戏幕，上面绣着"光复登黄伟人"六个大字。一时"都督唱戏"成为

佳话。

1913年，“二次革命”（即反袁斗争）失败后，刘在被捕名单之中，乃逃到日本。当时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生活十分困难，刘艺舟为了接济同志，就与日本“松竹株式会社”签订合同，邀约了上海开明同仁到日本合作演出，在东京、大坂等地上演。他编写《林冲》一剧，并主演林冲，深获日本各界好评。

1915年，刘艺舟回国，被袁世凯逮捕，袁死后，才恢复自由，继续披戏装登台献艺。他文才好，演技高，许多戏都是他自编自唱。戏文紧密地结合现实，针砭时弊，起到了潜移默化，宣传教育的作用。如他根据革命党人、山西巡抚吴禄贞被袁世凯刺杀的经过，针对湖北革命党人不团结的现象，编写了《吴禄贞被刺》一剧，并在汉口大舞台演出。他自扮吴禄贞，借临终前吴氏之口呼吁道：“寄语南方同志，革命前途，阻碍尚多，务望同心协力，切莫争权夺利，自起党争。须知洪秀全的功败垂成，就是由于内讧，我们应当引为殷鉴，只要南方同志同心同德，我今日死亦无恨。”他慷慨悲歌，冷劲苍凉地唱出了吴禄贞生前的希望和抑郁心情，很多革命党人看了这出戏，抚今思昔，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又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刘艺舟编出《皇帝梦》，在汉口满春戏院上演，自饰袁世凯。剧中对群臣劝进和袁氏恢复帝制的丑态，表演得唯妙唯肖，博得群众捧腹。但是却惹恼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竟下令逮捕刘，情事紧迫，他连装也没卸就逃走了。

此后，刘艺舟又自编自演《石达开》等剧，因其演出内容都是针对军阀官场而发，所以总不为军阀、官僚和地方恶势力所容，到头来，只有被迫出走。国民党当权时，有人劝他去谋一官半职，刘声称自己不宜做官，也不会做官，演戏还可以借舞台说说心中要说的话。

刘艺舟的一生，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正是这些坎坷的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境界愈来愈高，斗志愈来愈昂扬。他曾说：“吾心所向，提倡人权，吾志所趋，铲除国贼。人溅之以铁血，吾溅之以心血，同利于国、利于身。吾志未酬，吾心不死！吾国一日不强，吾舌一日不敝。有生

之日，即吾奔走鼓吹之年。粉身碎骨，在所不计。”他不管遭到什么横逆，始终不改变他的宗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刘通鸾）

京剧票友和票社

清朝初年，八旗子弟凭清廷所发“龙票”赴各地演唱“清音子弟书”（清代曲艺之一），为清王朝歌功颂德，此后，人们据此把非职业演员统称“票友”。许多京剧爱好者平日寻师访友，摹仿苦练，练得一身过硬功夫，务求一“露”。但他们无论登台演出，还是台下清唱，均系业余性质，不取报酬。按照习惯，人们把他们称为“京剧票友”。为方便集中研习，联络同好而组织的票友团体，就是“票房”，也称为“票社”。

京剧形成历时200多年，吸引了一大批业余爱好者，武汉地区的“票友”何止百千。他们早在20年代，就建立了“票房”，积极开展业余演出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的京剧票房（社）有汉阳铁厂、铁路、水电公司、怡社、钱业、三育、竞存、雪社、盐业、马会的致强、戊辰、精武体育会、华商总会、青年会、潜龙、雅歌集和邮局票社等几十家，还有一些成立时间不长，活动较少的票房（社）如宁汉会馆的昆曲票房等。

在这些票房（社）中，每家都有一些著名的票友，成为票房（社）中的骨干，如铁路局票房的南铁生、章晓珊；华商总会票房之程君谋；钱业公会之汪少伯；戊辰票社之万幸一；既济水电公司的余增秩和卢寿椿等。

南铁生扮相酷似梅兰芳，唱做均佳，为戏迷们誉为“汉口梅兰芳”。他的拿手戏《三堂会审》（饰苏三）、《棋盘山》（饰窦仙童）等，深受戏迷们欢迎，较之专业演员毫不逊色。30年代末，南铁生在汉口大舞台（今人民剧院）“下海”（即成为专业演员），后在天津组织“南剧团”。

章晓珊能演武旦戏，是京剧大师王瑶卿的嫡传弟子，在汉旦代王瑶

卿授徒，其功力可见不凡。

程君谋（著名电影演员程之之父）是老谭（鑫培）派正宗，除演谭派代表剧目外，且善操琴。30年代他在新市场大舞台（今江夏剧院）演出时，当时挂头牌的朱雅南（专业演员，坤旦）甘挂二牌支持君谋演出。他们会演的《宝莲灯》堪称"珠联璧合"。后在上海授徒，人称"上海谭鑫培"。

汪少伯曾拜"小生泰斗"姜妙香为师。他被戏迷们誉为"黄白楼主"，因他演《黄鹤楼》中的周瑜和《白门楼》中的吕布得到姜妙香的真传，故得此雅号。

万幸一戏路宽，既能演《连环套》中的黄天霸、《凤凰山》中的薛礼；也能演《白马坡》中的关云长。30年代初，他在《八蜡庙》中扮褚彪，他甩着髯口，拿着带有铁圈圈的真钢朴刀开打，并作抢背等翻跌动作，功力不亚于专业演员。

余增秩工余派，卢寿椿宗梅派，他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老生"余"味甚浓，旦角"梅"腔亦佳。

武汉京剧票房（社）自精武剧社起，历经华商总会到青年会，逐步发展到高潮。在此期间演出频繁，赈灾义演的次数多，有的各票房单独被邀，有的各票社联合演出，还有的与专业名演员和汉剧演员同台演出。如北伐时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在汉举办了三天义演，欧阳予倩和王攀云（精武剧社）分别在《人面桃花》、《黛玉葬花》中扮演角色。为慰劳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士兵，青年会每周演两晚，连续4周。1937年5月1日，梅兰芳、南铁生、章晓珊等还在汉口大舞台演出《花田八错》和《西施》，为市图书馆筹款，轰动武汉三镇。

武汉沦陷后，原有各票房（社）均已停止活动。但汉口法国租界尚不是日寇势力范围。一些京剧票友便以法租界为基地，在那里开展业余京剧活动。1904年，在江岸区如寿里26号陈洁如家成立"融社"票社。继之成立的还有冬社、阳春、韵社、业余、文协国剧社、云锦、青年会、雅韵、民教等票房（社）。票友中著名的有冬社华香琳、融社何友三、林震遐、阳春

·社马叔璋、文协国剧社管家驹等。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汉的票友张立鹤、乔维善，原在汉口其他票社之王秉祥、唐敏初等均纷纷加入融社。当时融社角色齐全，除演传统折子戏外，还能演《红鬃烈马》、《探母回令》、《审头刺汤》、《宇宙锋》和《举鼎观画》等大戏。

解放后，1949年初"融社"与华中文工团合作，举行劳军义演3场，演出《失空斩》、《古城会代训弟》、《八大锤》等。

1954年，"融社"迁入武汉市文化俱乐部内，对外名义是"武汉市文化俱乐部业余京剧团"和"武汉市融社业余京剧研究会"。目前仍在活动的票房（社）有"海员业余京剧团"、"铁路业余京剧团"、"梨园春京剧社"、"江四寿星京剧社"、"满春业余京剧园"、"上海街业余京剧社"、"宝庆街业余京剧社"、"先锋居委会业余京剧社"、"武汉市业余京剧研究社"等。

（商若冰）

旧汉口的戏园

清末民初，汉口的花鼓戏（即楚剧）盛行，戏园亦称戏院（今日统称剧场），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满春、长乐、美成、天仙、天声、风舞台、大舞台、怡园、新市场、凌霄和老圃等。

最初，这些戏园上演的几乎全是花鼓戏，后来，随着汉剧、京剧的日益发展，戏园无形中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满春、天仙、凌霄、怡园、老圃多演楚剧；民乐、美成多演汉剧；而友益街的大舞台（今人民剧院）、共舞台、新市场内的大舞台（今江夏剧院）则以演京剧为主。

满春戏园在今满春路集贸市场内。满春即"满园春色"之意也。它开业于本世纪初。在漫长的岁月中，演出过京、汉、楚等剧。30年代初，楚剧名演员沈云陔、高月楼、李百川荟萃于此，名噪一时。当年的花鼓戏，是很能吸引观众的，因为它符合一般小市民的口味，人们在一天工作劳累之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乐趣。

美成戏园在今清芬路汉剧院内，它素有盛誉。该园创建于1913年，取名"丹桂舞台"，汉剧名伶余洪元、余洪奎、周小桂、张花子、李彩云等经常轮换在此演出。30年代初改名美成戏院，除演汉剧外，楚剧名角陶古鹏、黄汉翔、江南春、严楠芳、黄楚材等也曾在此献艺。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汉剧名演员周天栋、徐继声、刘金屏、袁双林等组成"栋联汉剧团"，进入美成戏院演出。戏院仿效上海，设有布景房，上演了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如《岳飞》、《张汶祥刺马》、《血滴子》和《火烧红莲寺》等剧，观众如潮，场场爆满。

新市场内大舞台是1917年(民国6年)动工修建的，有座位2011个，观众最多时可达3000人。最先在大舞台演出的，是以名演员余洪元为首的汉剧戏班，末、净、生、旦、丑等十大角色俱全。演出期间，观众踊跃异常，不仅座无虚席，而且站立者摩趾相接，几无隙地。

30年代以后，大舞台一直演出京剧，除名角演出外，常上演机关本戏，如《彭公案》、《西游记》、《八大剑侠》等。《彭公案》长达25本，演期竟达一年多。

怡园戏园在今江汉路无线电商店，专演"髦儿戏"，完全是坤角演出。当时名震一时的坤角，有王克琴、恩晓峰、张文艳、碧天霞等。

旧汉口的各戏园，多按时令排演戏曲，如端午演《白蛇传》、七夕演《天河配》、中秋演《唐明皇游月宫》等。这些应时剧，观者踊跃，有时人们也喜欢看一些新剧，如《大香山社会》、《潘烈士投海》、《情天恨》等剧，都很受欢迎。

(刘通鸾)

《蝴蝶杯》与 蝴蝶杯

湖北楚剧有一出传统名剧《蝴蝶杯》，脍炙人口，深受观众喜爱。这出戏的故事就发生在汉阳龟山，故戏名又称《游龟山》。

故事说的是明代湖广江夏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一日去龟山游

玩，路遇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依仗其父权势，强行索要老渔民胡彦所捕的娃娃鱼，并将老渔民打死。田玉川路见不平，上前理论，卢世宽并不把田放在眼里，不仅不认罪，反而责怪田多管闲事。田玉川气愤填膺，当即挥拳将卢打死。卢林得知爱子死讯，便差人捉拿田玉川。田玉川混在游山的人群中逃向江边，一时找不到藏身之所，就急忙躲进一只停泊在江边的渔船上，巧遇胡彦之女胡凤莲。凤莲机智地骗走了卢林派来的兵丁，田玉川得救。田将传家之宝蝴蝶杯交给胡凤莲，让她到江夏县衙告状，为父伸冤。这只倒下酒便能见隐隐腾起一只彩蝶的玉杯，成了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信物。人们将此故事编成戏剧，不仅唱遍了大江南北，而且也流传到黄河两岸。晋剧、秦腔、评剧都有《蝴蝶杯》的演出本。

有蝶能翩翩起舞的蝴蝶杯原来谁也没有见过，人们都当做虚构的故事。不料前些年山西侯马市陶瓷厂在《蝴蝶杯》的启示下，利用现代工艺，精心研制了一只蝴蝶杯。这种结构新颖、造型美观的瓷杯，跟传说中的蝴蝶杯一样，只要斟酒入杯，就能看见一只色彩艳丽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看来，田玉川那只蝴蝶杯算不上传家之宝了。

（商若冰）

武汉最早的影星
——“模范美人”叶秋心

在武汉的电影史上，最早的影星当推“模范美人”叶秋心了。叶秋心，湖北黄冈人（一说汉口人）。1913年生，少年时曾就读于汉口圣罗以女中（今二十中）。她喜爱文艺，尤其是对电影更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出入电影院，是当年圣罗以女中有名的影迷。因她有这一爱好，又长得文静秀丽，身材窈窕，被当时汉口的武汉影片公司看中，应邀在该公司拍过一部《什刹海》的片子。当时她曾提出到珞珈山拍外景，后因大雾作罢。她后来转入话剧界，在汉口演《西游记》，她女扮男装演唐僧，颇得观众好评。

叶秋心于1932年离开武汉来到上海，经影界前辈邵醉翁介绍，进“天一影片公司”正式从影，与著名影星胡蝶、马陋芬合演《孽海双鸳》，一炮打响。继之又与陈玉梅联袂，在《青春之火》一片中再创佳绩。后来，她又主演了《似水流年》和《春宵曲》等影片。在《春宵曲》中她饰演一位舞女张珊珊，因演得维妙维肖，观之者众，使叶秋心声名大振。1934年，她因主演了《百花洲》而进入当年《良友》电影杂志评选的全国八大名星之列。当时，八大名星之一的徐来，被影界誉为“标准美人”，叶秋心的容貌胜过徐来，则被冠以“模范美人”的称号。从此，声誉日隆。

1935年，她离开“天一”，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与著名影星郑小秋合演了《吉地》一片，也非常成功，在汉口明星影院（现在武汉电影院）上影时，江城三镇，为之轰动。她在明星公司还主演过《桃李争艳》与《大家庭》等影片，均获好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明星公司毁于日寇炮火。上海的电影事业陷于停顿状态，大批的电影工作者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叶秋心偕同夫婿张某回到她童年成长的地方—汉口。在汉期间，叶秋心也演了一段时期的“文明戏”。不久她与张某离异，迫于生活，竟流落在民生路一带成为“马路天使”。之后，穷途潦倒的叶秋心，也只好离开武汉，随着逃难的人流，流落他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秋心回到汉口，振奋精神，重登舞台，主演了根据当时发生在汉口而震惊全国的“双钉案”改编的《双钉记》一剧，演出场场客满，叶秋心因此又红了一阵子。后来，她加入另一个剧团，辗转演出于湘、鄂两省的县、市。这已是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了。

解放后，叶秋心离开影剧界，寓居汉阳县蔡甸镇，在一家国营拉丝厂当工人，直到退休。1984年2月7日，这位天生丽质，技艺精良的武汉早年影星，因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

（刘通鸾）

跑龙套起家的丑星大和尚

武汉的汉剧戏迷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大和尚的。他不仅是汉剧一

代宗匠，而且是中国戏剧界久负盛名的表演艺术家，在汉剧丑角行当中，名列“五丑之首”。

大和尚本名李春森，字国坤，湖南沅陵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汉口，伯父李光耀、父亲李光友都是当时汉剧著名艺人。大和尚生长在这“伶工世家”，从小耳濡目染，酷爱戏剧，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成为一名演员，可他家里人因为他幼年体弱，经不起严格锻炼，即使学成，也不能成为名角，所以不打算要他继承父业，要他专心读书，另谋出路。大和尚进了私塾，可心仍放在“戏”上，他把戏曲的基本功当作练身游戏，每天放学回家就练“翻筋斗”、“拿元宝”，还要摹拟戏中的表演动作。读了两年书，也私下练了两年功，身体渐渐硬朗，家里人见他学戏志坚，也改变了主意，同意他拜师学戏。11岁时，正式拜汉剧“复兴班”名丑汪天中为师，开始了艺徒生活。

过去，在戏班里学艺，并没有一定的时间安排，除了每天清晨起来练功，朔望歇功外，师傅不会有太多的功夫教徒弟，主要学习方法便是“看戏”。这“看戏”并不是现在所说的观摩，而是在戏班学艺的附带条件——跑龙套，行话叫“站班”。汪天中是当时名演员，除演出外还有许多社会应酬，不可能经常说戏，而名师带徒弟，一般都是这样，多以“站班”为主要学习方式，只有到“接骨斗榫”的关键处所，才去找师傅当面请教。跑龙套跟老师一起出台，老师在台上现身说法，艺徒（龙套）在他们跟前“站班”，老师们的一手一脚，出言吐语、启眉动眼、咬字行腔，艺徒比谁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一次不懂，再看一次，久而久之，艺徒们也就慢慢地学会了，大和尚就是通过跑龙套这一独特学习方式，再结合师傅平日所教的，对照台上所见所闻，细心揣摹钻研，终于成为汉剧一代名丑。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周赶宝组福兴班到乡间演出缺乏丑角，就来邀大和尚参加，汪天中也同意，可是并不放心，他担心大和尚戏路不宽，怕下乡被人点戏难住，便连夜给他赶排了几出“找戏”（“找”就是添补的意思）。在乡下演出，这些小型“找戏”是必备的。从此大和尚离开了“复兴班”，成了福兴戏班的当家丑角。

初次当家，第一个戏是《广平府》，这出戏有繁重的舞蹈，是一出身段很多的功夫戏。大和尚虽然看得不少，却从未演过，事到临头，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幸亏他跑龙套时十分留意这出戏，才顺利地演完了这出"打炮戏"。

此后，大和尚应邀到上海、北京和湖北各地演出，他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汉剧丑行的表演艺术。他擅演和尚戏，饰《扫秦桧》中的疯僧、《收痨虫》中的济公、《双下山》中的猛悟、《游赤壁》中的佛印、《跑楼》中的了空、《兴隆庵》中的怀义等，表演精湛，刻画细致，各具特色，有"六出半和尚戏"之称。其艺名大和尚亦由此而来。

（商若冰）

谭派鼻祖谭鑫培

京剧老生行当，流派纷呈。汪（桂芬）派、言（菊朋）派、余（叔岩）派、高（庆奎）派、马（连良）派、奚（啸伯）派、杨（宝森）派等各流派各领风骚，各自拥有一批忠实"戏迷。"但是，追根溯源，言派、余派、高派都是在老谭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马派、奚派则又各自来源于余派、言派，其根也在谭派。而独领风骚的谭派鼻祖，就是戏迷们熟知的、人称"伶界大王"的谭鑫培。

谭鑫培（1847—1917）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原名金福，以字行。幼年随父学艺，父亲志道演老旦兼老生，称"叫天子"，所以，谭鑫培艺名一度为"小叫天"。1858年（清咸丰八年）到北京金奎科班学昆乱老生，受7年严格训练。18岁出科后到天津演出，旋在北京人永胜奎班唱里子老生（二流角色）。后来因倒仓（嗓音变哑）改演武生兼武丑。曾一度脱离舞台，转入江湖"粥班"，在乡下演草台戏。但学习艺术之心未改。后到上海，重返舞台。不久，回北京入三庆班，拜著名"京剧开创基业的大师"程长庚为师，习演老生。1872年（同治十一年）在老生的基础上，创"文武老

生"的新行当，改演长靠戏。又拜"老生三杰"之一的余三胜为师，努力学习余三胜创造的老生新腔。1880年（光绪六年）和孙菊仙（孙派老生创始人）合搭四喜班。1887年又组同春班。1890年奉诏入清宫，为慈禧太后演出，得其欢心，任为"内廷供奉"，赏四品服。

1899年，应聘来汉口满春茶园演出，轰动一时。由于戏迷们纷纷涌往满春观谭鑫培演出，另两家未演京剧的茶园（天一、贤乐）只好关门大吉。谭鑫培来汉后，牢记其父临终遗言，曾专程到武昌宾阳门（今大东门）找谭家祖坟，准备祭奠。但因年代久远，无法找到，只好含泪离去。

1900年以后，谭鑫培回到北京，潜心研究艺术，对唱腔、做功、剧本进行改革，创立了唱腔平稳婉转、做功生动活泼的谭派艺术，形成独特风格，在京剧艺术上实现了徽汉结合、文武结合、唱做结合，令人耳目一新，风靡一时。当时"凡王公大臣荐绅先生每有喜庆必招谭，谭不至举座不欢也。膏粱纨袴弦歌相娱，不学谭则无以鸣高也。贩夫走卒抽暇聚谈，不知叫天则无以夸于侪辈也。青楼歌伎以喉侑觞，不摹谭不足以引宾客欢也。他如大家闺秀、学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拟，低声而歌。"以至狄平子的《庚子即事》诗中有句云："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

1905年受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任景丰聘请，拍摄了《定军山》片断，开创了京剧上银幕之先河。

辛亥革命后，谭鑫培虽然红遍京华，但却常受军阀欺凌。1917年，被迫带病在黎元洪总统府中演《洪羊洞》，后忧愤而死，享年70岁。其子、孙均为京剧名家。其代表剧目有《卖马》、《定军山》、《空城记》等。

（商若冰）

老牡丹花和小牡丹花

在汉剧界，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同习"八贴"（花旦）行当，在30年代还一度同台演出。他们一为男旦，一为女角。熟悉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老牡丹花董瑶阶先生和小牡丹花陈伯华女士。

从两位艺术家的艺名来看，根据惯例，他们之间总是有亲属关系或师徒关系的，京剧演员王桂卿和小王桂卿（父子）、王玉蓉和小王玉蓉（母女），擅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和六小龄童（父子）等就是例证。然而，这两位牡丹花艺名虽同，却无任何关系。只是在小牡丹花已经取了这个艺名之后；老牡丹花不仅没有反对，还主动提出要收小牡丹花为干女儿，这才在两位艺术家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在汉剧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牡丹花董瑶阶先生（老牡丹花是有了小牡丹花之后，戏迷们为了便于区别而加的个"老"字）1898年出生。民国初年即享誉湖北、武汉。他的演技高超，扮演的各种女性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汉剧老观众用一句通俗的话称赞他，说他演的旦角"比女人还象女人"。他的代表剧目有《挑帘裁衣》（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中的一折）、《醉归杀山》（石秀和潘巧云故事中的一折）等。1952年秋，他被邀请去北京途中病逝，终年仅54岁。

小牡丹花陈伯华女士比老牡丹花幸运得多。她8岁进入汉剧女科班——汉剧训幼女学社学艺，取艺名"新化钗"（全体艺徒均用"新化"二字做派名）。在科班中，她受到汉剧艺术教育家刘本玉先生的精心教诲。刘先生根据她的条件，决定让她学"八贴"（花旦），除了教她学习一般花旦戏如《玉堂春》、《打花鼓》、《打渔杀家》、《反八卦》之外，还因材施教地要她学习《闹金阶》、《小姑贤》一类"娃娃旦"的戏。刘师父教的方法和一般的师父教法不同。象《闹金阶》里面的曹瑞莲，出言吐语和举手投足，就不同于生活中的小女孩，如动作中有不准确的扬手踢脚，说白里有不规则的断句读音，这种特殊的表演手法，用来表现小女孩的好动、发嗲，演来就能别具一格，妙趣横生。陈伯华女士正因为受过这套严格训练，并从中得到启发，因此在半个世纪以后，以花甲之年还能演《柜中缘》里刘玉莲那样的角色。

出科后，陈母因十分推崇牡丹花的艺术，要 新化钗改用"小牡丹花"（按当时习惯，把"小"字写成"筱"字）的艺名登台演出，一炮而红。

1934年前后，老、小两朵牡丹花在汉口新市场同台演出，使小牡丹花直接受到老牡丹花的艺术熏陶，扩开了眼界，同时也使她感到"八贴"

这一行的局限性。她从当时"四旦"(青衣)表演艺术大师李彩云先生的表演中吸收营养,形成了青衣花旦兼而有之的"陈派"艺术,为发展汉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2年10月在北京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她主演的《宇宙锋》荣获二等演出奖,她个人荣获一等表演奖。

陈伯华在解放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武汉汉剧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两朵牡丹花在新旧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命运,充分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人们怀念老牡丹花,祝愿小牡丹花艺术之树常青。

(商若冰)

汉剧公会及其三任会长

汉剧,早期曾名"楚调"、"汉调"。明朝末年始改称"汉剧"(1926年傅心一等建议将花鼓戏改名"楚剧","楚调"便成了楚剧前身,不再是汉剧的别称)。由于楚调之名较久,声誉较高,因而过去汉剧演员聚集之处,通称"楚班公所"。汉口楚班公所,位于杨千总巷与戏子街(今称人和街)的楚班巷内,辛亥革命时被清军焚毁。

民国初年,经酷爱汉剧、热心公益的教育界人士杨铎倡议,傅心一(汉剧艺术家)、陈新年(汉剧"天春长"科班班主)发起,得到汉剧名家余洪元的支持,在满春戏院旁设立"汉剧公会筹备处",以取代楚班公所,为汉剧演员建立聚集之处。筹备处由傅心一负责,发动汉剧全体演员,举行集资会演,不足之款,由余洪元垫借。

1917年,汉剧公会房屋竣工,公会正式成立。大家一致选举傅心一为首任会长。傅心一出身汉剧世家。他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是当时戏剧界文化水准较高的艺人之一。他待人落落大方,态度谦虚,不吸烟不喝酒,与汉剧艺人关系甚好。抗战时曾在四川北碚组织"汉剧训练班"(即今黄石市汉剧团),从事培养汉剧人材的工作。解放初,曾任湖北省文化局戏剧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戏剧家协会委员和政协委员。1958

年9月4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1923年，因在北京演出《群英会》中的诸葛亮而获"活孔明"之誉的余洪元由京载誉回汉，被选为汉剧公会第二任会长。余洪元少时酷爱汉剧，且能演唱一些传统名剧，是沙市"菊社"中的"名票"。后拜著名汉剧末角胡双喜为师，精心学艺，从此"下海"，创造了深厚苍劲、醇厚优美的"余派"唱腔，成为汉剧界鼎鼎大名的一代宗匠。1900年，余洪元由沙市来汉搭班演出，誉满江城。1916年他在北京参加赈济水灾义演，获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赠给"慷慨悲歌"匾额一方，汉剧公会也获"急公好义"匾额一方。

1927年秋，突然中风。后穷途潦倒，1940年病故于原籍咸宁家乡。

余洪元病后，汉剧公会选举汉剧表演艺术家吴天保任第三任会长。他于1915年入汉剧"天春长科班"学艺。出科后便组班在武汉各剧场演出，技艺日进，被群众誉为"汉剧大王"，声誉与余洪元媲美。吴天保唱腔工整，吐字清晰，腔体清新。念，讲究声韵，尖团分明；做，规范严谨，动必在情。他勤奋好学，撷采各剧之长，融汉剧生、末为一体，开创汉剧三生唱做并重的新风。抗战期间，吴天保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汉剧流动抗敌宣传队任总务主任，并率领第一队徒步进行，作抗日救亡流动宣传演出。抗战胜利后，吴天保率队回到汉口。见汉剧公会房屋毁损，一片荒乱，特请董瑶阶（牡丹花）、周天栋等发动全体汉剧界在美成戏院作了两次会演筹款，把公会房屋整修一新，使长期在外流徙归来的汉剧艺人有个栖息场所。

解放后，吴天保历任武汉汉剧团团长、武汉汉剧院副院长等职。1961年底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武汉汉剧院建院庆典中曾赠诗一首，诗中有"尊重吴陈（伯华）派，宏宣江汉声"，对吴天保给予了充分肯定。后在文革中受迫害，于1967年含冤逝世。

（商若冰）

楚剧改革家李百川

二三十年代，"李百川"三个字在武汉可是个叫得响的名字，武汉的

市民们特别是些中年妇女和老太婆，一提起楚剧演员李百川没有不伸大姆指的。那时，汉口的“玉壶春”戏院（后改名天仙舞台，在今江岸区天声街）和满春戏院（地点在今满春路，已毁）只要有李百川的戏，门口便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欣赏他的精湛艺术，更敬佩他的品德。称他为楚剧“三大名旦”之一。

1924年前后，由于李百川才华横溢，能演能导（行活称“报本子”），早已誉满武汉，是满春戏院的台柱。但他从事业出发，甘把头牌让于沈云陔，自己只挂二牌。须知那时十分讲究挂牌，牌头不同，收入、名气都大不一样，有人为了争牌头往往闹得不可开交。李百川主动让头牌，实属难能可贵。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李百川回到黄陂泡桐店袁李湾家中。伪人民自卫军将其拘捕，勒索银元、军鞋、大米等物，遭拒绝后，又以盛酒引诱，委任李百川为该部参谋长，亦遭严词驳斥。李百川被拘押几天，决意不从，伪军长李汉鹏无计可施，只好将他释放。家中呆不住，李百川立即返汉，在“长乐”（今楚风剧院）、“美成”（原清芬剧场）等戏院重新登台。在沦陷区演出，环境险恶。日寇得知李百川曾参加过抗日活动，便放出口风，说“楚汉剧艺人都是田汉的学生”，意即与共产党有牵连，对楚汉剧艺人和李百川进行迫害，许多艺人常常挨日寇和汉奸的耳光和毒打。这一切给李百川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在美成戏院编演《杨家将》时，借古喻今，痛骂日寇：“有多少好男儿葬身异地，有多少好姐妹被敌奸污”，并痛斥汉奸：“国仇家恨你全抛弃，醉生梦死你枉披人皮。”台下观众“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胆小的艺友劝其谨慎，他却说：“汉奸报告了，先枪毙我，与你们无关。”果然，一天装有一颗子弹的恫吓信出现在李百川面前，可他毫不畏惧。

他醉心楚剧艺术，1923年在“玉壶春”同名艺人陶古鹏、章炳炎等合作改革楚剧，在汉剧琴师严少臣的帮助下，首先成功地将楚剧的“哦呵腔”（用人声伴唱）改为胡琴伴奏。在《送友》一剧中，他结合祝英台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感，重新编写了“两河岸，施一礼，梁兄请坐”唱段，不

仅唱腔生动，富于民间色彩，而且突破了"三三四""二二三"的传统声腔格式，如在同一唱段中"兄坐在河东岸，弟坐在河西坡，犹如隔断一条银河"一句，形成独特的堆字唱法，开楚剧唱腔革新之先河。在演出《天宝图》一剧时，他根据剧情需要，创造了一支新腔"西江月"，词格为"五七三三七五"，一阕六句，曲调清新，至今在楚剧中仍广泛应用。

1943 年，李百川因病不能登台，回故乡养病，同年与世长辞，年仅 47 岁。

（商若冰）

新市场大舞台今昔

在汉口民众乐园（原名"新市场"）后院内，有一座大型现代化剧场，名叫"江夏剧院"。它的前身是当时颇具盛名、妇孺皆知的"大舞台"。因为建在新市场内，所以人们均称之为"新市场大舞台"。

1917 年，时任汉口稽查处长的刘友才为自己发财致富，决意在汉口筹创一座供人们游乐的场所，发起组织汉口新市场。他从官商两界募集资金建立两个公司，即"汉口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总额 10 万银元）和"协兴公司房地产经理处"（资金总额 7 万余银元）。协利公司专事创办新市场；协兴公司则经营房产业。1918 年底，协兴公司在毗连协利公司修建的新市场处（今后院）盖戏院两座：一曰新舞台（今群众电影院）；一曰大舞台（今江夏剧院）。大舞台有座位 2011 个，是当时武汉最大的剧场。由于经营单位不同，大舞台与新市场门票历来分开出售，大舞台单独卖票，并可加售站票，观众最多时达 3000 余人。

大舞台本是为"汉剧"建立的，所以开业第一年演出的是汉剧。以著名汉剧演员余洪元为首的戏班，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等十大角色齐全，为近几十年中汉剧群英的一次集结。

1922 年，新剧（文明戏）在武汉盛行，"醒名新剧社"曾到大舞台演出。后因当时的警察厅长周际云借口姨太太被演员勾引，将京剧演员陈

筱穆的腿打断，新剧演员张竹泪也遭株连，被拉去游街示众，新剧因此遭到禁演。

30年代以后，大舞台一直演出京剧，人们习惯称为"大京班"（与新市场二楼剧场演出的"小京班"相区别）。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小三麻子（李吉来）、金少山、林树森、李仲林、刘五立、李万春、谢小天、雪艳香等都在大舞台演出过。除演出传统流派剧目外，还常演机关连台本戏和应节剧目，如《白蛇传》（五月初五端午节）、《天河配》（七月初七七夕节）、《唐明皇游月宫》（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等。连台本戏《彭公案》长达24本，演期长达1年之久。《西游记》也连演了几十本，久演不衰。刘五立主演的《七侠五义》、筱奎官主演的《狸猫换太子》和《济公活佛》也颇受欢迎。还有一位"德国姑娘"（艺名雍竹君）也曾在该场演出《玉堂春》等剧。

40年代初，汉口沦陷时期，大舞台仍照常演出京剧，聘请著名京剧演员、人称艺坛英杰的戴绮霞和其丈夫名武生王韵武等组班到大舞台演出。正是在大舞台，戴绮霞夫妇收下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原名戴鹂鹂）为徒，在京剧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新市场，改名为"民众乐园"。同年12月大舞台改名"民族歌剧院"，聘请了杨菊苹、郭玉昆等著名演员来汉演出。1950年元月，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等来汉组建全国第一个大型国营戏剧团体——中南京剧工作团（武汉京剧团前身），周信芳任总团团长，高百岁、陈鹤峰分任总团副团长，常驻大舞台演出。大舞台也改名为"中南京剧院"。此后，全国许多著名京剧演员纷纷慕名前来献艺，如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盖叫天、厉慧良、童芷苓、言慧珠等都在这里表演了自己的拿手好戏。有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洛神》、盖叫天的《武松》等都已成绝响。在此期间，剧院场场爆满，门前每天出现排长队购票的情况，飞票票价高得惊人。

由于大舞台修筑年代过久，到解放时已呈衰败迹象。1953年虽因屋顶大梁折裂而进行了拆修，但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文革"中一直以

"危房"作仓库使用。1978年经武汉市计委批准拆除重建，全部工程耗资215万元。1981年10月1日竣工开幕，改名江夏剧院。为庆祝剧院首场演出，特地请了京昆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和张君秋联袂演出，盛况空前。大舞台从此"旧貌换新颜"，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江城。

（商若冰）

丹桂舞台的变迁

武汉是汉调（即汉剧）的发祥地，汉剧是市民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之一。清末汉调多在各行帮的会馆戏楼、茶园及富户宅院演唱。辛亥武昌起义后，一些汉剧演出场所被清兵纵火焚毁，致使汉剧缺少演出场所。汉剧迷张鉴堂四处求援集资买下今清芬路一带的一片草地，着手修建戏园。1913年戏院建成，取名丹桂舞台，以演汉剧为主。许多汉剧名演员如余洪元、牡丹花、大和尚等经常在此轮换演出。30年代初，丹桂舞台改名美成戏院，楚剧著名演员陶古鹏、严楠芳、黄楚材等在此献艺。

抗战爆发后，美成戏院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参加了"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并将剧场作为义演场所，为救济难童、支援抗战作出贡献。1938年6月汉剧艺人成立了"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分赴川、鄂、湘等省后方作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美成戏院一度成为楚剧演出剧场。抗战胜利后，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相继返汉，著名演员周天栋、徐继声、袁双林、刘金屏等组成了"栋联汉剧团"，进入美成戏院演出。戏院仿效上海，添设布景机关，上演了《岳飞》、《火烧红莲寺》、《血滴子》等连台本戏，场场爆满。

1950年仲夏，正当剧团与剧场续约之际，剧场方面突然提出要提高剧场分成比例，将原来的32.5%提高到35%，剧团则坚持按原来比例不变。双方僵持不下。适此时，吴天保率领的"汉剧宣传第一队"也想进入美成戏院演出，吴与场方接触，便构成了"两天（吴天保、周天栋）之争"的格局。这样，剧场进退两难，又见此举激起公愤，只好按原比例续

约。这场名为劳资纠纷，暗为"两天之争"的闹剧才告收场。

1951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接管了美成戏院，更名为"新生剧场"。

1953 年 6 月，武汉市汉剧团成立，剧场改名为清芬剧场，隶属剧团，剧场与剧团的矛盾得以根本解决。剧场随着汉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61 年经中央批准，将武汉市汉剧团组建成武汉汉剧院，列入全国八大剧院之一。1962 年元旦正式建院，建院大会就在清芬剧场举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书五律诗祝贺。为庆祝汉剧院成立，作了 10 天的建院演出，汉剧名老艺人和优秀中青年演员在此各献拿手好戏。

"文革"期间，汉剧传统剧目遭到禁锢，名老艺人陈伯华、吴天保等遭受迫害。剧场改名"红星"剧场，只演所谓"样板戏"和放映电影。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剧场恢复"清芬"原名。汉剧院演出频繁，观众如潮，剧场又呈现盎然生机。1985 年，剧场更名为"清芬文化娱乐中心"，改成歌舞厅，仅在原剧场舞台一隅设一小型剧场，恢复"美成戏院"老名称，供区县小剧团演出。随着戏剧不景气，剧场只好转向另谋生路。

（商若冰）

一末带十杂
——汉剧的脚色

武汉人有句口头禅："一末带十杂，烧火又引伢。"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事，都由一人全做了或全包了。实际上，"一末带十杂"这句话是来源于武汉汉剧的行话。汉剧脚色分为"十大行当"，或称"十大脚色"，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一末带十杂"，就是表示无论什么角色都能扮演，时髦的称谓叫做"全能演员"。引申为无论什么事都能干、都包干。

一末：也称末脚或简称"末"。唱做兼重，用"丹田"中正音即所谓"脑

后嗓”，以表现苍老衰迈之人物。杂剧中以末为长，故汉剧亦以一末为首。《甘露寺》的乔玄，《琼林宴》中的范仲禹，《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李陵碑》的杨业都由末角扮演。一末的代表人物有任天泉、胡双喜、余洪元、胡桂林等。

二净：亦称净脚，即“大花脸”，以粉涂面演出，着重唱工。用云遮月嗓所发出的声音出之“丹田”，声大而宏亮，以表现“叱咤风云”的气派和刚强的个性。《雁门关》中的潘仁美，《毒龙兄》中的杨广以及曹操、董卓，《白良关》中的尉迟恭，《昏殿》中的齐王等均由净脚扮演。二净代表人物有罗赶生、郑万年、连戊申、张春堂等。

三生：亦称生脚，唱做并重多挑大梁。三生历来重唱，以腔音（即丹田正音）为正宗，不尚边音，名角多以腔音出名。《打鼓骂曹》的祢衡，《斩黄袍》中的赵匡胤，《男绑子》中的汉光武，《水淹七军》中的关羽都由生脚扮演。三生的代表人物有米应元、余三胜、吴天保、陈春芳、徐继声、尹春保等。

四旦，亦称正旦，以演闺门旦为四旦，几属唱工戏均属之。《武家坡》中的王宝钏，《二度梅》中的陈杏元，《贵妃醉酒》之杨玉环等均由四旦扮演。四旦的代表人物有吴鸿喜、李彩云、李四喜、胡玉喜（黑牡丹）邓云凤、刘顺娥等。

五丑，俗称小花脸，敷粉墨而打浑者，又称丑脚。戏班中重丑行，有“丑不到，不开锣”之说。《活捉三郎》的张文远，《青凤亭》中的张婆，《游花园》中的丑丫头，《审陶大》中的陶大，《孟津河》中的张义等都由五丑扮演。五丑的代表人物有袁心苟、汪天中、大和尚（李春森）、李罗克，留一笑等。

六外：亦称外脚，以男脚挂须，专演做工戏，注重工架、道白。言于生、末之外又添一色，故谓之“外”。《关羽走麦城》中的关羽，《宋十回》中的宋江，《八义图》中的程婴，《表功》中的秦琼均由六外扮演。六外的代表人物有吴燕尾、陈旺喜、程双全、周天栋等。

七小：即小生，年轻不挂须者。《白门楼》中的吕布，《借将》中的赵

云，《花田错》中的卞生，《二度梅》中的梅良玉，《双合家》中的赵宠等都由七小扮演。七小的代表人物有刘正文、董金林、李四立、王晓楼、夏国光等。

八贴：即花旦，多演做工戏，重娇工。《八义图》中的程婴娘子，《挑帘裁衣》中的潘金莲，《连环计》中的貂蝉，《斩狐》中的狐精等都由八贴扮演。八贴的代表人物有赛黄陂（钟华卿）、牡丹花（董瑶阶）、小牡丹花（陈伯华）、万盏灯、花碧兰、雷金玉等。

九夫：即老旦。主唱戏不多，但在唱腔上很别致，发声用本嗓，但比一末的唱腔要柔软些。《钓金龟》中的康氏，《断太后》中的李 后等都由九夫扮演。其代表人物有谭志道（谭鑫培之父）、江婆婆、刘子林、董雯堂、董金钟等。

十杂：即架子花脸，与二净分工，着重工架。二净主唱重庄严，十杂主做重雄浑。十杂扮相要魁梧，幼工要有根底，唱用云遮月嗓，要宏亮，表现出气魄来。《三打平贵》中的魏虎，《送袍》中的张飞，《斩李虎》中的李虎，《三搜索府》中的施有伦，《红逼宫》中的司马师等都由十杂扮演。其代表人物有尹广福、尹太平、徐正奎、熊长武等。

汉剧的十大行当对戏剧界影响很深，京剧的脚色分行也来源于汉剧。"一末带十杂"的口头禅之所以在武汉流行，足见汉剧十大行当也影响到民间来了。

（商若冰）

小凤仙挽蔡锷联的捉刀人

看过电影《知音》的读者，对蔡锷和小凤仙英雄美人之恋的故事都很熟悉了。蔡锷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京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的掩护下逃往天津，转道日本，返回昆明，发动了有名的护国战争，终于迫使袁氏取消帝制。小凤仙因此而享有"侠妓"之美名。

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食道癌病逝日本，北京各界举行隆重的

追悼会。小凤仙感于蔡锷在风尘中的知遇，悲不自胜，乃着丧服，素车白马，手捧挽联一幅，前往灵堂祭奠。小凤仙的到来，自然引人注目。人们争看侠妓风采，细细品味挽联上的文词：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读罢挽联，与祭的文士们不禁啧啧称道："妙绝，好一个桃花颜色亦千秋。"有人指着一旁黎元洪秘书殷学璜说："汉光兄，定是你代笔的。"殷学璜笑而不答。

殷学璜何许人也？为什么有人认定小凤仙的挽蔡锷联出自他手？

殷学璜(1882—1935)，字汉光，汉阳县永安堡桐山头人。早年肄业两湖书院，以成绩优异，官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宪兵科深造。回国后任职清陆军部。为人倜傥风流，以文自负，与京中名士王闿运、章士钊、杨度等过从，诗文酬应，附会风雅。民国初年，被聘为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一命呜呼，殷学璜写了一副挽联：

曹操云勿人负我，宁我负人，惟公能体斯意；

桓温谓不能流芒，亦当遗臭，后世自有定评。

此联寓笑骂于挽歌之中，无情地鞭挞了这个独夫民贼，一时为人传诵。故有人看了小凤仙挽蔡锷联当即能判定是殷学璜捉刀。

小凤仙挽蔡锷联还刊于1916年12月初的汉口《民报》上，同时还刊登了别人代笔的另两副小凤仙挽蔡锷联。其一为：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另一为：

英雄儿女本常情，忆去年，帝梦酣歌，借酒浇愁，小妮子曾蒙垂睐；

沧海桑田成契阔，叹此日，京华闻讣，举国辍音，薄命人更自伤心。

殷学璜后来受黎元洪委托，创建民国宪兵，并任中央宪兵学校校

长5年。中年以后潦倒，虽与蒋介石有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之谊，也未在南京政府任职，后病逝青岛。他所代笔的小凤仙挽蔡锷联收入北京出版的《名联集锦》，上注明为殷学璜捉刀。

然而《小凤仙其人》(载1981年10月26日《文汇报》)的作者岳山所收到的湖南郴州易伯根来信则称，该挽联是他父亲易宗夔应友人邀请，替小凤仙代作的，后收入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伤逝篇》中。但查《新世说》，著者并未明言该联为自己所撰。岳山没有确信这一点，他在《再谈小凤仙》(载1981年12月23日《文汇报》)一文中表示："到底是谁的手笔？有待知者的进一步提供确据。"根据汉阳县政协时遵珍所撰《旧中国宪兵 始建人殷学璜》一文(载《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晴川近代名人小传》)所提供的上述线索，我们是否可以确认小凤仙挽蔡锷联的捉刀人就是殷学璜呢？

(严昌洪)

闲话"老圃"

《辞海》云："圃，种植蔬菜、花果或苗木的绿地。周围常无垣篱。"《论语·子路》："吾不如老圃"，则指种植园圃的人。汉口江汉路北端，有一片繁华地带，名曰"老圃"，则既不是菜圃、苗圃；也不是种植园圃的人，而是一条有近百年历史的街道、里巷，人烟稠密的居民区——老圃正街、圃东、圃西，这里的巷名，均少不了一个"圃"字。

老汉口居民，大都知道"老圃"的来历。早在19世纪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修筑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硚口到江汉路一段)，逐渐把湖塘填平。1905年芦(芦沟桥)汉(汉口)铁路(后改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歆生路(今江汉路)北端与铁路交叉处，是铁路部门的循礼门货站。货站与歆生路之间的铁路边(今铁路边往南至江汉四路以西)有一长约250余米的地段，则是一片无人管理的湖塘菜地，随着铁路通车，货运量日增，不少贫苦农民、市民都来循礼门货站搞搬运，上货下货，赚点脚力钱。由于铁

路按点运行，白天晚上均有活干，这些搬运工必须随时守在铁路边等待任务。因此，他们只能在货站边这块菜地湖塘塔点小茅棚栖身。于是，这片无人管理的地区便成了这些搬运工的聚居之地。后来，一些因天灾战祸离乡背井的贫苦百姓也纷纷来这儿居住，人越聚越多，湖塘菜地逐渐被填平，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棚户区。在这里栖身的人们，跟这儿取了一个地名—"老圃"，以示不忘这儿原是一片菜圃之意。

1919年，胡明初在这里修了一座名曰"老圃"的露天戏园。因这里原系园圃之地，无楼房建筑，便用竹篱围成院墙。院内有各种杂耍，有东西舞台，演出京、汉、楚剧和文明戏，有无声电影，还有大马戏班子。院中到处摆摊设点，十分热闹，成了汉口小市民娱乐的中心场所。1931年汉口被大水淹没，戏园全部被毁。以后，一些搬运工又逐步在此搭棚，做屋，成了一片居民区。

汉口沦陷，日寇将这里的居民赶走，在这里筑起了院墙，成了日军刺杀训练的场地。

抗战胜利后，大批难民从四川等地陆续回来。因无地居住，便纷纷来这里搭简易房屋定居下来。房屋日渐增多，逐渐形成了街巷。由于这里是老圃戏园的旧址，"老圃正街"等带"圃"字的街巷名便正式确定下来。

70年代初，一场大火把圃西的板壁房屋几乎烧光，仅剩下圃东一片。"祸兮福所倚"，在人民政府关怀下，圃西建了7栋7层居民大楼。圃东居民已近小康，昔日棚户已成了"历史文物"，成片的二、三层小楼房平地而起。老圃已经旧貌换新颜，变成"新居民区"了。

（商若冰）

汉口的跑马场

汉口历史上共有3家跑马场，一曰西商跑马场，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地点在现在的解放公园及其周围地带；一曰华商跑马场，即

华商体育运动会，在现在的同济医科大学及航空路、万松园路等大片地区；一曰万国跑马场，即万国体育运动会，由中西商合办，在现在的马场角与唐家墩一带。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上海”、“江湾”两家跑马场，而在汉口有3家跑马场。在旧中国，汉口这个消费城市，在一这点上却居全国之冠了。

汉口之有跑马场，是在1861年汉口开辟租界之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属“舶来品”。外国侵略者以租界为依托，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在租界上建起高楼大厦，兴办花园、舞厅、波罗馆（即俱乐部），吃喝玩乐，仍然感到精神空虚，于是又搞起了跑马、打球。首先是英国人，在英租界的外滩荒地，即现在的兰陵路与黄陂路之间一带，不经中国官厅许可，擅自开辟马道子（即跑马场）和球场。到了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这块马道子和球场划进了俄租界范围，他们又在现在的复兴路、昌年里一带新辟马道子和球场。这是帝国主义在汉口建立的最早的跑马场和球场。1902年，这里被划进法租界。英国人又经过策谋，以贱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里购得汉口西北部的水荒地800亩，于1905年正式开辟为西商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分内场和外场。内场设有酒吧间、舞厅；外场有两个中心，一为马道，一为高尔夫球场。马道有两圈，外圈周长1英里，宽30公尺。这是赛马时的跑马道，沿途竖有里程标杆。赛马终点有公证亭，亭旁建小型看台，专供外国人使用。而偏僻的大看台，才是中国人看赛马的地方。内圈在马道内，是马球和撇檫球场。

跑马场最大的活动是赛马，实际是公开的受到政府保护的大赌博。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每季进行7天。春季每天赛10多场；秋季则为六七场，每季还集中进行一次决赛，即“香槟赛”。当每季赛马前，跑马场就印发马票、彩票，从中提成抽头，谋取大量佣金，西商跑马场每年通过赛马一项所得佣金常在二三十万元以上，如加其他各种营业，收入不下百万元。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国的富商、地主纷纷避入租界，托庇洋人，

以效法西方生活方式为荣，随着赛马赌风大盛。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武汉，英帝国主义受到冲击，英租界被收回，西商跑马场一度冷落。1928年重新恢复，直至珍珠港事变被日本人接管。后来成为日军军事物资储藏场和高射炮阵地。抗战胜利复员后，英国人卷土重来，但赛马一直没有恢复。

西商跑马场的会员全系侨居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等外国的有钱人，拒绝中国人参加，在马场的许多地段竖有"禁止中国人人内"的牌子。中国人不能到酒吧间和舞厅，看赛马只能坐偏台。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同样遭到冷淡和藐视。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进场打高尔夫球，洋人漠然视之，并不派人接待。汉口市长吴国桢到场，也不迎接。连直接向跑马场提供大量廉价土地的中国商人刘歆生，不但没捞到一个赛马会会员的资格，想开车进入马场，也被印度巡捕拒之门外。

洋人的骄横、傲慢，激起一些中国商人的自尊心；同时西商跑马场的厚利，也引起一些富商巨贾的眼红，就是那位在西商跑马场受过气的刘歆生，提供大片土地作股本，邀约地方有影响的商界人士，如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熙太茶栈经理韦子峰、大买办刘子俊等，合资在汉口北郊，于1925年兴建了一个"华商体育运动会"，通称华商跑马场。

华商跑马场内建有一个圆形跑马道，周围1公里半。在赛马终点设有3座看台。在跑马场四周，有茶座、冷饮室、中西餐馆，还有各种摊贩。赛马的时间和彩票发售，彩金分配等规定，大致如"西商"相同，但赛期稍长，除经营赛马外，并为"赈灾"、"助学"举行义赛。其最大的不同，则是场内没有"禁止中国人入内"的牌子，不赛马时，不收门票，中国同胞可以随时进场参观游憩。从此，一些看不惯洋骄气的中国同胞，多汇集到这里来了。

华商跑马场开场后，生意鼎盛，获利甚巨，在一段时间内不逊于西商跑马场。大革命期间也曾一度冷落。抗战前营业进入高潮。抗战胜利后，由青红帮联合一些骑师，举行过多次赛马，但景况大不如前。

1926年，由王植夫、吴春生、孙惠卿等人发起，联系中西商界，又在汉口北郊张公堤内，办起了一个"万国体育运动会"，通称万国跑马场。但因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营业远不如"西商"和"华商"，却也扫除了"西商"那股洋骄气，实行华洋平等相待。

汉口跑马大赌赛，始于1905年西商跑马场开场时起，长达40余年之久。1949年武汉解放，西商跑马场从英国人手中交回给中国人民，华商、万国两个跑马场自行关闭。现在，解放公园、曙光幼儿园和一排排高层住宅楼，在原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建立起来。同济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酒楼、饭店高楼大厦，铺陈于关闭了的华商跑马场场地之上。而万国跑马场的原地，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正在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化腐朽为神奇，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绝对办不到的。

（萧志华）

汉口华商总会

汉口华商总会，是汉口洋行华籍买办们所建立的一个娱乐性组织，也叫华商夜总会，俗称买办财主的乐园。

自汉口开辟租界后，各国洋行、银行先后在汉开业，来汉的侨民日渐增多。他们为了满足闲时的娱乐要求，首先是英国侨民在鄱阳街和南京路交叉处，兴建了一座高楼，为"夜总会"会所，通称"汉口波罗馆"。不久，在俄、德等国租界内，也各有其"波罗馆"。唯日本侨民的称为"俱乐部"。但是，这些波罗馆或俱乐部，都不允许华人参加。是时，汉口各洋行华籍买办醉心于欧美生活方式，眼见各洋行大班及西人高级职员于业余时间，咸趋就波罗馆或俱乐部，尽兴娱乐，虽怀羡慕之心，但受其限制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相约模仿洋行的这一作法，组织华籍买办的夜总会。于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的前几年，他们租用英租界内现鄱阳街与江汉路交叉处的一栋房子（前湖北省银行、现外贸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为会所，命名为"汉口华商总会"。用"华商"二字以示区别于洋商

总会(即夜总会)之意。后来又迁至对面的五福里(现四明里)内。1922年,华商总会利用日积月累的巨额收入,自己设计建筑在"模范区"华商街的新会所落成(现为江汉二路165号市科技信息所),乃正式定居。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后,会址为北伐军总部占用,因而迁至吉庆街青云里10号为临时会所。不久,迁往汉润里50号。1935年汉口商业银行新建行址(南京路胜利街口,现武汉图书馆)落成,该行行长、在华商总会实际居总管地位的周星棠利用权力之便,将该行四楼全部划归华商总会租用。从此华商总会定居于此,直到抗战爆发,活动停止。

华商总会最早的组织发起人,有美最时洋行买办王柏年,瑞记洋行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歆生等,以后陆续加入的有欧阳会昌的助理周星棠、安利英洋行的先后买办蒋佩林和宋立峰、礼和洋行买办胡范冰、和记洋行买办黄厚卿、嘉利洋行买办潘恕安、慎昌洋行买办刘少岩等。

华商总会在成立之初,曾约定入会会员只限于各洋行买办。到了1921年该会会员周星棠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后,因他的关系便开始吸收当时一些工商界上层人物,如总商会前后任主要负责人的郑卿卿、黄文植、贺衡夫、萧纯卿等。此后工商界参加者日多,殷实富商万捐伯、毛树棠、亦官亦商的郭人潭(前清淮军名将郭松林之子、在汉开德安庆钱庄)、卓小梅(中南银行汉行行长、曾任盐务稽核处处长)等,也都是人幕之宾。最后一段时期,竟有当道的军阀、官僚夏斗寅(湖北省主席、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徐源泉(第十军军长)、张贯时(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等显要人物,不时进出于华商总会,无人敢于拒绝。

华商总会的会舍是适应娱乐活动的需要而设计安排的。内有可以演戏或开会的会场、大小会客室、阅览室、餐厅、理发室、浴室、起居室等,在这里,除了每天供应会员吃喝和待候赌博两件大事外,会员可以假座宴客、打台球、下棋、品茗谈心、鉴赏古玩、阅览报刊、理发、洗澡,皆可随心所欲,不假外求。有人要在此吸食鸦片,也是准许的。少数人还

携带熟识倌人(即妓女)在起居室度夜,也悟不为怪。总之,使参加者能够尽情"享乐",无怪乎这个场合能吸引很多的人乐而不倦,流连忘返。同时也使总会得以发展,久而弗衰,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

华商总会固然是以吃喝、赌博为主,没有其他社会活动。但由于参加者都是汉口工商界较有经济地位的人士,有了总会这个固定必到之地,因此彼此交换商情,大谈赌经之余谈生意经,是常有的事。有时为了某一种重要的事务或某一项公益事业,或有关某一商事纠纷案件的解决,也利用这个场合交换意见,或作出判断。由于事物的发展,这个场合既然给予人们以便利,它也就自然地进入到这一阶段。汉口"模范区"(即现江汉路以北、大智路以南、中山大道以西、京汉铁路以东)的规划建立,并非出于那时的地方政府——夏口县的主动,而是由参加华商总会娱乐的人们酒酣耳热之余,一呼百应,意气相投,酝酿而成的。当时,这里是荒凉低洼地带,通过开发建设,要变成马路纵横、房屋栉比的新区,在旧市区和租界之外,独树一帜,别有一个天地,故起名为"模范区"。并将华商会的会址奠基于此,将面临的一条马路,命名为"华商街"。

抗战胜利后,由于负责人周显棠去世,刘少岩在大后方未重返汉,余人皆意兴阑珊,不愿旧事重提,至此"华商总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其会所立在"模范区"街头,成了宏大的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个陈列品。

(萧志华)

大端阳节

农历五月初五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人们在这一天要举行龙舟竞渡,吃角黍(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民间又以五月为恶月,为防疾病、避瘟神,又要插菖蒲、艾叶、饮雄黄酒。端午节的习俗在我国汉族地区大致相同。惟楚俗还有大端阳节为他处所无。

所谓大端阳节，是指五月十五日，它是从五月是恶月的观念衍化出来的一种驱瘟疫赛会。有的地方称为龙船会，有的地方称瘟火会。其活动是以纸扎成丈余长的龙船，富裕地区甚至用五彩绫绢扎船，船中设有层楼飞阁，内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神、水官等像。船旁排列水手十余人，皆装束整齐，以鼓乐、旗帜为先导，抬着纸龙船出游各处，称为"迎船"。好事者更装扮成各种故事人物，务极诡丽，引人注目。数日后以茶、米、纸钱装满船舱，同样用鼓乐、旗帜导送河边焚烧、称为"送船"。"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这两句诗描写的就是类似的送瘟神活动。

清代汉口亦盛行大端阳之俗，但做法有些不同小异。也是剪纸为龙船，中坐神像，自五月初一早晨起，至十八日止，人们抬了龙船各处游行，鼓钲爆竹，灯火喧闹，昼夜不辍。扬林口（今武汉关下游一带）地方特别热闹，人们把纸船放到小舟上，数十人驾之，众桨齐飞，疾如风雨，鼓声人声，与水声相应。岸上观者如堵，也称为"龙舟竞渡"。还有士女坐四柱有棚的游船，竹帘旁挂，肴酿笙歌，出游助兴，当地人讲："将以驱瘟疫也。"

这种活动迷信色彩很浓，且废时耗财，当时即已受到开明人士的批评。范锴《汉口丛谈》卷二所引吴德芝《大端阳行》诗，就是剖析、批评这种陋俗为主旨的。诗云：

午日龙舟闹江水，楚俗相传叫屈子。
无端更有大端阳，初五日至十八止。
剪纸为舟逼肖龙，中坐神像装束工。
迎处妖娆杂妇女，扛来鼓侧集儿童。
金彩高张锦翠铺，极工穷巧尽欢娱。
游民废业事厥役，半月以来争追呼。
典衣卖器供博饌，肉山酒海腥风煽。
急管哀弦恣牛饮，长旗大鼓疑龙战。
醉来怒骂老挥拳，盘簋壶杯飞瓦片。

明日酒醒仍兄弟，不仅娄公甘唾面。
虐及神明守市廛，俨然面目与冠裳。
麦瓜不黄李子黑，神前故故来相将。
皆言一岁不如此，瘟鬼入门何能当。
我看往年钟邑候，曾经示禁城门头。
莅官七载人不犯，闾阎清洁薰风流。
当时此事竟衰止，并无一家见瘟鬼。
可知挽俗在循良，小人所视君子履。
且也先王法制详，是月勿用火南方。
喧阗爆竹若如此，微阳生意能无伤。

诗中关于移风易俗的道理，在今天读来似仍有借鉴意义。

（山风）

元旦开笔

旧社会，老辈人习惯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到这一天，一些书香门第要举行“开笔”的活动，祭了天地祖先以后，由家长或经其指定的人在一方红纸上写下八个象征吉祥的字样。多数是写的“元旦开笔，百事大吉”，或“元旦书红，万事亨通”等等，上下句必须押韵。

某年除夕，伯祖对我祖父说：“你的八股文和试帖诗，看来已到火候，可以进学了。元旦就由你开笔吧！”那年初一，祖父在朱红纸上写下了“元旦开笔，游泮可期”。当年进县赶考，他果然中了秀才。

我父亲结婚的第二年，祖父盼孙心切，要祖母向我父亲示意，并安排他主持开笔活动。那年初一，父亲在桃红洒金笺上写的是“元旦开笔，梦熊梦罴。”到了腊月，我就出世了。

由于我体弱多病，在五岁开始练毛笔字的时候，祖父为我写了“元旦开笔，不染诸疾”的影本，令我经常临摹，到了每年正月初一，就要我把这八个字写在印有寿星图象的绯红色纸上。然而，年复一年，我依旧

经常吃药。

读高中时，我的表兄向同学们宣扬了这件事，有的同学老是笑话我，“元旦开笔，拿药来吃”。从此以后，我坚决摒弃了这种一年一度的表达美好愿望而又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因为我在学校住读，集体吃饭促使我改正了偏食的习惯；同时又加强了体育锻炼，直到读大学，倒真的是“不染诸疾”了。可是，母亲对我说：“你看到了吧，爸爸每年都在为你祷告：‘元旦开笔，百病远离’，这还是菩萨祖宗在保佑呵！”

前不久，和晚辈闲谈起这些往事，他们问我：“如果现在你要开笔，打算写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元旦开笔，祖国统一。”

（徐明庭）

六月六，赶臭肉

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人们都要把衣物、书籍放到太阳底下曝晒，认为晒后可以不长虫，故谚语说：“六月六，晒包袱。”这天一般是夏季最炎热的时候，阳光强烈，利用此时曝晒衣物以防霉蛀，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但各地民间对此节来历却有不同的说法，浙江湖州人谓此日为猫狗生日，江浙一带这天都要携猫狗到水边洗浴。苏州有“六月六，狗龀浴”之谚。而广州人却把这一天认作龙母娘娘的诞日，要建醮演戏。浙江丽水对这一天佛寺晒经书的来历有如下说法：相传陈玄奘自西天取佛经回中国，经大海时，曾堕海中，为水所湿，故这天有晒经之俗。有的地方称这天为虫王节，要宰牲设供，致祭虫王，祈求避免虫灾保丰收。历史上一般称为天贶节，起源于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下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定为天贶节，“天书”第一次“下降”是在1008年，为表示庆贺，改年号为“大中祥符”。

还有一些地方以这天为回娘家节，谚曰：“六月六，请姑姑。”武汉近郊亦有六月六回娘家的习俗。据说此俗起源于春秋时代。晋文公重臣狐偃居功自大，常于六月六日生日大张筵席，挥霍无度。其亲家赵衰劝其

节制，却遭到他的羞辱，忧愤而死。一年晋国发生灾荒，狐偃出京放粮，女婿萌生乘狐偃生辰之机杀死岳父为父报仇。狐偃之女知道了丈夫的计划，便在六月初六的那天赶回娘家报信。放粮回京的狐偃已了解民众疾苦，深悔自己大肆挥霍且不听劝告的过失，不但没有怪罪女婿，还改正了错误。此后每年六月六日生辰，狐偃只请女儿女婿等家人亲眷回家团聚。此事传至民间，百姓极为赞赏，纷纷仿效，相沿成节。

旧时，每年六月初六，农村人家均请回已出嫁的老少姑娘，盛情款待。在武汉地区，因天气炎热，娘家的菜肴常有发馊的，故人们戏称"六月六，赶臭肉。"大概为了不至于吃臭肉，不知何时起，回娘家的女儿、女婿必带一大块猪肉作为礼物献给父母。此俗现已不存。

（严昌洪）

"童言无忌"

旧社会，每到岁尾年头，不论是谁说话，如果带了一个不吉利的字眼，就会引起对方的不快。然而，小孩子们哪里懂得这些，仍旧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于是，很多人家的屋里都要贴一些"童言无忌"或"百无禁忌"之类的红纸签条，聊以自解。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堂兄指着我父亲刚刚写完的"六畜兴旺"的四字帖问我："你晓得六畜是指的哪些畜牲吗？"我随口答道："马牛羊，鸡犬豕。"母亲一听就不住地念："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父亲开导我："应该是马牛羊、鸡犬猪。"我不服气："《三字经》上明明说的是'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我没有说错。"父亲把眼一瞪："我说是猪就是猪！小伢不懂莫开口。"堂兄连忙打圆场，把我的手一牵："我们出去玩吧。"

出门后，听到一阵猪叫，我把堂兄的手一甩，朝那边直跑。只见在一个院子里，几个人把一头大肥猪按在屠凳上。"哎呀！你们杀了好大的一头猪呀！"我的话一出口，那家主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向我连连挥手，"到

那边去玩吧！走远些发财！”紧跟过来的堂兄尴尬地陪笑说：“恭喜你家伏年猪，堆金积玉。”把我的手拉着就走。

到了一垛避风向阳的山墙边，见一些人围着一个蒸酒的甑子，我不顾堂兄阻拦，钻进人丛站到酒甑子旁边。看到下边出酒口的流量很小，我好意提醒酒匠师傅：“完了！快完了！”意思是可以派人抬酒桶收场了。堂兄连忙大声说：“满了！快满了！”我认为他讲的不对：“酒桶还差一截，哪里满了？”堂兄一边向我摇手；一边向主人道贺：“恭喜贵府蒸年酒，富贵长久。”主人揶揄地一笑：“令弟真会说话！”堂兄不住地拱手作揖：“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你家多包涵。”

过了正月以后，堂兄告诉我：“冬字与死字同音，象死、杀、完了，这些不好的字眼，逢年过节不能乱说。”这种民间语言禁忌习俗，我是长大以后才懂得的。

（徐明庭）

“二百五”，“半吊子”的由来

武汉人把苕里苕气、大傻瓜、做事莽撞的人叫“二百五”，也叫“半吊子”，这都是有来由的。

传说有个武汉人在与两位外地客商聊天受辱后，用一吊钱（旧时，1000个制钱称一吊，也叫一贯）打哑谜回敬了他们。这位武汉老乡把一吊钱分作了3份，他把半吊钱（500个制钱）放在肩上，250个制钱挂在胸前面对甲商，剩下的250个制钱挂在背后面对乙商。这样，就成了“肩上半吊子，前后都是二百五”，那两位商人便都成了“二百五”了。1000个制钱既是一贯，那么500个制钱当然只有半贯即半吊。如果人的思维能力只有半贯即半吊而不能“满贯”，岂不是个思维不全的大苕货吗？

当然，关于“二百五”的来由还有一种说法。相传在战国时期，以号召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合纵对抗强秦而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被人暗杀，齐王要为苏秦报仇，而不知凶手是谁；便心生一计，命人将苏秦的

人头割下来悬挂城楼上，城门挂一榜文："苏秦乃内奸，杀(除)他者实为齐除一大害，兹赏千两黄金，请速领之。"不久，果有四人前来领赏。齐王说："苏秦果真是尔等所杀吗？不可冒充呀！"那四人一致咬定是自己所为。齐王又说："一千两黄金，尔等各分多少？"四人齐声回答"二百五"。齐王听了哈哈大笑，当即命刀斧手："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斩了。"大家知道，苏秦是因合纵失败被车裂而死的，根本不是被人暗杀的，传说毕竟是传说而已。

（商若冰）

"打扁担"、"刮胡子"及其他

武汉人有许多语言习俗，查查其来历，品品其含义，也是很有意思的。

旧汉口狎妓的嫖客召妓陪酒，即吃花酒，照例写条子去叫局，妓女一般都要来出局，即使是在陪别的客人，也要转局过来。倘若召妓不到，则谓之"打扁担"。据说"打扁担"本来是广西方言。瑶族风俗，女孩长大，通过对歌自行择配。参加对歌的男青年有多人，依次对歌，根据歌意所答，有一人留下，赠给女方扁担一条，女方接受了，即表示同意结为夫妇。汉口狎客则认为召妓不至，好似以扁担援妓，妓不受，反将扁担打过来，因此引为莫大耻辱。

"刮胡子"也有类似的含义。清制定期选拔秀才为贡生，称为"拔贡"，拔贡对文章水平固然要求高，而对长相也十分挑剔，别说残疾不拔，就是生有络腮胡子的人也不能参加考试。传说武昌王秀才熟读经书，苦练制艺，梦想拔贡，应试前竟忍痛将络腮胡子拔光，但仍落第。他后悔不迭，作顺口溜自嘲道："未曾拔贡先拔胡，贡生未拔胡已无。早知拔胡不拔贡，何必痛拔络缌胡。"后来，人们把考试不中，求人不应等遭遇就称为"刮了胡子"。

武汉人常把不自重或不受人敬重的人称为"贱三爷"。有时候，人们

还戏称汉阳人为"贱三爷"。其实，民间传说中的"贱三爷"并不"贱"，而是一位名叫"健"，排行老三，人称"健三"，专爱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的好汉，"贱三爷"是喜欢他的人们对他的谑称。

武汉人逢年过节说话很注意彩头，讲究禁忌。如过年去人家拜年，喊门话叫"开财门"，主人如未起床，回答则是"在挖窖"，即挖财宝。招待客人吃红枣、桂元泡的茶，称为"端元宝"。总之，尽往好的说。而一些不吉利的话是不能说的，不得已要说，则应以别的词语代替。如人死了说"老了"；火熄了要说火"燃"了；舌头的"舌"与蚀(武汉方音念 sè)本的"蚀"谐音也不能说，只能说"赚头"；不知为什么，猫子要叫做"财喜"。

武汉人还喜欢说俏皮话，采取歇后语的形式，后面半截则让听话人去想。如：下河的来了——要人屎(死)；光棍梦到娶媳妇——尽想好事；道士丢了令牌——有得法。还有一种"缩脚语"，从前称军人为"太上老"，其为"君"(军)由听者去体会，称母为"梨山老"。今天也有称钱为"角子洋"的。

(严锴)

洪山的天齐会与甘蔗节

"三月二十八，洪山敬菩萨。钱多吃甘蔗，钱少吃麻花。"这是抗战前流行于武汉的一首民谣。寥寥20字勾勒出洪山的天齐会——又名甘蔗节的一个侧面。

1011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敕封守护泰山的神祇为"东岳天齐仁圣帝"，民间称之为"东岳大帝"或"东岳菩萨"。因此积习相沿，认为旧历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诞辰。每年这一天，一般寺庙多半要举行天齐会。尤其是武昌洪山宝通寺，香火更盛。香客中不仅有歇工的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与店员，绅商淑女也纷纷前往进香。从早到晚，撞钟，击鼓，敲磬，伴随着木鱼声，念经声不绝于耳。在烟雾缭绕中，善男信女们跪在神龛前的蒲团上，虔诚地磕头，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和亲人获得

"福、禄、寿、喜、财"。随之而来的是许愿或还愿，愿仪的大小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而定，有：上油、挂红、抹金、献匾或布施若干钱财等等。最后还要抽签，请和尚核对签文，预卜财运、文运、婚姻、子嗣或流年吉凶。

每逢这种盛大场合，初见世面的沙弥往往手足失措；而善于应酬的知客、方丈等则忙而不乱，按照"檀越不同招待异"的宗旨办事："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有的并请到禅房，"馔设伊蒲酒泛香"。如果有贵客"夕阳西下尚徘徊"时，还有人上前逢迎，"邀向禅林听暮钟"。这些描写见于1920—1922年间蔡寄鸥等人就此写的《洪山竹枝词》中。

在众多的香客中，还混杂了两种人：一种是游山玩景，去瞻仰大铁佛；观赏"岳松"、东岩刻石、铁钟；登临灵济宝塔；赏玩接引殿前形态生动的一对大石狮；品尝用大雄宝殿后面的明净甘冽的白龙泉水所沏的香茗。还有一种是专为看女人，存心"猎艳"的。《洪山竹枝词》中就叙述了"青年子弟太轻狂，步步窥人在路旁"，"赵家燕瘦玉环肥，引蜂招蜂逐逐飞"的情况。其实，象这类"打圈"的轻薄行为，在旧社会人多的处所是屡见不鲜的，并不是洪山庙会的特产。在1917年和1936年，有两位作者写的关于黄鹤楼的竹枝词中，就有"恼煞少年群笑语，偷评时样美人头"，"鹄立争看新女性，描眉画眼烫蓬头"之类的词句。

在那一天，洪山上卖甘蔗的小贩特别多，价钱相当贵。然而买甘蔗的却没有一个人还价。"甘蔗有价福无价"，朝山进香的人谁愿意在甘蔗节这一天做"折福"的事呢？钱带少了的人只好买麻花吃。"钱多吃甘蔗，钱少吃麻花"的民谣就是这样产生的。儿童们拿到了甘蔗当时就吃；有些青少年喜欢在摊子前玩"劈甘蔗"的游戏，由输的一方付出买甘蔗的钱，有的还要另外"带彩"；老翁与小脚妇女则把甘蔗当作游山的手杖，回去后再和家人分享。"甘蔗一根堪作杖，无人不道看花回"。

汉口和汉阳的寺庙举办"天齐会"时，卖甘蔗的既没有洪山那样多，价钱也不象那样贵，更没有所谓甘蔗节的提法。

为什么甘蔗节仅仅盛行于武昌呢？据说元末农民徐寿辉起义，在蕲水（今浠水）建都称帝后，派遣邹普胜智取江夏（今武昌）。约定在城

内接应的人，手持甘蔗为号。邹部官兵入城后，见人家门前有甘蔗渣的概勿侵犯。从此以后，在江夏遂流传这一天吃甘蔗可以免灾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洪山甘蔗好就好在能够清火明目。其实，甘蔗不象红菜苔那样是洪山的特产，谁知道那么多的甘蔗是从哪里贩来的呢？

1938年4月，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国难严重，空袭时闻，为策人民安全起见"，特地出告示，停止一年一度的甘蔗节，禁止民众往游洪山。当时的《新华日报》还就这事发表了消息。武汉沦陷后，三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然谁也再没有心情过什么甘蔗节了。

（徐明庭）

"五方杂寓，家自为俗"
——客籍人风俗拾零

武汉不仅有荆楚风俗传承，而且由于"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武昌在明代已是"五方杂寓，家自为俗"；汉口更是"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外来客商将东南西北的风俗也带到武汉来了。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记曰：

徽客爱缠红辫线，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

西人指山西、陕西人，他们性嗜葱蒜，雨天不着钉鞋（木屐），齐脚跟的长袍必用"羊头"（羊肚手巾包头），表现出与本地人完全不同的风貌。苏馆、西馆将苏看西馔的各种花色品种介绍给武汉居民，面馆业除本帮外还有徽帮、湖南帮、小京帮、川帮的佳肴面食，丰富武汉人的饮食习俗。武汉妇女的服饰习俗也受外地式样的影响：

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

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

汉口同乡会馆如林，"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各会馆不同建筑风格使汉口面貌更显繁盛。各帮还信奉着不同的神祇，江西帮

敬许真君，山西帮则有西关帝庙，福建人奉妈祖为保护神。

丧礼中的祭奠，有徽祭、本地祭之别。本地祭仪大致疏简，礼生6—8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祭文而已。徽祭则用一大厅堂，设20张祭席以上，用60—80位礼生，每一祭席均供九件头和三牲礼，三叩三献略如本地祭，惟多一场仪式，由引赞领歌童，手持琉璃果灯，灯上扎有飞禽走兽，孝子孝孙跟随其后，在灵堂里走乐字格，走至一定时候，即奏钧天大乐和燃放鞭炮，比本地祭显得更为庄重肃穆。

武汉还有一些回民，从前称为"回子"或"回回"。回族最早来武汉，恐怕要上溯到元代。后来各地回民都有到武汉谋生的，以河南为多，江苏也有一部分。回民在武汉三镇大分散，小聚居，形成一个个回民聚居点。他们或宰牛，或卖馍，或经商，或做手艺，而且有他们独特的风俗习惯，有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教和教堂——清真寺，是武汉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居民。

至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武汉建租界开商埠，又带来了许多西方风俗，读者自有感受，勿须赘言。

外来客商的开拓精神，竞争意识，使武汉原来不事浮华的质朴俗尚，一变而为"俗尚多刁"；也使武汉本来就劲直易怒的民性，更加负性使气，形成所谓"九头鸟"性格。武汉乡俗民风受客籍人士及其风俗习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严昌洪）

武昌火药局爆炸纪实诗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在各处加强军事力量，江夏（今武昌）也设局筹备军器，储存了大量火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西方侵略势力深入武汉，西洋火器的威力使中国人慕而仿之，而制造洋枪洋炮，需备火药尤多，江夏火药局储存之火药达30万斤，分置三处。

1867年11月20日(清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晨，火药局因"不戒于火"，发生火灾，所储存的火药与大小洋炮数百尊，一并燃爆。猛烈的爆炸使沿江二、三百里皆震惊。火药局及其附近，砖瓦飞空，屋宇倾地，堂室基址，陷为深坑，江水为之沸起，大地因而震动。研药之牛毙数十头，不知去向，局中供役员丁数十百人，皆成齑粉。附近行人和居民伤亡惨重。黄州人程维周根据族中赴武昌参加武乡试者回来所描述的惨状，写了《鄂门灾》一诗，为我们留下了爆炸的现场纪实，诗云：

鄂门晨旭辉曈曈，长江千里销狼烽。
竹树晴川碧曈曨，林峦黄鹄青葱葱。
观音阁上罢斋鼓，万家烟火方朝饔。
轰然一声拔地起，六丁霹雳无其雄。
地脉山坼鼎柱动，神嗥鬼斗于天聋。
丹砒绿盖纷纷下，满城黑雾腾虚空。
炮子百千万亿突，飓飓南北东西攻。
非墙迅似天花阵，折栋疾如沧溟风。
男颠女踣童叟颤，须臾五岳摧昆虫。
马骡飞过鹦鹉渡，人齑乱落龟蛇峰。
余怒更思拏鼍鼋，出水竟欲升蛟龙。
涛头百丈屹江上，倾樯断柁沈艨艟。
金口老父朝出汲，忽为折臂为伤胸。
痛极不知火药变，惊定方悟奇灾逢。
我在黄州坐拥席，屋瓦震撼声隆隆。
初疑地中鼓角发，旋讶边圉兵戈哄。
哪知省会万家室，此时已化阿房宫。
……

当时爆炸所形成的气浪使江夏城中民房、衙署大量倒塌。目击者说，突然一声巨响，房屋朝前倾斜；须臾一阵呼啸，房屋又朝后翻仰。三处火药，三次爆炸，左冲右击，使诸多屋舍变成一堆瓦砾。爆炸造成了人

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清政府却并未采取得力措施救灾，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士心）

轰动全国的张五婆大骗案

1946年7月间，汉口发生了一起"张五婆大骗案"，受骗人数直接间接达数千人之多，其中有小商人、一般公教人员、工人小贩、闲居市民，而以妇女居多。诈骗金额达法币（当时法币尚有些购买力）13亿元之巨，导致一些人破产、自杀，成为轰动武汉、盛传全国的特大新闻。

这起诈骗案的主角，竟是个没有资产、没有权势、没有文化而又年过半百的老太婆。她夫家娘家都祖居黄陂，名"张冯氏"，由于其夫张中健排行老五，人们习惯称之为"张五婆"，住在汉口汉正街祥和里7号。此人矮小身材，小脚，梳妆打扮得干净利落。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却十分精明强干，平日走家串户，帮邻居排忧解难，貌似善良，骨子里却暗藏奸诈。

当然，搞这样大规模的诈骗，光靠她单枪匹马显然不行。物以类聚，她联络了一帮人组成一个庞大的诈骗集团，其中主要骨干是王翼飞夫妇、"十姊妹"等人。

32岁的王翼飞是汉阳县人，当过伪"黄卫军"的少校副官，是个汉奸。他老婆王赵氏，山东人，是个"交际花"。抗战胜利后，王侥幸漏网，一贫如洗。后来，夫妇二人靠邀会、标会、代人存放款等诈骗起家，购置了汉正街凌云里房屋，室内陈设富丽堂皇，俨然公馆派头。王以部分存款投入大中企业公司，担任了该公司协理。他整日西装革履，出入乘坐自备新人力包车，举止极为阔绰。1945年底，经同屋朱王氏（朱婆）介绍，与张五婆结识。张五婆也是个邀会、标会老手，两人一拍即合，互为"会首"。由于王翼飞气派非凡，又是协理，王赵氏打扮得花枝招展，口若悬河，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王与张五婆合流后，王翼飞利用张五婆的社会

力量和在市民群众中的影响，张五婆利用王翼飞在外面的社交场面，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里应外合，组织严密的诈骗集团。

他们行骗的手法主要是“邀会”、“标会”。所谓“邀会”，即由一人出面邀约街坊、友好（一般邀10人左右），每人出相等的钱（例如10元右右）交给约会人（俗称会首），然后每月“标会”一次，人会人都可出“标”，谁出的“标底”（即利息）大，谁就得会。“邀会”、“标会”在武汉相沿成习，本是民间自发的一种借贷、存款的方式，开始带有互助性质，标利很低。参加的人多为妇女，一般是利用节省下来的钱或暂时不用的钱，存一个会，一方面可以待急需时取用，一方面可以获取一定利息。由于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来会的人越来越多，“标底”越来越大，实际上形成了“高利贷”似的形式。

“邀会”关键人物是“会首”。会首必须具备良好的信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较好的交际能力，而这些条件，张五婆诈骗集团都具备。老五婆开始“邀会”时，收钱、付钱清清楚楚，可谓“信誉卓著”。参加她的会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她也参加别人邀约的会，照例出标付利，这样结识的人就不断增多。不久，以汪大姐、韩二姐、陈三姐、杨四姐、何五姐、刘六姐、俞七姐、孙八姐、黄九姐、吴十姐等组成的“十姊妹”，由标会与张五婆结识，同时拜张五婆为“干妈”。这样，“十姊妹”在张五婆的安排下，四出为她“邀会”，他们八方串连，以一串十，以十串百，以百串千，一个月30天，天天有会可标，有时一天要标几个会。有了“十姊妹”这支“先锋部队”，张五婆诈骗集团可谓“如虎添翼”。

这个诈骗集团中，还有一个得力“主将”，是个吃斋的妇女，名叫刘汉斌，人称“刘师兄”或“二师兄”，住汉正街光裕里。这个所谓“看破红尘修来世”的“斋姑”，却颈带金项链，手带金镯子，招摇过市。她帮张五婆代收会钱、存款、放款，从中牟利。她在外面吸收存款给利月息一分到一分半（1%—1.5%），存入张五婆处则提高到二三分（2%—3%）。“斋姑”靠此发了大财。

这伙诈骗分子兵分三路（张五婆、刘汉斌、王翼飞）到处“邀会”，人

数膨胀到数千人，钱数达十几亿元以上，味口越来越大。他们除"邀会"外，又以存款、放款方式行骗，把存放利率提高到大一分至大三分(10%—30%)，使许多借高利贷的人动辄破产，家败人亡。而一些贪图高利的人又纷纷把钱存到张五婆这里来。

张五婆用高利吸来的会钱、存款，并没有投资工商企业，而是用来购买一些黄金首饰。在黄陂老家购田买地，又在汉正街购置祥和里房产。这样死钱没有盘活，白白付出高额利息。

由于张五婆、王翼飞等所收会钱、存款年深月久，负利过巨，至1946年7月，本利总数达13亿元，来源不继，难以弥补，诈术渐穷。许多标会者和存款者见事不妙，纷纷向张五婆追索债款。起初，王翼飞夫妇还出面周旋，说"钱有着落，大家不要着急"，力图挽回局面，掩盖真象。到了7月下旬，回天乏术，债主盈门。此时张五婆和王翼飞互相"踢皮球"，张五婆说有12亿元和一些金银首饰存放王翼飞处；王则称有2亿元存张五婆处，未见张分文。这样，诈骗集团终于露了真相。

1946年8月18日，债权人汪云龙等100余人，将张五婆、王翼飞、王赵氏及王家包车夫梁家茂抓住，扭送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押经繁华的中山大道，像游行队伍一样，王翼飞胸前挂有一个牌子，上书"大骗犯王翼飞"，前面有人沿途高呼："请看13亿元大骗案主犯王翼飞！"有4个强壮有力的人挟挽着王翼飞前进，后面跟着男女债权人百余人。有些老太婆走不动，坐着人力车跟随，计有27辆人力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交通为之阻塞。许多人跑上前去朝王翼飞吐口水，揪王赵氏头发，叫骂不止。

9月12日，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张冯氏(即张五婆)、王翼飞、王赵氏(王妻)各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7年，债务部分应付"假执行"(即由法院查封被告人之财产，拍卖后偿还债务)，而那个裹姑刘汉斌则未见处理，原因不明。喧嚣一时的"张五婆大骗案"就此草草结束。

(商若冰)

汉口轮渡跳板折断案

45年前，汉口江汉关(今武汉关)轮渡码头发生一起空前惨案，数十人葬身鱼腹，酿成多少家庭悲剧。

那是1947年9月6日，这天风大浪急，汉口王家巷至武昌的航线宣布停航，仅江汉关码头一处开航。欲过江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江汉关码头。当时江汉关轮渡有"建汉"、"建施"两艘轮船行驶，到上午10时左右，建汉轮舵链发生故障而停航，仅剩建施轮行驶。一时船少人多，轮渡当局不采取疏散乘客的措施，反而一个劲地卖票，致使趸船、跳板上全都挤满了渡江乘客。当时有多少人候船，据汉口地方法院检察处调查后写的材料证实："江汉关航线平日一般售票在6500张左右，连免票乘客在内约为8000人。9月6日这天到11时为止售出之票竟达4440张，加上免票乘客，应在5000人以上。11时前，'建汉'、'建施'两轮共开出9次，运出乘客总数不超过4000人。肇事时(按：上午11时)已买票候船者，在趸船、跳板以及人棚口处最少在800人以上，很可能达到1200人。

这么多的人挤在长20呎、厚1呎、宽6吋(英制计量单位)的腐朽跳板上和其他处所，由于跳板下方腐朽部份计3吋半(均据长江航政局鉴定报告)，加之乘客多、载量过重，跳板承受不了，终被压断，站于其上者一下子全都掉进滔滔奔流的大江。到底有多少人掉进江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查清，当局当然更不愿查清。

据遇险游上岸者给当时法院检察处写的旁证材料证实："遇难者约计百许"，"自行游泳登岸者仅26人"。另据法院检察处提供资料，称"此次肇事溺死者计有刘余三……等6人，湖北水上警察局移送阳逻培心善堂捞获死尸调查表明尚有无名死尸10具。……培心善堂还提供另有14具死尸因江流太急未能捞获。"仅据这项官方材料，死亡已达30人左右。而遇救群众材料证明至少有百人遇难。可是湖北省航业局却反复说

"只有二三人死亡",显然是想大事化小,逃避罪责。

案件发生前,江汉关码头曾以电话将拥挤情况报告航业局程楚栋局长,程命彭副局长赶往码头,但他对混乱情形熟视无睹,未采取任何措施,以致酿成此一惨案。

案件发生后,湖北省政府决定:码头管理员赵浚撤职、趸船水手头目喻凤祥解雇,送法院审判;业务科长刘炳耀及汉口营业所主任徐国瑞各记大过一次;船务科长卢光余记大过一次;航业局长程楚栋记过两次;建设厅长谭岳泉记过一次。

赵浚、喻凤祥被解往法院后,航业局大小员工均不平,联名致函法院检查处申诉。赵、喻两人更不服,均先后提出申诉。经法院最后判决:傅祥浩(船务科代理科长)、李骏逸(副工程师)有期徒刑一年,王可曾(助理工程师)、喻凤祥有期徒刑6个月,其余人赵浚和两名售票员无罪释放。航业局科长以上人员一个也未涉及,国民党的官官相护,使几个小职员、工人当了这次惨案的替罪羊。

(商若冰)

"济饥辟谷"仙方的传说

中国的气功神奇无比。近闻一种"养生益智功"中竟有"服气辟谷"的功法,惊叹不已。所谓"服气辟谷",从字面上看就是只吃空气不吃饭,练气功练到这份上,那真叫绝,节约粮食自不待言,就是节省那买米买菜、做饭吃饭的时间也是够吸引人的了。但我不知是否真有练成"服气辟谷"功法的。

气功与道家术数有渊源关系,大凡进山修炼的人,总想找到一种仙草或炼出一种神丹,吃了长生不老,升天成仙。他们摸索出一套炼丹法、养身术,气功的发明,他们有一定的功劳。

翻阅陈诗的《湖北旧闻录》,发现了由在山修炼者传授的一个"济饥辟谷"仙方,此方还是要吃东西的,比吞丹辟谷、服气辟谷要实在得多。

据称这个仙方曾勒石立于汉阳大别山(龟山)太平兴国寺，供广大民众救灾、济饥之用。该碑称为"救荒碑"。碑文如下：

昔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黄门侍郎刘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氏，传济饥辟俗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大豆五斗淘净，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开取仁。各捣为末，和捣作如拳大，入甑内蒸，从戌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晒干为末，干服以饱为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顿得七日不饥，第二顿得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得三百日不饥，第四顿得二千四百日不饥，更不必服，永不饥也。不问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强壮，容貌红白，永不憔悴。口渴，即研大麻子汤饮之，转更滋润脏腑。若要重吃物，用葵子三合研末煎汤冷服，取下药如金色，任吃诸物，并无所损。前知随州朱颂教民用之，有验。序其首尾，勒石于汉阳大别山太平兴国寺。

同治《续辑汉阳县志》也曾著录此碑文，其来源与陈诗一样，都是《王氏农书》。该书作者抄录碑文前发表议论说："辟谷之方见于石刻，水旱虫荒，国家代有，甚则怀金立鹄，易子炊骸，为民父母者不可不知此法也。"这完全是一种慈悲为怀，救民苦难的好心。从碑文来看，完全不像晋代表奏语言，当系后人伪托无疑。方中所列大豆、麻仁，皆极富营养之物，吃了此二物制成的干粉，能够饱几天也是不成问题的。然谓长期不饥，甚至永远不饥，则不可误信。（田雨）

孟宗哭竹生笋
——"二十四孝"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成为驯服的工具，便大肆宣扬"二十四孝"，借此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所谓二十四孝，即是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

祥、郭巨、杨香、朱寿昌、庾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褒、丁兰、孟宗、黄庭坚等 24 人的"孝行"的统称。在这 24 位孝子中,"哭竹生笋"的孟宗是江夏(治所在今武昌)人。

孟宗,字恭武,三国时吴国大臣,官至光禄勋、司空。其家在武昌高观山(今蛇山)北至 凤凰山之间某地,今已不可考。孟宗酷爱竹子,故在宅边栽竹千计,闲暇时常去竹林欣赏竹子的风姿。

孟宗幼年便失去了父亲,母子俩相依为命。母亲只得每天在江边捕鱼和给人做针线活来挣钱供他读书。

孟母是位贤德的母亲。在孟宗初为吴国管理渔业的监池司马时,她为教儿为官清廉,也为了使儿子免受贪污的嫌疑,竟在儿子 3 年的任期内不吃鱼。有次孟宗亲自结网捕鱼,腌制成鱼鲜寄给母亲,孟母退还了鱼鲜,还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后来吴王又派孟宗管理国库官粮,孟宗不忍心再让母亲 3 年不吃粮食,便向吴王奏请辞去这个官职。他说,"我当了 3 年渔吏,我母亲 3 年未食鱼。现在大王令我管官粮,我母亲怎能 3 年不食米呢?"吴王为孟母的贤德所感动,同意孟宗辞去此职。

天性纯孝的孟宗,对母亲极尽孝心,是吴国有名的大孝子。相传有一年冬天,孟母生了重病,想吃鲜笋。可是这时不是竹笋生长的季节,一筹莫展的孟宗来到宅旁竹林悲泣哀叹。忽然,奇迹出现了,随着孟宗的哭声,一根根竹笋从土中冒出,孟宗尽到了孝心。于是,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便流传开来。孟宗任吴令时,母亲去世,私自回家奔丧,然后自拘于武昌听候法办。吴王孙权以其素行孝道,予以从宽处理,得以免死复官。

孟宗的孝行,孟母的贤德,受到人民的尊崇。人们常去祭扫孟宗与孟母的墓地,并在武昌凤凰山下孟母墓前立下牌坊,上写"吴司空孟母墓园",在哭竹生笋处立下了刻有"孟宗哭竹生笋处"字样的石碑。五代时,吴杨溥为了纪念孟宗,于天祚年间(935—937 年)在武昌高观山北麓修建了"灵竹院",其远孙南宋末荆湖制置使孟珙又将它改建为"孝感祠",1491 年(明弘治四年)重建,改名"灵山寺"。可惜的是这些遗迹均

不存。

（胡永弘）

旧武汉的斗蟋蟀

相传斗蟋蟀始于唐太宗贞观初年（一说始于天宝年间）。当时中国统一，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上自皇宫内院，下至各级文武官员，无不尽情享乐，斗蟋蟀的风尚随之出现。据说有一太监捕得一头紫色黄身的蟋蟀，献与太宗，竟将宫内各院所蓄蟋蟀全数击败。后来，又与大唐名相魏征一头全身皆黑的蟋蟀在焚香炉内角斗，良久不分胜负，还是魏征见机行事，以"臣虫敌不过陛下之虫，陛下之虫胜了"为词结束了这场"战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凡是斗蟋蟀的人都以拥有紫黄色虫为荣而在斗的时候又放在香炉里的由来。

武汉从清末民初起，至解放前夕，斗蟋蟀的人也不少，每年秋季，武汉三镇爱斗蟋蟀的人，集中汉口涵芬茶楼（今江汉区双龙街附近）或楼外楼旅馆（今江汉路人民饭店）等地，互相较量，这些场所都有主事者，他们一般是失业军官或与官府有联系的人，既可应付有关方面的需索，又能对付流氓地痞的捣乱。此外，还有掌掸子的人，即裁判员，他们帮同约定地点时间，与本、外埠负责人联系，布置场面进行赌博，每一赌局终结，主事者和裁判员都收取一定数量的佣金。

斗蟋蟀时，先由双方根据蟋蟀大小及优劣，决定与谁互斗。然后，由双方各将对斗蟋蟀拿到特制的斗台上，并各派3人立于斗台两边，台后由裁判员负责掌掸，观众立于台下，在双方负责议定斗金数额并将参斗蟋蟀由各自盆内转入香炉之后，由裁判员用掸把两虫赶拢互咬。一局结束，玩场人向输方收取赌金给予赢方。而在台下，观众亦可找对象押赌，输赢完全以台上胜负为转移，有时比台上输赢还大。

蟋蟀斗至最后几天，由主事者制定5块银牌，分别镌刻正副左右翼勇字将军字样，其中将军牌子，镀以赤金，以示独特，分别赠给全季参

加角斗的获胜最多的5只蟋蟀作为纪念。凡是得了银牌的帮或个人，一般又拿出高于银牌若干倍的现金，赏给这些玩场人，或另外邀约各帮有关人员吃喝一顿，以示蟋蟀与人都有面子。

显而易见，玩蟋蟀这种活动，表面上是蟋蟀在拼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行为。

（朱务本）

相命骗术种种

以占卜问吉凶，古已有之。早在周代，就有文王课、易经流行。发展到近、现代，占卜之术又有许多变化，什么抽签、测字、卜卦、手相、面相、扑克麻将算命、排生辰八字算命等等，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迷信占卜的人仍不在少数。武汉街头抽签、相命的地摊仍时有所见，甚至有人发明用"电脑"算命，则更是"前无古人"了。

占卜活动纯属迷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有不少人甚至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也迷信此道？那就不得不"归功"于施行此道的人善用一个"骗"字。无论是问卦、抽签，都离不开这个"骗"字，而相命（看相、算命）的骗术则更加高明罢了。

解放前，武汉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测字摊，较高级的则长期包租著名旅社挂牌相命，更高级的则自建或租赁房屋开设相命馆。如汉口有名的"吴铁嘴"则在今民众乐园对面永安里口开了一家大相命馆。里面陈设气派非凡，"仙"气十足，一般凡夫俗子不敢仰视。

算命先生有一套黑话（称为"局子"）、行规，入门要拜师，说什么"进了江湖门，一生不受贫，到处能吃饭，家当比不赢"，并要求严守行骗术的秘密。"江湖一点诀，勿对妻子说，若对妻子说，七孔流鲜血。"他们把给人算命称之为"审囚"、"盘点"、"宰猪"。行骗术仅两个字："慑"和"刚"。"慑"是使人惶恐，"刚"是刀口上的钢之意。

"慑"有四种，即"飞栽赌邪"。对来客先用"飞慑"，说来人要见什么

不吉之事，如是非、破财、丧人等。如来人答应已见了什么事，就接连用"栽惶"：说来人又会有么事，藕断丝未断，火熄烟未散，要来人谨防。如来人不相信，则用"赌惶"：跟来人打赌，说某日某时非见不可。当顾客被吓倒肯出钱化解时，再用"邪惶"：要来人去做忏悔，求神化解；或叫来人何时何地不交何样的人，趋吉避凶。

沦陷时汉口有家"胡糊涂"相命馆，一天清晨尚未开门，胡在床上抽鸦片烟，一个"点"（即来问吉凶者）手提皮箱推门进来要算命看相。胡叫他稍坐，胡边抽烟边窥"点"，估计手提箱内是钞票，抽烟谈相，用一"飞惶"，说这人目前是生死关头，有大凶大吉。这人本来心虚胆怯，当面求胡指引生路。胡开口要100元（银元）才讲。来人说只要不遭凶险就可以。胡收钱后便说，你的相上目前流魂泛海，九死一生，如不趋避，危莫可逃。现在四处有凶，一方占吉，北方最凶（胡看来人北方口音，身着军服，时间清晨，手提皮箱，定是由北南来才下火车，所以才说北方最凶），西方也凶，南方去不得，只有东方可行，能叨吉化，事不可迟，速行为上。来人花了100元冤枉钱，反而千恩万谢而去。正是"识透人情便是仙"。

"刚"有两种，即"龙刚"、"千刚"。一说人么样好，称"龙刚"；一说人么样坏，称"千刚"。20年代初，汉口大相家黄鹤山给北洋军官赵荣华、李景林两人相命，用的是"纯龙刚"，说赵很快可升师长，李不到一年可升督军。以后，李景林果然升了督军；不仅当时花200元（银元）相金，还把黄鹤山找去给了一个"参议"官衔。至于赵荣华花了100元相金，是否当了师长，则只有天知道。

他们行骗的手法当然不止这几种，什么翻天印、靠子、滚勾、连环套、水火票、蛋出血等不一而足，反正万变不离其"骗"。还有一套28字诀："掌老扶幼骂中年；先千（刚）后龙（刚）用心坚，来问何事有何事，前头见过防后头"。掌握了这一套骗术，就能无"骗"而不胜。

人生道路难免坎坷，有喜怒哀乐，有企求，有危难，有奢望，当这些问题发生而不能自解时，人们便只好求助于占卜术了。占卜术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因盖此。

（商若冰）

汉口药帮巷与药王庙

药帮，即中药材帮，是汉口开埠以来就有的一个大行帮。早在明末崇祯年间，有一批来自河南怀庆府（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自古为药材集散地，以“怀药”驰名）的药农，携带当地出产的地黄、山药和其他中药材来汉口摆摊销售。他们在今硚口区“宝寿桥”附近的一条僻静小巷居住下来，就地出售中药材。时间一长，一些药材商贩都到这里做药材买卖。生意越做越活，名声越传越远，从河南沁阳及邻近地区来的药农也就越来越多。他们都在此巷定居下来，并集资兴建怀庆会馆，久之便形成了一个“帮口”，人称“怀帮”，这就是汉口最早的药帮，这条无名小巷也因此得名“药帮巷”。如今，随着汉口市区日渐发展，一条僻静的小巷发展到“药帮大巷”、“药帮一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了。

“怀帮”生意做出了名，本省汉阳县、咸宁县和武昌县的药商也纷纷来药帮巷做生意。为便于竞争，又形成了“文帮—汉阳帮”和“武帮—武昌、咸宁帮”（对外统称“汉帮”）。外省的如浙江、江西来的药材商，则人称“浙帮”、“江西帮”。

各帮口自成体系之后，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加兴兴旺，便各自组织人到药材产地去收购。他们鼓励药农种药、采药，鼓励长途贩运，包产包销。还有的店铺在产地设收购站、点，就地收购。药帮巷内以及邻近的九如巷、沈家庙、大夹街、汉正街等地自然形成了药材市场。

生意兴隆，钱赚多了，一些大商号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这都是“药王”孙思邈（唐代医学家。但有史书认为，药王系指神农或扁鹊）的“赐予”，因而各帮共同捐资在今硚口区药帮巷小学地址上修建一座“药王庙”。每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相传为“药王”生日）到庙里进行朝拜。

汉口药王庙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壮观，黄瓦、绿棰金边，绘有云头小狮花纹。共分为前大殿、后大殿和花园三部分。前大殿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前是弧形看台楼，楼上设女座，楼下设男座。

前大殿门宇轩昂，门上有镂金浮凸的“药王殿”三个大字牌额。门口两侧蹲伏着高约 2 米、宽约 1 米的一对大石狮，每个大石狮身上和脚爪旁各雕有 1 个小石狮，形象栩栩如生。大殿卷棚前，石台阶中间是甬路，卷棚两边是钟楼，楼旁均建有石碑亭。大殿两厢，左是更衣室、浴室，右是怀帮药材堆栈。前大殿的正中靠壁，摆着一个大型紫檀木的供桌，上放一个神龛，龛内供奉有药王孙真人的牌位，设有神像。牌位前放着一个大型紫铜香炉和一对铜烛台。神龛两侧和殿内的盘龙大柱旁各挂着一副紫木金字的对联，墙壁上挂着明朝董其昌等名家字画。大殿周围挂有宫灯 48 盏，金碧辉煌。

后大殿有一个大阁，名“覃怀阁”。阁内摆着一个供桌，供桌上小神龛里供奉着药王的牌位。四周摆放着精致的红木靠椅和茶几，大阁上面挂着 20 盏琉璃纱灯，壁上挂着很多名人字画。这里是覃怀会馆（即怀庆会馆）的会议室，大阁两侧修建了几十间大房，陈设富丽，还有餐厅，是怀帮仕商寓居之所。大阁后面是一座“三皇殿”（“三皇”有六种说法，较普遍的说法是：“燧人、伏羲、神农”），供奉着“三皇”神像。

花园分东花园、西花园和后花园三园。东花园内有火神殿、凉亭、喷水池。西花园内有财神殿、凉亭、石碑亭和池塘，池内种芦根、石斛等药材。后花园内有荷花池、假山、水榭、石桥和二程夫子殿（“二程”指北宋著名学者程颢和程颐）。这三个花园里都有松柏、槐桑、杜仲之类药用的树木，还有很多奇花异草。这三个花园是怀帮仕商避暑胜地。

汉口药王庙内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和文物，可惜历遭劫难，绝大部分都被毁坏。药王庙曾发生三次大火，后大殿被焚后没有再修。二程夫子殿在清乾隆二十六年重修过一次，武汉沦陷时药王庙的建筑物被毁坏不少，戏台和看台楼均被日寇拆毁。覃怀会馆为了保护庙宇，在庙里办了覃怀小学（现为药帮巷小学），保存了一些建筑和文物。“文革”中，庙内仅存的少数古代字画被一扫而空，石狮、石龙毁于一旦。

现仅存一个石狮藏在药帮巷小学左侧一间民房里，还有三块地契

碑记和雕凿有小狮花纹的一条石横梁在药帮巷小学的后院里，为盛极一时的药王庙留下一丝历史的遗迹。

（商若冰）

街头巷尾讲“善书”

所谓“善书”，又称“劝善书”，是根据一定的材料或事实编成的劝人行善做好事的本子。早期的善书源于道教，宋时已流行的《太上感应篇》是最古的劝善书。到明代大量制作，如《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阴骘文》等。清代由于乾隆帝的提倡，更翻刻了大量劝善书，最有名的是周心耕刻的《敬信录》，将劝善观念普及。到了后世用善恶有报的具体故事来宣传这种观念，讲“善书”有如讲故事，使更多的下层群众也能接受行善积德的通俗性伦理观念。

旧时武汉讲“善书”的活动也很普遍，一般在春秋两季举行。春季多半在正月底二月初，秋季则安排在七月初一至十五。讲时，要搭一个高台，台的正中立有牌位，是黄纸做的，上书“谨遵圣谕”或“宣讲圣谕”等，两旁则有红纸写的一副行善的对联。讲“善书”的人，先对牌位叩头作揖，然后开讲，在讲的过程中，有哭有言，有问有答。当情节需要什么角色出场时，台后就有扮演什么角色的人出来。或婆婆或媳妇，或官吏或犯人。这样一哭一言，一问一答，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听众中的一些，尤其是老太婆和青年妇女，在听到伤心处时禁不住哭了起来。

清末民初，讲“善书”的多由善堂组织，请年高德劭的知名人士主讲，不收报酬。1931年大水，汉川、汉阳等县涌进武汉的灾民中以讲“善书”为业的人，三五成群搭台宣讲，赚钱糊口。他们将当时汉阳县蔡甸镇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余海子谋杀案编成“善书”《一口血》，并在以前讲过的本子中挑选出情节感人的《四下河南》、《塘坊产子》等长篇故事，连番宣讲，吸引大批工人、苦力、小市民、家庭主妇、爹爹、婆婆，使武汉人对“善书”的爱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1935—1948年，据估计，武汉有20多个讲“善书”的班子。汉口的罗家墩至华清街、水厂至龙王庙一带，武昌的起义门津水闸一带，都有“善书”艺人坐堂演出。其中，皮子街至龙王庙沿汉水几十家茶馆，如硚口“四海春”茶社、宝庆街傅桂林父子开的茶社、皇经堂“吴瑞记”茶社、宗关村的“即日兴”茶社等是讲“善书”最热闹，最集中的地方。三署街的“瀛台”茶社，请来汉川“善书”艺人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从1935年开讲，一直讲到1943年，整整讲了8年。可见当时有些人对“善书”迷到了何等程度。

1949年武汉解放后，讲“善书”的活动不复存在。

（朱务本）

名中医的奇怪处方

60多年前，武汉的冉雪峰和天津的张锡纯，都受到我国中医界的推崇，有“南冉北张”之誉。

有一年，安徽省主席的母亲高烧不退，请遍了该省有名的中西医都诊不好，听说武汉的冉雪峰确有“起死回生”的本事，特地到武昌求治。经过望、闻、问、切，冉雪峰开的无非是丹皮、鲜生地、知母、枯萎根等一些普通中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上好野山参一两，瓦上煅为白灰，煎汤作引”。这个处方传到社会上以后，不仅一般中医大惑不解，就连当时的著名中医杨树千也莫名其妙。

某次学术讨论会上，杨问冉：“伤阴用人参出自哪部药典？人参剂量多达一两，根据是什么？人参烧成白灰后还有药性吗？这是遵照哪位前辈传授的炮炙法？”冉的回答出人意外：“这不稀奇。病在人身，不能单独诊病，要重视病人的心态，切忌人病分离。既要治病，更要医人。譬如打仗，攻心为上。”

原来这位老太婆一向养尊处优，初起病也不过是打喷嚏，流鼻涕，头痛发热。她和她的家人却惊惶不安。中西医交替邀请，中西药物杂投

纷下，阴错阳差，造成阴伤热炽，病象垂危。冉雪峰开的都是便宜草药，吃惯了贵重药品的人家，怎么会相信两三角钱一剂的草药能治重病？有鉴于"贵人不信贱药"，冉雪峰想出了加野山参，而又把参烧成白灰当药引的办法。这样空有药名，不存药性，它起的不是药理作用，而是精神作用。老太婆听说药价很贵，以为是好药，连服几剂，病就好了，其实真正治她病的还是那些一般的草药。

（徐明庭）

"无不灵"测字

1949年4月底，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武昌的黄鹤楼前新添了一位测字先生。每当游人在他的摊子前停下来，他就指着侧边小树上挂的布招子"无不灵无不灵"六个字请人看，并且卖关子道："这六个字好认不好念，假如哪位尊驾念得出来，我奉送测字三个，不取分文。"

众人一听纷纷揣摩，有个穿长衫的人按捺不住喊了起来："我会念！无不灵，无不灵。"测字先生立即带笑抱拳："多谢老兄过奖。"随手抖开摊子上的一卷小轴："不过，列位请看，六个字要当八个字念，就是'无不灵。不灵无？不，灵！'"众人不解，测字先生接着说："唐诗曰，'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无'字用在句尾，就作'吗'字讲。不灵吗？不，灵！"众人一听，禁不住都笑了。

测字先生把盛满字卷的木盘递给那个自称会念的人："兄台是第一个捧场。来！免费测三个字。"不料那人也懂得一些门道，不去拿盘中的字，而要现写，测字先生同意了。那人立刻写了一个"京"字，并且说："问国事"。测字先生好象有些顾虑，环顾四周以后才说："我本来不想谈国事的，既然先生要问，我就照直说吧！北有北平，南有南京，请看两处重地，竟是谁家天下？京城尚且不保，国事也就难说了。"

穿长衫的略显惊讶，马上写了一个"金"字，"你看我是从哪里来？是干哪一行的？"测字先生脱口而出："南京古称金陵，阁下是从南京一带

来。金者，金戈铁马，长官是带兵的。”话刚落音，旁边一个穿中山服的拍着穿长衫的肩膀说，“你信不信？灵不灵？”

穿长衫的接着在“京、金”两字右边写了一个“斤”字，顺手把摊子上的石压条拿过来把“京、金”两字都压住了。“我再问我的流年运气。”测字先生略一端详，然后严肃地说：“‘斤’字左边加‘石’就成了‘斫’字。斫的意思是用刀斧砍。你不论是砍是杀，总斗不过他。”说时，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八”字。“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等测字先生谈完，那人忙不迭地说，“领教领教。佩服佩服！”拉着同来的穿中山服的人匆匆地走了。

围观的游人们似乎领悟了什么，赞扬声此起彼落：“高明高明！”“真灵真灵！”

从此以后，无不灵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同行甲乙丙原来瞧不起这个新来的；到这时一反常态，凑钱办了一些酒菜，请无不灵赏光。表面上是祝贺他一举成名，实际上是想“盘”他的根，摸他的底，为什么能把骗人的勾当搞得这样神？酒过三巡，他们连声追问其名师真传的秘诀。

无不灵笑道：“我哪里有名师真传，不过是找了几本看相测字的书读了几遍。生意来了，察言观色，逢人说人话，见鬼学鬼腔；看到菩萨烧高香。”

同行问他那天根据什么那样去测京、金、斤三个字？无不灵只好交底：“那天上午，我正要到黄鹤楼出摊子，在孔明灯前，看到那两人问一位老先生：‘这里测字哪个最灵？’老先生回答得很妙：‘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两人见问不出结果，就边走边谈，我恰好走在他们后头，从他俩的闲谈中，我听出这是南京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人，眼看战局节节失利，对前途有些悲观。过了一会，两人转到我的摊子前来了，我既然心里有数，当他写出那三个字，我就随机应变，说了那些话。假如是你们几位老兄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象我这样应付的。”

一个同行问：“你说国民党打输了，劝他们要识时务，未必不怕他们抓你吗？”无不灵放声大笑：“这就叫知己知彼。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

难保，估计不会跟我这个跑江湖的为难。何况我说的是老百姓爱听的话，他两个就是要变脸，围着摊子看的人也会出来转弯的。要是国民党各地的驻军都象北平傅作义那样，我们不就有太平日子过了吗？"

五个同行听了，无不点头称是。

1949年秋天，在成都的望江楼也出现了无不灵的测字摊。成都解放后就没有再看到他，据说他是一位负有特殊任务的进步人士。

（徐明庭）

鹦鹉洲的竹木市场

清道光年间，有湖南资水流域的安化、益阳等地的木商，自采自运，以小型竹排运来湖北汉阳出售，试获成功。接着，宝庆府一带和湘水流域的郴州、桂阳、祁阳、洞阳、长沙、衡州等地的竹木商人亦相继而来。初期排筏来鹦鹉洲时，都聚泊在洲北内河，停靠在汉阳老岸的药王庙、抱弧庵上下，朝宗门外上首一带，将此处作为交易场地。抱弧庵旁的安（化）益（阳）会馆、祁阳会馆、无量殿以及朝宗门外的郴（州）桂（阳）会馆，都是当时湖南商人聚集之处。后因鹦鹉洲洲身淤高，居住的人增加，加上货源日多，内河滩地有限，除郴、桂两地的商人外，其余商人都转移鹦鹉洲上，逐渐形成了享有盛名的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

做竹木生意的客商逐渐形成地域性的帮派，最早有江西帮、北帮（武昌、汉阳客商）、南帮（湖南洞庭湖之客商），还有相继形成的大冶花帮、无锡帮、常州帮和上海帮。

湖南安化、益阳两地所产楠竹，量大质优，各地制竹器，用楠竹可取篾5层，用土竹只能取3层。每年二、三、四、七、八月，两地楠竹运来较多，每月到洲数字总在三四十万根上下，竹木市场亦因此得名。

江西客商经营的赣江木材，质差量多，加之在洲上经营的地段不及南帮方便易于兜揽顾客，因此常有隔年积压木材，变色变质，不得不削价脱手，卖给南帮；经南帮转至洲上易售地段出售（行话称为"囤滩"）。

因为"囤滩"木材，进价便宜又无运途风险，所以得利优厚，南帮因而逐年兴起，江西帮便无形处于落后。

清光绪年间，大冶花帮逐渐发展起来，初办时由大冶刘、殷、白、纪四姓族人经营。柯逢时当广西巡抚发财后，看中竹木业务，便投资同乡共同经营此项生意，花帮资金雄厚，设有驻地坐办，兴旺时期，一年销售木码价值达白银数万两。他们的竹木排在水面运行，长途数里，排面搭盖储物宿人木棚，两厢面对形同小街。排头竖有斗式旗杆，张悬旗帜，临风飘扬。排尾可以种菜、养鸡、喂猪。排上装有水上车轮和旋转排行方向的设施，还有绞轮、铁锚、木犁等辅助工具。工人划排，以声号相应，锣鼓协调。排上除设文武账房外，还有负责指挥运行停泊的打鼓佬和领工班头。这种排声势浩大，当时称为"皇排"。此排起于花帮四姓，到柯逢时当道，便盛极一时。

最初，南帮客商运货来洲上，搭一棚子售货，货卖完连棚子一起卖掉回家。后来资金增多，便改为长年留棚续销。送棚工人原先也是送棚到埠后即结账回家，后来排多了，也有寄居洲上不归的。那时南帮客商遍及长沙、衡州、宝庆、常德、辰州5个州府，下属有湘、资、沅、澧4水流域的18个小帮组织，称为五府十八帮，五府在洲上建有两湖会馆，各分帮也在洲上建有各自的会馆，计有20多所。五府中的宝庆、常德会馆，富丽堂皇。两湖会馆更集全洲会馆之大成，尤为壮观。

太平天国时，由清军制造炮船时起，洲上竹木销售量骤增。同时海禁大开，都市日趋繁华，加上外商架竖电杆，敷设路轨，建厂开矿，均需大量木材，所有官需民用，莫不取之于洲。竹木供应，西达陕西，北至京津，东抵上海，南销鄂南各县，营业日益兴旺。民国初年，更加繁荣。经营木材生意的客户，正式登记于两湖会馆交缴厘头经费的，常在一千三四百户之间，未经立号的还未计算在内。交易额常达五六十万两码（每两码约值20银元，1.6立方米木材），还不包括楠竹、杂木和其他品种的交易额。洲上还设有缆索厂、竹篾坊、酒楼茶馆，可供邀宴赴会，聊天闲谈。竹木市场，热闹非凡。由于竹木在产区价值极低，只要在成排过程中不

出意外，都有利可图。吴全茂、黄万顺等行，客满沿江各埠，顾客之多，生意之大，称誉一时，号称行商巨子。汉川人孙和顺经营的斧记行，自营木材，发财至百万，誉为竹木业的"冠冕"。

武汉沦陷前夕，竹木在洲上的存量尚有20万两码。沦陷后日寇强行搬用，日伪组织、流氓、稽查明索暗敲，不几个月，竹木全空。不久，日寇实行木竹统制，客商被迫改行，洲上滩地逐渐成为各帮客商种麦、种菜之地。胜利后，许多客商遭受通货膨胀的打击，多已破产，加之产地停伐时久，运途梗阻，销地不畅，业务不振，向两湖会馆登记的大小牌号不过160多户，多数没有登记。

解放后，鹦鹉洲发生了变化。50年代初，竹木行业已转为国营，统一集运调拨供应，竹木进出运输，有排行、轮载、汽车、铁路都直通洲上，常住人口已达五六万人。鹦鹉大道贯通全洲，交通方便，商店工厂林立，千人以上的工厂共有20多家，全洲欣欣向荣，成为汉阳区百业兴旺的金色三角洲。

（商若冰）

和记蛋厂与坤厚里

提起英商汉口和记洋行，知道的人并不多，如果说起和记蛋厂，老一辈的武汉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其实，英商汉口和记洋行是它真正的牌名，冰蛋（包括冰全蛋、冰蛋白、冰蛋黄、全干蛋片、炕蛋白等）是这家洋行最主要的产品（该行还有冻鸡鸭、冻猪、牛肉等产品），远销英、法、德、美、加拿大以及英属各殖民地。因此，汉口人不称和记洋行而称和记蛋厂，就是这个原因。

和记洋行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28日在汉口开业的，是英国万国进出口公司在中国开业的牌名。该行表面上称为"和记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5万英磅，以1英镑为1股，股东有怀特、维克林、兰姆、兰佛德等人，实际上是英国公爵费史特（万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独资经营的，怀特等人既是费史特的亲友，又是万国进出口公司的职员，

一切听命于费史特。

汉口和记洋行由英人纪而大班(即经理)负责。行内分内外两部分，内事部是洋人，由大班率领(内有副班、大写、机械工程师、管理冰库、蛋厂等各重要职员)。外事部是华人，由买办率领(内有副买办、账房、稽查、庄首等职员)。拟定营业计划，调拨款项，决定进出口品种，归内事部负责。按照内事部的决定，向华方买货、卖货则归外事部负责。而外事部又由内事部领导。

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做生意，必须要物色中国人作为帮手，而中国又有一些人甘心为外国人卖力，从中得到好处。这些中国人就是"买办"。和记洋行初来汉口，主要业务是收购鸡鸭。厂址设在汉口六合路。起初业务并不顺利，鸡鸭死亡率高。后提拔工头杨坤山为正买办，黄厚卿为副买办，业务日渐发展，逐渐成为武汉颇负盛名的洋行之一。而杨、黄二人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杨坤山乳名和尚，从小生长在汉阳县农村，由和记洋行第一任买办广东人王某介绍，到该行鸡鸭场当工人。他有一套饲养鸡鸭的本领，把鸡鸭的死亡率由10%—20%降到2%左右，得到王买办的青睐，提拔他当工头。接着他又提出一套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深得大班纪而的赏识，于是王买办被辞退，杨坤山于1903年被提拔为正买办，每月工资由30元一跃为600元(合米100石)，从此平步青云。杨坤山、黄厚卿当上正副买办后，通过做假账，变更收购限价，收取庄首的"孝敬"钱等办法，每年收入不下数十万元。

和记洋行在杨坤山等人的努力下，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开业时的5万英镑，到了武汉临近解放时，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从1903年起，和记以30万银元来建筑和记厂房。在胜利街(前抵胜利街，后抵中山大道)六合路口购买23195市亩基地，建起钢筋水泥四层楼房两栋，六层楼房一栋，机器平房一栋，冷冻冰房一栋，还建有屠宰场、冻油厂、鸡鸭饲养厂和购买大量土地。此外，在湖南靖港、益阳、宁乡、长沙芭茅洲、江西庐山牯岭、河南的驻马店、确山、明港、信阳、鸡公

山等购置有大批房屋田产。正副买办杨坤山、黄厚卿也在汉口中山大道下段一元路与一元小路之间合资建造了一个里弄，用杨坤山的"坤"和黄厚卿的"厚"命名，定名坤厚里。这个坤厚里实际成了洋奴剥削中国人民的罪证。

杨坤山财大气粗，因而得罪了他的主子——总大班费史特，两人闹到对簿公庭，奴才当然闹不赢主子，1926年杨坤山被解雇，回汉阳原籍当寓公去了，他的职务由黄厚卿接替。抗战胜利后，黄亦被解雇，由闵绍骞继任。闵一直干到武汉解放，才跟和记洋行一起在中国消失了。

（商若冰）

从仁济医院到协和医院

汉口协和医院，是一所久负盛名，融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型医院，它的技术力量、医疗设备等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都是比较先进的。它创建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迄今已有126年的历史，是汉口一家古老的医院。它的建立和发展，都跟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汉口等内地城市为通商口岸。并规定："传授习学耶稣教、天主教者，一体保护"。为教会侵入中国内地开了绿灯。在这种情势下，英国牧师杨格非受基督教伦教会总部派遣，到中国长江流域各省市传道。1861年6月9日，杨格非和另一英国牧师威尔逊一道抵达汉口，在汉口金庭公店巷内租了一间"吊楼"，开始了传教活动。杨格非为了接近群众，获取人心，使布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决定以看病施药为传教手段。1866年，杨格非向在汉外商募得白银2500两，在后花楼居巷（今交通巷）建立了一所有两个病房能收治15—20个病人的小医院，于是年9月8日正式开业，称"汉口伦敦会医院"，又取仁爱济世之义而命名为"汉口仁济医院"，这就是汉口协和医院的雏形。

当时，医院仅有一名英籍内科医师雷德，且每天只在院内工作两小

时，没有护士，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另外有一名勤杂工和一名黄包车夫。医院除看门诊和施药外，设有两个病房，一个收治外国病人，一个收治中国病人，且都只收男病人。

1875 年(光绪元年)，雷德医师对医院的设备条件和周围环境不满意，加之业务量增大，医院已不敷应用。于是，他用 500 两白银买下太平路广南洋行的一处地产(今江汉路四明银行处)，捐给伦敦会。伦敦会向中外商人又募得白银 5000 两，于 1878 年建成了新医院，其前门开在居巷，与旧院相对。杨格非为纪念已故夫人玛格丽特，将新院命名为"玛格丽特"医院，并决定在新院增设妇孺部，从此开始收治女病人。

1882 年，伦敦会总部派托马斯·纪立生医师来汉主持医院工作。此时，医院才增设外科，开展普通手术和截肢手术等。年门诊额已达 2 万左右，年住院数达 500—600 例次，年手术也达 500 余例次。

1902 年，伦敦会兴办了"汉口伦敦会医科学校"，又称"大同医科学校"，由仁济医院院长纪立生兼管学校工作。1906 年，该校首批毕业生进入医院。自此，仁济医院才开始有中国医生。

仁济医院业务日益发展，病人日渐增多，原医院已不适应需要，扩建又受到地皮限制。于是，医院董事会与早在 1864 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在汉建立的普爱医院(今市四医院)合作，组成"汉口医院协会"，筹建新医院。该会反复选择，最后选中了跑马路(又称西满路，后改中正路，现为解放大道)的一块地皮。地产主刘西满(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之子)听说修建医院，便将此地产(即今协和医院院址)无偿地送给了医院。1926 年，由建筑师胡伯设计，营造商韩亚辛承建。两年后，新医院建成，1928 年 4 月开始收治病人，纪立生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新医院是伦敦会(建立了仁济医院)和循道会(建立了普爱医院)合作的产物，因此定名为"汉口协和医院"。当时医院门口之所以悬挂有三块牌子："汉口协和医院"、"仁济医院第一医院"、"普爱医院第二分院"，便是这个缘故。原后花楼仁济医院仅保留居巷一处(今交通巷 95 号)，称"市内门诊部"。

协和医院当时在武汉甚至在全国都可称先进水平，院内科室齐全，设备完善，病床较多，并实行医教结合，先后举办有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博医技术专科学校和普仁护士学校。

当时医院打着"济世救人"的旗号，也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1931年水灾时的救治工作，1937年抗战时自愿赴上海救护伤员等，但它始终是为宗教服务的。医院在工作人员中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收纳为基督教徒。凡是由教会派的外籍医生都称为"传教医生"。中国医生虽未冠以"传教"二字，但也负有同样的任务。医院附设的护校、技校每年都要举行"洗礼"，学生必须参加，不受洗礼者则很难取得毕业资格。医院的宗教活动十分频繁，早晚祷告，饭前祷告，唱诗班，查经班，不一而足。后来还在医院内专门建造了一座教堂——灵光堂，以进行宗教活动。通过治病，也在病人中广纳教徒，在病房里宣传教义，发给病人基督教宣传品。宗教活动渗透到医院一切活动之中。

武汉沦陷初，医院停业，后经和日方多方交涉，才开始收治病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医院被日军接管，成了日本驻军传染病医院。英籍院长和医护人员在遣返途中被囚于上海平民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才获释。抗战胜利后，被囚人员返回汉口，在伦敦会、循道会的支持下，着手恢复医院工作。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汉口协和医院获得了新生，各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从此步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商若冰）

官商相争的武昌掘金案

50多年前，武昌曾发生一件掘金案，这批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挖出后，官商争夺，轰动一时。

案发地点在武昌粮道街61号及其毗邻的尚书巷1号住宅内。房主是曾在国民党政界显赫一时的孔庚。由于官场多变，孔庚浮沉迭更，正

闲居于此。这栋住宅的原主子是黄冈人刘维桢(人称刘长毛)。清代咸丰年间,刘长毛投机参加太平天国军队,后变节降清。随清军攻抵南京后,刘囊刮沿途抢劫的大批金银、珍宝、古玩返回武昌,过着寓公生活。刘生前暗地在武汉埋下101个金窖,刘在临死之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98个窖。有3个窖没有说出就断气了。孔家这个金窖正是来不及说出的3个窖之一。金窖所在地尚书巷1号是另立门户的,原住户童某已迁出,房屋无人居住,空着上锁。房屋下边是与粮道街61号为邻的彭幼南住宅。

1934年端午节这天,孔家过端午节,又过生日,家中上下,忙个不停。彭幼南也从汉口回家过节。夜间,彭出后门小解,朦胧中看到上边孔家屋后坡岸倾坍,泥土随雨水下泻,泥土中混杂着闪闪发光的块粒,也滚了下来。彭走近一看,原来那闪闪发光的是小银锭,当即惊得目瞪口呆。彭幼南在汉口是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对金银的识别颇有见地,立即电话告知汉口金银号的兄弟彭石荪率亲信渡江回家,偷进尚书巷1号,动手挖掘。孔家那边过节做生,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彭家这边不动声色,埋头挖窖,手忙脚乱。

农历五月初八早晨,彭家兄弟以肥皂木箱盛满的金银珍宝20余口,抬到汉阳门轮渡码头准备渡江,适遇武汉警备司令部少校副官李某在码头值勤,李见木箱沉重,挑夫忙忙碌碌,形色可疑,便上前盘问,得知是从粮道街抬出的。李是孔庚的旧属,怀疑孔家被盗;一面制止木箱抬下轮船,一面电话孔家查询。彭家兄弟见势不妙,灵机一动,趁李打电话之际,以巨款疏通警备部士兵,迅即将木箱抬至曾家巷码头,重价雇只木船,过江而去。孔家得电话后,满宅查看,并无什物丢失。再打开尚书巷1号大门,看到厨房里挖了一个大坑,坑旁边还有不少耀眼的小银锭,孔家用箩筐来检装,足足检满了两筐。这是彭家兄弟花了两天三夜的挖窖时间,来不及检装而弃置下来的剩余财宝。

孔家以所有权问题,向警备司令部和法院控诉彭家兄弟盗窃。彭家兄弟一面将金锭珍宝10余箱转运到上海租界密藏;一面手持黄金四出贿赂,以求平息无事。警备司令叶蓬和法院的负责人都得到不少黄金。

警司和法院为了敷衍孔庚，特组织"掘金调查委员会"进行调处。调处会上，彭家兄弟只承认挖得银锭数箱，否认挖得黄金珍宝。孔家从侧面了解到挖有大量金锭、金器以及其他珍宝，但找不到人证。互相坚持不下，不能论断。

1935年，张群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孔庚企图请张群出面解决这项悬案。在张群的就职大典上，孔庚借故大骂叶蓬受贿。叶蓬也不甘示弱，指孔庚倚老卖老，想发横财，反唇相讥。张群见闹得不可开交，只得大骂叶蓬狂妄，扰乱大典，嘱其退席。并面准孔庚所求，亲自过问此案。

彭家兄弟面临如此困境，立即逃离武汉赴上海，将所有珍宝转移香港。孔庚并不因此罢休，专程去南京找司法院长居正，请断曲直。居正准状，组织"武昌掘金调查团"来汉处理。但这时彭家兄弟及家人已全部逃往香港，调查团只好作了一个被告缺席裁断，收彭幼南的粮道街住宅断交孔庚了事。一桩轰动一时的掘金案即告结束。

（武文七）

千古悲剧"江宽"轮遇难

1918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北军"和以岑春煊等为首的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南军"正酝酿议和。而段祺瑞反对议和，主张乘胜追击，用武力统一中国。他怕代总统直系头子冯国璋从中作梗，便于是年4月23日由北京来到汉口主持军务会议，与会者有督军赵倜、张怀之、王占元、两湖宣抚使曹锟以及奉、苏、赣、鲁、皖、湘、陕、晋各省代表20余人。但会议中主和主战意见不一，未获结果，会后，段祺瑞准备乘船东下，沿途与赣、皖、苏三省督军进一步商谈。

4月25日下午，段祺瑞登上"楚泰"军舰，晚上9时开航，海军专门派"楚材"军舰护送。这晚天气阴沉，大雨滂沱，能见度极低，楚材舰却全速前进，超越"楚泰"舰向下游急驶。当行至汉口丹水池铁路线路碑130

号江面上、离江岸约3华里处时，突与由上海驶汉的招商局大型客货轮"江宽"号相撞，酿成了一场千古悲剧。

"江宽"轮有船员105人，此次由沪驶汉，装载乘客1200人，货物1500吨。该轮原定于4月25日下午6时进汉口港，因雨雾过大，在武穴停泊两小时，故到达丹水池已过晚上9点。由于能见度低，"江宽"轮根本看不见迎面而来的"楚材"军舰。及至两船相距很近时，才互相发现，急鸣笛示警。"楚材"舰满车下驶如飞，不待转舵，已相距仅一箭之遥了。"江宽"轮吃水甚深，转舵不及，被"楚材"舰头齐腰折断，轰然一声，船上灯火全熄，四周漆黑一团。只听见人们的呼救声、惨叫声，难辨西东。江边的小划子不敢往救，怕船小人多，不能救人，反遭不测。又是阴历三月，江水寒冷刺骨，加之大雨不停，落水之人，不是淹死，就是冻毙。

当"江宽"轮船头、船尾快要全部沉没时，随送段祺瑞的湖北省水警厅长何锡藩乘"鄂巡"小火轮，又请求美孚煤油公司的"美鹰"、"第八号"两拖轮先后赶赴失事地点抢救，奈时已夜深，风雨交加，施救甚难。费九牛二虎之力，总共救起者不满200人，其中船员52人。其余千余人不是随波顺流而去，便是闷死在舱中(一说得救325人，捞获尸体280人，无下落者75人)。一连几天，在江面上看到许多被冻死、淹死的尸体，情况极惨。

26日清晨，湖北督军王占元亲赴肇事地点查勘，而段祺瑞乘坐的"楚泰"军舰早已安抵九江了。

事故发生后，招商局汉口分局与汉口各慈善团体办理善后事宜，商请美孚、亚细亚两公司派出"敦实"、"永安"两艘拖轮以及普化、培心两善堂的红船20余艘，参加捞尸工作。所捞之尸以及在舱中闷死取出之尸均送至后城马路慈善会广场(今中山大道利济路武警湖北总队)陈列，让死者亲属认领，延至5月间，尸体腐烂，奇臭难闻。无人认领之尸，均送往汉阳义冢(卧龟山下、钟家村附近地区)安埋。丹水池附近浮起的尸体，皆就近掩埋在丹水池的荒地里。

尸首安埋后，由招商局汉口分局、汉口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共同

发起举行一次超度亡魂的"道场祭奠"(类似今之追悼会),各方面送来挽联很多。其中有冯玉祥将军的挽联:

浩劫讵无因,最可恨驶上商轮,飞来兵舰;

英灵归何处?定化作汉阳云树,鄂渚烟波。

夏口律师公会的挽联表达了人们的悲愤之情:

世界只有强权,汝辈冤魂,胡不向对头索命;

当道太无公理,我心惨切,哪能据法律量刑。

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楚材"舰长赵进锐、副舰长兼航海长余振华,案发后在湖北督军署军法处扣押了一个极短的时间,原拟判赵死刑,余有期徒刑。后经海军次长徐振鹏等援救,赵仅被免职,余则另行调动。受难家属不服,向北京政府控告,招商局总办向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均无结果。赵余二人躲在其他军舰上,逍遥法外。对死难船员家属由招商局每人抚恤 30 元了事,广大死难乘客的赔偿根本无人过问,这桩千古悲剧就此不了了之。

(商若冰)

旧陆军医院轮奸案

1948 年,汉口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4 个国民党军官、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轮流奸污了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的妻子。当时,此事激起武汉各界人士、广大市民和舆论界的无比愤慨,一直闹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经代总统李宗仁干预,罪犯们才得以伏法。

事情发生在这年 9 月间。座落在汉口黄浦路口的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汉口陆军总医院"(解放后接管,原址即今 261 医院),收住了不少国民党陆军官兵。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楼将亮因患肺结核病,住在该院内科 11 号病房。楼团长系浙江诸暨人,当时约 40 岁左右。由于病重需人照料,他的妻子陈愉被特许住院陪伴。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 4 岁,一个仅 8 个月,也陪同父母住在该院。陈愉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是

个师范学校毕业生。她和丈夫感情甚笃，对于身染重病的丈夫并不嫌弃，精心照料，毫无怨言。她举止端庄，每天除陪伴丈夫、照看孩子外，从不到处游逛，病员们十分尊敬她。

该院内科17号病房中，住着6个患轻度肺结核病的病人，他们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附员崔博文、少校军医曾立民、少校副官石磐、上尉军医凌志、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某大学在校学生袁尚质。后两人虽非军人，但因跟院方和联勤总部的人有亲属关系，因此也住在该院。这帮人虽然个个"仪表堂堂"，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却都是些兵痞流氓、花花公子。名曰"病员"，实际都很轻微，他们吃饱喝足之后，每日无所事事，专门凑在一起，想歪点子，出馊主意。他们早已看中陈愉年轻貌美，起下邪恶念头，经常趁陈愉到厨房拿饭或到池边洗涤衣物之机，上前搭讪。但陈愉一身正气，不苟言笑，从不跟他们交谈，有时出于礼貌，也只敷衍一两句，使这帮家伙的企图难以得逞。这帮人依仗自己的后台，有的甚至当着一些病员的面说些风言风语，可陈愉从不假以词色。为了少惹麻烦，陈愉白天就更加少出病房，她把洗衣物的事放到晚上人少时去做，有时硬是偷偷摸摸地去洗，尽量避开那帮家伙的耳目。日子长了，陈愉每天在夜间洗衣物的事被那帮家伙侦知，为了达到他们邪恶的目的，他们策划了一起更大的阴谋。

9月9日这天晚上，陈愉跟平时一样，端了一大盆全家换下的衣服准备到水池边去洗涤。当她正穿出走廊朝水池边走去时，突然从17号病房窜出两个人——崔博文和凌志，用衣服将陈的头蒙住，还没等她喊出声来，崔博文用棉花纱布已塞进她的口中。随即几个五大三粗的人把她拖进17号病房，将陈愉按在地板上进行了轮奸。待这六个禽兽发泄兽欲以后，陈愉才睁开昏花的双眼，认出了崔博文等六个畜生。

六人轮奸后，惟恐事情败露，用威胁的口气对陈愉说："这件事不准你声张，否则，你儿子和丈夫难活命。"

陈愉无端遭此凌辱，又羞又愧又恨，边哭边回到11号病房。楼团长发现妻子神色异常，衣衫不整，忙问出了什么事，她本打算不讲，深恐丈

夫气得吐血，但心中冤屈又想向亲人倾诉，便将此事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丈夫。

楼团长秉性刚烈，一听妻子被辱，只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就要去找那六人拼命，陈愉一旁苦劝，说楼以病残之躯，无法与之抗争，加上儿子幼小，如动起武来，恐遭不测。两人商量很久，决定找院方反映，寻正常途径，依"法"解决。

第二天清晨，陈愉带着六人犯罪的罪证——污秽的衣裤来到院长室，向院长蔡善德、训导长刘家桢反映，请检验身上伤痕并逮捕罪犯。蔡、刘两人起初根本不信，经检验罪证，才答应调查，但要求陈愉不要声张。陈愉年轻幼稚，哪里晓得其中的内幕：凌志是该院的检验员，又是该院医务长孙明和的结拜兄弟。曾立民的妻子是该院的护士。崔溥文既是联勤总部的官员，又是该院张主任的好友。袁尚质是该院某领导人的表侄。石磐、查大钧也有很硬的后台。院方得报后，不仅不进行调查，反而叫住在17号病房里的陈松连（石磐的勤务兵，发案那天他睡在走廊里，事后他供认，他亲眼看见崔等六人把陈愉抬进17号病房）把地板用水冲洗干净，销毁现场罪证。然后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威胁利诱陈愉，要她不要告状。

陈愉决心要求惩凶雪耻，见院方有意拖延、官官相卫，便到汉口市妇女会申诉。该会当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声援陈愉的问题，并请陈到会报告受害经过。经讨论决定成立"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并向全市发出通电。会后妇女代表顾若昭、张人骥等偕同陈愉晋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陈愉面向白泣诉了六犯的罪行。白崇禧表示："一俟证据齐全，即予严办，决不使被害人含冤。"后援会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武汉著名律师张楚信、张显棠等愿义务担任陈愉的常年法律顾问。

此事发生后，武汉大小报纸如《大刚报》、《中国晚报》、《正风报》、《罗宾汉报》等都详细地报导了这一事件，上海有的报纸也发了驻汉记者的专电，闹得满城风雨，全国皆知。

事已至此，白崇禧才下了一道手令，要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司令部军法处办理此案，并将崔博文等六犯逮捕归案。

湖北省参议会和汉口市参议会得悉此事后，分别致电白崇禧，要求"当局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由于此事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一些军官愤愤不平，纷纷投书军事当局，指出"目前前方正在打仗，军人眷属多数得不到丈夫的直接照顾……丈夫是卧床不起军官，妻子被人集体轮奸，前方将士闻之非常寒心。"加之各界舆论的压力，震动了国民党首脑机关，蒋介石曾三次来电，令白崇禧查明严办。白将这些电报转给第九补给 区司令朱鼎卿，朱下令给军法处："限三日呈判 "。

六犯被捕后，他们的家属终日奔走呼救。他们召开茶话会恳求社会支持；多次联名致电白崇禧、朱鼎卿要求"公正处理"；还在汉口各大报发表声明、启事，宣传他们的观点，甚至诬称"陈愉是否神经正常"，"是否尚挟有其他目的"，企图为罪犯们开脱。然而事实俱在，铁证（陈松连的证词 、陈愉的伤情证明等）如山，经补给区军法处三审定案，判处四名军人罪犯死刑，两名非军人身份（查大钧、袁尚质）罪犯移送法院判刑。白崇禧又令长官公署军法处复审无误后，上报国防部审批。

国防部派军法局长尤雄章来汉对各罪犯逐个进行了审讯，同意补给区军法处判决。经李宗仁代总统批准（蒋此时已"隐退"），第九补给区军法处于 1949 年 3 月 23 日 5 时 45 分将崔博文等四犯绑赴法场执行枪决，查、袁二犯移送汉口地方法院审判。历时半年震惊全国的大案到此结束，这伙衣冠禽兽终于得到可耻的下场。

（商若冰）

夫妻黑店思明堂

黑店思明堂药房系民国初年来汉的日本商人矢田氏夫妇所创，表面上是推销日本成药，实际上则以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为主要业务。1921 年，武汉厉行禁烟、禁毒运动，矢田氏夫妇自忖已获得厚利，继

续冒风险不值得，于是将其所得资金悉数汇回日本，人也随之离去，汉口思明堂的店堂和设备及残存的少量货物，则交植松康行（矢田夫人之弟）夫妇继续经营。

思明堂药房店址原在今江汉路南京理发厅。植松康行接手后，业务逐渐发展起来，店址数度迁移。先是迁至现中山大道保成路对面湖北省交通厅，旋又迁至今江汉路人民银行礼堂，最后迁至现江汉路电业局对面原三井洋行隔壁。1934年还曾在当时属日租界的现长春街邮政支局所在地建造一幢三层楼的房屋，开设了思明堂药房分店。

植松康行夫妇在刚接手经营思明堂时，迫于形势，只推销日本成药，销售医疗器械，代订日文书报杂志。但随后不久，又对原经营的一些淫药和制造毒品的工具、原料，成套成批的出售。他们利用当时中国关税不能自立的弱点，拉拢江汉关日籍职员田中，通过田中打通其他人员关节，达到走私、贩毒、偷税漏税的目的，如海关规定必须批准签证后方能进口的磷酸可的因、吗啡、海洛因等麻醉品和5毫升以下的注射器及针头，思明堂在向日本厂商购买后，分别包装在脱脂棉内，使用假发票，利用田中的关系，蒙哄其他海关人员偷运到汉，课税也轻。就这样，植松康行夫妇掠得了高额利润，大发横财无数。

思明堂药房存在近3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植松夫妇回国，它也就寿终正寝。

（朱务本）

金圆券存兑骗局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将人民手中的银元收归"国有"，兑成法币，禁止银元流通。法币开始发行总额为8亿元千万元，到1937年6月即增至14亿1千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国统区经济失控，乃乞求于高速运转印钞机，于是，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总额竟猛增至6636946亿元，增加377万倍，达

到了天文数字。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到两条大牛，到1947年初则只能买到1/5根油条。

在全国解放的前一年(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败，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为了挽回败局，挽救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蒋介石也于次日发布了实行金圆券的命令，宣称每元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以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银圆1元换金圆券2元，每市两黄金换金圆券200元。妄图以"币制改革"的老办法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也知道，光凭这些办法不会使人民就范，一面硬性规定，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持有黄金、银圆，限期兑换金圆券，否则一经查出，即严厉惩处，外汇一律存入银行，不准动用；一面命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银圆，按照发行时原价兑换，但必须以同等价值的金圆券存银行定期存款一年(即金圆券2元兑换银元1元，再存定期存款金圆券2元，实际是4元金圆券兑银元1元，因为存入银行的那部分到1949年就成一堆废纸了。兑换黄金也一样，即金圆券200元兑黄金1市两，再定期存款金圆券200元，实际是400元金圆券兑黄金1市两)，美其名曰"金圆券兑现"，实际上是打了对折。

汉口中央银行，更是花样翻新："规定每笔必须满银元50元，或黄金1市两才能兑换，零星小数不办。换言之，必须手中持有400元金圆券才能去兑换银元或黄金。在当时，公教人员和升斗小民工资收入都极其微薄，每月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哪有余钱去向银行兑换存款呢，但是，由于市场金银黑市价与官价悬殊很大，尽管兑换手续苛刻，但仍有利可图。一些投机商人和银元贩子在外收集到散碎黄金和银元，用高价向市民兑回金圆券，然后向中央银行兑换黄金、银元，牟取暴利。当时民生路统一街口就是汉口最大的银元黑市市场。

由于去银行兑换金银的人很多，很快形成挤兑风潮，汉口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每天天没亮门前就挤满人群，秩序混乱异常，

踩死人，挤伤人的事也不断发生。金圆券存兑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加之国库空虚，这场存兑闹剧仅办了五六天就寿终正寝了。后来，随着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政府只有发行大钞票，重蹈旧法币的复辙。到1949年春，距金圆券发行不到半年，寄一封平信，要贴邮票金圆券500万元，按政府牌价，即需用25000市两黄金才能寄一封普通的信件，真可算世界奇闻了。

国民党政府通过发行金圆券大大地捞了一把，全国不算，仅武汉市，就强迫市民收兑了黄金7.36万市两，白银55.1万市两，银元520余万元，这还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官方统计，有些入了贵族豪门、达官富贾私囊中的就只有天知道了。

金圆券从开始发行到最后崩溃，前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行史上最短命的记录。一场以搜括人民血汗为目的的闹剧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而草草收场，在金融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商若冰）

后　记

为了弘扬武汉的历史和文化，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武汉，我们编写了这本《武汉掌故》。

本书力求所叙史实信而有征，因此，撰稿人多约请对市情比较了解的"老武汉"担任；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有史料依据。除了正史、方志、报刊与《汉口丛谈》、《汉口竹枝词》、《湖北旧闻录》等史籍外，我们还参考了近人、今人的部分著述，如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徐焕斗的《汉口小志》、黎少岑的《武汉今昔谈》、潘新藻的《武汉市建制沿革》、皮明庥、李权时主编的《武汉通览》、武汉市及各区县政协文史资料等，特此说明，并向原作者致以谢意。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振兴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徐明庭先生热情关怀，不仅备充顾问，而且审阅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王兴科同志代为查找资料；朱务本同志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武汉出版社潘长胜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严昌洪　萧志华

1992 年 12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武汉掌故
作者=
页数=482
SS号=0
出版日期=
Vss号=87109032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编·
故园青史话沧桑（代序）&杨振兴
“武汉”的由来
“扬子江”名的来历
芳草何处鹦鹉洲？
晴川历历汉阳树
汉阳为何在汉水之南？
武昌名山“龙”占多
“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
蛇山古迹觅踪
孔明灯、石照亭与仙人洞
涌月、压云与南楼、北榭
历史的纪念
有凤来仪——武汉三座凤凰山
黄鹤的故事与黄鹤楼
清代黄鹤楼的铜顶
龟山古迹揽胜
摩崖长留天地间
千湖之乡——武汉的湖泊
后湖何处觅芳踪
东湖定比西湖强
李白泛舟郎官湖
“坐两天牢，充一天军”——昔日马沧湖之旅
高山流水有知音
榴花吐蕊为谁开？
汉阳十景名胜多
黄陂十景与“铁锁龙潭”
归元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
宝通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二
古德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三
莲溪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四
佛教居士团体
抗战僧尼救护队
汉口第一公园——中山公园
不知遗址所在的怡园
乃园——一幅“田园山水画”
歆生花园漫忆
杨森花园

萧耀南庄园
花楼街的故事
“背娘舅”与保华街
“满园春色”一名街
华清街——多事的街
汉口里弄的崛起
接驾嘴接谁的驾？
故国神游——三国遗迹巡礼
黄巢的“系马桩”
凤凰山下“天完国”
三公庙异事
未雨绸缪——晋将陶侃的故事
焦度与焦度楼
“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宋状元冯京轶事
江夏的榜眼和探花
汉阳的榜眼：萧良有与熊伯龙
唐代武昌大员趣闻
二程夫子与黄陂
黄陂文武三榜眼
弃城而逃的威顺王
“诡谲秀才”吴彻
官文督府“三大”
裙带风一例——陈夔龙妻改变朝廷成命
张济川一日“三捷”
阅马厂与红楼
孙中山铜像与黄兴铜像
“床下都督”黎元洪
黎本危的醋劲与改嫁风波
为科学献身的徐建寅
大智若愚——华蘅芳为仆所愚
词人老去风情不减——王湘绮与“侠妓”王金玉
地皮大王刘歆生的自吹
孔庚监狱写春联因祸得福
萧楚女、李四光改名趣谈
为中国工运献身的第一人
“劫收”大员“四大金刚”
话说武汉童子军
保卫武汉的三大空战
中山舰金口遇难
武汉的鲁迅逝世周年祭
汉口人力车夫血泪史
吴一狗案
龚银保案

徐典案
“四三”惨案
水杏林案
“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一三里与工人运动讲习所
两个“六一惨案”
“六一惨案”祸首“投江自杀”假相
蒋介石怒杀韩复榘
洪帮“寨主”杨庆山
王世杰不怕挖祖坟
吴国桢照相馆结姻缘
《俄华辞典》与陈昌浩
陈时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郭沫若与第三厅
“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熊廷弼巧帮冯梦龙
江夏书画家趣闻
“江夏画派”的鼻祖——“画状元”吴伟
闵呆子为啖牛脯而作画
美术家的摇篮——武昌艺专
汉口市警察局长策反内幕
张轸智斗“小诸葛”
黄陂三姊妹
杨永泰被刺案探秘
陈启天与国家主义派
僧房认子报夫仇
两世姻缘
黄鹤楼九老诗会
“莫笑鸲眼石，不换蛾眉人”
第一支劳动人民的足球队
武汉的古老书院
江汉书院
晴川书院与凤山书院
经心书院
两湖书院
钟台书院
近代学堂的兴起
早期警察及其警务、警风
武汉邮政、电信之始
武汉铁路、火车之始
中国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
《鄂州约法》的诞生
景明大楼美军淫舞案

满城争说“双钉案”
奇特的社会产物——武汉的茶馆
“九头鸟”典出何处？
漫话除夕旧俗
春节习俗琐记
龙腾狮跃闹元宵
教罗汉与大士阁求子
木兰山进香旧话
洪山菜苔趣闻
“秋来倍忆武昌鱼”
热干面与名小吃
美人店的蝴蝶面
武鸣园里吃河豚
近代汉货精品
武汉著名老字号（中药业）
古老的药店叶开泰
“同登寿域”的金同仁
以饮片闻名的陈太乙
洪帮大爷开设的初开堂
武汉著名老字号（绸布业）
妇孺皆知的谦祥益
悦新昌绸缎局
武汉著名老字号（餐馆业）
经营楚乡名菜的老会宾楼
以鱼菜为主的大中华酒楼
小笼汤包四季美
豆皮大王老通城
老大兴园与“？鱼大王”
从“筱陶袁”到“小桃园”
武汉著名老字号（食品杂货业）
２５０年的老店汪玉霞
“一大把”蚕豆起家的曹祥泰
过世纪的的伍亿丰
老锦春酱园
和利汽水厂发家小史
经营有方的国货公司
“外圆内方”——周恒顺的立厂之本
武汉地区主要教堂
韦棣华与武汉第一所图书馆
湖北最早的西医院和第一位西医
花园山育婴堂的万婴墓
三镇善堂与汉口慈善会
阳逻浮尸与培心善堂

游弋江、汉的救生红船
敬节堂里嫠妇泪
“大水冲了龙王庙”——近代武汉大水灾
大火烧不尽，劫后又复兴——明清时代汉口大火灾
旧汉口的堂子姑娘
洪帮帮规种种
“翻戏党”及其拆骗手法
“花会”与花会迷
“丐帮”探秘
·下编·
龟蛇锁大江的传说
汉阳古城的兴废
武昌城的变迁
汉口堡的兴建与拆毁
洪山上的塔
九峰山与无念禅师
八分山与白云洞
木兰山与木兰古寨
九真山的“九”
吹落乌纱帽　变作镇水山——纱帽山的来历
三镇古堤漫忆
澹灾伟画——金水闸的修建
“谁人垒石架长虹？”——三镇古桥巡礼
古江汉亭与雄楚楼
古镇金口与留云亭
“无陂不成街”——汉口的黄陂人与黄陂文化
江楚名区长春观
九宫八卦的元妙观
神灵之宅的武当官
闹市街头的大道观
旧武汉的“长街”与“正街”
武汉名人路
用“三民主义”命名的四条路
武汉行业街
汉口的“雨花台”——铭新街
防汛险段龙王庙
汉口的“龙须沟”——黄孝河
武汉第一座水塔
梅神父医院与梅神父路
人间地狱——汉口难民区
武汉三条文化街
火巷与水巷
汉口“墩子”何其多

汉口的会馆、公所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清代汉阳两相国
注意平政刑的吴正治
迷信误国的叶名琛
张之洞生活琐闻
“丫姑爷”张彪
梁鼎芬驱逐章太炎
“从武昌县开国子”到“鄂王”——岳飞与武汉
从学徒到兵部侍郎
学台充刑台　冤狱难平反——黄陂胡瑞澜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天国”故实
九女墩
江、汉浮桥
“双料举人”与“状元游街”
清王朝祭台上的牺牲
首义“三武”
湖北“三怪”
廉介刚毅的石瑛
圣洁苦行的严立三
嫉贪如仇的张难先
省主席当县秘
“密青天”与“密疯子”
汉口“末代市长”晏勋甫
寇英杰电话局碰壁
“屠户”和“三蛋将军”
“烟土大王”出任禁烟处长
洪帮首领周胜余
“中国女神童”冯铸
恶有恶报——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不得好死
楚王府轶闻
封建亭与楚望台
愍王为世子所弒
华奎假王案
楚宗人造反
华奎被沉入江
龙泉山下楚王陵
从“反日英雄”到大汉奸——叶篷罪行录
黄卫军是什么货色
狱中十三姊妹
斗级营七姐妹
湖北女师学潮

断子绝孙的刘桂狗
活捉汉奸汪步青
徐祝平娶日本女谍
短命的伪共和党
“魔术师”顾顺童“变”成了叛徒
柳亚子题曹立庵印谱
推门竟是弹冠客
张若柏得印丢命
王铭章灵梓过汉记
戴笠行宫与雨农图书馆
刘镇华妾与小杨月楼私情
萧耀南暴死之谜
张少帅主持球赛
夏寿康“忧容”“庸相”
追悼“三·一八”烈士联争
断指争路与割肉血书——武汉保路风潮中的动人事迹
革命党人筹款奇招
奇文共欣赏——汉口审判厅为孀妇改嫁之判词
急公好义的汉口商人
孝子里与李孝子
冯玉祥与抗到底社
七月社与时调社
抗战电影与《抗战电影》
“好一记鞭子”——《放下你的鞭子》在武汉街头
昭文新报——中国内地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
江流呜咽无处诉——清末民初两度“大江报案”
华字《楚报》的创办与被封
“现世报”与《现世报》
王国光与《汉口中西报》
《江汉日报》插图讽时政
南洋大楼
武汉新式旅馆第一家——汉口大旅馆
璇宫饭店今昔谈
宝庆码头与宝庆会馆
“瓷瓦描青”的万寿宫
中国最早的地图出版社——武昌亚新地学社
洋人的俱乐部——波罗馆
所谓“模范监狱”
洋奴、洋“法”和巡捕房
吴天保演《哭祖庙》
在汉口演京剧的第一个外国人
“小叫天”高月楼“响”遍武汉
花鼓戏、楚剧和沈云陔

演戏的革命军都督——刘艺舟
京剧票友和票社
旧汉口的戏园
《蝴蝶杯》与蝴蝶杯
武汉最早的影星——“模范美人”叶秋心
跑龙套起家的丑星大和尚
谭派鼻祖谭鑫培
老牡丹花与小牡丹花
汉剧公会及其三任会长
楚剧改革家李百川
新市场大舞台今昔
丹桂舞台的变迁
一末带十杂——汉剧的脚色
小凤仙挽蔡锷联的捉刀人
闲话“老圃”
汉口的跑马场
汉口华商总会
大端阳节
元旦开笔
六月六、赶臭肉
“童言无忌”
“二百五”、“半吊子”的由来
“打扁担”、“刮胡子”及其他
洪山的天齐会与甘蔗节
“五方杂寓，家自为俗”——客籍人风俗拾零
武昌火药局爆炸纪实诗
轰动全国的张五婆大骗案
汉口轮渡跳板折断案
“济饥辟谷”仙方的传说
孟宗哭竹生笋——“二十四孝”这一
旧武汉的斗蟋蟀
相命骗术种种
汉口药帮巷与药王庙
街头巷尾讲“善书”
名中医的奇怪处方
“无不灵”测字
鹦鹉洲的竹木市场
和记蛋厂与坤厚里
从仁济医院到协和医院
官商相争的武昌掘金案
千古悲剧“江宽”轮遇难
旧陆军医院轮奸案
夫妻黑店思明堂

金圆券存兑骗局
后记
附录页